

1915年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

1917年

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新青年》总部迁往北京

简体典藏全本

新青年

第一号至第五号

原刊主撰 陈独秀
本书主编 杨宏峰

《新青年》的首要之功，就在于它彻底地否定了传统的封建文化与道德伦理，在于它高高扬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新青年》虽然亦有时代之局限，但无疑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座高耸的里程碑。

可以说，举凡国人关注的新知识、新问题，《新青年》同仁皆试图给予解答。故，只有如此表明政治态度而非具体学术主张之“民主”与“科学”，才能够集合起众多壮怀激烈之新文化人。

1923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

1920年

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

1923年

在广州改为季刊，瞿秋白担任主编，
成为中共中央正式理论性机关刊物

1926年

因故停刊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新青年

简体典藏全本

第一号至第五号

原刊主撰 陈独秀
本书主编 杨宏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 / 杨宏峰主编.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227-04748-3

I. ①新… II. ①杨… III. ①期刊—汇编—中国—民国 IV. ①Z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3409 号

《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第一号至第五号

杨宏峰 主编

责任编辑 郭永顺 丁丽萍
封面设计 陈冰融 张宁
责任印制 李宗妮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37.75 字数 71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8685

版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748-3/Z·147

总定价 88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一般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滥觞，是以1915年《新青年》（初名为《青年杂志》）之创刊为标志。1917年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之结集，遂使运动风靡全国。《新青年》是鼓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主要阵地。陈独秀创办该杂志时，适值民国初立，北洋军阀窃权，二次革命，袁世凯抓紧称帝，《二十一条》签订，定孔教为国教，等等。国内形势风云变幻，政治状况一团糟糕，如何重建政治基础，并为之作出合法性论证，在—批觉醒的知识分子中间大有市场，《新青年》可谓适逢其时。其中，《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被后来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思想旗帜，直至今日，它们已经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被写入各种不同的教科书中，被一代代学者直接运用，被一代代青年直接接受。赞誉五四新文化者以此誉之，诋毁五四新文化者以此毁之。可以说，《新青年》的首要之功，就在于它彻底地否定了传统的封建文化与道德伦理，在于它高高扬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新青年》虽然亦有时代之局限，但无疑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座高耸的里程碑。

我们应该承认，“民主”与“科学”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基源，并不是没有值得讨论的地方。首先，我们必须看到，陈独秀提出“民主”与“科学”的这篇文章，是以“答辩书”之方式写成的，并且是在回答“根本上立于反对的地位”的论者的攻击时所使用的两个思想标准。我们不妨看看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是怎么说的。他说：“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

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呱呱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陈独秀接着说，在这些“非难本志”的人中有两种人，一种是“爱护本志”的，一种是“立于反对的地位”的，这第二种人，“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人治），这几条罪案。”接着，陈独秀又说：“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办法。”“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2~243页）这两段文字见解精辟，表述生动，常为史家所征引。这就意味着，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时期，“民主”与“科学”已经是五四新文化同人独有的思想旗帜，它们同时也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所承认，或者说所不得不承认。“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言下之意，就是他们没有气力、没有胆量反对“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对于他们而言，已经是一种权威性的话语。

《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之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两个权威性之话语，说明它们已被中国文化所接受，并非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始，而是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夜。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清王朝“天朝大国”之迷梦，对中国伦理—政治型文化传统也造成了致命打击。中国第一次被迫面向整个世界，在恐慌、震惊、自卑而又自负的不平衡心态中，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与现实、价值与知识。这是中国早期现代化之外在动力。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的变迁尚有其内在之根据。事实

上，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外部世界之挑战，而是内部传统之危机。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走向是在中国历史内部要素与西方文明外部示范之双重制约下进行的，这必然造成现代性的复杂性。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现代性理性法则建构起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主要是在个人主体领域起作用，“民族国家”是不言而喻的当然的外在前提。一旦现代政治民主以假理性之名行使专制，造成对个体空间和文化的戕害，现代性反思者便会站在人性自由之立场予以抨击，以期寻到有效平衡，重新激活现代性的生命力。中国则不同。由于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重新论证社会制度与人心制度的正当性，“中国问题”一直左右着知识分子阶层的思维。这种论证大体涵盖了三个不同层面：在历史层面，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单位如何走向现代化，在国际间不平等竞争中如何取得强势地位；在生活秩序的价值理念层面，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与西方理念如何协调，民族性的价值理念与相应的知识形态如何辩护；在个体安身立命之意义层面，个体承担与意义之有效性如何落实与维护。此种“中国问题”之思维，积聚着种种民族性之情绪，一再延宕着“中国问题”向现代性问题之转化，在民族性原则与科学原则之间造成难以消除的紧张。故，中国之现代性问题就变成“救亡”与“启蒙”（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的双重变奏。民族国家之独立与富强、政治民主化之追求与设计，被当然地置放为现代化之首要目标和考虑一切问题之基本前提与立足点。这种现代性之两难处境伴随着早期现代化的整个历程，从经世致用思潮与洋务运动，一直到维新运动，莫不如此。可以说，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外力逼拶日甚，内患日深，为了救亡图存，近代中国才出现了如此之多的革新运动。虽然，这些不同阶段的革新运动由于受客观条件与主观认识之制约，而各有其不足的地方和局限性。换句话说，运动的推动者由于对中国困局造成之总体因素缺乏充分的认识，导致改革目标的不够完整。但是总体来说，这些运动之发展是一步步走向深化的，如洋务运动追求坚船利炮，是以器物层次为改革目标；维新运动追求君主立宪，是以政制层次改良为目标；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是以政体层次为革命目标。这接连的几个运动都各有其主导之革新目标，一个又比一个深化，事后作历史检讨，又感到其目标的不完整、不深刻。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产生，中国人才集中认识到，中国所面临之危机，不仅是国力的落后，更是文化发展上的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在思想观念上作彻底改造的觉悟，才触及了中国革新的核心问题。说得清楚点，从洋务运动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经过历次挫折之反思，中国人对困境之造成，才算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当然，在中国，民主之诉求归根到底仍然是在反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之愿望下产生的，是在救亡图存之愿望中产生的，因而洋务运动官僚知识分子现代性之目的同时也是在野维新运动知识分子提倡民主政治改革的根本目的。在现代性之根本目标上，这两个革新派是没有分歧的，分歧仅仅在于如何更加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总的来说，他们的民主理念并不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基础之上，而只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政治形式。维新运动推进了洋务运动官僚知识分子的“科学”观，由以发展先进技术为主要目标的自然科学领域进一步推进到社会科学领域，但由于其现代性的终极目标与洋务运动官僚知识分子并无不同，故在其实质的意义上，它仍然是以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主要目标的，其主要理路是：通过政治制度的改革使重视现代科学技术的政治人才进入国家政治体制，以利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实现现代化的目的。这就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科学与民主两个概念的极为特殊的错落关系：民主理念是包含在科学理念中而存在与发展的，科学（主要是数学、自然科学的理念）之普及程度要远远大于民主理念之普及程度。此种关系，改变了在西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真理性的一条马克思主义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使在维新运动知识分子那里，民主这个概念也同时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作为一种现代政体形式的民主与作为传统的“民贵君轻”意义上的民主。直至现在，中国文化中的民主这个理念，仍然是此两种意义之混用，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表达的是“民贵君轻”之思想。表面看来，“民贵君轻”较之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更加彻底，但它是在承认君主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不可动摇性的基础之上的，故传统的“民贵君轻”充其量只是一种思想理念，没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可操作性之特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是在《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取得胜利的。但当时的“民主”仍然是像孙中山那样的政治领袖人物之思想理念，是他们依照西方政治制度之形式设计出来的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形式，孙中山之“三民主义”也只是他们的建国纲领，而不是建立在中国社会公众个人权力基础上的政治民主。在中国，以技术为重心的“科学”是国家军事与经济之发展战略，“民主”是国家政权之一种结构形式，它们都是与国家政权直接联系在一起。辛亥革命之后，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它们有了至高无上的合法性，甚至有了很高的权威性，但却与整个中国社会公众之思想没有必然的联系。《新青年》所倡导的“科学”，也同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面

旗帜。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化同人理解的中国现代文化，在其性质上就是“科学的”，“科学的”就是“现代的”，“现代的”就是“科学的”。但是，这种一元化之现代文化观，至少不是鲁迅的现代文化观。我们知道，早在留学日本时期，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就已经指出，西方近代文化，不仅仅有“科学”，还有“文艺”。“科学”与“文艺”不但颠覆了中世纪宗教神学之绝对统治地位，而且也通过“科学”与“文艺”（人文主义）之发展传承了中世纪宗教神学之宗教精神。但这分明也是鲁迅自己对中国文化之期待。鲁迅是现代中国最痛苦之灵魂。在他身上，充分体现着现代性之两难的深刻性与难以化约：传统与现代、知识与道德、物质与精神、国家与个人、科学与文化、政治启蒙与思想启蒙、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救人与自救……历史似乎专门要寻觅一个灵魂，来承担这无边之痛苦。与陈独秀、胡适等人相比，鲁迅一开始就表现出思想之深邃与超前。作为传统文化浸润哺育的知识分子，鲁迅不可能超越“中国问题”和民族主义话语之界限，其思想与行为的出发点、归宿点不可能溢出《新青年》同人之主体思想，即背后悬着一个大写的民族与国家之目标。所以，他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乃至“文艺救国”之自觉选择与倡导，是他最基本的动力与归宿。以《新青年》为先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不是反对科学的，但它本身也不是一个科学运动，而是一个崭新之思想文化运动，并且是以文学革命为主体之文化运动。胡适有《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有《文学革命论》，周作人有《平民的文学》与《人的文学》，提倡的都是文学革命；陈独秀、刘半农同时是诗人、散文家，周作人是小品散文大家，他们尽管没有像鲁迅那样明确的意思，但却绝对不是科学主义者。也就是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初创时期，科学与文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二元价值观绝对不仅仅是鲁迅一个人之思想理念，同时也是《新青年》同人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之文化意识。总之，《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涉及众多的思想流派与社会问题，根本无法一概而论。以《新青年》之“专号”而言，“易卜生”“人口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除了同是新思潮，很难找到什么内在联系。作为思想文化杂志，《新青年》视野开阔，兴趣极为广泛，讨论之课题涉及孔子评议、欧战风云、女子贞操、罗素哲学、国语进化、科学方法、偶像破坏以及新诗技巧等。可以说，举凡国人关注的新知识、新问题，《新青年》同人皆试图给予解答。故，只有如此表明政治态度而非具体学术主张之“民主”与“科学”，才能够集合起众多壮怀激烈之新文化人。

顺便交代一下，我们这次将《新青年》重新排版录入，将原竖排繁体字版改为

横排简体字版，杂志内容全部保留。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圆了《新青年》创办者当初之心愿。此套典藏横排简体字版共合订为12卷本。真心希望这套横排简体字版的《新青年》能够进入更多读者的阅读视野。也许，当我们重温五四先贤们激扬奋发的言说，感受他们当年那炽热的忧国忧民之情，我们的灵魂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冲击。

是为序。

杨宏峰

2010年9月10日

凡 例

《新青年》以简体典藏全本的方式面世，对普及历史知识及研究新文化运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编辑的总原则

《〈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只在字体上改繁体字为简体字，版式上改竖排版为横排版，在内容、语言表述上保持原貌。

二、关于版式的处理原则

1. 竖排版统一改为横排版，双栏统一改为单栏。
2. 栏目标题（无论“目录”还是“正文”）统一用黑体字排在左上方。
3. 独立引文缩进两字，用楷体，其他引文与正文字体一致。
4. 剧本等特殊文体改为横排时遵循目前的通用格式。
5. 原稿中通信落款全部统一改为另起一行，行末空两字。

三、关于用字的处理原则

1. 《新青年》（上海书店影印版，以下简称“原件”）中的繁体字统一改为现行通用的简化字。执行标准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6 年 10 月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

2. 字形用国家标准局公布的相关字体的《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中的字形，严格杜绝港台字形的混用。

3. 原件中附有《勘误表》的，此次排印按《勘误表》所列内容进行修改。

4. 原件中的错别字，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要求进行改正。

5. 原件中明显的脱文，用〈 〉补充在相应的字后。

6. 原件中的衍文或明显有疑问的字，在该字后标注“（？）”。

7. 原件中模糊不清的字用□表示，如参考其他文献获得可靠字形的，在□之后用夹注注出。

四、关于句子、词语等的处理原则

1. 未改变原件的句式和语序（即使欧化或文言色彩很浓的句子也不作变更）。
2. 原件中的结构助词统一改为现代汉语通用的“的”“地”“得”，其他虚词不作改动。
3. 原件中的实词（主要是常见双音节词）以《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为准，凡《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有标准词形的，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中未收录的或《现代汉语词典》中虽有收录但词义与原件所用有出入的，不作改动。
4. 方言词保留原貌，但用夹注的形式加以标注，如“麻雀（即麻将）”。

五、关于标点符号等的处理原则

1. 原件无标点符号者，须加标点符号。新加标点符号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的要求。
2. 认真阅读原件中的《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相对照，相同的予以保留，不同的以《标点符号用法》为标准作调整。

六、关于注释的处理原则

1. 原件中的脚注、篇末注、文内夹注一律未作改变。
2. 原件中的双行小字夹注改为横排单行。
3. 原文中人名、地名所用下画线、着重号等全部删除。

七、关于外文词的处理原则

1. 原件中的外文只改为横排，英文书名用斜体字标示。
2. 原件中的外文音译词保持原貌，未作改动。

八、关于图表、广告等的处理原则

1. 原件中的广告一律未收录。
2. 原件中的照片一律未收录。
3. 原件中的普通图表改为横向排列，遵循目前印刷通例；跨页式图表略作处理，使之不跨页，亦不影响内容表达。

目 录

凡 例	1
-----------	---

第一号

(列宁号)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出版)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纪念宣言	/ 1
列宁逝世的第一周年	/ 3
列 宁	腊狄客著 华林译/ 10
列宁主义概论	瞿秋白/ 24
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	陈独秀/ 38
专政问题的历史观	列宁著 郑超麟译/ 42
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位置	列宁著 郑超麟译/ 55
社会主义国际的地位和责任	列宁著 陈乔年译/ 60
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	瞿秋白/ 64
列宁、殖民地民族与帝国主义	魏琴/ 72
列宁与职工运动	郑超麟/ 77
列宁与农民	谢文锦/ 87
列宁与青年	任弼时/ 94
在伟大的墓之前	蒋光赤/ 101
列宁年谱	蒋光赤/ 113

第二号

(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出版)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	瞿秋白/ 120
------------------	----------

“二七”前后工会运动略史	张特立/	131
托洛茨基主义或列宁主义?	斯大林著 郑超麟译/	145
西欧农民运动的前途	马丁诺夫著 郑超麟译/	161
一九二四年之世界形势	任卓宣/	169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之研究	萧子暉/	187
道威斯计划与世界帝国主义	瞿秋白/	205

第三号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

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	瞿秋白/	211
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	瞿秋白/	226
从凡尔塞到洛迦诺	郑超麟/	241
印度民族革命运动与工人阶级的奋斗	梳罗达古/	253
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	布哈林著 郑超麟译/	256
《马克思通俗资本论》序言	李季/	264
战壕断语	屈维它/	272
并非闲话	蒋光赤/	284
革命日志	/	288

第四号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

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	瞿秋白/	299
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是不是国家主义?	陈独秀/	310
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问题	瞿秋白/	315
从洛迦诺到日内瓦	任卓宣/	323
新经济政策之第五年与苏维埃政权底下的农民问题	郑超麟/	328
今日的美国	觉奴/	342
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续)	布哈林著 郑超麟译/	349
马克思的家庭教育	季子/	356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观	王伊维/	360
战壕断语(二)	屈维它/	368
并非闲话	蒋光赤/	377

革命日志	/ 383
革命日志	/ 390

第五号

(世界革命号)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版)

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陈独秀/ 396
世界的及中国的赤化与反赤之斗争	瞿秋白/ 400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目前的问题	季诺维埃夫著 郑超麟译/ 414
世界职工运动之现状与共产党之职任	洛若夫斯基著 瞿秋白译/ 435
世界的农民政党及农民协会	瞿秋白/ 458
世界革命与世界经济	刘仁静/ 468
苏联政治经济概况	斯大林著 蒋光赤译/ 482
英国帝国主义之崩坏与世界革命	尹宽著 耳悚译/ 492
英国大罢工的原因及其经过	剑持平太/ 511
摩洛哥的革命战争	颜斐周/ 527
历史上的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盟	任卓宣/ 535
世界革命运动年表	屈维它/ 540
革命日志	/ 570
革命日志	/ 578
后 记	/ 588

第一号

(列宁号)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出版)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对于 列宁逝世一周纪念宣言

去年——一九二四年——的今日，是我们全世界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永不能忘记的一日，因为这是我们全世界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首领、教师、同志列宁离开我们而去世的一日。

自马克思以后，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首领列宁还更伟大，列宁不但把解放全世界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理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从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垄断下挽救出来，他并且已经应用到实际上去。他手创了一个领导俄罗斯工农阶级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政党——俄国共产党，他把俄罗斯的沙尔、贵族、资产阶级、地主、神父等一般压迫工农阶级的魔王根本扑灭了，他把大俄罗斯民族压迫其他弱小民族的锁链完全打断了，他并且为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创造了一个劳农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不但如此，他并且替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创设了一个共产国际，把全世界工农阶级的先进分子都联合在这一个国际之下，进行指导解放全世界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工作。

现在全世界都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完全成了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奴隶。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要想脱离此种奴隶地位，只有联合起来根本消灭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列宁主义就是资本帝国主义专权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消灭帝国主义的唯一武器。

中国的工农群众和一切被压迫民众，所受国际帝国主义和其工具军阀之剥削与压迫，比任何地方更要厉害。最近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备战及其工具军阀的私斗日趋险恶。在此种趋势之下，中国的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众有立即变成第二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牺牲品之危险。我们要根本避免此种危险，我们只有站在列宁主义

的旗帜之下，实行列宁主义，与全世界的工农阶级联合起来，去消灭世界资本主义。

中国的工人们、农人们和一切被压迫民众！你们要想脱离你们的重重压迫与奴隶地位，只有起来努力了解列宁主义，实行列宁主义；因为只有列宁主义，才是我们自己解放自己唯一武器，才是消灭帝国主义和一切压迫阶级的唯一武器。我们在列宁逝世一周纪念日子里，应该高呼着：

打倒世界资本主义和一切压迫阶级！

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万岁！

列宁主义最后的胜利万岁！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列宁逝世的第一周年

(一)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首领列宁逝世之第一周年。痛哭这个巨大损失的时候，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应该以其整个的注意力安放在列宁一生所努力的目的上头，应该记取列宁至高的教训——列宁死后第一年的经验所证实了的教训。

(二)

列宁的名字是几百万无产者和农民的旗帜。他们为脱离帝国主义压迫，为夺取政权，为共产主义而起来奋斗。

各国的改良主义者、第二国际的社会党叛徒和机会主义者、各国的孟雪维克党人，虚伪地戴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学理的假面具。他们为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利益而损坏了这个革命的学理。有许多年数之久，他们杀死了被资本剥削的劳动群众之革命的毅力和热情；他们把资产阶级制度不朽的观念灌输在群众脑中，并羁系各国无产阶级于“资产阶级的祖国”。

列宁号召劳动者暴动起来反对资本。由他反对战争的奋斗，由他改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由胜利的十月革命的榜样，列宁已经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间划分了一道鸿沟。他从新以革命的意义灌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旧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把自己力量的信心和胜利的担保，拿还给工人群众和一切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人。

(三)

列宁的工程，其要素在于劳动者反抗帝国主义的暴动之准备，这个工程于过去一年中是继续发展的。各国资产阶级及其第二国际的走狗不断地断定共产主义死了，而其实“共产主义怪物”正徘徊于全世界，恐吓资产阶级，激起资产阶级联合战线的新

企图，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西方和东方的劳动者。

德国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尽其所能以杀灭德国革命，然而德国共产党还未曾死，且继续抵抗压迫，坚定地站在自己的阵地。

法国资产阶级于六年中用武器攻打共产主义在东方的危险；它攻打过苏维埃俄罗斯，但现在它感觉共产主义危险在自己的国中了；它看见几万的革命工人于列宁旗帜底下，在巴黎街上游行。

英国资产阶级曾经组织了一个“工人政府”来欺骗工人，但它不久就被迫得放弃这个计划了。因为它感觉英国无产阶级群众永远是革命的，在阶级斗争的旗帜底下团结起来，对于它施行可怕的迫逼。

在巴尔干，在波兰，在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工农反对资产阶级的同盟，巩固起来迫得资产阶级政府去采用一些绝望的手段来镇压革命运动。在么么的爱沙尼亚，无产阶级和农民，是被农村资产阶级、大商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镇压过了的。爱沙尼亚的革命工人、勒法尔的暴动者、被资产阶级枪毙的革命者约翰托姆卜（Yon Tomp）等死时高呼列宁名字，这是告诉资产阶级说：无产阶级暴动的观念是永久活着的。

在近东和远东，在北非洲、印度、中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众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到处取得新的势力而扩大范围；这种运动危及帝国主义生存的本身，而告诉帝国主义说：你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

(四)

号召世界工人阶级做革命行动以推翻资本当中，列宁已经毫无顾惜地打破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及“德谟克拉西”和“和平主义”之虚伪的谎话。

第二国际一班走狗于列宁逝世那一日，抬出英国资产阶级走狗麦克唐纳尔及其所谓工人政府来抵制列宁的工人阶级首领地位。他们高呼过“民治和平主义”的新纪元到了。在这一年中，麦克唐纳尔名字就变成了资产阶级佣仆的异名同义的字。

反一方面，政治事变的潮流，愈加显著地证明了共产主义的革命政策及其认定无产阶级利益和资产利益为不可调解的对抗之学理是真确的。忠实于列宁的学理，一九二四年六月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就估定：“德谟克拉西”和“和平主义”的政策，不过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一种诡计，用来欺骗群众和巩固资本制度。

一方面劳、资中间日渐急剧的冲突，他方面不同的帝国主义中间互相的冲突，使这个欺骗政策之实施不能持久，且迫得资产阶级从新去采用公开的法西斯特手段。

在英国，是资产阶级最反动的一派取得政权。英国政府及其走狗赞助反动的和军阀的党派。法国政府依靠法国的孟雪维克党人，逐渐公开地采用它的前任普恩费的方

法。意大利的法西斯特得着英国帮助，延长生命。爱沙尼亚、波兰、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公开地实行军事专政，压迫劳动者。

全世界无产者应该联合起来，在列宁的共产主义旗帜之下，到处拿起武器去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

(五)

列宁不顾惜地打破过和嘲笑过第二国际孟雪维克党所传播的在帝国主义统治底下得实现民族间和平友爱的幻想。经过社会党人参加和赞同而缔结的《凡尔塞条约》，列宁指定这是胜利的帝国主义者保障其统治地位的暴力的和打劫的条约。社会党人高擎其旗帜的国际联盟，被列宁看做是利用民族友爱的德谟克拉西空言来保障胜利的帝国主义之专利的一种强盗团体。

过去的一年证实了一些和平话句是说谎的了。第二国际一切政党所拥护的《道威斯计划》是英、美资本从经济上用来完全奴服德国的一种工具，其效果将十倍增加了对德国无产阶级之掠夺而归利于德国的和世界的资产阶级。《日内瓦草约》不过是资产阶级国家为攻击唯一的苏维埃共和国和东方民众而缔结一种新的和大的军事同盟之预备。

同时，帝国主义不同派别中间之冲突愈加急剧起来，譬如英、法冲突，日、美冲突，英、美冲突。正在预备下次战争，这一些政府反演裁兵的把戏，实则它们正在增加陆上、海上、空中军备，正在制造杀人放火的新工具哩！

整顿军备这一笔经费在小国如波兰、捷克斯拉夫、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尤其担负不起，这些国家都被帝国主义利用为其在欧洲的宪兵。同为不可告人的目的，协约国不管凡尔塞签字时的允诺而拒绝柯洛业撤兵。

工人群众的和平主义幻想是应该打破的。无产者应该联合起来从事革命行动，抵抗世界新战争之可怕的危险。

(六)

列宁在劳动者和被压迫者中间不仅发出为无产阶级专政奋斗的口号。从他所指导的俄罗斯革命经验，他已经给了全世界无产者以无产阶级国家的革命建设之一个活泼的榜样。他继续巴黎公社的工程。

在列宁指导之下，俄国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并不顾惜地破坏了占有阶级的抵抗。在国内战争之火中，无产阶级建设了新的苏维埃国家，选择从群众自身出来的几千工人和农民为这个国家的管理者。

这个第一个工人国家，现在是保护无产阶级革命利益，调动西方和东方劳动者从事武装斗争，反对资本之一个强有力的要塞。资产阶级及其走狗社会党人已不止一次预言苏维埃必要崩溃了。

然而这些资产阶级于过去一年中，迫不得已承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经济上的进步，正式承认苏维埃政府是苏维埃联合人民的合法政府。

孟雪维克党人用毁谤手段破坏各国劳动者与苏联的友爱的联络，这个企图未能成功。工联代表赴俄旅行，这些非共产党人的代表在俄国和柏林的宣言及其回英国后的报告，愈加将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试验的成绩证明给工人阶级看，不啻直接号召一切劳动者在自己的国中进行那已在俄国成功的革命工程。

列宁的工程永久活着。世界资产阶级现正联合战线攻击苏维埃俄罗斯。全世界无产者应该高呼：“莫损伤苏维埃俄罗斯的毫毛！”

(七)

列宁以其工农的革命同盟之思想，使阶级斗争学理丰富起来。

各国的孟雪维克党人永远是号召工人阶级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作神圣的联合，拥护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之打劫的计划。同时，他们又挑拨都会的无产者和贫农中间的恶感。

列宁永远坚持说，不仅是农村的佣工、大地主的农工，而且小地主的农民受了土地缺乏、租税繁重、兵役难堪诸苦痛，也是愿意消灭资本主义，应该拥护革命的无产阶级为专政而奋斗的。

列宁主义这一个学理，经过十月革命发展之后愈加证实。忠实于列宁遗训，俄国共产党继续巩固工农的同盟，指导社会主义工业兼使之能满足农民经济的需要，努力改善农民的享乐，逐渐引导农民去管理一乡、一县、一省、一国的事务。

在资本统治的国家里，革命的工人于过去一年中也一样地执行列宁的遗训，使无产阶级和农民中革命部分接近之进行上大有进步。

在德国、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拉夫、波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美国这些国家中，一部分的贫农已被牵入革命运动，与无产阶级联合奋斗。

到处举行革命农民代表会议，到处刊行农民的报纸。农民国际的势力一天一天地增大起来。在农民人口特别占多数的国家中农民革命强大起来，甚至于迫得资产阶级不得不加重压迫，其实压迫的结果反愈加巩固了工农的同盟。

(八)

在第二国际时代，参加革命运动的只有西方和美国的劳动者，换言之，即只有文

明国中的劳动者。黑种或黄种的劳动群众，只好去填炮灰或做压迫和剥削的对象。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果然能取得工人贵族的同情，共同轻蔑有色人种。

第二国际的政党，拥护了资产阶级对殖民地的压迫政策，自然不能以引导东方劳动者从事职工运动和政治运动这一件事为自己的职任。

列宁是替东方劳动者呼号，招集东方劳动者到革命军队中来的第一个人。十月革命号召了旧时受俄皇剥削的东方民族——鞑靼、巴斯季尔、启尔基兹、乌支柏格、土耳其曼及其他，来参加苏维埃的建设工程。

这些民族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中，建设自己的自由的苏维埃共和国。十月革命毁灭了俄皇与东方民族（波斯、阿富汗、中国）缔结的一切条约，这些条约是用来奴服这些民族及剥削其天产的。

还有一层，革命唤醒了这些民族起来作革命的斗争。殖民地（印度、埃及、摩洛哥等）和半被奴服的民族（中国、波斯、阿富汗等）的革命运动于过去一年中有新的发展。

世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到处碰见抵抗，使它惊惶失措。在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被压迫民族有苏维埃联合为其朋友和忠实的同盟者。他方面，英国、法国、西班牙忠实于列宁教训的革命工人都赞助殖民地民族。东方劳动者和欧洲革命的无产阶级之同盟已经密切了。

（九）

国际的孟雪维克主义，忠实于其与资产阶级的同盟，永远赞助对于被本国资产阶级以暴力霸占来的民族之民族的压迫政策。英国孟雪维克党人永远攻击爱尔兰的独立。奥大利的社会民主党人努力辅佐以暴力勉强造成的哈普斯堡王朝。他们永远攻击王朝底下民族创造自己的独立国家之企图。现在捷克的社会党人和波兰的社会党人与本国的资产阶级联盟，激烈地攻击本国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企图。

列宁早就和拥护国家主义的这些传统政策决裂。第一国际所发出的，马克思所热烈地主张的“民族自决”口号，列宁以为是最重要的和最迫切的。他号召各国站在统治地位民族的工人来赞助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斗争。

在苏维埃俄罗斯，共产党已经坚决与俄皇的旧政策决裂。共产党承认一切民族有独立权，帮助落后民族建设自己的民族共和国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由这个政策，共产党创造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之友爱的同盟。

在过去的一年中，欧洲其他各国的革命工人：波兰、捷克斯拉夫、巴尔干，都走上这一条道路赞助被压迫民族。这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发展中一个大进步。

(十)

世界的孟雪维克主义背叛了第一国际，背叛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帝国主义战争以前，第二国际每个政党就逐渐与本国的资产阶级联络，忘记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帝国主义战争初年，这个背叛就显露了，第二国际解体了。战后恢复的第二国际变成了屈服战败民族、攻击苏维埃俄罗斯之一个补助的机关。

当社会党首领们叛形已露时候，列宁就发出劳动者国际联合口号，反对战争，反对社会党叛徒。

列宁仇视国家主义，甚于一切。他教劳动者不拘民族的差异，尽管团结起来。他创造了苏维埃联合和共产国际，就把“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这一口号变成了一种事实。

共产国际是全世界真正的革命组织，联合全世界工人在斗争里头，指出世界劳动军某几支队的错误，并以各国革命的经验来改正之。不管毁谤，不管自己是仇愤的对象，共产国际永远活着而是发展去。共产国际预备无产阶级之胜利的暴动。

(十一)

工人群众在几十年的斗争中间，曾经几次创造了政治的组织，以斗争的指挥权付托之。可是这些政党却操在帝国主义所收买的工人贵族手中，却变成了资产阶级政策的工具。

这就是第二国际一切政党的真相。

共产党团结工人阶级革命的前锋，与阶级协作的一切幻想绝缘。共产党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机会主义之敌——的革命理论上头，联合工人阶级的积极分子。共产党由革命的纪律联合起来，俄国波尔札维克共产党就是实行这种纪律的榜样；有其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有其革命的纪律和刚强，俄国共产党才能战胜一切敌人。

忠实于列宁的教训，共产党将永远和无产阶级群众一起奋斗，指导这个斗争，视部分改善的斗争与全部解放的斗争并重，在群众中宣传列宁的革命教训，努力团结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十二)

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首领和官僚作不妥协的斗争，列宁号召工人巩固职工会，它在为日常需要而奋斗的范围内团结群众。按照列宁的教训，职工会应该变成革命行动的学校、无产阶级一致的学校、共产主义的学校。

职工会的机会主义官僚反要使工人这些组织变成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阿姆斯特丹国际实际上已变成世界资产阶级的支柱。

列宁号召革命的工人起来在经济问题范围中于职工会内部作坚决的行动，起来在职工会内部作共产主义思想的广大的宣传，唤起这些职工会的大多数反对机会主义叛徒。

列宁永远以统一口号抵制职工会官僚的分裂政策。过去的一年，我们在这范围内的工作著有成效。忠实于列宁的教训，迎合英国工联的革命潮流，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发出统一职工会的一个世界会议之口号，这个会议要创造职工运动的一个唯一的中心。

英俄职工会统一委员会之成立，惹起了机会主义严重的打击，可是无产阶级将会彻底做去。按照列宁主义的学说，全世界革命工人应该加入职工会，为的在内部奋斗反对分裂派的官僚，并使从前成了反动机关的职工会得变为革命的机关。

(十三)

由他的教训，列宁与从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指示给工人以康庄的大道，在目前世界帝国主义经济摇动的时代和无产阶级直接为政权斗争的时代，工人们应该由这大道走去。列宁是无产阶级斗争中的真正首领英雄。他的一生和所有的机会主义、所有的阶级妥协绝缘。他永远不肯和资产阶级妥协，却密切接近群众的革命行动。

列宁主义将永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

列 宁

腊狄客 著 华林 译

列宁——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之创立者

马克思学说，写在他的著作里，他的通信是很够作其著作之注解的。列宁遗书有几十卷，将来搜集他的通信，恐从新更有几十卷。但是列宁学说最重要的注解还是列宁的事业，还是他创立俄罗斯共产党以及这党取得政权之斗争的工作。这乃是一种方法，无产阶级得着可以在一个困难的环境上把握住政权。列宁遗留给俄国无产阶级的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握住政权，并且可以决定俄国工人阶级所以要取得政权之使命。

马克思参与一八四八年的德国革命，但在这个革命中，因为无产阶级分子软弱，所以他不能起很大的作用。德国一八四八年这个革命成为历史的例外：要作资产阶级胜利的革命，发生得太迟；要作无产阶级的，却又发生得太早。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之后，接着有几十年的反动，马克思在这反动时期中，只能做研究资产阶级世界的机械性之一位旁观者。由反动转到民族战争时期，无产阶级也不能于其中成一个指挥的势力，因此马克思又不能显其指挥的作用。随后就是巴黎公社明星照耀大地的时候了。只有马克思的天才才明白这个短期现象的意义；可是这一次仍说不上马克思的指导作用。

从巴黎公社以后直到马克思逝世，欧洲满布着反动势力。资产阶级的革命使命，在西方已经告终了。无产者则开始畏缩地、迟缓地从新创立自己的队伍。他们由各国小团体组织起来，他们脆弱的运动，自然不是从一个地方所能指挥得动。马克思悉用其天才以研究那推动资产阶级世界发展和无产阶级与此种发展的关系之一些根本法则。他不能投身在国内战争的火焰中来表现自己是一个革命的天才指挥者。

列宁是完全站在马克思学说上面的，他明了马克思学说比较马克思学生任何一人更为深切独到。但是列宁从他的生活第一天起，就准备着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做一个有实际指挥作用的人。他一生完全努力于一九一七年十月所实现的世界资产阶级阵线大破裂之准备。从这年上溯三十年的春间，这位少年列宁在他所作《什么是人民之友》

一书中，写着：

社会民主党人把自己全部的注意力和活动力用在工人阶级身上。到工人阶级的前进代表握有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握有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思想时，到这些思想散布很广，并于工人中间创立坚固的组织，改去现在工人零碎的经济战争为觉悟的阶级斗争时，站在一切德谟克拉西分子前面之俄国工人，必定倾覆专制并指挥俄罗斯无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并进）以直接的、公开的政治斗争达到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研究列宁论共产主义革命的科学，首先须研究列宁成为俄罗斯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指导者所经过的道路。

列宁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指挥者，他用非常的信心打败了一切。有些人以为这种信心系权威的性质，这种性质使他成为天然的首领；有些人以他对于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为他信心的来源。可是权威的意志，固能结合人类，但当历史已证明权威所向的全是错路，则权威又能离开人类了。列宁做首领的力量，是由他的党中同志非常信服他的意志能引导他们循向历史上不错的道路。

这条道路在社会主义信仰中，是不会找到的。英国改良派首领卡尔哈底极其信仰社会主义，却引导英国无产阶级上错误的道路；法国改良派首领若勒斯亦是深切地信仰社会主义；第二国际阿特来尔是信仰社会主义最明确的人，他引导奥国无产阶级行向恶浊的社会爱国主义。不管他们的信仰是怎样，可是以上诸人没有一个当得起历史的考验。社会主义不是宗教，社会主义是论无产阶级胜利条件的科学。列宁铁样的信心有其固有的来源，即他比较马克思的任何学生，都能联想马克思的科学到社会上来。他把这科学注入于他的血肉，他应用这个科学，也非科学社会主义鼻祖的任何徒弟所能望其项背的。列宁忙于组织俄罗斯共产党之实际工作及指挥这个党，所以他关于马克思学说一般的根本之著作并不多见。然而只要看列宁自称少年期的著作中，怎样提出关于唯物史观的问题，只要拿他的设问和那时期蒲列哈诺夫、考茨基著作中的设问两相比较，就可知道列宁怎样独立地来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问题。列宁在讨论职工会问题时期出版的小册子中偶然有二三页说及辩证法和天演论之区别，我们从这二三页看来就可知道他自称为蒲列哈诺夫的学生，仍是太过谦逊了的。列宁是伟大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有此根基，所以能成为铜铁一般有力的人，做指导世界无产阶级的政治家。

思想家的列宁、俄罗斯革命政治家的列宁，是由革命问题能像实际奋斗问题一样

提出之一种环境中产生出来，这就是他所以能超过马克思的其余学生之原故。

拉发尔格在小资产阶级国家中长大起来，这国家虽然经过三次革命，但其资本主义尚未能造成新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条件。偌大才能的拉发尔格，终不能尽展其天才。

考茨基是在恩格斯、马克思之后想独立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可是他只能利用马克思主义为社会历史的研究。对于活的事情，对于德国社会运动问题，马克思主义却只做了他的工具：说明无产阶级尚不应去包围阶级的敌人，不能飞过他们，要慢慢地积聚势力，作最后的决战。考茨基看最后的决战，如此杳远，所以他在其论社会革命的著作中对于夺取政权的问题，很为疏忽。他于这个问题，并没有多少明了，甚至他不了解无产阶级革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无产阶级于得胜后第二天，将从何处得到面包呢？

蒲列哈诺夫是著名马克思科学的解释者，是著名拥护马克思主义“反对各派批评”的人，但他生活于离开风潮发源地很远的地方，离开俄国很远的地方。他对于俄国革命斗争，并没有充分的兴趣，所以他不能倾注全部脑力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之实际问题的研究上面。在《我们意见歧异》一书后，蒲列哈诺夫即没有著作去详细研究俄罗斯革命主要问题的一个——农民问题。这件事就很可能证实上边的断语了。

理论家的列宁、政治家的列宁，第一步就是研究俄国无产阶级主要的活动范围和必须参与俄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拿考茨基、客希维茨基、莫来利对于农民问题的设问及列宁对于农民问题的设问，两相比较来看：我们不仅仅可看出西欧和俄国经济上条件的差异，不仅仅可看出俄国和西欧农民问题各有其特性，而且也可看出革命首领的列宁究竟与欧洲科学社会主义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所不同。列宁研究农民问题，不仅以说明资本主义命运发展，马克思经济科学于农业范围内适用与否为观点，而且首先是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为观点，无产阶级于其斗争中选择同盟者为观点的。

考茨基看到这个同盟者，只有乡村的工人。但是他这样排斥获得乡村贫农之观点，以为这是机会主义，这究竟是他马克思主义应用上好或坏的结果么？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消极性及其实际放弃夺取政权的斗争和德国无产阶级太偏于行会利益的见解之结果？我们举德国社会民主党并不能从事奋斗，以取得考茨基所说无产阶级同盟者——乡村工人之一事实来看，就很可以解答这个疑问了。列宁在俄国经济中、农民中，发现了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同盟者；并且在几十年的时间中，在俄国一切历史线索上，教会了创设无产阶级和农民之斗争的同盟。

蒲列哈诺夫辟除民粹派以农民为能尽独立的革命职务的妄想，但他不能集中俄国工人阶级的注意力到联合农民的问题；他不能使俄国工人阶级明白没有农民，无产阶级是不能取得政权，违反农民意向，无产阶级亦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这一层道理。惟有

列宁能够使俄国工人阶级知道这个，所以无产阶级伟大思想家的列宁能变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指导者。指导阶级斗争，这不是别的，就是研究阶级斗争胜利的条件，无论在胜利或在失败时候，都不应忘记了上述的这些条件。列宁对于农民问题的关系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开一新纪元。

农民问题并非处处都有同样具体的作用，像在俄罗斯革命中一样。在各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中，雇农的作用将比在俄国的更加重要。但不论何处，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获得生产面包者的问题将占重要的位置。而列宁首先要以自己的理论和实际告诉世界无产阶级的，也就是关于获得生产面包者的一个问题。

列宁对于农民问题的关系上，尚有别一方面，也可以算做世界无产阶级将来斗争中之根本的后援。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在西欧作反抗机会主义奋斗中，却把玉石一齐丢去了。他们驳斥拉塞尔对于整个资产阶级的观念为错误，以为整个资产阶级就是“整个反动的群众”，但实际上他们都是畏惧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分子联合的。列宁当时最坚决地奋斗，反对少数派和城市自由派资产阶级之联合政策，因为这个阶级绝不会和无产阶级澈底去推翻专制制度；他同时却以不断的精神，提出与农民联合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和那要求推翻专制为有利益的小资产阶级联合的问题。他这样，就教会了别国无产阶级对于非无产阶级分子关系问题的观察。这种观察不是用抽象的、否认一般联合的观点，而是用具体的观点，估定某一阶级之利益的观点。这观点的问题：是看别阶级或别阶级之一部分，在历史途程上和无产阶级有怎样的距离，可否和无产阶级共同反对那必要去除的敌人。列宁在《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提出：获得群众的同盟者，为无产阶级于夺取政权斗争中和维持政权斗争中的一个根本条件，无论这个同盟者是如何摇动。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意义的科学，是准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政治家列宁之主要的科学。明白一九〇三年列宁和孟雪维克党人关于党的职务和进党分子的争论，即等于明白列宁政策中最重要的杠杆。列宁教无产阶级以阶级斗争运用的艺术。他提出此任务于无产阶级面前，远在他工作史上最初的时期，可是同时他又教无产阶级说：在无产阶级未成为运用的主体之先，是不会有无产阶级的运用斗争的。倘若他论对于农民关系和对于自由派资产阶级关系的科学，可说是无产阶级政党运用的科学；那么，他的组织观点，一定是怎样保证无产阶级不受敌人运用所中伤之客体的科学了。

在《社会民主党章程》第一条争论中，列宁提出的问题，比起他和孟雪维克党人所争论的其余一切政治问题，不但不算是次要，反而可以说，这是列宁所有政治主张能够应用到生活上去之一先决的问题。俄国工人阶级处在沙尔制度压制之下，没有创立强有力的群众组织之可能。工人阶级不自觉他作政治经济的罢工去和专制奋斗。

孟雪维克党人梦想创立广大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但在沙尔制度条件之下，是没有这样一个党之位置的。一切所说关于广大的德谟克拉西的组织，在这种条件之下，等于空洞的计划。事实上，就是开放工人政党的门户，容纳那些口说同情工人运动或只以物质维持工人运动的人进来，这个等于将尚没有形成、尚没有坚固的革命工人运动，安放在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沙尔制度条件激起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反感，加以欧洲自由主义之影响，自然每个律师都能够有一点社会主义的知识。谁容纳这些仅承认工人政党党纲和以物质维持工人政党的人入党，谁就是把火炬一般的工人运动交给小资产阶级手里。列宁主张只有在无产阶级秘密组织中工作的人，才许做党员，这样方可以减少工人运动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支配之危险。甚至凡与资产阶级社会决裂，冒险依附无产阶级秘密组织，成了职业革命者的人，亦还不能保证他始终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不过这样总算已有一定的保证了。

列宁站在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无产阶级的进程，创立职业革命者的秘密组织；他因此创造了无产阶级斗争之集中的、革命的指挥机关之条件。欧洲最良好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如十分注意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卢森堡，都以为列宁的组织观点是阴谋策略的反映，都恐怕波尔札维克组织会和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相分离。这危险是不的确的。孟雪维克党人在革命高潮中创立广大的组织，可是指挥这组织的都是一班摇动的机会主义的智识阶级。列宁创立的组织是能够于最困难时候指挥无产阶级斗争的，是能够于革命平静之年保存革命原则的，而且是历史动力引导无产阶级进向阶级斗争时代之广大的群众组织。

列宁从来不坚持理论上的组织形式。一九〇五年在秘密组织中的只有几千人，经过第一、第二两次革命中间几万人的群众组织，他扩大共产党到几十万人，至十月革命之后，共产党的势力更影响到几百万人。形式虽有变更，但不论何种形式的组织，列宁总以一个观念引导着：无产阶级能够胜利，须有革命的组织。这组织必须坚固和集中，因为敌人的力量比我们的组织要强过十倍。

当列宁创立了一个能够和敌人斗争的群众的党之时，他首先提出的责任就是为夺取政权预备武装暴动。他于我们软弱的时候，或失败退转的时候，能够教导我们的党步步为营地奋斗，从事日常最黑暗的工作以积聚无产阶级的力量，可是他没有一天会忘记：一切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准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

拿列宁在反革命得势时期的工作和他在工人运动潮流高涨时期的工作两相比较来看，当代共产党于此可以得着一个再好没有的教训。当第一次革命失败以后，他极坚决地和那班老不承认反革命胜利，空等革命势力再起，而不愿意去做积势聚力的困难工作，利用种种方法以达到这目的的人们奋斗。但他又以同样的毅力攻击那班丢去革

命的希望，改变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为琐碎经济斗争的人们。列宁在这反动时代，很精细地研究一九〇五年所得教训，为将来运动复活时之应用。

一九〇八年他在波兰社会民主党的杂志中，根据莫斯科暴动的教训，提出未来武装暴动之技术的准备问题而发表的一篇论文之意义是何等可贵啊！

在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当全世界工人运动不仅被资产阶级的军事机关破坏，而且被社会民主党叛徒推翻的时候，列宁在每一个实际的步骤上帮助他的同伴，利用公开的可能，以具体的方案创立各种秘密组织。同时他又在瑞士的孤独生活中，研究关于国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之马克思的科学，为一九一七年十月暴动的准备。像梅林格和卢森堡这一班人，在胜利的德国帝国主义和胜利的第二国际社会爱国主义之前面，从来是不解除自己武装的。但那时他们也跟着以为，列宁于世界大战开始后二个月公布的波尔札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宣言中提出的“国内战争”口号这一件事，实为浪漫的行动。他们那时不敢提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的口号。

列宁在这黑暗之夜，已经准备了无产阶级的十月暴动。可是他于二月革命后不久回到俄国，在党内同志们惊讶的面前，发挥苏维埃政权的观念，同时又教党对待尚在社会爱国主义迷梦中群众，须以非常的忍耐心去解释目前的状况，而且要一步一步地增长群众中的革命恐慌。列宁带着苏维埃共和国的理想一同回到俄国来而提出宪法会议的口号，以为这是行向苏维埃共和国之一阶段。苏维埃共和国口号那时对于他正是一颗明星，但他明白要群众随着这颗明星进行，必须打破群众的德谟克拉西观念、宪法会议观念。他并不要求群众超过德谟克拉西阶段，而要自己和群众共同度过这个阶段的。他取消这口号只在拿到政权以后，即宪法会议已经在群众面前自己表现出是阻碍群众走向群众最需要的和平之道路的时候。

整个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无产阶级如何取得政权。可是马克思主义当着世界无产阶级前面，那时已经丧失了这个意义。其原因不仅是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以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而且是自从一八七一年以后，欧洲工人运动在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范围中发展起来。列宁从新发现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不仅因为他是革命的马克思派学生，而且是因为俄国无产阶级已经上了夺取政权斗争的道路了。

十月暴动指导者的列宁和苏维埃政府指导者的列宁，就是他平时所预备的科学之最高的表现。列宁说，革命的政治家必须替百千万人奋斗。他在百千万人的面前，果然以苏维埃俄罗斯指导者的资格，将几十年来在俄国波尔札维克小环境内所教导过的东西，非常明了地来教导世界无产阶级。他以镰刀和锤子做徽帜，来告诉全欧无产阶级，去找乡村里的同盟者罢！因这同盟者是为革命而给你面包的。他以红军的红星做

徽帜，告诉无产阶级说：无产阶级应该领导那些与地主、资本家反动势力因利益冲突而起斗争之社会阶级，并以自己的力量毁灭敌人的力量。他做国家最高机关的首领，不断地指示并证明给各国无产阶级看：维持政权，只有倚靠无产阶级坚固的前锋，只有倚靠共产党。列宁这样以事业证实他的理论的科学，因为有这个证实，他就成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导师、共产国际的创立者。

列宁——共产国际之创立者

列宁于放逐前第一次侨居西欧之时，已经有很大兴趣开始实际上研究那从前仅在书籍或杂志上所认识的西欧工人运动。他时常说起他在瑞士和法国工人的集会中所得着的印象；他说在俄国时所推测的西欧工人运动，恰与所亲见的相反。可是这位大实际家总不会走到怀疑主义去的，而总要于西欧工人运动潮流中，寻找革命的实质。列宁更密切地接近工人运动，接近德国、瑞士、法国和英国工人运动的首领，仅仅在一九〇一年刚从流放回来以后，和马尔多夫、亚克西里洛、蒲列哈诺夫刊行《火星》的时候。《火星》不仅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奋斗的机关报，亦且是国际社会主义的奋斗的机关报。《火星》刊行的时期，正是国际社会主义中二个倾向：修正派和革命派间的激烈斗争时期。那时首先在《火星》上分析西欧工人运动实际问题的是蒲列哈诺夫；列宁所最注意的是在其理论方面，但同时亦很仔细地研究工人运动现象。他参加过米海纳的工人集会，他注意倾听的，不仅是伦敦哈德公园演说会上社会党演说家的演说，并且注意到能在英国工人群众中取得应声的各种教派宣传者之演说。

修正主义是工人贵族和工人官僚的利益之反映，列宁自从伯恩斯坦第一次露骨进攻时就已经十分明白了。现在列宁从工人运动的派别上看去，更加一目了然。在亚姆斯德丹和司徒嘉德举行的国际会议上，他观察第二国际的指导人物，或许他那时感觉自己是很单调的。在司徒嘉德会议上关于殖民地策略，关于战争危险的反抗之辩论已经告诉列宁：改良主义首领所导引的途径将通到什么地方。他于第一次革命后所作关于国际局会议论文中，对于哥勒、特鲁斯特纳、白勒兰丁格诸人已有很仇恨的表示了。

第二国际还是整个而未分裂之时，列宁就已知道这里面藏着工人阶级的仇敌，而且看出第二国际那批有名人物——从公认的修正派直到考茨基——的底细。列宁于一九〇一年在米海纳认识考茨基时，至少已经察出考茨基不是真同志了。波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瓦斯基同志，于其所著《关于多数派纪念日的教训》一文中说：“当第二国际中的好分子组成左派，反对改良派时候，第二国际中只有列宁一人有成立第三国际之决心。”只要读过列宁在《教育》上对于德国职工会首领列忌恩游美的著作之批评，就

可知道当时除列宁外，再无有一个人敢写这样的文字评论第二国际这一批名人。

修正主义与那时考茨基所倡导的急进马克思主义中间意见所不同的，只在马克思主义学理的解释上头。实际上，这两种倾向对于日常的实际是互相接近的：第二国际的统一就是建筑在这个上面。几年的会议席上，很少引起激烈的斗争。普通会议终了，总是通过一个共同的议决案。实际上所谓急进马克思主义者，也并未主张用光明的革命的暴动，去做群众的革命准备。到一九一〇年，德国所谓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已发现分裂，这种分裂是在实际问题上，是在行动上的。所谓左派急进部分和以考茨基为首的中央派就形成了。分裂点系在反对帝国主义奋斗问题及群众罢工问题上。起初列宁以为我们急进的左派对于帝国主义关系之表示不甚确切，不过对于总同盟罢工问题的见解是十分对的。到马尔多夫在考茨基机关报上做反对卢森堡的文章时，列宁才在俄国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巴业古克拥护急进左派的论文，而他自己精神上亦拥护左派。

大战开始了。八月四日黑暗日子到了。列宁隐居在卡巴特山中接到关于德国和世界社会民主党附逆的消息。他初时很不相信，以为这或许是世界资产阶级的诡计、军事上的阴谋。但不久他们悲惨的行动已证实了这个消息。列宁出了奥地利牢狱到瑞士以后，即刻从事斗争的职务。我能够和他会晤，已在一九一四年末，那时列宁的态度已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有历史价值的宣言中和数期《社会民主派》中表明出来。我和列宁谈话时所受很深的震动，现在还牢记着。我从德国前去，是要和别国革命团体成立关系。我们在德国于开战第一天起，即绝对不承认大多数社会民主派的态度，反对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我们和考茨基、格席冲突，他们仍不抛弃他们的审慎地反对社会爱国派的态度，所不同的，只是他们不时有和平的叹息。我们于印刷品检查之下用誊写版印刷品宣传反对战争的革命战争。但到我与列宁谈话之后，不禁使我——由我又使许多德国同志——突然左倾。列宁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之前途。”这个问题，使我和站在党的极端的同志都有刺心之痛。我们总有千数次说改良主义是工人贵族的政策，但无论如何，总希望德国全党于第一次爱国主义毒气消灭之后会转到左方来。李卜克内西八月四日公开投票反对战争，可以说他是希望全党在政府通缉的打击之下，能够与政府、与保卫帝国主义祖国的行为实行决裂。列宁却简直这样提出问题：“第二国际政策，是错误么？还是背叛工人阶级的利益？”我就对他说明：我们是站在两个时代的界线——社会主义在德谟克拉西范围内和平发展的时代和其狂飙突起的时代；现在的问题不在首领背叛，而在群众没有充分力量足以反对战争，才不得已顺从资产阶级政策，此种政策之难堪将迫得群众和资产阶级决裂，而走向革命斗争的道路上来。列宁即以几句话打断了我的论点，说：“这是历史主义，

不论什么都可以时代转变来解释的，但是这班改良派首领，战前已经有系统地引导无产阶级进资产阶级营垒去，战时又公然跑进这个营垒，似这一类人能够变成革命政策的引导者吗？”我回答他说：“我不相信。”“那么”，列宁继续说，“过去的时期应当在改良主义首领的身上完结了。倘若我们要使工人阶级容易转到和战争决斗、和改良主义决斗的政策，那我们应当和改良派首领决裂，和那班不忠实地攻击改良派首领的人决裂。至于什么时候决裂及怎样有组织地预备这决裂等问题，这乃是策略的问题，到这决裂去的倾向则为每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原则上的责任了。”列宁坚持以最严厉的形式和社会爱国派作思想上的斗争，坚持必须公开地说明他们的背叛是真正的背叛。他把这句话连说了好几遍，后来在共同工作中、在起草议决案中，他常常提醒这一个政治的定义。以为这个定义乃是测量革命的忠实和恒性之尺度，是测量与社会民主党决裂意志的尺度。

关于以国内战争口号抵制国内和平口号问题，列宁亦以同样的严肃态度提出。我们德国急进的左派，自从因群众罢工问题和考茨基开笔战时起，即时常提出比较不确定的口号：“群众行动。”这口号的不确定性，是由于德国一九一一——一九二二年革命运动之原始的状态，当时柏林工人趁普鲁士国会中普选问题之争斗，在底尔卡丁示威，我们即以为这是德国工人革命斗争之开始了。

列宁告诉我们说：“这个口号在战前，是可以号召群众行动去抵制德国社会民主党首领们之议会诡计的，但到了这个铁血时代、战争时代，就不够用了。”“倘若”，列宁说，“群众的怨望因战争而加甚，那么，中央派尽能组织群众运动，压迫政府，使之和平休战。倘若我们的推测，以革命代替帝国主义的推测，不是空洞的愿望，而是要做的工作，那我们必须明确地提出国内战争的口号。”列宁非常喜悦李卜克内西《致齐密瓦会议书》中用了这句话：“反对国内和平，赞成国内战争。”他证明李卜克内西根本上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

第二国际分裂是形成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条件，国内战争是打倒帝国主义战争之条件，这两个根本思想，就是列宁所要贯注于各国和他有关联的先觉革命分子头脑中的。虽然他那时早就坚定地、明确地站在未来共产国际之地位，但他仍然走去参加反对战争的社会民主党团体在齐密瓦和京达尔所开的会议。他很明白，开始应当和中央派提携，以摇动工人的头脑，破坏社会民主党的一致，在自己周围团结大部分工人群众，不以宣传为满意，并须开始斗争。

他不仅收集在这派别斗争中散布的文件，而且不怕费力地去研究这些文件。举一个例：荷兰马克思主义者郭泰以荷兰文著的关于战争的一本小册子，他拿来从头到尾用字典读了一遍，因他是不懂荷兰文的。他很注意群众革命独立性之一切微少的表现，

为的找到他们政治发展已经真正达到的地位。在伯尔尼（瑞士）时候，有一位勒卜士格的老同志来访我，他自一八九〇年以来，即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最左翼，但于原则上的问题是绝不明了的。列宁从他口中详细地得到运动的整个概况。我记得这位社会民主党员那时很惊异列宁不给他休息，反问他于示威运动中男工、女工的叫号。“叫号么？在当时的情形是可想而知的。”但列宁坚持着，“总请你告诉我：他们叫号什么东西？”于是从他口中得到了必要的报告。他很注意欧美工人印刷品中的琐碎事件，要借此认识群众于政治论文中因受军事较严厉检查不能写出的真相。伟大的革命首领在国外，在别的国家中极力与工人群众密切联络，由此种联络就可找到运动的台柱。他在恶劣的小酒馆，整夜和瑞士工人谈话不以为苦，这些工人自然不尽抱革命思想，但他却要从这谈话立定真实的运动基础。当瑞士工人运动左翼有许多指挥者动摇的时候，他很坚决地主张虽是工人小团体，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联络，因为这些团体是唯一有希望的。

一九一六年，我们已经聚集各国同志的小团体于齐密瓦联合之内，创立了所谓齐密瓦左派。那时列宁就主张要起草将来革命国际的纲领了。

后来他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一书，就是从他这次的预备工作著成的。一九一三年，他就已提出国家公社的观念，我们起初不明白这个观念，更甚于后来俄国同志二月革命之后对于列宁所提出著名的《四月提案》之不了解。我们每个人都读了几遍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著作，但是不曾注意到这著作中新的“国家公社”观念是什么。列宁费了许多力气，才为我们说明他的观点。他在策略上有一种特色，就是在一九〇五年经验的根本上，他那时已经告诉了我们：苏维埃能够尽国家公社机关的作用。当二月革命之际，列宁对于俄国实际状况只有模糊的报告，但他对于那时回俄同志必答郭夫和郭仑泰请授机宜之答复，就这样说：“对临时政府，不给任何信用。立法会议是废物。要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市议会拿在手里。”列宁为国家公社的奋斗，去寻找和群众日常生活接近的一种机关，至于这种机关名称则不是十分重要的。

此时列宁在党纲工作的结果之一，就是他提出民族自决问题。战前，列宁提出这问题只在俄国范围内，当时只用来解放俄国无产阶级使之不受大俄罗斯爱国主义的影响，并用来取得俄国内非俄罗斯人民群众的信仰，这个他认为是与沙尔制度奋斗的同盟者。到战时，他把这问题扩大到世界的范围。卢森堡著一本小册子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破产，否认在一般帝国主义时代，有民族解放战争之可能。这本小册子给列宁以重新提出民族自决问题的机会。这位坚决地否认那所谓为帝国主义国家保卫祖国之列宁，却以策略上的非常手腕，告诉我们这班偏狭的西欧人说：民族战争，虽然在西欧已是过去的时期，但是在东南欧洲、在俄国的弱小民族、在殖民地、在亚细亚都不能免。

列宁战前没有具体地去研究殖民地运动。这问题在我们中有许多人所知道的，比他多过十几倍。他曾打算仔细地就书上和说话中收集这问题的具体材料。可是他却转以这材料来反对我们。他在民族自决问题中反对考茨基，考茨基拿这个口号做和平主义的工具体，要以投票方法去解决亚尔萨斯，劳兰问题。他以很严酷的批评，反对我们民族自决问题提案；他指示我们以这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的炸药——之意义。狡狴的中央派哲学家，像希尔费丁一班人，告西欧无产阶级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会议所提出的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是为俄国国家利益的。殊不知列宁为这个问题曾经和郭泰、巴业古克、布哈林、必答郭夫和我有很厉害的斗争，而那时他是瑞士国里一个无家而被逐的外国人。这问题对于他有替世界无产阶级在国际上寻找农民同盟者的意义。不和东方及殖民地被压迫的幼稚民族之革命联络，世界无产阶级是不会胜利的。这就是列宁远在一九一六年教导我们的。

列宁于二月革命初起的时候，就要和中央派决裂，要取消齐密瓦的联合。他以为俄国革命，已于各交战国中提出了革命问题，将给我们共产党人以群众的力量，将推动动摇的中央派到叛徒的营垒去。他不许我们签字于齐密瓦委员会关于俄国革命的宣言，因为和马尔多夫共同签字，恐怕紊乱了俄国工人的头脑，将妨碍了和我们乞黑依特席及孟雪维克党人的斗争。这个决裂在一九一七年中尚未发作，因为我们想利用齐密瓦委员会，拉住那时尚未分出斯巴达季团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去反对德国帝国主义。一九一七年十月获得政权以后，齐密瓦联合，事实上是已消灭了。俄国工人阶级的奋斗，是唤醒各国无产阶级的主要工具。一九一八这一年，就是共产国际成立会召集之准备。

这成立会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开幕，那时正和台尼金、哥尔萨克开始战争。此次会议原则上并没有创立新的东西出来，不过以多数派大战初年对齐密瓦左派提出的观点做基础罢了。大会的议决案、宣言，特别是列宁关于狄克推多和德谟克拉西的提案，就成了以后共产国际工作的基础。十月革命之际，许多人读了土地与和平命令，以为这不过是一篇宣言，决无实行的时候。当俄国革命危险万状，哥尔萨克进攻窝瓦河流域，连幼稚的红军在南方失败消息一齐到来之时，接到共产国际第一次会议议决案的人，不仅是西欧多数共产党员，连我们俄国共产党在西欧秘密工作的许多党员，也都要自问：这些文件不就是受致命伤的俄罗斯革命之遗嘱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那时受封锁，与西欧工人运动隔绝，实际上很少能影响于这个运动之进行，很少能帮助西欧工人，西欧工人们当时只好独立开辟道路，只好自己解决自己的任务。直到一九二〇年红军打败了台尼金和哥尔萨克之后，共产国际才开始日常的群众工作。于是列宁站在世界工人运动的主脑地位，已经是世界工人运动的实际首领、大天才家，帮助幼

稚的共产主义运动去了解现在的地位，注意将来的进程了。

列宁替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写定了三种根本的文件。从世界上各地来的代表都得到列宁所著《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一书的译本。他们都知道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部猛烈的书，如火把一般，照耀着他的目的——无产阶级专政。《左派幼稚病》这本书，是指示幼稚共产党的路径，这些幼稚的党以为一跃就可扼住敌人咽喉，以为革命潮流一起即可推动他们一直达到目的。列宁以俄罗斯革命经验去抵制那些在革命怒潮中反对任何妥协的幼稚的共产党。列宁告诉他们说：要设立无产阶级专政，首先须获得工人阶级大多数；要获得工人阶级大多数，应当利用一切方法，甚至先进的工人所要颠覆的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亦可利用；倘若是先经过国会再到战阵上去，那么，应从这粪堆中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于工人群众，在无产阶级群众组织中，在职工会中，应当不断地使这些组织从黄色领袖手中脱离出来；少数革命派不应否认妥协，倘若这妥协是可以促成他们得到多数的。伟大领袖的这部不朽著作的含义很难用几句话形容出来。可以说共产国际诸首领现在还未得着这著作含义之十分之一。这本简短的小册子，包含着波尔札维克主义所有的哲学、所有战术与策略之精华。再过许多年失败和胜利之后，那时我们才可以说：列宁这些思想，已贯注到共产国际诸首领的血肉中去了。这本小册子你不妨多念几遍，每遍你都能在其中找出思想上新的财富和新的变化。联合战线策略应用过两年之后，我到去年，才觉得这个策略已经在这本小册子里面发挥过了，我完全忘记了一九二一年正月我写给社会民主党及其职工会之一封有名的“公开的信”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应用了这个策略。在这论无产阶级战争的学说中，有无限的教训，明白地发挥着或隐约地包含着。这个学说对于我们的战术上之重要，并不减于客列胡席维此所著《论战书》对于军事战术上之重要。列宁的教训难于应用之处，即在无产阶级的战术绝不是以宣传的方法、以默想俄国无产阶级战争的方法所能学得到的。各国共产党日常经验无时不改变形式，使我们推想到根本的问题。每个共产党要达到无产阶级这位最伟大的首领之革命战略的水平线，必须有独立的思想工作。

列宁提向第二次大会的第二种文件，是加入共产国际条件的草案。当时有几个人不鄙笑这些条件？有几个人不抗议这些条件？可是你把这些条件重读一遍，你自己再问问：加入共产国际的许多党中，哪个党能够至少执行这些条件的十分之一？那么你愈加可以看出这些条件的政治意义了。倘若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可说是将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指示给我们，或者精确点说，是将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阶段指示给我们；倘若《左派幼稚病》一书可说是指出为专政斗争有许多不能通行的荆棘路，那么列宁起草的这些条件一定是提出共产党必须怎样之一的问题了。没曾确证这些条件已

被执行了几分之几之先，可以无须乎再通过新的议决案。这些条件是个试金石，是个尺度，测量共产国际底下的党由社会民主左党走向真正共产主义的党的发展。

列宁的第三种文件，是他起草的殖民地问题提案。这提案尚没有溶入西方无产阶级共产党的血肉中（西方资产阶级抓住了几万万殖民地人民在它的利爪底下），也没有灌输到东方幼稚的共产党意识之内。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同志在殖民地工作碰到很大困难，不只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警察方面的压迫，并且是由于我们同志在文化极低的殖民地群众中工作没有充分预备。我们殖民地的同志，很容易趋向于左派共产主义。他们在主张为专政而斗争的著作中受到教育，很难懂得将中国、高丽、波斯、印度、埃及幼稚的无产阶级和手工业工人和反对外国的和自己的资产阶级之斗争与本国幼稚的资产阶级反宗主国压迫的资产阶级之民族的解放运动联合起来。殖民地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要和欧美无产阶级革命实际联络起来，还需几十年，才能成功。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列宁已指示给世界无产阶级以应走的道路。这句话单就字面来说，就是阶级斗争史上列宁及其科学第一次创造了一个全世界劳动者结合的中心。我们欧洲无产阶级第一次开始由死路走出来到真正的世界运动的道路上去。印度同志路意所著《新印度》一书，是列宁科学理论方面第一个实例的证实。路意所办报纸的奋斗，是列宁科学定期的应用之第一个证实，我们可以说这个证实告诉我们说，我们首领识见是如何之深且远啊！第二国际在汉堡开会时，汉堡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登载一篇祝贺会议的诗。这位诗人致意于中国稻田上工作的苦力、南非收集棉花的黑奴、采金的黑人，并请他们来到国际解放旗帜之下，但这都是空洞的呼声。这第二国际自身现已得到大胜利了！它的首领麦克唐纳尔组织了第一个工人政府。他委任谁来做三万万被压迫的印度人民的总长呢？是恶里瓦爵士，旧殖民部官僚，牙买克的总督。这位殖民部官僚是牙买克植糖主人利益之精密的保护者。他现在将号召英皇陛下底下的印度奴隶来到第二国际旗帜之下呢？或者是第二国际首领，麦克唐纳尔恩赐第一爵士之前任印度副总督乞里姆斯弗尔爵士去这样做呢？只有共产国际能够组织殖民地的奴隶。而列宁指示我们这条道路的功绩，在历史前面，在国际工人阶级前面，在人类前面是永不会被人忘记了的。

共产国际第三次会议，又看见列宁站在战斗的地位。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革命的潮流消沉了。德国共产党成了无产阶级群众的党，不注意到状况的变更，不注意到资本已经开始进攻，却自己煽动起来，没有得到大多数劳动群众同情，就急急发动武装斗争。我们都明白党的错误，我们都驳斥德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政治让步时期所发表的进攻理论而成的那个提案。但是我们直接在共产国际做工的人，知道党中央系由斯巴达季团旧首领和从前独立党的好首领所组成，唯一的，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之

能干的中央，所以我们指出他们由失败得来的教训而想以缓和的形式出之。列宁接连五次，迫我们修改我们的提案，迫我们以很坚决的、很严厉的态度告诉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你们先要拿到无产阶级大多数，然后，你们才可以担负取得政权的使命。”列宁救起了共产党，又以同样坚决的态度拥护那不仅为西欧共产党所反对的联合战线策略。他将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和西欧共产党战斗条件中间根本不同之点，明晰地提醒出来。他十分明白凡有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而半世纪来握在黄色领袖手里的地方，要有很复杂很缜密的工作，要有许多为共产党人所不愿意的，而为获得无产阶级大多数必所需的妥协。他担负了国家的工作，没有时间去注意西方发展的详情，但他有一种特别感觉，能领会各国间状况之差别及各共产党的特殊责任。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列宁来作俄国现状的报告，那时刚是他第一次患病痊愈之后。大会对他非常欢迎，又非常怜惜这可爱的首领艰难地用别国语言表达他自己的思想。在其报告中列宁狡猾地闭了一只眼睛问道：“若是有人问及世界革命最近的前途，我们将如何答复？”他又随即自答道：“可告他，倘若共产党人更聪明一点，那么前途就更可乐观一点。”列宁写定和战争奋斗的方法，交给派往海牙的俄国工会代表。列宁这篇给国际无产阶级最后的忠告，是他的非常的实在主义之新的面貌。他宣言在帝国主义大战教训以后，再主张于新战争发生时实行总同盟罢工的人，不是蠢才便是骗子；倘若我们不能预防帝国主义的战争，那么群众前去作战，我们亦要到战争中去，于帝国主义军队中做革命的工作。问题全在于现在尽我们所有的力量，务必使战争不能发生。这又是列宁反对战争危险，一步步扩充日常革命工作的计划。

列宁没有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已经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遭了两次大失败：在保加利亚和德国。目下革命潮流，尚没有高涌起来，像我们去年夏间所期望的那一样。倘若革命怒潮于最近年间不起来，那么，我们必得解决许多的复杂问题，像在反动时期、在资本进攻时期一样去团结群众在我们的周围，把他们日常的奋斗与准备向将来取得政权的奋斗结合起来。我们有四十二个党，每党都站在特别的场合上。统计这些场合之一切特性，不管他们的区别怎样，而用同一的共产主义工作以处之，这是非常的困难的。但是我们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因为我们有用不尽的列宁思想的宝藏，有经过无数进攻和自卫的战争锻炼过的列宁方法。我们研究列宁的文集，和研究马克思的一样，其最大的价值不是结论，也不是具体的决定，而是解决的方法，而是达到无产阶级最伟大的革命者之事功的捷径。

列宁的旗帜——他的科学，武装了共产国际在一个整个的时期，即从现在一直到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时期。

列宁主义概论

瞿秋白

列宁主义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假使详细地论述起来，必须要整部的巨著。对于世界革命的大理论家及大实行家，自然应当有很详尽的研究，我们这篇文章，不过是研究列宁的第一步——先作一概括的、简要的说明。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应用马克思主义实行十月革命，成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的革命理论，本来与马克思主义绝无二致，不过他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世界范围内的实际的阶级斗争，而能有如此的成功，是列宁的特点。因此，有人说，列宁主义是应用于俄国客观情形之马克思主义。这一说固然有几分理由——列宁确是能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到俄国的特殊的实际状况上去，而且是应用得非常之好。然而假使列宁主义仅仅是应用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那就成了俄国一国的现象；列宁主义决不止只有这一点意义。又有人说，列宁主义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别于其他改良派、机会派，如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说亦只有一半是对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本来只有革命的，就是只有列宁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机会派、改良派、修正派的理论，已经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早已成为非马克思主义了。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绝不能说列宁主义是革命派的，其他马克思主义是改良派的，仿佛马克思主义可以分成革命与非革命两种似的。然而列宁主义始终不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中有许多成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原来所没有的，或者虽有亦很不详尽，还未发展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马克思和昂格士所处的时代，是欧陆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商工业资本主义的时代，所以当时依实际阶级斗争的经验，自然只能造成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大纲，而不能及其细目；一切策略上的指导，还只是预备无产阶级革命，而并未研究到执行无产阶级革命及独裁制的种种更具体的问题。马克思和昂格士将资本主义社会彻底地研究过，创造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的大纲。随后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到帝国主义，到财政资本主义的时代，无产阶级的斗争便日进于实际执行革命及独裁制的工作。列宁的理论，正是根据于马克思主

义，再从这种实际工作中的经验里锻炼出来的，所以对于帝国主义时代，世界革命已经可以实际开始时的具体策略问题，如无产阶级独裁制与农民阶级、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与殖民地民族革命之关系等问题，便有格外详尽的研究，发现许多新的原则。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然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前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革命思想之大纲；列宁主义呢，便是无产阶级革命时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执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的原理。

（一）列宁主义之历史的根源

列宁主义生长、成熟于帝国主义的时代。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已经使它内部的一切矛盾冲突到了极点，不得不爆裂而开始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这些矛盾冲突之中，最重要的有三种：

第一，资本与劳动之冲突。帝国主义的意思，本是指资本主义国家里发现种种独占式的托辣斯、新狄嘉、银行以及极大的财政资产阶级的时代而说的。工人阶级要反对这种万能的大资本家——大银行家，因为他们力能左右全世界的金融，垄断全世界某种某种工业，简直是困难到万分。以前通常的斗争方法，如工会、如协作社、如选举竞争等，简直已经绝无用处。总之，资本集中到极点，劳动者已经绝无回旋的余地，一切和平方法不但不能争得什么新的权利，并且连已得的权利也不能保障。于是除革命以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第二，帝国主义列强及各国内财政资产阶级内部的冲突。帝国主义的国家都要向外发展，于是互争殖民地——以求推销国内的商品，采取尚未开发的原料，剥削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这种恶斗必然要引起帝国主义的战争。历次战争的结果，削弱帝国主义者的势力，使无产阶级革命时机愈趋愈近，时时可以爆发。

第三，列强帝国主义者与殖民地弱小民族之间的冲突。帝国主义固然侵略殖民地，然而它既要输入商品、采取原料、剥削劳动，它便不得不使殖民地相当的资本主义化。于是殖民地上也发现无产阶级（工厂工人）、现代式的智识阶级，发现通商大埠、工业区域。殖民地弱小民族里的这种变化，自然要引起民族的自觉，爆发出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弱小民族的经济的发展，便日渐与帝国主义国家处于绝对冲突的地位。

这种时代，世界革命——列强国内无产阶级的革命与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爆发，已成不可终日、必然发现的现象。而在俄国，恰好又是这些冲突汇聚得最紧凑、最剧烈的地方：俄帝国与德奥的冲突；俄帝国与土耳其、波斯及中国的冲突；大俄罗斯人与俄帝国境内许多被并吞的弱小民族的冲突；俄国资产阶级虽没有普遍地发展，却已直接进于托辣斯、新狄嘉的独占形式，对于工人的压迫异常残酷；俄皇地主贵族阶级又

还存在，自身渐渐地资本家化，极猛烈地剥削农民。俄帝国政府处于这许多冲突之上，自然要比各国纯资本的国家，比封建制度已经消灭的国家的政制，格外专制压迫，方才能镇压得住。而且俄国大资产阶级要与德、奥、英、法资本家竭蹶相竞，便不得不努力增加军备，同时借着外债经营工业，于是俄国政府又成了英、法、比等债务国间接剥削俄国人民的代理机关；亦就因此，不得不与西欧各国共同压迫中国、波斯、土耳其，以便竭力榨取利润以自救。俄国在革命前，国内既然是资本与劳动的冲突和地主与农民的冲突相联结错综，国外又一方面要竭蹶争先以与西欧诸国相斗，别方面要压榨弱小民族。正因为俄国是西欧最后起的资本国家，便将西欧帝国主义的重任完全担负起来，成了世界帝国主义的关键。凡是反对俄皇政府的，便不能不间接反对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这种各方面剧烈斗争的旋涡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当然处于最积极的领导地位，受着几十重直接、间接的压迫的俄国农民与工人，自然奋勇直前地行向革命，而且必然是世界的革命——一切改良派机会派的爱国社会主义、和平社会主义，绝骗不信群众。这种革命运动的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列宁主义。列宁——俄国无产阶级的使命，是开始世界的社会革命，有极大的革命的农民阶级以及许多弱小民族，做革命斗争中的同盟者，以反对俄皇及俄国资产阶级并且进而反抗国外的列强帝国主义及世界的资产阶级，更要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及各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因为非如此，连俄国革命也不能得最终的胜利，必受列强资产阶级的摧残。于是列宁和俄国无产阶级的使命，便成了世界的。而列宁主义也就根据于此，成为帝国主义时代世界社会革命的原理，把世界革命里一切实际问题都汇合起来，找着政治上、经济上、策略上的总原则。

（二）列宁主义之方法

第二国际处于一八四八年革命与一九一四年欧战之间，那时代，西欧的无产阶级只能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之下，勉力进行和平方法的斗争。等到欧战前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已进于帝国主义的阶段，而第二国际的社会党，还守着旧的方法。当然，为适应这种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冲突之爆发起见，首先便要矫正第二国际的谬误的斗争方法，才能建立——恢复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便引导无产阶级群众执行革命，给他们以理论上的根据及政策上的指导。

第二国际派理论上的第一种谬误：便是以为无产阶级争取政权，必须等无产阶级本身成了一国内的多数。列宁主义却不同。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各种冲突爆发的时候，即使无产阶级在这一国内还是少数，何以不应当利用这些时机，譬如大战争或农民阶级的暴动等，亟起取得政权呢？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时，已经说：

假使德国“农民战争”重又爆发，那么，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正未可限量。一九一七年俄国的无产阶级，已经比当时德国的工厂工人多得好几倍，并且适值俄国农民问题亦爆发起来，当然可以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机会派的社会主义理论，确是谬误不切事实，而且是以阻碍无产阶级直起实行革命的勇气。

第二国际派理论上的第二种谬误：便是无产阶级自身没有行政家、管理家足以治理国家，虽得政权，亦不能持久。照这学说，差不多应当先在资本主义统治之下，养成一班无产阶级行政家，提高无产阶级文化之后，再能去争取政权。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何以不可先取得政权，然后再施行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种种教育，以提高群众的文化程度呢？机会主义者在理论上，也是无可回复的。何况，现在革命后的俄国，这种文化运动昂进的速度，异常地可惊，更有事实来矫正第二国际派的这种理论了。

第二国际派理论上的第三种错误：便是以为政治的总同盟罢工是不适用的，恐怕要破坏国家经济生活太甚，恐怕工会的罢工基金枉费了。因此，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方法，唯一的主要的——还是国会里的选举竞争和立法运动。政治的总同盟罢工在革命潮流紧急的时代，恰好是最有力的方法，是以工人阶级的实力与资本家政府相斗。诚然不错，这方法是在国会的民主主义以外的，然而正唯这种方法，才能推翻资本国家。机会主义者不知道：国会里的社会党运动，本只能当作国会外的工人运动的辅助方法，他们却把他看做最主要的斗争。无产阶级什么时候再能革命呢？依靠国会中的立法运动，想进化到社会主义！实际生活已经屡次帮着列宁主义证明这种学说的荒谬了。

至于第二国际的政策和党的组织，也受到列宁主义的矫正不少。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组织上本来就是很散漫的，除出党众共同运动选举时，党员对于各党的政策，差不多都是不实行的——各人只顾各人自己的生活，没有严格的纪律和负责的党的工作。因此，各社会党首领，如考茨基等，虽然有口头上很革命的议案和口号提出来，而实际上并不执行。再则，譬如一九一二年白柴尔国际会议时，各国社会党还发宣言，一致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而到了一九一四年，欧战发生时，社会党议员大家都投票赞成战争了。只有列宁主义的多数党，是言行相符的；亦就只有多数党，正能将帝国主义的国际战争变成阶级的国内战争。

列宁主义理论上、实践上的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里所原有的：他是批评的、革命的方法，绝不是死板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公式。而且列宁主义的方法，更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实行得更详尽切实的原则。

（三）列宁主义与理论

往往有人以为列宁主义，仅仅是实行中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列宁主义对于理论，很不看重的。这实在是很大的错误，理论是各国工人运动经验的综合。当然革命的理论必须和革命的实践相密切联结起来，否则理论便成空谈。然而实行革命运动而没有理论，也就要变成盲目的妄动，不相适应，绝无全盘规划的行动而已。所以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决不能有革命运动。”（《怎么办》）譬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哲学，或者可以说是纯粹的理论问题。昂格士说：“每次新的发明，必定要使唯物哲学改变新的形式。”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职任。果然不错，二十世纪初年，发现了许多柏格森、马赫等的心理派、新康德派、新经验派的哲学；可是同时也就发现了化学、物理、生物学上的新公律。列宁便在《唯物论及经验批评论》一书上综合这些理论，根据科学加以批驳，而筑成唯物哲学的新壁垒。可见列宁主义非常之重视理论，而且能实行整顿理论的重大职任。列宁说：“只有先进的理论所指导的政党，能尽革命运动中先进的斗争者之责。”如今俄国共产党真正实践了这一遗言了。

马克思主义重视分析客观的经济环境，能够以社会科学的公律解释社会现象的原因。机会派却利用这一方面造成一种“自然说”。俄国当初有所谓“经济派”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以俄国客观环境，资本主义还没发达，工人运动自然只会是经济斗争，决不能勉强进行政治斗争——反抗俄皇、要求民主共和等。列宁自始便反对这种学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说：哲学不但要解释客观世界，而且要变更客观世界。改良派的社会主义家却只行了一半。本来无产阶级的革命党，研究分析客观状况之后，应当设法利用这客观环境进行自己的革命工作——换句话说，便是既然看见有自然而然发生的工人运动以及一切政治经济的现象，便应当引导这些运动到自觉的、有规划、有组织的道路上去，便应当支配这些政治经济现象，使无产阶级的斗争力和觉悟力日益增进，以至于夺取政权，而实行无产阶级独裁制。所谓“自然说”的机会主义却不如此，他们一切都委过于客观状况。西欧各国社会党里，也有这种“自然说”，就是所谓“生产力论”，譬如欧战时，各国社会党引导工人阶级去赞助帝国主义战争，这显然是社会党之变节。然而这些社会党的理论却说：因为某国某国的生产力没有发达到社会革命的时期，工人阶级自然而然不会变更这次战争成国内战争。社会党这种委过的理论，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机会主义罢了。实际上这种生产力论，完全不合事实。

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便和他绝不相同。最注重的，当然是在于分析客观的、自然的生产力状态之后，还要定出规划去进行革命运动。然而就是客观的分析，列宁主义也比机会主义切合实际得多。理论的正确与否，对于革命的实际运动非常之

重要；理论若与实际相结合，它自身也就成为革命运动里的一种很大的实际力量。所以西欧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必须首先攻破这种机会派的“生产力论”，使无产阶级群众深信自己的力量，明了客观的时势，知道各种政局社会变动中的关系，不但知道各阶级现时的相互关系，而且知道最近的将来，这些关系应当如何变更，那时才能行向胜利的道路。

(四) 列宁之无产阶级革命论

列宁之无产阶级革命论根据于三个界说：

第一界说——列强资本主义国家内财政资本统治一切社会生活，纸币及一切有价证券的发行，以至于总握全社会的金融；输出资本到国外弱小国家内，经营实业或放兑国债，以攫取当地的原料，遂成为帝国主义的根源之一；极少数财政资本家的万能专制。凡此一切，都使工人阶级不得不奋起反抗不能忍受的资本主义压迫，而独占式的托辣斯和新狄嘉等制度里大资本家的寄生性质日益明显，无产阶级革命便成现代社会之唯一的出路。因此，列强各国内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日趋剧烈。

第二界说——因有列强输出资本于殖民地及弱小国家的现象，所谓“势力范围”日益扩大，以至于全球。于是资本主义便成了世界的整个的经济制度——所谓“先进国”里的少数银行资本家对于全球大多数民众，行施财政的剥削和统治。凡此一切，一方面使各国社会和各国领域都变成世界经济的某一部分，变成这总机体里的某一机件；另一方面，将全世界分成两个敌对的营垒：少数先进国家的压迫者、剥削者，大多数殖民地和弱小民族的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因此，各殖民地及弱小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日益兴起。

第三界说——各帝国主义国家之发展极不平均，已经攫得殖民地及势力范围的，还在尽力扩充，没有攫得的，又在千方百计地图谋。于是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明争暗斗非常剧烈，除了诉之于武力之外，绝无其他恢复均势之可能。凡此一切，都使资本主义方面，自己削弱其势力，而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之联合革命，易于进行。因此，帝国主义之下，战争必不能免；而欧美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之弱小民族革命要相联结，而成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列宁综合这些理论称“帝国主义为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夜”。（以上均见列宁所著的《帝国主义》）

根据这一种的客观的分析，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论，当然与向来关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理论，不能相同，机会派的社会党之“生产力论”，诿过于客观状况里的生产力尚未成熟，所以说现在还不能社会革命，何以它们对于上述的那些客观事实，却又

都没有看见呢？足见机会派理论的错误，就因为他们不愿意革命，以至于连这种很明显的客观状况，都不肯去看。列宁主义不但有充分的革命意志，而且有很充分的客观分析。

根据这三个对于世界经济状况的界说，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论，便和第二国际派素来的论点不同。

向来总是看某一国的经济状况、某一国的客观条件，来决定这一国是否能有无产阶级革命；向来总是看某一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发展，是否已经达到阶级斗争的爆烈点——无产阶级革命的程度。现在这一观点是不够的，应当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的帝国主义制度内，各种矛盾冲突的发展之结果；无产阶级革命首先爆发于某一国，不过是世界帝国主义的战线，首先在这一国破裂罢了，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线，首先在这一国建筑起来罢了。

所谓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当然不是说各国无产阶级同一天同一时，突然不约而同地暴动，无论如何不会有这样巧的事。然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从哪一国开始呢？

向来的答复是：工业比较地最发达，无产阶级占全国民众里的最大多数，文化程度最高，民主主义最盛的国家里，可以开始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的理论以为这种答案绝对不对——不必一定要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里，才能开始无产阶级的革命。资本主义已成全世界的经济机体，世界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的大战争时期，全世界经济状态、生产力以及其他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可以发现无产阶级革命。这整个儿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当然要在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开始破裂。无产阶级当然要在资本主义锁链最脆弱的地方，突围而出。一九一七年时，俄国资本主义最弱，俄皇政府最残暴，绝无精神上的威信。同时，俄国无产阶级却有最强固的革命政党，有数千万受地主压迫的农民做他的革命同盟军，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竟开始于俄国，并且得着胜利。

以后呢？亦许在印度开始继续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因为印度已经有新生的很强固的无产阶级，有民族解放运动做他的革命同盟军，而且英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异常地严酷，为印度一般民众所切齿痛恨，不但是工人阶级而已。同时，印度的资本主义比较起来还很幼稚，资产阶级的力量很弱。亦许在德国议会开始。因为德国现在亦在各国帝国主义剥削之下，自国的资产阶级，因为战败之故，已经很弱。然而德国的文化程度和印度不同，这两处假使要有无产阶级革命，两者之间当然有许多差异之点。总之，无产阶级革命，绝不一定要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内。第二国际派往往计算某国内工人占百分之几十，农民占百分之几十，如此来决定这一国能否有无产阶级革命，这实在是枉然的。固然，无产阶级的多寡，对于革命之后的一切建设事业

及革命的过程，不无影响，然而决不能以一国内的无产阶级分数，来决定无产阶级革命能否实现。

再者，第二国际派还有一种理论，以为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一定要有一长期的阶段：资产阶级先革命，资本主义因之发展；无产阶级在这时期再积聚自己的力量，预备将来再起革命，而推翻资本主义。其实，在法国大革命时，世界的资本主义刚刚是兴盛起来的时期，所以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要经过好几十年或一二百年，再到无产阶级革命。现在呢，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垂死的时期，即使有实业不十分发达的国家，还要经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些资产阶级革命也就一定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同时并进，而且可以急转直下地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于欧战时，已经说当前的革命对于俄国，正是这种民主革命与社会革命并进，而且是民主革命急转直下以至于社会革命的过程：“无产阶级将要力争政权，力争共和制度，力争没收大地主，并且在这反对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俄皇政府）以求解放资产阶级的俄国的斗争里，努力引导‘非无产阶级的平民群众’来参加。这种反对俄皇及地主而解放资产阶级的俄国之运动，无产阶级立刻利用它来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以与欧洲无产阶级相联合。当然不是利用它来帮助乡村中富有的农民，以压迫农村工人。”（列宁《反对流说》一九一五年）

可是，同时列宁又反对杜洛茨基派的革命无间说。杜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便以为革命简直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不必经过民主革命，不必注意农民的资产阶级式的政治、经济要求。列宁主义在于集中一切革命力量（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式的革命要求，当然亦在其内，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充分发展他们的革命性，以辅助无产阶级的革命。而杜洛茨基派的“革命无间”说，却以为只要进行革命，得到政权之后，即刻可以实行纯粹的社会主义政策，不必管小农私有者的要求——均分地主田地等；如此，革命便会不间断地发展到社会革命了。其实，这种政策，使农民群众与无产阶级革命相隔离，无产阶级革命反而不容易成功，因为资产阶级亦会利用农民来反对无产阶级。

革命无间说，其实并不是杜洛茨基派的什么新发现，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告共产党联合会》书里，便已经说到这种民主革命可以急转直下变成社会革命的意思。所以列宁反对杜洛茨基派，并不在于革命的无间断与否，却在于革命时注意小农资产阶级的要求与否。况且马克思当时所说的，也和杜洛茨基的革命无间说不相同：（一）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时，并不曾主张德国可以直接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二）马克思主张，竭力推进资产阶级的各派，使他们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一直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为止。

再则，向来以为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要同时有好几国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才能得

到胜利，胜利之后，才能站得住。其实帝国主义时代，资本家方面自相冲突的地方很多，列强和殖民地的利益相矛盾——他们的力量很不稳固，很不能统一，所以无产阶级尽可在各国内革命成功，而且成功之后，还能站得住，再进而辅助其他未革命国家内的被压迫阶级。帝国主义势力的自身削弱下去，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一个前提。列宁说：“历史上一切革命，二十世纪俄国的三次革命也在其内，已经证实了一个革命的根本公律：单是被剥削与被压迫者觉悟到不堪忍受旧式的统治而想变革它，还是不足以成功革命；若要革命成功，必须剥削者与压迫者自身，也实在不能再照旧生存，照旧统治下去。只有‘下层的人’不肯，‘上层的人’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那时革命才能胜利。换句话说：革命若无全国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共同的总危机，必不可能。所以革命若要发生：第一，必须使大多数工人（或者至少大多数觉悟的、有思想的、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完全明白改革的必要，能以生命为革命而牺牲；第二，必须治者阶级受着政治的危机——这种危机能使最落后的民众也要参加政治斗争，于是政府的威力减削，而革命党便能很快地推翻它……”（列宁《左派的幼稚病》）

然而推翻资产阶级，一国的工人的力量是做得到的，至于完成社会主义，那就至少非联合几国先进的无产阶级不可。因为社会革命的最终胜利，在于组织社会主义的大生产，必须有好几国先进的无产阶级，共同规划世界经济，要利用资本主义时代一切科学技术的发明，要享有一切重要的生产事业，煤、铁、电、交通等。所以列宁说，革命已成功的无产阶级国家之职任，在于“实行这一国内最大限度的经济改造，同时即以发展并辅助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列宁《无产阶级革命》）

（五）无产阶级独裁制论

无产阶级独裁制论，可以分三方面来说明：一、无产阶级独裁制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工具；二、无产阶级独裁制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统治；三、苏维埃制度，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国家的形式。

一、无产阶级独裁制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工具。无产阶级独裁的问题，首先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是否要用强力，是否只限于和平方法，是否必定要依着民主主义的形式，要全国大多数举手投票赞成了，再去革命？当然是要用强力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第一，必须以强力镇压已推翻之剥削阶级，保障自己已经取得的权利与自由；第二，必须进行革命事业到底，进行到社会主义完全胜利才止。因此，必须要有无产阶级的独裁制，就是必须要有在革命之后成立特别的组织，以执行上述的两种职任。列宁说：“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一个历史上整个的时

代。这一时代未曾终了以前，剥削者总有恢复资本主义统治的希望，既有希望便要尝试。剥削者第一次大失败之后，居然被人推翻了，真正出于他们意料之外。他们还不信自己的失败，他们想都不肯想到会有这种失败，于是用尽十倍、百倍的气力，切齿痛恨、忿怒咆哮地要来恢复他们‘天堂’的旧观，恢复他们的家庭。他们过得这样舒服的生活，如今一班‘普通平民的混蛋’居然破毁了它，使他们破产、穷困（或者反而要来做‘普通’劳动……）。这些剥削者之后，还会拖着许多群众的小资产阶级——几十年来的历史，证明这些小资产阶级，又是很动摇不定的。今天可以帮助无产阶级，明天便可以看见改革的困难而吓退，工人阶级初次失败一下，或是小小的挫折，他们便恐慌起来了，惊惶起来了，倒来倒去，一忽儿帮无产阶级，一忽儿又帮资产阶级。”（列宁《无产阶级革命》）

资产阶级是要尝试复资本主义的辟的。他们的确也有复辟的根据，因为虽然他们已经推翻，始终还比无产阶级力量大。他们的力量：第一，在于国际的资本及各国资产阶级间的声息灵通——各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只能算是难得的例外，事实上终还是一国先革命，这一国胜利的无产阶级，始终比较的是孤立的。第二，在于剥削者推翻后，始终还有许多剩下的金钱及种种动产，组织上、管理上、军事上的经验，高等教育的知识阶级生活偏近于资产阶级，当然在革命初期，也还帮助他们，以及其他……初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是没有这些优点的。第三，在于群众的小资产阶级习惯和小生产制度，小生产制度在革命后还保存着不少（小农及手工业），而小生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便又是资本主义。所谓消灭阶级是一二百年的经济改造事业。地主资本家可以没收或赶掉，然而这还不是消灭阶级。小生产者若不完全消灭，阶级还是会发展出来。然而消灭小生产者却不是一赶可以了事的，必须渐渐地改造经济、发达大生产，同时进行协作式小商品生产。如此，便一定要有长期的组织上、政治上很小心很有规划地工作。

因此种种，革命胜利之后，必须有无产阶级独裁制来保障革命之胜利：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运动，防止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扰乱。列宁说：“无产阶级独裁制是绝无妥协、绝无怜悯的阶级战争，是新阶级反对很强有力的仇敌，反对那资产阶级的战争——资产阶级推翻之后，正用着十倍的气力来袭击呢……无产阶级独裁制是决死的斗争，流血的、不流血的、强力的、和平的、军事的、经济的、教育的、行政的种种方法，以反对旧社会的力量及流毒之斗争……无产阶级独裁制时代，无产阶级要训导几千万小农民和小生产者，要驾驭许多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官吏、资产阶级的智识者，使他们服从无产阶级国家及无产阶级的指导，战胜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的习惯及遗传性……同样必须要在长期的斗争中，历练并且教育无产阶级自己。无产阶级自身是从

资产阶级里出来的，当然不会骤然间脱离那些小资产阶级式的成见；这绝不是天神的魔力，绝不是口号、命令、议决案所能除之于一旦的，必须经过长期的反对小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过程。”（列宁《左派的幼稚病》）

二、无产阶级独裁制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统治。少数派及一切机会主义派总以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只要推翻一个政府，改组一个内阁，便可以开始。其实英国劳动党政府，或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绝还不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还存在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利用这些所谓“劳动”党、“社会”党，实行他们的统治。欧战后，英、德两国的实例，非常之明显：虽然有了劳动党内阁，虽然有了社会民主党政府，然而丝毫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不能开始，工人阶级仍旧受资本家的剥削。何以故？因为资产阶级还有参政权，还有一切剥削他人自由，还有一切造谣欺诳的自由，还有发财自由，尤其重要的，他们还保存着照旧的享有大生产的工具及资本的私有权。所以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的政权，无产阶级独裁制，决不能根据于资产阶级的秩序——普通选举、国会立法等的秩序上发生出来，必须在破坏、崩裂这些秩序的过程中，必须推翻资产阶级，没收资本家及大地主，将最主要的生产工具及资料收归公有，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之强力的革命；无产阶级独裁制便是革命的政权，以强力制服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独裁制，实在就是不受旧社会法律之限制，而依据于强力，并能得普通劳动者及被剥削者群众之同情及赞助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统治。（列宁《国家与革命》）

因此，我们可以得着两个结论：第一结论——社会革命后的政治制度，决不能是所谓完全的民主主义、全民的民主主义、贫人富人完全平等。“无产阶级独裁制应当是新式的民主主义国家；对于无产阶级及一切无产者既是民主主义，对于资产阶级便是独裁的政制……”（《国家与革命》）资本主义下的民主主义，决不会是人人平等的。单就物质力量上说，参政运动里的报纸、印刷工具、纸张、房屋，都属于资本家，他们能操纵一切，结果名为民主，而实际上是大资本家主治国家。所以社会革命之后，要保障最大多数无产阶级及农民的自由和政权，便必须剥夺资产阶级的政权和自由。无产阶级独裁的政制，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是大多数被剥削者的民权，镇压那少数的剥削者，限制他们的权利。第二结论——社会主义决不能从资产阶级社会里，依据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用和平的方法发展出来。社会主义必须经过社会革命，实行无产阶级独裁制。首先便要破坏那资产阶级的国家、军队、法律、官僚机关、警察组织，然后才能剥夺资产阶级的政权及自由，而建设无产阶级独裁制的国家机关；然后无产阶级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而不受阻碍。尤其是现在帝国主义时代，大资本家享有一切大生产的工具及资料，力能操纵全国的金融、交易、生产、交通，以致于

全国的官署、法律、警察、军队、国会、舆论、选举运动，除出强力拆毁这一资产阶级国家的机器以外，别无他法可以开始行向社会主义。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独裁制的第一条件，便是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当然，等到有好几个强国都已经革命，在国际关系上，变成了许多无产阶级国家包围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势，那时也许这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资本家“自愿”对无产阶级大大地让步，那时革命的强力程度，或者可以减低些。然而这还在很远的将来。最近一期的各国革命，是决不能避免强力破坏的。

三、苏维埃制度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国家的形式。无产阶级独裁制之胜利，就是镇压住资产阶级、毁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以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这是无可疑义的。可是用什么样的组织，来实行这些重大的工作呢？资本主义之下发展出来的无产阶级组织，根据于资产阶级国会制度发生出来的那些旧形式的组织，当然是不够的。于是有一种新形式的组织从革命斗争的过程里发展出来——就是苏维埃。苏维埃的制度，比较起旧的组织，譬如工会等类起来，有许多优点：第一，苏维埃包括的范围最广，可以把一切工人完全组织起来；第二，苏维埃是唯一的最群众的机关，包含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工人、农民、兵士、水手，而无产阶级政治指导极容易实行；第三，苏维埃是最强有力的革命机关，从群众的政治斗争及暴动反抗的过程里发生出来，足以摧折财政资本阶级的经济、政治力量；第四，苏维埃是最直接的群众自己的组织，所以也是最民主的组织——群众得以充分发展管理政事的能力，进行破坏旧国家和创造新国家的工作。苏维埃政府，便是各城乡地方苏维埃联合起来的国家组织。苏维埃里所组织的群众，正是革命前受地主资本家压迫剥削的阶级。这些阶级，即使在最民主、最平权的国家里，名为民主主义，而实际上用种种奸猾的方法，使他们不过投一投票，再也不能实际上去管理政事。苏维埃里，却只有当地一切工人及农民——剥削别人劳动的没有选举权——按职业、工厂、村落，自己派出代表去组织，直接议定并执行当地的政事，这才是平民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参政。所以苏维埃制度是国家组织的新形式，原则上根本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及国会制度不相同；这种国家，不是剥削及压迫劳动群众的工具，而是解放他们的利器，并且是实行无产阶级独裁制的机关。

（六）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的政党

社会主义及社会革命，既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的结果，那么，资本主义下所发生出来的无产阶级，负着实行革命独裁制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怎样去尽这种职任呢？无产阶级必须要组织自己的政党，去尽这种从鼓起革命运动、指导革命以至于

实行无产阶级独裁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长期间的职任。列宁主义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定义，极为重要，可以分下列几层说明：

第一，党是无产阶级之先进的战队。无产阶级发生于资本主义之下，觉悟的程度当然参差不齐的；所以必须有先进的一部分组织政党，来指导全阶级的革命运动。工人阶级的最觉悟的一部分，能见到全阶级的利益，不限于一职业、一工厂或一地方，能见到历史的发展趋势，能见到各阶级间斗争的复杂形势，至少能觉悟到斗争的必要，并且积极的实行斗争，这种代表工人阶级的分子，自然是工人阶级斗争的先锋队。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必定要知道革命的理论知识，必定要能引导工人阶级往前斗争，应付各阶级间斗争的复杂变化的形式；再则，必须与党外群众密切相关，成为工人阶级最积极先进，同时又是最亲密的一部分。

第二，党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战队。党不但是阶级之先锋队，并且是阶级之有组织的战队。革命的政党既要指导工人阶级的斗争，那就自身必定先要有组织，使工人群众感受到斗争中的有规划、系统、集权、分工等的训练。俄国社会民主党之多数派及少数派分裂的时候，最初的争执，便在这组织问题。当时少数派首领马尔托夫说：“随便一个罢工工人，都可以算是党员。”这便是根本上的错误。党的本身尚且没有组织，党员与非党员都分不出来，如何能有规划地指导群众呢？所以党的组织必须很严整，并且有很严格的纪律。

第三，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之最高形式。无产阶级的组织，除了政党之外，还有许多，譬如职工会、协作社、工厂委员会、妇女团体、青年团体、文化教育团体、报纸、国会的劳动系、革命运动时的武装队等。然而党应当是一个中心组织，因为有斗争中必要的经验和智识，能定出一切运动的总方针，而且因为向来的口号，使群众信仰的政治指导，所以更能影响其他组织，而实行这种斗争中的总方针。如此，工人阶级的斗争，才能得到统一的指导。机会派及少数派总爱说工会、协作社等，应该脱离党的关系而“独立”“中立”。其实这是使无产阶级的运动解体，指导没有中心，斗争没有总的方针。

第四，党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工具。党诚然是无产阶级各种组织的最高形式，然而党的自身，决不是目的；党应当是无产阶级手中的工具，用以夺取政权，建立并巩固无产阶级独裁制。没有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组织，无产阶级必定无从取得政权，并且保卫革命胜利后的无产阶级政权。

第五，党应当代表革命的统一意志，内部不能再有许多小团体或小组织。党的职任既在夺取并巩固无产阶级独裁制，那就自己必定要团结得非常之紧，有铁的纪律。所谓铁的纪律，便是要有统一的意志，全党党员行动绝对的一致。当然不是说，党内

不应当有意见的争执、批评和讨论。铁的纪律，正要预先有详细谨慎的讨论和批评，然后大家共同服从多数的决议，这才是自觉的、自愿的服从，而不是盲目的、机械式的服从。可是，既经议决之后，批评和讨论既经充分辩明之后，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一致，便是全党党员的天职。否则，不能有统一的党，更无所谓纪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斗步骤，尚且自相参差不齐，怎能指导群众，怎能克服强大敌人呢？

第六，党应当肃清内部的机会主义派的分子，方能巩固。无产阶级并不是固步自封、永久不变的阶级，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小商人、小农民、智识阶级，这些逐渐无产阶级化的分子，自然会加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同时，工人阶级的“上层”，职工运动里的职员或国会里的工党议员等，亦会妥协而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在这帝国主义时代，列强能以剥削殖民地劳动者所得的利润，增加自国高等工人的工资，这些高等工人“劳工贵族”，列宁所谓资产阶级化的工人，最容易倾向于机会主义。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分子或资产阶级化的工人，往往渗入共产党里；无意的、有意的他们能紊乱党的革命策略，使机会主义侵入；所以必须时时防避这种倾向，绝无惋惜地反对这种分子，以致于开除他们。这样，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巩固，而不迷失自己革命的道路。

无产阶级必须有这样的革命政党，方才能尽自己社会革命的使命，实行无产阶级独裁制，引导全人类入社会主义之域；无产阶级必须有这样的政党，方才能在这帝国主义的时期，推翻那强有力的敌人——世界资产阶级。

这篇文章所说，只是列宁主义的大概，还有列宁主义与民族问题，列宁主义与农民问题等的重要理论，因为本号另有专篇，所以没有重复赘述。

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

陈独秀

列宁主义自然就是马克思主义，然而马克思主义到了列宁，则更明了、确定了，周密了，也扩大了。其更明了、确定、周密、扩大之点，最重要的便是资本制度与共产制度间之无产阶级独裁制及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民族运动这两个理论。后者尤于中国目前的民族革命有关，我们应该略知列宁对于民族问题的意见。列宁对于民族问题的意见和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对于民族问题的意见，完全不同。

列宁的意见：

- (一) 全世界一切有色无色人种的；
- (二) 行动上帮助民族解放运动；
- (三) 由被压迫者革命而分立，而自建国家；
- (四) 被压迫的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问题；
- (五) 联合被压迫的民族运动和被压迫的阶级运动——推翻国际帝国主义；
- (六) 各民族间在政治上应该是自由分立的，在经济上应该是协作而统一的。

改良派的意见：

- (一) 欧美白人种的；
- (二) 口头上的民族平等；
- (三) 由压迫者恩赐民族自治——在宗主国统治下的自治；
- (四) 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之各国内的局部问题；
- (五) 利用民族联合或排斥异族的名义巩固帝国主义；
- (六) 各民族间在政治上应该是统一的，在经济上应该是分离而竞争的。

据上表看来，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殖民地及被压迫的国家（即半殖民地），它们的民族运动，只有依照列宁这样伟大的、周到的意见而行，才能够澈底地解决，才能够得着真正自由，这是一件最明白无疑的事。改良派所谓民族问题，乃是宗主国应该采用何项政策欺骗殖民地的民族，使之永久服侍宗主国而不思反叛，以维持各帝国主义

的宗主国永久对于殖民地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剥削。它们所谓民族问题和民族解放运动，本是正相反背的一件事。改良派不但不赞成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并且公然宣传：落后的民族，只有在宗主国统治之下，才有和平的幸福与进步。照它们的意见，各帝国主义的国家，对于殖民地政治的压迫和经济的剥削，都是不可少的高厚天恩。所以改良派的第二国际党，对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始终不表同情，而且公然承认各帝国主义的国家有统治其殖民地的权利，公然以帝国主义的国家所剥削殖民地之余沥，掀动国内一部分工人贵族，使之维持构成本国帝国主义势力的大来源——剥削殖民地，使之拥护祖国之胜利，反对本国的殖民地之民族运动及工人运动，因此更进而使之拥护本国资产阶级之政权。这是改良派的第二国际党不可宽恕的最大罪恶，这就是第三国际党指它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之真实事证，这也就是革命派的第三国际党和改良派的第二国际党根本不同之一重要点。

第二国际党所谓国际，乃以欧美白人种为限，其余有色人种，都是天赋给他们的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资格，不在国际之列。第三国际党所谓国际，不但绝对没有人种的限制，其主要目的，乃是联合全世界所有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与所有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于全世界之统治与剥削，跻全人类于真正平等、自由之地位。这就是国际的无产阶级运动，同时也是国际的民族运动。第三国际党这个理想，这个运动，就是伟大的列宁主义之结晶。

欧战后，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饱受了威尔逊所谓“民族自决”“人种平等”的欺骗，中国人也在内；在华盛顿会议，太平洋被压迫的民族又受了哈定一次欺骗，中国人也在内。我们因为这些欺骗的教训，应该明白：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二国际党的势力统治下的世界，绝没有解决民族问题之可能；要民族解放成功，是必须依照第三国际党所指示，亦即列宁主义所指示，联合世界被压迫的阶级与被压迫的民族，共同打破帝国主义束缚全世界被压迫者的锁链。

现在的中国民族运动，是不是以推翻帝国主义为对象呢？大部分是的，然却有三个危险的倾向：

第一是大商买办阶级。它们现在虽未曾公然反对民族运动，然而它们始终和侵入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有共同的利益。它们将来即进化到工业资产阶级，也是卖国的资产阶级，不是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们一向在帝国主义势力支配下发展它们的经济力之关系，尽有在美国人“中美提携和平进步”或日本人“大亚细亚主义”等口号之下，与帝国主义者勾结的可能。他们这种勾结帝国主义所发展的工业，将用“输入外资”的名义卖尽国民经济的命脉及国家主权。这是中国民族运动第一个大患。

第二是不脱封建思想的知识阶级。如国民党一部分右派分子及青年党等，口中也

说赞成民族运动；但是他们所谓民族运动的观念，完全立脚在国家主义上面，他们所谓民族运动的对象，是笼统的外族，不是帝国主义者。自资本帝国主义征服了全世界，全世界的经济关系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也成了整个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是一个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之两方面。在此世界经济成了整个的时代，已经没有一个封建时代闭关孤立的国家，便不能有一个封建时代闭关孤立的民族主义；在此世界革命运动成了整个的时代，也已经没有一个孤立无援的民族，便不会有一个原始的、笼统的民族排外运动。中国民族是全世界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者之一，中国民族运动也是全世界反抗资本帝国主义之一，所以此时我们的民族运动，已经不是封建时代一个闭关的单纯的民族运动，而是一个国际的民族运动，而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共同起来推翻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因为若不将资本帝国主义束缚全世界被统治、被剥削者的锁链全部毁坏，它在世界上存在一天，任何被统治、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都不会得着自由。因此，我们应该懂得立脚在国家主义上面而不以资本帝国主义为对象的民族运动，乃是资本主义前的民族运动，换句话说，就是封建时代闭关的民族运动。不脱封建时代思想的民族主义者，即资本主义前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不了解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形式的帝国主义和他剥削的弱小民族之间的关系，他们不懂得现代的民族运动特性和封建时代的民族运动不同，他们认不清弱小民族之敌人是谁，更认不清弱小民族的友人是谁。因此，他们自以为是民族主义者，实际上他们竟放过了民族运动之敌人，且会和民族运动的敌人妥协，而受敌人的教唆仇视民族运动之友人。如德意志民族党，一面和英、法、美帝国主义者妥协，承认《道威斯计划》，一面极力仇视反帝国主义的苏俄，便是一个显例。中国不脱封建时代思想的知识阶级也是如此。它们当中，或极力主张民族运动（如青年党），或自以为是民族主义者（如国民党右派）；然而它们都不赞成反对帝国主义，它们竟看不见剥削、压迫中国民族无所不至的帝国主义者，它们竟不觉得它们自己及自己的民族践踏在帝国主义者脚下，反而攻击同情于中国民族运动的苏俄是“赤色帝国主义”。且竟附和官僚的研究系，对于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民族运动者，加以“亲俄”“卖国”的罪名，实际上做了帝国主义者宣传的工具。这是中国民族运动第二个大患。

第三是工贼。在中国的民族运动中，工人阶级参加的力量，已经使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国内军阀与大商买办阶级——感觉得有利用工贼来破坏工人阶级团结力的必要。这班工贼有些是工人贵族，有些是冒充工会运动者即招牌工会之职员。他们不反对帝国主义者，他们不反对军阀官僚，他们不反对买办阶级，他们的唯一目的是破坏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党，分裂工人阶级的团结力。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买

办阶级要利用他们就正在这一点。帝国主义者用以阻碍中国民族奋起的第一个工具是军阀官僚，第二个工具是买办阶级，这班工贼便是第三个工具。这班工贼不但勾结军阀官僚及买办阶级（交通系）是公开的，他们勾结帝国主义者也是公开的，他们已和帝国主义者的走狗第二国际党公开地发生关系。第二国际党为什么要和他们发生关系呢？不用说是为了要利用他们破坏中国民族运动中重要的力量——工人阶级的团结力，破坏第三国际党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民族运动在中国发展。这是中国民族运动第三个大患。

中国的民族运动，此时虽然有日渐发展的趋势；但是上述的三种力量若同时也日渐发展起来，至少也会减少中国民族运动成功的速度，和第二国际党的思想行动减少世界革命成功的速度一样。因此，我们敢说：在中国民族运动的现代，我们实有了解列宁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民族运动——的必要。孙中山先生，他是了解这种必要的一个，他临终时致苏联遗书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

专政问题的历史观

——译自《共产国际》第十四期

列宁 著 郑超麟 译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当代工人运动的根本问题。为完全明了这个问题起见，必须知道其历史。在国际上，革命专政学说史，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史，是与革命社会主义史，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史，互相混合为一的。再一层——这自然是最重要的一层——被压迫、剥削阶级反抗剥削者的所有革命史是我们对于专政问题的认识之最重要的材料和源泉。谁不明了任何革命阶级为自己的胜利有施行专政之必要，谁就是一点也不明了革命历史或一点也不愿意知道革命历史。

在俄国，从理论上说，《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党纲》有特殊的意义。这《党纲》是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黎明》和《火星》二报编辑部起草的，恰切点说，是蒲列哈诺夫起草，经过这编辑部审查、修改、写定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在这《党纲》里明显地、确定地提出，这样提出恰与反对伯恩斯坦、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互有关系。可是最重要的意义自然是革命经验，换言之，就是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经验。

这一年最后的三个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是特别有力、广大、群众、革命斗争的时代，是这个斗争最有效力的二种方法——群众政治罢工和武装暴动——之联合的时代。（这里带说一句：一九〇五年五月波尔札维克大会、“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已经承认“组织无产阶级用武装暴动手段去和专制作直接斗争是党的责任，是党最重要的最紧急的责任之一。”并命令党的所有机关“了解群众政治罢工的作用，这种罢工在暴动发端和进行上都能有重要的意义”。）

在世界历史上，革命斗争第一次达到这样的发展、这样的力量，发生武装暴动与群众罢工联络起来，与无产阶级这特有的工具联络起来。明显地，这经验对于所有无产阶级革命都有世界的意义。波尔札维克党人用所有注意力和热忱从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研究这个经验。我指出一九〇五年政治经济罢工、这些罢工中间联络形式、罢工斗争那时发展到空前高度等等每月统计数目之调查。这种分析，我发表在一九一〇和

一九一一年的《教育杂志》之上，其后又以简单的统计发表在波尔札维克党人那时的国外出版物之中。

群众罢工和武装斗争本身就提出革命政权问题和专政问题，因为这种斗争方法必然要引起——起初是地方性质的——排斥旧政权、无产阶级和革命阶级夺取政权、驱逐地主、有时占领工厂等事实。上述时代的群众革命斗争产生了世界历史上以前意料不到的组织，如工人代表苏维埃及继起的兵士代表苏维埃、农民委员会以及类此的组织。于是这种事实出现：即现在世界觉悟工人注目的问题（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在一九〇五年年底已经实际提出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和非假冒的马克思主义之主要代表，如卢森堡，即刻就估定了这个实际经验的意义，在集会上、出版物上带批评态度分析这个经验；但官僚社会民主党和官僚社会党大多数官僚代表，其中包括改良派和未来的考茨基派、朗格派、美国喜尔启特派等却表示出完全不能明了这个经验的意义和执行自己的革命责任，换言之，即不能从事研究并宣传这个经验的教训。

在俄国，波尔札维克党人和孟雪维克党人同样于这个时候，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武装暴动失败以后，即从事于结算这个经验。这种工作加紧起来，尤其是当一九〇六年四月在斯德哥尔摩开的所谓“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联合大会”。在这大会上波尔札维克党人和孟雪维克党人都派代表参与，这二派形式上也算联合起来。这二派异常奋勇预备这次大会。大会之前，一九〇六年开始，两派都发表自己对于所有最重要问题议决案的草案。这些草案都刊入于我的小册子《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联合大会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莫斯科出版，一九〇六年，一一〇页，其中差不多一半是二派议决案草案原文和大会通过的议决案原文）。这些草案是研究当时提出的问题之最重要的材料。

苏维埃意义之争论那时已经牵涉到专政问题。波尔札维克党人在一九〇五年十月革命之前就提出专政问题（参看我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在德谟克拉西革命中的二个策略》，日内瓦出版，一九〇五年七月，此小册子随后转载在一部论文集《十二年》）。孟雪维克党人否认这个口号——“专政”。波尔札维克党人特别提醒工人代表苏维埃“确实是革命新政权的萌芽”，引号内就是波尔札维克党人的议决案草案中的话。孟雪维克党人承认苏维埃的价值，答应“帮助苏维埃成立”，但他们不肯承认苏维埃是革命政权的萌芽，普通说来，他们不肯说起任何形式的“革命新政权”，他们简直拒绝了专政口号。不难看出我们与孟雪维克党人现在所有争辩都已经萌芽于那时提出的问题。也不难看出孟雪维克党人（俄国的和非俄国的，如考茨基派、朗格派等）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态度中就表现其是改良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口头承认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上则否认“革命”之最实质的根本的观念。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我于上述的小册子，《二个策略》之中已经驳斥过孟雪维克党人攻讦我的论据，说我“不自觉地混杂了革命和专政这二个观念”。我详细地证明过孟雪维克党人恰好把自己的机会主义、自己政策乃追随自由派资产阶级之后传播其势力于无产阶级中间之真相，表现在这种攻讦里头。我曾说过：当革命变成不可侮蔑的力量之时，革命的敌人就开始“承认革命”，我并且（一九〇五年夏天）征引俄国自由派仍然是君主立宪党人之实例来证明了。现在，在一九二〇年，可以添加一句说：德意二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或至少，其中最通达、最巧诈的分子正预备着“承认革命”。可是“承认”革命，同时又拒绝承认某一阶级或某几阶级之专政，这样所以当时的俄国自由派和孟雪维克党人，现在的德意自由派和杜拉底派、考茨基派就因此表现其改良主义，表现其完全失却了革命者资格。

因为当革命已经变成不可侮蔑的势力的时候，当自由派也“承认”革命的时候，当统治阶级不仅看见而且感觉到被压迫阶级有不可屈挠的力量力量的时候，所有问题——理论家的或实际政治家的——就都归到革命中各阶级之真确的分野；没有“专政”观念，就不能有这个真确的阶级分野；没有预备专政就不能算做实际上的革命者。这个真理，孟雪维克党人在一九〇五年是不明白的。在一九二〇年，德法意及其他国家惧怕共产国际苛刻“条件”的一班社会党人也是不明白的，这班惧怕的人，口头上能够承认专政，但实际上不能作专政的预备。关于这个问题，我著过了一篇注释马克思观点的论文，一九〇五年六月曾经发表一次为反对俄国孟雪维克党人，现在我再发表一次来攻击一九二〇年西欧的孟雪维克党人：

梅林克在其所印行的一八四八年《莱茵新闻》中《马克思论文集》内，他所作的注解里头，曾经叙述一段轶事，说资产阶级文人攻击《莱茵新闻》声中有一种责言，仿佛以为《莱茵新闻》主张“即刻采用专政手段乃是实现德谟克拉西的唯一方法”是错误的。（《马克思遗著》第三卷第五十三页）照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来看，专政观念和德谟克西拉观念是不能两立。资产者不明白阶级斗争理论，习惯于看见不同的资产阶级小团体、不同的资产阶级小派别在政治舞台上争持，自然只能明了专政就是德谟克拉西的自由和保障一切消灭，就是为专政者个人利益任意胡为，就是为专政者个人利益滥用职权。实际上，这种庸俗资产阶级观点也正就是俄国孟雪维克党人的观点，他们解释波尔札维克党人何以要坚持“专政”口号，说这是“列宁靠专政要来自己享福”（《火星》第一〇三期第三页第二行）。为要向孟雪维克党人解释阶级专政观念和个人专政观念之区别，德谟克拉西专政任务和社会主义专政任务之区别，我们必须站立在《莱茵新闻》的观点。

一八四八年九月十四日《莱茵新闻》说：“革命后所有临时的国家结构需要一个专政，而且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即斥责坎普豪兹（Camphausen，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日以后的内阁首领）不能施行专政手段，不能即刻击散和消灭旧制度之一切遗物。当坎普豪兹正在做宪法迷梦时候，失败的政党（即反动党）却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官僚和军队里头，重整旗鼓或东或西作公开的争斗。”

梅林克说得很对：在这几句话中就总括了《莱茵新闻》评论坎普豪兹内阁的许多冗长论文。马克思这几句话告诉我们什么？这是告诉我们说：临时的革命政府必须施行专政手段（这一层道理，惧怕“专政”口号的孟雪维克党人不能明白），这个专政的责任就是消灭旧制度的遗物（这正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波尔札维克党人在其论反对反革命斗争的议决案中所明白指示的，也正是孟雪维克党人在其上述的议决案中所缺少的。）最后在这几句话中，我们又可看出马克思嘲笑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和公开内乱时之“宪法的迷梦”。一八四八年六月六日马克思在《莱茵新闻》的一篇论文中有底下几句警句：“国民立宪会议首先应该是活动的，革命活动的会议。可是法郎克福会议只可算做议会行动之练习，而放任政府自由行动。假定这个‘研究会’讨论成熟之后居然确定出很好的议事日程，居然成立了很好的宪法。但如果德国政府这个时候拿刺刀列入议事日程上了，这个很好的议事日程，这个很好的宪法又有何种作用？”马克思这几句话有什么意义呢？

这就是专政口号的意义。

民众生活的大问题只靠暴力能够解决。最反动的阶级往往首先诉诸暴力，首先开始国内战争，首先“拿刺刀列入议事日程”。俄国专制政权从一月九日起到处的举动及继续的举动，就是如此。这种状况一经造成，刺刀一经事实上首列于政治的议事日程，暴动一经表现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那么宪法迷梦和议会练习只成了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之托辞，遮掩资产阶级“临阵逃脱”行为之假面具。真正革命的阶级此时正应该提出专政口号。

波尔札维克党人在一九〇五年十月革命以前，对于专政就持这样的一种论调。

有了这个革命的经验之后，我更详细地分析专政问题在这一本小册子里头：《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与工党的责任》（彼得堡出版，一九〇六年，小册子上写一九〇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我将从这本小册子中，摘举所有重要的辩论出来，不过我变换了许多人名，只简单指明这是关于立宪民主党人的，或是关于孟雪维克党人的。一般说来，这本小册子是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一部分又是反对无党的自由派、半立宪民主党人、

半孟雪维克党人。可是根本上，凡关于专政问题时，都是针对孟雪维克党人而发，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步步跟着立宪民主党人走去。

当最后的枪弹在莫斯科发响的时候，当军事警察专政庆祝其野蛮典礼的时候，当戕杀群众、虐待群众举动普遍全俄的时候，立宪民主党人报纸倒反抗议左派的强暴，攻击革命党的罢工委员会。立宪民主党的一班大学教授以科学帮助杜巴梭夫（Doubassev），甚至于将“加紧自卫”字义替代“专政”字义。这班“科学家”不惜假造他们学校的拉丁文来镇压革命斗争。专政的意义是——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好生记着！一种无限制的政权，靠在权力上头，而不是靠在法律上头。在国内战争时候，所有胜利的政权只能够是专政。可是专政有二种不同：一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少数警察对民众的专政；一是民众大多数对少数暴徒、劫盗、僭篡者的专政。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在右派最无法律的、最卑鄙的进攻时代，倒反假造“专政”的科学观念，倒反大声疾呼抗议左派的强暴，这种行为明明表示‘妥协派’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站立何种地位。斗争开始，“妥协派”就惊惶走开了。革命的民众胜利了（十月十七日），“妥协派”于是从巢穴中飞将出来，自鸣得意，乱吹牛屁，高声叫喊：“这‘光荣的’政治罢工！”反革命胜利了，“妥协派”又在失败者当中传播了虚伪的劝告和教训。胜利的罢工是“光荣的”；失败的罢工是犯罪的、野蛮的、无意识的、无政府的，失败的暴动是疯狂的、原始胡闹的、野蛮的、蠢才勾当的。总而言之一句话，“妥协派”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头脑专在伺察现在谁较有力，为的是参加战团，或赞助这边或赞助那边，和缓争斗，消灭那死力为自由奋斗的民众之革命意识。

再进一层，现在正是叙述关于专政问题之辩论，驳斥白狼克（Blanck）先生高见的时候了。这位白狼克先生于一九〇六年在貌为无党，实系孟雪维克党人的报纸中发挥孟雪维克党人高见，颂扬孟雪维克党人，说他们“企图领导俄国社会民主运动，走上那以德国大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国际社会民主运动所走的道路”。

换一句话说，白狼克和立宪民主党人一样，攻讦波尔札维克党人是无理性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轻举妄动的革命者，并以“有理性的”孟雪维克党人抵制波尔札维克党人，而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当做孟雪维克的党。这本是国际社会自由派、和平主义者及其他倾向的惯技，他们到处颂扬改良派机会主义者、考茨基派、朗格派是“有理性的”社会党人，以抵制“疯狂的”波尔札维克党人。

我在上述的小册子中，这样答复白狼克先生：

白狼克先生分俄罗斯革命为相反的两个时代。第一个时代譬如自一九〇五年十月到十二月，这是革命骚乱的时代。第二个时代就是现在，我们自然有权称此时代为立宪民主党人议会选举胜利时代，或简直可称为立宪民主党人议会时代。

白狼克先生论这个时代，说：意识和理性重新到来了，也可以说回转到觉悟的、有计划的、有系统的行动来了。第一个时代，白狼克先生以为这是理论和实际完全解体的时代。社会民主党所有原则和观念完全消灭，俄国社会民主党创立人所确定的策略全被忘记了，甚至社会民主党人生观的基础也从根本上被割断了。

这就是白狼克先生根本上的见解——纯粹带实际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在这“革命骚乱的实际时代”解体了。

确是这样吗？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初的和重要的“基础”是什么？是说：无产阶级是当代社会始终如一的革命阶级，因此也就是所有革命中最进步的阶级。自己试自问：社会民主党人生观的这个基础，在革命骚乱中从根本上被割断了么？不然。骚乱反能以最光耀的方式证实了这个基础。无产阶级正是这个时代重要的而且起初差不多是唯一的战士。在世界历史上，这可说是破天荒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遇见了最巨大的，甚至较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亦未之前闻的这个纯粹无产阶级斗争武器——群众政治罢工——的应用。无产阶级起来奋斗，作直接的革命斗争正当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和白狼克先生号召人们往布柳更（Bulguine）议会去的时候，正当立宪民主党人一班大学教授召集学生上学的时候。无产阶级靠自己的武器，可以说占领了整个“宪法”交给俄罗斯，这个“宪法”从此时起才腐败、堕落。无产阶级在一九〇五年十月所用的策略上斗争方法，就是半年以来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波尔札维克派的第三次大会议决案所说的，这个议决案又教人加紧注意到群众政治罢工和暴动同时结合起来之重要。“革命骚乱”整个时代——一九〇五年最后三个月——之特点正在于有此种结合。这样，可见俄国小资产阶级这位思想家用最不识羞、最令人肉麻的手段故意附会了实事。它并未指出一件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骚乱”的实际经验中间之冲突；他企图抹杀这个骚乱的根本特性，这种特性正好证实“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原则和观念”“社会民主党人生观的一切基础”。

然而，究竟何种实在的原因推动白狼克先生到这样一个万分错误的见解，以为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则和观念都在这“骚乱”时代消灭了呢？研究这一点是很有趣味的，这种研究愈能使我们发现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真相。

从政治活动不同态度的观点上看，从民众历史创造不同方法的观点看，“革命

骚乱”时代和现在这个“立宪民主党人”时代中间重要的区别究竟何在呢？首先，主要在“骚乱”时代应用了民众历史创造才能之一些特殊的方法，为政治生活其他时代所未经见过的。这些方法中最重要的是：（一）民众“获得”政治自由，其实现全不靠任何权限法律，也不受任何限制（集会、出版、结社等自由）；（二）创造革命政权的新机关——工人、兵士、路工、农民代表苏维埃农村和都市的新政权等。这些机关纯粹是民众中革命分子所造成的；这些机关造成起来全不靠任何法律和习惯，纯粹用革命方法，自然成其为民众独立创造之产品，成其为民众独立性之表现，这些民众是从警察旧锁链底下解放出来或正在解放之中。这终究是政权的机关，姑无论在其组成和运用上表现幼稚、原始、雏形、脆弱。这些机关行动起来和政权一样，譬如占领印刷局（彼得堡），拘捕那些妨害革命民众实现其权利的警官（此例彼得堡也有，那里新政权机关比较薄弱，旧政权机关比较强大）。这些机关发命令告全民众不送钱给政府，这也和政权一样。这些机关没收了旧政府的金钱（南方铁路罢工委员会），即以此金钱供给新的民众政府之需要。这无疑新的民众的，也可说是革命的政府之萌芽。按其社会政治性看来，这又是民众中革命分子专政之发端。白狼克先生和季济维特（Kisewitter）先生，你们觉得这是很奇怪吗？你们在这里看得见“加紧的自卫”，即资产阶级所谓专政的意义吗？我们已经告诉你们说：你们一点也不懂得“专政”的科学意义。我们现在解释给你们听，可是首先我们再指示出“革命骚乱”时代的第三个革命方法：民众应用暴力对付民众的强暴者。

我们上述的政权机关是专政的萌芽，因为这个政权不承认任何其他的政权，不承认任何法律，不承认任何习惯，不管这些是从何处来的。无限制的、法律外的、靠在权力之上的政权，这就是专政。可是这个新政权所倚靠的和所要倚靠的暴力并不是少数军人所施行之刺刀的暴力，并不是警察的暴力，并不是金钱的暴力，并不是任何旧时固有制度的暴力，都不是的。武器、金钱、旧制度，这些新政权的新机关都没有。这些机关的暴力——白狼克先生和季济维特先生，你们能够懂得吗？与旧的武器暴力绝无关系，与“加紧的自卫”也绝无关系，要说有关系，除非是民众为防御旧政权警察及其他机关进攻之加紧的自卫。

那么这个暴力究竟倚靠在什么呢？倚靠在民众！这就是新政权与旧政权一切固有机关之根本的区别。旧的是少数人政权机关统治民众、统治工农群众。新的是民众政权、工农政权机关统治少数人，统治少数警察暴徒，统治少数特权贵族和官僚。统治民众的专政和民众革命的专政二者中间之区别便是如此，白狼克先生和季济维特先生，请你们好生记着！旧政权是少数人的专政，只能专门靠警察

诡计，靠压迫排斥群众参加政权、监督政权之方法维持着。旧政权有系统地不信任群众，惧怕光明，靠欺骗过活。新政权是大多数人的专政，只能靠广大群众的信任维持着，必须一切群众最自由、最宽广、最有力参加政权，才能存在。一点都不遮掩，一点都无秘密，没有什么成规，没有什么形式。你是工人吗？你愿意替俄罗斯从少数警察暴徒手中解放出来而奋斗吗？你是我们的同志。现在即刻选出自己的代表吧！你愿意选谁就选谁，我们高兴和热诚欢迎他有同等权利做我们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农民委员会、兵士代表苏维埃及其他机关的会员。这是向一切人公开的政权，在群众面前动作的政权，群众可以接近的政权，直接从群众出来的政权，为群众及其意志的直接机关。新政权便是这样，或者恰切点说新政权的萌芽便是这样，因为旧政权的胜利早斩断这株幼树的萌芽了。

白狼克先生和季济维特先生，你们一定要发问：这里怎么说到“专政”去呢？怎么说到“暴力”去呢？这样广大的群众难道需要暴力反对少数人么？几千万几万万人的专政者难道能够统治几千人、几万人吗？

“这是常见的问题。第一次听见他前所未听过的专政新义的人必定会这样发问。这种人所习见习闻的，仅仅是警察权力，仅仅是警察专政。没有警察而有权力，不是警察而称专政，在他们看去一定以为很奇怪。你们说几千万人便无需要暴力来对付几千人吗？你们错了。你们的错误，在于你们不从其发展方面来观察某种现象。你们忘记了新政权不是从天外飞来的，而是在旧政权旁边，反对旧政权，攻击旧政权而发生，而长大起来。对付手握武器和政权机关之暴徒如果不用武力，就不能从这些暴徒底下将民众解放出来。

白狼克先生和季济维特先生，试举一个小例给你们看，你们便可领会这一为立宪民主党人理性所不了悟的，足令立宪民主党人“脑筋错乱”的真理。请你们回忆起亚弗拉谟夫（Avramov）虐待、伤残司比里东奴夫（Spiridonov）一件公案吧。在司比里东奴夫一边假定有几十个或几百个徒手的人，在亚弗拉谟夫一边只有少数的哥萨克兵。民众怎么办，才得阻止司比里东奴夫在监狱中受非刑呢？民众使用暴力对付亚弗拉谟夫及其随从。民众或致于牺牲几个战士给亚弗拉谟夫枪毙了，但民众的暴力终能解除亚弗拉谟夫及哥萨克兵的武装，甚至可以做到即刻杀死了亚弗拉谟夫方面的几个人而监禁其余的人使之再不能作恶，使之得受民众法庭裁判。

白狼克先生和季济维特先生，你们现在看见了：亚弗拉谟夫统带哥萨克兵伤残司比里东奴夫，这是军事警察对民众的专政；革命的（能够与暴徒斗争，而不仅是只懂得告诫、议论、叹息、评判、啼哭、悲痛的，即非资产阶级庸弱性的而

是革命的) 民众使用暴力对付亚弗拉谟夫及其同伴, 这是革命民众的专政。这是专政, 因为这是民众对付亚弗拉谟夫而用的政权, 这种政权不受任何法律限制。(资产者定会反对用暴力从亚弗拉谟夫将司比里东奴夫解放出来, 因为这是“非法的”! 有一条法律允许我们杀死亚弗拉谟夫吗? 资产阶级一些思想家不是创立了无抵抗的理论吗?) 专政的科学定义只是不受限制的, 不受任何法律、任何绝对规则束缚的, 直接倚靠暴力的政权。“专政”的定义便是如此……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 好生记着!

从上面这个小例, 我们所看出来的专政, 恰恰是民众的, 因为无组织的、“偶然”聚集在一定地点的民众, 自己直接出现, 自己组织裁判所和法庭, 使用权力, 创造新的革命权利。这个终归又恰是革命民众的专政。为什么仅是革命的, 而非全民众的呢? 因为经常地惨苦地在亚弗拉谟夫压迫底下受苦的全民众中间, 有一些人物质上被伤残了的, 被吓怕了的, 精神上也被伤残了的, 譬如抱持无抵抗理论, 或简直不是理论而为成见、习惯、惰性等等。这些漠不关心的人便是资产阶级所谓善于阻止猛烈的争斗、善于回避, 或甚至善于隐藏的人。(譬如说: “不要也卷入漩涡去吧!”) 就因这个缘故, 所以专政之实现非由全民众, 而只由革命的民众, 他们不怕全民众, 指导全民众以共行动的利益, 热烈领率全民众不仅参加国家之管理, 而且参加政权, 参加国家自身的建设。

这样, 可见上面这个小例就包含“革命民众专政”科学定义之一切元素, 并且“军事警察专政”定义之元素也包含在里头。从立宪民主党的大学教授也可领会得到的这个小例, 我们还可推广到另一个更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

革命这一个字从狭义的直接的意义来说, 正是民众生活之某一个时期, 此时民众几世纪积聚下来对于亚弗拉谟夫一类人的仇恨突然爆发起来, 而这种爆发是行动上的, 而非口头上的, 又是几百万民众的行动, 而非个人的行动。民众觉醒过来, 兴奋起来, 为的自己从亚弗拉谟夫一类人手里解放出来。民众从亚弗拉谟夫一类人手里解放出无数的司比里东奴夫, 民众使用暴力对付亚弗拉谟夫一类人, 民众夺取政权, 支配他们。这个发生起来自然没有那样简单、那样“迅速”, 像在我们上面为便于季济维特教授容易明白而引用的小例里头一样, 民众和亚弗拉谟夫一类人的这种斗争(从狭义的、直接的意思上说), 民众从亚弗拉谟夫一类人求解放的这种运动, 需要几个月或几年的“革命骚乱”。民众从亚弗拉谟夫一类人求解放的这种运动便是所谓俄国大革命之真正意义。这种解放运动, 从其历史创造方法一方面看来, 呈现出如我们上面论革命骚乱时所说的那种形式, 明白说来, 即: (一) 民众取得政治自由, 此自由之实现将妨害亚弗拉谟夫一类人; (二) 民

众创造新的革命政权，对付亚弗拉谟夫一类人，对付旧警察制度的暴徒；（三）民众使用暴力对付亚弗拉谟夫这一班走狗，驱逐他们，解除他们武装，使他们不能为害——杜尔诺（Dournovo）、杜巴梭夫、靡诺夫（Minov）等都包括在其内。民众使用这种非法的、不规则的、无秩序的、无系统的斗争方法——如夺取自由，创造新的形式上无人肯承认的和革命的政权，使用暴力对付压迫民众的人——是对的。不错，是很对的。这是民众为自由奋斗之最高表现。这个是俄国内最优良分子的自由希望之实现的时候，这种实现是民众自己的工程，而非单独某个伟人的工程。这是很对的，因为成群的司比里东奴夫（见前例）得从亚弗拉谟夫底下解放出来，因为亚弗拉谟夫被迫得解除武装再不能为害。

这里，我们就达到了立宪民主党人虚伪和危险之中心点。立宪民主党人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因为他们对于政治，对于全民众解放，对于革命，都与上面亚弗拉谟夫摧残司比里东奴夫的例中那位阻止群众、劝告群众、不要破坏法律、不要急迫解放、依法律行动的刽子手手中的受害者的资产者抱同样观点。自然，前例中的资产者简直是精神上残废了的，但应用在整个社会生活里头，资产阶级精神上的残废便是立宪民主党的思想。重复一句话说，这完全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或者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庸俗的法律成见深根固蒂长在他们头脑之中。

为什么白狼克先生以为无须乎证据，便可断定在“骚乱”的时代，所有马克思主义原则都被忘记了呢？因为他将马克思主义附会成了勃林吞诺主义（Bientonism），以为民众夺取自由、创立革命政权、使用暴力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原则”。此种观点充满白狼克的全篇论文，且不止一白狼克，所有立宪民主党人，包括现在恭维立宪民主党人的蒲列哈诺夫、《无题报》伯恩斯坦派的自由急进派作家勃罗谷卜维奇（Prokopovitch）、顾斯谷瓦（Kouskova）等在内，也都持此种观点。

此种观点怎样发生及何以必须发生，我们需得考查一下。

此种观点是直接起于伯恩斯坦主义者，或放宽点说，机会主义者对于西欧社会民主党之观察。此种观察的错误已经从各方面被西方“正统派”有系统地攻击得体无完肤了，现在却大惊小怪输入到俄国来，另换一副面孔，另找一个机会。伯恩斯坦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但须除开马克思主义之直接革命的方面。他们不把议会斗争看成是适用于某个历史时代的斗争方法之一种，而反看成是主要的和差不多专门的斗争形式，而反看成“暴力”“占领”“专政”是无必要的东西。白狼克先生及其他崇拜蒲列哈诺夫的一班自由派输入俄国来的，便是马克思主义之这种庸俗的资产阶级的附会。他们太习惯于此种附会了，以致于不用拿出证据，便断定人家在革命骚乱时代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观念。

这种观点何以必须发生呢？因为这种观点很深合于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和利益。资产阶级社会的“纯清”思想家容纳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斗争方法，只除开了革命民众在“骚乱”时代所用的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所同意帮助使用的那些方法。资产阶级需要无产阶级参加反对专制的斗争，但在这种参加中，第一等的作用必须不会落在工农阶级，旧的专制农奴警察的政权机关必须保留着。资产阶级要保存这些机关，要自己直接监督这些机关，资产阶级需要这些机关来压迫无产阶级，这些机关如果完全消灭了，无产阶级斗争便容易得着胜利。所以资产阶级利益，就其阶级性看，需要帝制、需要议会而不需要革命民众专政实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说：“你们打专制去，但不要损坏了旧政权机关，我需要这些机关。用‘议会斗争’方法去打专制吧！换言之，你们不要走出我与专制所议定的范围之外。靠组织去斗争吧！可是这里并非指总同盟罢工委员会、工人苏维埃、兵士苏维埃等的组织，而是我与专制定出法律所允许的、所限制的、所保障其必不妨害资本的那种组织。”

从此，我们明白资产阶级为什么要用轻蔑、藐视、险恶、仇愤对待“骚乱”时代，又为什么要用热情、高兴及其对反动之无限的爱慕来对待杜巴梭夫底下的宪法时代。这仍旧是立宪民主党人经常不变的本性：既想倚靠民众又怕民众的革命独立性。

我们也明白资产阶级为什么惧怕“骚乱”复来，如惧怕火灾一样，为什么不知道且遮掩新的革命危机之元素，为什么在民众中坚持和传播宪法迷梦。

我们现在完全解释了白狼克先生及其同伴为什么宣言在“骚乱”时代中大家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原则和观念。白狼克先生和所有资产者一样承认马克思主义而除开其革命方面，承认社会民主党斗争方法而除开其最革命的方法。

白狼克先生对于“骚乱”时代之关系，很足以表示资产阶级不能懂得无产阶级运动，资产阶级在紧张的决死的斗争前之恐怖，资产阶级对于破坏旧制度，对于革命方法解决社会历史问题之一切表现之仇愤。白狼克先生自己背叛了自己，自己突然表现其资产阶级的偏狭。他听见说而且在书报上读过，社会民主党人在“骚乱”时代做了一些“错误”，他于是赶快做个结论，并且以自负的态度，不用证据即宣布所有马克思主义“原则”（他自己也就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原则！）都被忘记了。关于这些“错误”，我们应当提起来说：工人阶级发展，社会民主党发展，在这样一个时代能免这一种或那一种的错误吗？能免表现左倾或右倾吗？德国社会民主党斗争的议会时代历史——即全世界所有偏狭的资产者都以为是个界限不容超越的这一个时代的历史——不是充满了这种错误吗？如果白狼

克先生对于社会主义问题不完全是个门外汉，那么，他就很容易忆起慕尔堡（Muhlberg）、杜林（Duhring）及关于蒸汽津贴、关于“青年”、关于伯恩斯坦等等许多问题。可是白狼克先生并不注重在研究社会民主党实际发展步骤上头，他所需要的，只是减少无产阶级斗争范围，使他的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作用能够扩大。

在事实上如果我们应用社会民主党倾向的观点，从普通的“常态的”进程来看，我们便可看见“革命骚乱”时代在这关系上，表现社会民主党比之前更加团结，思想上更加一致。这个“骚乱”时代的策略不仅不分离，而且更结合了社会民主党的二派。对于武装暴动观点上之统一，使以前种种冲突消灭。二派社会民主党人共同在工人代表苏维埃内，在这雏形的革命政权之特有机关内工作，他们引导兵士、农民到这苏维埃来，他们联合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共同刊行革命的宣言。革命以前各时代的争论，现在都被实际问题的一致所代替了。革命潮流之膨胀消灭了内部龃龉，迫得各人承认斗争的策略，丢开议会问题，列入暴动于议事日程，于直接最近工作之中使社会民主党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接近。在《北声报》中，孟雪维克党人和波尔札维克党人共同号召罢工和暴动，号召工人于政权未到手之前不要停止斗争。革命的潮流自己发出实际口号。所争论的只在评判事变之琐碎节目上：譬如《发端报》以为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自治的机关，《新生活报》则以为是联合无产阶级和革命德谟克拉西之革命政权的雏形机关，《发端报》趋向于无产阶级专政，而《新生活报》则站在工农德谟克拉西专政之观点上面。社会民主党内部这一种或类此的龃龉，难道任何西欧社会党在其发展之任何时代可以免除了吗？

不可以的。白狼克先生附会事变，他无耻地假造昨日的历史——这个行动是可以解释的，即在我们面前有一种人带着资产阶级夜郎自大的丑态，以为革命骚乱时代是疯狂（“忘记了一切原则”“思想和简单理性差不多消灭”），而压迫革命和资产阶级“进步”（在杜巴梭夫保护之下的进步）时代才是有理性、有意识、有计划行动的时代。这样比较时代（“骚乱”时代和立宪民主党人两种时代）之评判充满了白狼克先生的全篇论文。当人类历史以火车头的速度前进时，则以为是“骚乱”“急流”“消灭一切原则和思想”；当历史以肥牛的速度进行时，则以为是最有理性的、最有计划的。当群众以其真实的原始状态，单纯、果决、开始创造历史直接和迅速实现“原则和理论”时候，资产者即发抖高叫“理性消灭了”！（资产阶级的英雄呵！这不正是历史上此时表现群众理性代替个人理性吗？这不正是群众理性此时变成活的、实际的而非研究室内的势力吗？）当群众直接行动被枪毙、正法、鞭笞、失业、饥饿镇压下去的时候，当杜巴梭夫金钱津贴的教

授式科学界臭虫钻出来开始假借民众名义为民众说话，同时又卖民众给少数特权者的时候，资产阶级的骑士反倒以为宁静、和平、进步的时代来到了，反倒以为“意识和理性复回”了。资产者永远到处自以为是：我们试拿《北极星报》或《我们生活报》来看，我们试读司徒维或白狼克的论文，我们到处看见同样的东西，到处都是对于革命和改良时代之这种偏狭的、教授式博学的、官僚的评判。第一时代是疯狂的、意识理性消灭的时代；第二时代是“觉悟的、有系统的”行动时代。

请你们不要误会了我的意思；不要以为我说白狼克先生一班人选取了这一个或那一个时代。问题不在乎选取，历史时代的变换不关于我们主观上的选取。问题在乎于解剖这一个或那一个时代的特性之中（完全不关于我们的选取或我们的同情），白狼克先生一班人无条件地附会了事实。问题在于革命时代的特性是历史创造上最广大的、最丰富的、最有觉悟的、最有计划的、最勇敢的、最明显的，而非资产阶级立宪民主改良主义进步的时代所能梦想得到。可是白狼克先生一班人叙述事实恰与此相反。他们以为历史创造财富是穷困的；他们以为被压迫民众之消沉是官僚资产者行动中“有系统的”胜利。当民众简单、直接、迅速破坏了压迫民众的机关，夺得了政权，索回了一切侵略者从民众取去的财产的时候，民众此种直接政治行动时代到来，代替了书记官或自由派以一办尼一行字的代价写成的法律时候。总而言之，即当几百万被压迫者恢复其意识和理性，不仅觉悟须研究，而且觉悟从事于事实、于活的人类事实、于历史创造功业的时候，白狼克先生一班人倒反大声疾呼意识和理性之消灭！

以上所述便是俄国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关于专政问题之争辩。

德国的第特曼（Dittmann）、考茨基（Kautsky）、克里斯宾（Crispien）、希尔费丁（Hilferding）等先生们，法国的朗格（Longuet）一派先生们，意国的杜拉底（Turati）及其朋友，英国的麦克唐纳尔和司奴丁（Snowden）等，现在非难专政之论调，实质上完全和白狼克先生及立宪民主党人一九〇五年在俄国的论调一样。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专政，不会预备、了解、实现专政。

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位置

——译自《共产国际》第一期

列宁 著 郑超麟 译

协约国的帝国主义者封锁俄罗斯，看苏维埃俄罗斯像瘟疫发源地一样，企图使之与资本主义世界隔绝。那班矜夸自己的组织是“民治主义”的人，却盲昧于其对苏维埃俄罗斯的仇恨而致于不自觉自己是很可笑的。只要仔细想一想：那些最开化的、最文明的、最“德谟克拉西”的国家，全副武装了又在军事上旁若无人地统治全世界，现在反被从那个破产的、饥饿的、落后的，甚至他们以为半野蛮的国家传染来的思想上之瘟疫所吓住了！这一个矛盾点就够撑开各国劳动群众的眼睛，就够帮助我们揭破帝国主义者克列蒙梭、路易乔治、威尔逊及其政府的假面具。

然而惹起资本家中间的齟齬因而无形中帮助我们的，不仅是他们对苏维埃的盲目的仇恨，而兼是他们中间可鄙的冲突。他们中间曾经缔结一个真正的秘密条约，首先防备关于苏维埃正确的消息之传播，特别是这个共和国的正式文件。可是，法兰西资产阶级的机关报——《时报》，却发表了第三共产国际已于三月成立于莫斯科的消息。

我们很恭敬地感谢法兰西资产阶级最重要的机关报、法兰西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喉舌。我们预备好了送给《时报》以我们的严肃的敬礼，答谢它给我们的这样有成效、这样巧妙的帮助。

由《时报》根据我们的无线电报而发表的这段消息的口吻看来，这个“银库”的机关报的动机显然表现在我们面前。它要给威尔逊一个刺激，告诉他说：“请认清你要与之开谈判的这一班人！”承受“银库”意旨作文的一班人想不到他们借波尔札维克来恐吓威尔逊的手段，在劳动群众看来，反成了替波尔札维克登广告。我们很恭敬地再加一次感谢法兰西诸百万富翁的机关报。

第三国际成立了，当时的情况使协约国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走狗如德国希德曼、奥国勒纳的禁令和鄙吝、虚伪的狡诈，都不能阻止关于第三国际和关于同情第三国际的消息在全世界工人阶级中传播。这个情况是到处不仅逐日进步而且逐时进步的无产

阶级革命所造成的。这个情况是劳动群众的苏维埃运动所造成的，这个运动已达到变成真正国际的一种势力。

第一国际（一八六四——一八七二）建设了劳动者的世界组织之基础，为他们的革命进攻反对资本之预备。

第二国际（一八八九——一九一四）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国际组织，这种运动逐渐扩大，但却不得不暂时地降低了革命水平线，提高了机会主义，机会主义终归陷第二国际于不名誉的破产。

第三国际实际上是一九一八年成立的，那时，特别是大战中，长期反对机会主义、反对社会爱国主义的斗争之过程达到了许多国家中都有了共产党的组织。形式上，第三国际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莫斯科开第一次大会时才成立的。第三国际的特性及其使命，在于输入马克思主义原则于生活之中，在于实现几世纪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思想。第三国际这一种特性明显地表现出来，即在于新的第三个的“劳动者国际协会”开始自今以后在某种限度内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相混为一。

第一国际建设了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的国际斗争之基础。

第二国际成了广大的、群众的运动在许多国家扩张地盘之预备时代。

第三国际收获了第二国际劳动的果实，删除了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分子，开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指导世界上最革命的运动、指导无产阶级推翻资本统治的运动之政党的国际联合，现在找到了一个空前的巩固基础：许多苏维埃共和国，这许多共和国在国际上代表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对资本主义胜利的生命。

第三共产国际的全世界历史意义，在乎这个国际开始实现马克思最伟大的口号，结算几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口号，确定无产阶级专政意义的口号。

这个天才的先见，这个天才的理论变成实际。

这几个拉丁字现在都译成了当代欧洲的一切民众语言，甚至世界的一切语言。

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开始。

人类消灭奴隶制度的最后形式：资本主义的或雇佣的奴隶制度。

从奴隶制度解放出来，人类才破天荒第一次得了真正的自由。

第一个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组织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为什么是欧洲之一个最落后的国家呢？我们不至于错误，如果我们说俄国跳过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到民治主义最高形式，到苏维埃或无产阶级德谟克拉西这一个“突变”与俄国的落后地位成了一种矛盾，然而这矛盾恰好正是西欧所以特别难于了解苏维埃意义的原因之一（除了机会主义习惯和卑鄙成见对于社会主义大多数首领之束缚以外）。

全世界工人群众从本能上就认识了苏维埃的意义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可是受机会主义传染的“首领”仍旧继续向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祷告，称它为一般的“德谟克拉西”。

无产阶级专政实现，首先表现俄国落后地位和它跳过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这一个“突变”中间之“矛盾”，这是奇怪的么？如果德谟克拉西新的形式之实现不给我们以一些矛盾，那才是奇怪哩！

无论哪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哪一个学过近代普通科学的人，我们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从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能够按照同等的步骤或和谐的比例么？答复这个问题将无疑地是否定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从没有同等的步骤，从没有和谐的比例，而且也不能够有。每个国家发展特别偏向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或特别显著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某一种特性或某几种特性。发展的过程不是划一的。

当法国唤醒欧洲全大陆到历史新生活去以完成它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之时，英国却领导反革命联盟，实际上那时英国资本主义比较法国还要发展些。在这个时代英国的工人运动中，我们倒可看见未来马克思主义之许多元素。

当英国给世界以广大的、政治完成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第一次真正群众运动——Chartisme——之时，欧洲大陆多数情况正经过柔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法国则发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间的第一次国内大战争。资产阶级分别地和不同地战胜了各国的无产阶级。

英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之模型（根据恩格斯的意见）：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化的贵族旁边，创造了一个最资产阶级化的上层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观点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反表现出落后几十年。法国无产阶级力量似乎用尽了在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反对资产阶级之有世界历史上意义的两次战斗之中。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第一国际中工人运动的牛耳不得不归于德国，而其时德国经济上较落后于英、法二国。到了德国经济赶上英、法二国时候，换言之即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候，足为全世界模范的德国马克思主义工党领导者之中倒产生了一些公认的流氓，最卑鄙的、卖身给资本家的强盗——从希德曼（Scheiderann）到诺斯克（Noske），从大卫（David）到列更（Legoién）——杀工人的刽子手替帝制和资产阶级反革命服务。

全世界历史是定归要走向无产阶级专政去的。但所走的绝不是平坦的、单纯的、一直的道路。

当加尔考茨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之时，当他还未曾为联合希德曼的统一奋斗，为赞助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反对苏维埃或无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奋斗而变成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之先，他在二十世纪初年曾经做了一篇论文，《斯拉夫人与革命》。在这篇论文里，

他提出一些历史的条件，指明国际革命运动的牛耳有归于斯拉夫人之可能。

这样，可见国际革命运动的牛耳一时——自然是很短的——可以归于俄国人，亦犹十九世纪中之先归于英国人，继归于法国人，后归于德国人一样。

我已经不止一次这样说：同先进国比较起来，俄国人很容易开始无产阶级大革命，但很困难继续和引导至最后的胜利，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完全组织。

我们很容易开始，第一，因为俄皇专制在二十世纪的欧洲是异常古老的，因此就激起群众异常的革命努力。第二，因为俄国的落后地位特别能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联合起来。我们就根据这一点在一九一七年开始了，我们如果不这样开始，那么我们当时就不那样容易取得胜利。在一八五八年，马克思即指明普鲁士无产阶级革命有与农民战争同时并进之可能。波尔札维克党人自从一九〇五年开始，即坚持革命德谟克拉西的工农专政观念。第三，因为一九〇五年革命在工农群众中大做了一番政治教育，使群众先锋认识了社会主义在西方的最后口号，使群众认识了革命行动。没有一九〇五年这样的“普遍练习”，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资产阶级革命、十月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是不可能的。第四，因为俄国的地理条件比较其他国家更便于自卫，抵抗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进攻。第五，因为无产阶级对农民的特殊关系，允许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革命，促成都市无产者影响及于农村半无产者、最穷苦的劳动者。第六，因为多年罢工斗争的教训与西欧群众工人运动的经验，使深刻紧张的革命状况中容易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新形式——苏维埃。

以上所举数点自然是不完全的，但现时只好限于此。

苏维埃或无产阶级德谟克拉西产生在俄国。如果拿它比较巴黎公社，就看出它跨过世界历史上的第二步了。工农苏维埃共和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巩固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新的国家模型是死不了的，它现在已经不是孤独的了。

为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为完成这个工作，现还需要许多努力。比较开化的国家，无产阶级有较大的力量和影响，只要走上无产阶级专政道路，这个国家的苏维埃共和国自会赶上俄国。

在破产中的第二国际现在已经死了，临终之前就已解体了。这个国际实际上是国际资产阶级的工具，这是真正的黄色国际。理论上最大的首领如考茨基恭维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称之为“一般的德谟克拉西”，或更卑鄙地、更愚蠢地称之为“纯粹的德谟克拉西”。

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同第二国际一样都过时了，它尽过历史的使命，有用的工作，当时正是工人群众需要在这个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范围内预备的时代。

最德谟克拉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来只是资本压迫劳动者的机器、资本政权的工具、资产阶级的专政。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共和国宣言允许政权属于多数，但土地

和生产机关私有权存在一日，这种允许终无实现之可能。

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共和国中的“自由”，实际上只是富人的自由。无产者和农村劳动者可以而且应该利用这个自由预备自己的势力去推翻资本，去从事反对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之胜利的斗争，但事实上，普通说来，劳动群众在资本主义底下是不能够享受德谟克拉西的。

破天荒第一回苏维埃或无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创造了为群众、为劳动者、为工人、为小农民的德谟克拉西。

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属于民众多数的政权、实际属于多数的政权，像苏维埃政权那样。

它取消了剥削者及其走狗的“自由”，它取消了他们的剥削的“自由”、损人利己的“自由”，恢复资本统治斗争的“自由”，与外国资产阶级同盟来反对本国工农的“自由”。

任考茨基去拥护这种“自由”吧！拥护这个，就必须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社会主义的叛徒。

第二国际理论上的首领，像考茨基和希尔费丁一班人的破产之最明显的表现，在于他们完全不能明了苏维埃或无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及其与巴黎公社的关系及其历史上的位置及其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必要。

在德国“独立”（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机关报——《自由》第七十四期上，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一日登载了一篇宣言告德国革命的无产阶级。

这篇宣言署名者为该党干部，该党在“国民大会内”、在德国“立法议院”内的党团。

这篇宣言攻讦希德曼排斥苏维埃的倾向，并提议——大家不要笑——折衷苏维埃和“立法议院”，给苏维埃以某种国家的权利、宪法中的某种地位。

调停，联合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何等简单，何等妙想天开的见解！

所可惜的，就是这种见解，当克伦斯基时代在俄国已经经过孟雪维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联合派——这些自称社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试验过了！

读过马克思著作，谁还不明白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个紧张的顷刻中、每个激烈的阶级冲突里，只能有唯一的资产阶级专政或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层道理，谁就完全不懂马克思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学说。

我们如果还要考究二月十一日这一篇最异样的和最滑稽的宣言中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错误，那我们必须更深刻地分析考茨基、希尔费丁一班人企图和平联合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之独创的、俚鄙的见解。可是这必须另做一篇论文才行。

社会主义国际的地位和责任

——译自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社会民主党人》

列宁 著 陈乔年 译

现在的危机中，最可痛心的一件事，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主义、爱国主义对于欧洲社会主义大多数官僚代表之胜利。各国资产阶级报纸一会嘲笑他们，一会又带宽仁态度称赞他们，这并不是徒然的。还想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人，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说明社会主义危机的原因和分析国际的使命。

有一班人惧怕认识这个真理：第二国际的危机——正确点说，第二国际的破产，就是机会主义的破产。

譬如人们归罪于法国社会党人之一致，归罪于社会主义里的旧派别关于战争问题完全变节。但这种归罪是不的确的。

拥护阶级协作，抛弃社会革命思想和革命斗争方法，迎合资产阶级国家主义，忘记民族或祖国之历史上的暂时性，迷信资产阶级的“合法”，因惧怕“广大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离开自己而放弃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这些无疑地就是机会主义的根本观念。第二国际大多数首领现在的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就是从这个基础长大起来。他们中间的机会主义真面目老早就由不同的观察者，从不同方面看出来。战争不过特别迅速地、深刻地发现了这个面目的实体罢了。这样非常利害的危机，引起旧派别的种种变节，这是一点没有可奇怪的。在全体目标上看来，这些变节只关系于个人的行动，社会主义内部的倾向仍和旧时一样。

在法国的社会党人中，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瓦样（Vaillant）、格德（Guesde）、蒲列哈诺夫（Plekhanov）、黑尔畏（Herv'e）施行爱国主义的政策，可是他们也承认接到许多法国社会党人抗议的信件。在这些信件中说，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在这战争中，法国资产阶级的罪恶，并不比其他资产阶级的罪恶轻些。我们不要忘记这些呼声，不单是被胜利的机会主义所堵住，并且还被军事检查所打消了。在英国，信德门团（Hyndman）——英国社会民主党（British Socialist Party）——完全走入爱国主义的途

径，大部分半自由派的工联首领，也有同样的状况。机会主义的劳动独立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党员麦克唐纳尔（Mic Donald）、哈尔狄（Hardie）居然拒绝爱国主义，这实在是例外。可是一部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很久就是信德门的反对派，现在都退出了英国社会党。在德国，情形也很清楚的：机会主义者战胜了，他们很得意，他们很安适。考茨基领头的“中央”派也卷入了机会主义，他用特别虚伪的、卑鄙龌龊的狡辩来拥护机会主义。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中，可以听见梅林克、巴业可克、加尔李卜克内西诸人的抗议和德国以及德国的瑞士地方无名的抗议之声。在意大利，派别也分得很明白：极端机会主义者毕梭拉地那班人都赞助“祖国”，赞助格德、瓦样、蒲列哈诺夫、黑尔畏。革命的社会党人（社会党）在《前进报》（*I' Avanti*）领导之下，攻击爱国主义，揭穿资产阶级号召战争的黑幕；他们得了大多数进步工人群众的同情。俄国的极端机会主义者——取消派（Liquidateurs）——已经在出版物中和集会中，高声为机会主义鼓吹。马思乐夫（P. Maslov）和思米尔诺夫（E. Smirucv）以保护祖国名义来保护俄皇专制（你们看，德国恐吓我们，以商业条约的“武器”来压迫“我们”，可是俄皇专制自然不以鞭笞和断头台来压迫俄国十分之九人民的民族、政治、经济的生活！）主张社会党人加入反动资产阶级内阁，今天通过战争经费，明天又通过增加军备经费！蒲列哈诺夫以亲法的感情来遮盖他的爱国主义，他和阿列克新斯基（Alexinsky）都坠入国家主义中了。马尔托夫（Martov），假使照巴黎《哥乐思报》（*Goloss*）判断起来，他的态度倒很正当。他排斥德、法的爱国主义，煽动反对《窝尔瓦华页茨报》（*Vorwaerts*），反对信德门和马思乐夫，但他不敢公然对国际机会主义及其最得力的拥护者——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派”决断地宣战。当志愿兵就如实现社会主义，这样的见地〔见巴黎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志愿兵的宣言，又见波兰社会民主党莱得尔（Leder）以及其他的宣言〕只有蒲列哈诺夫一人赞成。我党巴黎支部的大多数对于这种主张已攻击了。读者在本期报上的社论，可以看见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态度。说到我党意见形成的历史，为免除一切的误会，我们应该举出下列的事实：我党一部分党员，克服一切的困难恢复战争所割断的联络机关，首先草成提案，在新历九月六日至八日将这些提案寄与同志传观。后来，又经过瑞士社会民主党间接将这个提案寄与吕加诺（Lugano）瑞、意临时大会的两个党员（九月二十七日）。只在十月中旬，关系才得恢复，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观点才得确定。本期报的社论就是最后完成的提案。

欧洲和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大概情形就是这样，国际破产是很明显的。在德、法两国社会党报纸上的笔战很能证明这个。不仅社会民主党左派（梅林克等）承认这个，就是瑞士稳健派的报纸也是承认的。考茨基的企图是要遮盖这个破产——卑鄙的诡计。

这个破产正是机会主义的破产，变成资产阶级的囚犯。

资产阶级态度是很明显的。机会主义者盲目地摭拾资产阶级的牙慧，这也是很明显的。我们除了社论中所说的之外，还应当对于《新世纪报》（*Neus Zeit*）的发刊辞说几句话。这篇发刊辞拿国际主义恰巧当作这一国的工人以保护祖国的名义，反对别一国的工人的互相残杀！

我们回答那些机会主义者：不懂得这个战争的具体历史性质，祖国问题是不能提出的。这个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资本主义最发达时期，资本主义结局时期的战争。《共产党宣言》上说：工人阶级首先应该在“民族界限以内组织起来”，同时又指示我们祖国和民族可以承认的界限和条件，这界限是资产阶级制度的必要形式，所以是资产阶级祖国。机会主义者改变这个真理，把适用于资本主义初生时期的真理，搬到资本主义终结时期。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的责任，不是推翻封建制度，而是推翻资本主义，马克思说得很明显、很确定：“工人没有祖国。”机会主义者为什么怕认识这个真理，这个社会主义的真理，并且不敢常常公开地考察这个真理？这是可以明了的。社会主义的运动不是在祖国旧界限中所能得胜。这个运动创造人类共同生活的新的、高的形式，在那时的民族界限消灭条件之下、国际统一之中，各民族劳动群众进步的意志和正当的要求才得到最初的满足。

近代资产阶级企图以保护祖国虚伪的号召来分裂工人，觉悟的工人抵制这个，就要不断地努力，前仆后继起来团结各民族的工人在反抗各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中。

资产阶级以“民族战争”旧思想遮掩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来欺骗群众。无产阶级就要高呼改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来揭穿这个骗术。这个口号已经很正确地在斯徒特加尔（Stuttgart）和巴尔（Bale）的决议案标明出来。这些决议案不是预防一般的战争，而是对付现在这个战争的，在那上面不是说“保护祖国”，而是说“促成资本主义的崩坏”，利用战争所引起的恐慌效法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就是由民族战争变为国内战争。

像这样的一个改变，自然不是容易的事，自然不能由某党的“愿望”可以做到的。可是这个改变正是资本主义客观条件，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结局时期的条件所必然造成的，所以在这个改变中，也只有在这个改变中，社会党人应该进行自己的工作。不通过战争经费，不宽容“本”国（和联盟国家）的爱国主义，首先攻击“本”国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恐慌到来，资产阶级自己取消它自己所创造的合法制度时候，切勿是限于合法的斗争形式。这就是我们的行动大纲，引导国内战争，并且在这个当中将引起这一时或别一时的全欧暴动。

战争不是偶然的事，也不是像基督教徒所想像的是一桩罪恶（和平、人道主义、

爱国等宣传者并不恶毒过于机会主义者)，战争是资本主义不可免的一个阶段，也是资本主义生活自然的形式，如和平一样。现在的战争是民族的战争，但是不应从这真理推论出爱国主义，而要在战争时候，对于战争，随着战争永远继续自己表现阶级的对抗和人民的痛苦。对于军役之拒绝，反对战争的总同盟罢工等都是纯粹的愚蠢，没有武器反对武装资产阶级斗争的迷梦，不用可怕的国内战争或许多战争来消灭资本主义的妄想。在战争中，宣传阶级争斗是社会党人的职务。改变民族战争成为国内战争的倾向，是社会党人在各国资产阶级武装冲突时期中唯一的工作。打倒“为和平不惜牺牲一切”的那些宗教式的感情和愚蠢的惊叹！举起国内战争底旗帜！帝国主义拿着欧洲的文化孤注一掷：在这战争之后，如果不有一些得胜的革命，那就快发生第二次大战了。“最后战争”的梦想是没有意义的，危险、梦想是小资产阶级唯心的见解（《哥乐思报》表现得最明显）。无产阶级的国内战争旗帜，现在或将来，在这次战争时期中或在这次战争以后，在这次战争中或在下次战争中，不单要成为成千成万觉悟工人的目标，并且还要成为现在被爱国主义所蒙蔽的成千成万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目标。那时，战争的恐吓不单使他们惊慌和痛苦，并且使他们明白、受教训、清醒、组织、奋起，预备在“本国”中和在“外国”中，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

第二国际死了，被社会主义战败了。打倒机会主义！祝不单是扫除那反叛者，并驱逐机会主义的第三国际万岁！

第二国际已尽了它的责任，利用和预备无产阶级群众底组织，在一个很长久的“和平”时期中，这个时期就是最发达的、最进步的、最惨酷的资本主义奴隶的时期（十九世纪最后之三分之一和二十世纪初）。第三国际责任在于组织无产阶级势力向资本主义政府作革命地进攻，向各国资产阶级宣布国内战争、夺取政权、护得社会主义胜利！

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

瞿秋白

俄国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前，俄国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工党之中，早已分成多数派及少数派，这是大家所知道的。然而除这两派以外，杜洛茨基一直自成一派，介乎多数派与少数派之间，直到革命时杜洛茨基方加入多数派——共产党。列宁之多数派是唯一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派，一切哲学上、经济上、政治上的理论，策略上的原则，党内组织的原理以及实际工作的方法，都是自成系统一线到底的。向来多数派与少数派之间的争执，以至于与杜洛茨基派的争执，都不仅是某个政策或某一口号的不同；推其结果，都是由于根本原则上的差异。各派最初分化时，表面看来，所争的大致是“小小的”问题，而后来逐渐演化起来，才试得出多数派确是无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最正确的指导者，少数派渐渐地退化到机会主义，以致于反革命，而成为资产阶级左派在劳动平民中的政治奸细。杜洛茨基派与列宁派的争执，也很可以含着这种趋势。现在杜洛茨基已经负责辞去军事委员，这是革命后他第一次最大地趋于机会主义的倾向之结果。然而俄国共产党的组织力，必定可以防止杜洛茨基的恶倾向，而重新统一自己的政策。所以现在这一争执已经没有实际的政治上的危险。然而我们还是很应当来研究一下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根本理论上的异点。

俄国帝制未颠覆以前，多数派认为党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关于这一理论，多数派和少数派并无不同之点。然而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在当时的俄国，从政治局势上推测起来，可以有种种不同的形势——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运用自己的策略，造成利于急转直下以进于社会革命的形势。这是某一派别是否有主观的革命意志的关键，其实，亦就是这一派别是否明了客观的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而能忠实于最革命的社会阶级与否的关键。因此，关于当时这一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问题，多数派的理论便和少数派不能相同了，这是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分水岭。多数派以为当前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农民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多数派的政策，便是在这一革命之中无产阶级与农

民携手，取得政权（列宁之《无产阶级及农民之革命民主主义的独裁制说》）。多数派策略的根据，实出于列宁对于俄国农地问题的学理的研究，列宁所著《俄国第一次革命中之社会民主党的农地问题政纲》，便是这一研究的成绩之总汇。列宁对于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途，曾经逆料它的大致的趋势，以为革命的结果。俄国经济里的资本主义发展，可以有一种急遽的“美国式”资本主义化，就是说，农业方面，封建式的地主消灭，而发现农业资本家，像美国的所谓“Ferner”。

少数派呢，对于这种科学的研究结果，极端忽视，只知道照抄法国大革命的老文章，不顾及将来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中之农民。农民的革命运动，亦是一种资产阶级革命，它们却绝不顾及，而只是主张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当然属于俄国当时“已有的”城市资产阶级。少数主义的根便在于看不见农民对于农地问题的乌托邦思想里却有进化的元素在内，可以成为革命中之一动力；它们只守着当时第二国际的死理论，只见着农民思想里的反动方面。

少数主义与多数主义的分歧，实由于对于俄国的社会阶级关系，各有不同的见解，因此双方的策略不同，政治运动里的“联盟方法”也就不同。少数派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与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以反对帝制派（地主阶级）。多数派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与农民阶级的政党联盟。事实上的结果，从一九〇五年以来：一方面是“少数派——自由派——地主阶级”的联盟；别方面是“无产阶级——农民”的左派联盟（当时在帝国议会的时代便是所谓劳动派）。

对于农民的关系，是多数派与一切种种少数派（杜洛茨基派亦在其内）之分水岭。杜洛茨基当时的见解，叫做什么“革命无间说”（Permanent revolution）——便是主张无间断的、永久的革命。革命无间派（杜洛茨基及柏尔胡斯）在一九〇五年的时候，曾经主张“跳出”当时环境，一直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警句是：“皇帝不要，政府是工人的。”

杜洛茨基的理论大纲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关系（注意——他没有把农民阶级算在内）日益激烈，其势在工人阶级一方面，必然要成立工人政府，实行种种社会主义的政策。他的意思，以为工人反抗帝制，同时就不得不与资产阶级冲突。帝制如果颠覆，这一冲突便变成争取政权的斗争。那时工人阶级如果得胜，其势决不能不实行社会主义，实行纯粹的无产阶级独裁制，否则无从镇压资产阶级，亦就无从防止帝制的复活，成就利于大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如此，反对帝制的革命一开始，便要急转直下，无间断地直至社会革命方止。然而他忘了俄国农民阶级的重要，俄国无产阶级在当时的革命中，正值农民要求瓜分地主田产，确立“自由的”“平等的”私有田地制度等之农民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很急的环境里，当然要联合它，先行完结

那扫除封建制度的事业。所以列宁主张：那时——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里，胜利的趋势只有这两阶级的联盟，组成两阶级共同的革命民主主义政制，对于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同样可以并且应当厉行独裁政策，镇压它们的反革命阴谋。这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性的，因为小农经济的要求，仍是保存私产，经济生活中之改革，仍是限于扫除封建式的地主制度，而并不是根本推翻资产阶级式的私有制度。然而对于帝制派、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则工农两阶级联合组织政府以镇压之。所以说是“无产阶级及农民之革命民主主义的独裁制。”杜洛茨基对于这一说不肯赞同，认为不能实行。他说：“无产阶级一执政权，依其阶级地位的逻辑，便必然要以国<立>制度来经营国民经济。”（杜洛茨基《我们的革命》集，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的文稿，第二四八页）他又以为“即使执行极低限度的工人要求——并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譬如八小时工作制、供给失业者的生活等等政策，资本家也要反对，他们同盟罢雇、停闭工厂……以对付革命政府，其时工人阶级‘只能没收工厂，至少在最大的企业里，实行国营或市营的生产事业。’（同上，第二五六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中间的斗争，其必然的结果，便是这样不间断地继续发展革命——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急转直下而成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那时的‘农民呢，自然只能和工人的民主政制相结合，而不会倾向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同上，第二五三页）可是，亦许农民会在这一革命里挤轧无产阶级，而取而代之罢？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农民阶级绝对不会有独立的政治作用。”（同上，第二五九页）

照杜洛茨基的理论看起来——“农民阶级之与无产阶级相结合”，是俄国无产阶级胜利时自然会实现的一种现象，而不是这种胜利的必要条件。并且，杜洛茨基还否认农民阶级的独立的政治作用。杜洛茨基派的革命无间说的“精义”，便在于此。

多数派的政见，便不相同。列宁在一九一二年的时候，还说，客观上俄国农民阶级里发生出来的农村资产阶级，使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染着农村的色彩”——这是非常之可能的事。俄国当时实在有两个资产阶级：一个是“极少数已经成熟或过分成熟的资本家”，一个是“大多数绝未成熟，却努力趋向于成熟的小私有财产者及一部分中等私有财产者，其中一大半是农民。”列宁当时的这种分析，便使多数派和杜洛茨基有不相同的结论：“俄国政治解放运动的历史，实在就是这两种资产阶级倾向相斗的历史……相斗的结果，俄国固然同样是变成资产阶级的国家，然而两者之中，必定有一方面得胜；那时的俄国或是完全成为大资本家的色彩，或是完全成为小资产阶级的色彩，至少两者之中，也必定有一方面占优势。对于雇佣的工人，这一斗争是很有关系的；假使无产阶级是觉悟的，他必定努力加入这一斗争，力求农民倾向自己，而倾向大资本家。”（列宁《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帝制制度下，贵族地主大商人，也能偷

着几分自由，变成资本家，变成实业家。这种已经发财的大资产阶级，它对帝制是不满意，它也反对帝制，然而它的要求，只要政府容许它参政，只要社会上有相当的自由，有宪法，有“人权”，它的工业能够顺利地发展就够了。这一阶级的政治思想，当然只能到所谓自由主义（Liberalism）。它不但非必要一定要推翻帝制，而且已经站在上等阶级的地位，还可以利用已有的经济势力，压迫政府，使政府对它让步，使帝制政府轻轻地不知不觉地变成它的工具——君主立宪制度。它很不用革命，那农民阶级以及一般的小资产阶级却恰相反背，它们必须得到更宽泛的自由，尤其必须完全消灭封建式的田地制度——没收地主田产；那就非革命，非实现共和的民主主义不可。然而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是很显然的，无组织，不觉悟，或是倾向于盲动的激烈行动，而绝无可言的政纲，或是陷于封建旧习，而甘心屈服。自由主义派的政策往往也可以欺蒙得过农民，或恐吓得住农民。所以当时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便有指导、吸引农民阶级到自己的政治旗帜之下的天职。况且，农民阶级的经济要求，虽然同样是资产阶级性的，可是始终与大资本家的不同，当然更与无产阶级的不同；所以农民的政治作用，并不能说绝对不独立。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事实上固然没有完全实现上述的形势，农民资产阶级式的俄国并未实现，地主资产阶级式的俄国却直接变成了社会主义的。然而那种趋势，在当时不能不特别注意，在现时也还应当用心。俄国社会革命之后，大地主是没有了，资本家是没有了——还剩两种阶级：一是工人阶级，一是农民阶级；经济上的发展仍旧可以有两种形式——工人阶级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农民阶级却倾向于小私有经济的扩大（长成资本主义）。所以即使现时的俄国，也还有变成“美国式”的农业资本主义的可能——便是从农民私有经济里发展出来。乡村中富农的经济势力，很可以危及无产阶级独裁制。

因此，杜洛茨基说“农民绝对没有独立的政治作用”，的确是不合“互辩律”（Dialectio）——因为他只看见已有的农民阶级，而不注意在发展中的农民阶级，而事实上（互辩律上），却从农民阶级的内心，尽在发生出资产阶级来呢。

至于农民阶级与无产阶级相结合，是否像杜洛茨基所说：“等无产阶级胜利之后，农民阶级自然只能倾向工人的民主主义（即无产阶级独裁制）？”还是农民阶级之倾向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胜利的必要条件呢？换句简单话说：是无产阶级胜利了，农民阶级方和他结合呢？还是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结合了，无产阶级方能胜利呢？

固然，大多数农民群众，在十月革命时，还是赞成“社会革命党”（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社会主义），他们在立宪大会选举的时候，投社会革命党的票。然而，第一，十月革命前农民已经倾向无产阶级的政党——农民子弟所组织的旧俄军队和农村田地委

员会的赞助革命，反抗克伦斯基的农民暴动。凡此一切，都是赞助多数派“田地分给农民”的口号之表现。十月革命之后，各省革命的地方政府，也都是在当地农民及军队信仰无产阶级政党之后，才能巩固的。既如此，可见不是农民阶级看见无产阶级胜利之后，再来和它“结合”的，不是无产阶级消极地坐待农民阶级倾向过来的；而是农民阶级受无产阶级的吸引，积极地赞助它和大资产阶级斗争，所以无产阶级得以胜利的。第二，农民阶级之所以结合无产阶级，而赞助多数派，并不是屈服于“工人的民主主义制度——无产阶级独裁制”。农民对于无产阶级的信赖，是无产阶级以妥协的代价去换来的，暂时抛弃多数派自己的农地问题政纲，而采取社会革命党的农地政纲，且而容纳农民方面所提出的政治条件。

可以说：列宁主义和杜洛茨基主义的不同，不在于主张“革命无间断的转变”与否，而在于这两点：一、无产阶级政党是否承认农民阶级绝无独立的政治作用；二、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当注意吸引农民阶级，使它积极赞助自己。

列宁派的政策，便是无产阶级不死守着自己社会主义的原则，而以小资产阶级式的农地政纲，赞助农民阶级的利益，帮它和封建地主斗争，这样去换取农民阶级赞助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策。换句简单的话说，便是无产阶级要努力帮助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地主，农民阶级方才肯帮助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杜洛茨基派的政策便不同：他们以为无产阶级只顾可以独行其是——执行社会主义政策，不愁农民阶级不自然而然地倾向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因为反正农民阶级并无独立的政治作用。

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联盟，力求引导农民阶级，使其革命性充分发展——这是多数派策略的根本原理。一九一七年革命中，这一联盟的动力，第一，便是田地制度的改革——这一大激变，虽然是一种革命政策，却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不是反对资本家的，而是反对封建地主的；不是以田地收归公有，实行农业中之大规模的共同生产和共同分配，而是均分封建地主的田地，取消不平等的地主与农民间的身份限制，废止不以公平买卖为原则的佣役制度，而造成平等的小农经济，使农业中开始“自由竞争”之可能。这等革命政策，俄国无产阶级毅然赞助农民阶级去实行当时在革命后公布的田地令，并非多数派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农地政纲，而是所谓社会革命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农地政纲。可以说，这一政策纯粹是无产阶级为农民阶级的需要而实行的，并非为自己的社会主义要求而执行的。虽然如此，那没收地主的政策，同时便与银行界的财政资本以一大打击，因为这些地主的田地，都在各银行里抵有押款。所以，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的政策的另一方面，便含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转变而成社会主义的政策。不但如此，地主田产的没收，又是否认私有财产的“天经地义”之示威。再则，当时这“劳农同盟”之动力，第二，便是多数派

力争停止帝国主义的战争。历史的突变，竟使农民不但从帝国主义的战场上退出“同盟罢战”，而且转身加入赤军，以拥护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利益——田地，从事于三年之久的国内战争。这就可见那时农民已经确见多数派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主张是正当的，因为除此之外，绝无取得和平的别条道路。历史的事实，不断地使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利益与无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利益相结合。俄国之资产阶级革命“转成”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是如此。这一转变之历史的规律性及其意义，当然不能单从资产与无产两阶级之相互关系上考察出来，而应当从三个阶级——资产、无产、农民——的相互关系上考察。否则，与俄国的客观情形决不符合。

杜洛茨基的革命无间派，在一九〇五年便说：“皇帝不要了，政府是工人的。”列宁却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论及工人政府时，还说：

我们有一种愿望：现时农民运动的时期还没有过完，这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没有完结，然而我们却想“跳过”这一革命，而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这种愿望，是否有堕入主观派的危险呢？

假使我是说的：“皇帝不要，政府是工人的”，这就确有主观派的危险。然而我说的是：现在只能有“工人、雇农、农民、兵士代表苏维埃”的政府，而不能有别种政府（这里资产阶级政府不说在内）。我说，现时的政权从古池夸夫、黎沃夫（当时的内阁）手里，只能转移到苏维埃，而在苏维埃内恰好农民占多数，兵士占多数，小资产阶级占多数——这所谓“小资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术语，不是指生活程度、职业关系或社会地位，而是指他们的阶级性质而说。

我可以自己保险，我这一提案里，绝对没有跳过还没过完的农民运动及一般的小资产阶级运动之空想，绝对没有想现时就以工人政府“攫取”政权的儿戏，绝对没有任何一种的白朗起主义的政治投机……（《论策略书》全集，十四卷，第一册）

固然我们知道，随后列宁常常称苏维埃为工人政府，为无产阶级独裁制；然而他在那个时候，认为“工人政府”的口号是不适当的，因为有忽视农民，空想“跳过”农民的意义。俄国是农民众多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应当特别注意农民。农民国家中进行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应当有相当的方法。列宁说：

俄国大多数农民能不能赞成糖业新狄嘉收归国有，由工人农民监督着，使糖价便宜呢？当然能够的，因为这对大多数人民有利的。这一种办法，经济上有没

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因为糖业新狄嘉不但已经经济上渗入全国范围的生产机体，并且在俄皇时代便已经归“国家”监督，不过那时国家的官吏，是为资本家阶级服务的罢了。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的农民国家里，这种一切糖业大公司收归国有的办法，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呢？不是的，这还不是社会主义……再问一问：譬如糖业收归国有，或统一全国银行等类的办法，在民主主义的农民国家里，是否增加还是削弱无产及半无产阶级的势力、作用及意义呢？当然是增加无产阶级的势力。因为这类办法，不是小经济的。这种办法的可能，实是现在的“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实行了这类办法，再进而向社会主义，便是完全可能的事。如果再有西欧各国工人从旁帮助俄国工人，那就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真正变成了不可免的事，而这种过渡的成功已经有保障了。”（《根本问题中之一》全集，十四卷，第一册）

对于统一全国银行、田地国有等办法，列宁也一件件详细证明：就算在民主主义的农民国家里，也可以行的，要紧的是不去侵犯农民的利益，而去保护它的利益。列宁的论断，从不离开俄国现实的阶级关系，他所提议的第一步的社会主义办法，都求适合农民的民主主义的利益。

可见，列宁的“无间断”的革命说，不是要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而斗争时跳过小资产阶级的农民而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和所谓“工人政府”，而是合乎历史的一切阶级发展律，无产阶级在每一阶段努力执行现实上可能的社会主义职任之最大限度，同时保存并且巩固自己与农民阶级的联盟。这是俄国无间断的革命中，列宁派的策略的精髓。杜洛茨基派的革命无间说，却只见着推翻资产阶级后的无产阶级之“阶级地位的逻辑”，仿佛无产阶级在封建军阀或帝制农奴的政制之下，既然参加民主革命，当然已能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无产阶级的政治势力更加增高，直接便要进于社会革命，提出纯粹社会主义的要求，可以不顾农民，单独向资产阶级进攻，如此，便会实现急转直下的无间断的革命。何以故呢？杜洛茨基回答道：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使它不得不直进而要求实行社会主义。这便是死公式！这公式的意思：因为工人没有私有财产，因为工人只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于国有大生产事业——农工业都要如此，所以农民是否要均分田地，是否暂时只能经营私有的小经济，不去问他。总而言之，因为工人是无产阶级，所以它只知道要社会主义，不管农民要民主主义，参加民主革命时（更不用说实行社会革命时了），便只要提出社会主义的要求，不必去联络农民。假使实行这样的策略，农民很可以反动而趋向于自由主义的大资产阶级（未必见得像杜洛茨基所说自然而然服从工人政府），工人阶级势孤，其势非失败不可。这样，那就

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真可以成功，而革命中断了——哪里来的无间断的革命呢？这是杜洛茨基主义的根本错误。

少数派因忽视农民而主张联络大资产阶级，因此便要消灭无产阶级的独立，而使它屈服于反革命；杜洛茨基派亦因忽视农民而不顾农民利益，因此便要激使农民反动，使无产阶级孤立，而助长反革命的势力。所以杜洛茨基主义，亦是一种少数主义，亦是一种机会主义。

列宁、殖民地民族与帝国主义

魏 琴

在全世界农民和工人及一切被压迫民族首领之逝世周年日，“列宁”这一个名字必定到处喧呼于人们的口里。

在中国，年来国内的军阀战争——同时是世界帝国主义者间之利益的冲突——尚在有加无已地继续，际此列宁逝世的一周纪念日，我们以为最好是将列宁的名字重复回忆，以振作被压迫民族反帝国主义奋斗的勇气，因为列宁是人类一切解放的象征。列宁的名字在他的生活史中之最后的几年，更在东方被压迫民族中之下层阶级间变为普遍了。在印度、波斯、土耳其、爪哇、菲律宾群岛、中国……列宁的名字形成为最贵重的、最亲切的，大家都以为他是被压迫者的救星。殖民地中之一些愚笨的群众，本来不晓得什么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但是他们知道，列宁具有伟大的力量，并将这种力量用之于最危险的、最凶恶的仇敌——世界列强的帝国主义。他们明白，列宁完全站在他们的一方面，列宁教导了世界的无产阶级如何反对帝国主义，如何联合被压迫民族而奋斗。

但是当列宁死后，他的名字更侵入于东方的城市和乡村的里面。“列宁”日渐形成唯一的口号，大家都围绕着这个口号，以求达到自己民族的解放。东方民族越将列宁主义的理论理会好了，则他们越会组织自己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共产主义的赤色是越要发凶，人类平等的空气越见膨胀，无压迫的世界越要快实现。

在纪念伟大的首领之本文中，我们特别地注意两点：第一，列宁如何教导西方的无产阶级反抗自己资本的政府，以达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第二，列宁以为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对于世界革命，有如何伟大的意义。在离死期还有九月之最后一篇论文中，列宁以为东方民族之反帝国主义运动，是全劳动人类胜利之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列宁著一论文，名为《不患少而患不精》，每一个革命家，每一个为劳动群众争利益的战将，都应将其详细地读熟：

西欧资本主义的列强，一部分是有意的，一部分是无意的，为着要把我们倒转退后，为着要利用俄罗斯的国内战争，以破坏其国内的一切，不惜用尽了方法。它们以为虽然不能将俄国的革命制推翻，也要使它难走入社会主义。的确，它们也达到了目的的一半。它们没有把我们的新制度推翻，但是它们却给了我们以可能，使我们迅速地发展生产力，迅速地建设社会主义。

现在国际情状形成如此了：德国为列强所征服，一切其他旧欧洲国家，因为它们能够利用这个胜利，而对于自己被压迫的阶级略表示让步，这个让步却使革命运动迟缓下去，而造成若干相似的“社会的和平”。

同时，许多东方的国家——印度、中国……因为这次帝国主义战争，完全更变了自己经济的状况。它们的发展完全变为普遍欧洲资本主义的步骤。它们已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此种发展不得不促进世界资本主义的恐慌。

我们现在立于这个问题的前面：我们在小农生产的状况下，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完成自己的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它们完成自己的发展，绝不如我们从前所等待的一样。它们的完成不是照着内部平均的社会主义的成熟之道路，而照着这一个国家压迫那一个国家，战胜国压迫战败国，竭力压迫东方的民族。然而，在别一方面，东方因帝国主义战争的结果，已漫溢了革命运动的潮流，已陷入全世界革命的旋涡里。

我们对于此，到底用什么策略？很明显地要如此：我们要用最大的力量谨慎地保护我们的劳动政权。全世界正在转入极激烈的运动——这种运动一定要产生全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因此，我们无所用其畏惧。但是在我们一方面又有一点弱点，就是帝国主义者能将全世界劈为两个营寨，它们极力压迫文化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先进国——德国，使它不能重兴起来。而在别一方面，全东方被帝国主义的列强放在很困难的状态下，就是它的物质的或军事的势力，无论如何，不能与任何一个欧洲小国的物质或军事力量相比较。

我们在将来与帝国主义列强发生冲突时，能不能保得安全？我们能不能希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与东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第二次给我们以缓冲的机会，如第一次西欧反革命帮助俄国反革命，而卒因东西反革命势力的冲突——日本与美国的冲突——遂告中辍？

对于这个问题，应如此回答：这个问题之如何解决，要以许多环境状况为转移。资本主义自会将地球上之最大多数人口训练到奋斗的方面走，我们在此也就预见这种奋斗的出路。

中国、印度、俄罗斯占全地球之最大多数，奋斗的出路当然要以此等国为转

移。在最近许多年中，这一部分大多数的人民很快地流入为争自己解放的运动，我们由此可以断定社会主义的胜利可以完全保证了。但是我们现在所重要的，不是社会主义之必然的胜利，而是我们，俄国共产党，应用什么策略，以维持住苏维埃政权，而使西欧反革命的国家不能把我们压迫下去。若欲保持我们的生存到下一次反革命的西欧与革命的东方——文明的国家与落后的国家——之军事的冲突，则这一部分最大多数的人民应当自己文明开化起来。

此地所引列宁对于帝国主义者反对苏俄的论文中之一段，的确是东方民族的教训。凡列宁所说的话，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人们，日见明了。现在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做的勾当，其目的也如他们在俄国国内战争时所抱的一样。当俄国国内战争时，帝国主义帮助反革命派惟力是视，现在他们在中国的行为又有什么不同呢？只要一回忆民国十四年来的经过，与不久之前在广东所发生的事实——英国的帝国主义者极力帮助反革命的商团，而与一切劳苦群众为敌，我们就知道帝国主义者之如何屠毒中国，如何促进中国反革命势力的增长。每一个革命党人，每一个劳动群众之友，都应当牢记着列宁的死前话：“照帝国主义者的利益而论，他们非如此做不可。”因此，一切国民革命运动的人们，应当视列宁的话为普通的定理，而时时刻刻指示群众：无论帝国主义者所用侵略中国之形式如何，其目的不过是要助长中国反革命的势力，防止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去年在东方的各国家中，我们更可以找出许多能证明列宁的话之不误的事实。在印度、波斯、埃及……所发生的一些大事变，到底是一种什么的表现？帝国主义者在这些国家中，重新进攻反对劳动群众，帮助反革命的势力。

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不但有海、陆军的武备，他们并且设立了许多机关——学校、教会、报纸：他们用这些机关来屠毒被压迫民族的思想。最大的反毒剂是列宁主义，我们现在应当极力传布列宁主义，好打消帝国主义者的毒药。

在中国，现在一切帝国主义者的报纸极力鼓吹反对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人们，讥笑他们为暴徒。帝国主义者以为中国受过资本国家的及教会学校的教育之知识阶级，是现在国民革命运动的首领。所以天天要这样说的，是因为帝国主义者要指明中国国民运动之不坚固，因为它趋向反对资本主义，而自身却为资本主义所培植出来的。然而列宁却正以为资本主义自己将大部分的弱小民族训练到奋斗的道上去，正是世界革命全胜利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自身本是资本主义的产儿，但是它是中国无产阶级趋向推翻资本主义——外国的和中国的——的压迫之表现。

东方民族有自身急速开化起来的必要。列宁对殖民地民族与全世界无产阶级说，

若要战胜帝国主义，则殖民地国家应赶快地驱除自己的封建制度、落后的经济关系、宗法制度生活及一切宗教的谬解。总而言之，凡是帝国主义者所愿意帮助的，本国军阀所依以为生命的，均应极力废除，不留残迹。

能领会列宁主义之民族解放运动的首领，一定能找出与帝国主义奋斗的道路，一定会引导无数万的劳动群众向胜利的方面走。

列宁的理论与实际是分不开的。他的理论是如何转入行动的工具。人类的大革命主义者，他仅承认为被压迫民族争解放、为推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而奋斗的人们为“人”。捷克的革命首领克列比黑说：“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对于列宁，是不讲理的：对于这种人只望其死而不愿其生。对于我们，反革命的人没有生存权，没有名誉之可言。”这几句话的确可以形容列宁之如何伟大，如何愿将人类引到光明之路！

一九一四年，当欧洲大战时，列宁极力反对一些假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承认欧美资产阶级之殖民地政策。后来，他们果然都跳入资产阶级的营寨。列宁当时教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及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一篇论文《帝国主义与民族压迫》中说：

帝国主义者说，殖民地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必需的，而社会主义者也以为殖民地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必需的，因为社会主义一方面要帮助殖民地发展文化，而别一方面可以用自由交换的方法，从殖民地中取得社会主义国家所无的东西。因此，无产阶级无反对殖民地政策之必要。

这是一些假社会主义者的论调。这种论调当然为着资产阶级的殖民地政策辩护。列宁深明这种论调足以眩惑落后的无产阶级之视听，因之极力反对这种论调，反对一切民族间的压迫。

从殖民地滚开去！殖民地是资本的利润之新的源泉，这个源泉可以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不但图其财力，并且利用其体力，组织军队，好利用机会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反对它的敌手。

在许多东方的大国中（土耳其、中国、印度），我们看出资产阶级分子的增长，它们执行发展自己国内生产力的责任。社会民主党应帮助殖民地之无产阶级的奋斗，反对外国的和本国的资产阶级，应当极力宣传无产阶级的思想，使殖民地的无产阶级为着自己的利益，不与本国的资产阶级，而与先进国的真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在这两段文中，列宁不但教训被压迫的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并且教训他们要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他在自己的理论中，将民族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联合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制度。

一九一七年，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的指导下，推翻资产阶级，而建设了劳农政权。革命后，列宁即时实行他民族解放的主义，不但一方面帮助弱小民族组织独立共和国，并且又在经济上帮助它们生产力的发展。在外交的政策方面，苏联完全照列宁的主张做，如取消前俄帝国在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一切特权……都表示出苏维埃政权之外交的精神。无论帝国主义者下如何的压迫，总不能使苏联抛弃列宁主义的原则。

在列宁死后的一周纪念日，我们应当好好将列宁主义解释给无数万被压迫的群众听！

列宁与职工运动

郑超麟

职工运动的历史同无产阶级存在的历史比较起来，是很短的。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欧洲才有雏形的工人职业组织如互助会这一类团体出现。一直到今日，为时还不到一个半世纪。无产阶级职工运动已经由互助会性质的原始状态逐渐发展；从那在资本主义制度底下做减工时、加工资的改良主义运动的工具变成了含有几百万会员的团体，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利器了。这种进化的过程可算是异常迅速的。职工运动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已尽人皆知。职工运动理论在列宁主义中占重要部分。列宁论职工会作用和使命的学说，现在已成了俄国职工运动理论和政策的基础，同时又是国际革命派职工运动理论和政策的基础。忽略了职工运动将是我们的错误，不知列宁主义的职工运动理论尤其将引导我们错走歧路。

了解列宁论职工会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和使命，这就等于对革命派职工运动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有了把握。

马克思主义者所区别于浪漫派革命者之一要点，在乎马克思主义者知道研究革命的阶级怎样由“在自己”的状态长成至“为自己”的状态，怎样认识得自己的历史使命。工人阶级绝不是一开始每个人都认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是本阶级伟大的历史使命。工人阶级与其余一切阶级一样，阶级觉悟程度并非一致，内部有一部分是先进分子，代表本阶级，领导其余落后群众为阶级利益而奋斗。认识工人的阶级斗争发展途径，根据这个认识来指导这个斗争，这就是列宁所看出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之使命。这个使命是很重大的。工人的阶级觉悟程度不一致之来源，首先在乎工人出身不同，旧式生活之影响既未能同时抛弃，在资本家剥削底下又因职业分工关系不能同时明了自己的使命。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整个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与资产阶级对抗是很难能的。

落后的工人群众，只有眼前的经济利益，只有改善生活条件、增加工资、缩短工

时等经济要求，才能使之逐渐感觉工人与资本家是立在利益相反的地位。在改善工作条件的斗争里，认识了自己和做工的同伴有共同的利害关系：这就是阶级觉悟发展进程之第一步。列宁提醒工人阶级先进分子，教训他们不应该忽略了这一点。在其所著一九〇二年出版的《怎样办》一书中，列宁就教训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说：“经济斗争，是工人改善劳力售卖条件、改善工作生活条件之集体的奋斗。这个奋斗必然是职业的奋斗，因为劳动条件是随职业不同而生差异的，故此为改善这些条件的奋斗，不得不按照职业差别而进行。”十八年之后，到一九二〇年列宁又在俄国职工会第三次大会上重申这个教训，他说：“在资本主义制度底下，无产者只能按行会和职业组织起来。这是进步的现象，不然，无产阶级无从组织。以为无产阶级一下可以整个阶级组织起来，这是不通的话。”由这个教训，我们可以看出列宁怎样了解工人的职工会斗争之必要。

工人阶级的先进革命分子应该承认这个必要，承认只有用职业组合的方式才能组织广大的工人群众。这个必要必须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灭，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资本主义制度遗留的渣滓未净尽以前，职工会的组织还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者切勿忘记阶级觉悟是从阶级斗争中逐渐得来的。改善工作条件的奋斗是工人的阶级觉悟之第一步，由这个奋斗，工人逐渐认识资本家是自己的敌人，逐渐发生联合做工同伴共同行动反对资本之要求，以至于结果取得政权。

这种过程在俄国工人运动史上是很明显的。列宁一九二〇年在全俄纺织工人大会上的演说，曾经有一段说到俄国工人阶级觉悟之过程：“我们都还记得或听见我们的父亲说过，几十年前工人初进工厂做工时候，总以为工厂养活工人，厂主是工人的恩人。那时工人不明白资本家剥削他们。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初时都是这样想。从原始无知的、不觉悟的状态过渡到认识自己地位的状态。此时罢工就开始了。工人开始感觉自己有力量。职工运动跟着罢工的增多而起来。晓得抵抗敌人已经是向前的大进步。职工运动初期，工人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缩短工时、增加工资……上头。工人再不超过这种倾向的观念了。可是又到了一个时候，工人这个第二期的阶级觉悟已不够用。大工厂主，因自己的帝国主义倾向和银行家联合起来，并以瓜分地球为目的而开始战争。这个战争杀死了一千万人，残废了三千万人，结果缔结了《白列斯特和约》和《凡尔塞和约》，然后工人更进一层觉悟，明白工人受欺骗了，战争是资本家为自己利益才鼓动出来的。这一层道理，工人明白了，于是乎发生工人革命，完成十月暴动。”从列宁这一段演说，我们可以知道职工运动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有何种意义。

职工运动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既如是之重要，工人阶级先进分子自然应该认识这个作用，指导这个运动，使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利器，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怎样指导这个运动呢？工人阶级先进革命分子组成革命的政党——共产党。职工运动与无产阶级一般的政治斗争有何种关系？什么是无产阶级政党及其与职工会的关系如何？正确回复这些问题，对于列宁主义的职工运动理论，便思过半矣。

什么是无产阶级之革命的政党？列宁以为无产阶级之革命的政党，只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在资本主义制度底下，大多数工人组成的革命政党是无存在之可能的。只有最活动的、最觉悟的、最勇敢的工人才加入革命政党。革命政党虽然只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却代表整个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利益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初无二致。革命政党不放弃职工会的斗争，不过把这种斗争看成是为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革命政党所区别于其余工人群众的，在乎“革命政党着眼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的每个转弯点，努力拥护工人的利益，这种利益不是某部分的，不是某职业的，而是全阶级的。”总而言之，革命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头脑、前锋、总司令部。只有这个总司令部成立，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

譬如军队的组织：总司令部与各兵士有很密切的、良好的联络，这一军队才能获胜；所以在阶级斗争中，广大的工人群众与其革命政党的关系、职工会与革命政党的关系，是异常重要的问题。前面已说过，革命政党不仅指导工人的政治斗争，兼要指导工人的经济斗争。这样，根本上才能保证职工会政策不至于违背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但革命政党如何指导工人的经济斗争呢？这必须经过职工会。故列宁以为革命政党和职工会中的密切关系有很重大的意义。

关于革命政党与职工会的关系，关于职工会应该受革命政党指导的理由，列宁替一九二一年俄国共产党第十次大会起草的议决案中，说得极为透澈：“马克思主义的教训——这个教训不仅形式上被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一九二〇年）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作用之议决案所接受了，而且实际上也被我们的革命的一切经验所证实——告诉我们说，只有工人阶级政党即共产党，是能够团结、教育、组织无产阶级的和劳动群众的前锋，使群众能避免那些小资产阶级性的流毒，以及各种职业的偏狭的成见，而综合无产阶级各方面的运动，换言之，即指导一切劳动群众。”革命政党指导职工会的这种主张，在苏维埃共和国现在每个做职工运动的人都承认了。但十月革命以前只有波尔札维克党人这样主张，而持论非难这种主张的人，却时时刻刻都有。现在列宁的主张贯彻了，但其历来与各方面攻击论调奋斗之经过也值得我们研究。

只要研究列宁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我们就明显地发现列宁主义的职工运动理论历来与其他错误的和危险的观点经过了好几场的恶斗。这种斗争一部分是关于俄国

的运动，一部分则扩大到国际的范围；一部分是已告终结的，一部分则还是目前争论的焦点。

最初，是反对经济派的斗争。列宁初期的名著《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责任》（一八九七年）一本小册子及《怎么办》（一九〇二年）一书的第三篇《工联主义的政策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就是为攻击经济派而做的。俄国工人运动发展到那时（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已成社会上一大势力：职工会先后组织起来，而且有工人政党“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出现。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遂引起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参加，这班人于“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之时，在党中代表一派倾向，即所谓经济主义的倾向，是后来孟雪维克主义的祖宗。经济派当时的主要人物是现在的白党，侨居国外不能回俄的勃罗谷卜维奇（Prokopovitch）和顾士谷瓦（Kouskova）。他们当时都是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哩！这一派以为工人除了狭义的经济问题之外，不应该多管其余的问题。其余的问题与工人了无相干，即告诉工人，工人也不懂得。我们只能够对他们谈说那些关于工人切身利益的问题，换言之，即只谈得上工人的经济要求。这种倾向甚至于否认打倒俄皇专制之必要：他们以为这个，是工人不能懂得的。根据这种观念，于是他们成立一种“为五个戈比斗争”的反政治理论，禁止工人做政治运动，否认有组织独立的工人政党之必要。勃罗谷卜维奇和顾士谷瓦二人告诉列宁和蒲列哈诺夫说：“我们才真正是工人的良友。你们主张打倒俄皇专制，做革命的政治斗争，可是这并不是工人的事。你们的行为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行为。我们才是工人的真正良友，我们告诉工人说：俄皇专制与工人绝不相干，工人分内的事只是如何增加工资、如何缩短工时等等问题。”

这个倾向表示什么？这个倾向乃表示做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完全不明瞭了工人阶级的作用。但在这初兴的俄国工人运动里，这种说话投合工人原始的心理，工人很容易动听。有一些工人团体拥护勃罗谷卜维奇和顾士谷瓦的主张，彼得堡有势力的秘密报《工人思想》，亦是拥护者之一，因此经济主义在俄国九十年代下半期，特别是自一八九八年到一九〇一年，于工人运动中引起巨大的危机。那时如果列宁和蒲列哈诺夫不起来攻击这一种倾向，谁又知道俄国工人运动牵引进了经济主义的道路——机会主义的道路，要若干年后才得翻身呢？

蒲列哈诺夫和列宁先后攻击经济主义，但列宁的攻击比较蒲列哈诺夫的，尤为中肯、尤有系统。蒲列哈诺夫只限于说：谁只指导工人做一点一滴的经济要求，谁禁止工人做政治运动，谁就不是工人的首领。列宁却不限于这样的攻击，他当时在流放中著成一本有名的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责任》，十分具体地提出无产阶级霸权问题，从各方面向经济派作战。列宁以为马克思主义者绝不主张忽略工人的工资和工时，

我们自然要增高工人工资、缩短工人工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但我们所要的决不是如斯而已。我们要工人来管理国家，变成国家的主人翁和指导者。因此绝没有一个问题¹和工人了无相干。特别是推翻俄皇制度这一个问题，尤与工人有切身利害关系。我们主张无产阶级霸权而反对陷工人囿于琐碎的经济要求。列宁随后又著成《怎么办》一书，给经济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列宁认定纯粹的经济斗争是工人运动还未到觉悟状态的思潮，他在本书中说：“原始状态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Trade-unionism），工联主义正是资产阶级束缚工人思想之表现。所以我们的责任、社会民主党人的责任，乃在反对这个原始状态，乃在领导工人运动，使之脱离这个工联主义的原始倾向，而就社会民主党的规范。”“西欧资产阶级仇视社会主义因而利用工联主义，告诉工人说：只有经济的斗争才是为自己、为子孙的斗争，而不是靠什么社会主义，替未来人类争幸福。”因此我们知道：如果经济的斗争不与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联络起来，职工会必将受资产阶级政策所支配。其实工人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是分不开的。资产阶级从来未曾把经济从政治分离出来。资产阶级只知道有了资本主义国家便可满足自己的经济需要。列宁说：“最实际的、最‘决死’的阶级利益，只有根本的政治改革才能满足，这是指一般而言；特别地说，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必须用政治革命手段，必须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然后才能满足。”“勃罗谷卜维奇……领导工人运动走上资产阶级工联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运动更幼稚的国家，更应该有力地攻击这些违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更应该坚决地领导工人使之离开这班反对‘觉悟分子张大其辞’的顾问。”

经济主义这样受了革命分子的打击，到一九〇二年已沉寂下去了。

其次，是反对职工会中立论的斗争。孟雪维克党人主张职工运动在政治斗争中是“中立的”“无党的”“独立的”，政治问题让政党去解决，职工会只能做经济斗争。一九〇六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在瑞典京城斯德哥尔摩开联合大会，波尔札维克党人请大会决议：（一）党的所有组织应该帮助无党籍的职工会之成立，并督促属于此种职业的党员加入这些职工会；（二）党应该用种种方法去教育职工会会员，使之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及其社会主义的任务，应该用自己的活动实际上获得这些职工会的指导权，并应该使这些职工会在某种条件下能够直接附属于党，而同时又不淘汰无党籍的会员。这次大会上是孟雪维克党人占多数的，他们拒绝这样的决议，而另成立一个议决案，与波尔札维克党人观点所不同的，就在这个孟雪维克的议决案删除了党实际上获得职工会指导权这一点。到了一九〇七年伦敦大会时，会场空气已有变化，除孟雪维克党人抗议外，大会没有其他辩论即通过底下的议决案，提醒党对职工会的指导权：“大会于承认联合大会对于职工会工作的议决案外，再提醒党的组织及在职工会

做工的同志，注意社会民主党人在职工会工作的根本责任之一：便是使职工会承认社会民主党有思想指导权，并促成社会民主党与职工会组织上的联络之设立。”自此以后，波尔札维克党人反对职工会中立论的斗争更扩大到国际范围。同年，第二国际在斯徒嘉德（Stuttgart）开大会也通过一个议决案，说明政党与职工会之密切关系及巩固这种关系之必要。这个议决案起草时得波尔札维克代表积极地参加，列宁以为这是革命派对于机会主义派之胜利。但第二国际这个议决案，在俄国却未曾发生过何种效果，政府反动潮流增长及孟雪维克党人在职工会之把持，使这个议决案不能见诸实行。一直到一九一七年，波尔札维克党人关于职工运动的理论和实际才得到胜利。

但职工会中立论在国际职工运动中现在仍有势力。这种理论表示什么呢？我们知道改良主义首领们虽然否认职工会的一切政治行动，但他们所否认的实际上只是革命的政治行动，因为他们既然断绝职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联络，实际上即不啻令职工会执行资产阶级的政策，削夺革命势力、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中立”“无党”“独立”等好听名词其实是“赞助”“党同”“依附”资产阶级的政策。改良主义首领们在战前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以自肥兼以收买工人贵族的时代，自然发生一种幻想，以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底下可以过人的生活，殊不知他们即因这个幻想而忘记了马克思的教训。马克思分明告诉我们：私有财产还在资产阶级手中，又有国家为其护符的时候，工人阶级是不能根本改善自己地位的；资本主义存在一日，工人群众的贫困、剥削和压迫即增加一分。因此，经济斗争是不能和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全体的一般政治革命斗争分开的。职工会中立论是改良主义幻想之表现。列宁一开始即坚决地攻击这种改良主义的理论。列宁根据马克思学说的真精神教训我们说：在阶级斗争中是无中立可言的，譬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我们绝不能不参加生产品或劳力之交换。列宁认定主张职工会中立论的人都是“资产阶级派往工人运动中去的侦探”，西欧职工会的改良派首领，如康比尔斯（Gompers）、亨得孙（Henderson）、朱奥（Touhanx）等人都是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列宁教训共产党人须坚决地攻击这班职工会的改良主义首领，为获得职工会的群众。

其三，是反对放弃反动职工会的斗争。前面所说的二种斗争是反对右派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这一个斗争则是反对“极左派”的斗争，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对症发药的医治。反对职工会中立论的斗争胜利之后，俄国已经有一部分波尔札维克党人，被称为“撤回派”的，主张党停止职工会的工作，以为现在的职工会已为孟雪维克党人所把持了。及帝国主义大战发生，机会主义幻想打破使职工运动左倾之时，西欧共产党人于是纷纷鼓励革命的群众，脱离改良派亚姆斯德丹国际的职工会，故意使现有的职工会分裂而另组织新的赤色的职工会。此种倾向是很危险的。列宁的名著《共产主

义左派幼稚病》一书最大的功绩，即在能给此种倾向以严重的打击而挽回国际职工运动之危机。“极左派”的共产党人以为现有的职工会不仅首领是改良派，群众也是富于反动性的。列宁答复他们说：我们不应该恐怕群众的“反动性”，我们的口号是“务必在有群众的地方工作”。

当无产阶级阶级组织发展至最高形式——无产阶级政党（首领如果不能与全阶级全群众作巩固的联络，则不能僭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之时，职工会必然要表现些反动性、一些职业的偏狭、一些反政治的倾向、一些迟钝……可是，职工会这条道路，除了职工会与工人政党联络之外，无产阶级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发展……职工会的此种“反动性”，即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亦不能免。不明了这个，就是完全不明了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根本条件。惧怕这个“反动性”，企图跨过这个“反动性”，跳过这个“反动性”，乃是其蠢无比的思想，因为这样即等于惧怕无产阶级前锋所担负的教育、锻炼、训诲、领导工农群众最落后的一部分到新生活去。他方面，延长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时日，先令工人一切职业上的偏狭消灭，先令工人破除行会习惯的和工联主义的成见，这尤其是更深刻的错误。政策上的艺术（及共产主义者对自己任务之正确的认识）在乎精密地计算条件和时机，预备无产阶级前锋能够有把握取得政权，夺取政权之际及取得政权以后，能够得工人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广大部分之充分的赞助，随后又能够于教育、训练、领导广大劳动群众之中，维持、巩固、扩大自己的统治。

在比较俄国更先进的国家中，职工会的一些反动性无疑地较甚于俄国。俄国孟雪维克党人所以取得职工会的赞助（现在他们还有一部分势力在很少数的职工会里头），乃全靠在行会的偏狭职业上的自利主义和个人主义上头。西欧孟雪维克党人愈加巩固地把持职工会，所以西欧产出比俄国更强有力的职业性的、偏狭的、自利的、腐败的、贪心的、供帝国主义指使的、被帝国主义收买、受帝国主义贿赂的“工人贵族”。这是谁都承认的。在西欧作反对康比尔斯、朱奥、亨得孙、墨尔欣（Merrhein）、列更（Leghien）一班人的斗争，比较在俄国作反孟雪维克党人的斗争更加困难，他们完全代表同性质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形式。这种斗争应该不顾惜地和不可缺地做去，一直到像我们在俄国完全打倒和驱逐职工会中所有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首领和社会爱国主义首领一样。

可是反对“工人贵族”的斗争，我们是用工人群众名义，为拉拢工人群众到我们一边才去做的；攻击机会主义首领和社会爱国主义首领，我们为的是拉拢工人阶级到我们一边来。除非是蠢才，才会忘记这个最初步的、最明显的真理。“左

派的”德国共产党人却正做这蠢才的勾当。他们因职工会上层的反动性和反革命性，而推论出应该退出职工会，应该放弃职工会工作，应该创立新的、发明的工人组织形式。这种不可宽恕的蠢才勾当，乃是共产党人替资产阶级的良好的服务……不在反动的职工会中工作，这就等于放置不发展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在反动首领、资产阶级侦探、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的工人”的影响之下。（《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

列宁这样对“极左派”的共产党人指出：他们放弃反动职工会之错误以后，又于其起草的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告法国社会党员、告觉悟工人宣言》中，积极地申言：

我们反对革命者和共产党人退出群众的职工会，即许不幸这些职工会跟着列更和朱奥走去，我们也要留着。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应该到有群众的地方去。俄国共产党人有很长久的时间在职工会中占少数。俄国共产党人懂得在最落后的，甚至反动的工人团体中为自己的观念奋斗。

列宁以“不是分裂职工会，而是获得群众”口号抵制这种“极左派”倾向。接着第三国际根据列宁这个观念，确定职工运动的策略，到现在，统一职工运动已成国际上必然的趋势了。列宁在这一斗争中，是国际真正革命派职工运动之指导者。列宁在国际职工运动中的作用是很重大的，他的功绩将永远不会磨灭。

一九二一年七月，各国革命派职工会开联合会议于莫斯科，成立了赤色职工国际。列宁写了一封信给大会主席团简要地这样说：

我以一切的诚意感谢他们托你（按：指赖可夫，此信系由赖可夫带往宣读）邀我到会。十分可惜，我因病，医生言须离开莫斯科休养一个月。

请你代表我致意各代表并热烈地祝贺大会的成功。很难找得相当字句表示职工国际大会之重要。以共产主义思想获得职工会会员，到处都有不容阻挠的进行。战胜千万障碍进行自然是不规则的、不等速的，但总是不容阻挠地向前进行。职工会的国际会议加速这个运动。共产主义思想在职工会取得胜利。世上没有一种势力足以阻止资本主义之崩溃及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胜利。

请接受热烈的敬礼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心！

列宁

最后，研究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俄国职工运动中的作用，也是我们研究列宁主义的职工运动理论所必不可少的。

俄罗斯革命给国际职工运动以一重大的影响，具体说来即俄国职工运动之产生、形成和发展。这并不是说革命前俄国没有职工运动，上头说过职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关系问题而且在俄国发生过热烈的争论。不过革命前俄国职工会本身没有重要的作用，对于国际职工运动的影响尤其微小。俄国职工会发生于一九〇五年，发展于一九〇六年，随后即被反动势力扑灭了；到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工人运动怒潮涌起时，又恢复起来，但不久大战发生，旧式职工运动于是乎终结。革命中俄国发生的职工运动开辟一新纪元，其性质和意义完全与从前不同。罗作夫斯基区分工联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为旧式职工运动之三种形式，革命后俄国新兴的职工运动则为新的、第四种的形式。革命后俄国的职工运动是革命派的职工运动，也可说是共产主义的、列宁主义的职工运动。这种运动虽然初在俄国发展，但将随十月革命影响而扩大到全世界。

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职工会自然另有一种任务。历史起了巨大变化，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于是职工运动的任务自然和在资产阶级国家内的不同。在资产阶级国家内，职工会是同一产业工人的结合，从改良日常生活条件的斗争中，养成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而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利器；到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之后，职工会的任务便自然不同了。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职工会的任务是在建设新社会。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免的，但组织下层广大的群众非职工会不为功。无产阶级先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职工会则联络这个先锋与后方的群众；没有职工会，无产阶级必至动摇而不能巩固。他方面，列宁又说明职工会是经济上的组织者，是政权的“后备军”。经过战争、革命、内乱之后，国内经济组织破坏不堪，此时职工会的任务是组织指导机关，管理国有的种种企业，而国家机关内办事的、指导的人才，又必须从自己阶级里边养成出来，训练这个“后备军”，职工会亦是责无旁贷的。有这种种新的要求，加以帮助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所以职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的任务比较在资产阶级国家的，更为复杂、更为繁重，因此职工会组织上和活动范围亦须改变，务求适合于这些新的任务。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文化发展之后，加入职工会的工人往往最多亦不过占雇佣工人全体五分之一；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就不同了，职工会开始国家的、经济的新建设，有可能而且必须扩大会员的数量，企图组织一切劳动者到职工会里头。教育、训练这些觉悟程度或能力不齐的工人，使之成为经济的组织者，使之成为国家的管理者、指导者，这就是职工会迫切的任务。所以，职工会为共产主义学校这一个意义，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比较在资产阶级

国家中尤为重要。职工会的这个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在资产阶级国家内，只是教育、训练工人如何作反对资本家的斗争，甚至如何推翻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则是教育、训练工人使之能够管理国家、指导经济组织。

在一九二〇年党内有名的职工会问题的辩论中及新经济政策实施后，职工运动策略之修正，列宁都很积极地参加，他的观点终于俱得胜利。俄国职工运动完全在列宁指导之下产生、发展起来，现在俄国职工运动的理论和实际完全建筑在列宁主义上面，而且能以其影响扩大到国际的职工运动。

列宁主义的职工运动自然是以马克思学说为根据的。但第一，列宁发展了这个学说，攻击附会马克思主义的改良派；第二，列宁应用这个学说在新的条件上头，为马克思当时所无的而且也不能够有的。无产阶级专政底下，俄国职工运动的经验在国际职工运动历史上开一新纪元。

列宁逝世之日到今已过去一周年了。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第三次大会于列宁逝世之后，确定了自己的职工运动策略；这一年来各国共产党和赤色职工会执行列宁的遗训，愈加热烈地攻击机会主义首领，同时又不放弃职工会的群众。职工会统一运动之进步、亚姆斯德丹国际之左倾、英国工联与俄国职工会的联络合作，就是列宁主义国际胜利之征兆。资本家阶级应如何地发抖呵！

在职工运动正处幼稚、半觉悟、甚至完全原始状态的中国无产阶级前面，列宁主义的职工运动理论是对症的药。俄国和国际职工运动过去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很可宝贵的。有了列宁主义做我们的武器，我们虽不敢希望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完全免除了俄国和国际过去的错误，但我们敢断定这些错误至少要减少一大部分。

列宁与农民

谢文锦

我在此处有几句话是要先向读者声明的：就是在一篇很短的文章里头，要将这个题目详详细细地发挥出来，自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只将其中重要的数点介绍于读者。不过我对于这个问题也研究很浅，故自己虽已觉尽力之所及，从事搜集，但遗漏和错误，恐亦难免，读者如能加以补充或指正，实不胜感激之至！

俄罗斯的多数派，在一九一七年所以能够集合这样伟大的力量，得到最后的胜利，它的政权又一天巩固一天，其原因不但在于它的奋斗目的很对，它的奋斗方法能适应环境及多数派的先锋队，能和工人阶级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且在于它同时又能够注意到农民的心理和利益，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去奋斗。这就是多数派的首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无产阶级的指导者列宁同志，指示给工人、农民群众的一条很正大的道路。他在历史上的大功绩，一部分也就在乎此。

那时——二十世纪之初——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大都是很藐视这个农民问题，至于那些机会主义者，是只想利用农民，以期选举的胜利。他们以为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和目的总是相矛盾的，所以农民是将来工人阶级革命进行中阻碍者。那位赫赫有名的考茨基，对于这个问题，也只尝试乡村贫农的意见。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始祖蒲列哈诺夫，对于攻击民粹派以为只从事于农民运动，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妄想，曾有很大的功劳，对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问题，也有深切的研究，但是他对于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问题，就没有注意，也没有了解。这个问题，到了现在，因已有列宁同志的指示，又有许多历史上的事实证明，所以自然没有什么疑问，不过在二十多年以前，就能够澈底了解这个问题，并很明白地指出工人和农民的联合道路来，除了列宁同志，实没有第二个人了。腊狄克说：“列宁对于农民问题是开历史上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真非过言！

列宁同志于一八九三年就很激烈地攻击民粹派的错误——他们说：“俄国资本主义是不会发展的”“俄国没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俄国将来的革命只有希望于农民”

等。他于监狱及流放中——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入狱，一八九七年二月被放于西伯利亚，一九〇〇年始得自由——曾作了最有名的一本《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文集》第三卷。他在这本书里头，用许多的数字和事实来证明俄罗斯资本主义怎样发展、农民怎样破产等，在许多地方又常表示，俄国工人和农民除革命外，实无他路。自然他在这种环境之中没有很明显地写出来，但是我们精细读之，字里行间，实有这种意思表现。一九〇一年四月，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一篇《工人的政党和农民》。这篇文章开首是描写俄国的农民在一八六一年二月俄皇政府颁布《解放农奴令》以后的苦痛生活状况，他继续就注意这些问题：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出一条路？用什么方法才能改善一部分农民的状况？于是他即很明了地对农民说：“农民要想从资本的压迫底下解放出来，只有倾向于工人运动，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没收土地及其他生产机关——工厂、矿山、铁路等——归于公有而奋斗。”他又时常说：“俄国将来的革命，工人是居首领、指导者的地位，是最前列的军队，若没有多数农民的帮助，他们还是不能达到目的，所以我们应对农民说明：共产主义怎样的比较只占一块小土地好些，共产主义是保证人类的发展，提高人类的生活。”这就是列宁同志在二十多年以前所指示出来的一条很正大的道路——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去奋斗。

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时——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于一九〇三年在伦敦开第二次大会，当时因组织问题和党员资格问题的争论，遂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多数派于一九一八年的第七次大会又改名为俄罗斯共产党——曾采纳一九〇二年列宁同志所定的农民政策，是为该党第一个农民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反对土地赎取法，即农民须付给地价以赎取土地，而采用土地没收法，即直接没收地主等的土地。

一九〇三年三月，他又作一本小册子，叫做《告乡村的贫农》。他这本小册子是用很浅显的文字，说明农民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一定逐渐地破产而去为富农和地主的奴隶，或到工厂里去做工厂主的牛马，所以乡村的贫农要救拔自己，就只有和城市的工人联合起来，共同去行动。他又以为：只将所没收来的土地，平均地分配于农民，还不是一个澈底的办法，因农民只有土地而无耕种土地的资本，则土地势又必逐渐地为富农或地主所吸收。

一九〇五年三月，列宁在《前进报》上作了一篇《无产阶级和农民》。他说：“农民的革命运动已经开始了，各省俱听到农民焚毁地主的房屋和没收地主的谷类及家畜的消息。俄皇的军队在满洲被日本打败后，就只想对于无枪的国民来复仇，派遣军队以攻击国内的敌人——城市的工人和乡村的贫农。城市的工人运动已于革命的农民中得到新同盟者。无产阶级有觉悟的先锋队社会民主党，对于农民运动是有直接的实际意义，他与自己党的组织内和宣传者煽动者去进行时俱须注意到这个问题……要解决

这个问题只有一条路：和贫农联合起来共同去反对农奴制度和地主，和城市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去反对富农和其他的资产阶级——这就是乡村无产阶级的轨道。”他继续着又说：“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它是竭力要将全体的劳动者从一切剥削底下解放出来，帮助一切的革命运动以反对现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组织，所以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工党是积极地维持现时的农民运动，用有力量的革命方法以改良农民的生活，且不以夺取地主的土地为终止的目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既然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它就须坚决地去组织乡村无产阶级的独立团体。并且时常对乡村的无产阶级说明他们和富农之间的利益矛盾性，他们只有和城市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去奋斗反对一切的资产阶级，才能得到真正将乡村的贫农群众从穷困和剥削中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在农民中煽动实际的口号，也就是最能够增加农民在运动中的觉悟力。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为各方面维持一切的民主革命，所以即刻要组织革命的农民委员会。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为维持农民的民主革命的进行及保护乡村无产阶级和富农奋斗的实在利益，所以在农民委员会之中还须组织乡村无产阶级的独立团体。”三月三十日，他又于《前进报》作了一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专政》。这篇文章最后的一句就是说：“我们从俄罗斯的政治革命来演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幕。”果然，经过了十二年半——一九一七年十月——这句话遂见诸事实。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风潮不可谓不高，工人在莫斯科及其他城市俱有武装的暴动，农民在各处乡村中也有很激烈的暴动，但是终为俄皇政府镇压下去。这就是因为那时的工人和农民还是散漫的，没有共同组织的，也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照列宁所指示出来可以推翻俄皇政府及地主和资本家权力的唯一的道路，好好地联合起来共同去奋斗！

一九〇六年四月，多数派——列宁派——因为时势所迫，乃和少数派开联合大会于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列宁曾提出一个农民政策，其重要的几点就是：（一）没收一切教堂、俄皇、贵族和地主的土地；（二）在国民立法大会未规定新的土地制度以前，应设立农民委员会，以没收地主的土地和消灭地主的权力；（三）在一定的政治条件之下，应废除土地私有权，将土地交给全体人民；（四）应该设立乡村无产阶级的独立团体，这就是叫农民对于地主须取直接的革命行动，消灭地主的土地占有权，夺取地主的土地，毁坏旧的权力而建设新的革命力量所在的农民委员会。这些口号对于无产阶级和农民俱很有利益的。农业的革命和政治的改革有很密切的关系，农民若没有实在民主的政治组织和自己来组织政府及警察，他们还是不能保守所夺得的土地。农民除了夺取土地以外，还须按照这条奋斗的大路前进以完成政治的改革，若没有新的政治胜利，必不能够夺取和保持其土地。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以后，为要开辟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预防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运动起见，就须还要消灭土地私有权。但是少

数派的马思乐夫等反对之，蒲列哈诺夫也作部分的反对，且少数派当时曾占多数——因一九〇五年十月的武装暴动失败以后，多数派的执行委员会和受多数派所指挥的工人组织多被解散，党员多被逮捕，所以那时有表决权的到会代表，少数派占六十二人，多数派占四十二人——所以竟否决列宁的意见。不过各处的革命进行，还是不服从少数派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听从多数派列宁格勒的委员会的指挥。

后来俄皇政府乃采纳内阁总理斯托柳宾的意见，实行新的《土地改良法》。但他这种只有使地主和富农得到利益，而劳动的农民群众就没有福气享他的好处，他对于中央俄罗斯有革命性的小农的政策，就是于西比利亚和土耳其斯坦等处收集许多好的土地，定了优待的条件，以奖励他们移住。列宁当时就说：“这种方法不但不能改善农民的状况，而适使他的生活日趋于恶劣。”他又说：“在俄国农民的面前只有两条路：保留许多地主的经济，使他逐渐地变成资本主义的经济，或用革命的方法以破坏地主的土地占有权。”斯托柳宾是极力要使俄国向第一条路走，保护地主的经济使不致于消灭。而列宁为农民群众的利益计，所以竭力主张破坏它。他说：“我们应反对地主形式的资产阶级进化，而赞成农民形式的资产阶级进化”。他对于移民的意见，以为移民法，还是不能够解决农民问题，只有混乱那边的租税法 and 惹起其他民族的仇恨心。他又说：“若只于欧、俄和地主的遗迹上而行改良，那就是使俄国的农民增加地主和专制政府的压迫。”

一九一四年俄国和德国开战后，农民问题就沉寂下去了，没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了，一切社会运动俱陷于很困难的地位，大部分的社会主义者，俱染了“保护祖国”的爱国毒，完全忘记了本阶级的利益，而愿意牺牲一切以保护本国的资产阶级。法、德大部分的社会民主党及俄国的少数派和社会革命党，统统是向着这条路跑的。独列宁极力反对这次的战争，告诉劳动群众，须立时起来，将各国间的战争变成各国内部的战争，劳动者和剥削者的战争、即所谓“以战争反对战争”。他曾说：“这次各帝国主义者强盗式的战争，欧洲的人民一定蒙着很大的损失，也就是资本主义破产和社会主义的革命即要爆发的时期。”不久，在专制的俄罗斯，因为食粮的不足和战场上的失败，遂发生了二月的革命。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列宁还在国外，四月三日晚上才回到列宁格勒，次日即在多数派大会上演说，他的题目，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责任》。其中有说：“我们应该从第一步——政权在资产阶级手内——来走第二步——无产阶级和贫农应该夺取政权……没收地主的土地，并没收一切的土地交给贫农和农民代表的苏维埃管理，且于各大产业之中而建设公众的大经济。”他的意思，以为如此，则一方面农民有了组织，就可以免去内部的纷乱；他方面就可以消灭地主的经济势力，免得他们有所凭依。

五月二十二日，他在列宁格勒且夫利欠斯基王宫内所开的全俄农民代表——实在其中以地主富农及商人占多数——大会上，用很简单、很明了的口号来表明多数派的政策和革命的目的。于是一般素来被惑于少数派的谣言的农民始大大觉悟起来，群集于多数派的旗帜之下而听他指挥，各处农民的暴动——驱逐地主、占领土地等——日见膨胀。但是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还在那边一方面继续地制造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而他方面则派兵去镇压农民！

十月二十六日——俄旧历——临时政府推倒之后，即公布两个很重要的命令：《和平令》和《土地公有令》，这就是列宁按照当时工农兵的需要而发的。这个《土地令》，就是说废止土地私有权，没收地主、皇族和教堂等的土地，在立法大会未召集以前，应交给区土地委员会及县农民代表苏维埃管理，该机关等应按照农民提出要求，斟酌执行。但列宁以为这个《土地令》系临时的性质，苏维埃政府应立即制定更详细的《土地法》，于是新的《土地法》乃于一九一八年二月公布。

一九一七年革命初起的时候，全体农民，俱能结合起来以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列宁当时就说：“在现在土地尚未夺回、敌人尚未推倒的时候，所以有这种现象。到了他们得到了胜利，利益的冲突就会表示出来，那么，这种关系就不能维持下去。所以贫农及乡村的无产阶级应立即起来组织独立的团体，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他又告诉城市的工厂工人说：“凡是有觉悟的工人，俱不应该忘记了自己在乡村内做工的困苦的弟兄，应该帮助他们独立组织本阶级的职工会，引导为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而奋斗，为保护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他又说：“贫农和乡村的无产阶级是苏维埃政权在乡村内的砥柱。”一九一八年春，依列宁的主张又创设了乡村的苏维埃经济，使一般贫农和乡村的无产阶级俱受农业专门家的指挥加入工作，以为周围农民的模范，并且还时常告诉他们，应和邻近的农民发生很密切的关系。

当《土地改革法》开始实行的时候，投机的富农即将较好的土地占领了去，列宁于是即建议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用法律来规定组织贫农委员会。恰巧这时——一九一八年，夏捷克人——白党——占据了俄国出产粮食的中心点，而投机的富农又将粮食囤积起来，故意提高价目，于是粮食大起恐慌。是时列宁为维持苏维埃政权计，为供给红军、城市的居民及贫农计，乃不得不采取军事共产制，将农民的余粮一律征收。

贫农委员会当和富农争斗终了之时，又开始和中农挑衅。那时列宁很注意此事，一九一八年秋间全俄苏维埃大会时，即议决解散贫农委员会。一九一九年三月第八次共产党大会时，又采纳列宁的意见，议决对待中农的议决案。他的提议中有说：“在经济落后的俄国，乡村中的中农是有较坚固的经济基础，所以无产阶级和他们必须有长时间的协作……中农不属于剥削者，因为他们不是从他人的劳动得到利益。社会主义

的国家必不可失了这个小生产阶级……苏维埃政权不应对待他们有什么强迫的举动。否则，只有增进他们反新颖的心理，致得不好的结果……社会主义的国家，对于农民的帮助应该竭力推广开去，最主要的即须以城市的工业品供给中农，且宜偏重于改良农村经济的工具、种子及提高乡村的文化、改良农民的生活条件……地方苏维埃应找出可能的方法，给贫农和中农以实在的助力。”

俄国因为和德国战争以后，即继以口地主资产阶级的内国战争，再因为各帝国主义者的种种反苏维埃运动，致使国内的战争又特别地延长下去，所以农村经济完全破产。同时农民因为他们所收获的粮食，除出自己所需要的以外，俱须交给国家，而国家那时又因工业的大破坏，已无能力将工业品供给农民，以交换其农业品，农民于是又不愿意多余耕种，故一九二〇年遂发生了大恐慌。是时白党又乘机煽惑，农民暴动的消息于是时有所闻。一九二一年三月第十次共产党大会，乃采纳列宁的提案，议决废止《食粮征收法》——又名《食粮均配法》——而采用《食粮纳税法》。于是农民所收获的食粮，除了一小部分的租税，所剩留下的，他们就可以自由处理它，所以他们因此俱竭力去耕种土地，而工人和农民间的联合乃也因之而巩固。一九二三年四月第十二次共产党大会，又由列宁提议，通过《租税划一法》——此时列宁已在病中。

当食粮政策改变的时候，列宁就很注意地分析合作社的发生和发展，所以第十次共产党大会上会同时议决组织合作社。以后又时常说：“共产党应去学习经营商业，以从事于合作社。因为合作社是和私有资本奋斗的一种最有力量的机关。”他在病中又发表了两篇关于合作社的短文，但是这两篇短文的影响实比资产阶级的学者所做的几册大厚书还要大得多。他曾说：“快去组织农村经济合作社，因为它是对于农民渡到社会主义里去的许多桥梁之中的一条。”又说：“倘若合作社——消费、农业经济及工业等——现在已经普及于全体人民，那么，我们两只脚已俱踏于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了。合作社对于乡村的重要点还是在于提高农民的科学程度，若农民的科学程度不能提高，那就无论什么社会主义俱是达不到的。”他对于提高农民科学程度的问题，曾时常有注意到，所以他在病中的时候，还提出改善农村学校和农村学校教师的意见。他曾说：“国民学校的教师是可以使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联合更见巩固。”

第十二次共产党大会，曾将农民问题列于第一项，他们以为工业和农业应该使它同时发展，所以当时就有所谓“剪刀政策”。那就是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而减低工业品的价格，使城市和乡村接近，使工厂和田野有实实在在的联络，也就是使无产阶级和农民有很密切的联合，以期共同努力来建筑这条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大桥梁。上次全俄苏维埃大会，又议决组织农村经济银行以帮助农民及改善税法以减轻农民的负担。这次大会列宁虽然没有到会，但是这些议决案，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忘记了列宁所说的

“我们若没有农民，是无论何时俱不能达到共产主义”一句话。苏维埃政府以后的农民政策自然还是照列宁所指导的路继续地进行。

列宁不但对于俄罗斯的农民有很大的意义，就是对于全世界的农民也有极重大的意义。他于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时，曾提出一个农民政策的纲要。不过此处为篇幅所限，不能将它介绍给读者，所以只好请读者自己去参看俄文本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记录，或中文本成则人先生所译的《第三国际议决案及宣言》。以后他又提出一个“工人农民政府”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号召全世界被压迫的农民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去和他们自己的剥削者奋斗。去年所组织的国际农民苏维埃，也就是列宁预先已确定它的基础。唉！列宁死了，而列宁的伟大事业还是继续地进行，不但共产党，就是工人和农民，俱将继续他的事业，为自己的自由及建设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列宁与青年

任弼时

列宁死了，而列宁主义永存！列宁主义是被压迫阶级求解放的武器，是全世界共产革命成功的唯一工具，是资产阶级——一切统治阶级——催命符。简言之，列宁就是替人类建设真正平等、自由社会的首创者。列宁主义就是达到真正平等、自由社会实现的工具。

青年是老年的替代者，是社会的建设基础。某一阶级的青年，乃为拥护本阶级的后备军，所以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子弟恒教养以怎样维持资本主义的阶级教育，无产阶级对自己的青年子弟，亦教养以为本阶级解放的政治教育，以培养自己的新基础而达到解放的目的。各阶级利益根本不同，故各阶级均有自己不同的教育对象和教育方法及形式。

列宁在自己一生革命工作中，虽然没多的时光去参加青年工作，但是他对于青年人的作用，认识得异常明白，对于青年教育所指明的对象、形式、方法，没有再确切的了。他时常对一班青年说：

现在年近五十的老辈，他们一世，未见得能看到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之实现，但是现在年仅十五六岁的青年，他们一定是能够目睹共产社会的而且是参加共产社会建设的一份子。不过这辈青年，应当要明白他们自己终身的责任，就是在于这个新社会的建设！

我们从这一小段谈话之内，就可以知道列宁对于青年的认识和希望以及他所指明出来的青年应有的责任。列宁并未尝把被压迫的青年，尤其是青年工人与工人阶级分开；他以为对于青年，总要多加原谅，特别注意加以指导和培养。他说：

无产阶级成年人的政党，一面须指导群众作阶级斗争，同时又应教育群众，

因之须处处应特别严格。然而青年组织本来是处于学习地位，他的责任，就是要从青年中给社会革命的政党预备能工作的人才，因此对于他们，须特别设法帮助其发展，对于他们所做出来的错处，总须十分忍耐地去纠正他，须让步地感化他，而绝对不应以极严格的手段去对付。

列宁接着又说：

有许多年长的人，往往不会对付一般青年幼辈。我们应知道，青年幼辈去接收社会主义，绝对不会像他们的父辈一样的方法、形式、条件和环境。因此，我们应当要主张青年人有组织上的独立权。这也并不是我们要表白我们不像第二国际改良派的那样害怕青年组织的独立，而是在事实上确有独立组织之必要，因为他们没有独立的组织，不能够培养很好的社会革命者，换言之就是不能够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

当欧洲青年运动非常幼稚的时候，列宁与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极力做宣传青年的工作。因为那时西欧军国主义异常发展的时代，列宁看见当时的社会民主党的势力极弱，又近于妥协，所以他乃主张从青年中间着手，教育青年以革命的教育，使他们仇视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国主义。那时他在青年出版物上作了如此的文字宣传，西欧青年活动，得他的助益不少。

当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欧洲大战决要发生的时候，全欧人民均为战争所包围，此时列宁对于青年运动特别注意。当时在瑞典、挪威、荷兰、瑞士以及其他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为消免战事，初则主张改国家常备军为民警，或是人民普通的武装，后来见武装之不免危险，大家都一味主张解除一切武装。对于这个问题，在欧战发生后二年——一九一六年，列宁做了一篇反对的论文。他说：

我们现在尚生存在有阶级的社会，除开推翻统治阶级，实行流血的阶级斗争，是另无别途。所以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武装占领生产机关，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

列宁知道帝国主义是要强迫青年去为它牺牲的，平时资产阶级是绝对禁止青年接近政治斗争，但是对于自己有利益的事业，它便拼命地武装青年，去做保护自己的牺牲品，如欧战时的德国，便征募十六岁的童兵，其他国家亦有如此之现象。列宁知道

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要讲解除武装，也是一句欺人的话。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怎样在军队中去作宣传，须将资产阶级的军队，变成无产阶级的武器，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列宁又说：

现在军国主义之发展已成为社会之普通现象，帝国主义就是互相争夺土地、瓜分世界、残惨恶战的主动，世界各国无论是中立国，或是弱小国家，在最近的将来，必然都会军国主义化。在这种情形之下，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呢？如果只一味反对战争，主张解除武装，那就恐怕是极大的错误。在这种情形之下，无产阶级应当对自己的子弟说：“你快要年长成人，给你以武器，赶快去学习军事常识，这是我们无产阶级必需有的科学。教你武装学习军事常识，并不是要你去打你的兄弟们，杀外国的工友们，好像现代战争和反对社会主义者教你们去打仗一样。而是教你去反对本国的资本家，去抵抗一切压迫贫苦和为资本家利益的战争。我们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就纯靠自己去战胜资本家，解除资本家的武装，绝对不是和平方法可以达到目的。”

列宁对于青年，素来不取冷淡任意的态度，但是又不故意地夸奖，并且时常劝戒过于夸奖青年的人，以为过于夸奖是有害于青年的。他说：

我们不应当过于夸奖青年，但是有许多年老的同志，时常忘记这点重要，随意去虚伪地夸奖，这是有害于青年本身的！

列宁知道青年的作用和责任，但是他更能指明青年人在某种环境或时代的作用和责任。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他在俄罗斯少年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上说：

我们可以说现在俄国青年人目前极大的责任，就是怎样去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在旧式资本主义社会里长大的成年，最多能将建筑在阶级压迫上面资本主义旧制度根本推翻，或者能够勉强建立一个新社会制度的骨骼，帮助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保持政权。建立一个基础，而靠这辈新生的青年，在这个没有人与人间压迫的新条件和环境的基础上，去努力建设新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就是指明在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底下，青年目前的根本责任。列宁的意思，以为青年要能尽他的责任，就纯靠自己去努力“学习共产主义”。但是列宁随着提醒青年不

要把学习共产主义像资产阶级青年学习一样，仅仅明白书本和杂志上一点皮面的共产主义常识，知道几个新名词而已，而且要从共产主义奋斗中才可以求得真正的共产主义。他说理论是从事实中产生出来的：

当然，我们脑筋里所想要“学习共产主义”，就是要懂得那些共产主义教科书、小册子和旁的著作上的记载的学识，但是仅作如是想象，那就未免不够。倘若我们学习共产主义，就仅只要懂得那些书本上所记载的，那么就很容易变成共产主义的一知半解者，这倒对于我们有莫大的损害，因为这样由书本上研究主义的人们，他们不会将所得的知识连贯起来去应用于事实，这非共产主义所真正需要的。

从旧式资本主义社会遗留给我们一个最不好而最可怜的病根，就是书本与实际生活隔离。因为我们知道书本上，多半是记载一些不可靠的东西，因此仅从书本上去了解共产主义，这是一种极大的错误……没有实际工作和奋斗，从共产主义书籍中所有的书本知识，也是等于没有多大的价值，因为也是像资本主义旧社会理论与实际隔离的书本一样没有分别。

列宁这段话就是警戒一般青年，不要纯靠从书本上、学院主义式图书馆内闭门研究理论。凡是一种理论和科学总要能适合于社会上的需要，我们研究一种理论或科学，如果不能有益于社会，这是等于不认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有碍人类社会之发展。同时要明白，理论与科学并不是从脑筋造起来的，而是由于时间、空间经过许久所得来经验的结晶体，所以我们要求适用的智识和科学就需要注意日常生活，从日常奋斗中去寻求。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亦即列宁所具体揭破资产阶级黑暗教育、指导青年的科学研究方法，以期人类社会能迅速发展的要道。

资产阶级为求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之永存，不独教化自己的子弟，使他去继续维持将来的政权和旧制度，并且想许多教育方法，使一般非资产阶级的青年也能做他永久的奴隶，不致反抗自己。故资产阶级的学校和教育之本质，均是建筑在自身利益的奴隶教育上面，而美其名曰“爱惜平民”“普及教育”，以遮饰一般不识之徒。其实平民受了这种教化，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永世奴隶犹不觉。列宁对于资产阶级所设学校有以下之批评：

……旧式学校（指资产阶级的）时常表白自己是造就人才、培养科学智识的机关。然我们知道这是一种骗人的话，因为旧式社会是建筑在有阶级——被压迫

阶级和压迫阶级——的基础上的，所以一切旧式学校当然是根据于阶级利益和精神的所给的智识，仅有利于资产阶级和它的子孙，因为每种教材都是依着它的利益而编定的。

在这些学校受教育的青年工、农子弟，也不过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家要教育他们，无非是培养一班很驯服的奴仆，使他们能善于工作、多出利润，同时不至于反抗自己……

这种批评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资本主义垄断思想确是一种可怕的现象。它们不仅垄断本国内青年思想，并常常到国外去做垄断思想的事业，以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锋，中国教会学校，即为美国侵略中国之表现。

但是我们要明白，某种新社会和制度之产生，并不是与一切旧有社会和制度毫没有继承关系突然创造出来的，而是从旧社会和旧制度化身的结果。所以我们对于旧制度虽然根本反对，然而对于旧社会所遗留的科学和文化，也有可采用地方。因为那些科学与文化是一种人类历史产物，我们要革新旧的设施，必须根据旧有的产物而加以去取地选择。列宁又告诉我们说：

无产阶级的科学和文化，并不是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称无产阶级科学和文学专家脑袋里乱想出来的，而是由资本主义压迫社会之下，人类所集储的知识有系统发展出来的结果。

我们时常听到有许多青年或是新教育家，毁谤旧式学校，说它是一种废物。……我们就对他们说：我们应当择其善者而取之，共产主义者应当要收罗人类所创造的智识，方才能够考察整个社会统体。我们收罗在脑袋里，而并且要取它来分析批评，去掉不需要的成分而使自己有丰富实际的智识，这才可以算一个真有学问的人。

倘若一个人要研究一种主义，而仅利用那些陈语、套话，而不加以详细思索、考虑，不溯源寻根，也不加以批评，那么这个研究主义的人就未免太含糊了，这种只顾外面的人，终久是要失败的。我们平常总要有这种态度和精神：倘若我知道，则总要觉得还不足，必须更进一层求其能多得，如若有人说他是一个某某主义者，用不着再加研究，这样的人将来是没有用处的！

我想这几段话正合现在中国一般浪漫色彩青年的思想和行为，这就是一种不顾实际的空想者，或是害了夸大狂病的想象，也确是普通青年一生所必经过的历史表现。

然而要不注意改变，对于个人恐终久难免失败，对于社会是一种不真诚的表现。

列宁时常注意青年的道德观念，本来道德的真意义在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存在的余地。因为阶级的利益不同，统治阶级所有的道德观念即为保全资本制度，不侵犯私有财产，不反抗资本家……这完全是如保护资产阶级的法律一样，是对付无产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本身利益不同，故其道德观念也显然与资产阶级相反。列宁指出青年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我们所说的道德：就是破坏一切统治阶级的旧社会，结合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又说：“无产阶级道德，就是联络劳动群众去反抗一切压迫，反对一切私有财产，因为私有财产是霸占社会劳动，压迫旁人的表现和工具。”

这种无产阶级道德观念对于资本家，当然是有莫大害处的，所以他们时常诬骂无产阶级不讲道德。列宁又解答为什么无产阶级不讲资产阶级道德的原因：

我们反对资本家所倡的道德，因为资本家所采用的道德，是从《圣经》里面选出来的，我们当然是不信什么上帝的，我们从来知道贵族、神甫、资本家都会利用“上帝”的“道德”去压迫人家而取得利润。有时资产阶级的道德是一种理想或半理想的空话，其实也和上帝的《圣经》一样。这种理想的、空洞的道德我们是反对，我们承认这是一种欺骗行为，这是想要为资本家或地主保护利益来愚弄工农的一种方法。旧社会是根本建筑在阶级压迫上的，我们的道德就是要破坏这样的社会，要联络我们的劳动阶级。

总之，列宁的道德观念，完全是立脚在被压迫阶级利益上头。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是保护资本家和其制度，他便明说无产阶级道德，也不过是一种保护自己利益的工具，是求共产主义实现的无产阶级道德观念，他所主张的教育学说科学也都是站在无产阶级利益上面的。这也就是他要讲“学习共产主义”的方式。

青年人因受旧社会洗涤的程度较成年人少，所以他们的思想是容易纠正，加以青年富于感情和革命性，所以在社会是应当有极大的作用，社会之进步及新社会创造良好与否的责任，都是摆在青年肩上不可轻易放的。因此青年对于社会问题须特别注意和参加，并须集中其力量有统系地参加，方能真正帮助社会。因此列宁复说：

无产青年是新社会的建设者，他们的肩上负有莫大的责任，但是青年人要在社会上能得人们的信仰，必须自己有组织完善、纪律严肃的团结。

接着又说：

无产阶级青年组织，应当是极有力量的团体，他对社会上一切事业，都须有帮助，并需要站在领导的地位。青年团体所办的事业，要使工人能够一看就可以知道是对于他们有益，指导他们到自由之路的，那怕工人还没有相信主义或并不赞成主义，然而总要能使他们看到青年团体所办的事业，便表示要来亲近才好。

要有团结才能为社会服务，我想这是至理明言，谁都不敢否认，但是现在我们中国的青年界是否有团结，这也是非常明了易见的，这也就是中国青年界放弃责任的表现。

我们上面所写的看来，就可以知道列宁对于青年的注意。列宁应然没有长时期亲身参加青年活动，然而他时常把无产青年看做是无产阶级全体的一部分。所以他在某种时间和空间，都能将青年归并于全阶级的活动，并能指明青年活动所应注意之特别点，以期适合于阶级斗争的全体。

总之，列宁对于青年是抱有莫大希望的，而青年则应能容受他的期望，去研究他遗留给我们的宝贵品——列宁主义，要知道这是求解放的唯一武器。

中国青年界！列宁指教你们的方针，你们觉得怎么样？

在伟大的墓之前

蒋光赤

在茫茫的人海中沉落了一朵光明闪烁的浪花，
在克里母宫的城下长卧着一个今古无比的伟人；
历史故意地遗留下这一堆黄土——永远的纪念，
也不知要引起了许多悲痛、哀感、凭吊和歌吟！

我不以死为人生的悲剧，
我最可惜造福人类的人不能长生；
纵让全世界无产阶级号天痛哭，
也哭不醒最亲爱的、无知觉的墓里人！

列宁啊！你生前有改造世界的天能，
你的死难道也如昙花泡影的永逝？
你或者安安稳稳地卧在克里母宫的城下，
远观世界革命的浪潮，近听赤城的风雨？

列宁啊！你的功业如经天的红日，
我要歌咏你罢，我又何从歌咏起？
你的墓是人类自由的摇篮，
愿你把人类永远摇到自由乡里去！

——录自《新梦·临列宁墓》

一、去年今日

时间真快，如风车也似地飞转，不觉又是一年了。

今日是列宁——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领，去世的周年纪念。在这一年之中，我总常常想到那列宁死后的悲哀，那永远不可忘记的悲哀。去年今日我在莫斯科，今年今日我在中国，空间的距离不可谓不远，时间的距离也不能说太短。但是那列宁死后的景象，那列宁殡葬时的炮声，那工人、农民、学生……的悼歌，那用笔墨言语形容不出来的严肃、沉痛，宛然在我的耳里、眼里，紧紧地固着在我的心里。

我还记得列宁死之前一日——大约在晚上罢？我同几位朋友——他们都是外国人谈论到历史上的人物谁个伟大些，谈论到十月革命的成功，谈论到列宁的天才与无产阶级革命，谈论到列宁与被压迫的东方，并且谈论到列宁的夫人克鲁布斯加牙，她如何地与列宁同受甘苦……把列宁的一生都谈论到了。我们说到列宁的病，列宁的能好不能好，列宁的病是革命的不幸，我们的不幸……大家都呈现着无限的悲感！可恨的病魔！可恨的那行刺列宁之社会革命党的女党员！可恨！……

当时我们没有一个人说列宁要死，我们不愿意说，我们不忍说。我们都是无神论者，我们不是上帝的信徒，但是我们却暗地里祷告，祷告列宁的病快些好，快些好！

我说一句实在话，我从没有关心过别人的病像关心列宁的病一样亲切，列宁是谁呢？列宁的病为什么值得我这样关心？不，我说错了。全世界爱自由的人们，主张人类解放的人们，被压迫的人们，都如我一样关心列宁的病，他们也祷告，祷告列宁的病快些好，祷告列宁永远康健！但是列宁的病为什么值得他们这样关心呢？这不必问，他们自己会说出这个理由来。

我们希望列宁的病快些好，祝列宁永远康健，因为他是现在世界中最有用的一个人，因为他指导我们到光明的路上去，因为他是社会革命的象征。但是希望是无用的，千千万万人们的希望战胜不过自然的法则，“脑髓之呼吸的中心停止动作——绝顶睿智思想的中心窒息了”！这的确是一件憾事！为什么在科学无能为力的地方，怪事是不会完成的呢？

列宁不应当死，列宁更不应当早死！但是列宁死了，列宁更居然早死了！

列宁死了！……

今日是革命首领去世的周年纪念。我今日虽在上海，但不能不想起去年今日的莫斯科：

“列宁死了！”有一个朋友对我说。

“什么？”

“我得到确实的消息，列宁已经死了。”

我听了这个消息——好一个不幸的消息！莫明其妙说什么话好，似觉顿时神经失了作用。但是还自语自问地想：

“这个消息不的确罢？这个消息是不应当的确！……”

各机关都悬起哀悼的黑边的红旗了。街上往来人们的面孔上，都呈现着很深刻的悲戚。他们中多数的衣袖上缀着一块黑边红心的布条，我后来也得到这么样一块布条缀在衣袖上，这是说列宁已经死了！列宁真正地死了！

二十二日列宁的灵柩从哥尔基村运到莫斯科来，哥尔基村的农民在后面成群结队地哭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长加里宁、第三国际会长季诺维埃夫、《真理报》主笔布哈林……亲自到车站去抬灵柩，无数万的人们望着灵柩落泪，有的竟放声哭，为什么哭呢？父亲死了，焉得不哭！灵柩抬到劳动同盟社安放，政府为着要使革命的首领与民众更亲近，为着要使工人、农人……与革命的首领为最后的辞别，为着革命的首领永远留在群众的脑海里，议决开放三日，使人人得睹列宁死后的面貌。

这几天莫斯科的人比寻常至少要多一倍。各地派来工人的代表、农民的代表、红军的代表，……挤弄得没有房屋可住。他们从那俄罗斯的内地来，他们代表全俄罗斯的工人、农民、一切群众致奠于首领的灵柩之前，表示无数万万人们的心灵对于人类的导师之哀悼。他们冒雪而来，来到莫斯科与他们所谓亲爱的伊立伊奇（列宁的名字）作最后的晤面。他们大约有无限的伤心罢，或者这种伤心是世界上最深刻的伤心。

我住莫斯科三年，从没遇过这几天气候的寒冷！寒度降至零下四十，街上几无行走的可能。但是各地的代表、莫斯科的群众，为着要晤列宁的一面，为着要在灵柩前表示哀悼的心情，居然不怕寒冷，在街上成行成队地排着，至少也要三个小时，才能达到灵柩安放的所在。天气既这般的寒冷，在冰天雪地里站立三四个小时，若无很激烈的热诚，很坚强的忍耐，很结实的信仰，谁也不能够啊！冻僵的也有，冻得说不出话来的也有，冻倒了抬到医院里去的也有，我亲眼看见了许多。他们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般受冻？他们要看列宁，他们情愿地受冷！

一队一队地经过列宁的灵前，人太多了，没有停立久看的可能。大家眼里含着泪，——不，有的竟放声哭，那心肠慈弱的女子更不待说了。口里唱着悲哀的悼歌，这悼歌真表示出人间最伟大的、最深邃的悲哀。

在无数万人们的泪海中，在无数万人们的哀歌中，我们看出列宁的伟大，我们看出历史上再没有更比列宁伟大的一个人。

二十七日，红色克里母宫的城下，埋葬了一个今古无比的伟人。

列宁埋葬在无数万人们的泪海中，埋葬在无数万人们的哀歌中，埋葬在无数万人们的心灵里。

这是去年今日的事。

时间真快啊！如风车也似地飞转，不觉又是一年了。在今年的今日，我想起去年

今日的事情，想起那无数万人们送葬的情形，想起那时候天气的奇冷，想起那列宁的灵前堆积如山的奠花，想起那难以言表的悲哀，更想起那白发老妇人克鲁布斯加牙——列宁夫人的演说……

二、苏俄的创造者

哦，我的亲爱的母亲！苏维特的母亲！
哦，美丽的、快乐的时代之摇篮！
你是自由的、光明的海岛，
你是巨钟，作唤醒奴隶的狂喊。
你脱离了那蒙古的、亚细亚的、
万恶沙皇的、奴隶的铁锁；
你抛却那市侩的、惧怕革命的怀抱，
来过这公道的、共产的生活。

——择译沙度维叶夫《俄罗斯》二节

哦，是的！新的俄罗斯是美丽的、快乐的时代之摇篮；新的俄罗斯是自由的、光明的海岛。

哦，是的！旧的俄罗斯处在蒙古的、亚细亚的、万恶沙皇的制度之下；旧的俄罗斯是黑暗的、野蛮的帝国。

我们把新的俄罗斯与旧的俄罗斯比较一下，我们不得不喊新的俄罗斯是最可爱的，新的俄罗斯是自由的、光明的海岛！我们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望望将来，不禁觉得过去的俄罗斯之令人惧，现在的俄罗斯之令人爱，将来的俄罗斯之更令人希望。

我最亲爱的苏维埃俄罗斯呀！在茫茫的世界中，我只在你这块土地上找得点公道、正义，我只在你这块土地上看见劳农的群众们脱离了奴隶的生活，我只在你这块土地上听不见那资本家、地主、贵族、军阀的恶声。苏维埃俄罗斯不是诗人幻想的乌托邦，不是毫无缺陷的共产社会，不是那宗教天国，……但是劳农的祖国，是世界革命的发源，是被压迫人们的护符。

但是追溯苏维埃俄罗斯之由来、苏维埃俄罗斯产生的过程，我们就不得不起那已经死了一年的列宁——革命的首领、人类的导师、苏维埃俄罗斯的创造者！不错，历史不是个人所造成的，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其成功当然不是列宁一个人的力量。说列宁是苏维埃俄罗斯的创造者，似觉有点不妥当。但是，我们要知道，若每个人能彻察历史的进程，顺应群众的心理，代表群众的愿望，使自己变成为群众的象征，使自己变成为群众的集体，则说他即群众，群众即他，有什么不可以呢？十月革

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但是列宁是无产阶级的化身。苏维埃俄罗斯之能产生，是因为劳农的努力，但是列宁是一个总指挥，列宁一身具有劳农的睿智，他能引导劳农到成功的路上去。

我们说列宁是苏维埃俄罗斯的创造者，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们一提到苏维埃俄罗斯，就联想到列宁，一提到列宁，就联想到苏维埃俄罗斯，这的确因为列宁与苏维埃俄罗斯有不可隔离的关系。那无数万的工人以列宁为父亲，那无数万的穷农以列宁为救主，——在群众的意识中，已经坚固地承认列宁是苏维埃俄罗斯的创造者了。

我们提到列宁，提到苏维埃俄罗斯，又不得不联想到被全世界资产阶级咒骂的过激党——共产党了。共产党是列宁一手所创造的党，是在列宁指导之下，从事建设苏维埃俄罗斯的党；现在列宁虽死了，这个党还是照着列宁主义，进行列宁所未做完的事业。现在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即没有苏维埃俄罗斯，共产党是苏维埃俄罗斯的砥柱，是劳农的罗盘。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但是我们要知道，它是列宁一手所造成的。

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大会——在一九〇二年——一般的情绪均有将劳动政党变为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政党的趋势。当时列宁见着这种危险，毅然反对著名首领马尔托夫的主张，以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如铁一般的结实、统一，它的党员应守无产阶级的纪律。结果，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就从此形成，将来十月革命的首领列宁亦就在此时预定了。

列宁极力与少数派主义奋斗，极力使多数派的政党在不公开的状态中巩固，极力主张指导罢工的运动为劳动阶级谋利益。在第三次大会中，列宁已经很明确地预定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革命之不能避免。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在反动的政潮下，一般从的革命分子发生颓废的情绪，许多的社会主义者或遁入秘密的天国里，或滚到资产阶级的怀抱里，或为神秘哲学的探讨，——总而言之，他们失望了，他们不愿再革命了。但是列宁却高声地呼喊：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被压迫下去了；但是革命还未消灭呀！”

在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之间，因着列宁的努力，多数派已形成很坚固的、很实在的工人政党。少数派时时刻刻背叛劳动阶级的利益与资产阶级为无耻的妥协，而多数派却未曾一秒钟不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

帝国主义国家分赃的大战爆裂了！……

应当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之社会主义者至此抱什么态度呢？

有的失了魂魄，无所措手足；有的直接背叛了社会主义，滚入资产阶级政府的怀

抱；有的置之不问，依违于两可之间。他们帮助劳动阶级的互相残杀，他们为资产阶级的祖国做忠仆，他们把什么阶级利益、劳动阶级无国家、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抛到那九霄云外去了！他们……社会主义者！

仅仅一个列宁是无产阶级的救星！他深明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内容，他宣言不但反对战争，不但承认资产阶级战争对于劳动有害无益，并主张将资产阶级战争化为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无产阶级革命。

欧洲的大战真给了俄国的劳农以无穷的痛苦！

面包呀……土地呀……和平呀……工厂呀……

在这一种喊叫的声中，列宁指示了劳农一条超生的道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把政权拿到劳农自己的手里来！

那违背劳动阶级的少数派，那自称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他们在二月革命登上政治舞台了。但是他们上了台之后，所给与劳农的是一些什么呢？工人要求的是工厂，而他们所给予的是帮助资本家压迫工人；农民要求的是土地，而他们所给予的是惩罚扰害地主安宁的农民；大家要求的是和平，而他们所给予的是帮助资产阶级继续战争；大家要求的是面包，而他们所给予的是枪弹。这是他们的罪过呢，还是他们的不聪明？

他们不能代表劳农的利益，无论如何，是不可讳言的了！

只有列宁，只有列宁的党能够偿还劳农的愿望！

“一切政权统归苏维埃！”

列宁发出这个口号，多数派遵照这个口号进行，一切农民、工人跟着走，于是结果开了一朵十月革命的鲜花！从此俄罗斯变为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的劳农跃上统治的地位，一切土地、工厂……都夺回到劳农的手里。

哈哈！只有列宁，只有列宁所手创的党——共产党能够偿还劳农的愿望！

俄罗斯的劳农从黑暗的地窟里跳上光明的大道，脱离了奴隶的羁绊，而得到自由的生活，这虽然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但是也大半由于列宁，由于列宁的党之指导得力吧。俄罗斯的劳农当然永远忘却列宁不了，当然永远把列宁埋葬在自己的心灵里！列宁的死引起全世界劳农的哀悼，但是俄罗斯的劳农比较着更多流些热泪，更为伤心，更为沉痛！这并不是因为列宁于俄罗斯的劳农厚待些的原故，而是因为俄罗斯的劳农比较任何一国的劳农感受列宁的恩爱更为直接些。

新俄罗斯是美丽的、快乐的时代之摇篮，而列宁是此摇篮的奶娘。

新俄罗斯是自由的、光明的海岛，而列宁是此海岛的开辟人。

海岛的开辟人呀！你将与海岛以并存！

三、世界革命的大旗

你的心是人类的洪钟，
你的心是红的、活的大旗。
哦，世界鹏鸟呀！
你飞腾时羽翼掩了大地。
你雄立在那山之高巅，
向那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狂喊：
“万国劳动者联合起来啊！
来！来随我开辟那幸福的乐园！
来！来随我向这旧的世界决战！”

——译卡金《列宁》一段

倘若列宁之死仅能引起俄罗斯的劳农之哀悼，倘若列宁之死仅能博得俄罗斯之热泪，则我们将不能说列宁是世界革命的首领，是全人类的先师了。但是列宁之死却引起了全世界劳农之哀悼，博得了全世界劳农之热泪。列宁死的消息传出后，我们无论在地球的那一个角上，都听着人们的哀悼，都寻着人们的泪痕。

“列宁死了！
亲爱的列宁死了！
……”

但是同时随着这种哀悼流泪的音流，我们又听见欢笑、愉快、诅咒的声波，——这是全世界旧的势力、旧的阶级、旧的分子对于列宁死了的表示！

倘若列宁仅被俄罗斯的资产阶级、贵族、神甫……所诅咒，而他的死仅引起俄罗斯的资产阶级、贵族、神甫……之欢笑、愉快，则我们又不能说列宁是世界革命的首领了。世界革命是对于世界的旧制度总推翻，世界革命的首领是消灭旧世界的催命大将军，列宁自然要为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贵族、神甫所诅咒，列宁之死自然要引起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贵族、神甫之无限的快乐。

于是全世界劳农的悲哀与全世界统治阶级的快乐同一高的程度！

在这两种悲哀与快乐并行的声中，我们深深地认识，认识了列宁对于人类的意义，认识了列宁是一个不可比拟的伟大……

十月革命虽然发生于俄国，但是十月革命的意义则不限于俄国，它是全世界革命的开始。十月革命如法国大革命一样，法国大革命开辟了资产阶级统治的世界，十月革命则开辟了无产阶级统治的世界。虽然十月革命未完成世界无产阶级统治，未把全

世界的资产阶级推倒，但是它开始了世界革命，它还在继续着前进，全世界资产阶级消灭之时，就是它完成的最后。倘若谁个说十月革命是俄国一国的革命，与世界没有什么大关系，则就未免不了解十月革命的真价值。世界经济的、物质的发展将全世界无产阶级合成一个整体，再不能有严密的国界的、地域的分别。所谓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到了现在，不但是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本来接着欧战，世界革命是应当爆发的，我们的列宁先生也曾如此预料。不料十月革命爆发后，各国无产阶级因物质条件的防阻、思想的未完成，不能为即时的响应。这的确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但是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始，十月革命虽未能一时完成世界革命，但它绝不能终止进行，绝不能缩小自己的职任。我们想起十月革命，不得不起列宁，想起列宁，又不得不起共产国际——指挥世界革命的总机关。那为世界革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叛贼的第二国际，已经失却自己指挥的作用，于是有所谓共产国际的实现，这个共产国际就是在列宁指挥之下所成立。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总机关，而列宁是它的大旗。共产国际的职任在于完成世界革命，而列宁——大旗的作用在于号召被压迫的群众，做人类解放的象征，规定世界革命的方向。这一面大旗令全世界统治阶级和一切仇视新世界的人们见之丧胆，令全世界被压迫的民众和一切厌恶旧世界的人们见之兴奋。

哦！好一面照得天红地赤的大旗！

列宁生前因为做了苏俄的人民委员长，不能兼做共产国际的会长，但是这并没有什么紧要，谁个也晓得列宁是共产国际的指导人和化身。我们试一读他的演说，他写予各国工人阶级的书信，我们可以看出他在世界革命运动上有如何大的作用。他不但对于欧、美先进国的工人阶级尽力地帮助，并且对于落后的国家、被压迫的民族，也是一样地热烈，也是一样地代它们筹划，俾全人类能够达到解放的目的。

列宁真是全人类的福音啊！……

不幸十月革命未能即时完成世界革命，列宁只能做苏俄的人民委员长，不免关于社会主义的建设、措施，都只能限于苏俄一块土地。但是列宁从未将苏俄看为一个最终的目的，或以为将苏俄治好了就算完事。他永远将苏俄看做东西革命运动的连环、世界革命之一个必要的大本营、全世界无产阶级战胜资本统治的根据地。列宁以为只有把苏俄巩固了，终能使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有所依持；但是在别一方面，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机关无势力，则苏俄自身亦将不能保存。因此列宁用自己全身、全心、全力量巩固共产国际。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劳动阶级解放的目的，只有如此才能促成新的世界之实现。

哥尔基说：“……我还继续地想，如我前两年所想一样，对于列宁，俄罗斯不过是

开始全世界之一个经验的材料。”

是的！对于列宁，俄罗斯不过是开始全世界之一个经验的材料！

若列宁的眼光只限于苏俄，列宁的愿望只限于解放苏俄境内的劳农，则列宁将不能成其为列宁了。不错，若某一个人愿望将自己一国内的劳农解放，则已经是很伟大，很令人敬佩；但是我们不能拿这个范围来论列宁。列宁的行动、主义，是以全世界为标准的，他的愿望是解放全人类，他在人类史上所做的事业，谁也不能够同他□比拟。他所给予全世界劳苦群众的东西，将永远不被忘却，将永远如日月的经天，如江河的行地。他的肉体虽死了，而他的精神将永远地活着，将永远会溶化在人类心灵里。

列宁本身是人类解放的象征，是世界革命的大旗。大旗所放射的异彩将永远炫耀于人们的眼底深处。历史既然产生了一个列宁，列宁既然为人类做了不朽的事业，列宁实无死的可能。又或者那克里母宫城下所掩埋的棺木已经朽了，那棺木内的尸骨已经化了，但是列宁还没有死啊！

列宁不死，列宁永远地不死！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那冰天雪地莫斯科城中的一个小学生。大约是列宁死后的第二天吧？我看见我们寄宿舍隔壁住的一个小学生——他或者十三岁，很聪明、很可爱的一个小孩子！他没有从前那样高兴似的。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不高兴呢？

——你现在难道高兴么？

我被他这一反问，倒觉不大好意思了。

——不，列宁死了！……

他听了我的话后，沉吟了一回，说道：

——不错，列宁死了，我很为之悲哀。我的父亲昨天竟哭了。今天他拿了一块大红布，在上面写着：“列宁是世界革命的大旗，列宁主义是达到人类解放的工具。列宁永远地不死！”他写过之后，又解释给我听，我现在还想着我父亲所说的话。你是不是……我父亲说，列宁不但是我们俄国人的，并且是东方人、西方人、中国人、印度人的。你听见他死了，你也不高兴吗？

我听了他这一番话，我不知道拿什么话来回答他。现在离列宁之死，已经一年了。际此周年纪念的日子，使我更不得不回忆那冰天雪地莫斯科城中的一个小学生所说的话……

四、黑暗的东方之红灯

在克野母宫城下

会聚着无数万无数万人们……
全世界都低着头，抬在肩上，
送这红色的伊立伊奇的灵柩。
在那鞭笞底下呻吟的黑奴
大约现在在那热带的地方痛哭；
那久处于压迫之下的中国人
也将怀着无限的、深沉的忧愁。
亲爱的列宁啊！
你死了，
你居然一逝悠悠！

——译自俄国某诗人《哀列宁》之一节

好一个黑暗的东方！

除开一部分日本人，凡是东方的民族，没有不受那所谓文明的、白色的种族之欺凌剥削。无数万万东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劳苦群众，简直是欧、美资产阶级之压迫的对象，欧、美资产阶级用他们的力，饮他们的血，吃他们的肉，统治他们的土地，蹂躏他们的文化……无恶不作、无微不至。

可怜被压迫的东方！可怜东方的劳苦群众！

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先进国的资产阶级不能以仅仅剥削本国劳苦群众为满足，并且剥削本国劳苦群众有一相当的程度，不能太超过范围，这种状况使先进国资产阶级一定要另寻财源，一定要在国外开辟殖民地。可怜经济落后的国家、文化不发达的民族，就因此变为欧美资产阶级之侵略的目的物了！所谓文明人有诡诈的外交政策，有锐利的枪炮，有美妙的机器，有欺骗的知识，当然容易将幼稚的、愚蠢的民族征服下去。野蛮人（？）当然不能与文明人相比，文明人对于野蛮人可以任意残杀、蹂躏、抢掠、压迫……总之，一切黄色民族、黑色民族、非白色民族，都是不开化的民族，都要受白色的、开化的民族的处治。

我们不必远溯美洲开辟的历史、非洲被瓜分的事迹，只要打开欧、美资产阶级近百年来侵略亚洲各民族（日本除外）的图画一看，就觉得这一幅图画是用欧、美资产阶级的枪炮、欺诈、抢掠、残忍和亚洲民族——中国、高丽、安南、缅甸……的血肉、性命、财产、痛苦所制成的！现在除一个高丽是日本的殖民地，为日本资产阶级剥削的对象，其余哪一个不在欧美帝国主义者支配的范围内？无数万万的劳苦群众日在奴隶牛马的状态下过生活，日呻吟于帝国主义者的鞭笞下。唉！好一个黑暗的东方！

但是十月革命响雷一般，不但解放俄罗斯领域内无数弱小民族，并且惊醒了一切

东方被压迫的民族，指示出它们求解放的道路：欲求民族的解放，必要推翻帝国主义，必要与无产阶级革命联合向资本主义世界攻击。于是埃及觉醒了，印度觉醒了，土耳其觉醒了，中国也觉醒了。现在国民革命、民族解放的呼声漫溢于被压迫的东方，东方向着光明的路上走。但是我们说到十月革命对于东方解放运动的影响，又不得不说到指挥十月革命的主帅——我们的先生列宁了。

本来第二国际的首领何尝未注意到民族问题，但是他们所注意到的是开化民族，而亚洲或非洲的未开化民族是不值得他们垂念的。欧、美资产阶级的领袖，如威尔逊，又何尝未说过什么民族自决，但是这不过是他们的慈悲心陡发，或者是他们要说几句好听的话给被压迫的民族听听，拿出一个宽心丸给被压迫的民族吃吃。在实际上，他们真愿意民族自决么？倘若弱小民族都自决了，则他们自身——帝国主义者还能生存么？

我们且看一看被压迫民族的首领——列宁对于民族问题的态度。

在俄国共产党（从前的多数派）形成的初期，列宁已将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提出；在当时以至于到现在，谁个也没有他对于这个问题的注意，谁个也没有他对于这个问题的明白。一九〇〇年，列宁在《火星报》著一论文《中国战争》，在此论文中，他指示出欧、美资产阶级压迫中国人民的真相：

中国人对于欧洲人的攻击由何而生？……不错，中国人仇视欧洲人，但是为什么呢？中国人之所仇视的，不是欧洲的民众，中国人与他们没有接触过，而是欧洲的资本家和服从资本家的政府。中国人能不能不恨这一些人们——他们到中国去只知道榨取、欺诈、抢掠、压迫、剥削，尽做一些残害中国人民的勾当？……

在满欧洲的资产阶级狂喊中国人野蛮、用枪炮轰击中国人的时候，我们的革命首领独为我们劳苦的群众声辩，独为我们被压迫的民族揭露帝国主义的黑幕。列宁之为弱小民族的救星，大约不自十月革命后始了。列宁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压迫弱小民族的行为，始终尽量地指责、反抗，从没有一次放松过。十月革命轰然一声，把俄罗斯境内东方之弱小民族的锁扣完全解去，可怜他们处于旧俄沙皇政治之下，也不知受了许多的摧残、许多的痛苦！十月革命后他们才能享得民族平等的权利，他们才能得到抬头的机会。怀古思今，他们对于十月革命的首领诚抱着无涯的感谢！也不怪列宁死了的消息一出，那高加索的山人、土耳其斯坦带小花帽子的回民、那西伯利亚的土人……他们如丧了考妣，他们的悲哀不减于本俄国的劳农群众。

列宁的愿望当然不仅在于解放俄罗斯境内的弱小民族。共产国际成立后，他在大会中特别规定无产阶级革命与殖民地解放的关系，欧、美的先进的无产阶级应极力帮助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在他所指导的苏俄政府对于东方的政策，没有一处不是帮助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没有一刻不号召被压迫民族起来做解放的运动。啊！也难怪东方的劳苦群众视列宁如圣人一样，视列宁如救苦救难的天神，他们对于列宁之死，如欧、美的劳苦群众一样，抱着无限的悲哀，洒了许多的热泪！

三年前，俄国《新闻报》主笔威林斯基旅行中国中部某地遇一苦力，当时苦力知道他是俄国人，微笑着向他表示对于列宁的敬意。

——他从什么地方知道列宁呢？威林斯基问他的翻译。

——人人都晓得列宁，从前有过孔夫子，现在就是列宁！苦力很郑重地这样回答。

中国的苦力把列宁比成孔夫子，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列宁在中国劳苦群众中的势力了。

在那印度穷乡僻壤的深处，有一个小侍童沙弥，受够了主人的鞭笞，一日忽然外出，数日不回。后来回来了，主人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回答道：“我受够了你的鞭笞，想到那救世主面前去，他住在那很远的冰天雪地里，他给饥饿的人们面包吃，他完全不虐待自己的侍童。他的名字叫列宁。……”

这是东方劳苦群众普遍地对于列宁的想像。在这一种想像中，我们已经看出列宁变成神话传说的英雄了。东方劳苦群众总有一日脱离黑暗的压迫，列宁就是在天空高悬着引导他们到光明道上的红灯。

最后，我引用巴古迫悼列宁大会中回教徒代表色哈加迷之一段演说——做为本文的结束：

……列宁终生只有一个目的：解放全世界劳苦群众脱离资本家的压迫。列宁之死实使全世界劳苦群众抱着无限的悲哀。在列宁的墓前，我们应当说，只有你鼓起了民族觉悟的火光，只有你燃着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红灯。你的名字将永远在我们之中生活着。我们永远尊重你的事业，永远与你的仇敌奋斗！

列宁年谱

蒋光赤

乌拉基弥儿·伊立伊奇·列宁为俄罗斯共产党领袖、十月革命指导者、苏联第一任人民委员长。去岁逝世，哀耗惊动全世界，无产阶级如丧考妣。今将其一生大事按年简述于后，他日有暇，当为之详传也。

一八七〇年

四月十日（俄旧历，即新历四月二十二日。下仿此），生于新比斯克省。父为新比斯克省国民学校组织人。

一八八六年

一月十二日，父死。

一八八七年

中学校毕业，秋入加赞大学。

十二月五日，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并被解送至加赞省柯枯斯金诺乡村。

一八八八年

七月十一日，拒绝复进大学校。

九月，警察禁止列宁出国。

秋，居住加赞，研究马克思学说，与学生团体有结合。

一八八九年

夏，拒绝学校考试。

一八九三年

居住撒麻喇。为撒麻喇马克思主义者小组之一员。著《农民生活中之经济运动》一书。

秋，至彼得格勒（现改名为列宁格勒）。

一八九四年

加入社会民主党之宣传组，组织中央劳动团。

著《国民之友是什么及他们如何与社会民主党争斗》。

一八九五年

四月末，出国，与蒲列哈诺夫、阿克色洛德、撒苏利奇相结合。

九月，回国，办妥转运秘密印刷品事。

组织“劳动阶级解放同盟”，筹备出版秘密报纸《劳动新闻》。

十二月九日晚，警察逮捕“劳动阶级解放同盟”会员，列宁入狱。

一八九六年

狱中着手著《俄国资本主义之发展》。自狱中寄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党纲草案》。

一八九七年

二月末，充军至西伯利亚，限期三年。

一八九八年

六月十日，与克鲁布斯加牙女士结婚。

秋，《俄国资本主义之发展》一书完成。

一八九九年

四月，在彼得格勒，《俄国资本主义之发展》出版。

一九〇〇年

一月二十一日，充军期满。

筹划恢复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报》，未成。议决列宁与比得列梭夫出国，借“劳动解放团”之助，刊行社会民主党报纸。

五月二十一日，与马尔夫托同被捕。

五月三十一日，被释放。

秋，《火星》开始出版，列宁为编辑员之一。

一九〇一年

为《火星报》指导者，克鲁布斯加牙为《火星》编辑部书记。

一九〇二年

二月，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结识，与罗萨·鲁森堡会面。《怎么办》一书出版。

四月，与妻克鲁布斯加牙至伦敦，因《火星》移至伦敦出版。研究、进行党纲及章程草案。

一九〇三年

是年反帝政运动甚激烈，列宁提议赞同自由派提议，共同刊一反帝政报纸，被社会民主党否决。

在全俄社会民主党第二次大会，列宁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一、列宁要求每一

党员均应参加党的工作，仅积极的革命工作者能为党员；二、提议建立一真正指导党的机关；三、主张党纲仍旧。

一九〇四年

俄国第一次革命开始。

列宁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一员。

五月，著《一步向前两步向后》，指摘少数派之趋向投机主义。

六月，退出中央执行委员会。

十一月，刊行《前进报》——多数派之机关报。

十二月二十二日，《前进报》第一号出版。

一九〇五年

俄国第一次革命爆发。

列宁着手第三次大会之预备。

积极参加第三次大会之工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领袖。

六月，《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派之两种策略》在日内瓦出版，此书说明无产阶级应在将要爆发之革命（一九〇五年革命）中为主力；运动之目的——非将政权转入自由派之手，而应建设劳农之民主独裁。

八月——九月，列宁鼓吹推翻帝政之暴动，宣传无产阶级武装。

十一月初，列宁回国。

十一月，在多数派之公开报纸《新生活》《奋斗》工作，极力揭露维节内阁之反动政策、自由派资产阶级之妥协趋向、少数派之投机主义。

极力为武装暴动之预备。

十二月，武装暴动起，列宁在彼得格勒鼓吹工人组织援助莫斯科之暴动。

一九〇六年

四月，极力与立宪主义及少数派主义奋斗。

在社会民主党联合大会上，列宁为一副报告者：一、关于农民问题，主张国有化之原则；二、关于在现在状况之下无产阶级之阶级的职任问题，指摘少数派所用的方法之谬误；三、关于对国会态度问题，主张拒绝参加。

五月，向彼得格勒工人报告俄国社会民主党联合大会之经过。

七月，刊行多数派之秘密机关报《无产者》，并为之编辑；极力攻击革命党中之颓废的趋向。

十一月——十二月，极力攻击所谓“工人大会”、少数派之投机主义政策及蒲列哈诺夫。

全俄社会民主党大会之后，列宁为多数派之首，制定竞争选举之进行大纲：不与立宪派合作，而单独实行无产阶级之策略。

一九〇七年

一月，列宁主张参加第二国会之选举，欲借之揭露自由派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性、民粹派团体之小资产阶级性及少数派之投机主义。

四月——五月，列宁指导国会中多数派代表之工作。极力参加社会民主党伦敦大会之工作。

六月，大会后，列宁回俄，住于芬兰。

七月，在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临时大会，列宁不赞成拒绝第三届国会选举。

八月，在第二国际在斯徒嘉特之大会：一、将自己对于职工会运动之提议转交与罗萨·鲁森堡；二、与罗萨·鲁森堡共同提议，于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大会后，返俄住芬兰。

十二月，列宁再出国。

一九〇八年

俄国反动潮流大盛。列宁移居日内瓦。

八月，至伦敦。

攻击波格旦诺夫、鲁纳卡斯基及巴札诺夫之经验批评主义。

秋，转至巴黎。

十二月二十一日，参加社会民主党在巴黎之临时大会。

一方面极力攻击取消派，一方面又极力反对撤回国会代表派。

编辑《无产者》。

一九〇九年

列宁住巴黎。

五月，在巴黎开多数派之临时大会。与撤回国会代表派分裂。在反对撤回国会代表派与取消派之见地上，与蒲列哈诺夫接近。

《马克思主义与经验批评主义》一书出版。

一九一〇年

一月——二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开会，列宁极力指导此次工作。加入《社会民主派》为编辑。

赴第二国际在柯平刚更之临时大会，在协作社委员会工作。

十一月，创立《劳动报》。

一九一一年

列宁建议取消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国外办事处，发起召集临时大会改组中央执行委员会。

夏，列宁在巴黎党校授课：一、经济学；二、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三、农民问题；四、社会主义之理论与实际。

一九一二年

列宁进行党的复兴之工作。

一月六日——十七日，列宁为社会民主党在普拉加大会之主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领袖及第二国际之代表，当选为《劳动报》编辑主任。

四月二十二日，在彼得格勒《真理报》第一号出版，列宁为该报发起人及指导人。

五月九日，在社会民主党巴黎支部报告林拿罢工事变之意义及党对此应有之策略。

一九一三年

列宁指导第四届国会中多数派代表之工作。

住加里西亚。

八月二十六日，多数派名单在五金工会选举通过时，五金工人致贺电与列宁，以之为工人阶级之真正领袖。

九月二五日——十月一日，在加里西亚之白都纳乡村，多数派开谈话会，讨论民族自决问题、公开组织问题、罢工运动问题、对于民粹派态度问题……列宁为指导人。

一九一四年

六月十八日，俄社会民主党在布留赛开联合大会，此会为第二国际所召集。列宁领袖多数派要求承认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唯一指导党的机关，取消少数派之组织委员会。

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开始，列宁极力攻击社会主义爱国派。奥大利政府将列宁逮捕，后列宁逃至瑞士。

列宁提出《关于战争之意见》，交意大利、瑞士社会民主党临时联合大会讨论。列宁主张以国内战争制止帝国主义战争，并以为沙皇政府若战败，则对于俄人民为小罪恶。当时深信德社会民主党不致可决政府对于战争之军费案。及得德社会民主党可决军费案时，乃云：“第二国际死矣！”

十月，列宁赴蒲列哈诺夫在拉桑所开宣传保护祖国主义之演讲会。

一九一五年

列宁极力攻击社会爱国派及帝国主义战争。

二月十四日，列宁委立特温诺夫赴协约国社会主义者在伦敦所开之大会，并携一宣言：“大家必须断绝与自国帝国主义政府任何种关系，应与奥德革命社会民主派亲善

合作。”

二月二十日——三月三日，多数派国外支部在倍恩开临时大会，列宁为指导者，报告多数派最近之职任。

列宁在瑞士工作。

极力进行国际革命社会民主派之联合。

九月五日——八日，列宁为奇穆瓦德会议左派之代表，主张号召交战国无产阶级进行国内战争，因之与列德波尔冲突。列德波尔讥其远离祖国而高呼国内战争。列宁自谓现所处之地位与马克思草定《共产党宣言》时同，终有亲身指挥国内战争之一日，而不畏任何之艰辛。

一九一六年

二月五日——八日，列宁参加倍恩会议，议决召集第二次奇穆瓦德会议，讨论取消战争之方法。

列宁与拉柯夫斯基在倍恩社会主义者大会，指出进行社会革命之必要：战争后，无产革命为不免之现象。

四月二十四日——三十日，秦泰尔会议开幕，列宁为左派之首领，开大会建议应适用消灭战争之最激烈方法：总同盟罢工、怠工、武装暴动。

列宁在倍恩及秋立黑报告：一、俄国社会民主党之农民问题党纲应重行改正，将自治化改为国有；二、社会民主党在俄国之最近职任（工民加入军事工业委员会为一大错误）。

《著帝国主义为资本主义最后新阶段》一书。

极力在瑞士工人中宣传革命的国际主义。

一九一七年

俄国第二次革命发生。

三月，列宁领袖旅外俄国国际主义者商量返俄。

四月三日，列宁回俄至彼得格勒。第一次向民众声呼：“世界社会革命万岁！”出席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

四月四日，列宁提出草案：一、抛去社会民主派之片段政策，改着共产主义之革命衣装；二、在革命运动中，俄国应当放弃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之管理形式，将一切政权交与劳农代表议会。

三月二十四日——二十九日，列宁指导开全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大会，议决案为：一、即速宣布不割地、赔款之和平；号召战线上军士互相亲善；二、农民为有组织地占领地主之土地，在旧地主土地上面建设大模范的经济；三、俄国社会民主党之根本

职任为建设第三国际。

五月二十二日，列宁在农民代表第一次大会演说：一、占据土地；二、贫农有组织之必要；三、组织模范的集体经济。

六月，在少数派与社会革命党指导之下，第一次全俄劳兵农苏维埃大会开幕。列宁有演说。

七月三日——五日，《真理报》被抄，政府下通缉列宁令，列宁被迫复过秘密之生活。在秘密情状之下，仍指导党的进行，为党的各机关报撰文。

列宁企图推翻克伦斯基政府，将政权与有组织的劳农群众之手。曾向同志云：“即速抓政权，否则迟矣！”

八月——九月，列宁住芬兰，此时完成《国家与革命》一书。

九月——十月，列宁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中央执行委员会，谓时机已至，应即速推翻临时政府，将政权交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赞成，列宁遂冒险至彼得格勒组织暴动。

十月十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列宁出席，议决在第二次苏维埃大会时夺取政权。

十月二十五日，彼得格勒起武装暴动，政权转于苏维埃之手。第二次苏维埃大会在列宁指导之下开会。

十月二十六日，发表土地与和平之命令。人民委员苏维埃成立，列宁为委员长。无产阶级胜利。

一九一八年

八月三十日（新历，下仿此），社会革命党暗杀列宁，列宁受伤。

一九一九年

三月三日——七日，第三国际第一次大会开幕，列宁出席。

一九二二年

列宁病势沉重。

一九二四年

一月二十一日，列宁病逝。

第二号

(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出版)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

瞿秋白

(一)

孙中山时代的中国，是屈服于满洲贵族北洋军阀统治之下的中国，同时，亦就是受英、法、俄、日等资本国家侵略的中国。从一八六六到一九二五（从清同治丙寅到民国乙丑），六十年中的中国历史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远东史。在这六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因受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外货的输入，原料的吸收，外债的增加，赔款的勒索，路、矿、实业权利的攫取，领土、租界、港口的割让，不知道经过多少变更，六十年前的中国与六十年后的中国，在经济上简直是完全两样的国家。社会里的阶级关系也因此经过巨大的变更——士大夫的“世家”已经完全消灭；买办阶级已经大半变成所谓“中国”的体面商人；小农民、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之中，已经一部分变成现代的无产阶级。中国国际关系上的变更，日日促进中国社会里的阶级分化，统治者、压迫者已经掉换了好几十次。各帝国主义者对远东侵略的形势转变了种种花样——可是有一件事是至今还没有改换的：便是中国民族——大多数的平民始终还是受着压迫和剥削。六十年中所变更的只是压迫者和压迫的方法，而中国民众的受压迫和受剥削这件事，是没有变更的，不但没有变更，而且剥削的范围更大了，剥削的程度更深了。因此，这六十年中中国平民的倾向革命、需要革命，也是没有变更的一件事实。

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剥削一天天地增加起来，中国平民的革命运动也就一天天地扩大而且深入。中国古代的宗法社会和小农、小手工业的经济，遇见了帝国主义者们的资本主义，都崩溃下去，发生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于是历史的舞台上，一个一个地发现新的革命力量。中国的革命运动因此在六十年中一步步地进化，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革命家——孙中山也就在这过程里逐渐地生长出来。

总之，最近六十年的中国是革命的中国，尤其是民族革命的中国——而孙中山的历史使命，便是完成这一民族革命。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到侵略中国的一时期，已经进了帝国主义的阶段。中国受列强经济、政治、文化上种种侵略而要反抗，受资本主义化而发生经济发展的趋势。无论如何，只要求这种发展的成功，便不能不实行革命，而且首先便是民族革命。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便是世界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阻碍中国发展还不仅在于经济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民权主义，根本上便与帝国主义势力不相容，更不用说中国大多数平民的生计的改善——中山先生所称为民生主义的了。六十年前的中国早已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是在发展经济，以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中国民族加入世界史的最重大的责任；换一方面说，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必然先引起中国人的这种民族自觉。因此，我们可以说，从孙中山出生直到现在，中国民族的历史职任，一直是反抗列强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孙中山现在死了，这一民族革命离他的成功还遥远得很，然而中国革命运动，在孙中山引导之下，已经经过好几个阶段，而得到了他的正当的道路：因为要反抗列强，然后知道非颠覆满清政府不可，非建立共和不可，非为大多数中国平民争生活之改善不可，最后非联合世界上一切反帝国主义势力、被压迫的殖民地及弱小民族和世界的无产阶级不可。这一条中国革命运动所已经经过的道路，中国民族自觉地深入和前进，在现时看来是很明了的，然而从中山开始自己事业的初年的中国思想，进步到现在的国民革命的口号，中国平民群众及孙中山不知道经过几多困苦的经验、几多迷误的方法、几多重大的失败——这是一条荆棘的路。“反抗列强”是多么简单的“爱国”主义，四五十年前与中山同时的“政治家”“士大夫”何尝不知道。然而只有孙中山寻着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真正的答案——革命。为什么？因为孙中山感觉上代表中国的平民阶级，认识中国平民阶级的历史职任。所以只有中山能随着革命运动的经验，寻找着中国民族革命的道路。

(二)

中国的革命运动既然是民族革命、反抗列强的民族革命，那么，第一个问题，便是谁是中国民族？这一问题，似乎问得很奇怪。可是在四五十年前，连“汉人才是中国民族”这一粗浅的答案，都不是公认的。当时，满清的官吏，所谓维新派的分子，也谋反抗列强，也极力想“谋富强”。中国人那时的民族自觉很模糊的，只想以全国对待外国，便是爱国主义：中国的朝廷，中国的人民都是自己的；那带着枪炮兵轮的外国人才是侵略中国的。所以在孙中山的少年时代，已经是“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駸駸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

恃以凌我者，我今亦有之……”（孙中山《与李鸿章书》）这种“朝廷”的革新政策，不能说不是中国民族自觉的第一步。满洲政府在当时似乎足以代表中国民族以反抗列强。不但孙中山当时是如此想，中国一般人民都是如此的想。必须要满洲政府几十次事实上证明它实在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满洲贵族的政府，而且是列强的奴才，那时中国平民再进而有革命的觉悟，想到要颠覆满洲贵族。这一革命的觉悟，据《孙文学说》的《中山自叙》，直到庚子之役，方在民间开始传播，而前此差不多倡排满革命者，大家都目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然而孙中山却在上书李鸿章后十年（上李鸿章书时在甲午），乙酉（一八八五）中法之战的时候，已经开始革命运动。中国平民革命运动的目标，本在于压迫剥削中国最强大的仇敌——列强帝国主义，前此三四十年时希望满洲政府革新富强，到此才打破这种幻想。既然这样，要反抗列强，便必须革命——推翻满清政府，所有中国人——汉人便都能负这种革命的使命么？中国的民族革命，一方面是对满洲贵族的，一方面亦就是反抗列强的——这种民族革命里“民族”的意义，似乎是指全体的汉人的了。事实上却大谬不然。抽象的全体的民族，实际上并没有这么一回事。满清政府时代的中国社会，显然分着士大夫和平民的阶级。经济上固然农、工、商三类人之中还包含着许多阶级，而在社会上士的一阶级是政府的雇佣奴才，它在经济未发展、工业未出现以前，帮着满洲贵族统治小资产阶级的平民。所以要推翻满清政府，必须要以平民做领导阶级，革命运动中方才有主力军，方才能得到胜利。《孙文学说》上说：

予由太平洋东岸之三藩市登陆……至纽约市，沿途所过多处……皆说以祖国危亡，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然而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然美洲各地华侨多设立洪门会馆。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也；然其事必当极为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觉也。夫政府之爪牙为官吏，而官吏之耳目为士绅，故凡士大夫之类，皆所当忌而须严为杜绝……当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门之人，初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复明何为者，彼众多不能答也；后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数年，而洪门之众乃始知彼等原为民族老革命党也……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

于是中国革命运动发现了这老民族革命党，辛亥以前的革命，差不多大半以会党为中枢——这是革命的社会基础。士绅阶级的态度是怎样呢？当时所谓保皇党的康梁

派可以代表他们；他们只要利用狭义的爱国主义或所谓国家主义蒙蔽民众，想借此逼迫满洲贵族而和他们平分政权，保存自己统治阶级的地位，所以倡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谋富强的主张。这时，在当初谋富强以抗列强的总口号之下，显然已经发现阶级的分化：一方面民党以下层阶级为社会基础，从事于革命运动；别方面皇党以士绅阶级为后盾，而进行立宪运动。康梁派机关报的《新民丛报》，便竭力攻击民党的联络会党及主张民生主义：他们的论调，不外说：“利用下等社会，必无所成而徒荼毒一方；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并行之后，无资产之下等握权，秩序不得恢复，而外力侵入，国遂永沦。”（见《朱执信集》）在这两层反对意见里，已经显然可见梁启超等代表士绅阶级的说话。本来士绅阶级不但不肯革命，而且摧残革命，帮助反动势力；名说也要变法维新、要谋富强，而又反对下等社会握权，反对土地国有、平均地权，反对改善下等社会的生活。所以康梁派不肯革命，以为满洲政府能代表中国民族，又曾倡国家主义以抵制民族主义。这种国家主义在当时就等于宣传“忠君爱国”，即使真能变法维新，当然仍旧是满洲贵族和中国士绅阶级联合而压迫平民的局面：实际上，中国大多数人民仍旧受着压迫和剥削；而在反抗这种压迫的革命过程中，士绅阶级当然会反过去求助于外人。所以要回答“谁是中国民族？谁是民族革命里的领袖阶级？”的问题，到此便非常明白了，“只有中国平民是中国民族的代表，只有中国平民是民族革命中的领袖阶级。”

(三)

中国革命运动实际上在辛亥以前，一直是以“下等社会”——平民阶级为中枢的，而孙中山的同盟会，也是以代表“下等社会”的会党做实力的基础。尤其是当时平均地权的口号，孙中山要借此组织并集中“下等社会”的力量于革命的标语。孙中山以“平民的感觉”觉到“上等社会”的奴才性和卖国性，本能地知觉中国革命事业必须以平民为中枢，才能成功，因为只有平民真正要反抗列强，真正受满清的压迫，只有平民真正要求革命，真正要求从专制政体及列强侵略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力趋于“中国民族的经济的发展”。总之，孙中山在组织革命运动的初年，便早已知道：真正的中国民族代表是中国的平民——所谓“下等社会”，只有他们能负担真正民族革命的职任。

虽然如此，革命运动进行的过程中，反映着中国经济各种力量——阶级的斗争。辛亥革命的结果，革命的平民阶级竟完全失败，而反革命的军阀阶级却起而代替满洲贵族——压迫平民，并做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

中国的反抗列强，本不仅是平民的需要：满洲贵族、士绅阶级以及平民阶级——或所谓第三阶级及农民阶级，在民族自觉的初期，本有反抗“外国”的共同倾向。不

过在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各阶级在总的反抗列强的倾向里，渐渐暴露各阶级自己的本性，各阶级都想利用这一反抗运动专图自己的利益。我已经说过，就是最早“富国强兵”的口号，也未始不是民族自觉的一种表现，不过这一口号实际上只代表满洲贵族治者阶级的利益；一切采用火器制造兵舰等的新政，未始不是反抗列强的一种运动，不过这种改革只利于当时的政府。满洲贵族自私自利的政策，却要蒙着爱国、排外的假面具。所以等到这种最初期的新政，一方面既不足以抵抗外力的侵入，别方面又刚刚加重人民的负担，反而增加革命潮流的“恶势”，那时，满洲贵族——尤其是在庚子之役之后，只有倒到列强的怀中，努力媚外，以求自存。士绅阶级便乘机进而要求立宪。当康梁变政失败之后，士绅阶级那种“得君行道”革新的运动，并不因之而停止，并不因这种极明显的失败而悔悟，并不因此而完全站到平民阶级方面来。这是因为士绅阶级的梦想，一直在于居中调和满洲贵族与中国平民的斗争，实际上便是欺罔民众，使与满洲贵族妥协，而结果必然是使革命流产。代表士绅阶级的“改良派”的策略，总是造作许多“君主立宪”等的幻想，使民众暂时躲避“困难的”革命道路。当时革命派的职任，便在于暴露这种“改良派”——康梁派的罪恶，暴露他们口号的虚罔，打消“改良派”所造成的种种幻想，而使民众自己深信革命之必要。孙中山先生和民党那时的策略正是如此。可是满清政府客观上也帮助革命的进行不少——历史的和平的立宪运动，一直到一九一〇年各省咨议局请颁布《宪法》前后三次的入京请愿为止，无不受清廷的打击。九年预备立宪的欺人之谈，更使民众深信除革命外别无出路。

于是辛亥革命便一发而不可遏止了。辛亥革命的结果，只是颠覆满清贵族的民族革命，这次革命的唯一胜利只是推倒一腐朽不堪的满清政府。然而就只这一点胜利，也还完全靠平民阶级做中枢，士绅阶级在这革命里只有反动的作用。士绅阶级在革命前竭力阻遏革命，在革命后又竭力破坏革命；只要看康梁派在辛亥前主张保皇，在辛亥后联袁世凯而排斥民党，便可以了然。

(四)

可是所谓平民，也还包含了利益相反的种种阶级，在革命前分化还没有明显，而且共同的仇敌未去，所以内部的斗争没有表现出来。同盟会中可以兼收并蓄地包容种种不同的成分，也就因此。当时中国的社会组织，因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农民手工业者破产日多，于是游民的无产阶级数量日增，这是大多数当时的平民——小资产阶级中最流动、最革命的一部分，实是革命运动的中枢、革命运动的社会基础，虽然在革命组织里，形式上不能做原动力，诚如中山先生所言（《孙文学说》），然而这不过是

形式上的事，以社会阶级关系的观点来看，这部分平民确是革命中的发难者。其次，便是半欧化的知识阶级及军官——这部分人，因为满清旧社会的崩溃，已经客观上没有插足士绅阶级的可能，而且受着新式的教育，应当能代表当时的民族意识，所以也是革命中的重要部分。可是知识阶级本身绝不会有独立的政治作用，其中的分子可以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平民而加入革命，也可以代表大商阶级，更可以混入军阀阶级——绝非靠得住的革命力量。再其次，便是大商阶级，在前清末年，这种大商阶级（或所谓工商界），有两个来源：一、是士绅式的资产阶级，这是资本主义初期“贵族的资产阶级化”中必然发现的现象，它们“代表”着人民争立宪，其实是清廷路、矿、邮电的新政中，这些“洋务官僚”，靠着官署积累资本，到此已自有阶级利益，只想借立宪运动巩固自己的阶级地位，实行“提倡实业”等的“爱国”目的；二、侨商的买办阶级，这部分是因为与帝国主义接触，而来做外国资本与中国原料、或外国货物与中国市场间的中间人，因而积累资本，渐渐有独立投资于工业的倾向，所以比较地赞助革命——因为清廷的压迫及外国的侵略，无处不阻碍这种工业发展。

士绅式的、官僚式的资产阶级与侨商的买办的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微有不同，然而它们对于“维新”或“革命”的希望，根本与小资产阶级不同，尤其与游民的无产阶级，有阶级利益的冲突。最后，便是最大多数的城市及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及农民。这是数量上最大的群众。它们的政治要求，应当是很民主主义的政纲，它们的经济利益，不但和列强帝国主义相冲突，并且和士绅资产阶级及侨商资产阶级是相竞争的。可是小资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总是动摇不定的，必须有一领导它的阶级，充分地去帮助它发展自己的革命性而遏止它的反动性，然后才能彻底地忠于革命。否则，它便容易受大资产阶级的欺罔，倒到反动派的怀抱里去，而受人家的利用。

所谓“平民”——辛亥以前可以概括的与满洲贵族及士大夫相对待的，实际上含着这许多不同的成分；到辛亥革命前后，已经分化得日益明显出来。然则这所谓“平民”之中等到革命爆发之后，政治上积极行动的是那几个阶级呢？上述的各阶级中，只有两个阶级是在政治上积极行动的：一、大资产阶级（士绅资产阶级及侨商资产阶级——这两部分虽然在革命前政纲上不甚相同，然而满清既倒之后，政治上的合作和联盟，对于它们是极自然的事）；二、游民的无产阶级（所谓会党，所谓土匪，根本上不脱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可是因为破产失业最受苦痛，它们那种暴动的反抗性是很厉害的）。当时工业的无产阶级数量上还极少，而且政治上还没有成一觉悟的自动的力量，可以说还没有“组成阶级”——所以自然没有能起而领导革命——引导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以至于游民的无产阶级。因此，我们在辛亥革命时，只看见大资产阶级及游民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无产阶级是经济上有组织、有团结力的阶级，只有

它能领导革命；游民无产阶级便不同，虽然革命性很强，然而它自身便是一盘散沙，只能有极模糊的社会理想，只能顺着革命潮流随处发起无组织的暴动。这种阶级自然不能引导农民及一般小资产阶级实现胜利的革命。于是不久便使大资产阶级攫得革命运动的指导权，镇压游民无产阶级的暴动，和反动派妥协，而终至于使革命完全失败。平民中之阶级分化，在这种革命时期，最显而易见。

辛亥革命的时候，孙中山的革命口号——“平均地权”，虽然在国民党自己并未努力去宣传和实行。可是所谓最下等的“下等社会”，尤其是长江下游的会党、各地失业的穷而无告的游民，往往奋起暴动。当时即使没有很明显的社会主义的要求，也就有不少地方，所谓“土匪”都染着革命潮流，高呼均分财产的口号，有些地方，并且有小农的暴动。恐怖的空气——“匪类”“暴乱”“暴民专制”的骂声，可以不绝地在各城市的“绅商界”里看得出、听得见的。这样的情形，至多不过三四个月——随后竟完全消沉了。游民无产阶级，当然梦想也想不到现代的社会主义；可是它们的要求，最早在革命以前，实在代表大部分饥寒交迫的小农、小商。不过游民无产阶级的均产主义，根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它们内部决不会有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而只会有一种宗法社会式的“头目制度”，夹杂着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它们对于富人的嫉恨，实际上并不适合他们取消贫富不均的理想，而终究是代表各个想自己变成富人的意识。所以即使游民的无产阶级暴动成功，或是真正成了一种实力，也很容易受头目的卖，而完全丧失其革命性，简直变成军阀、官僚。譬如革命初年江苏的徐老虎（宝山），便是最明显的例。

经过这种革命的潮流之后，马上便开始资产阶级的反动期。当时许多城市里，商会都大大地活动起来，并且编练“商团”维持秩序，大商阶级亟想取得政权，是当时很明显的事实。“商人”那时的政治活动，对于满清的地方官，对于当地的士绅阶级，确有些革命的作用；可是因为它的阶级利益，决不会和游民无产阶级联合引导当地的小农、小商，彻底地去实行革命，却只会受着了游民的恐吓，反而去和士绅阶级妥协，以“维持秩序”。不但如此，中国当时的大资产阶级，差不多纯是商业资本，经济力还很薄弱，政治上的积极性，也很有限，不能独立地取得政权，于是因为要“维持秩序、保障私产”，便不能不假手于新、旧军阀：各地“绅商”对于革命初期的都督或军政长，都是竭力奉迎，要借他们的武装，拥护自己的利益。其结果，渐渐造成革命后的新式封建诸侯——督军。到此，资产阶级大半仍旧退回受治阶级的地位，于是革命便完全失败。

读者或者以为上述的过程，只是当时的地方现象，并不能概括全国范围的政治变化。其实从南京临时政府，而袁世凯、宋教仁以至二次革命的过程，只是上述的社会

阶级之相对关系的反映。辛亥革命的时候，一方面是反动的满清贵族和士绅阶级——袁世凯等清室的新军军阀；别方面是革命的平民各阶级——孙中山及国民党，互相斗争的局势。士绅阶级及军阀，虽然在群众排满的口号之下，不得不形式上转移于“革命”方面，而实际上是想以此转移“革命”于自己手里，造成自己代替满清而为治者阶级的地位。革命方面势力的涣散既如上述，而且大资产阶级亟亟乎要维持秩序，而想和新起的军阀妥协——这样局势之下自然是真正的平民、真正的“下等社会”重受压迫而失败——孙中山所以不得不让袁世凯。社会阶级之中，那侨商资产阶级赞成革命于前，而想谋与反动派妥协于后。这种阶级分化反映到国民党方面来，便形成国民党中的右派——宋教仁及黄兴等。右派于孙中山让袁世凯之后，还是主张责任内阁，一直到袁世凯解除国民党武装，大借款成功，右派还是梦想妥协。右派的主张，完全代表这种“革命”后资产阶级：怕骚乱、想和平、反对下等社会、求与军阀妥协——有一件最好的证据，便是宋教仁等改同盟会为“国民党”时的新党纲：（一）政治统一；（二）发展地方自治；（三）种族同化；（四）注重民生；（五）维持国际和平。请看，同盟会时代的国有土地、平均地权的党纲，变成了极模糊的“注重民生”四字。当时主张与袁世凯议和让位的是这些右派；主张改政纲而容纳一班士绅阶级的，亦是这些右派。国民党内部右派的胜利，便是革命运动中资产阶级的反动和妥协的明证。可是，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被右派搁而不行，“下等社会”受大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不能进行革命。总之，大资产阶级战胜真正平民之后，不久，军阀的政权因此便大稳固，更用不着资产阶级对他妥协了。何况帝国主义者趁此竭力帮助，于是他们——军阀便一转而压迫及于资产阶级自身，于是国民党连右派也受压迫和购买，二次革命便完全被镇压下去。此后，资产阶级更不容“下等社会”抬头的了，不但袁世凯称国民党为乱党，一班资产阶级，甚至于小资产阶级都认国民党为乱党了。

孙中山却始终代表真正的平民，一直反对妥协，主张讨伐袁世凯，只因受右派牵制，终致于失败。辛亥革命里没有一个彻底的、团结的、真正能领袖革命的阶级，所以失败；然而孙中山和中国的平民从此更觉悟革命的职任。帝国主义固然趁此更加扩张它的势力，利用国内各派的军阀互争而从中取利，指使他们压迫中国的平民，阻碍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平民——小商人小农等也越益明了自己的敌人，不仅是满清贵族，而是帝国主义，而是一切种种的妥协派、大资产阶级。

（五）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反动政局，直到现在，根本上并没有变更：满清贵族已推翻了，然而代替他而统治中国的仍旧是反动的军阀阶级和士绅阶级。中国的民族

革命至今没有成功。民族革命的主体——中国平民，经过了阶级的分化，一部分士绅式的资产阶级结合了军阀阶级，侨商中的买办阶级也早已退出革命的战线，它们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纯粹是反动的。只剩得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全国的小农、小商人，客观上十分需要彻底的民权主义的革命，可是主观上没有政治上的积极能力。至于游民的无产阶级，本来只有破坏的、暴发的反抗能力，在革命的过程中，不但不能做指导阶级，而且这种阶级的内部崩裂和个人主义，反而成就军阀阶级的反动力量——兵匪的蔓延扰乱，是一切军阀统治的根本。而民族革命的对象——列强帝国主义，不但没有丝毫损丧，反而利用国内军阀的互争和反动，用尽种种的方法扩张自己的势力。

既然如此——民族革命的职任还没有尽，民族革命的力量却已经自就崩坏，那代表中国民族革命及大多数小资产阶级民众的革命运动，便只能利用各派军阀及各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和互争，作军事上的应付。护法以来的南北战争，客观上确能削弱北洋军阀和凭借这种军阀的各国帝国主义之势力；然而这种斗争的社会基础是间接的——大多数民众并不能赞助这种斗争。革命之中而没有革命的阶级做它的社会基础，积极地参加和领导，这种革命当然是不能成功的。我们在这一时期，只看见革命营垒的内部崩溃——右派的民党，妥协的、投降的反动的分子随时随处发现，只看见辛亥以前多少有些革命性的社会阶级一天一天地反动。

虽然如此，帝国主义自己的发展，日益倾向于灭亡——它内部的矛盾不得不爆发；欧洲大战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在殖民地上大大地削弱，中国这时也能偷着机会稍稍发展自己的工业。于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渐渐地上历史的舞台。五四运动本身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结果，是中国民族自觉的一大进步。随后中国无产阶级——铁路工人、矿山工人、海员以及其他工人的罢工运动，组织工会的运动，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都大大地开展出来。民族革命运动中便得着了一支生力军——革命的无产阶级，真正能做革命的先锋的，而且是革命运动的领袖阶级。所以，此后的民族革命运动便能有群众的、广大的范围，渐渐地将以以前模糊的革命政纲变成很明了的革命口号——反对一切军阀，推翻帝国主义。

孙中山在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便明白地感觉到革命的主要阶级是大多数的贫苦的平民，尤其是农民，所以革命口号是“平均地权”；他在革命过程里，很正确地找着革命中的同盟者——“下等社会”的会党。他的革命主张，经过好几十次的失败，经过了辛亥革命后右派背叛革命的大失败之后，始终不变，孙中山是代表中国平民的民族革命的首领——所以虽然在反动潮流很利害的时期，平民各阶级都不能积极革命——孙中山却没有一刻妥协，没有一刻忘掉革命。如今革命战线之中新发现了无产阶

级，他当然加入民族革命，而且是强有力的生力军，于是革命运动的主力军便很明显的是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民族革命中的联合战线形成，革命的高潮重新兴起，民族革命的政党——国民党，在孙中山指导之下，决然改组，容纳中国工人的政党——共产党加入。这便是孙中山对于“谁能执行民族革命谁是中国民族”的问题之事实上的第二次的回答。

同时，反动派方面的情形也已经大大地改变。假使辛亥以前，满洲贵族及士绅阶级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反动派，孙中山要以农民阶级及游民无产阶级的联盟反抗它们，那么，辛亥革命以后，农工阶级及一切平民的仇敌却是军阀阶级及买办阶级。这十几年之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比前清时代增加了许多，他们不但利用形式上的中国中央政府，攫取权利，而且直接指使一种买办阶级组织的武装力量——如广州买办陈廉伯的商团，实行反革命。这种买办阶级到处表现它们的反动性。孙中山指导之下的广州革命政府毅然决然地扑灭这种外国雇佣的“商团”。这便是孙中山第二次对于“民族革命中应当反对的反动势力是谁”的答案。

再则，中国革命运动，虽然根本上是反抗列强帝国主义的革命，然而在辛亥以前形式上似乎只是反对满清的革命。一直要等到革命之后，各帝国主义屡次地帮助反动军阀及买办阶级，甚至于要直接以兵力攻打革命政府，经过了几十年的苦经验，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再明白地宣言：“今后的革命，目的要在推翻帝国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发现于孙中山政府对外宣言的一句话，实是因为最近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它们的利益，完全与帝国主义相反，它们的要求反映到革命运动上去，使隐藏在革命内的最终目的彻底显露出来——于是全国民众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便充实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内容。

孙中山的末年，正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初初开辟新的道路的时候——已经有真正能代表中国民族的无产阶级，真正能彻底革命的阶级，此后足以领导大多数农民群众及一切贫苦的平民——游民无产阶级，积极地实行革命，反对一切士绅阶级买办阶级的反动势力，避免资产阶级性的妥协政策——直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之军阀阶级。孙中山的伟大，正因为他在四十年来能随着社会内革命势力的增长而日益进于明显的不妥协的革命政纲。

不但如此，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对象，既是世界的帝国主义，他能够并且应当在国际范围中找着革命的同盟军。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往往有共和、民主、人道、正义的口头禅；尤其是那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尽着欺罔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革命前各国往往有遵守所谓国际公法而保护中国的政治犯的。

当辛亥革命之初，孙中山曾有联日的政策，然而不久便证实帝国主义者在辛亥前

即使优容中国的革命党，也仅仅在于自利自私的见解，想趁革命爆发而未胜利的时候，更进一步地攫取中国权利。等这种局面造成之后，他们便转而力助军阀等的反动势力了。孙中山对于这一点，曾经在《陈英士致黄克强书》后附注着说：“……不图彼国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国之强，尤畏民党得志而碍其蚕食之谋，故屡助官僚以抑民党，必期中国永久愚弱，以遂彼野心……”中国在这最近十年之中方才明切地看见帝国主义之用心，方才明白觉到中国自己所处的国际地位；孙中山在《民族主义》上说中国是各国的殖民地，是“众人的奴隶”。这些主人，“以不平等条约束缚中国的列强”，如何能做中国革命的同盟军！中国人既是“奴隶”，还得找奴隶的朋友。所以中国民族革命的同盟军，当然是各国无产阶级、世界所有的被压迫民族及殖民地——尤其是已经革命胜利的苏联农工阶级。

因此，孙中山——中国革命运动的代表，最后的遗嘱，尚且郑重地声明中国革命运动有与苏联及一切弱小民族联合之必要。

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半世纪以来，从模糊的“富国强兵”的口号，进化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从会党的军事暴动，进化到劳工农民之联盟；从联日政策，进化到与世界无产阶级携手——这一条困苦的道路，正反映在孙中山的生平和事业里呵！

“二七”前后工会运动略史

张特立

一、“二七”前工会运动之发展

我国北方和中部的真正工会运动，发生于民国十年，尤以铁路工人得风气之先。由是工会运动，风起云涌，彼响此应，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推其原因，系由于工人身受种种痛苦，因而要求改善，更因而组织工会。在工人所受种种痛苦之中，最先感受的原因有二：一、中外员司之虐待，如克扣工薪、贿赂公行、包卖米粮、包赁住宅、放印子钱、私行役使等等，种种黑暗，罄竹难书；二、经济的压迫：车务、工务两部分铁路工人，大概月薪都是九元左右；机器匠的月薪，以十五元上下为最普遍。生活日高，而工人薪如此低微，数口之家，何以度日！

但是工友们怎样知道组织工会，就能改善他们所感受的痛苦呢？换句话说，便是有什么事实，发动工友们起来组织工会的观念呢？这里也有三种事实：一、五四运动虽然是排日的爱国运动，而又完全是由学生发起的，但是五四运动完全表现一种群众的势力。工人们看见学生一有组织，便能殴打公使、罢免总长，于是也就起来组织职工会或十人团，赞助学生的爱国运动。后来这种爱国组织便一变其色彩，而为工人的经济组织了。二、大战后，世界各国的劳动运动，澎湃已极，报纸连篇累牍，日有登载，中国工人不免受其影响。尤以俄国工人之大胜利，最能惊醒中国工人。三、一班信仰共产主义、献身工人阶级的志士，最先组织工人补习学校、劳动组合书记部等机关，宣传工会的作用，开发工人的知识，并实际赞助工人们组织工会。

在这里有一点，须特别注意的，便是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铁路工人曾经也受过很大的刺激，开始发生的对于政治的兴趣。那时也有少数志士提倡工人组织团体，结果都失败了。其失败原因是：那时的工人团体，并不是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人团体的宗旨只图参加选举，而未注意工人切身的经济要求，所以失败后，就烟消云散，并未在工人群众中留下丝毫影响。五四运动后，一班提倡工人团体的志士却不然，一面助长工人的爱国运动，并因利乘便地输入正确意识，一面宣传真正工会组织的意义，并进

而引导工会为工人切身利益而奋斗。所以“二七”失败后，工会虽然被封禁了，但是真正的工会的观念，依然存留在全体工友脑海中。还有不少觉悟分子在“二七惨变”后，仍为工会努力。足见“二七”虽遭重大打击，工会运动却依然进行不已。

工会运动既然有了工人的经济痛苦和种种虐待做基本原因，同时又因五四运动的发生，使工人知道群众的组织势力，世界各国的劳动运动又做了工人人们的实际例证，又有一班志士的正确指导，所以真正的工会运动，就发生于民国十年而莫可抵挡了。

北方铁路工人运动，发生于两个地方：一是唐山，一是长辛店。五四运动的时候，京奉路唐山南厂工人即开始组织职工同人会，于民八“五七”国耻日举行示威运动，曾有三千余工人参加；该会并加入唐山各界联合会，做种种爱国运动。后来爱国运动渐渐消沉下去，职工同人会的色彩也渐渐改变，直至民国十年，遂变为纯粹的工会组织了。五四运动的时候，长辛店工人即有十人团的组织，加入者二百余人，开始与北京一班热心工人运动的志士接触。民国十年一月一日，才成立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该校在发起之初，为长辛店一班有力工头、工人中觉悟分子及热心工人运动的志士所主持。至同年五月一日，该校遂发起千余工人之示威运动，并产生工会的初步组织。后来经过许多困难和分化，淘汰了一些不良的工头，才成立了纯粹工人的工人俱乐部。铁路工人既然有了这两个组织，同时还有一个《工人周刊》替工人们鼓吹工会组织的消息，传达工人们的意思，因此各地各站的工友们都一致奋起发动他们的组织了。

工人们初有组织的时候，同时也就发生经济的奋斗。这就证明工人们受了不可忍耐的痛苦，简直不能等待他们有坚固的团体，即勉强举行罢工运动。这种事实，也证明工人运动并非凭空由少数鼓吹而成，实是有不可忍耐的痛苦为基本原因。十年八月间有长辛店工务处工人的加薪运动，十一月间有粤汉路工人的加薪罢工运动、陇海路工人驱逐洋总管若里的罢工运动，十二月又有汉口人力车夫及香烟厂工人的罢工运动，还有许多的零碎的加薪和改良待遇的运动。

当工人们进行工会组织的中间，当他们举行罢工运动的中间，他们得着了许多的教训。第一点，他们知道和平的哀求是没有效果的。如粤汉工人上禀要求加薪，结果不但不能加薪，还被开除八十一位小工。而且他们从此觉悟幸福与利益，是要靠工人自己的力量奋斗得来。第二点，惟有工人才能帮助工人。在他们组织工会和罢工运动中间，路局、员司、军阀、官僚、交通系等等都是或明或暗地破坏他们或压迫他们；只有同一阶级的工人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热心志士是忠实地帮助他们。如陇海工人罢工中，路局千方百计破坏罢工，竟想利用京汉工人往陇海开车，以致陇海工人之死命，但是京汉工人不但不受利用，反而赞助陇海工人。第三点，他们渐渐了解组织愈大，力量亦愈大。这是他们开始组织的时候，以及每一个组织问题中或运动中，都能直接

感觉，无须特别举例证明。

这些教训因此又变成促进工会的要素了。

接着就有十一年春间的香港海员罢工，那次罢工参加的海员至三万人，支持至五十七日之久，算是我国工人运动有史以来的一桩惊天动地的事件。那次罢工不但得到香港和广州全体工人的同情罢工和经济援助，而北方工人，亦极为兴奋。京汉、京奉、陇海、正太、京绥等路工人，发起“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曾举行许多次大会，并发出许多通电和文告，一面向铁路工人宣传阶级休戚相关之义，一面充分援助海员罢工。正当海员罢工的紧急关头，“援助香港海员”的旗帜从北京一直飘扬到汉口；陇海、京汉、京奉、正太、京绥等路工人汇寄海员工会之捐款，至二千元。这就可以表现北方工人运动怎样受海员罢工的影响了。海员罢工之大胜利，又使全国工人更确信工人阶级的组织势力，而工会组织因之也更易发展了。

自海员罢工胜利以后，全国各地的工会运动和罢工运动有如雨后春笋。而工会组织得最完善的，有京汉铁路工会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等。罢工运动最重要的，有五月间的上海纱厂工人罢工、七月间的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八月间的京汉工人罢工和九月间的安源矿工罢工等等。而且这些罢工都得着相当的胜利。不消说得，罢工胜利的结果，自然使工人得到许多的新教训，工人的团结力亦因之而增厚，工会的组织更易扩大到各地各种工人了。

工会发展的进程中间，遇着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便是集会结社自由问题。工会发生之初和罢工运动中，没有一处地方未曾遭过强权压迫或武力恫吓。如上海纺织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之被封禁，京汉及各地罢工中以及安源矿工罢工中，都遇着严重的武力恫吓。因此十一年八月曾发生全国工人的劳动立法运动，要求国会通过劳动立法案。这个劳动立法案共十九条：第一条即是要求承认工人集会结社自由；第二条要求承认工人同盟罢工自由；第三条要求承认工人团体的契约缔结权，同时又要求取消束缚工人的《治安警察法》和《罢工刑律》。工人们从痛苦中了解自由之宝贵，要求自由之迫切，于那次布满全国的劳动立法运动中完全表现出来。自然直系军阀豢养之国会，丝毫不能给工人以自由权，不过那次运动，是工人群众争夺自由之必须的初步办法，也是工人群众进行政治运动的发端。十一月间唐山五矿三万余矿工发生反抗洋资本家的虐待和要求加薪的罢工运动；罢工支持至二十余日，竟横遭洋奴杨以德的武力压迫。唐山矿工会、京奉路唐山工会、洋炭工会都被封禁，矿工伤五十余人，京奉路唐山工会书记彭礼和君被捕入狱。那次矿工罢工之受摧残和工会之被封禁，北方铁路工人异常愤激，愈觉得非夺到工人集会结社和罢工的自由不可。

正当唐山矿工罢工失败之际，全国各铁路工会代表聚集北京，议决各铁路一致罢

工，要求恢复唐山铁路工会、矿工会和洋炭工会，并承认矿工条件。虽然因为时机已过，各路罢工运动没有实际举行，足见那时工人所感受的切肤之痛，便是压迫工会的事件。那次会议最终决议有两点：一、筹备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次第统一各路组织；二、如某路遇到压迫时，各路工会一致行动，以图全体互相保障工会之存在。从这两个议决案看来，那么，我们便知道，十二年二月一日京汉总工会成立大会被禁止，因而引起大罢工，诚非偶然。

综起来说，北方及中部工会运动到“二七”时，发展到什么程度呢？铁路工人有组织者，如京汉、京奉、津浦、正太、京绥、陇海、道清、粤汉、株萍等九路，共计会员约四万人；武汉有二十个工团组织的工团联合会，人数约三万人；湖南有十四个工团组织的工团联合会，人数亦在三万人以上。北京天津济南等处，亦均有各业工人之工会发生。那时工人方面的计划是：先成立京汉总工会，再次第成立各路总工会，再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为铁路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各城市成立各业工会，再由联合而成立各城市工团联合会，准备于同年五月一日在武汉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谋全国工人运动之统一。工人们这种一日千里的进步和这种伟大的计划，军阀岂有不忌刻之理，怪不得吴佩孚揭穿假面具，而实行其大屠杀工人的阴谋了。

二、“二七”大罢工之始末

我们知道工会运动正在猛烈发展之中，而团体尚未集中，基础尚未稳固，正是工会运动最危急的关头；十二年春间就是我国工会运动的一个最危急的时期。我在前面已经叙述了北方及中部工人运动发展的大略，现在我再特别说说京汉工会蒸蒸日上之形势，证明“二七”罢工是不可免的事变。

民国十年以来，京汉工人陆续组织“工人俱乐部”，至十一年春，全路皆组织就绪，得十六个单位。四月九日在长辛店召集全路代表，筹备组织总工会，整饬和划一全路的组织。八月十日复召集全路代表于郑州开第二次会议，制定总工会章程，举定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决定总会地点设在郑州。紧接着第二次会议以后，即同月二十四日，复由北段工人发起全路总同盟罢工，作第一次经济的奋斗。全路一致响应，支持二日，结果工人胜利，路局不得已承认工人九条要求，每人每月加薪三元。足见京汉工人稍有全路统一的雏形，便不能忍耐，奋起而为改良生活之决斗。胜利自然又给予新的兴奋，京汉总工会也就无形中得到一种权威了。总工会筹备了四个多月，十二年一月五日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复在郑州开会，尔时全路纪律确已一致。即该路少数工人组织之传习所，亦自行宣告取消：该所之百余工友，亦悉数加入总工会。至是全路总工会统一之局完全告成，遂定于二月一日在郑州正式举行京汉总工会成立大会。

成立大会既已定期举行，于是由筹备委员会登报宣告成立总工会的宗旨，并邀请各工团各界到郑州参与盛典。不料一月二十五日，京汉局长赵继贤、南段段长冯沅忽致电吴佩孚，要求其禁止该会成立大会。吴佩孚遂利用机会，以赵、冯等报告为根据，下令靳云鹗严禁开会，靳又指使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执行一切。至一月二十八日，黄殿辰即到工会声明禁止开会，工会与之相持三日，终无结果。至三十日，忽得吴佩孚致总工会电，召代表赴洛计议，工人于愤激之余，遂派代表杨德甫、史文彬、李震瀛、李焕章、凌楚潘等五人即日赴洛与吴交涉。三十一日见吴，吴一味敷衍恐吓，仍声明禁止开会，交涉遂无结果，代表即于当日晚回郑。是时京汉十六个分会，到郑代表已有六十五人；应召而到郑之各工团亦有三十余，计代表二百三十余人；各地男女学生及新闻界到者亦有三十余人。不但成立大会已准备完善，并已由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命令各分会全体工友，于是日举行庆祝大会。在此情势之下，成立大会岂能因吴之禁止，而遂中止？

代表由洛回郑后，即召集全体代表会议，报告与吴交涉情形，当时全体代表一致愤激，咸谓集会结社乃人民应享之自由，吴佩孚何得而干涉！然犹再三计议，委屈求全，共同议决成立大会或可延迟一二日举行，但各工团所送之牌匾，则须于二月一日迎送总工会会所。当以此意详告黄殿辰，亦足见工人让步求全之苦心。不料二月一日清晨，郑州全部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当各代表及郑州全体工友整队护送牌匾向工会进发时，中途竟被军警包围，举枪威吓，阻止前进。于是全体大愤，群以人民自由既遭武力干涉，誓非开会以雪此耻不可。全体鹄立街心约二小时，代表与军警长官再三理论，终无结果。乃奋勇拚死冲开阵线，拥入会场，首由主席宣布组织总工会宗旨，及此次被强权无理压迫之可恨，并郑重宣布京汉路总工会正式成立。群众亦遂大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是时全场四周，已被武装军警包围，群情至此，更加激昂，奏乐欢呼，声震屋瓦。既而黄殿辰至，出言百般恐吓，强迫解散，但群众仍照常开会，延至下午四时，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

是日下午，代表所驻各旅馆，即有重兵监守，不许偶语；总工会在酒馆所定酒饭，亦不准开售。各代表一时完全丧失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的匾额、礼物等，也尽被毁弃道旁，不许馈赠。总工会及郑州分会会所均为军队占驻，禁止工人出入，室内一切文件、杂物，尽被捣毁。问何以如此强暴？兵士都说：是奉大帅命令。当晚郑州会所即被封闭。

我们现在试静思想：当初这种情形，工会应当如何办理才好？吴佩孚始则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禁止开会，继则由黄殿辰秉吴意旨，用强蛮手段，干涉开会。交涉数日无效，最后并不准各团体代表送牌匾，包围工人行列，监视行动，不准走路，

不准谈话，不准吃饭，并蹂躏会所。军阀之凶横至于此极！而我工人多年来奋斗得来之工会亦遭封禁！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到底是吴佩孚的用心惨暴，手段险毒呢？还是工会代表的主张激烈呢？京汉工友在此严重压迫之下、极端侮辱之下，还是束手待毙呢？还是急起以图最后的奋斗呢？想无论何人，凡有血气者，无不愿舍死拥护此神圣之总工会，奋力争夺此获而复失之自由，虽死亦无余恨！

各处代表目击此种情势，知毫无挽救之余地和退缩之可能。即郑重致函京汉总工会，其大要云：“京汉铁路总工会能否健全，实全国工人共同问题。我们希望京汉总工会必能为争自由而取最后奋斗之手段，各工团誓必为实力的后盾……。”各团体全体代表于当日晚车及次日早车分别离郑，各回原地准备实力奋斗，临行时，无不慷慨激昂，大有破釜沉舟之慨。京汉全路各分会代表于十分忍无可忍之中，当即秘密会议，本着拥护总工会之天职，真实代表全体工友的愤恨心理，为紧急之决议，其大意是：“我们为抗争自由起见，谨决于本月四号午刻宣布京汉路全路总同盟大罢工，同时为事实上的便利起见，总工会决移江岸办公。全路一切进行，于罢工期内，全视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是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决无退后的。”这个议决案，便是我国工人运动史上最有价值的议决案。如火如荼的“二七”大罢工，便根据这个议决案而发生了。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说：吴佩孚为什么摧残工会呢？吴佩孚这个人阴狠成性、口是心非的大奸雄。当他看见工人们毫无势力的时候，他便宣言“保护劳工”，以为沽名钓誉之计；及至工会势力日见膨胀，他便用种种阴谋破坏工人。一面设法买得工人领袖的欢心，如工人代表于十一年八月间去见他时，他亲自接见，殷勤招待，并赠送代表川资及纪念品，殊不知诚实工人并不如官僚政客之易牢笼，吴佩孚的手段遂毫无效果；一面又令他的兵工队学习开车，为破坏罢工之准备。等到他觉得工人势力已不可侮，他又唆使他的死党京汉南段段长冯沅组织京汉同人会，借以破坏京汉工人的组织。但是他的破坏手段，都着着失败。所以十二年二月一日京汉总工会开成立大会时，他便毫不客气地揭穿假面具，明目张胆地摧残工会了。但是他究竟为什么摧残工会呢？这个道理，是最易明了的。京汉全路早已是直系军阀的私产，换言之，就是吴佩孚的私产。京汉路是他的重要财源，供他挥霍奢侈，供他养兵乱国，并供他镇压人民之用。京汉第一次罢工时，他迫于时势，不得不允许工人每月增加工薪三元。但是后来他详细计算一下，每个工人每月增加三元，京汉路二万多工人，那么，每年便增加支出约八十万元，便是他每年减少收入八十万元。他如何舍得这笔巨款？因为这八十万元，他就认定了工人们与他个人的利益是根本冲突的，将来工会扩大，得陇望蜀，再接再厉，这还了得！恶贯满盈的吴佩孚，又知道他自己是为人民所痛恨的；工人有了组织，终究是他的隐患：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因此吴佩孚下定决心，非摧残工

会不可。当初就是工人方面能够格外容忍，也不免遭他的毒手。工会与其无声无臭而被封禁，不如轰轰烈烈地不屈而死！工人回想吴佩孚压迫工人的事实，应该明了军阀与工人的利益是永远冲突的。工人还可正告全国人民：中国铁路名虽国有，实则无异军阀及交通界官僚的私产；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军阀官僚和洋资本家是冲突的，与全国人民是共同一致的。

到了四日上午十二时，果然全路一律罢工，所有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止。京汉工人罢工后，第一件事情便是向旅客散发传单，说明人民的自由权被摧残，不得已而罢工。一般旅客与工人们同是被军阀剥夺了自由的人民，无不表同情于工人的壮举。他们痛恨军阀垄断国有铁路，摧残人民自由，因而妨碍一班人民的交通。工人们内部的组织是十分整齐严密的，因全路工人，自司机升火以至小工，无不是工会会员。各会员均听命于各分会，各分会均听命于总工会，秩序井然。维持秩序，则有全路各分会素有训练之纠察队；刺探消息，则有罢工期内各分会临时组织的调查队。但是在这组织严密的中间，也有一二缺点，为工人所必须注意的：第一，罢工后，车辆一概停止行动，总工会与各分会的信息来往，亦遂断绝；曹锟、吴佩孚、萧耀南、赵继贤等倒能往返电商，调动军队，屠杀工人；我工会反不能彼此互通消息，及至敌人杀来，犹在梦中。这种缺点：一则因为铁路上的电报生未加入工会，二则因为电报局工人无组织，并与铁路工人没有联络。故铁路工会将来必须劝导铁路电报生加入工会，为初步办法。第二，北段各站员司及站长等，居然私自开车，运输军队，屠杀工人。铁路下级职员这种助桀为虐的丑行，工人们此后亦必须尽其能力之所及，开导感化之才好。

四号罢工时，京汉总工会即发表宣言，提出五条件，其原文如下：

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沅，要求吴靳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

二、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六千元。

三、所有当日在郑被军警扣留之一切牌额、礼物，要求郑州地方长官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复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偿，并由郑州地方官到郑会道歉。

四、要求每星期日休息，并照发工资。

五、要求阴历放年假一星期，亦照发工资。

工人方面，既有总工会负责，又发表宣言，提出条件，当然是静待吴佩孚和路局方面派代表与他们接洽，俾得早日恢复自由。谁知奸险之吴佩孚，不但毫无与工会和平协商之意，且纵使其爪牙，多方压迫，百计破坏。吾人不妨叙述一二事实，证明当日吴佩孚之狠毒手段。在总工会所在地之江岸，始则由萧耀南之参谋张厚生要挟工会

交出林祥谦、罗海臣、杨德甫等五人，不遂；继则派大批军队占领铁路工厂，于深夜在工人家中拘去司机二人，强迫开车。江岸二千余工友闻讯，即全体冲破军警防线，将该二工友抢回，张之阴谋遂完全失败。于是一变其阴谋破坏之手段，而为威吓强横之暴行。首先捕去纠察团工友三人，并连工会派往要求释放被捕三工友之代表项德隆、罗海臣等四人，亦一并拘禁，百方威吓，谓须枪毙、斩首，他们毫不为动，而二千余工友又与军警对垒相持。张氏无法，只得将项罗等七人释放。直至七日下午二时才有警官来工会，谓奉萧督军命令，当派全权代表于下午五时来工会与工人代表开会谈判。谁知五时二十分即有大批军队突然包围工会，向工人群众开枪袭击，事前并无丝毫警告。此种一网打尽之毒计，始则诱骗工人以开会谈判，继则乘黄昏之时突然袭击，不下警告，诚所谓绝无仅有之残酷事件。郑州方面，由黄殿辰等，逮捕工会领袖刘文松、高彬、姜海士等五人，非刑拷打，游街示众，逼其下上工命令，刘等始终不为之屈。长辛店方面，一面由赵继贤限工人于十二小时内上工，一面调动大批军队，形同围猎。结果捕去工会领袖史文彬、陈励茂、吴雨铭、武把等十一人。及至工人群众要求释放被捕领袖时，此等手无寸铁之工人，亦遭江岸工友同一之命运。

是役也，计江岸死者有曾玉良等三十二人，残伤者二百余人；郑州被捕者八人；长辛店死者四人，重伤者三十余人，被捕者十一人；沿路各站，亦均有捕拿工会领袖，严刑拷打，或杀伤工人之同样事件。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被捕不屈，于回答三声“不下上工命令”之后，当工友群众之前，即遭斩首。京汉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以热忱赞助工人之故，亦于二月十五日被害。

统观当日情形，国人细想，这是工人行动激烈，要求过当呢？还是吴佩孚等居心险毒，立意谋杀工人呢？假若吴佩孚等稍有息事宁人之意，“二七”罢工，极易和平解决。当日工人方面要求之主要目的，即为撤退占据郑州工会之军警，恢复京汉路总工会；所提条件，工人方面未始不可由协商而让步。并且工会方面，曾将撤革赵继贤、冯沅、黄殿辰之条件可以让步之意，由代表委婉达知张厚生及其他曹、吴爪牙。此种事实，为参加此次罢工之工友所共见共闻。无如吴佩孚狼子野心，毫不顾及工人方面之意思，而以屠杀无辜之工人为称心快意之事。事后复捏造谣言，谓工人身藏手枪，与军队互斗，以淆乱国人之听闻，掩饰其屠杀之罪恶。其爪牙黄殿辰复勾结郑州少数流氓，假借国民大会名义，为反对工人之虚声。其实国人中稍有血气者，未尝不赞叹工人此次为人民争自由之壮举，而自惭不能附工人之骥尾也。

当日工人之奋斗情形，实笔不胜书，但是工人为反抗军阀为人民争自由之最勇敢的先锋，诚毫无疑问。工人中如林祥谦者，竟能于白刃加颈之际，连呼三声“不下上工命令”，虽古之英雄豪杰亦何以过此！江岸工友，处枪林弹雨之下，倒毙者已三十余

人，犹死守工会，无一逃避者。相持至数十分钟，得工会退后之令，始渐次退散。郑州姜海士等被黄殿辰强迫执旗劝告工人上工，姜等竟不畏强暴，反劝工人万勿上工。正定分会委员长康景星被军阀捕拿之后，于下令枪毙之时，彼乃要求稍延数分钟，俾得略申数语，时围观者数千人，彼乃从容叙述工人争自由之意见，滔滔不绝，言词慷慨，历一小时半，听者泪下如雨，狂号震天地，卒使某军官慑服，不敢加害。此种义烈行为，诚可歌可泣！因此吴佩孚无论如何横蛮残暴，无论如何严厉压迫，工人有如上述之奋斗精神，虽局外人亦知其绝无一蹶不振之理。“二七”大屠杀后，京汉工人之所以陆续上工者，虽由于军队之捆绑、强迫、监视，并绳之以严刑，其势不得不上工，实亦根据总工会二月九日之命令。该项命令，为劝告全路工人暂时忍痛上工，以图将来之再起。因总工会认定全路工友要能恢复工作，将来才有报复之可能。故屠杀后二年以来，京汉路的秘密组织，是从没有中断的。无怪乎曹、吴一倒，京汉铁路总工会之旗帜，又复高扬于郑州矣。

上述种种，均系“二七”京汉工友奋斗之实际情形，现在不妨再说说各路和各地工友的奋斗经过，证明工人阶级的一致及中国工人的阶级觉悟。读者于这些事实中，更能看出“二七”京汉罢工之扩大，及其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之重要意义。

各路的罢工援助，当各路代表离开郑州时，共同约定如京汉罢工三日仍无切实解决办法，即实行陆续罢工援助。代表回至本路即实行照此公约准备，现在不妨分别简单叙述一番，以明当日情形：

一、正太路。二月四日京汉路罢工后，是日下午一时，正太工会即行召集一个紧急执行委员会议，讨论援助京汉方法，结果决定：（一）立时发出通电，以作声援；（二）准备实力援助，七号实行罢工；（三）派纠察队往京汉正定分会石家庄部分，夜间帮同守望；（四）下午六时，召集全体大会。是晚召集全体大会，工友异常愤激，委员议案一律全体通过。七日正午，该路即一致罢工；直至九号晚得到京汉工会通知，谓京汉工潮已被武力压迫上工，请贵会明日开工，免遭意外。此通知证实后，正太方面才于十号一律忍痛开工。他们上工后，虽经武力恫吓，但工人团结坚固，故未受害。工会虽被封闭，然路局开除工会委员时，工人复一致反抗，路局遂不得不允许他们复职。

二、道清路。该路工人数不过千人，然于“二七”奋斗时最为勇猛，该路工会与京汉同日同时举行罢工，支持九日之久，始继续开工。工会领袖王惟俭等四人被捕入狱；黄业兴、李培学、谷雪岭、秦梦虎等均因此被开除，工会亦遭封禁。该会此种奋斗精神，正所谓“虽败犹荣”也。

三、津浦路 该路工会秘密约定于十三日上午五时，全路一致罢工，但南段浦镇

方面已先行发动，于十日上午实行罢工。嗣因京汉工友已遭武力强迫上工之消息传到，该路南段工人遂不能不即时恢复工作，而全路罢工之计划，亦只好中止了。

四、粤汉路 该路工会自八日起举行罢工，随后该路工人即被军队用麻索捆绑上工，徐家棚工会亦被封禁。

其余如京奉路工会、京绥路工会均一致议决于八九号实行罢工，一切罢工手续，均已准备完善。不幸京汉大惨剧发生，罢工风潮亦渐平息，他们同情的举动也只好相机停止了。即彼时尚无组织之胶济路工人，亦准备于津浦路罢工之后，立刻参加此次光荣之奋斗。“二七”罢工蔓延如是之广阔、工人团结力如是之伟大，军阀武力压迫，表面上虽暂告成功，然亦足以使军阀胆战心惊了。

至于各地各工团之实力援助京汉罢工，以武汉各工团出力为最多。当武汉各工团代表自郑州归去后，各以此次所身历的压迫与不自由，当众发表，武汉工友，大受感动，各工团全体议决于八日实行罢工，与京汉工友取一致奋斗。于大罢工之第三日（即二月六号），各工团各派代表数十百人，持旗至江岸总工会慰问，即于江岸举行露天大会，合江岸及各工团工友到者，有万余人，并举行大规模之游行示威，声容之壮，为从来所未有。不幸二月七日江岸工友即遭大惨杀，同时武汉特别戒严，湖北工团联合会及各重要工团均被封禁。然八日起执行工团联合会之议决案而实际举行罢工者尚有：汉阳钢铁厂工人、汉冶萍轮驳工人、丹水池工人、杨子机器工人等等，结果均遭悲惨的厄运，甚至工人子弟学校亦被蹂躏，开除工人至二百余人之多。其余如电灯、电话、自来水工人，事先即被重兵看守，故未能实行践约。其他各处，亦有同样之准备和行动，如上海总同盟罢工之酝酿、北京电业工人之暗中准备、香港海员工人之大愤激，种种事业，不可胜记。

至于那次罢工所得到的同情声，更是难以尽述，如湖南、广东、香港、上海、北京等处的工人团体之电报，如雪片飞来，举行示威者有之，召集大会者有之，集款援助者有之。真是“劳动者联合起来”的意义，于奋斗中特别能够表示出来。那次罢工不但得到全中国工人阶级的同情，而且震动全世界的耳目，第三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特因此发表宣言，海参崴工团总会和日鲜无产者同盟以及其他各国工会工人政党，均有最恳挚之电报，遥寄其阶级的同情。即我国民众团体，亦能认识工人争自由之真正意义，为充分之同情表示，如北京市民曾举行四千余人之群众示威运动；通电者、发表宣言者有：北京全体教职员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及各地学生联合会、全国各界联合会及各地各界联合会、民权运动大同盟、南洋华侨协会等团体。甚至直系御用之国会中，亦有不少有良心之议员屡次为此大屠杀之事件提出查办、质问及弹劾案者。工人要求之正当自由为全国人民所迫切需要，于此广大之同情声中，已足见其一斑。

我工人更须毫不客气地昭示国人：“二七”之役，实为我工人争自由之起始，自由一日未获，我工人誓必与各业民众为共同需要之自由而奋斗；在此奋斗中，我工人当继“二七”未竟之功，以争自由之先锋自任。

三、“二七”后的工会运动

“二七惨变”后，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既然受了偌大的损失，自然工人运动转到了一个新的局面，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最困难的局面。表面上看来，简直没有工会的活动，其实工人运动何尝一日停止，不过在严重压迫之下，进行迟缓罢了。就是在先进各国的工人运动，每当一次大压迫之后，亦必长时间才能恢复元气，何况初登舞台之中国工人。我们要知道“二七”后的工会运动情形，最好先检查“二七惨变”所留下之残破局面。

“二七”失败后，统计死者四十余人，残伤者三百余人，京汉及各地失业者在千人以上，被捕者四十余人，工会领袖，多在通缉严拿之列，故多逃亡在外。新兴的工会运动，蒙此巨大损失，何能负担！故彼时工会第一义务，即为抚恤死伤、救济被捕工友及其家属。因是工会运动者一时均奔走呼号，设法募集捐款，以图稍舒被难者之困苦。此种救济事业，有极重大之意义，不但直接安慰被难者，实亦间接安慰全体工人。工会运动者既多逃亡在外，同时又为救济事业所苦，秘密工会运动，进行自然更迟缓了。

直至十三年二月七日，才有全国铁路工会代表之集会。彼时检阅工会势力：计京汉工会各重要车站，均有数人至数十人之秘密组织，领袖人物为姚佐唐、刘文松等；京奉工会尚秘密存在，暗中拥有实力，工会基金亦尚有千余元；京绥车务工会亦颇为进步，有会员约一千五百人；正太工人尚能团结一致，委员会亦依然存在，惜工会基金分散；粤汉工会亦秘密存在，但会员亦略有减少；津浦工会只有浦镇方面有五十余人秘密组织；株萍路组织如旧，且极有进步；“二七”后异军特起者为胶济路之工会，该工会竟能于工人运动大受打击之后，突然发生会员至一千五百余人，算是“二七”后第一件难得的事。北京《工人周刊》，于极端艰难困苦之中，依旧出版，为指导工界之明星，这也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武汉等处各工团，至此亦只剩下秘密组织。全国铁路工会代表在此情形之下开会，到者计九路代表，共二十余人，卒能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其成绩不可谓不佳，兹录其宣言如后：

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宣言——

前年十月间开滦五矿罢工时，全国各铁路工会代表曾于北京集会，除计议援

助开滦矿工外，并产生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之正式成立。自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进行极为顺利，本拟去年三月间召集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不幸“二七”事变发生，京汉工友大遭屠杀，京汉和各路工会多被捣毁封禁，筹备委员会委员及各路工会重要分子，死伤的也有，监禁的也有，逃亡失业的也有。那么一来，进行就极为困难，因此一年之内，除救济死伤、失业、被害者外，简直没有余力，去精密地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幸赖筹备委员和各路工会领袖都具热忱、毅力，所以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事宜，没有停顿，这不能不说是“不幸中之大幸”！

我们经过了这一年多的艰难筹备，直至如今，我全国各路工会代表才于本年二月间集会，正式宣告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章程制定好了，机关也设立了，负责人员也推选出来了。那么全国铁路总工会，便形成而实具了。全国铁路总工会之成立，简直是我全体铁路工友于痛苦不堪之中，得着一颗光芒万丈的救星。

全国铁路总工会怎么是我全体铁路工人的救星呢？我们只要看看总工会的宗旨，便能知道了。总工会的宗旨是什么呢？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铁路工人之福利；二、联络感情，实行互助，化除境域界限，排解工人相互争端；三、提高知识，促成工人阶级的自觉；四、帮助各路工人组织各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界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关系。这四条宗旨，写得多么明白，哪一句一字，不是为我全体铁路工人谋幸福呢？

总工会既然有了宗旨，办法又怎么办呢？我们要谋得幸福首先便要有团体，所以这次成立大会已经制定了一个全国铁路组织计划，务使已经组织好了的各路工会，团结更加严密，各路工会被封禁了的，设法恢复，还没有组织的，从速成立团体。死伤、被捕、失业工友，总工会当力图救济；各路工会互相关系，总工会当力谋密切。从前各路罢工已要求到之条件，总工会当力争实行；并决定加入万国运输工人联合会，实现全世界联合之目的。我总工会既系全体铁路工友的总机关，当然以谋全体铁路工友之利益，为第一要义。但工人亦国民一分子，所有救国、救民以及反抗军阀、官僚之横暴和外人之侵略等国民运动，亦当视能力之所及，参加而促进之。我工友若参加此种国民运动，必首先提出争自由和恢复工会等要求。如有为恢复工会而奋斗者，吾人亦必同情之。这些办法，如果能够一一做到，不但总工会的宗旨实现了，我全体铁路工友的幸福也就不小了。

总工会既然有了很好的宗旨和办法，最可注意的，还有各路工会代表的精神。各路工会代表都抱定坚强的志愿、牺牲的魄力，大家约定非实行互助不可，非组织坚固的总工会不可，非奋斗以解除痛苦谋到幸福不可。这种全体代表一致的精

神，便是铁路工人万众一心的表示，也就是总工会团结坚固之表证。如果我全体铁路工友能以代表之精神为精神，那我们前途的希望，就很远大了。

全国铁路工友们！全国铁路总工会是我们全体铁路工友的，我全体铁路工友务必拥护我们的总工会，务必依照总工会的宗旨和办法做去，并须在总工会指挥之下，一致团结起来奋斗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除痛苦，获得幸福哩。全国铁路工友们！我们的总工会已经成立了，从此一致团结，一致奋斗，并一致庆祝全国铁路总工会万岁！

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后，工会运动为之一振，各路组织，均有显著之进步：如胶济路会员之大增加、京绥路车务工会会费之能确实收齐、正太工会组织之大加整饬，皆其明证。不料又遭国贼曹、吴之所忌，于五月间捕去汉口工人领袖杨德甫、许白昊、罗海臣、周天元、黄子章及律师刘芳等六人，牵连所及，全国铁路总工会北京会所亦被抄封，干事张特立、彭礼和、李斌等同时被捕，未几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亦在石家庄被捕。四月间胶济路工会又因举行大会被封禁，工会领袖郭恒祥等四人被开除，至此又有郭君等七人被通缉。一时各工会领袖有被开除者、被通缉者，亦有逃亡者，共计不下四十人。于是工会运动又受一大打击，为“二七”后工会运动的第一大厄运。然工会运动之进行，亦未尝因此打击而停顿，此则足见工人再接再厉的精神。

此次曹、吴倒后，民众势力随之增进，工会运动亦遂蓬然有生气。京奉路二千余失业工友，因工会之坚苦奋斗，居然达到完满恢复工作之目的。京奉路唐山四千余工友，虽无公开会所，然团结精神，极为浓厚，最近唐山工友捐助京汉被难工友恤金约二百元，即足证明京奉唐山工会之真正存在而具实力。胶济路工会亦已恢复，有会员千余人。京汉总工会恢复未及一月，郑州分会已有会员七百余人，彰德分会已有会员二百余人，将来向南、向北发展，不难恢复“二七”以前的局面。这些事实，表现什么意义呢？这就是说，工人运动又开了一个新的局面，这个新的局面，足使工人运动发生极大的进步。

前前后后工会运动的略史，都约略叙述完了。最后我觉得有几个重要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的：一、工会运动虽然遭受了“二七”那次的大摧残，但是二年以来，仍进行不断，前仆后继，那么我们便知道：无论如何压迫，工人运动决不会消灭的了；二、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发展的局面，工人们应一致奋起，恢复“二七”以前之原状；三、我们不但要恢复“二七”以前的原状，还要知道“二七”失败后之一败涂地，究竟是我们工人的组织还有未完善的地方，我们应该谋更完善的组织；四、我们有许多先烈既然为工会牺牲了，我们决不能退缩，决不可畏惧，无论如何，要继承“二七”未竟

之功，争得工人集会结社之自由；五、“二七”失败既然因为工会组织力还薄弱，以后处处要谋工会运动之统一，进而谋全国工人的统一组织，更进而谋全世界工人之联络；六、我们既然得着“二七”的教训，我们知道军阀与工人的利益是冲突的，我们以后处处要小心提防才是。

“二七惨变”是我国工人运动不可幸免的难关。“二七惨变”给了我国工人许多痛苦的教训，许多工友们已经为工会死了，为工会入狱了，为工会失业了。我全国工友只有继续这种光荣伟大的奋斗，只有不怕死的奋斗到底，才能改善我们工人的地位，造成更光荣的工人运动史。

托洛茨基主义或列宁主义？

斯大林 著 郑超麟 译

同志们！在同志加美聂夫的详细报告之后，留给我说的东西已不多了。我现在要专答辩同志托洛茨基及其朋友所传播关于十月革命、关于在革命当中同志托洛茨基的作用、关于党及关于革命的准备等等。我也要谈托洛茨基主义是不能与列宁主义相容的，最后我又要说到党对于同志托洛茨基最近的著作的责任。

一、十月革命的真相

在党员中间，人们特别热烈地传说中央委员会一九一七年十月曾宣布反对暴动。人们时常说十月十日中央委员会多数起初曾反对暴动，但突然有一工人进来就把会场的空气转换了。这工人曾说：“你们反对暴动，但我告诉你们，即使你们反对暴动，暴动仍然是要举行的。”中央委员会感动了，于是乃决定暴动。

这个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谣言，里得（John Read）在其所著的《十日》里面曾说及此事，里得此时还不是本党的党员，他堕入了苏哈诺夫（Soukhanov）的诡计中。此种记载曾为托洛茨基的友人在他们所著各种小册子中，譬如同志西尔经（Syrkin）在其近著关于十月革命的小册子中，屡屡采用过。

同志托洛茨基近著发表后，愈加促成这些谣言的传播。无须乎证明这些无稽之谈是不近情理的，也无须乎证明中央委员会会议中绝没有这么一回事。我们以前未曾注意到这些传说，以为这是党内反对派及党外的人惯用的无聊的发明。对于里得的错误，我们也未曾把他看得重要。但是在同志托洛茨基最近的行动后，就断不能把这传说置之不问了；因为人们要利用这些传说，去训练青年且不幸已收了些功效。所以我应以事实来打消那人们所传播的这些谣言。

我们拿一九一二年十月十日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记录来看。出席者：季诺维埃夫、列宁、加美聂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斯威得洛夫、乌利茨基、得热尔任斯基、郭仑泰、布不诺夫、索可尔尼可夫、洛莫夫。议事日程为：“现在情势与暴动”，讨论后把

列宁的动议来通过（关于暴动的）。此动议由十票对二票通过。由此看来，中央委员由十票对二票已决定直接准备暴动。当时举出列宁、季诺维埃夫、加美聂夫、托洛茨基、索可尔尼可夫、布不诺夫六人组织政治局，指导暴动。

事实便是如此。

这些事实推翻许多传说，打破中央委员会曾宣布反对暴动的传说，打破中央委员会因对暴动问题意见不同而起分裂危险的传说。从这记录中，又很明白看出直接暴动的敌人——加美聂夫与季诺维埃夫——已加入政治局来担任指挥暴动。然则决裂已不成问题了。

托洛茨基以为在十月中本党几有和社会民主党员相等的加美聂夫、季诺维埃夫的右派，假使是如此，为何本党能避免决裂，又为何这些同志能以指导暴动的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党内占重要位置？人人知道列宁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是很强硬的，列宁决未宽恕过党内有社会民主党倾向的同志，更不许他们占重要位置。

成问题的同志是多数党老党员，他们是站在多数主义普通基础上面，关于根本问题的见解是一致的，譬如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原动力、农民的作用、党的组织的基础等等。若是没有这些一致的见解，则免不了决裂。这些同志和中央委员会多数意见的不同，决不至于引起分裂，只过几日就消灭了，加美聂夫同志和季诺维埃夫同志是列宁主义者，是波尔札维克。

我们现在说一说同志托洛茨基在十月暴动中的作用的传说，托洛茨基朋友热烈地传播托洛茨基是暴动的创意者与唯一的指挥者。

这些谣言特别是同志托洛茨基著作的编辑者同志伦斯列（Lentsner）散布得最起劲。托洛茨基不提及党的作用，又不提及中央委员会与列宁格勒委员会在暴动组织中的作用，而把自身放在第一把交椅上，自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帮助这种谣言之传播。

我不否认同志托洛茨基在暴动中的作用之重要，但我应该说他在这中间没有也不能有特别的作用，他不过以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长资格来执行那时党的意志而已，党则一步一步地指挥他。苏哈诺夫一类小资产者自然觉得奇怪，但是事实，真的事实完全证实了我刚才所说的话。

试看十月十六日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记录。出席者：中央委员会委员，彼得格勒委员会代表，军事组织代表，工厂委员会代表，工会及铁路工人代表；此外还有同志克理伦柯、学特满、加李宁、胡洛达尔斯基、习里亚蒲尼可夫、拉起斯及其他。议事日程：“暴动的实际组织”。列宁的动议由二十票对二票通过，有二票中立。人们决定组织一中央机关担任暴动的实际组织。此机关由斯威得洛夫、斯大林、得热尔任斯基、布不诺夫、乌利茨基五同志充任之。此委员会依照中央委员会命令来指导实际工作。

你们看见：中央委员会这次会议发生了一件“恐怖”事实，即指导暴动实际组织的中央机关，并未邀请所谓暴动的“创意者”“主要行动者”“唯一指导者”托洛茨基参加。

托洛茨基在我们党内是较新的党员，不能在党中及暴动中有特别的作用，他不过如一切负责的战士一样执行中央委员会及其各机关的意志而已。知道多数党组织的人就不难明了他不能有何种别的作用；若托洛茨基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意志，他不能对于事变的进行发生何种影响。人们所谈他在党中有特别的作用，这不过是胡说而已。

这不是说十月的暴动没有创意者，它的领袖及首倡人是列宁。列宁关于暴动的动议已为中央委员会所采纳，他当时虽迫得在秘密的条件中生活，任托洛茨基怎样说，但他终是暴动的真正首倡者。否认他的作用，将是很蠢的、很可笑的。

事实只是如此。

有人说这是不错的，但是同志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当中很勇敢地奋斗，这可否认的么？他在十月革命当中很勇敢地奋斗这是真的，但很勇敢地奋斗的不只他一人，例如左派社会革命党，此时也一块儿和多数党人努力工作。我敢说在暴动胜利时期中即在敌人已经孤立及革命势力不断地扩大的时期中，很勇敢地奋斗是不难的。在这种时期，即落后的人也能变成英雄。可是，无产阶级的争斗不是时时进攻，也不是时时得着胜利，也有退守或失败的时候。真正的革命者不仅在暴动胜利时期应该努力，就是在退守及失败时期也是一样。

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十月革命中援助了多数党，他们也是很勇敢地奋斗，但在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的时期、这些“健儿”是如何地狼狈，德国帝国主义的进攻又把他们抛于黑暗的失望中。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当中曾作很勇敢的奋斗，到了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时期，革命暂时不胜利期间，就没有勇气及坚决心，只得步左派社会革命党后尘。当时的情势很严重，必须有特别的勇气，才能退守及时缔结和约，以避免无产阶级的军队遭敌人的打击，而保存农民的后备军，经过一定时间的休息，即可用新的力量去攻打敌人。

依托洛茨基的意见，十月时候的根本教训，便是不要走出正轨。这是不对的，因他的公式只有部分的真理。真理，全部的真理是不仅在革命时期不应走出正轨，当革命失败以及敌人强迫我们退守时期也应该不动才行。十月不过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若开始就走出正轨，实是不幸的事，但是若在取得政权后，到革命经过困难时期而走出正轨，则更是不幸的事。革命后保存政权与夺取政权同样重要。同志托洛茨基在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时期，在很困难时候又是当我们将失却政权的时期，既然走出了正轨，那么他便不配说加美聂夫与季诺维埃夫在十月革命中的错误。

二、党与十月革命的准备

听着同志托洛茨基的说话，可以使人相信：多数党在三月与十月之间已是智穷力竭；列宁为内部纠纷所困，感受许多阻碍，若没有同志托洛茨基在那里，谁人知道十月革命怎样结果！听着同志托洛茨基说及关于党的话，似乎有些趣味，因在他所著书第三卷的序言中我们见着“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工具”，又见着“若无党或站在党的旁面，或者这党不是真正的党，无产阶级革命不会得胜”。照他这样说，便以上帝的智慧也不足以解释：若“主要工具”不好，我们的革命如何会胜利？

我们现在试把十月革命准备的历史约分为三个时期来看。

（一）党的新方针的时期（三月——四月）

这时期重要事实是：（一）俄皇制度之推翻；（二）临时政府（资产阶级专政）之成立；（三）工兵代表苏维埃（工农专政）之出现；（四）双重的政权；（五）四月示威；（六）政权的第一次恐慌。

这时期的特点，就在资产阶级专政和工农专政同时并存，且这个时候，工农专政信任资产阶级专政，信任其和平的倾向，自由地放任政权落在资产阶级之手而自己就这样变成了资产阶级的附属品。这二个专政间之严重的冲突，此时还未曾发生。此时却有一个所谓“接洽委员会”。

这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变动和吾党历史上所不能忘记的转弯点。直接推翻政府这一旧的革命前的根本原则是明了而确定的，可是这原则已不适合于新的斗争条件。现在已经不能够直接走去推翻政府，因为政府和在爱国派势力下的苏维埃已经有了联络，照旧原则使去，吾党将担起一种势力不均的斗争：反对政府，同时又反对苏维埃。

可是，我们也不能够采取维持临时政府的政策，因为这是帝国主义的政府。在这新的斗争条件里，吾党采取新的方针，这是必要的，吾党（其大多数）暗中摸索地向这新方针走去。吾党采取了一种政策，使苏维埃在和平问题中逼迫临时政府；吾党未能立刻决定前进一步，从工农专政的旧口号，到苏维埃政权的新口号来。这种不彻底的政策，为的是使苏维埃在具体的和平问题中看出临时政府之继续帝国主义的本性，且即以此使苏维埃离开临时政府。可是，这是很错误的立足点，因为这立足点产生了和平的幻想，给爱国派利用了去，并使群众的革命训练愈加难做。这错误的立足点，那时我要与吾党其他同志共同负责的；我完全放弃这错误的立足点时候，仅仅在四月中旬，采取了列宁的提案以后。〔托洛茨基同志称季诺维埃夫同志为“希尔费丁派”（Partisnd Ne Hilfeiding），但大家都很知道，当时季诺维埃夫同志完全站在列宁的观

点。]新的方针是需要的。列宁在他有名的《四月提案》里，就给吾党以这新的方针。我不细说这提案了，因为这是大家每个人都知道的。那时吾党和列宁中间有分歧的意见么？有的。这意见分歧闹得很久么？不多过二星期。彼得城党部会议（四月后半月）采取了列宁的提案，这就是吾党发展上之转弯点。全俄的四月会议（四月底）不过推广《彼得城决议》于全国范围，团结吾党之十之九于党的统一的立足点。

现在，七年已经过去，托洛茨基同志把波尔札维克党人旧时的意见分歧重新提起来，他把这分歧的意见说得像波尔札维克主义内部有两个党在那里斗争。可是，第一，托洛茨基同志，这里，把事情万分张大了。其实波尔札维克党渡过这意见的分歧，绝未感受一点损失。第二，吾党将是少数人的机关而非革命的党，假如吾党不容许党内有稍微不同的意见。这中间，大家都知道，我们过去，譬如在第三国会时代，也有分歧的意见，然而这并不妨害了吾党的统一。第三，托洛茨基同志现在既愿热烈地提起波尔札维克党旧时的意见分歧，问一问他自己那时的立足点是怎样，这或者也不是无益的罢？托洛茨基同志的著作的所谓编纂者，伦斯列同志，宣传说托洛茨基同志的《美洲来信》（三月），“完全超越”于列宁的《四月提案》根据之列宁的《远方来信》（三月）。所谓“完全超越”就是这样说的。托洛茨基同志并不驳斥这无稽之谈，而且似乎以感谢态度承认了。可是，第一，托洛茨基同志的信“完全不同于”列宁的信，无论在精神上或在结论上，因为《美洲来信》完全表现出托洛茨基同志的反波尔札维克口号“皇帝不要了，政府是工人的！”这口号是指明革命不要农民。只要比较这两种来信，我们即可知道。第二，在这种情形之下，怎样能够解释，回国之后，列宁需要与托洛茨基同志分立呢？谁不知道列宁不止一次地批评过托洛茨基同志的口号：“皇帝不要了，政府是工人的”，以为这是打算“跳过正有生气的农民运动”，这是以“工人政府夺取政权为儿戏”？在列宁的波尔札维克的提案和托洛茨基的反波尔札维克的公式，连那“夺取政权的儿戏”，这中间能够有什么共同之点呢？伦斯列同志于许多关于我们的革命的神话之外，为什么还要冒险地再加上托洛茨基的《美洲来信》“超越”于列宁的有名的《远方来信》这一神话呢？

这些神话的中间，有一种流传很普遍的，即说托洛茨基同志是内乱中胜利“唯一的”或“主要的组织者”。同志们，为真理起见，我应该宣言：这神话完全不合事实。我绝不是否认托洛茨基同志在内乱中的重要作用。可是，我应该十分坚决地说：我们的胜利的组织者之无上的光荣不属于几个人，而属于我国先进工人之大集体——俄国共产党。试举几个例来看，这或者不是无益的。你们知道苏维埃共和国的重要仇敌，是高洽克（Koltchak）和田尼庚（Denikine）。你们

知道我国能够自由呼吸空气，仅仅在战胜这两个仇敌以后。历史告诉我们，我军肃清这二位将军，高洽克和田尼庚，是违反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计划方才做到的。你们自己看：

（一）高洽克 事情在一九一九年的夏天。我军进攻高洽克，向乌发（Oufa）前进。托洛茨基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议：停止白河（乌发前）阵线的进攻，让乌拉（Oula）到高洽克手里，我们从东方战线抽回一部分军队而派遣到南方战线去。会场起了热烈的辩论。中央委员会不同意于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觉得我们不能到让乌拉及其工厂和铁路到高洽克手里，因为那里他容易恢复元气，拉拢富农而再占据窝瓦河流域。我们必须先驱逐高洽克过乌拉岭到西比利亚平原去，仅仅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好移动军队到南方去。中央委员会拒绝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计划。托洛茨基提出辞呈。中央委员会不许他辞职。总指挥华泽底斯（Vatsetise）赞成托洛茨基计划的一人，辞职了。嘉米纳夫同志代替他当总指挥。从那时起，托洛茨基同志就不直接参加东方战线的工作。

（二）田尼庚 事情在一九一九年秋天。进攻田尼庚不能得手。围绕马孟多夫（Mamontov）的“铁环”是分明熔化了。田尼庚占领了顾尔斯克（Koursk），田尼庚向奥勒尔（Orel）攻来。托洛茨基同志从南方战线被召回来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央委员会承认现状是很可虑的，并且决定派遣新的军事人员到南方战线去，而撤回托洛茨基同志。新的军事人员要求托洛茨基同志“不干涉”南方战线的工作，托洛茨基同志不直接参加南方战线的工作。南方战线的一切行动，包括我们占领罗斯多夫（Rostov-Sur-Don）和奥德萨（Odessa）在内，托洛斯基同志都没参加。

让他们设法推翻这些事实罢！

（二）群众的革命动员的时期（五月——八月）

这时期重要事实是：（一）彼得城的四月示威和“社会党人”参加的联立政府之正式成立；（二）俄国重要区域五月一日示威高呼“德漠克拉西和平”的口号；（三）彼得城的六月示威高呼重要口号“打倒资本家的阁员”；（四）前敌的六月进攻和俄国军队的失败；（五）彼得城的七月武装示威，立宪民主党阁员退出政府；（六）反革命军队从前敌召回，《真理报》编辑部被捣毁，反革命与苏维埃斗争，克伦斯基领率的新联立政府成立；（七）吾党开第六次大会提出准备武装暴动口号；（八）反革命的“国家会议”和莫斯科的总罢工；（九）哥尼洛夫进攻彼得城之失败，苏维埃复兴，立宪民主党人辞职，“督政府”之成立。

这时期的特点，就在恐慌的加重和苏维埃与临时政府间不固定的均势之破坏。这个均势且不说它是好是坏——在前时期是存在的。双重政权两方都感觉不便了。脆弱的建筑物“接洽委员会”，已到了末日。“政权恐慌”和“政府庸懦”这二句是那时最通行的话。前敌的危机和后方的解体，增强了极端派的势力，并缩小爱国派向双方求妥协的机会。革命的动员令下了，因为反革命的动员令也下了。反革命自己又推动革命前进，激起新的革命怒潮。政权交给新阶级这一问题，变成了当时最紧迫的问题。

那时，吾党内部有分歧的意见么？有的，不过不管托洛茨基同志怎样努力宣传党内有个“左派”和“右派”，但这意见分歧纯粹是事务的性质。这就是说，假使没有这种意见分歧，那一般说来将没有活的生活和行动的党的工作。

托洛茨基同志宣传说，彼得城四月示威引起了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意见分歧——这是错误的。对这问题，中央委员会是绝对的一致，它斥责一派同志的谋划，打算在这波尔札维克党人在苏维埃和军队中皆居少数地位的时候拘捕临时政府。假使托洛茨基同志著述十月革命的“历史”，不是根据苏哈诺夫，而是根据实际的文件，那么他将不难相信他所信以为真的是错误的了。

托洛茨基同志肯定说，“列宁倡议”的于六月九日举行示威的计划，被“右派”的中央委员指为“轻躁”——这是绝对错误的。假使托洛茨基同志的著述不是根据苏哈诺夫，那么他将确实知道六月九日的示威运动是得着列宁的完全同意才延期的，列宁在彼得城委员会的有名会议，还有一篇大演说，赞成这个延期（见彼得城委员会的记录）。

托洛茨基同志说到中央委员会内部因七月武装示威而惹起了“不幸的”意见分歧——这是完全错误的。托洛茨基同志简单地想象中央委员会几个指导的委员“应该把七月这一幕看做有害的轻躁举动”。托洛茨基同志那时还未加入吾党的中央委员会，他仅是我们在苏维埃的一个代议士，他自然会不知道中央委员会只把七月示威看做试探敌人的手段，中央委员会（和列宁）并不愿也不想，在主要的几个苏维埃尚在爱国派手中的时候，把示威改成了暴动。波尔札维克党人中间，有某几个人实在因七月的失败而流涕，这是十分可能的。我知道譬如那时被捕的波尔札维克党人中有几个准备离开我们的队伍。可是，因此便作出结论攻击几个所谓“右派”、所谓中央委员，那就未免太曲解了历史。

托洛茨基同志宣言，在哥尼洛夫叛变时候，吾党高级人员的一部分，发现一种倾向，主张与爱国派联盟，主张维持临时政府——这是错误的。这所说的自然是那些最“右派”的分子，他们搅扰了托洛茨基同志的清梦。托洛茨基同志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有许多公开的文件，譬如那时党的中央机关报，这些就驳斥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宣言。

托洛茨基同志举出列宁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其中有个警告，反对维持克伦斯基。可是，托洛茨基同志不了解列宁的信其意义及其目的。列宁在他信中有时故意前进一步，提醒那易于发生的可能的错误，并预先批评这些错误，其目的乃是使吾党预先看着这些错误而设法避免，他有时或放大了“微细的情况”“把苍蝇看做象”，这也是同样的目的。党的首领，特别是他处在秘密生活的条件，是不得不这样做的，因为他应该看得比他的同伴远些，并应该提醒每个可能的危险，甚至“微细的情况”。

可是，从列宁的这种信中（他的这种信是不少的），作出“不幸的”意见分歧的结论，并利用起来，这乃是不了解列宁的信，不认识列宁。这个，应该可以说明托洛茨基同志有时空费心思了，简单一句话说，在哥尼洛夫叛变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内部一点意见分歧都没有。

七月失败以后，中央委员会和列宁中间确实发生了意见分歧，关于苏维埃命运的问题。大家知道，列宁要集中党的注意力到苏维埃外的武装暴动，他要人留心不要被苏维埃所诱惑了，因为他以为苏维埃被爱国派利用坏了，现在已成了一件空的东西。中央委员会和吾党的第六次大会采取了更慎重的政策，决定说：那以为苏维埃复振无望是没有根据的。哥尼洛夫的叛变证明这决议是正确的了。总之，这种意见分歧对于吾党并无现实的意义。随后，列宁也承认第六次大会的政策是对的。有趣的，即托洛茨基同志不抓住这一意见分歧，并不把它放大到“神奇的”规模。

一致的和巩固的党，站在群众的革命动员的中心——这便是吾党在这时期所处的地位。

（三）暴动的组织的时期（九月——十月）

这时期重要事实是：（一）德漠克拉西会议的召集和与立宪民主党人联盟思想的消灭；（二）莫斯科和彼得城的苏维埃走过，站在波尔札维克党人的一边；（三）北方苏维埃的大会和彼得城苏维埃决议反对派遣军队到前敌去；（四）吾党中央委员会决议暴动和彼得城苏维埃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成立；（五）彼得城卫戍队决议武装拥护彼得城苏维埃和军事革命委员会系统的组织；（六）波尔札维克武装势力的进攻和临时政府阁员被捕；（七）彼得城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取得政权和苏维埃第二次大会创立“人民委员会”。

这时期的特点，就在恐慌的迅速地加重，政府人员的手足失措，社会革命党人和孟雪维克党人的孤立无援及摇动分子的成群结队走过波尔札维克党人一边。这时期革命策略有一新奇的特点，是应该指出的。这特点就是革命每次的，或差不多每次的进攻，都出于自卫的形式。拒绝派遣军队，这无疑是革命进攻严重的步骤，但这进攻乃在保护彼得城以抵御外敌可能的进攻之口号底下进行的。

军事革命委员会成立，这无疑是对临时政府进攻的更严重的步骤，但这进攻乃在组织苏维埃对军事机关行动的监督之口号底下进行的。卫戍队公开地走过军事委员会一边，来和苏维埃委员系统地组织，这无疑地是表明暴动开始，但革命进这一步，乃在保护彼得城苏维埃以抵御反革命的可能的进攻之口号底下实现的。革命把自卫的外衣遮盖了自己的进攻行动，这为的是吸引那些不决定的摇动的分子到自己一边来要容易些。这便可解释这时代的演说、论文和口号表面都带着自卫的性质，而其内容仍旧是猛锐进攻的意义。

这时代，中央委员会内部有分歧的意见么？有的，而且不是不重要的。关于暴动问题之有分歧的意见，我已经说过了。这些分歧的意见完全可以在十月十日至十六日的中央委员会记录上看得出来。我以前说过的，现在可不必再提了。现在我必要提及这三个问题：参加临时国会问题，苏维埃在暴动中的作用问题和暴动时间问题。这所以必要，也是因为托洛茨基同志很热烈地自己烘托在触目的位置，“无意地”曲解了列宁对于后二问题的观点。

临时国会的问题无疑是有严重的性质。临时国会的目的究竟在哪里呢？在乎帮助资产阶级，把苏维埃放在脑后而建立资产阶级国会的基础。在这复杂的革命环境底下，临时国会能够尽这种职任么？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事变证明这目的是不可实现的，而临时国会自身表示哥尼洛夫式的叛变之流产。可是，孟雪维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创立临时国会，恰无疑是为这个目的。在这条件底下，波尔札维克党人参加临时国会会有什么意义可言呢？这也不过是造成无产阶级群众的错误，认不清临时国会的真面目。这大约便可以解释列宁为什么在他的信中，要用很大的热情去驳斥那些主张参加临时国会的人。参加临时国会，这无疑是严重的错误。可是，像托洛茨基同志所说，以为主张参加的人，进临时国会去的目的是在组织的工作，是在“指导工人运动”“于社会民主党范围之内”，这也是错误的。这完全不是事实。假使这是对的，那吾党自不能够以公然退出临时国会为改正错误的手段。吾党的活动和革命能力亦在乎它转瞬间即能改正这种错误。现在，且让我来改正托洛茨基同志著作的“编辑者”，伦斯列同志，报告波尔札维克党团会议解决临时国会问题中间的一个微小的不确之点。伦斯列同志报告说这会议上有两个报告者——加美纳夫和托洛茨基，这是不确的。实际上有四个报告者：两个主张对临时国会怠工（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个主张参加（加美纳夫和诺更）。

说到托洛茨基同志论列宁对暴动形式问题的观点，那他就更糟了。托洛茨基同志以为照列宁意见，吾党在十月应该“不理苏维埃”而自夺取政权（见《列宁论》七十一页）。托洛茨基同志，随后批评这附会于列宁的无意识思想，而结果却以高傲的态度

说：“这是错误！”托洛茨基同志这里关于列宁的话并不是事实，他曲解了列宁对于苏维埃在暴动中的作用之观点。我们能够列举多数的文件，证明列宁主张夺取政权须经过苏维埃，而切不可不理苏维埃。托洛茨基同志为什么偏要创造这段过分奇异的神话，附会于列宁身上呢？

至于说到托洛茨基同志“分析”中央委员会和列宁对于暴动时间问题的观点，那他也未尝不糟。谈到十月十日中央委员会有名的会议，托洛茨基同志竟肯定说在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决议案，以为暴动应在十月十五日以前举行。（见《列宁论》七十二页）”这就是说中央委员会已经指定十月十五日为暴动时期，随后自己又打破这成议，把暴动延期到十月二十五日。这是真的么？不是的。中央委员会在这时期共通过了两个关于暴动的决议案——十月十日的和十月十六日的。我们试看这两个决议案。

十月十日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

中央委员会承认俄罗斯革命的国际形势（德国舰队的暴动，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风潮竭力在全欧洲的发展，帝国主义间为扑灭俄罗斯革命而缔结和平之危险）、军事状况（俄国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一伙必定把彼得城卖给德国人）以及无产阶级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这些连着农民暴动、民众对于吾党的信仰（莫斯科选举）以及第二次哥尼洛夫叛变之明显的准备（派遣军队离开彼得城，哥萨克骑兵召回彼得城，哥萨克骑兵包围明斯克及其他）。以上这些都把武装暴动列入于议事日程。

这样承认武装暴动是不可避免的和完全成熟的，中央委员会告诉党的各种组织要指导这暴动，并以此观点讨论和解决一切实际的问题（北方苏维埃大会，派遣军队离开彼得城，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的进攻等等）。

十月十六日中央委员会联合负责同志会议的决议案：

本会议完全同意和拥护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号召一切组织和一切工人、兵士到细密的和有利的武装暴动的准备，到维持中央委员会因此而创立的机关，并表示完全的信心，确信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能指定适当的进攻时间和合用的进攻方法。

你们看托洛茨基同志的记忆力，关于暴动时期的和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暴动决议案的，竟这样地不行了。

托洛茨基同志肯定说列宁并不看重苏维埃的合法地位，说列宁不懂得十月二十五日全俄苏维埃大会夺取政权的重大意义，说所以列宁便坚持须于二十五日以前取得政权——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不的确的。列宁主张十月二十五日以前取得政权，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反革命随时都可出卖彼得城，日渐提高的暴动风潮将消沉下去，因此每一日都是可贵的；第二，因为彼得城苏维埃公开地规定并公布暴动日期（十月二十五日）是一种错误，这错误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改正，即实际的暴动爆发在这法定的暴动时期以前。这大约便可解释列宁在他的信中为什么要用很大的热情去驳斥这拜物主义的日期——十月二十五日。事变证明列宁完全是对的。大家知道暴动是在全俄苏维埃大会以前开始的。大家知道实际上政权是在全俄苏维埃大会开会前取得的，而政权还不是苏维埃大会取得，乃是彼得城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取得哩！苏维埃大会仅仅从彼得城苏维埃手中接受政权过来。这便可证明托洛茨基同志长篇大论关于苏维埃合法地位的意义完全是白费的了。

活的和有力的党，站立在暴动的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革命群众前面——这便是吾党在这时期所处的地位。

以上便是辩白关于十月革命准备的那些神话。

三、托洛茨基主义呢？列宁主义呢？

我们上面说过了托洛茨基同志及其朋友因十月革命及其准备而传播出来的许多不利吾党和关于列宁的神话。我们已经辩白过和推翻过这些神话了。可是，现在有一问题：托洛茨基同志何乐而传播这些关于十月革命及其准备、关于列宁及其党的神话？托洛茨基同志何乐而为此新的文字进攻，攻击吾党？当现在吾党不愿意争辩，吾党忙于迫切职责，吾党需要缜密地工作以恢复经济而非需要为旧问题作新斗争的时候，——托洛茨基同志这种进攻究竟有什么意义、责任、目的呢？托洛茨基同志何乐而迫吾党向后转去作这新辩论呢？

托洛茨基同志说为“研究”十月革命，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可是，假如没有多方攻击吾党及其首领列宁，那便不能研究十月革命么？假如十月革命的“历史”，自开始以至结局都在诋毁这暴动的主要行动者，都在诋毁这暴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吾党，那这“历史”还有什么意义呢？不是的，这里事情不在乎十月革命的研究。

人们研究十月革命，不是这样。人们著述十月革命历史，不是这样。这里，明显地别有一种“存心”。而这种“存心”，大家知道，即在乎托洛茨基同志在其文字的进攻中还有一种（还有一种！）愿望，希图准备相当的条件以托洛茨基主义暗换列宁主义。托洛茨基同志亟需攻击吾党、吾党的中心人物、暴动的指导者，为的是从对党的

攻击过渡到对列宁主义的攻击。攻击列宁主义是必要的，为的提托洛茨基主义出来，当作“唯一的”“无产阶级的”（你们不要笑！）思想。所有这些自然要（自然要！）借用列宁主义的招牌，为的把这种暗换的过程弄成“不显露的、无毛病的”。

这里，便是托洛茨基同志最近文字的进攻之真义。

因此，托洛茨基同志这种文字的进攻分明就提出托洛茨基主义问题。

那么，什么是托洛茨基主义呢？

托洛茨基主义有三特点，使它与列宁主义不能相容。这些特点又是什么呢？

第一，托洛茨基主义是革命无间论。在托洛茨基主义的解释之下，革命无间论是什么？这是不把小农看做革命势力的革命。托洛茨基同志的革命无间论，照列宁的话，是“跳过”农民运动，“以夺取政权为儿戏”。他的危险在哪里呢？在乎这种革命，假使真要实行起来，结果必至失败，因为这种革命使俄国无产阶级与其同盟者——小农分离。这便可说明为什么自一九〇五年起，列宁主义即开始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以这斗争的观点，托洛茨基同志怎样判断列宁主义呢？他把列宁主义看做是含有“反革命性质”的一种理论（见《一九〇五》二八五页）。这种疯狂的诋毁列宁主义，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呢？在乎列宁主义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观念。可是，托洛茨基同志不以这种疯狂的诋毁为满足。他进一步肯定说：

列宁主义的整个建筑物目前是建立在虚谎和假冒之上，并带有破坏的毒恶元素。（见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托洛茨基同志给齐赫氏的信）

第二，托洛茨基主义不信任波尔札维克的党、党的整一性、党对于机会主义分子的憎恶。托洛茨基主义在组织问题是革命者和机会主义者并合的理论，机会主义的各种各色的派别都可容纳在一统一的党里头。你们应该知道托洛茨基同志的有名的“八月联盟”的历史。在这联盟里，马尔多夫派和撤回派、取消派和托洛茨基派，都和气地合作——这便表示其为“真正的”党。大家知道，这破砖碎瓦的“党”所有目的即在破坏波尔札维克的党。那时“我们的意见分歧”在哪里呢？在乎列宁主义看见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前提就在打破“八月联盟”，而托洛茨基主义却看这联盟是创立“真正的”党的基础。你们看见，这仍旧是两个相反的政策。

第三，托洛茨基主义不信任波尔札维克主义的首领，企图使他们丧失信用，使他们减轻声价。我未见过党内有别种倾向可以比得上托洛茨基主义那样努力于使列宁主义的首领或党的中央机关丧失信用。譬如托洛茨基同志这样“有趣的”诋毁列宁，把他形容得是“专门利用俄国工人运动的落后性为职业的一个人”（见给齐赫氏的信），

这又何苦呢？这其实还不是托洛茨基同志所有“有趣的”许多诋毁之中最“有趣的”一个哩！

托洛茨基同志肩上既然挑着这样笨重愁苦的行头，他在十月革命运动时候又怎样能够出现在波尔札维克党人队伍中间呢？这因为托洛茨基同志那时放下了（事实上丢弃了）他的行头，把这行头藏起在柜台里。没有经过这道“手续”，与托洛茨基认真合作将是不可能的。“八月联盟”的理论，即与孟雪维克党人联合的理论，已经受革命攻击、被革命丢弃了，因为在波尔札维克党人和孟雪维克党人武装斗争底下，还有何种联合可说呢？托洛茨基同志只好承认这个理论的不适用是事实。革命无间论也“遇着”同样的不幸的历史，因为波尔札维克党人中没有一个人不想二月革命之后政权必当迅速夺取过来，这里托洛茨基同志也不能不知道波尔札维克党人不允许他，像列宁说的，“以夺取政权为儿戏”。托洛茨基同志只好承认波尔札维克党人为争苏维埃势力而奋斗、为争获得农民而奋斗的政策，是对的。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第三个特点（不信任波尔札维克首领），那自然只好搁起，因为前二特点分明已经消解了。

在这种环境底下，托洛茨基同志能够不把他的行头藏起在柜台里面，并不跟着波尔札维克党人走去么？自然不能！他的背后没有什么重要的团体，他到波尔札维克党这边来，像丧失了队伍，只成政治的孤立。

从这里得着什么教训呢？教训是有一个：托洛茨基同志必须丢弃他的旧行头，完全接受列宁主义，他才有可能与列宁派作长久的合作。托洛茨基同志著述十月革命的教训，但他忘记了除了他这些教训之外，还有一种十月革命的教训，即我刚才所说的，这教训对于托洛茨基主义有极重要的意义。托洛茨基主义须细咏这一十月革命的教训。

可是，托洛茨基主义并未曾受用着这一教训。因为十月革命时藏起在柜台里的托洛茨基主义旧行头，现在重新拿出来，想望可以找得较好的销场。在托洛茨基同志的新的文字进攻中，我们无疑地看出一种企图：回转到托洛茨基主义，“制服”列宁主义，发挥托洛茨基主义的一切特点。新托洛茨基主义不是简单的旧事重提，它改变了面貌，它比旧托洛茨基主义来得柔软得多、温和得多，但它根本上无疑地保留着旧托洛茨基主义的一切特点。新托洛茨基主义不愿像军事战斗那样攻击列宁主义，它宁愿拿列宁主义做招牌，在解释列宁主义、改善列宁主义的口号底下活动。这因为新托洛茨基主义是柔弱的。新托洛茨基主义的进攻恰值列宁逝世时候，这事实并非偶然。列宁在世时，托洛茨基是不敢做这冒险事情的。

新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在哪里呢？

（一）革命无间论问题 新托洛茨基主义无须公然坚持革命无间论。他“简单地”说明十月革命完全证实了革命无间论就够了。从此，他作出底下的结论：列宁主义内

中重要的和可以接受的，只是大战之后在十月革命时期的一段；反之，大战前、十月革命之前的列宁主义，是不正确的、不能接受的。从此，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把列宁主义区分为两部分：战前的列宁主义——旧的、不适用的列宁主义及其工农专政的观念，和战后的列宁主义——新的、十月革命的列宁主义，这是能够适合于托洛茨基主义要求的。托洛茨基主义需要将列宁主义作这样的区分，以为进行上“不会引起反感”的第一步，为他与列宁主义斗争时随后的几步容易进行。但是，列宁主义并不是折衷派的理论，不是集合各种各色元素而成，绝不可以分为若干部分。列宁主义是整个的理论，发生于一九〇三年，中间经过三次革命的经验，现在像全世界无产阶级一面斗争的大旗向前走去。列宁说：“波尔札维克主义从一九〇三年就存在迄今，是一派政治思想，是一个政党。惟有波尔札维克主义整个的历史，从它发生以至现在，才能满意解释，为什么在最困难的条件之下，它能够创立和保持那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见《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波尔札维克主义和列宁主义——这根本是一样的。这两个各异的名称是一样的内容。所以，区分列宁主义为二部分的理论，乃是破坏列宁主义的理论，乃是托洛茨基主义暗换列宁主义的理论。

不用说，吾党是不能容许这新奇的理论的。

（二）党的问题 旧托洛茨基主义借用联合孟雪维克党人的理论（和实际）来破坏波尔札维克党。可是，这理论已经是太丑了，现在再也没有人敢提起了。为破坏吾党，新托洛茨基主义发明一新的、不太丑的、差不多“德漠克拉西”的理论：以党的青年对抗党的前辈。在托洛茨基主义看来，我们一致的整个的党是不存在的。托洛茨基主义区分吾党为价值不等的二部分：十月前的和十月的。吾党历史十月前的部分，自然，不是历史，只是“史前史”，只是吾党不重要的或至多不很重要的准备时期。吾党历史十月的一部分才是真正的历史。那里——“老的”“史前史的”不重要的吾党前辈；这里——新的、真正的“历史的”政党。不待说，对于吾党历史这种新奇的观察，是着意在破坏吾党前辈和青年的一致，破坏波尔札维克党。

不用说，吾党是不能容许这新奇的观察的。

（三）波尔札维克主义首领问题 旧托洛茨基主义公然竭力诋毁列宁，不怕发生何种影响。新托洛茨基主义便比较留心了。它努力进行旧托洛茨基主义的工作，但出之于赞许列宁时候，出之于恭维列宁时候。我以为值得举出几个实例来证明。

吾党认识列宁是一往无前的革命者。但吾党也认识列宁是小心的，他不喜欢走极端的人，他也时常坚硬地斥责那些好趋恐怖手段的人——托洛茨基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个。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列宁论》一书中也说到这一点。

可是，照他形容起来，列宁仅仅是“利用每个机会，使人感觉得有使用恐怖手段

的必要”（见《列宁论》）。这样使人得着一种印象，以为列宁是残忍的波尔札维克党人中最残忍的一个。托洛茨基同志何乐而加此不必要地和不确实地过分形容呢？

吾党认识列宁是党员的模范，他解决问题，不喜欢专恃己见，必与人商量，必细心而审慎。这一点，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书中说到了。可是，读过他的著作，所感觉得反不是列宁，而是一位中国官员，他解决重要问题在他的寂静的书斋内，焚香祷天，默求启示。

你们要知道吾党对解散宪法会议问题怎样解决么？请听托洛茨基同志道来：

自然应该解散宪法会议——列宁说——但怎样安置社会革命党的左派呢？

然而这位老郎当孙（Nathanson）着意安慰我们。他走来和我们“商议”，交换了几句话之后，他即说：

——若是必要时，那么，你们就把宪法会议武力解散了罢！

——勇哉！——列宁欢呼说——公道的，毕竟也就公道的！你们都赞成了么？

——我们中间，有几个是犹豫不敢决的，但我想，结果是都要赞成的。——

郎当孙答。（见九十二页）

历史是这样写的！

你们要知道吾党怎样解决“高等军事苏维埃”的问题么？请听托洛茨基同志道来：

没有老成的有经验的军事专家，我们是不能免除这混乱的——每次来到大本营，我都这样对佛拉底弥儿伊里衣奇（Wladimir Illitche）说。

——这料想是对的。但他们一定是把我们卖掉。……

——每个派一个委员去监督。

——派两个更好了——列宁欢呼说——但这要能干的委员。能干的委员，我们大概不会没有罢。

高等军事苏维埃就这样组织起来。（见一〇六页）

托洛茨基同志就是这样著述历史！

托洛茨基同志何乐而对我们讲这些亚拉伯的故事？为提高吾党首领列宁的地位么？谁也不肯相信！

吾党认识列宁是当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高深的理论家和有经验的革命者，绝没有白朗起主义的色彩。这一点，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书中也说到了。可是，照他

形容起来，绝不是列宁，而是一位短矮的白朗起主义者，他叫吾党在十月中“用自己的手腕夺得政权，不理苏维埃，并不要苏维埃知道”。我已经说过，这样的形容丝毫不合事实。

托洛茨基同志何乐而造此荒唐？这里不是“略略”诋毁列宁的企图么？

以上便是新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

新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险在哪里呢？在乎托洛茨基主义的根基很能够变成非无产阶级的中心点和联合点，这些分子倾向于削弱、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你们一定要问：往后呢？吾党对托洛茨基同志新的文字进攻有何种办法？

托洛茨基主义现在出现，是为着减轻波尔札维克主义的声价并掘断其根基。吾党的责任在埋葬托洛茨基主义，使它丧失了成一派思想潮流的资格。

人们说起压迫反对派，并说起分裂的危险。这是蠢想！同志们！吾党是巩固的和有力的。吾党不容许任何分裂。至于压迫，我是坚决地反对的。现在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压迫，而是发展思想的斗争，攻打这复活的托洛茨基主义。

我们不愿意并未挑起这文字的辩论。托洛茨基主义以反列宁主义的进攻迫着我们作这辩论。同志们！我们已经准备着呵！

西欧农民运动的前途

马丁诺夫 著 郑超麟 译

——译自本年二月号的《共产国际》——

西欧共产党，纵使不在理论上，但至少在实际中，是太不注意于农民。这个不仅因为第二国际思想之遗留和列宁主义观念之尚未充分深入。这个首先因为西欧农民自身趋向革命，比起一九〇五、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农民，未免太迟缓了些，太困难了些。

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革命时期，列宁即已断言农民问题是这个革命的基础，并说解决俄国农民问题可以有两条的道路：“农奴制度的遗留之消灭，或是按着改革地主经济的道路，或是按着取消地主田产的道路：换一句话，就是改良或革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可以从大地主经济发动，逐渐变成资产阶级经济，逐渐以资产阶级剥削方法代替农奴制的剥削方法；但资产阶级的的发展也可以从小农经济出发，用革命方法从社会生机中割去了农奴田产制的‘赘瘤’，然后按着资本主义农村经济的道路自由发展。”第一条道路对于农民是迂远而难堪的——这是“普鲁士的”道路；第二条道路，从其效果看，是迅速而坚决的——“美利坚的”道路。

在俄国这两条道路的选取何由决定之呢？决定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势力的比较。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绝对占得霸权，所以俄国农民在一九〇五年即已走上第二条道路，到一九一七年，俄国农民问题便照“美利坚式”而解决了。

西欧农民问题在一八四八年也是很剧烈地提出的。但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乃完成于十九世纪统一德意志和统一意大利的民族战争及一九一二年的巴尔干战争，在这些革命中资产阶级占得优势。所以西欧农民问题，就大体上说，一半是照“普鲁士式”解决。资产阶级与地主妥协的结果，给西欧农民以一深刻的印象，农民的经济迂缓地、痛苦地长进至资本主义。因此，便有万千线索联系西欧农民与地主和资本家，并置农民群众于资产阶级封建政党的影响和指挥之下。这是到处如此，不论西欧诸国农村关系怎样差异和繁杂。

这是说西欧农民是不可救药地富于保守性么？不然！“普鲁士的”道路只解决了农

民问题的一半，此种解决延长至几十年。在这种条件之下，农民经济逐渐长进至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决定了西欧农民的保守性，这种保守性能够巩固，必须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是巩固之时。因此，当世界大战爆发，摇动欧洲资本主义直至其根基之时，农民问题重新以其剧烈的形式——没收地主财产问题——在西欧提出来，在欧洲资本主义命运没有解决之先，此问题即有不能解决之形势——这是毫无足怪的。

重新起来的西欧农民有足镣在自己的脚上，已经有坚固的保守性的传统，在许多国家中又已经有很旧的经济、政治组织，富农、地主、教士、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并且在这组织中活动——这些都是一九〇五年俄国政治上幼稚和不甚觉悟的农民所没有的。因此，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影响之下，西欧农民之革命化还是异常迟缓；因此，西欧只有最受压迫的一部分农民才开始走上正确的道路，而且这还是最近的事。可是最重要的在于冰山已经摇动了，将没有一种势力足以阻止冰山的融化，如果西欧同志善于应用列宁主义策略的原理到西欧的条件去。就农民问题上看，西欧条件是异常复杂的：这一国和那一国不同，甚至这一地方和那一地方不同。

为要正确估量西欧农村的状况，不仅要知道最近西欧农民运动发展的趋势，而且要认识这运动所拖带的长尾巴，要认识这运动所已经过的阶段。这便是本文所要致力的。我们十分知道西欧农村关系异常复杂及适应于此关系之西欧农民运动亦呈现种种不同的形式。但我已经说过，在西欧农民运动环境中可以找出几个共同的特点，为俄国农民运动环境所没有的。西欧农民运动所经过的普通几个阶段，就大体上，也是可以说的。

立足在十九世纪中叶，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战争在西欧造成的条件上之西欧农民，得着的第一个倾向组织的冲动，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农业恐慌。

这个恐慌爆发在资本主义狂热发展的时期，是由于面包跌价所引起的，而那时面包跌价又是运输廉价和海外竞争剧烈的结果。这个农业恐慌影响最甚的，首先是大地主，因为他们所得地租全数只够偿还他们欠人的借款，因此便不能好好适应于新的市场条件。然而大农村经济的恐慌结果是渡过了，其方法乃改善技术，使之能适应于新的条件——以麦子发展牧畜，减低麦子生产的代价。发展农村经济的补助部分，而主要是采用农村保护政策：“社会主义的”危险和救济“本国农业”为未来帝国主义战争中设立安全之保证，是“爱国的必要”。这些遂促成大地主和重工业资本家中间形成一反动的保护政策的联合。

农民经济，就全体看，比起地主经济受农业恐慌的影响较轻，因为农民的收入普通是不算地租在内的。然而，大农和中农在其为市场生产的当儿，也感觉到面包跌价的痛苦；在其经济上、思想上，附属于地主或资产阶级之条件底下，这种痛苦遂成一

种冲动，迫使他们行向三种不同的方向。大多数的大农和中农联合起来或加入地主的联合会，积极地拥护地主的保护政策，因此便与无产阶级、面包购买者，立在相反地位。一部分大农和中农，应付面包跌价的方法，乃以麦子去发展牲畜、养禽、收取牛奶等事业，这一部分人就落在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影响范围。这二部农民都是强烈发展协作社去平服农业恐慌，这些协作社指导权完全是操在富农手中。德国一八九〇年组织协作社的农民有三十万人，到一九一五年则增加至二百八十万；法国一八九〇年有二十三万四千人，到一九一四年增加至一百零二万九千七百二十人，占全体农民三分之一。

小农民、小佃户、半佃户、无地农民是不以农业保护政策为有利的，面包恐慌只有利于他们，而无害于他们。因此，农业恐慌不会迫得他们与无产阶级立在利益相反的地位；他们组织上、思想上，不附属于教徒的和资产阶级封建的政党，所以他们在九十年代开始各地方都受着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欧洲资本主义此时已经切实地固定起来，强烈地发展去，小农的革命运动自然是不能发生的。恰好相反，社会民主党本身——法国格德派在郎特会议之后和南德社会民主党人在北勒斯劳会议之后——都以机会主义政策代价、拥护小生产原则代价，于小农中取得初期的成绩：格德派不惜违反其理论上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南德和奥国社会党人不惜投降于理论上的修正马克思主义。

世界大战引起了农民地位大变化。一方面，在战中死伤的农民比其他阶级较多。譬如法国壮年男子总数一二·六四四·〇〇〇人，其中农民还不及一半——五·二三七·〇〇〇人；但全体动员人数七·九三五·〇〇〇人中，农民已差不多占有一半——三·五八六·〇〇〇人；而在战争中牺牲的一·三六三·〇〇〇人中，农民恰好占半数——六七三·〇〇〇人。农村受战事损失比都市更重。他方面，战争替农民造成了经济上良好的机会：纸币逐渐跌价，结果差不多完全取消了农民旧欠的债务，而军队需要面包及国外面包输入之减少或停止，又提高了面包的需求，于是面包涨价，各国农民借此机会改善了自己的经济。

这两个原因——农民巨大的“爱国的”损失及其经济的改善——之外，加以资产阶级政府在革命怒潮危险和民族斗争利益地域前面之恐怖，遂给农民以可能，得于战争终止之后，经过半个世纪的沉寂，重新提出土地问题，缩小地主田土以扩大自己田土的问题。在一些国家里，譬如法国，地主因战后农工缺少和昂贵之故，陷于困难状态，农民遂得于地主手中购买田地，相当满足了他们新有的对于土地的渴望。还有许多国家（爱沙尼亚、芬兰、列多尼亚、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拉夫、意大利），土地问题则经过法律解决——规定大地主须以其土地之一部分为其犯罪时的

罚金。

在苏维埃共和国周围的许多欧洲国家中，没有一国战后，一九一八、一九年的农民问题是由革命方法解决的，其原因我们上面已大体说过了。假如说西欧农民战前思想上已经很久被统治阶级所束缚，那么由战争引起的爱国空气及与此“解放的”战争有连带关系的幻想，更加增重了西欧农民这个思想上的束缚。农民战后侵犯了地主的土地，但因为农民不仅仇视地主，他们也仇视都会，以为都会靠着农民劳动而生活，他们尤其特别仇视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因为听见说共产党人要和他们“共产”；农民与地主争斗中，农民相信所有农民的利益——自没有土地的农民以至富农——是一致的。有以上这二原因，所以农民对地主的侵犯便减轻了意义。这些成见是资产阶级封建党和宗教党所灌输到农民脑筋中去的，在乡村中，政治上较进步、做乡村指挥者的富农也懂得利用这些成见为自己的利益。农民反动的幻想和成见，预先就决定了战后差不多各地方土地改良的愁苦的命运，这种改良不隐藏其是欺骗小农群众性质的。要证实这个，只要略为分析一九一八、一九年各国施行的改良便够了。

罗马尼亚农民于战中组织了自己的政党——“罗马尼亚农党”。这纯粹是议会的政党，开始而且是政府党，要求没收超过一百公顷的土地付与劳动的农民。但这种要求过后没有实现，因为农党赞成阶级调和，拥护专制，看出工厂的工人普通一定会帮助农民，以为农民是广大的阶级，现有土地，必善于与“放债资本”争斗。在农党指挥之下，农民看见大地主果然因改良政策施行交出许多“耕种的土地”，但所没收来的土地大部分落于新的农村资产阶级之手（官员、教士、商人、军官等）。民族少数的地域里，土地之三分之一而且从本地农民手中剥夺来，交付与罗马尼亚的殖民者，本地农民自然不断地要与这些殖民者作战。

捷克斯拉夫没有纯粹的农民政党。中农，甚至于小农，都跟着大地主加入农村党：如自一八九六年以来的“地主与农民的共和党”——其中小农与无土地的农民有特殊的组织——如教士的“捷克斯拉夫民党”、德国人的“田主联合会”、斯洛伐克民族教士的“人党”。这样可见战后全捷克斯拉夫境内的农民（除喀尔巴特山下俄国民族之外）都处地主指挥底下。因此，政府允许的土地改良终于欺骗农民毫无足怪的。说明要分给农民的四三二·五〇〇公顷田地之中，到一九二四年为止，只分给了二〇六·〇〇〇公顷。一八九·〇〇〇有取领土地权利和要求领取土地的贫农中，只有七一·〇〇〇贫农得着土地。

匈牙利富农的“小田主党”加入“基督教徒联合党”，为这党的一部分。在其党纲中虽然规定要求没收大田产，但这党加入了政府党联合里头，向协约国借了一笔款以延长实施土地的期间为交换条件。

波兰农民战后受两个政党指挥。第一，是在塞姆较有势力的富农政党“拍亚斯特”，以维多斯为首领，一九一三年从“兰波民党”分裂出来。这是国家主义的、反犹太人的政党，要求开辟靠东边境为殖民地，是“绿色国际”的一个创立者。第二，较不反动，但亦在塞姆较无势力的中农政党“维赞瓦棱尼”，一九一八年以这个名字从“农作者联合会”长大起来。在这党在卑尔苏斯基一派指挥之下，徘徊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间。这两个政党在波兰农民环境中都主张土地改良，强迫收买地主土地。但第一党代表富农利益，以为自己是地主的继承者，因此趋向于限制改良贫人，使他的侵犯不至于损坏自己的利益。所以主张暂时不妨留存多量土地于地主手中，并以“公平”价格收买地主的土地，就是说以高价收买地主的土地。有了这种指导及自己利益的保护者，农民自然要受骗的。一九一九年订立的和一九二〇年补充的《塞姆法案》规定：依一定次序的渐进均分法，每年最多以二〇〇·〇〇〇公顷为限。在事实上，这数目还只分给了三分之一多些。三年之中只分给了二六〇·〇〇〇公顷，而且这些土地完全落在富农之手。政府并且滑稽地公然提出口号：土地只卖给有充分农具的人。波兰小农及无土地农民的梦想便这样实现了！

列多尼亚土地改良实施的成绩与结果也是如此。有私产的农民和雇农立在对抗的地位，土地改良是富农的“农民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共同施行的，他们公开宣言：这改良的目的是“镇静小农和扫除共产主义的秽草”。

芬兰土地改良也带着这种欺骗的性质。这改良是有私产的农民参加将革命镇压下去之后才施行的。这种农民仇视革命的工人和革命的小佃户，而富有国家主义的公理。

保加利亚本来就没有许多大地主，斯坦布里斯基政府依靠“保加利亚农民联合会”，施行土地改良，强迫大地主交出超过四十公顷的土地。可是“保加利亚农民联合会”联合所有的农民，从无土地的以至富农，提出保护共同的“农村利益”而为绿色国际之一努力的支部。这党既一方面仇视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他方面又仇视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农工联合会”。这党因此处于孤立的地位，藏可夫遂得举行法西斯特式暴动，暴动之后保加利亚的土地改良也就取消了。

意大利土地改良一九二〇年施行于波河流域，那时正是革命状况工人占据工厂之时，但这改良是由法西斯特以反革命目的去施行的。解甲归来的小农民有很强的土地欲望，改良派社会党人不知道这个，他们按着第二国际开辟的道路走去，只要联合这些农民于农村工人的组织之内。这种组织只提出无产阶级职工的要求而鄙薄均分土地为反动行为，法西斯特恰好利用这个成就他们的欺骗目的。在一九二〇年下半年，农村和军事的法西斯特发展，依靠在小农上开始反革命的进攻，先占领波罗尼和费拉里，随后逐渐完全取得波河流域各行省。法西斯特以强迫大地主交出一部分田产为收得小

农帮助之方法，同时又以恐怖手段恐吓农村工人，破坏协作社，使农村工人对地主罢工时没有后援。随后又强迫政府拿些社会劳动给雇农，使他们安土重迁，又强迫这些农村工人加入法西斯特职工组织为得到工作之必要条件。结果，意大利土地改良之实施，得着被欺骗的工人之参加，违反小农群众的利益，违反农村工人的利益，做成中等地主和反革命的利益。

在爱沙尼亚，因民族的关系，为从德国地主的强暴底下解放出来，所以没收地主田产一事执行得很急迫。但因这改良是在银行家、工厂主、大官僚这些反动分子所赞助的反动的富农政党“大地同盟”的指挥底下施行的，所以地主土地给了小康的农民，而地主的活的和死的农具则被劫掠净尽。结果新来旧地主领土内耕种的人，百分之七十五陷入危险状态：没有资本，没有肥料，没有农具，没有一切农村建筑物。

农民战中巨大的“爱国”的牺牲，希望战后能分得土地以赔偿损失，但此种希望无论哪个地方都没有实现。农民受欺骗了。这个应该即刻便能摇动农民对于富农政党的信仰，这些政党指导农民，羁系农民于统治阶级的屁股后面。但农民至今仍坚持旧有的成见。他们遗传下来的对于都会的不信任，他们确信都会利益与农村利益相反——这些阻止了他们觉察另一个更深刻的对抗——一切劳动者和一切剥削者的对抗，这个对抗在战后解决土地问题中愈加显明出来。所以当新的灾祸——农业恐慌，侵害他们时候，他们仍旧开始走上他们以前走过的道路，从新坠落于农业家的怀抱之中。

战后的农业恐慌表现在“剪刀问题”——工业生产产品价格异常提高，面包价格则跌落。此剪刀问题发现，是战后资本主义解体的结果。工业生产产品价格比较起来异常提高，因为重工业及其高度的资本有机构成，因战争所受损失比较农村经济为重，为填补这笔损失，资本家愈加将工业集中起来。农村经济生产品价格异常降低，因为都会穷乏、都会市场的消费力锐减。对付这剪刀问题，农民可有两种方法：或是加入革命运动反对垄断的资本主义，反对工业卡德尔和托拉斯；或是为农业保护政策去奋斗。他们走上了第二条路，较容易的道路，以前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农业恐慌时走过的道路，他们并重新与农业家结密切的关系。

然而，这是农民脱离困难状况的理想的路，因为战后的农业恐慌仅仅外表上类似过去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农业恐慌。那时面包价格绝对降低，乃起于海外农业发展及交通廉价。战后面包价格相对降低（比较工业生产产品而言）来到了——无论劳动力的普遍缩小，尤其无论欧洲农村经济的退落及其能力因战争而减轻。

奥新斯基同志在其所著《农村经济之世界恐慌》一书中证明“全欧洲（旧俄国除外）战后播种面积平均低于战中的播种面积”；又证明在欧洲五种重要麦子的收成，除俄国的生产及输出数量不算外，平均战中比战前低，战后一九一九、二一年又比战中

低：假设一九〇九、一三年为百分，则一九一四、一八年为百分之八十六，一九一九、二一年为百分之八十五·八。战争给农村经济的生产能力以一打击，使之非经过许多年不能复原。“战前在欧洲许多国家里头（德意志、丹麦、荷兰、比利时、南瑞典、英吉利等）和在其他国家的许多区域里头，牲畜驯养业，联系于一定的农业系统，本为输出于俄罗斯及阿根廷、多瑙河流域诸国。俄国随后退出了，牲畜驯养业的基础动摇起来，因而影响及于此业有关的农业；欧洲糖业的生产也被战争破坏……而这生产又是牲畜驯养业之最主要的帮助者……”

农村经济这个生产恐慌比较“剪刀问题”起来，对于中农，特别是对于小农更加危险，生产恐慌没有“剪刀问题”那样容易解决。最近，面包商人已开始组织卡狄尔来解决“剪刀问题”了。政治上，生产恐慌影响于农民，与“剪刀问题”的影响成相反的方向，因为这恐慌将引导很久在好经济中过生活的西欧农民。至于俄国农民的状况，过恶劣的经济生活，渴望土地，热力为分得土地而奋斗。

农民中生产恐慌加甚，他们对于货币的要求也加甚。为恢复战争所破坏的经济，西欧农民便需要资本。战中货币跌价虽然除去了农民的债务担负，但战争终止之后，跌价便以其反面表现给农民看。恢复经济的最初消费，农民从自己钱袋中于战中“幸福”时期及面包涨价时积蓄的钱拿出来的。随后中欧诸国金融固定了，因信用上的要求，农民愈受剥削，农民债务重新增加起来。譬如捷克斯拉伐克一国，一九二四年土地的债务比一九二〇年的增加百分之十八。同时，赋税的剥削更十分便利了资本主义的恢复及新战争的预备。

这些特别加害于小农。再加以一九二四年欧洲许多国家收成不佳，如在波兰、匈牙利、德意志、捷克斯拉伐克、英吉利、意大利、西班牙诸国，面包价格得以增加，“剪刀问题”得以调解，结果，在西欧农民中明显地表现出破绽。资本主义崩坏时期事实的逻辑，终于开始征服了西欧农民于过去世纪最后几十年中、于资本主义最固定时期所积聚的传统逻辑。有名的一切农民利益一致论，现在明显地开始失效了。许多地方的小农民从富农影响底下自己解放出来，发动了，并开始听共产党人的话：在许多地方，旧农党开始解体或至少左派在其中形成起来。

何尔华底的共和农党（拉底奇）曾经拒绝与“独立工党”联合战线对反动的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现在拉底奇自己倾向苏维埃俄罗斯。在塞尔维亚，“农民联合会”一九二四年第五次大会中，发现强有力的左派。大会认定知识分子在联合中没有完全的权利，大会对于主席团打电报给皇帝要求土地改良及速与俄国发生关系一举表示不满意。在保加利亚，“农民联合会”中也发现左派主张与共产党人联合战线。在捷克斯拉伐克，农党解体了。捷克的“多模维尼”本加入捷克农党，现在分裂出来，自成“独立

的多模维尼”。斯洛伐克宗教党中也分出一部分“遗产派”，并组成“独立农党”。在斯洛伐克“人党”中，也强大了一支左派反对派。在农民的卡尔巴特山俄罗斯，捷克共产党取得百分之四十的选举票。在波兰“维至互棱尼党”至在恐慌之中，其中形成了右、中、左三派，从这党分裂出一些小团体组成“独立农党”，凡革命的及同情波兰共产党的农民都加入这新党。在德国的杜林格和东普鲁士，都有强大的农民运动发展，这种运动第一次直接或间接受共产党指导……

西欧农村中的这些过程自然还是脆弱的。可是不要忘记农民运动的转机刚才开始，这种运动不是去年偶然的好运所引起的，而是最近六七年来西欧农村所有经济的和政治的生活逐渐预备下来的结果。农民开始结算这几年来经验。因此我们可以希望，如果共产党现在知道更密切地与目前才发生的小农运动联络起来，并置于自己的指导之下；如果共产党知道促成旧农党之解体，这些党对于农民的反动，亦如第二国际党对于无产阶级一样——那么，在欧洲革命潮流复涨之时，农民群众将赞助共产党，而不反对共产党。

一九二四年之世界形势

任卓宣

季诺维埃夫说：“布尔塞维克首先就在明白具体的形势。”因为俄国布尔塞维克之所以能完成其历史上的使命，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第一就是他明白俄国的历史发展到了何种地步，世界的历史发展到了何种地步，而俄国及其所处之世界在此一定的时代中又是何种形势。明白了这个，然后才能将共产主义应用到实际上来，为与实际相应的策略。这是布尔塞维克能够首先完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步工作之重要原因。

各国共产党既然要实行布尔塞维克化，以步俄国布尔塞维克之后尘，则能不努力于其所处国家和世界之实际情形的认识么？并且共产党是一个行动的党、革命的党，若不了然于其所处之国家和其国家所处之世界的真实状况，则所谓行动、所谓革命，皆不免失之瞎撞了。只有了然于其所处国家和世界后，其策略才能正确，其工作才能有效，其运动才能落实际，其主义才能不致停顿于理想领域中。为了这些缘故，共产主义者必须要时时研究实际，步步追随实际。因此，我的责任实迫我不得不过来作这一篇《一九二四年的世界形势》。

(一) 经济情形

照科学的社会主义创造者马克思的定律，经济是社会的物质基础，政治是与他相适应的表层建筑，社会中的阶级争斗亦是随经济关系之变迁而变迁的。这是社会科学上的一个重要原则，既然如此，则我们要认识世界的真实状况，能不从认识世界上的经济情形着手么？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九二四年的世界形势，必要先了解一九二四年的世界经济情形。

(A) 各国的相异之点

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可分为二种：一是资本主义落后国；一是资本主义先进国。前者为后者所征服，故前者隶属于后者，即是所谓殖民地。殖民地既然经济落后，既然为资本主义先进国的附庸，所以它的经济始终是被动的，为资本主义先进国所左右。

其大者就如埃及、印度、安南、中国等，亦是这样。所以这一种国家的经济情势在世界上占的位置极小，且常为列强国际政策之客体，暂可略而不论。但在资本主义先进国中，又因其资本主义发达之程度不齐，而亦有强大与非强大之分。非强大者，一则受强大者之影响；再则于世界上的关系极小。这一种国家虽不像殖民地之处于被统治地位，却亦不如强大者之处于统治地位。例如瑞士、丹麦、瑞典、葡萄牙等国皆是。资本主义先进国中的强大者，经济地位极高，动辄可以左右世界，这不独它们的殖民地广大，完全受其支配呢！当今的英、美、法、意、日、比等国，皆是很明显的例子。

但因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长期的帝国主义大战之结果，一方堕落了許多帝国主义国家如俄、奥之类；一方又衰弱了許多帝国主义国家如德、布之类。因此，现在比较少数较有影响于世界的国家，当然只有美、英、法、日、意、比等国了。但是他们除受战争之损失外，比国本土太小，意国生产力素不强大，日本不处于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地带，又在一九二三年九月受了地震之灾，所以耐得战争之苦痛而还号称强大的，只有美、英、法三国。

法国在一九二四年的工业尚发达。煤的产量凡四五·五〇〇·〇〇〇吨，比之一九二三年所产三八·五四三·六七〇吨，则增加甚多，且超过战前数量（一九一三年四〇·八四四·〇〇〇吨），沙尔所产之一四·一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吨尚不在内。铁的产量七·七〇〇·〇〇〇吨，比之一九二三年，加了百分之三十。钢约七·〇〇〇·〇〇〇吨，较之一九二三年所增加之数约近百分之四十。农业如洋芋、甜菜、麻、苧等俱产得很多。糖产为七二一·〇〇〇吨，葡萄为六七·〇〇〇·〇〇〇立百，比之一九二三年所产之数四四〇·〇〇〇吨和五七·〇〇〇·〇〇〇立百者，更有惊人之增加。至于商业方面，亦甚为发展，输入达四〇·一三三·〇〇〇·〇〇〇方（佛郎简称，一九二三年才三二·六〇八·〇〇〇·〇〇〇），输出达四一·四五四·〇〇〇·〇〇〇方（一九二三年才三〇·四三一·〇〇〇·〇〇〇），比之一九二三年，亦增加得不少。为什么如此呢？其原因在于：（一）佛郎跌价，顾客甚多，故工、商繁昌；（二）德国竞争减少，法国市场扩大，提高了它的生产。但这是表面的现象，而且是暂时的现象。若从其财政观察，便可得其究竟。法国欠英、美之债，共数一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方，合内、外债共计，就现在财政总长所说之数言之，凡六六〇·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方。至于它的借出和德国赔款，不独收不全，即收全亦不敷偿还英、美债款之用。而在此年之三月，普恩加费借美债一万万美元，六月还清，爱友继任内阁后改为十年还清。在十二月又募集了内债四、九三六·〇〇〇·〇〇〇方，可谓罗掘备至。至于佛郎，极不巩固，完全受英、美银行之操纵。一到低落过甚时，只有向财主老爷——美国的摩尔根银行求救。因此，法国这个帝国主义

的经济，简直是美国的附庸一般，大有受《道威斯计划》支配之虑。《人道报》谓美国《道威斯计划》先奴隶德国，次奴隶法国，实是很有理由的。故法国经济势力影响于世界者甚小，而且反受英、美的影响。

英国在战前是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其势力极为雄厚。不过在战后，一方因受战争之影响，一方英、美财富之增进，遂不能保持其旧日“至尊无上”的地位了。虽是它的经济基础比法国要巩固得多、扩充得多，然以与美国比较，还转成为次一等的国家了。其国家岁入在一九一四年为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到一九二四年则减至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差不多只等于一九〇七年之数目。然在一九〇七年，它用其岁入百分之二四，来伸张国外威权和发展其国内实业，而在一九二四年，则只能用百分之一十了。从此可知其工业在此年之发展状况。至于失业人数之不能安插和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还日益增多的现象看，更可见其工业之无再进步而且逐渐衰落。就事实看来，英国有四五七高炉（熔铁炉），在一九二四年上年，只有一九四在工作。产钢之量，在一九一三年为一〇·二〇〇·〇〇〇吨，现在仅为七·六〇〇·〇〇〇吨。但因为在一九二四年下年，失业人数既未减少而反增多，则可知其重工业仍在故态中而毫没有进步。再就其最发达的工业——棉工业看来，在一九二三年后三月棉之消费为一·三四一·〇〇〇捆（Balles），在一九二四年的前七月棉之消费则为一·三七七·〇〇〇捆；可是美国在同时间之数，前者为二·五四三·〇〇〇，后者为三·〇六九·〇〇〇，超过英国很多。然于兑换方面，英镑固较佛郎、马克等为稳定，至就美国赴伦敦会议之代表涡文源所说观之，英镑仍要受美元之压迫。他说：“假设这个会议（指伦敦会议）埋葬在讨论细节目所产生的公式和误会中，欧洲将要在一个奇大灾害的打击之下，马克、佛郎以及其他的欧洲货币，就是在某种限度中的英镑，也一样地包括在内，一齐都要感受一个很厉害的跌落之苦。”这不是英镑为美元所压迫的证明么？

美国自一八九八年即西、美战争以后，便成为世界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了。从那时起，即如墨西哥湾的主人一样，而古巴、墨西哥、南美诸国以及北美的加拿大，逐渐做了它的掠夺地带。帝国主义的经济，完全植下了一个强大的基础。一九一四年年的大战，更来了一个良好机会，制造军械，霸占市场，工业资本既大大发展，故财政资本遂增殖无算。战后，欧洲各国，都是疮痍遍地，而美利坚却还是浩劫之余的“乐国”。于是这时它便一跃而成世界第一大强，继英起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最后营寨。一九二三、二四年，恐怕就是他自大战以来发展程途中的登峰造极时代了。以工业言之，在一九一三年的铁产量占全世界铁产量百分之四十，到现在则为百分之六二；钢产量占全世界钢产量百分之四二，到现在则为百分之六十，其发展之盛，至于如此。现在

我们就其重要工业之产量与世界产量的百分比例数观之，煤占百分之五十，铁占百分之六二，钢占百分之六十，铜占百分之六十，锌占百分之四七，煤油占百分之七二，汽车占百分之八四，铁路占百分之三七，商船（战前还没有什么可言）占百分之二五（就吨数言）。以农业言之，其收获除麦子外，俱比一九二三年好。欧洲那些农产输入国，都要往它那里去买。其重要产品之产量与世界产量的比例是：麦占四分之一，燕麦占三分之一，玉蜀黍占四分之三，而棉则几占其全部。这样发达的工业农业，其商业之占大势力于南美、东亚、西欧，是不必征诸统计而可想见的了。至于兑换，则美元便是世界上最稳固的货币，而且是其他各国货币的主人。财政资本，十分发达，不独英、法、意、日等都借它的力，且已成了世界上的第一名债权人，而在一九二四年放出之债，尤为不少。试以此年之前十月言，计秘鲁四〇百万美元（以下本段俱以百万美元为单位），日本一五〇，瑞士二〇，荷兰四〇，捷克一〇，匈牙利九，挪威二五，比国三〇，加拿大一四〇，德国一一〇，法国一〇〇；此外，还有欧洲各城市、各企业家之私的借款。至于他借债于别国，非常容易，试举两个例子来说：此年十二月十八日比国向美国以百分之六的利借五千万美元，在纽约市中，半小时就征收足了；十二月二十三日德国克虏伯借一千万美元，也是片时即得。至于其国家的岁入，则比之英、法、德、日岁入的总和多二倍半。因为自大战以来，世界上的金子，不断地流到美国，单以此年前七月金子输入之剩余而论，亦有二四一（仍是以百万美元为单位）之多，所以现在它拥有世界金子的百分之五三（见《新欧洲》杂志）。储蓄在美国银箱子内的数目，在一九一二年为八·四二五百万美元，在一九二四年则为二〇·八七三，简直增加了百分之五〇。国际商会会长威里布慈说：“我们（指美国人）中了财富的毒”，这是实在呢！金子膨胀病，真是美国很难解决的问题！这样看来，美国不是当今帝国主义的魁首、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么？若把今日的世界（俄国除外）当作一个圆锥体看待，则美国便是这个圆锥体的尖端——世界帝国主义的最高峰，可以照临一切，统治一切。美国的无产阶级和北美（加拿大）、中美、南美以及东亚的人民，便是这个圆锥体的基部，英、法、日、意等国，则不过是由基部到尖端之间或高或下的腰部而已！

以上便是一九二四年各国的经济状况，但我们不要忘记了美元旁边的英镑、国旁边的英国。当美元统治世界的时候，英镑是要竭力与之竞争的。我们看在协约国个个都未还债时，英国却决心在一定时期内还清美国债务，便知英国资产阶级是如何奋兴了。我们再看英镑与美元在市场上的争斗状况（表一），便知英国是不甘心居美国之下，而要来与美国竞争的。至于它欲率领法、比、意、德等国组织一个欧洲的钢托拉斯，以与美国抗衡，更是很显明的实证。但无论如何，一九二四年的世界经济形势，

终于以美国为中心，却是已决定的了。

英镑、美元与法国佛郎兑换行市	英 磅	美 元
一九二三年九月（平均数）	七七·八三	一七·一四
一九二四年七月	八五·四四	一九·五七
八月	八二·五〇	一八·三六
九月	八四·一一	一八·八五
十一月五日	八七·六八	一九·一四
二六日	八七·七八	一八·九二
十二月五日	八四·八〇	一八·二二
二六日	八七·三二	一八·五三

(B) 各国的共同之点

一九二四年的世界经济状况最表现得明白，而且共通于各国的，就是危机。在这一年中危机极多，亦极为普遍。自然这是承继以前的，但却是重大的事件，值得我们注意。现在我们试举其重要者来略加解说。

第一，为工业危机。这一年的工业危机，包含有几项重大事实。以生产言，则产量缩减。世界的重实业除煤炭产量恰到战前外，钢则相差甚远。英国四五七高炉，在上年只有一九四个燃着；产钢之量在一九一三年为一〇二·〇〇〇·〇〇〇吨，此年仅七六·〇〇〇·〇〇〇吨。德国重工业全部停顿，产钢之量在一九一三年为一九二·〇〇〇·〇〇〇吨，此年仅五·〇〇〇·〇〇〇吨。美国四二〇高炉中，在此年年头只有二七〇燃着，五月只有二〇〇燃着。美国工业产量在一九二四年前三月，就减少百分之二四，其中金属工业竟减到百分之五〇。其钢托拉斯在三月的产量为百分之百，在五月末则为百分之六〇，另外倒还有一百万汽车未卖。以工资言，则数目极小且逐渐低落。德国低于一九二三年之数，由百分之二〇到百分之四〇，而每周工作超过四八时甚远。在英国仅等于战前四分之三。在法国，则工资之增高，远不如生活增高之速。奥、匈、德等国内工资仅达到战前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五。世界工人阶级的生活，愈趋愈下。以失业言，则为害甚大，而且蔓延更广。英国、比国，荷兰、丹麦、瑞典、挪威、德国、美国等国，莫不为数极多。就中最多的，是英、德、美三国。英国一·二〇〇·〇〇〇人，德国五八八·〇〇〇人，这俱是官场之数，实际上还不止此，美国则约有三百万之多。合全世界的失业工人计之，大概数目由六百万至七百万。

第二，为农业危机。一九二三年美国所产之麦，三倍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产之麦的总和。因为这样，农业危机就从美国开始了，计受害之农庄占百分之四〇。此种危

机，蔓延于欧洲各国。法兰西境内布尔果尼四省和波若赖一带之葡萄业者，不仅受危机之苦，且要受破产之苦。但在此危机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有名的“剪刀”形式。这种危机现象是工业产品贵，农业产品贱。其起初原在工业未曾复原之俄国，可是在一九二四年，则美、德、波、法及巴尔干诸国，莫不皆然。

第三，为财政危机。各国货币之兑换价格，至不一定，其升降之速，有如跳舞者然。且除美元英镑能保持其价格外，其余类皆低落。因为这样，便起了生活昂贵，预算亏空。除英国比较可以支持得住外，其余俱莫不仰美国财政资本的鼻息，成为美国的债务者。利息率在欧洲为百分之四〇，百分之五〇，直至百分之百，而在美国则仅百分之二，百分之三，顶高至百分之四。世界金融之不平衡也如此！

这些危机的作用，就在于使一般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越加坠落，并且使各国 < 资 > 本家亦隶属于美国资本家。

我们从以上所分析之（A）（B）两种事实看来，可知一九二四年析世界经济情形有两个重要之点：即美国财政资本统治了世界；各种经济危机遍于全球，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以这种经济情形为基础的政治又是怎样呢？

（二）政治状况

有了一九二四年的经济情形，就有了一九二四年的政治状况。我们且分成下列之两大部分来叙述。

（A）和平时代之开幕

一九二三年的政治，是反动势力所支配的政治。不独当时意大利为法西斯特所征服，西班牙建设了军事专政，保加利的冉果夫把农民和共产党的革命运动压服了，德国的法西斯特随无产阶级革命潮而高涨，英国保守党内阁要筑港新加坡制造未来之帝国主义战争。就是德谟克拉西的祖国法兰西，亦因其为好战的普恩加赉专政之故，要通过“命令法律”于议会，以好表现其凶恶形象。美国为保守的共和党所统治。日本则乘地震之时机，大杀其被压迫人民——朝鲜人和中国人。这时的世界，可以说在暴力专政笼罩中。但一到了一九二四年之初，则展开了一个新局面——“德谟克拉西和平”时代的新局面。英国的工党政府（二月），法国的为社会党所维持之左派内阁（六月），丹麦的工人政府，奥国的社会民主党大胜利，巨哥斯拉夫的大威朵威克内阁，意国法西斯特反对派之改良运动（六月以后），日本之新的左派政府，美国的维持专家会议之决议和组织第三党（改良党）之运动，皆是构成德谟克拉西和平时代的因子。国际共产党第四次大会会说过：“资产阶级的复古，宣布其有展开一个‘德谟克拉西和平’时代的可能。”果然，一九二四年的德谟克拉西和平时代，竟在反动政治局面之下

出现了。

这个时代的由来是怎样的呢？原来改良派的先生们，即第二国际的首领麦克唐拿、亨得尔松、纳诺得尔、列翁柏郎等，见资本社会起了极大的破绽，须得弥补一下。而当此经过数年危机以致危机更深、更广的一九二四年，特别需要他们出一臂之力。所以在英国的劳动党，在法国的社会党，都愿为“攘臂下车”之冯妇。法国社会党之维持左派内阁，波尔朋古之随爱友和伯里安而跑跳于伦敦会议、日内瓦会议中，就是最彰明较著的例子。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呢？他们一九二四年这个难关不好渡过，英国工人对于政权之愿望和对苏俄之好感，克松恶辣外交之不宜继续，使法国退出鲁尔之必要，法国鲁尔问题之解决，美国黄金膨胀之宜疏泄，皆非有和平的手腕、改良的口号、德谟克拉西的面具不可。于是有产阶级遂肯委之以政权，而居中指挥，以资本势力来作指挥之工具。自由党之支持工党内阁、保守党大会之赞成麦克唐拿对《道威斯计划》政策，就是很明显的证据。所以这个德谟克拉西和平时代，是社会主义改良派所愿意而竭尽全力完成的，亦是资产阶级所愿意而用大力促成的。

排场布置好了，英国的选举、法国的五月十一把幕开了。于是麦克唐拿，爱友和波尔朋古这一班的重要角色遂飘飘荡荡出台，大唱其和平之戏。这出戏的第一幕便是伦敦会议。伦敦会议自爱友、麦克唐拿两次相会后，遂于七月十六日开幕起来。此会议是协约国会议，凡昔日加盟攻德之国，皆应他们二人之召，参加讨论，实际上就是为他们排场帮腔。会议经过一月之久，其所讨论者，无非是德国赔偿问题。其解决之法，即是将赔偿委员会在此年一月所组织之专家会议，在德国调查至二三月之久而始完成的《道威斯计划》，拿来实行。所以它的结果就是：（一）组织一个由协约国操纵的银行，握德国之经济；（二）变德国国有铁路为私有，由协约国管理；（三）加重德国的糖税、烟税及运费、车费等；（四）延长德国的煤炭和颜色原料之交付；（五）法、比于一年后撤退鲁尔驻兵。这样一来，英国资产阶级欲法国退出鲁尔以解散其亚罗铁与鲁尔煤炭之婚姻关系的要求，可以达到了。法国急待把鲁尔问题告结束和多得赔偿现金之愿望，美国黄金膨胀病之要求疏泄，皆于此得着相当解决。国际资本家的难关渡过了一大半，所以资产阶级的报纸都称伦敦会议展开了一个“和平的新纪元”。资产阶级的走狗——社会党亦以为“这是向着世界和平更前的一步”。

在第一幕的伦敦会议于八月十六日告终，在八月三十日以前由各国议会通过后，爱友与麦克唐拿这一班首领，又统率其后面四十七国（连英、法在内，共到四十九国）的小卒，到日内瓦高唱起来。原来国际联盟第五次会在九月一日举行，所以他们把第一幕演后，又忙忙碌碌地来演第二幕。各国的小卒及打杂人员排班既定，麦克唐拿和爱友又相继“大放厥词”，高谈国家安全、限制军备、国际裁判等。他们所叫出的和平

之声，把日内瓦的钟也震响了，全世界资产阶级的的手也拍肿了。实际上，在五星期内才把于一九二五年召集裁减军备会议反为国际失和的和平条例协定，从几次冲突中敷衍告成。但这些草案除法国首先签字外，美国表示反对，英国至今不签字，有何效果可言？因为这种点缀，原是多事的，在资产阶级无几许必要，所以和平之使者的威灵也大不如咋了。并且德漠克拉西和平时代快如太阳之西落，日内瓦会议原不过太阳西落前的一个夕阳返照而已！

这时代的政治现象，有两大特点。第一，表面上为改良派执政时代，实质上仍为资本家执政时代。所谓劳动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一句话，第二国际的首领们，不过是政治舞台上的登场傀儡，而国际资本家才是帷幕中的主动人。没有他们，这班傀儡不能登场，这出戏剧也不能开演。我们知道英国的工党政府是自由党支持起来的，法国社会党的政策，是凭急进党扮演起来的。而此时代中最重要的伦敦会议，却是美国资本家在或明或暗地主使及英、法、意、比资本家在或明或暗地附和。所谓专家委员会，不是在美国银行家代表道威斯指导之下开议的么？所谓伦敦会议，不是在美国资本家代表许斯指导之下（许斯于七月底到伦敦）开会的么？爱友到伦敦的信任票，不是连普恩加赉都投了么？麦克唐拿的维持人，不是连包尔温和爱斯葵斯都包含在内么？改良派的首领，不过在名义上当伦敦会议的会长而已！第二，表面上为德漠克拉西和平政治，实质上为压迫劳动和弱小民族的暴力政治。道威斯计划不是解决美、英、法、比以至意、日、希、巨等国际资产阶级的的问题，而为他们谋利益么？道威斯计划不是先压迫德国劳动者，次压迫法、比等国劳动者的工具么？九个月的工党政府，不独大产业国有问题未提出，最低工资标准未定，且只有失业工人之仍然失业，居住、恐慌之保持原状，罢工之被破坏，才是它最显著的成绩。至于和平时代中的左派政府，则工资税、二重附加税、军事裁判处都仍然继续，并且大赦之施行甚难，而路工之复业无望，在在足以证明爱友允许于选举前而废弃于选举后。再看麦克唐拿在印度、埃及等地之逮捕革命党人（六月），在苏丹之压迫（十月）；爱友之提出维持鲁尔占据的借债；以及英、法、美、日、意等国之开兵船到中国，特别是当麦克唐拿和爱友在日内瓦演说台上大呼“和平”的时候，不都证明了和平与德漠克拉西是此时代的面具，战争与暴力压迫是此时代的实质么？看呀！这便是帝国主义的和平、资产阶级的德漠克拉西、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呀！

在此时代中的丹麦、奥国、巨哥等国的改良派政治，其影响甚小，而且是为英、法改良派政治所左右、所代表的，故不必叙述。至于意国，因法西斯特杀麦梯台（六月）而起之带德漠克拉西性的反对运动，美国上议员拉福乃特所领袖之小资产阶级的改良的急进党组织运动，日本选举（五月）之左派政党获胜和组阁，则亦以其仅为此

时代之反映或陪客，故亦无须说及。德谟克拉西和平时代开幕后的情形，大概如此。

(B) 反动潮流之高涨

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之赞成英国工党政府，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当工党政府成立初，它们简直以第二国际的伦敦与第三国际的莫斯科相提并论。捷克社会党大总统玛萨利克说：“流血的革命是旧策略，不流血的革命(?)是新策略。”工党政府之成立和列宁之死，证明了“抱旧策略的革命党人消灭了，抱新策略的革命党人来了。”“来了”便是如此。但是它的“来了”是第三国际在十八个月前所预见的；它的“消灭”，也是第三国际在三四个月前所预见的。季诺维埃夫在第三国际第六次大会上说(六月十九日)：“德谟克拉西和平时代经过之期不久”。果然从此年初到此年底，中间不过九个月光景。十月九日麦克唐纳内阁之为自由党保守党所打倒，便是德谟克拉西和平时代之第一个讣音。到十月二十九日英国选举之劳动党失败，十一月五日美国选举之保守党(即共和党)获胜，德谟克拉西和平时代便从此宣告终止。于是反动潮流遂日益高涨，支配了世界。这种反动潮流是经济危机要求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必然现象，亦是民族危机要求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的必然现象。

自德谟克拉西和平时代闭幕后，全世界上顿然为帝国主义战云所弥漫，资产阶级国家的军备竞争，还原了一九一四年前的故态。保守党首领包尔温上台，马上便恢复其从前建筑新加坡为海军和飞艇之基础的计划。他方面，除工党政府在一九二四年已制造了一·四三九·八八五吨，占全年全世界新造军舰吨数百分之六四外，还要造三只巡洋舰以完成其在此年原有计划。美国在共和党继续登台之后，它的海军总长卫尔伯声言要把美国海军完成其“五、五、三”之规定。不久上议院果然决议以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建造八只巡洋舰，改装六只铁甲船。十二月十九日下议院议员柏里敦公然提议由美国召集澳洲、加拿大开会，规定联防政策，反对日本。并且美国还有定于一九二五年开其大西、太平两洋海军到檀香山和澳洲操演的示威运动。至于国内呢，却还正在制造二一七料射程的大炮，试验一种使人在二十四小时内长睡不动的新气！英、美既亟亟备战，日本能够坐视么？所以其国内舆论对于新加坡之筑港和太平洋之演操都大为哗噪。同时，内阁总理亦宣言不赞成英国在新加坡的海军基础之建筑。法国自然也是不满意于英美，而亦不愿落后的，然其经济势力，则与日本一样，不及英、美远甚。因此，它两国不得不趋于协作。法国借此以保障其安南和在华势力；日本则以法为援兵，好在太平洋上与英、美比赛。这是法报在一九二四年年底广载法、日交欢新闻且有《法、日联盟条约》之由来。从国际帝国主义之备战情形观之，从国际帝国主义多开兵船到中国的事实观之，它们现在竞争的舞台是在太平洋，而其主要目的则为中国问题。未来大战之预备，即从这个时代开始。

自德谟克拉西和平时代告终后，帝国主义的杀气和血腥，已充满了世界。它的被宰割者，首先就是各国无产阶级。爱沙尼亚对于共产党人压迫不遗余力。在十一月处罚了一四九人，枪毙二人；在十二月一日至八日又枪毙了四八人，监禁一五〇人；在七日大行逮捕时又杀死了三人。西班牙军事裁判处，亦处罚两个工人的死刑。“世界上近代最德谟克拉西的”德国为一九二三年汉堡暴动，大兴党狱。在选举时（十一月十二月）更大行封禁共产党报纸，逮捕共产党议员。当时已经有了八千共产党人、二千少年共产党人呻吟于社会民主党大总统爱伯尔特的监狱里。此外，匈牙利监中有四千，罗马尼亚监中有五千（十二月又新捕四三〇名），布加利亚监中有二千，意大利监中有八千，波兰监中有七千。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有阶级觉悟而能争斗的工人，则用刀枪、牢狱、苦工等严重压迫和杀戮，竟至如此！这时德谟克拉西的祖国——法兰西的左派政府，亦为西班牙里夫拉将军服役，驱逐其逃居法境之共产党人（十月），并且还驱逐了一切外国共产党人之努力活动者百多名（十二月）。讲到它的帝国主义和其走狗的报纸则由《法国行动》（王党报纸最复古的）以至《每日新闻》（左派报纸最进步的），由《人民》（黄色工团报纸，讲改良的）以至《自由人》（无政府党报纸，讲自由的），莫不长篇大作，十二分热烈地攻击共产党（由十一月至十二月）！至于法国的总理、议员及各政团等，莫不亟亟唯“共产祸”（?!）之是防（十二月）！而米兰、加时太罗等，正在此时却大擂大鼓地组织法西斯特，它们则听其发荣滋长。英国呢？包尔温一上台，便否认了八月八日之《英俄条约》，向苏联进攻。巨哥把共产党解散了（十二月）。至于英国外长桑伯林和巨哥外长南希克之奔走巴黎、罗马（前者在十一月后者在十二月）道上，无非是协商进攻苏俄、共产党和埃及、苏丹等问题。布加利总理冉果夫之游罗马尼亚、巨哥斯拉夫（十二月底），则是为的巴尔干之反布尔塞维克争斗。资产阶级国家对于无产阶级的压迫，便是如此！

帝国主义不仅压迫无产阶级，还要压迫弱小民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不仅在反动潮流中要压迫这两种革命的人民，即在德谟克拉西和平时代中，亦从没有放松过。至于压迫的方法，对于无产阶级是用枪刀、监狱、警察、苦工等为武器；对于被压迫民族，则是用兵船、飞艇、军队、大炮等为武器。另外，还有不露凶恶形象的购买洋奴、制造内乱、乘机进攻等巧妙手段。墨西哥内乱（七月）是英、美、法等国资本家援助反抗为工农谋利益的克乃大总统之反革命派所生出来的，巴西内乱（八月）是英、美两派势力争选大总统所生出来的，中国成乱（九月）是英、美与日、法两组帝国主义勾结军阀互相竞争所生出来的。亚尔巴利的革命（十二月），是意大利和巨哥斯拉夫等帝国主义，照英、美之于巴西，英、美、日、法之于中国的方式所炮制而成。至于美国，借口波斯人杀其驻波领事之下哀的美敦于波斯（七月），乘哄都拉斯之革命，干

涉哄都拉斯（八月）！英国对于印度革命党人和亚利伯民族运动之压迫（前者在六月后者在八月），借口埃及人行刺其驻埃军官（十月）之下残酷的要求于埃及，在中国广州组织法西斯特商团军之攻打革命政府！西班牙之用大兵攻打摩洛哥的国民革命（七月以后）！以及英、美、日、法、意之开兵船到中国，更是帝国主义者的直接压迫。因为无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掠夺对象，被压迫民族也是帝国主义的掠夺对象。没有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和被压迫民族的自然财富，帝国主义便失其生存的两大柱石了。

从此可知：反动潮流高涨时代，是德谟克拉西和平时代揭开了面具的形式。在此反动潮流中最显著的教训，就是爱伯尔特的德谟克拉西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特没有两样。可以说资产阶级的暴力压迫在意大利是法西斯特，在德意志即为德谟克拉西。以此推之，我们完全懂解了各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真相，亦完全懂解了各国社会党人改良主义的本来面目。

（三）革命势力

在一九二四年美国洋钱统治世界和各种危机普遍世界的经济基础上，自然要产生美国势力支配一切和国际资产阶级把和平与暴力兼用，以欺骗、杀戮其被统治者的政治形式。但是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被统治者又如何发展，在这种政治形式上的被统治者又如何争斗呢？因此，我们研究了统治阶级的世界形势，还要研究被统治阶级的世界形势。换言之，认识了反革命势力，还须认识革命势力。

当今的革命势力有二：一是无产阶级；一是被压迫民族。但在资本社会末日，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宣战的时候，所以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成为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之一部分。明白些说，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领导国民革命，国民革命附属于无产阶级革命。因为无产阶级大革命的本营是苏联，所以国民革命的原动力也是苏联。现在我们从苏联说起。

（A）苏维埃联合

苏联在一九二四年中，有极大的发展。土地之耕者，达到战前百分之九十。虽是农产品在一九二三年达到战前四分之三，在一九二四年有些部分收获不好，然尚无碍其一般的发展。且有几种农产品增加得很多，只看下列之表（二）便可明白。至于输出谷类，为数凡二〇〇百万普德（以下本段俱以百万普德为单位）。足见从大体说来，农业总是很有进步的。工业虽无外面的借贷，然因布尔塞维克之努力，工业的全部产量在一九二二年还不过战前百分之二五的，在一九二三、二四年，便已达战前百分之四五。最难恢复的是重工业，然已一年进步一年。铁在一九二一、二二年，才产一〇，在一九二三、二四年便是四〇，达战前产量百分之一三。钢在一九二一、二二年，才

产三六，在一九二三、二四年便是六〇，约达战前百分之二八。煤在一九二三年的产量为七四一，在一九二四年则到八九三，已达战前百分之五三，须向外求市场了。煤油在一九二三年的产量为三二八，在一九二四、二五年为四一七，而输出一八〇，与战前相等。以轻工业言之，织物之产量，等于一九二〇年之六倍，超过战前百分之六十。至于电气工业亦很有进步。国有工业在最近十月内产出了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卢布的价值，交通机关亦很改良了。工业之发展，大概如此。商业则因生产进步和国际关系恢复之故，国外贸易甚为发达。其发达之状况，有如下表（三）所列者。国内贸易在一九二三年秋，工业产品三倍贵于农业产品，所谓“剪刀”危机，便从此开始。但在一九二四年工业生产品价格低百分之二五，农业生产品价格涨百分之六十，剪刀便差不多合口了。至于卢布价格，则十分安定。财政预算则归于平衡状态。从此可知：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趋势，是代数上的降幂方式；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趋势，是代数上的升幂方式。

(以一千亩为单位)	棉	麻	甜菜
一九二二	五二	八一—	一六一
一九二三	一六五	八四四	二二六
一九二四	四一九	一〇五六	三二〇

(以百万卢布为单位)	输出	输入
一九一三	一·五二〇	一·三七四
一九一七	四六四	二·三一六
一九二一（九月）	—〇	一·八五一
一九二一——二二	六三·九	二七〇·八
一九二二——二三	一三二·二	一四七·八
一九二三——二四	三三二·六	二〇七·五

苏联经济既如是地与资本主义世界不同，则其政治自然而然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德谟克拉西和平及反动潮流两时代之现象，大不相同。对内的新经济政策日见成效，政府组织日见安定，工农生活大大改良。在此年，政府决定以七〇——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卢布来建造房舍。工资在一九二二年秋等于战前百分之三，一九二四年冬，便增加到百分之七二点五了。社会保险愈加完善。教育事业更如旭日之东升一样。

现在试把今年一月列宁格勒小学教员会议对于列宁格勒区域内的小学教育情形的报告，列成一表（四），以示苏联教育进步之一斑。对外，则国际地位日见增高。资产阶级国家之承认了它的，在一九二四年十月止，共有二二国，这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低头的表示。至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更努力拥护苏联，苏联亦努力领导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莫斯科直如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首都一样。被压迫民族若昔之土耳其，今之波斯、阿富汗、蒙古、中国、朝鲜以及印度，爪哇等，莫不与它生密切关系，视为好友。而它之援助被压迫民族，在此年最显著的事件：在上年为放弃其既得权利的《中俄协定》；在下年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乘军阀内乱在华侵略的“勿犯中国”运动。

学校经费预算	一九二二——二三	六·〇〇〇·〇〇〇卢布
	一九二三——二四	九·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四——二五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
学校数目	一九二二——二三	一·六二〇学校
	一九二三——二四	一·六九三
	一九二四——二五	一·八一三
学生数目	一九二二——二三	一二七·〇〇〇学生
	一九二三——二四	一三八·〇〇〇
	一九二四——二五	一六四·〇〇〇

苏联政治经济之进步，简直是平素反对它的第二国际首领菲墨枯克、毕尔塞等游俄后所不得不承认和满意的事实。苏联既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大本营，则苏联势力之发展，还非世界革命势力之发展么？

（B）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在这一年中更进步。以人数言之，则共产国际、青年国际以及工会国际，俱有比过去极大的增加。例如法国共产党在此年之初为五万五千人，在此年之底则为七万五千人。以共产党之得工人群众信用言之，则、德、法、意及英、美诸国的选举，便是具体的和精确的证明。意国选举（四月），共产党在法西斯特包办选举之下，还能于七百六十万选民中（无产阶级选民凡百多万），得票三十一万，其当选议员由十二名增至十七名。法国选举（五月），共产党在八百九十一万多选民（无产阶级选民约占一半）中，得票九十万，其当选议员由十二名增至二十六名。德国在此年的第一次选举（五月），共产党竟在二千九百二十五万选民（无产阶级选民居其大半）中，得票三百七十一万，其当选议员由二十四名增至六十二名。第二次选举（十二月）共产党在德

德克拉西的高压状态下，尚能得票二百七十万，当选议员达到四十五名；同时，它在普鲁士国会中的当选议员，却由三十一名增至四十七名。至于德国共产党在工厂委员会中之选举胜利、法国共产党在群众示威运动中之工人数目（五月纪念巴黎公社有八万人，十一月若勒斯入国立勋祠之示威有二十万人），皆有惊人进步。以共产党的活动言之，自然是十分努力的。埃及的亚历山大之工人占据工厂（三月），爱沙尼亚的纳瓦之共产党人暴动（十二月），欧、美各国共产党及工会等之哥罗尼会议（九月）及欧、美各国共产党之反对《道威斯计划》等，皆是活动力最足称道之著例。不过在德漠克拉西和平时代，若法、若德、若瑞典、若捷克等国共产党中，俱有一极小部分人有为德漠克拉西和平所反映出的右倾思想和若西班牙、若巨哥斯拉夫等国共产党的策略错误，这虽是一个小障碍，然实毫无损于其发展和活动。

无产阶级的朋友：被压迫民族和农人，在这一年中，亦有很大的进步。而无产阶级在这一年中与他们的关系，亦比往昔密切得多。农人国际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组织成功了。苏维埃政府尽量施行列宁的遗训——工农联合，并做了许多改良农业生产和农人生活的事情。各国共产党亦都极力组织农人，法国选举运动亦以“工农联合”为口号。对于被压迫民族，除苏俄自革命以迄于今，努力援助、结为同盟未尝一日停止外，各国共产党亦都特别注意于此。中国共产党人之努力于国民党活动，巴尔干共产党人之与少数民族合作，英、法、美三国共产党之致电孙中山，法国共产党之援助中国和摩洛哥，英国共产党力谋解放埃及、苏丹、印度，西班牙共产党之赞成摩洛哥独立，皆是很明显的例子。“勿犯中国”“在埃及之前放手”，成为了此年最有名的口号、最有价值的纪念。无产阶级对于其朋友之关系日深，则其革命势力日益扩大，世界革命之企图，便有实现的保证了。

共产党虽日益发展，然它是绝无无止境，以企图无产阶级革命之完成的。所以确当思想，端正策略，森严纪律，接近群众，使共产党成为一个能争斗、能革命的无产阶级组织，是非常之需要的。因此，国际共产党特于第五次大会（六月七月）上决定“布尔塞维克化”的口号。自是以后，各国共产党俱在“布尔塞维克化”的口号之下努力，即是使党的思想、策略、纪律，俱正确严明，完成其为一个铁的群众组织。因此，法、德、英、捷等国共产党之于托洛茨基主义或其党中新生右派倾向，俱严重反对排除。俄国布尔塞维克自身之于托洛茨基主义，更坚决攻打。这样做去，各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化的时候，便是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日子！

国际共产党在此年中，还有一个重大策略，即是“工会统一”。欧、美各国工会，多属四分五裂。不独互相攻击是不好现象，而工人势力散漫，更是延长资本主义寿命的灵丹。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把已组织好的工人完全联合起来。从前的“联合战线”

策略本从此来的，现在更具体、更前进地主张“工会统一”。自国际共产党和国际赤工会决定此项策略后，各国共产党俱一致努力。不久，英国工会的许尔大会，俄国工会的莫斯科大会，都竭力主张工会统一，并且还成立了一个英俄统一委员会，以专从事于此项运动。而阿姆斯特丹的黄工会国际内面，也有了左派如菲墨、枯克和毕尔塞等，从中发酵。这样，工会统一的运动，是不难成功了。

在无产阶级的先锋——共产党正在发展的时候，那无产阶级的叛徒——社会党、劳动党、社会民主党，在这一年中，完全成为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左翼。我们看英国劳动党之为帝国主义服役，法国社会党之维持左派内阁——资产阶级政府，德国社会民主党之时与资产阶级政党相联合，可说它们已经是与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为急进派之流，没有两样。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国际组织；第二国际是改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国际组织；第三国际（国际共产党）是革命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所以全世界上的觉悟工人，都走集于第三国际的旗帜之下了。

（C）被压迫民族

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在这一年中，亦最为进步。很可称道的，就是亚刺伯、摩洛哥以及中国。

亚刺伯是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它凭其巧妙手段，将全亚刺伯分裂，由他去统治。伊比苏却乘时起来，联合居于印度的亚刺伯人，于六月间开全回教人大会，以讨许爽（英人所立之王）为号召。八月中出兵进攻汤姆斯左丹，为英所压服。九月中复以全力进攻赫德查。首则取得其军事重城太夫，使许爽让位于其子亚里；继则进取圣地麦加，迫亚里出亡。虽然它未见独立成功，然回教人却从此继土耳其之后而觉醒了。

摩洛哥原为法、西二国所瓜分。西属摩洛哥是里夫一带地方，里夫人不甘屈服，在此年七月初揭出了反抗之旗。民族运动首领亚卜得克兰振臂一呼，全里夫人都齐声响应。因此，西班牙就派了十五万大兵，糜费国帑无算，亦不免于着着败北。里夫拉将军专政下的西班牙帝国主义，竟不得不在九月中大退兵出里夫境。在十一月，里夫国民革命的声势，简直把乌阿达人惊醒了；在十二月，又把安舍拉人搅动了。于是他们俱先后反抗，大有动摇国际共管城——汤吉尔之势焰。

中国的国民运动在这一年中，虽无几许成就可言。然其革命声浪之广大、革命组织之振顿，实有足述的地方。并且它这一年的国民革命，简直有了相当的国际地位，中国的孙中山被人看成为摩洛哥之亚卜得克兰。自然这是各国无产阶级报纸（共产党报纸和赤工会报纸）鼓吹和赞助之力。同时还有苏联在中国外交上的影响侵入中国人民中去起了发酵作用。但国民革命在中国渐渐得着了群众的信仰，向着进步方面走，却是不可掩的事实。

被压迫民族的国民运动既然蓬蓬勃勃地兴起，难道这还不是帝国主义颠覆的征兆么？

资本主义的生产缩减、财政空虚、危机四起、和平失败、压迫遍地以及其保护者——社会党之改良无效，俱是资本主义在其主观上必然趋于颠覆的证明。革命势力中的苏联发展、共产党振兴、工会运动统一、被压迫民族反抗，俱是资本主义在其客观上必然趋于颠覆的证明。但从他方面说来，这便是共产主义代之而兴的必然征兆。然资本主义能自然地消灭么？共产主义能不假人而实现么？不能！它们的代替，必须要用人力，而且取决于共产主义的无产者和资本主义的资产者之阶级争斗。

资本主义的最高峰是帝国主义；共产主义的行动方式是布尔塞维主义。因此，在当今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斗，成为了布尔塞维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争斗。无产阶级的报纸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报纸反对布尔塞维主义。帝国主义和布尔塞维主义这两个名词，是最近阶级争斗历史上的两面一白一红的军旗。我们既看了一九二四年的事实，自然对于这个断语，不会怀疑。为明白起见，我且再举一九二四年的事实二件出来：

第一，一九二四年十月三日伦敦《泰晤士报》有一段话，描写布尔塞维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争斗，最为明白。——明白说出了布尔塞维主义与帝国主义争斗，支配了近代历史：

在政界方面已列入议事程序上的，有两个借贷方案：在《道威斯计划》之基础上的德国借贷，为我们的政府与苏俄代表所订条约之基础上的苏维埃借贷。我们须将此二种借贷各放在特别观点上审查一番。我们知道在工业界中对于德国借贷有一个强烈的反对，因为只知道拒绝德国将来那威迫我们的商业之竞争。它的输出，能够严重地妨害及于我们。但是还有其他为《道威斯计划》之敌人的、为德国借贷之敌人的为德国工商业恢复之敌人的。人不曾说及这种敌人，然而他们却十分重要。他们是谁？就是共产党人。他们的定期出版物在两天前曾专载过一个共产党人大会的事件，他们在此大会中曾作了一个反对《道威斯计划》的报告。他们臆揣地说《道威斯计划》是要奴隶德国了。为什么英国的共产党人反对这个计划呢？因为他们奉了莫斯科的命令。为什么莫斯科反对《道威斯计划》呢？因为莫斯科就在如此长的平静时代中还没有放弃其世界革命之希望。莫斯科知道和平化了的及被人满足了的德国，将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倾向之障碍；它同样知道在现势之中，它毫无德国的恐怖。

先生们，文化维持问题摆在亚、欧之前了，而我们的责任是在牺牲我们的一

切来保卫这个问题。西欧文化藩篱（德国）应该坚固起来，抵抗那从东而来之破坏的压力；或者为保障此协作计，最有效的方法，是完成《道威斯计划》，这个计划是重使德国市场与其他世界上的市场接触的。讲到站在商业方面反对此方策（译者按：仍是指《道威斯计划》）的证据，我比人还知道得多些，但是我请你们严密地、深深地把此问题回想一番，而自己问一问看使欧洲和人类文化强固而不动摇，是不是我们的不可非难的责任。

道威斯计划的由来便是如此！英、美、法、意等帝国主义要施行《道威斯计划》，德国有产阶级要接受《道威斯计划》，英、法等国社会党要赞助《道威斯计划》，就是为了阻止中、欧无产阶级革命之危险，保持资本主义文化之和平！德国是目前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焦点，中国是目前世界国民革命的中心，它们施行了对德国之《道威斯计划》，还要预备对中国之《道威斯计划》，这是必然的事，亦是不足怪的事！

第二，现代世界上的国民革命，实在是受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之刺激和援助。至于第三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之宣传和帮忙，亦是人所尽知而且不能否认的。这样看来，没有布尔塞维主义，国民革命绝不会像前几年这样的蓬蓬勃勃，一日千丈！因为如此，所以各帝国主义报纸对于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不反对其国民革命党，而只严重反对其参加或援助之共产党。《小巴黎人》记者对于王宠惠之谈话（十一月）、《埃克塞雪》和《小巴黎人》记者对于徐树铮之谈话（十二月），莫不特别注意于这个问题：布尔塞维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怎样？至于《时报》之北京通信员、《晨报》之列冉达尔的论说，莫不至再至三注意于苏联和布尔塞维主义在中国之发展。关于记载中国新闻、帝国主义报纸则同声一词称孙中山为布尔塞维主义的首领，称国民党人为布尔塞维克。至于国民党一名，它们绝未提及，好像无足轻重一般。本来孙中山即是国民党的首领，国民党也并未赤化，显然是帝国主义报纸造谣。但从实际上说，国民党不得共产党人之加入，不受苏联及第三国际之影响，孙中山和国民革命不得中、外共产主义报纸之鼓吹，未必中国的国民革命声，就有如一九二四年的进步，使帝国主义发抖！同时，我们还要问一问，帝国主义报纸为什么不提及国民党，不重视国民党，而独再三、再四注意布尔塞维主义，攻打布尔塞维主义？这显然见得布尔塞维主义是帝国主义唯一的死敌，所以它把国民革命看成为布尔塞维主义革命在殖民地的特别形式。至于在中国人民口中的世界人物，却不是卢梭和孟德斯鸠，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却不是威尔逊，而是列宁。在这样状态之下的国民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之一部分是什么？不是共产党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是什么？我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领导国民革命，国民革命附属于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我敢说现代的历史，是布尔塞维主义与帝国主义争斗的记载，当今的世界，是布尔塞维主义与帝国主义比赛的舞台。这是生活于资本社会之最后时期的无产阶级所应特别努力来担负其历史使命的。这是生活于资本社会之最后时期的知识分子所应特别注意于历史之趋向，来选择其服务之阶级的。

一九二五，二，二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之研究

萧子暲

一、政治状况

(一)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之组织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由四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组成：（一）苏维埃社会主义俄罗斯共和国联邦；（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三）白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四）高加索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邦。这四个共和国基于平等权利和亲善的原则，联合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我们可以简称之为“苏联”。此四共和国无论何时，都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

这四个共和国中，有两个简单的共和国及两个共和国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俄罗斯共和国联邦与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是也。所谓共和国联邦者，即联邦内又系合若干民族的共和国及各特别民族之自治区而成。如苏维埃社会主义俄罗斯共和国联邦内，有十一个自治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鞑靼、基尔基士、叭什基尔、土耳其斯坦等）及十个自治区（华兹、卡尔墨兹、却华什等）；而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内，有三个主要的高加索共和国：亚才尔伯章（巴古城在内）、亚尔孟尼亚和格鲁叙亚。总之，全“苏联”及苏维埃社会主义俄罗斯共和国联邦与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都为共和国联邦或联邦，因为每个共和国非由一个简单的政府所组成，而系若干政府所联合。

(二) 组织苏联之时期及其原因

苏联系一九二二年十月三十日宣告组织成立。自此以后，称“苏联”而不称苏俄，因苏俄只苏联之一部分而已。苏俄、苏白俄、苏乌克兰、苏高加索此“四苏”结合于一个联合政府之下者，不外乎一、内部经济的，二、国内和国际的，三、苏维埃政权本身之存在和强国的三重意义。

经过七年国内、国外战争之后，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经济建设的利益上，决定联合主要的经济的和财政的元素，以改善其地位，促其进步。在国际的观点上，

苏联为必要，国际资本主义之进攻，无时或息；外交、战事、通商诸事，经过苏联而成坚强之联合战线。再则苏维埃政权统治各苏维埃共和国，基于工人阶级与农人之联结，基于劳动与协力以抵抗资本；这种协力（或云连带责任 Solidarite），需要一个最固的团结和全体劳动者之坚强的联合。由此联合，足增长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力量。在最近或较远的将来，凡有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称者，都可以自由地加入于苏联之内。这可谓之苏维埃式的合众国。

（三）苏联之最高机关及苏维埃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是十月革命的口号。苏维埃即会议之意。它最初发生于一九〇五年，那时俄国到处罢工，四五月俄皇政府公布选举议员的草案，但是限制很严。当时的社会民主工党（即现在共产党之前身）即主张选工人代表组织机关，十月就在彼得格列（现名列宁格勒）成立苏维埃。十月俄皇政府公布些纸上的自由，革命的潮流减退，遂使苏维埃只有五十二日的寿命。至一九一六年又要组织苏维埃，但社会民主工党左派不赞成。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时，又自然地组织了苏维埃，不仅工人，且有兵士加入。这时的苏维埃已实行国家势力，与临时政府之组织，同时并存了八个月。直到九月间，平民群众大家知道临时政府之无能，而且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牺牲民众的要求，十月革命便使苏维埃成了俄国唯一的政权。这是苏维埃的略史。

“苏联”之最高机关，为全联合苏维埃大会——每年开会一次。两会之间的最高机关，为由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凡二百余人，现在加里宁即为其长。全苏联苏维埃大会之组织，亦如苏维埃社会主义俄罗斯共和国联邦之苏维埃大会，即城市苏维埃从二万五千人中派代表一人，各省区苏维埃则每十二万五千人派出代表一人。为行政管理上便利起见，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选出一个人民委员苏维埃，专司发行命令，章程，统治国家等事（已故的列宁从前即为人民委员苏维埃之长），但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取消或停止人民委员苏维埃之命令之权力。人民委员苏维埃，由十七部委员组成，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及苏维埃大会负责。

地方区、省、县、镇政权属地方区省……苏维埃大会，大会之间属地方区省……中央执行委员。

苏维埃之组织系由下而上：如全苏维埃大会由各区、各省……选代表到会，省大会由县，县大会由乡或镇举代表，再以下即居民大会。故全苏联之立法、行政、司法，劳动人民都全体永远地参加。

全苏联人民，不论他是哪一种民族，只要他住在苏联内而是劳动者，都有同等的权利，有苏维埃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女子完全有同等权利。他以法国公社的口号“公社的旗帜即世界之旗帜”为口号，这是真正的德谟克拉西。但是资产阶级、奸商、神

父、僧侣及旧时的警察、宪兵，本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仇敌，所以褫夺他们政治上的权利，这是苏联立国的根本精神，无产阶级专政必所取的形式。

（四）民族问题

十月革命后，一九一八年开第三次全俄苏维埃大会，决定：“苏维埃共和国建筑于自由民族之自由联合上，为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之联邦”。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内乱、外侮、饥荒、天灾很多之时，苏联无时不坚持执行此革命的民族政策。结果在俄皇时代下的各民族政府都承认苏维埃政权。当时分为两部：一部苏维埃的，一部资产阶级的（内为芬兰、波兰、立陶宛、拉得维亚、爱司多尼）。在苏维埃之部，各国内部各有其宪法，平均发展其民族。一九二二年十月，各分部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苏联，各有自由退出之权，不扰乱其土地，自由发展其言语、文化、特别习俗等。

民族问题之在俄为最复杂之问题。全俄有百余种民族，语言、经济不同。一万三千万人中，大俄种只约八千万。其经济情形，大俄多半工业，其余则畜牧经济有之，农业经济有之，其程度甚低。俄皇时代之压迫，更使之落后。故民族问题之在俄，互半世纪不能解决，到现在乃很简单地解决了。

民族问题与农民问题、巩固政治统治问题及巩固苏维埃政权问题，都有密切关系。在革命的路上，是极大的问题，苏联宪法可为世界模范。季诺维埃夫说：“民族问题正当的解决，是革命成功解决之百分之五十。”

（五）经济政策

国有重工业与农村经济（生产面包及输出）之关系的政策、城市与乡村经济密接之政策、工人阶级与农人密切之政策，始于一九二一年之春，时当内乱终止及国家经济破产，此即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存在于无产阶级与农人联盟之新的经济基础上（一方面经过贸易，一方面与工业密接）。此外，于某种条件下容许私有财产，苏维埃政权利用之以发达其生产力。列宁之言：我们革命及将来一切社会主义的革命，最根本、最主要的问题，为工人阶级与农人之关系、工人与农人之联盟。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与否，看能否致农人于自己方面，看工人能否指示农人以惟有与之联盟而后可抗地主及资本家而增加其幸福。一九二一年以前，工、农结合之坚，由于每个农人都知道他的仇敌是地主，所以政治的及军事的联盟都很坚固。但在制胜地主之后，欲继续维持此联盟，当以经济的关系与之联结，此即经济和贸易的联结。

不发达工业，则不能发达农业。但工业亦关系于农业，如制品之销场及原料之取采，均赖于农人。由此全般的城市与乡村联合之经济的基础，乃为目前亟待建设的事业。注意到小农利益，故当给农人以自由卖其面包，自由贸易。新经济政策乃工人、农人、工业、农业相互间的让步，也可说是相互间的了解，共同地谋经济之发达巩固，

而为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中间必由之路。

（六）新经济政策之意义

（1）政治的意义，坚固千百万农人与工人阶级之联盟，以巩固苏维埃政权。对于工人，则新经济政策可以致许多无产阶级的队伍于工厂作坊，改良其物质生活以巩固苏维埃政权。（2）经济的意义，提高国富，发展生产力。无产阶级专政的靠背山，为属于苏维埃政权的重工业；重工业之发展，又只能看国内需要如何——千百万农人的需要如何。新经济政策所以发展农业经济，亦即以巩固、扩充工业出品，即所以助国有工业之生长，同时即无产阶级之生长。

（七）新经济政策之内容

（1）工业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没收一切资本家的企业，凡有五个工人以上的企业而有机器动力的一概没收，无机器动力而有十个工人以上的企业亦没收之。于是国家没有能力管理这许多小企业，大企业也办不好，因为没有燃料、原料和工人。但在当时为制反革命者的死命，这种手段是必要的。当时反革命甚凶，台尼金、哥尔察克、犹乾尼等到处扰乱，使全国经济大遭蹂躏；东纳的煤，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的食粮，乌拉尔的矿，土耳其斯坦的棉花，都在反革命派之手。所以苏维埃的大工业，仅是剩下的原料，而且当时完全注重在革命的国防工作，故群众日常消费品等缺乏极了。又因熟练的工人都上战场去了，有些则在国家各机关办事，因此各工厂的生产力大低，这是军事时期无暇注意到经济事业。所以当时劳农政府的经济政策大半是节省支出，或者暂时保存最好的国有企业，国家收集种种材料（农业品、燃料等）而分配于相当的国家机关。这是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时代。

到一九二一年，内乱渐平，台尼金、兰格尔、哥尔察克都倒了。各国的军队亦相继退去，它们知道武力之不行而行经济的封锁。苏维埃政府和波尔札维克当时的口号为：“到经济的战线上去！”其具体的办法即那年春开始所行的新经济政策。是由节省支出的政策，进而至于生产的创造政策，恢复并发展国有大工业，以从事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然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先有种种最需要的消费品（食粮、衣服、鞋袜等），如不能保证工人的消费，也就说不到大工业化。但是苏维埃国家差不多没有这种储蓄，有也很少，不足以即刻就进而恢复经济从事建设。于是建设消费基金、增加国内消费品的数量，才成发展大工业之必要条件。至于已经是苏维埃所有的企业之处置，则有三种办法：（一）出租企业；（二）租借区；（三）小生产。

出租企业的办法，是苏政府没有能力完全管理、振兴所没收资本家的一切国有企业，乃只留其中最要紧关于全国的企业，如最大、最完备的工厂、铁路、航路由国家管理，由国家供给原料，而为苏政府的根据地，维持其统治地位。其余各企业，国家

不能以自力振兴，因为燃料食粮不足，修理费太大，于是就由国家出租于工人合作社或私人企业家。承租者取得暂时享用权，而所有权仍属于国家，苏维埃国家是这种企业出租的主人而非承租者。承租者必付租价，依契约而定，每时期以一部分的生产产品交给国家，以后履行其余的义务。不仅如此，凡是承租者至企业交还时，必须将企业完全保存好。这种办法，恢复了苏维埃的企业，到租期既满之后，容易着手办理，而现时又足以补充国家的消费基金，即此已足以供给国有企业中工人的需要、军事以及其他用度。但是承租者资本家之利益，当然不在这里，他是想找利润的，劳农政府亦不得不暂时容忍他。

租借区的办法，则因为俄国有广大的富源，然而技术不精、机器太少，所以不能开采作用。比方俄富有煤、石油、矿产、森林，但是没有工具利用这种天然的富源。四围都是森林，地下都是煤炭，而工厂常因没有燃料而停办。为得要利用天然富源，而发展巩固大工业起见，就不得不以租借区办法出租于外国的资本家。这也是一种出租办法，不过是出租期较长，承租的资本家较大而已。生产品之一部分，承租人当交给苏维埃国家，作为租费，其余的归他享用。但是承租人应当整理、制备机器，租期既满，企业遂完全归苏维埃国家所有。这种租借区的办法之利益，是劳农政府以租借区出租于外国资本家，以增加自己的消费基金。几年之后，又可得着设备很完美的大企业。而且苏维埃国家借此利用资本家及其企业的经验。所以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会利用他们，而不被他们所利用。可以说他们为利润而承租企业的，间接地使苏维埃企业发展了，苏维埃国家，也渐渐地能以自己能力经营之。此时暂与资产阶级订很有利于己的契约，而绝不是与资产阶级妥协，而是利用他。一到各大资本国中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就可以无须这些办法了。

俄在欧洲算是工业落后的国家，因为俄虽然也有大工业，但是小生产手工业等，在经济生活中，仍占很大的地位。比如战前，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都属于小工业。国有大工业还没有能满足国家的需要之时，小工业的发展是不可免而且是必需的。它能增加消费品的总数量，承受国家定货，补充国有大企业的缺乏，即此已足帮助着大工业的发展。假使更联合它们于劳动协作社之中，就格外地有利而无害。苏维埃政府对于小工业，竭力帮助，而尤其维持小工业的联合会。因为国有大工业愈发展愈巩固，则小工业手工业，亦一定渐渐减少，以至于完全消灭而并入于大工业之中。

(2) 农业 农业根本上最重要的职责，在发展国有的大农经济。俄国本是农业国，一万三千万人口，城市居民只二千五百万，余约百分之八十，都是农民。他们自有其小经济的组织。农业中的小私有财产制度，和小手工业同样是实行共产主义的障碍。再则大战前，农业经济屡遭危机，大战及内乱，更损失不小。十月革命后，乃组织

“农村经济公社”“劳动社”“苏维埃经济”等。大工业之外，这种农业经济的新形式，亦是共产主义的基础。不过大农经济如没有大工厂的工业制造许多农业机械及人造肥料等，是不能够发展的。所以此时小农经济，始终是制造农业产品之最主要的农业生产者。“农村经济公社”及“苏维埃经济”，至多只能有一种模范的性质。大工厂工业发达得愈快，则大农经济的发展也自然愈快。

苏维埃政府的第一期，即所谓军事期，没有改善农民的可能。那时苏政府最重要的职责：维持幼稚的无产阶级俄国。当时红军众多，工人万数都从事于国防，必须输送军饷以保证战事的胜利，凡军队工人所需要，苏政府都竭力去收集。于是停止自由的流通，而行食粮均配法，因此谓之“军事共产主义时代”。

食粮均配法，就是农民所留给自己的农产品，仅只是最必需的，其他所有的余粮都交给国家。比方每俄亩平均产麦七十普特（每普特合华秤三十斤），国家抽去六十普特。这样的办法，当然不能助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民不愿意改善自己的经济，以为凡是余粮，对于他无利益，所以垦植的地亩，因此非常减少，而且农民亦大不满意，根本摇动农民与工人的联盟。在军事时代不能不有此绝对集中统一的办法，但至内乱、外侮渐平以后，这样自然不能长久继续下去。

至是从军事的战线移向经济的战线以后，于是就有废止食粮均配法之可能，而改用食粮课税法。这是经济建设中所必要的，于政治上亦有很大的意义——安慰农民，而巩固他们和工人阶级的联盟。照食粮课税法，每个农民或一农家可以不必将所有余粮交给国家，而只交小部分预先所定好的。谁的余粮愈多，所应付出的食粮也愈多。比方平均每俄亩产七十普特者，只抽三普特。如此，农民的负担减轻，除付税外所有的余粮，可以自由卖给国家或个人，所以他自然竭力去振兴自己的耕地，因此自然发生了贸易。

这自然是临时的办法，是对农民让步。可是这种让步是必要的，苏政府当局者决不讳言之。列宁于一九二一年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在第十次党的大会上关于农民问题曾说：“我们要实行食粮课税法，应当从今天晚上就用无线电打出去，使人人知道我们对于农民的让步。”等到城市大工业愈发展，国家所需用的农业品，可以得之于自己的“苏维埃经济”及以商品交易的方法取之于农民——给农民以工业品而换取他们的食粮，实行城市乡间的正当交易。换言之，苏维埃国家与独立的农业生产者之间的交易，凡乡村间所有的农产品，都可以换到大工业生产产品同等价值的数量。到那时，才可以慢慢地废止自由市场、自由商业。自由商业消灭，奸商投机事业，亦遂随之而消灭，于此，无产阶级的“苏联”向共产主义出发的第二步，也就走完。

（八）新经济政策危险性及其奋斗方法如何？

很明显的，有由新经济政策发生的私有资本（工厂主、商人）的危险，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有农业经济意义、价值不足的危险。列宁曾屡说过，自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国有工业与国有资本便有了竞争者，大部分是商业资本。国有工业全靠农村市场而发展。如国有工业品的价格贵于私有工业品——因生产得贵些及货品劣些——则国有工业与农村经济之关系、无产阶级与农人的关系，会变为私人资本与农人的关系。

新资产阶级与农人在经济上发生关系，则政治的关系亦自然会发生的，资产阶级必要求政治上权利，——但这是工人阶级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然则如何与之奋斗呢？苏政府早就想到这层了。首要一事，即将所有土地及其工厂、作坊，差不多一切大工业，所有铁路及水上运输、国内商业及农业经济之各种制度、工业和商业之信用事业（银行），都要拿在国家手里。这就所以给予无产阶级与资本奋斗而入于共产主义的工具。

最初列宁曾说过：“无产阶级国家应为很注意、很留心、很会经理的正确恰当的批发商人。不然，他那小农国不得经济的立足。如这样向共产主义去，在现在和资本主义的西方的条件之下，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学着做生意。因为惟有靠贸易才能经济地与千百万农民结合。关系他们的利益，密结他们，引他们于远的程度，用各种形式的关系与之结合于生产内。”是故在新经济政策时，最好的供给农人以国家工业品，是根本的经济的问题。于是生产求多，品质求良，价格求贱，这就所以远防新经济政策之危险。

（九）外交及其国际政策

一九二三——二四这一年，“苏联”之外交，以克尔松（Curzon）之哀的美敦书始，以许多资产阶级国家之承认终。兹举各国合法承认苏联者列表于下：

国别	时期
（一）爱斯多尼（Esthonie）	一九二〇年二月二日
（二）李端尼（Lituanie）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三）列多尼（Lettonie）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一日
（四）芬兰（Finlande）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一九二〇年之末，苏俄与巴尔干四邻国恢复通常关系

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三日，可列兹未 Kozemie（Kbiva 共和国在土耳其斯坦之西）加入苏维埃联邦

（五）波斯 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一九二一年三月四日，布哈拉共和国（在土耳其斯坦之南）加入苏联

（六）土耳其 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

- (七) 波兰 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八日
- (八) 蒙古 一九二一年九月五日，与俄订友谊契约
- (九) 德国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六日，有名之《拉拍罗 Rapallo 条约》自此两年直至——
- (十) 英国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日
(自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即有《英俄通商条约》之订)
- (十一) 意大利 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
- (十二) 挪威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三日（事实上已于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一日订临时条约时承认了）
- (十三) 奥大利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改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七日之事实承认（de facto）为合法承认（de jure）
- (十四) 希腊 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一日
- (十五) 瑞典 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五日
- (十六) 坎拿大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坎拿大首相通知在 Ottwa 的俄代表团已准备承认苏联
- (十七) 中国 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日
- (十八) 法国 一九二四年十月底，承认苏联 de facto，而未 de jure，而恢复经济关系者
- (十九) 捷克斯拉夫 一九二二年七月五日，临时契约
- (二十) 丹麦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临时契约
- (二十一) 日本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日俄协约》

当和德国订《Brest 条约》时，连列宁亦以为世界革命之胜利，不过是两三个月的事；去年（一九二三）冬间德国沙克生工人政府成立时，苏联当道者，差不多每点钟都在计算德国革命之胜利，这未免太急。又大家从前以为俄国无产阶级得到政权之后，就可以使别国革命马上成功；不然，则俄国这样孤独的、唯一的、革命的国家，决不能支持下去……这也错了。苏联现在诚然孤独，其实不完全如是。苏俄是唯一胜利的革命，无论哪个资产阶级的国家内，波尔札维克的势力，都渐渐成熟了。当克尔松发出哀的美敦书时，英国工人——世界上最和平的工人的表示，即可证明。

国际政策和国内政策有极密切的关系。无论还债问题、租借地问题、面包输出问题、对外贸易问题，都与农民有密切关系，故秦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三次大会上曾说：“我们的外交部，应成为各部中最通俗、最普遍的一部，且要将我们关于国际问题的重要议决案都宣布出来。”

苏联国际地位，以下这四个问题极有关系的：（一）关于受第三国际所指挥而发生的工人运动；（二）关于苏联的政策；（三）关于租借问题；（四）关于对外贸易之垄断（面包之输出）。以上四项，苏联全占在一种积极的新的地位。因为国际工人运动之发生及一方面苏维埃共和国与共产国际之联合，一方面第二国际与资产阶级的欧洲联合。他们——第二国际的人常说：第三国际就是莫斯科。第三国际便回答道：那么，第二国际，难道不就是伦敦么！

在许多国家里少数派都当权了，他们这是第二次上台。第一次，当欧战时，资产阶级利用他们彼此攻击，现在是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乃利用他们来反抗新生的工人运动。现在各国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的势力愈大，则社会民主党的首领跑到资产阶级方面的愈多。从前资产阶级公开地实行他的种种压迫政策，现在多改用法西主义一类的狡计。第二国际现在成为全欧资产阶级政府组织里的份子，资产阶级利用之向工人方面发生势力，吸收他们，这便是新的国际状况。英工党首领麦克唐那尔曾说：“只有第二国际能与波尔札维克作对。”正因为只有第二国际能与波尔札维克为敌，所以资产阶级要利用他们。

现在说说过去不久的英、俄会议。英、俄会议之中心，全在借债一问题。秦诺维也夫在第十三次党的大会演说云：“最近调查各国借债的利息，捷克斯拉夫百分之八，巴西百分之七又半，芬兰百分之六点八九，日本百分之七点一，波兰百分之十又半至百分之十四又半。日本这次借款要算最便宜。日本这次借了五万万罗布，这个数目也是苏联所需要的，不过利息再少一点才借。苏联比无论哪一国都要坚固，旧债固然不偿，新债却要合于我们的心愿。我们固然要与反对苏联的人奋斗，但是借一笔稍微比日本有利点的款，是我们所决不反对的，我们愿意牺牲一点以便振兴国内的经济。”读此，很可看见苏联倔强的态度，在国际上决不示弱。

各国资产阶级国家纷纷承认苏联，其中实含有最大的目的——还债。俄国应付之债，计：法国五十万万又二万五千万，比利时二万五千万，还有荷兰、日本，总计至少要付二百五十万万（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又国有工业时所没收的外国资本，照国有企业，应赔：美国商团二·〇〇七·〇〇〇·〇〇〇金罗布，法国六四八·〇〇〇·〇〇〇，德国二一七·〇〇〇·〇〇〇，英国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比利时三一—·〇〇〇·〇〇〇。世界局面的变更，如英国是麦克唐那尔掌政，很难直接公开地提起一班人来反对苏联；法国爱利友政府亦不能公开地给武装和金钱于罗马尼亚人及给武装于波兰以反对苏联；比利时的王德维尔德会登台；日本的封建被新进的资本家推倒；美国发生经济的恐慌，同时产生第三者的小资产阶级党派，想进攻反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资本统治：这些都给苏联的外交政策在国际舞台上以轻松一点

的机会。而且在承认这件事上，捷乐王子的发行，麻布、燃料种种的输出，起了很大的作用。外交部长齐捷林也有很大的作用。所以俄人在国际交涉上，常常以两个“g”（读如ch，齐捷林名字之头个字母和捷乐王子一字之头个字母相同）自豪。常说：齐捷林之硬，即是我们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硬；捷乐王子之硬，是因为它硬提高我们的经济硬。

二 经济状况

（一）新经济政策之积极的业绩概况

在政治状况内，我们已说明经济政策及经济政策之内容了，现在再将苏联经济状况用数目字详述于下，兹先总括地说个大概。

新经济政策，在政治上巩固了工农联盟，巩固了苏联国内及国际的地位。

在农村经济上，新经济政策给农人以扩充生产面包及特种产物如棉花、棉、麻、烟草等。播种地已到六千一百二十万俄亩，达战前百分之七十一。全般农产达战前百分之七十五。总计农村经济的商务，即农人给市场的生产品之价格，一九二二年时，仅面包一项有一百五千万罗布。一九二三年有五万万至五万五千万罗布。改进农产，是发展工业与无产阶级之经济的基础。

在工业及运输方面之成绩，大小工业熟货生产，比一九一三年提高至百分之四十三（这些生产价格，在一九一三年为三亿七万二千一百万金罗布；在一九二三年为一亿二万九千四百万罗布）。连带而发展运输，煤炭与洋油均长进。自一九二四年以来，运输业很有利益。

内乱时，许多熟练工人都下乡去了。自经济政策实行后，他们都渐渐地由乡村入了城市，进了工厂，因此得全般地改进工人阶级的地位。

贸易输出超过输入，金罗布内外流行。

钱币改良，出金币而废旧票 Sovynak（中国人称为羌帖）。

这是概括的说明。

（二）租借问题

此问题在苏联经济范围很重要，在第十次党的大会上曾有这样的一个结论：“苏维埃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又说：“在事实上，可以在某种条件之下，用外国资本来开发苏维埃天然的富源，享受一定的生产物，此即租借之表现……”租借的对象为：森林、矿山、石油、电气事业。

列宁曾说过：“现在旁的地方没有革命，我们应该在十年之中，就是牺牲几百万几十万财物，也没有什么可惜。只要借着外国资本的帮助，等到自己有力量时，然后

自己去实行。”苏联对此现在的问题是，得了外国资本之助，怎样去做、去利用。还有呢，即新经济政策之限度问题。如许租借者来，即苏联内增加一些新的资产阶级。因此对租借问题，特别注意。但是秦诺维也夫云：“在红的俄国，没有外国资本，这非常之有意义。因为资本是国际的，和布尔札维克主义一样。它不似爱国主义的、宗教的以及感情的偏见，他很坚固、很实际的，不用什么外交手段和宣传。”由此可见，苏联之引用外资，绝对不是和中国、埃及……被经济侵略一般的形式。

外国工厂在俄国，比较俄国自己的要多一半。它们住在苏俄，如住在家里一样，内中很多德国人、比国人、瑞士人、英国人。承租者何尝是为得发展苏联产业？他们不过谋利而已，资本是无孔不入的，所以虽则条件严酷，很难遂其野心，然而总来。今年六月十五英伦《太晤士报》有云：“我们可以租借森林与皮革，因为于输出，但是无人愿意用许多金钱去开矿山，因不能得多大的利。老实说，有这样的一种倾向：盗夺俄国，而非为开发其富源。”所以候补租借者之欲望，大概有以下三种：一、还债；二、恢复外国资本家私有财产；三、采资产阶级之裁判及其自由等。但这是苏联所绝对不会答应的。

德国柏林国会代表 Ludwig Gaay 曾说道：“假如世界革命发生，则资产阶级损失很多，债务亦在其内。如不发生世界革命，则苏俄引用外资将来是要偿还的。”这句话，在苏联当道者，认为他是最明了的说话。

总之，苏联对于租借问题，最谨慎而可靠。现在举几个数目如下：在一九二三年以前有四百六十件，现在一千〇七十二件；一九二三年以前订过二十六次条约，现在五十五次（一九二四年五月止）。

德——二八七件，英——一〇二件，法——六二件，美——五七件，俄本国——五二件。

去年租给合股公司的森林有六·五〇〇·〇〇〇，一九二四年五月以前有六·五六〇·八五九俄亩。

从森林租借，每年收入之总数，二百五十万罗布。

又，租借的形式有三种：一、掠夺的形式，为苏联所绝不能承受；二、两方都有利，这是承租者所不心愿的；三、合股公司，对于承租者很有利，苏联于此无甚成效。

（三）国外商业

国外商业，亦苏联经济之一部，在此领域，很有成效。一九二〇——二一年之中，进口货多为消费品。一九二一——二二年饥荒时，有很大的进口，而出口很少。一九二二——二三年进口货多为工具，而出口增加。一九二三——二四年进口货几均为工业原料品，出口货更增加，多为面包出口。把面包出口计划完全实现了，已卖出一万

五千九百万普特。去年一九二二——二三年面包出口只有四千万普特。明年预算输出四万万普特。现在一九二四年已达战前商业流通总数百分之二十，这当然是很大的（十）号。国外通商之垄断，是最要之一点。法国在预备承认之时，已买了一千三百万普特，英国也买去九百万普特。波兰、奥大利等处面包百分之六十是由俄运去的，此事在苏联外交关系上，有很大的意义。

秦诺维也夫在第十三次党的大会上说：“倘若我们有财源，富有面包及‘捷乐王子’及其他好东西，如麻……，倘若我们很发展自己的工业，坚固自己的红军，那么，我们将来在国际的政策，必有很大的意义……应使农民注意国际政策之一切。从前农民助我们，因我们把他从地主下解放了；现在他们应助我们，因我们要使他们从外国资本、放债者、地主下解放出来。外国资本家想取回帝国主义时代的债、国有企业及利息，想取消国外商业之垄断，农民都不能不知道此事。他们很知道应否还外国资本家之利息及债务，他们很知道国外通商与他们有关系——购买廉价的农村工具与面包价格问题。因此我们对国际的策略，已有很多的新的责任。我们应将国际政策上很困难和不明了的问题向农民解释，使人人明了，使我们在此领域内，每步都得群众的同情。我所以只说农民者，因他们对于我们最后的日子居很重要的地位。”看这段话，我们可知道苏联国外商业与农民的关系，同时知道苏政府对于农民之重视。

（四）新经济政策三年来的统计

苏联的根本问题，即在经济方面是否由所预备的初步走到第一步，由第一步走到第二步。列宁在第十次党的大会决行新经济政策时说：“俄国从大战中出来的状况，好似一个被打而半死的人，他受了七年的攻打，要两手扶着拐杖而行动……”以此与现状比较，是进步无疑的。现在虽仍困难，可是拐杖可以丢去而另换一根自由棍了（秦诺维也夫的话）。即如开始第一年所积聚的国家资金，没有过二千万罗布，在占地球六分之一的面积内，这二千万当然如大海之一勺。现在的进步，单拿所积的一种外国金数量已超过八倍以上。国家银行资金从三千七百万到三万七千万，约计十倍。列宁屡说经济方面之进步，不论何时不能有很快的结果——它的进步，是要以几年、几十年为单位的。现在只有三年，已有许多数字证明这方面已有很大的进步。

一年以来苏联的经济状况 一九二二年农业收成比战前为四分之三，工业品比较战前为百分之二十五，生产劳动为百分之六十，工资为百分之五十。这期的统计比较如下表：

农村生产品，一九二二——二三年比较战前为 78%，耕地在一九二四年比一九一六年为 90%，比一九一三年为 80%。照第五级收成计算，有三万五千万普特。

工业，一九二三——二四年度前半年比战前为 46%——48%，生产二三——二四

年前半期比二二——二三年前半期为高，比战前为2%。工业产品程度和战前比较：炭类（连税收）——60%，石油（连手工业）——65%，生铁至今尚很坏——14%，织布业49%，毛织58%，从去年来由25%升到40%。

此外，当前的根本问题，即“剪刀问题”。自今年二月始，已渐得其平。此事起于一九二三年之夏，至九月十月而剧，当时很危险。据华尔加报告，此事已成国际的现象，农业到处恐慌，此很可研究。（注：剪刀问题，即工业生产产品价格太高，农业生产产品价格太低，剪刀开得太宽，欲剪刀之开口渐拢及至于合，即工业品与农业品之价格莫相差太远而渐得其平。）苏联为剪刀而奋斗之现象之进步，如下表：

国家统计局批卖表		
	一九二三年十月一日	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
农业商品	0.54	0.93
工业商品	1.72	1.31

国家统计局零卖表		
	一九二三年十月一日	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
农业品	0.67	1.07
工业品	1.35	0.92

观上表，可知“剪刀”已在适当状态，没有摇动。

劳动生产比战前为60%，每月各工业部工资平均如下：

	常价		金罗布价	
22——23 头半年	1.41	100	74.3	100
22——23 后半年	1.51	100	18.8	131
23——24 头半年	20.3	144	27.2	190

若分列在二三——二四年这一年，以工资和一九一三年比较，矿业38%，五金46.7%，纺织80.5%，化学75%，印刷8.24%，皮靴91%，食品109.2%。在莫斯科平均为92.4%，在列宁格列为80.7%。

商品流通的高度 莫斯科取引所于商品批卖方面有三分之二，最近一年有121%。

一九二二——二三上半期 三三五（百万为单位）金罗布

二二——二三年下半期 六九九（百万）金罗布

二三——二四年上半期 七四〇点三金罗布

全俄苏维埃经济部所联合的九五出卖商店，一年内计有75%。

二二——二三年上半期 二六〇（百万）金罗布

二二——二三年下半期 四二五点四金罗布

二三——二四年上半期 四五五点九金罗布

商业方面，国家参与的商业为 26%，合作社 10%，私人为 64%。

工业的发展 轻工业生产品比战前已达到四分之三，惟电气、胶皮、化学，在这半年内略有逊色。最好的为玻璃、皮革、洋火商业：玻璃比前年高 41%，皮革高 7%，洋火高 51%。织布比前半年高 20%，但生产品在去年由一八·五〇〇·〇〇〇，到十月跌至一六·四〇〇·〇〇〇，到十二月又升至一九·七〇〇·〇〇〇，一直到今年二三月，毛织业升高 14%，和去年上半年比较，多做二千一百万罗布。麻工业比去年上半年多 34%。金属和煤相等，托拉斯这年获利三千万罗布。大工业很有希望。一九二三——二四年内得到战前价七万万零一百万罗布，产物有战前之 40%，在去年同时于相当期内，得到五八三·〇〇〇·〇〇〇罗布。燃料很好，非常丰富，煤和石炭，一路很稳固，无恐慌。如下表：

每年产额 (以百万普特为单位)		半年产业				
	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一 —一二二	一九二二 —一二三	一九二二 —一二三	一九二三 —一二四
煤	五一八(百万普特)	六〇〇	六五四	七一三	三四〇	四八五
石油	二〇(百万普特)	二七七	二七五	三二二	一四八	一七一
泥炭	九三(百万普特)	一三九	一二九	一六二		

石炭、煤油不仅满足国家工业和运输的需要，且扩张生产到市场上去；还有一宗很大的进步，即不再以木材为主要的燃料了。试看下列铁路火车燃料表：

	一九一九—一二〇	一九二一—一二二	一九二二—一二三	一九二三—一二四
石炭	五七·五%	三〇·五%	四〇·〇%	五四·〇%
油	二六·五%	二九·〇%	二四·〇%	二五·〇%
木柴	一六·〇%	四〇·五%	三五·〇%	二一·〇%

电气化之进步 苏维埃大联合对于农村经济政策约有五项：（一）极力输出面包于国外，增高价格使之稳固；（二）提高技术，改良机器，且能多种价贵之物如棉、烟草等；（三）组织农村经济便宜的信用事业——农村银行；（四）减税——特别对于贫农；（五）维持发展农村合作社。所谓电气化，即第（二）项提高技术之一个最伟大、最根本的计划。列宁电气化之计划，期以十年成功。现在已有许多电站（约二百余站），并正在建筑的电站有二十万 Quartiers。照专门家克里神可夫斯基说，这年已用去五千万

罗布于电气化事业了，即最初预定之百分之五十。

电气化成功之日，即共产主义实现可能之日。

转运业亦有进步，总收入为五万万罗布，现计有睡车一万三千二百，比一九一三年为40%，比去年增加14%。

信用事业 工、商、农方面，一九二三——二四年计四万万以上，在乡村尚弱，虽然从二三——二四年已由一千五百万到四千七百万。

金属事业 历来苏联当道者的口号为：“从事金属事业，从事改良生产机关，从事提高大工业。”现在石油、煤、币制都得利，提高冶金事业决非空想，有人计划在五年内对此事要用一万万——一万五千万——二万万罗布，这是根本经济的环锁。可如下说：（一）注意金属事业——这是第一个归结点，（二）增高生产力——第二个归结点，（三）“剪刀”要使他不成永久的现象，（四）用社会保护税则（向外定货（机器）宁可在国内行租借），（五）抛去恢复战前思想。

对于经济是否由初步而走上第一级的问题，看了这些表，已得很满意的答复。就生产商品数量看，可以无疑地说，是已走上第一级了。

（五）国内商业及往那里长的问题

列宁说：“商业是小农经济与大工业之间的唯一的结构，倘若大工业同时不能充足供给小农经济的生产品比以前多而且廉，我们不能一时猛进地发展我们的大工业。我们当缓缓地、渐次地进行下去。”又说：“农人知道市场与商业，直接的共产分配，我们是够来施行的。我们的工厂少，不能供给他们的需要，我们要供给他们的需要，只得经过商业，我们由商业供给农民，并不是坏于从前的资本家。……商业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形式之一个历史的环扣，若我们能将此环扣拿住，则在最近的将来之整个的锁链都为我们所有。……”因此理由，所以列宁常常说：“学习做生意去”，以后又更说：“广一点学文明地做生意”，最后更具体地说：“从合作社里学习做生意经商”，我们在上面已知道关于私人资本在商业上的作用：国家占36%，而私人资本占64%，故现在的问题，是要将私人资本弄轻。内地贸易要用能观察市面熟悉市场的委员会来做，已确定组织内地商业委员会。但我们应知道：苏联这种办法，非缩小及破坏商业，而为领导商业走正当的路。

总括言之，不用权力去破坏私人资本，不用政治手腕而在经济上组织去压服他们，用国家的力量去帮助这种经济的组织；自由贸易是新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则，故以后只注意一切信托机关，大胆地去学习拿住经济的枢纽，不能消灭私人商业而在限制。

虽然，商场上的势力，乃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从一九二二到一九二三年，以经济的势力大小看来，在城里和乡村的市场，能得着五千多万罗布的总数。城市的生产

品占五千万罗布，乡村能得二千二百五十万，总计内地市场的势力，可从五千二百五十万到五千五百万罗布。由此可看出市场的势力，什么危险都找不出，而的确能说，苏维埃国家是有恢复的可能，能从小资产阶级的农村经济向社会主义方面进行。

取得农民的市场，注意农民的消费（对于工人的消费已经有了预算），是苏维埃国家目前的责任。农民市场中的容量，据许多著述家之计算，大约现在为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罗布之多。

但是从许多数目字中，注意点在农人中的等级与各阶级一定的关系。全体农人可分为穷农、中农、富农三种。在全农人的人口中，穷农占百分之六十，在他们手中有百分之七十四的财产，百分之四十的耕地，百分之五十的耕作牲口。这类农人的团体，有全财产四分之三，在其百分之四十——一小半——的种地，一半耕作的牲口，买一半工业产品，这生产品是乡间所需用的。中农占全农数百分之二十三——略等于四分之一，大概计算——全财产百分之十八，耕地四分之一，牲口四分之一，购买工业产品由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都是乡间所需要的。至于富农，占农民总数百分之十四，有财产百分之八，耕地百分之三十四，工作牲口四分之一，买五分之一的工业产品。——以上只是大概的统计。使面包出口不至于减少及生产品不减少，同时将穷农与中农提高起来，不给富农发生政治上的力量于乡间，这都是苏维埃国家极注意的事。

同时知道，小农与中农，实决定苏联前途的势力。因为城市生产品主要的购买者，是穷人与中等人的群众。从城市往乡下去的生产品，穷人与中等人的购买力占百分之六十，富人占三分之一，所以将来的责任是提高穷人与中等人的购买力。

反对派学者某说：赞成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要免除三个障碍：第一，工业收归国有；第二，外国商业的垄断；第三，在国内市场的主要地位。这三点却正是苏维埃大联合达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唯一的道路呵。

（六）协作社

这项运动，是苏联目下非常重视的事，合作社之在苏联，除普通性外，当说列宁所谓用它来与私人资本奋斗。列宁说：“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生产机关归国有之后，第二步工作，即人民的合作社，这是实实在在到社会主义之途径……我们办一合作社，比用政治的力量去关闭一百个私人贸易要强。……从前人人要加入工业的生产里面去，现在要个个加入合作社去。”秦诺维也夫说：“我们要借这个组织来竟我们新经济政策的功劳。以后我们须集全部精力于此……这是我们成功的保证，我们多数党组织的能力，也就要在此处表现，……如果这个剪刀政策为不错，那么，对于往哪里长这问题，我们可以大胆地回答说：往社会主义方面长。”读了这两段话，可以明白合作社之重要

意义与苏联现在对此事之努力。还有一层意思，即列宁所谓“实际参加合作社，实际参入群众。”所以其现状，乡村合作社约只百分之二十五，大家便认为工作太弱。因为乡村合作社，是国有工业与小生产者、农人关系之所结。它是由小生产至于共产主义之形式之一。故现在竭力维持乡村合作社，由农村银行借贷。

去年消费合作社社员共五百万人，今年七百万人。

现在在消费合作社服务者，提倡工作的中心，应由省移至县及镇村，以与农人群众结合。

（七）货币之改革及其发行

最近的过去，苏联的货币糟极了，一九二二年冬列宁在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上说：俄国的票币有天文学上的数目。但是到今年（一九二四）五月一日止，那种一张几百万、几千万万万的纸币叫做 Sovznak 的已经绝迹。到现在新的捷乐王子，且通行于伦敦、纽约各大市场了。我们要知道，施行新币之先，要建立生产的基础。——无此，货币之改革是无效的。货币之改革，仅能建立在向上展发的经济上面和商品流通扩大的时候。苏维埃纸币不能再继续在市面上流通了，如不换成金属币，将使国家陷于很危险的地位。但如在经济堕落、国家继续贫困的基础上实行货币改革，那就成为空想了。

货币改革之基础有二：一、照可能地减少国家的亏空；二、实行有系统的奋斗，使生活费减低。没这两个先决条件，货币改革是不能成功的。现在苏联对此已经成功了，为防止将来困难，最重要的就是减少亏空，固定货物的价格。

从一九二三年一月至一九二四年五月一号，货币的流通很大。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流通金钱的总数一七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罗布，现在增加至四七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罗布，十五个月中增加至四倍，价格毫不跌落，这可证明国内商品流通有很大的发展。

从前发行苏维埃纸币时，尽力印刷，能印多少就印多少，这是不问国内的需要，其弊使纸币一天天跌价。现在可不行了：货币之发行，是要限制的。苏维埃国家预算是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罗布，由一九二四——二五年至多也不过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罗布。不要使罗布的价格跌落一个戈别克（Kopek，每一百戈别克为一罗布），这是苏联所最注意的。

货币改良能表现最大的胜利，列宁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在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上作报告说：“我们不只是能颠覆有产阶级，而且能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能产出真正实际的社会主义成功的保证。

自铸币出后，遂有了很好的工具，作为建设苏联经济的工尺。有了铸币，将来的

岁入、岁出都能一目了然，可借此以定国家的计划，好像有了寒暑表可以卜国家的健康。盖苏联至此，“已经入了内部经济建设的时代。……已经从破坏、恐慌、封锁种种情形中跳出来，而进入和缓的经济过程中了。……现在的根本问题，就是社会的生产扩大——农村经济与城市工业。”（加米涅夫之言）

三、结论

从新经济政策的苏维埃共和国到真实的社会主义联邦。

现在总括起来说：苏联在外交政策问题上，惟有加以坚固，小心对外租借，手段稍辣，预备将来的抵抗和进攻。在内部问题上，新经济政策还是要有的。但工农的苏维埃政府地位巩固一步，新经济政策也跟着往下压制这班租借者一步。不是一般的经商，而是文化地做买卖，经过合作社学习做买卖，价格低落，合作社提高，可以征服一切，“从合作社的货柜里将资产阶级轰击出去罢！”这在苏维埃国家内可以办到。货真价廉的商品，可给苏维埃一条往乡下去的很好的大路，用廉价品扩张乡村市场，发展五金业，维持货币改良，澄清国家机关（占领合作社之后）。列宁曾云：若要把国家机关改造成共产主义的机关，非得有几年工夫是不可能的，要抛弃以前之生产迟钝，在乡村要组织小农，与新资产阶级之恶影响奋斗……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最后一句话：“从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将来要产生一个社会主义的俄罗斯！”这是苏联目下全体工农所努力的一件事。

道威斯计划与世界帝国主义

瞿秋白

《道威斯计划》对于世界帝国主义的关系里，最重要的问题便是：英、美两国因此计划而能合作，还是格外要冲突起来？本来这一计划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它的对象——德国，却在于他的主体——美国。

美国资本主义现时加入世界的市场——决不仅是加入欧洲的，当然更不是单对于德国的进攻。这是《道威斯计划》最重要的背景。美国近年农业经济里有不断的恐慌，工业上又有过度膨胀：一则是因为国内市场的缩小，二则因为银行里资本的过剩。这种经济状况使美国不得不抛弃他的孟禄主义，而开始干涉欧事。

美国到欧洲来找些什么呢？它干涉欧洲的目的，究竟何在？这一问题实在并不容易回答。美国干涉欧事的总政策里，有许多互相牵制甚至于互相反对的派别和力量。

世界经济政治的总问题里，在欧战之后，这欧洲和美洲之间的相互关系实是一切其他问题的中枢。欧洲大战把欧美之间的关系，根本地变更了。美国资产阶级当欧战之初，故意旁观，一面供给交战国以食粮、军器，以及威尔逊式的口头□□，等到了相当的时机——德、奥和英、法双方都疲于奔命的时候，美国突然地加入战争，以逸待劳，终致于攫得世界的霸权。当初美国对欧的贸易日益扩张，利用欧洲的资本，发展美国的“无限的”国内市场；欧战期内美国工业大大地开展，国内市场也还能销纳这些商品。美国的资本家微笑地旁观欧洲人的窘迫，尽着送些小麦和罐头、牛乳去喂他们。可是欧洲呢，已经非有美国不能生存了，——美国有几种原料是专利的，欧洲没有这些原料便不能维持工业。欧洲向美国购买原料，更使美国的金钱资本日益盈溢起来。可是资本虽然增加起来，美国的经济命运，却也就坏起来了。美国国内市场渐渐销纳不下工业的产品，必须设法输出。欧洲的购买力，却因为欧战而大大低落：美国对欧贸易的输出额在战前占美国总输出百分之六二点三，战后跌到百分之五四点八（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二——二三年，百分之五一点四；到一九二四年，便只剩得百分之五一点一。同时，美国对其他各地的输出，在战后却大大地增加。

以战前美国对日本、中国等的输出额各为一百，比较起一九二三—二四年来，我们可以得到下列的表示：

日本——百分之五百四十一

中国——百分之四百七十七

哥伦布——百分之二百九十五

澳洲——百分之二百三十二

古巴——百分之二百〇五

可是，美国对欧输出虽然减少，始终还占百分之五十。而且大概美国输到欧洲去的，一大半是原料，工业制造品只有百分之十八。可见《道威斯计划》的目的，不在直接输入工业制造品到欧洲去。美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当然四处找寻市场，可是这工业品的市场并不在欧洲，而在亚洲、南美、非洲。欧洲呢，虽然占到美国输出之百分之五十，而对于美国对外贸易的意义，一天天的减下来了。美国工商界对于欧洲的意见，可以简括地说明如下：“欧洲对于美国是资本的销纳地，却不能做美国货物的市场。”

《道威斯计划》，是美国实行干涉欧事的第一步，同时，也就是实行銷纳美国资本的阴谋。《道威斯计划》的目的，在于美国财政资本输入欧洲工业，而且开始监督这些工业。德国和美国的报纸，现在已经陆续不断地登载纽约银行家对德国工业投资的消息。据 *Bergverxei Tung* 的记载，八个月内，美国资本投入德国工业者，已达一万六千万美金。

《道威斯计划》对于美国对外贸易的意义，有两方面：一方面，美国资本侵入欧洲，“恢复”欧洲的工业，使欧洲对于美国原料的需要增加；别一方面——对于原料的需要增加，不但影响到美国的输出，而且还影响到亚洲及南美各国的输出，——于是亚洲及南美对于美国工业品的需要也要增加起来。

美国对于欧洲，确是不信它能做美国工业品的市场，——这差不多已经是美国工商界中一致的意见。可是甚至于销售原料也未必见得有多大的前途。英国对于欧洲的关系，却大不相同，英国工业品的销路，向来在欧洲。所以《道威斯计划》足以恢复德国的购买力——这是英国所愿的；可是《道威斯计划》能增进德国输出货物的质量——那就是英国所反对的了。

德国现时是欧洲各国中技术最发达的国家，熟练工人也最多，工资也最低——照 *Mittleuropaische Wirtschaft* 登载的统计，有各国工人的工资比例表如下（以英国工资为百分比）：

	建筑工人	机器建造工人	印刷工人	平均工资
英国	100	100	100	100
德国	52	4	43	53
比国	58—63	71	56	62
美国	263—197	203	181	196
捷克斯拉夫	69—76	111	——	87
奥国	47—49	49	36	45

当德国马克低落的时候，德国资本家拼命地改筑工厂，改筑机器，要想把所有纸马克都变成物质上的不动产，所谓“Fiucht In Sachwerte”——“逃避于物质的价值”。这样一来，当然工业中流通的资本大大减少。所以现时德国有建筑得很好的工厂，机器动力等设备得非常之好，都是用全世界最新的技术；可是没有流通的资本。这样的德国，对于英国是非常之合宜的投资地方——《道威斯计划》便是想把德国变成工业的殖民地。向来帝国主义的宗主国是以殖民地为销货的市场，如今却要使德国变成造货物而销原料的场所，所以普通的殖民地，是销货的殖民地，德国却成了生产的殖民地，它的生产将要完全受美国财政资本的监督。

美国资本亦正在找对外贸易的出路，美国人称对外贸易为“The Key of Prosperity”——“幸福之匙”。同时，美国并没有流通资本之不是，却反而有过剩的资本，只要看银行利率的低落，便可以知道美国的金钱过剩了。

德国、美国两方面的这种情形，都要使美国不得不实行对于德国的“殖资政策”。何况现在对于德国实行经济侵略，是最容易的事，不用派一兵，不用放一炮，只要找几位“社会民主党”高叫几声和平主义，造成“恢复欧洲经济”的舆论，便可以着手了。

《道威斯计划》正是这种种关系及美国的政策的实现。《道威斯计划》的目的，正在于使美国资本攫取德国工业的监督权。当然将来德国工业的发展途径，须听美国资本的指挥。美国资本使德国工业专为它制造要输入亚洲及南美的工业品。因为美国本国的工业品成本昂贵，不能和其他各国在亚洲及南美市场上竞争，所以德国的贱价劳动，便成了美国资本剥削的目标，而且是美国占领亚洲及南美市场的工具。

美国工业或美国管理之下的德国工业，如若占领亚洲、南非、澳洲等处的市场，那么，首先受它的排挤的是谁呢？

此处，英、美之间的冲突，非常之明显。欧战之前，美国的对外贸易在全国商业里还不占重要地位，英、美之间的冲突不致于十分明显。那时英国的巨敌正是德国。

欧战之后，德国资本差不多绝对没有参加世界贸易的机会与可能。于是世界贸易之中，英国商业的敌人便是美国了。对于英国，不但有被美国排挤出原有商业势力范围之外的危险，而且连自己的殖民地都有划入美国经济势力范围之内之内的可能。欧战的时候，英国只能制造军用品，它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便有一部分开始发展本地的工业，以图“自我供给”，还有一部分便渐渐受美国商业资本的侵入。美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一直到一九二〇年遇见了国内市场的恐慌，才停止的；一九二一——二二年，英国才能勉强争回战前所有的市场。

然而一九二四年以来，美国商品重新开始占领亚洲、南美、非洲、澳洲的市场；英、美之间的冲突，从此又开了一个新时期。第一，美洲方面：有些南美小国的对外贸易本来完全是在美国势力范围之内内的，可以不算；单看阿根廷、智利、巴西等国，英、美商品之间的竞争和消长，确是很明显的。我们试举巴西为例，战前英国输入占巴西的输入全额百分之二四·五，美国占百分之一五·七。战后美国商品便多起来；可是到了一九二二年英国商品又占优势——百分之二三；而美国只有百分之一九·八；一九二三年英国占百分之二四，美国占百分之二〇。比较起战前来，始终美国的商业渐渐战胜。第二，远东方面：远东方面现时的优势还在英国方面，可是美国渐渐排挤英国的趋势是很明显的。譬如中国，战前英国与香港的输入占中国总输入百分之五六，而美国只占百分之六；到一九二三年英国输入只占百分之十三，香港百分之二六，而美国货已增至百分之一六·五。一九二四年第一季，上海一口岸的输入总共三百另五万两：美国占百分之二七；英国——百分之二五；德国——百分之二二·五；日本——百分之一四。再则，英、美对日本的输入亦是如此——一九一三年英国及印度货物占日本总输入额百分之四二·三；美国占百分之一六·八。一九二三年时英国及印度占百分之二七·四；美国便占百分之二三·八。一九二四年上半年，美国对日输入竟已占有日本总输入额百分之三〇。以上这些事例，已经可以证明英、美之间的竞争。

竞争的焦点，当然在于货价的低廉和市场需要的适合。谁的货物便宜而适合市场的需要，它便是这市场的主人。政治势力的作用是很少的。英国殖民地在战时及战后发生了本地的工业，英国要照战前那样禁止殖民地和国外通商，那是不能的了。不但如此，英国殖民地简直自立税关，虽然对英国货往往有优待的办法，然而对于英国并无大利。英国殖民地上已发生的工业，大半恰恰与英国工业相竞争；而美国货物恰好和这些新兴工业相冲突的，反而少些。

总之，世界贸易之中，有三种动力在这里竞争：一、英国资本；二、美国资本；三、英殖民地的保护关税。假使英国殖民地的关税税率，对于英国货有优待的办法，那就美国工业品必须成本很轻，方才能和英国货竞争。如若关税对英、对美是一律的，

那么，要看物价及销路了。可是，美国商品有一特点——货样极单纯，花色不多。这一特点有优点亦有弱点。优点是制法及手续简单，成本轻；弱点却是销路不是很广，便是很狭。英国商品却正相反，花色多而质量精。美国既因国内市场的拥挤，不得不注意对外贸易，便自然要力谋攫取德国工业——因为只有德国工业的技术，能敌得过英国：花色既多，制法也精。

如此看来，《道威斯计划》，确是四方八面想得很周到的。□□大缺点，或者是德国没有原料——《凡尔塞条约》之后，德国所有原料区已割归法国和波兰。然而美国原料仍旧可以供给德国。所以这一难题，也有解决的办法。

再则，美国加入欧洲的工业市场，目的还不仅在德国；美国现时正在图谋联合德国的煤和法国的钢成一托辣斯或新狄嘉去和英国竞争。斯大林说：

美国本很想以资本输入法国及德国工业，利用他们来调节美国的工商业，譬如联结法国的钢铁业和德国的煤业。……然而英国决不能轻轻让步。

美国要以自己的资本结合法德国工业以与英国钢铁业相竞争，这是无可疑义的。现时美国许多大公司已经组成“欧陆投资公会”，正努力投资到法国和波兰的工业里去。法国在经济上是没有力量足以抵御美国的，——美国并不要立刻讨债，它只要把收藏着的法郎放出去，便足以制法国金融的死亡。

美国资本既然能在德国工业中有了基础，它就要进而有规划地支配德国工业。美国得着了铁路及各大公司的股份，当然很容易调节德国工业，使为己用。德国某几种工业要特别奖励，某几种简直可以缩小生产范围——完全受美国投资的支配，美国原在秘鲁、智利及北美的铜矿公司，因为在欧洲经营利息更大，竟把北美铜矿停办，而转移到欧洲来。总之，一方面德国工业受美国资本的支配；别方面便是美国资本侵入欧洲工业，而自己国内工业反而可以收缩，以免国内市场的恐慌，而且可以减低工业品的成本，以与英国工业竞争——美国便算成世界贸易的主人翁了。

美国资本的计划，在德国方面或许首先要发展美国与英国相竞争的几种工业：铜业、铁业、纺织业、机器制造业。再则，美国在欧战时方发生的几种幼稚工业：化学制品、医药品、科学仪器等，便可以 and 德国合作。美国资本可以将本国及德国这几种工业的产品，占领世界市场。至于美国原有的很发达的工业，如汽车、火车头、火车车辆等，美国资本决不帮助它们在德国发展。

《道威斯计划》的目的既然说明，便可一看，究竟英、美能否合作。

英国方面，当然是要德国经济恢复，因为德国亦是欧洲消纳英国工业品的一个大

市场。可是，德国要恢复经济，必须有自己的对外贸易，——即使我们所假定的美国监理德国对外贸易不实现，单只德国自己的对外贸易发展或恢复，对于英国已经是很可怕的竞争者。——然而德国没有对外贸易，是不能偿付赔款的。如今德国又得着美国资本的输入，流通资本增多，德国工业品当然能多量地输出，——这对于英国是一大打击。本来对外贸易对于英国和德国是同样的重要——英国输出的工业品，现在已经因为销路减少而收缩生产，失业工人中百分之六十是这种工业里停歇下来的。因此，德国经济之恢复与否，对于英国是一个难题：德国经济发展，对于英国有危险；不恢复呢，英国经济也是没有出路。《道威斯计划》，是以美国资本恢复德国工业的计划，英国对于这种计划能否与美国合作，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些人以为《道威斯计划》的实行，是英美合作的表现，是帝国主义巩固的现象——未免太“乐观”了。

英国资本主义里的势力，大概可以分做两种：一是银行资本，一是工业资本。当伦敦会议决定《道威斯计划》的时候，英国的代表，正是“五大”（Big Five）银行的重要人物。所以当时所谓英国代表不过是英国银行资本的代表。美国方面的代表团里，却有大工业托辣斯和大银行双方的人物。这次会议上，英、美双方所以能得到一致的意见，完全因为美国答应在投资德国时，由英国银行资本做中介的经手人。本来美国在战前向来没有对外的大投资，对于欧洲尤其没有放款的机会。美国对外投资只在最近几年，所以在欧洲没有相当的经手机关。所以美国银行家便利用英国银行的经验，请它们做对德投资的经手人。所谓英、美合作不过在这一点罢了。

因此，美国银行资本及工业资本对于《道威斯计划》是一致的——对德投资的《道威斯计划》，一方面是输出余资，别方面是流通美国原料及增加美国管理德国工业的权力，况且美国的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是沟通的。英国却只有极少数财政资本家和美国银行沟通，共同享受对德投资的利益；工业资本家，尤其是对外输出的工业，决不能赞成道威斯的计划。英国钢铁业以及其他工业的代表，都已有反对《道威斯计划》的言论，说《道威斯计划》是“经济斗争和竞争的新的导火线”。

假使再加上美国与英国争英属殖民地的经济势力，英、美之间的煤油问题等——英美帝国主义的合作显然是不可能的了。

第三号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

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

——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

瞿秋白

(一)

一九二五年在中国政治上是以孙中山先生入京开始的。中国辛亥革命之后，不满一年，满清遗孽的北洋军阀，便重新恢复其统治地位。从此以后，所谓中央政府便一直在军阀手里，从袁世凯一直到曹锟，中间虽然经过直系、皖系、奉系等的战争、政变、毁法、护法、制宪、贿选种种斗争，然而除西南以外，差不多完全是军阀内部的斗争，也就是帝国主义者之间互争间接统治中国的现象。国民党早已被军阀政府认为乱党，在中国北部和中部没有行动的自由，甚至于也说不着和军阀短兵相接的斗争。可是经过了五四以来中国民众的社会力伸张的一个长时期的过程，中国无产阶级觉醒起来，他们的阶级斗争一开始便迅速地从经济斗争进于政治斗争，走上了政治舞台，中国的国民革命得着了新的生命、绝大的生力军，自然开辟出新的发展道路。一九二〇年后，各地的社会运动，从学生运动的性质转入工人运动的性质，像湖南的纱厂罢工（黄庞的被杀）、安源的矿山罢工、香港的海员罢工、京汉及其他各铁路的罢工、唐山等北部工人的罢工、上海香烟厂及江浙一带手工业的罢工，——一直到二七京汉大罢工的流血，这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黎明时期，也就是中国国民革命新时期的开始。中国社会里，新的革命力量正在这一时期渐渐地形成——知识阶级里，社会主义的思想，自然地随着笼统的新文化运动、德谟克拉西的要求、和反宗法社会的斗争而普遍地广泛地发展。一切社会阶级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巴黎和会、青岛问题等等的斗争里，得着民族意识的自觉，尤其是工人阶级——他们切身所受的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宗法社会、资本制度的侵略、压迫、束缚、剥削，比任何阶级都要厉害。所以只有无产阶级能在新文化运动、爱国运动、解放运动的总口号里，本着他们善于组织、善于一

致的阶级性，首先表现实际的行动和力量。这种社会力的伸张，当然趋于团结扩大革命的势力——工人阶级已经在这一时期组成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久便有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一面肃清辛亥以后这一党内的官僚化、军阀化的反革命分子，一面汇合一切新生的革命势力。中国的工人阶级在自己国内资本主义初期发展，同时便是世界社会革命开始的历史时代中，第一步的斗争便不得不认清自己阶级的使命——赞助并领导中国的国民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尤其是他们两三年来自己阶级斗争的经验，输入国民革命的政党而和民族斗争汇合为一，不期然而然使中国南部的农民觉醒起来，在广州革命政府协助之下，大大地发展他们的斗争，赞助政府反抗反革命的军阀、香港的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买办土豪等的武装势力（所谓商团和民团）。广州政府，从护法以来，历受南方军阀、买办、土豪的破坏内讧，到此才第一步得着平民群众的赞助，而后它的政治势力才对于全国有革命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最少限度政纲，如废除不平等条约、大产业国有、平民政权的确立、劳工保护等等——开始提议于一九二一年冬天的远东革命团体代表会议（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也曾出席），最终决定于一九二三年夏天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以及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之策略，都在国民党改组之后（一九二四年），成为国民革命政党的政纲和策略。国民党的政治威信，因此在全中国范围内得着了极大的发展。所以，一方面社会里革命力量的集中，另一方面革命政纲的明确规定，这两方面的原因，才使中国国民党的革命宣传，重新遍及民众而影响北方的政治，一扫以前国民党内部官僚化、军阀化的耻辱及北方军阀政客（如研究系之类）的诬蔑。

因此，一九二四年的直奉战争中，军阀内部受了国民革命运动潮流的影响，不能不开始分化和崩溃——北方国民三军的形成，正在这个时候，不能不说是中国军阀战争史中最重要的现象。国民军表示赞成孙中山先生的北伐宣言和北上宣言，赞成国民会议的召集和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不论它们的衷心如何，始终是国民革命运动和国民党政治势力发展的明证。向来中国的军阀总是受某一帝国主义的驱使和雇用，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帝国主义者这种间接统治中国的制度才开始崩溃——直系军阀，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当时既然因为战争失败而瓦解；奉系军阀，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也因为国民军的崛起，不能顺水使船似的攫取中央政权。中国军阀之中，居然发现一派较与民众接近的武力——虽然他们不能直接算是国民的武力，然而他们在四围复杂的环境里，全国民众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要求里，不能不如此表示，始终可以说：即使不是民众武力的形成，至少也是军阀武力的崩溃，即使不是民众方面增加一部分武力，至少也是军阀方面减少一部分武力。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较重要的关键。

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的政治势力，于是在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次重新发展到北方。

国民党主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要求各种人民团体、商会、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等等，大家都应派代表参加。这是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次觉悟到国会制度、法统问题、护法口号的不是引导民众向革命的道途上去走。国民会议的运动从此开始。中国民众见着自己的力量——历年反抗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学生运动、罢工运动，到此仿佛万流汇集而形成彻底改革政治制度的总要求。不但工人阶级——国民革命的主力军，以全力促成这一斗争，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向来逆来顺受的受军阀压迫，或者只在地方上，如上海等大城市之中，稍稍表示些抗拒，到此也看见了推翻这一统治的道路。

北京政变之后，北方的军阀势力，大致是这样形势：日本帝国主义御用的奉系军阀想要攫取北京政权的全部，因此排挤国民军的势力；国民军便和国民党的政治势力和广东革命政府联合起来反抗；同时段祺瑞的皖系军阀，早已完全崩溃，只剩山陕间的刘镇华、憨玉琨和山东的郑士琦，势力微小薄弱，虽然竭力献媚列强，表示“外崇国信”，以与孙中山先生“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对外政策相竞，以官僚、军阀的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先生的国民会议预备会相抗，——可是，因为他的力量决不足以替帝国主义者肃清中原、西北的“赤化”的国民军，所以一时不能在日本或英、美帝国主义之前固宠；直系遗孽仍旧盘踞长江中部。于是最初一期段祺瑞的临时执政，仿佛是帝国主义者与中国人民之间，奉、直系军阀与国民军、国民党之间的一个缓冲机关。段祺瑞的第一步政策，便是暗中联络直系的长江各督和西南联省派的军阀，想造成自己的势力，亦就是勾结帝国主义的资格，第二步便是指使刘镇华、憨玉琨进攻国民二军。他的第一步政策虽然有部分的成功，可是第二步政策却完全失败；——胡景翼和憨玉琨的战争里，中原的工人和一般民众因为国民军比较地开明，同情自然在国民军方面，国民二军这次的胜利，大得力于京汉工人的赞助。段祺瑞同时又对于广东，和英帝国主义者一致地采取援助陈炯明攻粤的政策。可是广东自从国民党改组、工农运动勃兴、黄埔的革命军成立以来，政治军事势力大非昔比：以前反动的军阀，如杨希闵之类对于东江战争故意怠工，如今国民革命军，在东江农民群众赞助之下，从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起到三月初，不满四十天，便肃清东江的反革命军。虽经屡次反攻，然而林虎、杨坤如等终竟是败的败，降的降（三月二十三日林虎败退闽边，四月二十日杨坤如以惠州降）。第二次，段祺瑞、张作霖又利用唐继尧，使他声称就广东副元帅之职，并侵入两广，广州内部杨希闵、刘震寰亟起内应（开始在四月初）；可是这步计划也归失败。同时，张作霖的势力渐渐向关内进展，他的李景林占领直隶，排斥国民军在保定、京兆的势力，张宗昌占领山东，郑谦占领江苏，处处实行极反动的压迫。

这种局势，可以说是段、张合作排斥国民军、国民党的过程里，互相争权夺地，并在帝国主义者之前争宠。段政府在奉张驱使之下，不但外崇国信，反对废除不平等

条约，并且解决金法郎案，损失国库六七千万元，借以取得余款，供给奉系军阀。张作霖对段祺瑞的压迫和段祺瑞自己的阴谋，无一不是把这“缓冲机关”，在几星期内完全变成帝国主义的工具。

孙中山先生北上的时候，正是全国反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和人民的国民会议呼声最高的时候，也正是段祺瑞初初上台，还当着缓冲式的工具，表面上赞成召集国民会议的时候。可是孙中山先生入京的时候，就是一九二五年的第一天，段祺瑞政府早已成了奉、张、帝国主义所牵制指使的走狗。段政府不顾孙先生的主张和全国人民的意见，悍然召集军阀、官僚、政客、学者（当然只有几个人）的善后会议。经孙先生及国民党及群众的坚决抗议，主张人民代表参加解决国事的会议，段政府竟只允许商会等所谓法团代表的参加，并且是只有发言权的专门委员。

他这种政策，原本是和设立淞沪特别市的政策一样，算是对资产阶级让步，而撇开大多数劳动平民，分散革命势力的奸计。可是除开各大城市的买办商阀（所谓总商会）以外，大部分的小商人群众，对于这种会议，很明了他的军阀官僚性质。尤其是工人阶级、农民、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等占全国最大多数的民众，经北京政变和孙中山先生之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纲之宣传之后，已经完全汇集于国民革命旗帜之下。

不幸中国第一个国民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却在这个时候逝世。然而国民党、共产党所领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大会于三月一日在北京开会），俨然与善后会议对抗（二月一日开会至四月二十日闭会）。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全国代表大会，组织集中中国最觉悟的农、工、平民以及妇女的革命分子，决定对外对内的革命政纲。继之以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追悼宣传——国民会议重建民国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解放中国民族的口号，正在此时普及全国——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明了的、切实的、共同的革命目标之规定，并且是将来中国平民共和国的新建设——国民会议制度之第一次确定的关键。

（二）

中国的劳工运动，自从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汉口的屠杀之后，一直到去年初，差不多全部在蛰伏之中，虽然上海、广州、香港等处，还时有罢工的暴发，——尤其是前年的沙面罢工。然而概括而论，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始终因受直系军阀及英、美帝国主义等强暴的压迫和屠杀，不能有勇猛突进的发展。直到北京政变——两年来以无产阶级运动之酝酿为“底力”的国民运动之结果——社会上的革命力量才得着了一个开展的环境。尤其是无产阶级，处于严重压迫之下既如此之久，当然稍有可能便要

乘机奋斗。

北部铁路工人的组织正式的在北京、河南等处，恢复过来；工会的自由、罢工的自由，成了全中国工人群众的要求。

恰巧在这个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趁着奉张势力的复盛，一面赞助他压迫国民军，一面便因棉纱市场的恐慌，以增加工作、减少工资、裁减工人的方法向中国工人进攻。于是上海（二月初）的内外棉厂及其他日厂、青岛（三月间）的日商纱厂相继罢工。中国工人在这几次罢工里，都因组织巩固得到相当的胜利。全国劳工运动从此又得了勇猛突进的形势——如北京三月间的印刷罢工，汉口五月间的英、美烟公司的罢工等等。帝国主义者当然继续着以屠杀政策、威慑政策和中国人民相周旋：福州学生（四月间）抵制外货，美国军舰十二艘便抵厦门，以武力干涉；上海、青岛的日本资本家在第一次罢工之后，千方百计悔约压迫工人，故意挑衅，要想趁势夺回工人的胜利。日商工厂里的压迫专制，向来便是绝无人道、惨不忍闻的；工人所得的“罢工胜利”，也不过是比较上说，其实便是罢工之后，工人所受压迫，当然还仍旧是统治殖民地劳工的特别奴隶制度。日本资本家这样的手段，便使所有日本厂里的工人时时刻刻在愤激怠工之中，因此，他们便任意地敲打强迫。结果，在上海，内外棉厂里的工人顾正红，因要求发给欠薪而被杀（五月十五日）；在青岛，日本人指使张宗昌杀死工人二人，以武力强迫怠工工人离去工厂（五月二十九日）。

帝国主义者这种屠杀政策，引起中国人民一致的激愤；上海南京路上的五卅惨案，便因中国学生、工人的抗议这种屠杀和列强帝国主义的上海政府（租界工部局）之印刷附律码头捐等而发生。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近年来国民革命运动的奋起时期中，看着他们向来利用军阀的间接统治制度逐渐动摇，便想以直接屠杀威慑的政策来扑灭“废除不平等条约”“国民会议”等的“过激派运动”，并且想在上海直接统治地的租界上，钳制中国人的舆论，进一步地压迫中国人（如印刷附律码头捐等）。然而现时的中国——从五四、二七以来的中国，决不是义和团时代的中国，可以用屠杀政策，“惩罚战争”征服的了！五卅的屠杀，立刻激起上海二十余万工人的大罢工、学生的罢课、商人的罢市。虽然帝国主义在六月初旬继续地施行屠杀，海军陆战队上岸、武装商团出防、军舰云集地来威慑，然而镇江、九江、汉口、南京、重庆、青岛、广州等处的民众，都还是更加勇猛地一致起来和帝国主义者奋斗，尤其是国民政府之下的香港、广州工人。五卅运动实际上是开始中国从古未有的群众革命运动，而且处处都是工人阶级当先锋，以最勇敢牺牲的革命精神，以实际的群众团结的力量，来争平民的权利，争自己阶级的利益和民族的解放。——除上述各地外，还有济南、河南（焦作矿工，郑州路工）、唐山、北京、天津等处的工人，他们都在这一国民革命运动和阶级斗争里，团结集中自己的力量，各地

(河南、北京、天津)都和上海一样,有总工会的成立。

五卅运动的意义,正在于中国工人开始执行他的历史使命——领袖国民革命以解放中国民族和自己。——中国的国民革命从五卅开始了!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跃登历史舞台,使国民革命中充实了群众的革命力、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统治根本动摇。五卅运动的第一点特性,便是使中国的政治运动第一次群众化。——列宁说,平时过问政治的只是几百、几千至多也不过几万人,可是真正的政治运动,真正的“民权”,只有劳动平民的革命政治,只有几百万人、几千万人所过问的政治。五卅以前,北京政变、孙中山北上以前,尤其是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所谓“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等运动,只有共产党努力去做,差不多连国民党右派——张继、谢持、邹鲁等,都认为是过激派的赤化宣传,是离间国民党与“友邦”“友军”的奸计。可是,到了五卅之后——一般民众以至大资产阶级的总商会,都觉国民革命的实力已经实现,或者存心利用以达自己的阶级利益(如大资<产>阶级),或者受着列强侵略的激刺和平民力量兴起的兴奋,都一致地趋于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

五卅后民众运动的发展,一直波及于穷乡僻壤,山西太原等处都有工会的成立,江浙则甚至于小小村镇如双林、义乌等处,都起来响应。上海的街头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写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歌。这岂不是革命运动深入普遍的群众之明证?

中国国民革命的经济基础,本来是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间之冲突,尤其是国外资产阶级与中国劳动平民之间的阶级斗争。如今帝国主义者因为不能痛快地继续他们的统治政策,不能如意地利用卖国军阀——直系势力一经摧败,奉系势力之发展又遇见国民军和劳动民众的障碍和抵御,于是从上海五卅起,竟实行大规模的屠杀,汉口(六月十一)、广州(六月二十三)、九江、重庆、泸州、青岛、福州、天津、大连,……暴露他们向来的种种假面具,惊醒了一般民众。中国资产阶级之发展早已使中国社会里发现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酝酿着三四年的国民革命运动,断然不能再忍受这种强横的压迫。于是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实现,全国各阶级各自奋起而汇合成空前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第一次实现于实际行动上——这是五卅运动的第二点特性。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租界、收回治外法权等,从此已经为一般群众所了解,从此便有了实际上的意义;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成立,它所提出去的条件,就足以证明联合战线的实现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口号,实际上为一般平民所接受。五卅运动初起的十几天内,不但上海小资产阶级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积极地参加这一斗争,全国各地的平民、商人,没有不赞成这些条件、同情这一斗争,就是半买办半资产阶级的上海总商会,至少也以消极的态度参加这一战线——上海总商

会的破坏联合战线，在它表示参加运动，组织所谓五卅委员会起，它没有参加工商学联合会并且没有表示态度的时候，虽然可以说是故意的怠工，可是实际上是它没有影响总的运动，没有敢来争这一斗争的指导权。上海而外，汉口有工学联合会的组织，北京、天津、河南等处也有类似的组织；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正在找寻它的党的组织形式。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在头两个月差不多成了地方政府。其他各地，虽然组织上没有确定的形式，然而商会、教育会、教职员、甚至于省议会等官僚机关，无不随着五卅运动的总潮流而随波上下。可以说，这一开始于日厂工人的运动、开始于无产阶级全国大罢工的实际斗争——领袖着爆发的国民革命中之各阶级而前进，震荡了全社会的一切活力。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里无产阶级的领袖地位和政治指导，不但实现于实际行动，而且在这斗争里证实了无产阶级是能解放中国民族的主要力量。再则，中国国民革命和世界的社会革命之联合战线，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联合战线，也在这一次实现出来，苏联、英、法、德、日等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的政党、共产党，都奋起援助。全国各阶级，如果能持久继续这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坚持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诚意地参加革命，承认劳动平民的一切罢工、结社的自由权，赞助上海、香港以至全国的工人阶级艰苦斗争，并且有国外无产阶级的援助——当然不难从根本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他们代理人——军阀。

现时帝国主义的世界里，如果失去中国这一大殖民地，决不是对于某一强国的打击，却是对于帝国主义制度的致命伤。因此，英、日、美、法等国都是想一致地进攻，它们不能不以种种卑劣欺诈的手段来破坏这一联合战线。可是，国民革命有巩固的联合战线，并且在无产阶级的指导之下的时候，革命潮流高涨到顶点，举国一致反抗帝国主义制度的统治，列强之间的一致进攻是不可能的——它们各国在中国的势力与利益各不相等，而且互相冲突，各自想保持自己的势力和“华人的同情”，不能为英国所牺牲。六月初旬至中旬的时候，除英国以外，都不敢公然进攻，无不竭力声辩，甚至于倡言赞成废除不平等条约，如六国委员不一致、不肯公布调查结果、美国立刻解决蔡继贤案、日本政府的非正式表示等等都是明证，这恰在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呼声最高的时候。再则，段祺瑞的军阀政府，恰在这个时候（六月二十四日）正式以外交公文要求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种种方面表示自己的“爱国”；张作霖原本在五月底要想进京攫取政权的，五卅运动一起，只能退出关外，张学良到上海来镇压民众运动的时候，也不得不先捐给学生两千元“买路钱”，表示是来防御外敌的。军阀的统治，在这时候显然是失去了自己的基础，至少也在极端动摇的状况之中。所以，五卅运动的第三点特性便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足以使帝国主义不敢一致进攻，

军阀统治根本动摇。

可是，这一联合战线不过继续一二十天之久——上海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商阀——总商会——“积极”起来了。

国民党的右派“站起来”了。总商会的积极，立刻擅自修改代表上海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市民的工商学联合会的对外要求，抹杀工人的罢工、结社权利，取消撤退外国驻华武装势力的条件——出卖平民的权利以谋与帝国主义者妥协，破坏国民的联合战线。一般高等华人，不用说研究系的梁启超、丁文江等卖弄他们的“学问”，主张妥协、和平渐进，甚至于反对抵制外货。就是所谓“站起的”国民党右派，如戴季陶先生等，在浙江国民党临时省党部通过反对阶级斗争的议案之后，立刻公布他们单独对英的主张，希望日本“回东方来”（见季陶之《中国独立运动之基点》）。五卅运动的发展，到七月中便完全陷于“单独对英”的对日妥协运动之宣传里。理论上既有戴季陶先生的高论以及北京一般反动的大学教授和国民党的种种右派的宣传，事实上便有上海总商会方面的买办分子竭力压迫上海总工会和日厂谈判，如此四方八面——戴季陶、大学教授、反动的右派、买办资产阶级、交涉员等——强迫、恐吓、欺诈种种手段地对付上海总工会，结果竟使日本厂的罢工工人不得不屈服而上工（八月十二日）。这种现象，显然是中国资产阶级想在国民革命中争得指导权以停止革命的解放运动，而用妥协策略取得自己的阶级利益。帝国主义者在这时候，一方面驱使奉系军阀到处开始屠戮革命的平民（青岛、天津、上海、南京等）；一方面便因为中国国民运动的目标单集于英国，其他各国无所顾忌，正可一致进攻，同时利用机会以稍稍挫折英国在远东的气焰，而用空且口的人情诱惑中国的高等华人以破坏联合战线，于是所谓关税会议、法权会议的提议都通过了。威慑劳动平民、利诱高等华人以一致进攻而破坏革命联合战线的帝国主义政策，便在总商会、国民党右派的妥协之后完全实现了。

并且奉系军阀也是同样的政策，他们（七月间）封闭工商学联合会，不准许启封，以示恩威于资产阶级，同时极端戒严，压迫工人。帝国主义军阀的这种离间政策和资产阶级自身的妥协策略之下，上海总商会第一步修改条件（六月十三日），第二步先行开市（六月二十五日），第三步压迫日厂工人上工（八月十二日），第四步与十一国上海侨商商会妥协而暗示军阀使封闭总工会（九月十八日）。

全国小资产阶级逐渐受军阀资产阶级的暗示和压迫，一方面倾向于妥协，另一方面畏怯革命的斗争，于是部分地退出革命战线——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在总工会封闭之后，自行取消工商学联合会。这时候，帝国主义者的列强，自然可以安心地一致进攻，沪案重查便公然实现，英、美、日三国一致判决五卅以来所杀的人都是该杀的。五卅重查的提议（使团领袖的照会）还远在十月一日，即离上海英厂工人上工不过一

星期，离总工会的被封不过两星期而已。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革命里的领袖地位，是何等的明显呀！同时，上海总商会在总工会被封后的第三天（九月二十三日），便开始募所谓爱国募金，名为接济英厂工人，实则五卅以来总商会所经手发的罢工维持费，大部分是各地捐来的，小部分是总商会办事人垫出的，爱国募金的作用，不过是为这些办事人弥补自己的“损失”罢了。况且到九月二十七日，上海的英厂工人，已经因总工会被封，没有革命行动的公开指导机关和自己的组织，因为总商会克扣募金，不发维持费，又被压迫、“调停”而上工了。资产阶级的妥协当然再明显也没有，外交部、总商会口头上尽管抗议沪案的司法重查，实际上他们每一步的行动都是成就这一沪案重查的；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退缩、懦怯，当然也是资产阶级策略的实行中所必要的助力——因为他们可以减杀革命派方面的势力。所以五卅运动的第四点特性，是在经验上证明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破坏联合战线而使革命运动失败。同时，也就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

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本是中国一般平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斗争，目的在于解放中国民族，当然就是解放平民；如果资产阶级阻挠、障碍、压迫这一斗争——否认工人的罢工、结社自由，保留外国驻华军队以备压迫平民，强制群众，对日妥协，而只想借对英罢工之力达到仅仅利于高等华人的工部局董事位置及中国轮船公司和英、日竞争的优势等等——劳动平民的反抗目标自然同时要注射到中国资产阶级方面来。帝国主义者方面的毒计，在七月四日停止供给马达电力于中国工厂（上海租界的电气处本是垄断上海的电气业的），当然不是使中国资产阶级更加愤激地反抗，而是使他们急速地倒到外国资产阶级一方面去，帮同着压迫工人阶级。短视的、浅见的中国资产阶级，为了保持几万元（就算他几十百万元！）的利益，居然甘心卖国、卖民，实行摧折上海总工会。五卅国民革命运动的过程里，无产阶级的势力在政治觉悟上、在组织上都是非常之膨胀的时候，资产阶级的这种态度只有使无产阶级得到更深刻的觉悟——阶级的觉悟：“压迫禁止我们的自由结社，克扣我们的工资，保持租界制度……的，不仅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而且还有中国的资产阶级！”况且中国劳动平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原因，本在于要求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增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于是五卅以来中国华商工厂里的罢工，突然由对外示威的性质，变成切实要求经济、政治地位改善的罢工。八月中旬上海邮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罢工，便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对外妥协、对内压迫之答复，随后全国电报局的罢工，天津、河南、山东的中国纱厂罢工，都是同样的性质。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市侩，是中外资本家走狗的工贼，是大名鼎鼎的戴季陶先生，还是所谓国家主义者……他们只准工人为着争民族利益、国家体面而罢工，不准工人要求加几分工钱、承认工会而罢工，此等论调，

决不能使工人相信的。赞成国民革命而反对阶级斗争这种“学说”，假使对于资产阶级的学者是天经地义，那就对于无产阶级是极端的荒谬：一方面要求工人为“民族”而流血牺牲，另一方面这个“民族”又不许工人加几分钱、几角钱的工资，不许他们结社罢工的自由，不承认工会，这是何等的矛盾！无产阶级正因此而要扩大自己的组织和奋斗力，在五卅运动对外因资产阶级的妥协而渐次失败的过程里，国内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内部的阶级分化，自然而然格外暴露得急速。

五卅以后，全国罢工波及中国企业的潮流，不但是简单的经济斗争，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中国工人阶级在这次总的民族斗争里锻炼自己的阶级意识，扩大自己的组织，集中自己的力量，以备后来更伟大的斗争里，整个儿地负起解放民族、解放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五卅运动的第五点特性，是在经验上证明：国民革命的过程里，阶级斗争和阶级分化的必然性，并且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巩固扩大、阶级意识明确坚决之后，才能引导一般平民达到打倒帝国主义的目的；“工人阶级的自由是要用自己的力量去争来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革命斗争去夺来的”。

五卅运动的发展，开始于中国工业中心的上海，波及全中国的穷乡僻壤，开始于中国的无产阶级，震荡到了大资产阶级，甚至于官僚、军阀。不但全国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一开始便站在革命派势力的一方面，直接参加这一斗争；甚至于河南、陕西、湖南、湖北、直隶、江苏（苏州甬直、宜兴、江阴乡下）等地的农民，也都渐渐地开始活动，成立农民协会，反对苛税杂捐及预征漕粮，反抗地主，有些地方农民的运动往往是工会或学生会引起的——这亦是五卅运动间接的影响。总之，五卅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极重大的关键，它引起了一般下层的民众的积极斗争。可是，不用说，许多小城市里的五卅运动，往往限于抵制英、日货或者捐款援助工人。抵制英、日货的运动在上海就受买办资产阶级的怠工，内地（如太原、福州等处）甚至于因此而引起学生会、国货商和洋货商的武装斗争。捐款虽然有些力量，始终便宜了上海买办阶级，使他们可以不出一钱而坐享“盛名”。因此，我们要知道：中国现时资产阶级内部虽然还是买办分子占优势，而在五卅运动后，大部分小商人之中，反对把持包办商会、总商会的少数买办分子之对抗派，也在逐渐发生。革命运动自从五卅之后，冲破了思想上、政治上的万里长城，深深地渗入工人、群众、农民、学生、小商人之中，是绝无疑义的。然而：一则各地的罢工运动第二次起来：八月十一日唐山罢工的爆发，八月中南京工人的流血，八月初北京英使馆的罢工，八月六日以及其他地方，都在上海日厂罢工结束，工人阶级已经疲于应付帝国主义者、军阀、资产阶级、买办、工贼等四方八面的压制、逼迫、捣乱的时候；二则农民的运动还在刚刚开始，不能和五卅的总斗争合流并进；三则各地的小商人，真正能为民族利益争斗的资产阶级分子，还在买

办分子或顽固派包办的商会势力之下，不能脱离妥协政策的影响和卖国政策的蒙蔽，以致不能诚意地、彻底地和无产阶级合作；四则各地工商学各界的联合斗争，还只是所谓纯粹对外的反抗宣传，没有能力推翻当地的军阀政府，处处受军阀政府的压迫而零零碎碎地摧败。再则，一九二五年的世界史上，虽然要以“中国革命运动”占第一等重要位置，可是同时还有埃及的解散国会问题（三月廿三日）、印度的纱厂罢工（九月十六日）、非洲坦及尔因地方的罢市（七月三日）、摩洛哥战争（六月廿七日）、叙利亚革命（八月六日）、波斯政变——殖民地革命已经开始世界的发展，而中国的五卅运动都还不能和这些地方的革命运动直接联合，互相呼应，始终还是各干各的。所以五卅运动的第六点特性，便是在实际行动上证明：无产阶级的全国指导要更加集中统一，无产阶级与农民运动虽开始联合，还要有百倍于现在的深切关系之领袖地位；五卅运动实际地具体地提出革命平民的政权问题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各国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互相联合的问题——只有工、农、小商等革命势力巩固地团结，和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作战，在各地直接地组织武装势力，推翻军阀政府，才能使民族解放运动胜利。

帝国主义者在伟大的五卅运动的时候，自己觉着对中国的统治和他们走狗的军阀政权日益动摇，他们的屠杀政策，实际上不过是自杀政策而已，于是一转变而注全力于宣传反赤化、反共产的政策来，并且用种种方法破坏联合战线。这种政策在中国北部似乎稍稍有些成绩，可是在南部却完全失败。杨、刘、唐继尧等里应外合地进攻广州革命政府失败之后（六月十三日），不过一礼拜，英帝国主义者已经用离间政策，挑拨许崇智和蒋介石，使许崇智宁可放弃潮汕与陈、林妥协（六月十七日）而回广州与蒋介石争权。

可是五卅运动暴发于广州（六月廿一日罢工，廿三日沙面屠杀）之后，民众方面既然一致对外，内部的冲突自然不易暴露。国民政府的成立（六月廿五日），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成立相差不过六七天，这亦是一种联合战线的形成。国民政府之政治的内容，便是代表农民、工人、大多数小商人的利益，而且有革命的武力——国民革命军。它与上海工商学联合和上海总商会共同管理对外斗争的差异点，就在：它——国民政府，有农民群众和革命武力的赞助，而上海是总商会的武力（保卫团）和军阀相勾结。并且国民政府之中，是劳动平民占优势而不是买办分子占优势。

广东的农民、工人，不用说是争得了阶级斗争的自由和集会、结社等的自由；就是大多数商人，自从商团叛国之后，渐渐觉悟买办商阀的罪恶，而自己组织起来，尤其是革命政府肃清内部反动军阀之后，他们都一致地拥护这一政府。广东国民政府和香港罢工委员会在这种环境之下，当然能以全力坚持五卅运动的总罢工与香港空前的打击（外国新闻记者詹密士的谈话，说香港因罢工而损失的每月在七千五百万以上），

尤其是黄埔的开港，足以争回中国的经济独立和交通独立。虽然帝国主义者和上海一样的勾结军阀妥协派、右派来破坏这一联合战线，可是四五次的尝试无不失败：八月廿日廖仲恺先生被右派军阀刺死；九月十五日许崇智完全放弃潮汕，陈炯明因此复图侵袭广州；九月二十日许崇智部下莫雄、郑润琦又在广州谋叛，私自释放刺廖要犯；十月三日熊克武叛谋发觉……随后，段、张派永绩等军舰，帮助邓本殷从南方与陈炯明（东江）及熊克武部下（北江）三方夹攻广州（十一月间）。然而广州的国民政府不但没有推翻，并且已经统一全粤，把这些反动军阀完全肃清：苛捐、杂税、烟、赌、拉夫完全消灭，农民协会、工会有充分的斗争自由，财政、军政统一……成了模范的国民政府。对外的交涉，虽然沙基惨案还没有最终的胜利，然而日、美等国看见这样的巩固的国民政府，境内的革命运动又确没有明显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的目标，自然都软化下去，不敢与英国一致进攻。美国煤油税问题、黄埔戒严区域枪毙违法的日本水手问题、汕头日本人行凶问题，广东政府都得到中国自有外交以来所未有的胜利。就是英国，现在也已经不能不俯首求和，香港罢工不但没有失败，并且还有中国商人预备以罢市促港督的觉悟（今年一月）之消息。固然，广州的国民政府，种种方面的革新计划和建设事业还做得很少，内部亦许还有种种缺点，可是在二三十年骚扰压迫的中国政局之中，它实是唯一的一线曙光。中国的人民现在没有不希望在全中国有这样的中央政府的。五卅运动的一九二五年中，只在广州一隅给了一个民族解放运动里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会流并进的联合战线而后能胜利成功之缩影——打倒代表买办、土豪阶级的右派，肃清反动军阀，然后劳动平民、工、农、小商的联合战线才能巩固，政府的武力才变成平民的武力，然后对外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的运动才能充分地发展，而得着胜利的形势。

（三）

五卅运动之中，奉系军阀在山东、直隶、江苏、上海到处施行屠杀压迫政策，使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不能进展。段祺瑞和直系军阀萧耀南等，虽然急急忙忙提出对外抗议、拟议工会条例、公布“人权保障条例”等等，然而不久就使人民完全觉悟：他们这些“作为”，仅仅是为保持自己权位的假惺惺；大资产买办阶级虽然貌为赞助工人，实际上处处妥协以求外人“谅解”，出力帮助军阀、帝国主义者压迫屠杀工人，而结果五卅案重查，上海工部局的董事也不能到手，关税会议不能给中国以自主权，法权会议同样是装腔作势——一般小资产阶级，向来受妥协派的催眠的，当然要有最后的觉悟；工人、农民中的运动仍在深入开展，积聚着、集中着自己的战斗力。从上海总工会封闭之后，虽然工人运动屡受摧残、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被杀、各地亦均继续压迫，然而上海及

各地的工人、农民（如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同兴怡及其他纱厂、漆匠、木匠、车夫、石印工人等的罢工、怠工，河南杞县、江苏江阴等地方的农民运动，反抗县官、地主，要求组织农民自卫军……），仍在勇猛斗争。五卅运动所开始的国民革命，不会受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和资产阶级的破坏就停顿的。革命的前途正很远大，革命的后备军正在征集呢。不过五卅运动中最明显的卖国贼，莫过于张作霖的奉系军阀：他不但压迫人民，做英、日帝国主义的走狗，他并且趁着五卅运动派遣军队占领上海、南京……这和直系军阀的利益已经大有冲突。于是孙传芳于十月十一日——上海工人运动已经由奉系军阀代他完全压迫下去之后——宣言反对压迫工人复工，随后吴佩孚等也表示反对关税会议……总之把一切罪名都归到奉系身上去，而借此名正义顺地开始反奉战争。北部的中国民众，在这种时机：一、正是感觉民众武力的缺乏，就连广东国民革命军一样的军队亦没有；二、看见比较开明的冯玉祥等的国民军与奉军势力早已冲突，渐次加入战争，当然积极督促这种所谓国民军澈底地先扫除奉系军阀。五卅运动后的革命民众，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他们不能再容忍自己消极旁观军阀战争的心理、消极地要求和平的心理，在这一次已经明显地发出“变军阀间的战争为人民对军阀的战争”之口号。假使五卅以前历年来国民革命的预备运动足以使军阀之中发生所谓国民军，那么，五卅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当然能使中国现时最巩固、强盛的奉系军阀内部也起崩溃——郭松龄的倒戈，显然是受民众的国民运动的影响。虽然日本帝国主义者直接派兵到满洲，亲自下手杀掉这一“赤化”将军，巩固了奉系军阀的势力，在直隶李景林、山东张宗昌方面，亦予以实力援助，把这次反奉战争实际上变成了国民军与日本帝国主义之战——然而对于民众在五卅失败之后，又加以帝国主义者公然地对奉张助战，只有使我们更深切地感觉武装自己实行打倒军阀统治之必要。

固然——五卅之后，国民运动内部起了剧烈的阶级分化的现象，不但资产阶级直接地压迫束缚工人阶级，而且政党界、思想界也因此而发生分化：这一分化开始于戴季陶先生的反对阶级斗争及所谓“右派国民党员站起来”的运动，结果是极右派利用戴季陶先生的领袖，召集西山会议——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之右派会议；学生界里也发生所谓国家主义的运动，成立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西山会议中的主持力量实际上是极右派的邹鲁、林森以及叶楚傖、邵元冲等犹豫分子，这一会议的意义，重要之点在于反对广州中央及国民政府（开除汪精卫），其余开除共产分子等是连带的问题而已。国家主义的“运动”，主要之点也在谩骂广州政府国民军及苏联。五卅运动之中，因无产阶级劳动平民战线的巩固，而坚持到现在还没有屈辱的，只有广州的运动、广州的国民政府。中国资产阶级宁可妥协、取媚于列强而不肯牺牲几分钱的工资和工会罢工等自由给工人，所以他们的思想家和政治代表用种种诬蔑手段毁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

政府。中国共产党和广州的国民政府一样是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所最毒恨的。现在问问：谁要汪精卫离去广州？谁要驱逐很得力的苏联政治军事顾问？谁要反对共产？唯一的回答是：帝国主义者、军阀、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这一句里的“国民”“国家”等字样，我愿意是我写错的！）因此，全国民众反奉运动之中，我们在最初一期，听见许多仿佛是很体面的口号：“内不妥协，外不亲善”，这意思是说：一切武力不是到帝国主义方向去了，如张作霖（我们国家主义者当然不便和他妥协），便是到苏联赤化方面去，如蒋介石、冯玉祥（那又是我们国家主义派不愿意和他妥协）。殊不知这些所谓“赤化”将军，离赤化还远得很呢。国家主义派亦未始不知道。不过苏联帮助了中国的劳动平民解放，中国劳动平民在创造自己的武力之过程里，先因倾向民众的武力之比较地放任，而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得着了阶级斗争的自由，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些许不利而已。可是，因为劳动平民政治势力之普遍发展和帝国主义者的强横压迫，一般人民对于广州政府便日渐明了真相而想望它：有具体的、实际的胜利放在眼前。再加之帝国主义的日本公然出兵满洲、五卅运动中妥协的失败，渐渐使资产阶级的学者悔悟，资产阶级的政客改变策略。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者之中，居然发现些人，大谈其劳动问题、罢工自由的法律基础等等；戴季陶先生对于这些，自然早已知道，始终他是较远见的资产阶级学者，他并且要讨论到合作的方法共同反日的行动。联合战线的恢复便成了目前最切实、最紧迫的问题。

同时，这次战争里，军阀的崩溃，亦因民众运动的发展、普遍的国民革命政府的要求，而愈加急速——郭松龄、魏益三称国民第四军，山东方振武最近自称国民第五军（今年一月）。一般劳动平民经过五卅失败的巨创，看见广州国民政府的模范，都一致地要求组织国民革命委员会，推翻段祺瑞的政府（北京、上海等处的示威）。就是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也，已经觉得没有出路。不但如此，军阀崩溃的过程影响到全国政局——帝国主义者逼得不能不以关税会议、法权会议等等，延宕敷衍；军阀之中，没有一派能维持住“中央政权”，北京简直成了无政府的状态。现时在全国人民之前，所急切要解决的问题，便是：还是民众在劳动平民领袖的联合战线中取得政权、组织革命政府呢？还是由帝国主义指拨着奉系和直系妥协，联合而攻国民军，当然更加压制民众，以成就奉、直联合的反动政府呢？这种时机——军阀帝国主义统治极端动摇的局面，实际上是五卅运动所造成的，民众反奉运动和反对奉、直联合的斗争，实际上是五卅运动更深一步地继续。

现在国民第一军的首领冯玉祥，他曾经拒绝与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共同领袖反奉的临时革命政府，他曾主张暂时保留段祺瑞，他现在下野了。国民第二军和第三军内部非常复杂，然而它的左派至今还主张去段祺瑞，成立临时政府，立即召集国民会议预

备会。他们这些主张都是对抗张作霖、吴佩孚、章太炎等“法统”主张的，奉、直联合的主张是要恢复军阀的统治，恢复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的均势。国民军反抗他们的斗争，不得民众的赞助是决难胜利的，民众以要求一切政治自由斗争、自由的保障为条件，当然可以并且需要对国民军和国民政府加以赞助。民众的政治主张，在五卅经验之后，自然一致倾向于国民会议重建民国的要求。只要看国民党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的领袖以及国家主义的《醒狮周报》，都不能不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便可以知道民众要求的压迫，到何等程度了！国民党现在的新右派（与邹鲁、林森、冯自由等的反革命当然不同），也许真有明白的分子，便是国家主义者的青年中，未始没有真正的爱国者，他们不能再容许他们的领袖专以反共产为职志了！现在的问题，完全在于平民方面联合战线之中，增加武力的后盾和正确的政治指导，所以上海总工会等的真正群众团体，发起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恢复运动，主张以人民代表和国民军、国民政府立刻组织临时政府，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这一运动不久便要普及于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复兴运动里重要的职任，在于切实地结合一切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力量；资产阶级在妥协失败之后应当觉悟，小资产阶级在受了妥协政策的迷误之后尤其应当立刻站到革命的平民一方面来，国家主义者和国民党右派既然都赞成国民会议，何以不赞助首先提议以国民会议预备会解决国是和五卅事件的广州国民政府（七月二十二日）？现在应当两方面同时进行：一面各地工、商、学、农各界，国家主义，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左派，共产主义派，大家联合起来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就当地实行民众的意志，组织武装力量，反抗军阀的统治，同时精密组织各种职业的平民，以为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的单位和基础；别方面，广州革命的国民政府与国民军应当以自己的武力拥护民众的利益，立刻派出代表和全国各界人民代表开联席会议，即时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组织临时革命政府，统一中国，肃清国内一切反革命的势力，然后真正的国民会议可以召集成功，真正的共和国可以建设。这种行动的方针，难道不是一般劳动平民以至于资产阶级所应当采取吗？总之，五卅以后，国民会议的运动已经从宣传的口号变成实行的方针；这种运动已经有极大多数觉悟的民众做它的基础，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摧败它的。除非是资产阶级、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派，因为这太对于劳动平民有利益了而从中破坏，破裂联合战线或者故意怠工，那时，这种运动的成功或许要比较多的时间，比较更加艰苦些的斗争。他们的怠工破坏或许要成就暂时的直、奉联合之胜利，而变成反动的局面，然而胜利始终是劳动平民的！五卅所开始的革命不能停止的了！

一九二五年在中国国民革命史上，在世界的社会革命史上，实在占着和欧洲一八四八年及俄国一九〇五年同等的重要地位呵！

一九二六·一·二二

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

——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

瞿秋白

中国民众革命运动的开始，可以说是从五四时代起的。帝国主义的发展，欧洲各国的向外侵略、征服殖民地，是资本主义进程中不可免的现象。资本主义的国家，如英、如法、如德、如俄、如日等，内部生产力的增加和阶级斗争的剧烈，渐渐地动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私有财产制度。于是资产阶级便不得不力求扩大自己商品的市场和原料的来源，就是掠夺殖民地，以维持自己阶级的统治地位。他们侵略弱小民族——资本主义文化还没有发展的国家，他们可以独占那地的市场，垄断那地的原料，因为这些地方自己既然没有工业，当然不能和帝国主义竞争。

因此，他们可以得到超越的非常的利润——比本国市场内多至百倍的利润。可是，这种殖民地政策的施行：一、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各国之间互相的冲突；二、不能不使被侵略的国家逐渐地资本化。这两种结果，原是帝国主义自己所造成的，便足以致帝国主义的死命。社会革命的爆发便在这帝国主义内部崩溃的过程里发现：帝国主义的欧战是列强冲突的表现，是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可是战争的延长和破坏，使全社会中大多数群众不能再忍受资本主义的统治，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等都倾向于无产阶级而造成革命的形势。俄国的十月革命便是因此发动，又加以内部农民问题、民族问题等类种种矛盾冲突的汇集而成功的。便是英、美、法、日各国在欧战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也都经过一个可怕的革命危机。至于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化，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致命伤，它们的种种殖民政策、经济政策，无一不是遏制弱小民族的工业发展；可是弱小民族内部假使商业经济极不发达，大多数人民安于农业的自足经济，那时，资本主义国家便无从畅销它们的商品，无从多量吸收原料。所以弱小民族与帝国主义国家接触，便自然而然，至少在商业方面，逐渐地资本主义化，商业资本的积累（所谓“资本之最初积累”）必然发生工业资本，这时候，帝国主义的侵略便和殖民地弱小民族间的资产阶级发生冲突了。何况，帝国主义列强为夺殖民地而互相战争时，正给殖民地以发展自己工业的机会，宗主国的生产完全集中于军事，

殖民地的生产和原料，当然只能自己经营、自己应用；那商业里（买办，洋货商）积累的资本，久受宗主国资产阶级政策的束缚和遏抑，到此便不能不急速地投入工业生产。这便是国民革命的经济基础。于是社会革命开始的时期，便是殖民地弱小民族里国民革命开始的时期。帝国主义之前的一时代里，落后的资本国与先进的资本国相竞争（如俄国彼得大帝变法、日本维新）的过程，和现时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向帝国主义革命的过程是断不能相混的。即前一过程，即使有革命，也只是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后一过程，便含着多量的无产阶级的性质在内——在国际范围内，这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一国范围内，虽然性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而在革命力量上，却大半须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端，正在于五四时代，这里原因看上述的经济分析便可以明了。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它在政治上的成绩，影响于多数民众最大的，只是“国货”两字，这一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和五四前后中国资产阶级，确有一期的大发展的事实，便已经完全证明了。可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反对宗法封建军阀的革命，内部必定含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种子，各国革命史都是实例，中国何尝又能例外？——其中的理由非常明显：资本主义发展之中，资产阶级的经济力固然集中而强大，无产阶级的增多与团结也必然相伴而行，天下哪里有没有工人的工厂呢？况且这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在殖民地上，如中国的五四运动，事实上、思想上都是受世界革命潮流的冲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中国新思想的勃兴，谁又能否认俄国革命、德国革命、英美大罢工、劳动问题的世界化等等的的影响呢？那时的青年和学生，差不多个人人都注意报上世界革命运动的消息，个人人都想谈几句劳动问题、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的思想，当然是很笼统模糊的，然而就在这一源流里，生长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共产主义。《新青年》杂志的左倾与其共产主义化的过程，便是明证。当初五四运动时的新文化思想——反对孔孟、反对旧礼教、白话运动、妇女问题等等，都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所需要的。同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劳动社会问题的研究热与上述各种运动混流并进。这是很明显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反抗宗法封建社会。——这种联合战线，第一，当然不是自觉的；第二，当然增加中国革命运动的新力军，以救辛亥革命后垂危的国民党。实际上这些思想上的新潮，只是资产阶级民族自觉的先驱和后盾，所以主要的政治力量，仅仅只产生“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可是在当时的环境里，这种社会力的伸张，确是一大进步，可以使国民党、孙中山先生等“俯就”新潮，甚至于俯就马克思主义——《建设杂志》《星期评论》《孙文学说》等等，都是在这时候出世的。

五四到五卅，这六七年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有重大的政治上、文化上的意义。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五卅之后，大家争着辟阶级斗争——从北京、上海到广东，从北京大学教授、戴季陶（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到所谓“中兴名将”的曾、左、李国家主义派。这是什么缘故？原来，中国社会在欧战之后，一方面资产阶级发展，别方面无产阶级发展；社会上新力量产生的初期，共同联合战线反抗宗法军阀社会，涌起国民革命的巨潮，随后的发展，便是两阶级互争革命的指导权和国际上联盟军的争择之过程。这六七年中国国民革命的实际进程，却是从模糊笼统的联合战线进而至于明显的自觉的，从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进而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从资产阶级联美，制日的希望进而至于联世界无产阶级的国民革命。这种过程，到五卅运动而得到了极高的发展。国际关系上，在这六七年中，资产阶级所希望于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的，着着落空；而无产阶级的新国家苏联，不但事实上废除领事裁判权等，并且进而切切实实赞助中国国民党的发展。国内斗争里，在这六七年中，中国无产阶级运动长足的进步、四五年来的罢工运动已经使无产阶级的三分之一（至少数）组织在工会里，每次在民族斗争里，表现它的力量；国民党改组一年，在党内刷除买办官僚的分子，在广东给买办和土豪阶级（商团、民团）以极大的、继续的打击；并且军阀之中亦起分化。无产阶级在这国民革命过程中，确已占得多份的优势，到五卅时候，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领袖五卅运动，尤其是无产阶级指导下之联合战线发展的最高点。资产阶级看着无产阶级的势力足以导国民革命于胜利，看见国民革命的进行中资产阶级要牺牲自己的私利——其实不过是容许工人、农民组织和斗争的自由，极普通的民权，于是开始反动而求争回革命的指导权以消灭革命。同时帝国主义者尤其害怕这种运动的澈底发展，正在努力“工作”，作反对所谓赤化苏联的宣传，离间挑拨资产阶级。于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也发现自己的“阶级觉悟”，而努力于反对阶级斗争和国家主义的宣传。国民党右派的形成，实际上是与帝国主义者联合战线。这里阶级分化的现象是非常之明显的，半年来思想界里的反动潮流，从主义上、策略上、革命领袖问题上以及道德文化上所发生的争执，都是这一现象的表演。可是，同时中国革命运动的进展，使无产阶级政党和国民党的主张，如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国民会议的运动等，都因而渗入普遍的群众里去。中国社会一般的革命化的过程，当然影响到政党界与思想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及智识阶级也就逐渐显现他们的左倾。最近半年来，北京方面有《猛进》杂志、《莽原》杂志，上海方面有《洪水》杂志等等。至于国民党内如柳亚子、朱季恂、甘乃光、陈公博等，居然形成强有力的群众的左派，汪精卫、蒋介石等革命倾向之确定更不用说。思想界与政党界左右分化的过程，显而易见是随着国民革命运

动的进展而日益激烈的，或者以为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的兴起是中国社会反动的表征。其实不然，这种反动正足以证明中国革命进展急速——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于军阀以外，另找一种比较“灰色”的工具；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急起直追地攫取革命思想的指导权。

中国革命是国民革命，然而国民革命的进行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由资产阶级来指导——对于帝国主义作局部的抵御，利用所谓列强之间的冲突而苟延残喘，想镇压劳动民众的阶级斗争，处处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而希望以反对赤化取媚外人，求得些许的恩惠；一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对于帝国主义整个儿推翻，利用帝国主义与世界无产阶级的总冲突而进行革命斗争，发展国民革命中之阶级斗争成分，集中最大多数民众的革命力，以求肃清国内一切买办、军阀、土豪等帝国主义的工具和劳动平民的压迫者。现时左右派斗争的具体问题是如此，并非如表面上看来是共产与反共产的争执。然而右派——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派——故意装着不知道自己造作一个共产做对象——其实是帝国主义的谣言，他们却偏偏当真的来攻击。

如果要反对共产主义，便应当明了共产主义的意义。

如今思想界的右派却都是信口胡说。譬如邹鲁、孙镜亚等类的国民党员，曾琦等类的国家主义派便都是如此。

他们或者说广东政府立刻就在实行共产，或者说共产党是要中国社会回到原始共产制度（《醒狮》第六十八期）。广东政府是否共产，现在不值一驳。中国共产党要实行的是原始共产制度吗？这不过是曾琦等自暴其不学与荒谬，不值得去说他。至于比较有研究的戴季陶先生和《独立青年杂志》的灵光先生，也是同样的不了解共产主义四字是何所指。季陶说中国共产党的主义不适宜于中国；灵光说中国共产党要抄俄国的老文章。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否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主义究竟是什么？我想，他们一定知道的，他们一定知道中国共产党并不曾主张明日便使中国社会里实现共产制度；可是他们因为要反对中国共产党，故意一口咬定地这样说。这里我们可以找着丝毫的客观态度吗？当然不能够！

我们应当分清楚共产制度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共产制度是说全人类社会之中阶级已经消灭，一切生产分配由社会经营，个人只须依照社会的计划去参加工作，便能得到社会的一切供给——衣、食、住、娱乐、科学等等。共产主义是说从现在社会——帝国主义的列强、商业资本、宗法社会的弱小民族殖民地，以至于非洲、西伯利亚等处的原人社会——怎样过渡到共产制度的种种式式政治、经济、教育等的方法：政党的策略、革命中的阶级关系、经济文化等的政策、革命后的国家制度等等。他们右派

说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即不能实现于现时的中国，如果是指共产制度而言，那么，不用说在中国，便是在已革命的俄国，将来革命后的美国，也不能立刻涌现。如果指的是共产主义，那么共产国际对于各国，都有相当适应于当地经济状况并与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相联络的政策。他们应当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政策加以详细地、虚心地研究，才有开口批评的资格。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中国经济状况有周密的研究，以前《新青年》《前锋》杂志曾经登过不少这类的文章。因此，中国共产党确定进行革命以达共产制度的第一步政策：（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适值世界帝国主义猖獗侵略中国的时代，亦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时代，中国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以至于资产阶级，都处于帝国主义、军阀双重的压迫之下。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应当努力实行国民革命，引导一切平民参加民族解放斗争——中国的国民革命当然就是世界的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民族的解放，便是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削弱。（二）这种国民革命的斗争里，无产阶级和农民应当以自己地位的改善和政治自由的取得为目标，因为解放大多数中国民众才能算得民族的解放。（三）凡是遏制劳动民众的斗争自由、剥削劳动民众的利益之一切势力，都应当和它奋斗，都应当推翻。那么，中国资产阶级如果压迫、剥削民众，阶级斗争便是国民革命中不可避免的，如果他们因为要压迫、剥削民众而与帝国主义者、军阀妥协或联合，那么，劳动平民的阶级斗争不但拥护自己阶级利益，而且就是拥护民族利益——更加必要。（四）这种革命的进行和胜利，必须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民族，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中国的力量才能排斥帝国主义的势力。而中国、印度、安南、朝鲜、南美等排斥帝国主义势力，同时，英、日、美、法、意等国内无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这种革命的胜利自然就是打倒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那时便当然根本推翻。（五）帝国主义国家内资本主义推翻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弱小民族及殖民地上的幼稚的私人资本主义便根本无继续发展之必要与可能，亦可以由劳动平民组织的国家执行有规划的发展经济实业计划，以渐进于社会主义和共产制度。这种政策，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国情？用不着理论上回来回答。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劳动运动之后，这四五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革命运动的进行，直到五卅的大开展，全国工人、农民、小商人的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普及穷乡僻壤，便是老老实实在的证据。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农工阶级因得着多量的自由而赞助革命政府，还在继续不断地和地主、买办阶级奋斗，以巩固革命政府的基础。广东一般人民现在能免除苛税杂捐的重负和反动军阀的压迫，便是这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国民革命的结果。苏联、土耳其、蒙古、印度、埃及、叙利亚、英、法工人等革命势力对于广州政府的赞助和同情，便是革命政权确定而不受英国帝国主义摧残的保障之一。

这种政策是否抄俄国的老文章，更不用详细地解释了。《醒狮》派和邹鲁派当然每况愈下，已经和买办阶级的冯自由派不能互相区别。他们除反对苏联、反对赤化而外，本无别种任务，只是信口造谣，说广东是俄人统治，是实行共产，说共产党是否认国家等等。广州的事实，最近国内外国民党代表的第二次大会，甚至于得到华侨及香港华商的赞助——已经为一般人所公认。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解放中国民族的口号，诚意地和国民党左派、革命派的孙中山主义合作——这第一阶段的中国共产政策当然和国民党的革命主义相符合。何以能说共产党否认国家？可见《醒狮》派的态度，还不仅是曾琦等无知、荒谬不学的结果，并且是有意混淆事实，出于造谣中伤的用心。至于戴季陶、灵光等也是无的放矢，还有些人，或者接受共产政策而故意反对共产党。适足以表现他们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

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所反对的既不是共产制度——共产主义的终极的目标，当然便是共产主义适用于中国情势的政策。这些政策之中第一个重要问题，便是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中国，自然而然工人阶级的运动也随着开始；尤其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帝国主义的资本家既在实行对于殖民地劳动者的奴隶制度，中国的资本家又因处于帝国主义强力的压迫与竞争之下，不必能如资本先进国的余裕，可以及早让步、賂买部分的劳工贵族，亦是拼命地向劳动者压榨，以求利润。中国工人阶级对于这种双方两重的剥削，自然不能不开始斗争，而且这种斗争一开始便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绝无改良主义的阶级妥协之可能。中国工人阶级开始斗争的期间，所争的不过是增加些工资、承认工会和罢工的自由——罢工期间的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的要求实际上也还很少，开始斗争的方式何尝不是“和平”的谈判？然而资本家的政策，都是非常狡猾无信、残暴狠毒，次次必须以罢工的斗争才能解决问题。阶级斗争本来是资产阶级自身的行为。如今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斗争，右派却叫无产阶级不准回斗，岂非纯粹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右派常说，要劝告资本家，诱发他们的仁爱性——仿佛共产党只是鼓动工人斗争，而又反对资本家仁爱。这种劝告，事实上是否收效？中国几千年的孔孟仁爱学说，是右派自诩为中国的国民性的，何以中国资本家都变成孔孟化外的人，而且变得如此之速呢？中国劳工运动的历史事实具在，现时工人阶级所处的实际地位具在，何以能说阶级斗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七八年前说中国没有大资本主义，或者可以说得过去，而五卅之后，上海、香港、汉口、河南、安源、天津等处，百万余工人的罢工事实还想否认吗？工人阶级默无声息地替资本家用汗血去赚钱，资产阶级的学者、思想家、政治家或者还可以装着看不见，信口乱说中国没有工人——没有工业资本。如今工人阶级已经有实际的行动，震动全世界的大罢工，资产

阶级的学者等等还能装聋装瞎吗？

共产党不但不反对资本家仁爱，而且只有共产党能够使资本家仁爱，只有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能够使资本家仁爱。譬如去年十二月商务印书馆的罢工，工会方面前三天提出条件，要求答复，然而资本家不理，一定要等到宣布罢工，军警压迫、开枪、鞭打而工人不屈，而后资本家“仁爱”起来，假惺惺地哭起来，退职俸金的条例答应了……这是一个证据。五卅以前，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都是反对阶级斗争，甚至于说农民协会、工会等的保护政策都是赤化（那时骂广东政府的口头禅，谢英伯、冯自由等反对广州中央的“证据”）；如今右派和国家主义派除反对阶级斗争之外，也赶紧谈起劳工立法，谈起劝资本家仁爱来了。假使不是工人阶级最近几年来的斗争，戴季陶先生的仁爱说、《商报》、陈畏垒君的劝告说（一月二十四日）、《独立青年》杂志的宣言、《醒狮》国家主义派的“解决国是办法”——处处不敢不提起劳工利益的口头禅，恐怕还未必见得实现罢？而现在谈得格外起劲，更是因为五卅运动中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之充分表显。这是第二个证据。再则，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的时候，罢工要求承认工会，以几十万人的斗争力量，逼使段政府不得不拟议工会条例，上海总商会也不得不代行电请；等到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摧残了工人运动，工人的大规模的斗争被停止了，段政府和总商会便不肯“仁爱”，不肯提起工会条例了。这是第三个证据。

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总说工人阶级的斗争足以把资产阶级吓得反动，分散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尤其是笑话。难道中国工人阶级应当忍受中国资本家的剥削，同时却又能反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参加国民革命？中国资产阶级要利用工人的力量争民族的解放，便应当牺牲自己的目前利益：工人反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当然也反抗中国资本家同样的压迫；中国资本家不能自动地减轻压迫，便只有受反抗。假使中国资本家因受反抗而竟反动，以至于勾结军阀、帝国主义，那就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尤其必要。总之，中国资本家、地主，只有两条路：一是向工人、农民让步，不禁止阶级斗争，因而取得民族解放——关税自主权、国家的统一、军阀的肃清、苛税杂捐的免除；一是宁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军阀的虐使，而勾结他们来压迫工人——自己忍受军阀的扰乱市场，勒捐餉项，帝国主义者之扼制——如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权、租界管理权等。前一条路是现在广东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所走的；后一条路是上海资产阶级的所走的：广东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工会的发达、资本家剥削的限制，工人罢工斗争的自由、农民协会的组织、农民自卫军的战斗）是革命政府的基础，而如今广东一般商人、资本家、地主，已经能免除苛税杂捐，自己建筑黄埔商港；上海的资本家却宁可受帝国主义者的统治，电气业由他们垄断独占，五卅时租界

当局停止供给华厂电气时，中国资本家赶紧出全力帮助帝国主义者用种种勒迫、欺诈的手段摧残罢工，仅仅因为不肯牺牲停电期间的工资！

再则，如上海孙文主义学会的《革命导报》宣言，如《商报》一月廿四日的社论，总是说：“中国工人只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战斗的目标也只外国资本家”，或是说，“以阶级斗争助成民族独立运动，吾人亦不能无异辞：民族独立要求，意义有在麦饼、米饭以上者”。诚然不错！可是，阶级斗争的意义不但在“麦饼、米饭”以上，并且还在民族解放以上。现时中国工人阶级所以能懂得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等，正因为他们实行了阶级斗争，正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的阶级斗争之最低限度的目标，正因为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范围内中国无产阶级和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国民党右派要反对国内的阶级斗争，要否认民族解放与阶级斗争有一方面的共同意义，并且要工人的战斗目标限于外国资本家——正足以见他们完全只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努力工作”“站起来”和赤化及阶级斗争奋斗，反对中国共产党，用种种手段欺蒙无产阶级，说中国“任何阶级”（军阀、买办似乎也在内）都有共同利害，实际上是叫工人去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压迫而不要反对中国资本家的剥削（去年上海、天津、郑州、安源等的华厂工潮，已是中国资本家剥削、压迫的明证——他们还要说没有！）——正足以见得他们努力从事于“阶级斗争”，站在资产阶级地位来反对工人的阶级斗争。他们自身的发现于中国，他们自身的政治态度和政策，正是中国共产党政策和共产主义适合中国情势的最有力的例证。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呵，你们如果要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适于中国，要证明共产主义是不合事实的理论，那么，你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最有力的打击，便是停止你们自己的存在，消灭你们自己！

国民党右派的内部，正和中国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的内部一样，是决不能一致的。虽说他们反对赤化，和帝国主义也可以结成联合战线，可是他们各派相互之间仍旧有许多不同的矛盾的观点和政策。去年国民党右派中央委员的西山会议，完全受邹鲁、谢持等买办阶级派之统治——他们勾结冯自由等之所谓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对于戴季陶等右派中较左的，施行绑票，提到俱乐部中，加以殴打、恐吓，强迫签发宣言。所以继承西山会议的所谓上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事实上是邹鲁派的，而还不是戴季陶式的，戴季陶因此而宣言辞职。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见《民国日报》十二月二十四日）这一所谓“中央”的告国民书，公开地骂共产党是依赖苏俄，说苏俄是另一属性的帝国主义，对于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共同作战，简直完全不提起，只说“必先取得中国在世界的平和地位，然后才配进行实际的援助弱小民族”。然而戴季陶先生最近的表示（致楚仑的信），却明确说：“现代之帝国主义成为一国际的组织，

反帝国主义之工作非一民族之力所能成功，故……凡信仰先生（中山）之遗教、遗嘱者，必须重视此点，对于先生与革命之苏俄友善，及与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与世界各国之革命的民众提携之旨，尤不可忘。至对于同在革命道途之友党……亦宜尊重同仇之德义，相见以诚，不为无益之猜忌、无理之攻击。”此中的分化，又更显然。嗣后上海孙文主义学会的《革命导报》宣言还是说：“他们（左派）只是消极地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这一制度，国民党之反对帝国主义，乃积极地扶植中国农、工、商、兵、士各阶级之利益的发展，联合殖民地、半殖民地各被压迫民族在同一战线上促进帝国主义之崩坏。”这可与戴季陶先生不同了：第一，《革命导报》宣言中有许多“无理之攻击”；第二，戴先生认帝国主义为国际的组织，必须“与世界之革命势力切实合作之以图我民族独立之成功，而促世界革命之实现”（见他复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电）。《革命导报》说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是消极地反对帝国主义，这竟是抹杀许多事实——共产党四五年来实际斗争，迹近造谣诬蔑。他们自己承受了联合被压迫民族、促帝国主义崩溃之政策，却还反过来攻击最先提议这一政策的人，实在有点可笑。可是善变的周佛海，从马克思主义者变成孙中山主义的修正派的周佛海，更退后了一步，竟说国民革命不是根本打倒帝国主义，而只是打倒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势力（见他《论国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演讲和《革命导报》上的《释打倒帝国主义》）。这不但和戴季陶先生不同，并且与《革命导报》宣言自相矛盾。这种政见已经与《独立青年》和《醒狮》完全相同，不过肯用帝国主义四个字罢了。《醒狮》派国家主义者动辄高呼外抗强权，认打倒帝国主义为共产党一党的口号，“非国民革命之所宜采”（见曾琦《对于开除共产党后的国民党之三大忠告》——《醒狮》第六五期）。《独立青年》宣言也说：“我们要认清我国的问题，是我们中国的问题，不是国际的问题，是应由我们中国人自起而解决的问题，不是要联合全世界哪一阶级来打倒他一阶级的问题——如共产党所主张的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的问题。”

邹鲁、周佛海派的上海右派国民党中央和《独立青年》《醒狮》等派的国家主义，总是反对打倒帝国主义——而只说要抵抗外国的侵略。无产阶级当然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可是同时认清必须打倒国际的帝国主义，而后中国才能根本免除侵略；资产阶级却不愿打倒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帝国主义。这些右派的资产阶级性是非常明显的。其实中国民族如果真能排斥一切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他和土耳其的经济上的国际地位大不相同——必然予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各国无产阶级得此援助，必然群起革命，推翻世界的资本主义，那时帝国主义自然要根本打倒。周佛海等难道还赶去救护这一帝国主义吗？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必然互相联合起来——这是反乎所谓国家主义的，国家主义派势必努力反对的了。这结果，岂不是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是列强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很恭顺、可靠的保护人！

不但如此，中国民族同时要反抗各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各国帝国主义如有巩固的国家主义，足以蒙蔽国内的劳动平民，他们便有可靠的军队、教徒、军事上的技术能力，加上外交阴谋、资本势力，中国民族用什么力量能抵抗这种侵略！国家主义派反对联合国无产阶级，孙文主义学会也是如此（《革命导报》宣言只说被压迫民族）。这种主张是足以为帝国主义所利用，证实它们的“黄祸”谣言——法国总理白里昂便以“防御”摩洛哥人屠杀白人的理由欺骗法国工人，使他们不反对出兵摩洛哥。中国国民革命必须联合被压迫民族，必须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共同作战，才能有充分的革命力量；必须努力宣传世界的阶级斗争，使各国无产阶级自己起来反抗帝国主义政府，同时帮助中国的国民革命，才能得到根本的解放——所以中国国民革命的进行中，反对各国国家主义，是联合世界一切革命势力所必须的工作。

至于联合被压迫民族和苏俄的革命运动问题，邹鲁派的国民党“中央”既是包藏着攻击苏俄的用心，并说先求中国独立，然后再能援助弱小民族。邹鲁等也曾和《醒狮》派一样，说广州革命政府受俄人的统治，况且他们的“援助”弱小民族也和《醒狮》《独立青年》等派一样，主张改蒙古、西藏为中国的行省，反对民族自决。先论联俄问题，这里有一个很可笑的现象：他们尤其是《醒狮》派，反对“帝国主义”的名词，可是却说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苏联是否帝国主义？有事实可以证明——试看如上海、汉口、天津、广州等处的苏联领事早已没有领事裁判权，最近那右派的所谓中央，却说苏联要以《陆路通商条约》为废除领事裁判权之交换条件，这岂不是造谣伎俩？他们攻击广州是俄人的统治，现在已经不成问题，香港的华商及一般人都已经看见事实的证明；俄国人在广东的唯一“罪状”，大概只是帮助国民政府练成强有力的革命军，弄得香港的英帝国主义者无从侵略。他们最近宁可和张作霖及日本帝国主义者联合战线，对于中东路风潮反对苏联，仿佛中兴名将于曾、左、李之外，又添了一位咱胡子也姓张的张作霖了！苏联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即使站在民族的观点，也应当和他联合，利用他和各国帝国主义的冲突。帝国主义者所最恐惧的，便是中国民族与苏联联合战线，而国家主义派所最反对的，也是这一联合战线。大家想想，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功绩多么大！对于与被压迫民族联合战线的问题，孙文主义学会形式上是赞成了；邹鲁派的国民党“中央”却要先“独立”而后“援助”。真不错！日本现在先独立了，所以讲起大亚细亚主义，国家主义派亦很赞成，只是不要日本来行，而要中国来行（《醒狮》第六六期曾琦答孙文主义学会）。这种中国帝国主义的阴谋显然暴露。《独立青年》更反对蒙古、西藏的民族自决，因而反对联邦，要使它变成中国的行省（《独立青年（创刊号）·联邦与中国》）。蒙古自决问题呢，

国民党右派——连孙中山主义学会也在内，以及《醒狮》派、《独立青年》派，都因此问题而说中国共产党是“亲俄卖国”，要“求中国为俄国的第三国际的附属品，……促成俄国发展到帝国主义。”国民党右派显然违背孙中山主义——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宣言，明确地承认蒙古等民族的自决权，主张各民族自由结合的中华民国。其实，单由民族革命、国民革命的观点上来论——就是《醒狮》和《独立青年》也不能不承认这种革命，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只有汉族采取绝对自由的民族自决的原则，才能解决；如果蒙、藏民族自己要坚持联邦制度，中国国民革命的政党，都可以让步——只有这样，才能使弱小民族倾心于革命的中国。各种右派的民族问题政策，正足以恐吓蒙、藏，使他们和中国离贰，或者愈益倾向苏俄，或者受帝国主义的利用。他们几百年来受中国大商阶级及满清贵族的侵略，自然有许多过分的怀疑和不信仰。列宁主义说：“民族自决直到分立国家”，这种原则，已经结合许多民族而成立伟大的苏联；孙中山主义说：“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只有这一原则才能结合巩固的“五族共和”。

国家主义派《醒狮》《独立青年》等，往往说共产党的打倒帝国主义是社会革命的口号，“共产适是以召共管”。这一说法，刚巧和辛亥革命前保皇党的康梁派之“革命适足以召瓜分”太相像了，这可不是偶然。所谓共产是什么？难道是中国共产制度的实现，那么，中国这种落后国家里共产制度尚且实现了，帝国主义当然早已不存在，又何从来的共管呢？假使是说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各劳农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国无产阶级与世界及苏联劳动平民的联合战线——在他们目光中，甚至于说国民党左派的政策，如辅助劳农、平民的组织、不禁止妨碍他们的阶级斗争、和苏联及各国革命平民相联络等，也认为共产主义。假使所谓共产是说的这些政策，是说的现时中国达到共产制度的革命途程（这里所谓共产主义并不名不副实——如灵光君在《独立青年》第一号所说的），那么事实上已经证明“共产即召共管”的论调之荒谬。这些政策，不是广东国民政府所实行的吗？事实上，这些政策正是救广东出于共管现象的唯一道路；而上海、北京等处的五卅经验中，都证明不能实行这些政策，适足以成就帝国主义的共管事实：五卅案司法重查、关税自主经列强一致否认等等。

至于理论上，他们以为中国只要利用列强的冲突，便可求得独立，常常举土耳其来作例子，用不着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这一理论的错误是很大的：第一，譬如土耳其，在欧战以前，同样有英、法、德、俄各帝国主义势力的冲突，何以不能独立解放？因为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是有一定限度的，它决不能帮助自己所要侵略的国家解放。第二，土耳其的革命成功，因此显而易见是苏联革命胜利、第三国际成

立后，英、法共产党的工人反抗帝国的侵略政策和苏联政府的实力赞助之结果。第三，中国经济上的国际地位和土耳其完全不同，当然更比维新前的日本不同。维新前的日本是处于资本主义初初发展成帝国主义的时期，列强的“海外侵略”还有较阔大的战场，他们因互相冲突而放任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还有如中国等处的市场可以侵略。土耳其在经济上对于帝国主义的存在，现在也不占举足重轻的地位，它的独立，不足以致整个儿帝国主义制度之死命。中国现时既处于帝国主义末期的时代，帝国主义的命根差不多全在中国，而且中国本身有最大的富源、最多量的廉价劳动力、最优越的商品销售场。因此，中国即使不行“共产主义”政策，仅仅民族革命，也足以促起列强的联合战线。共产主义的政策正足以破列强国内的民族的国家主义的联合战线，使这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各国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灭杀大部分的力量，不足以行共管。何况，五卅运动的经验里（见本号《五卅运动与国民会议》），证明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只能到一定的限度，过此限度，便必然互相冲突；中国方面民族解放运动愈澈底——民族革命政策愈共产化——他们的联合战线愈软弱而致于破裂。

国民党右派——邹鲁派国民党“中央”和上海孙文主义学会，如今说共产党是勾结一派军阀以打倒别派军阀（见《右派中央及革命导报宣言》）。这在国家主义派口中，还仿佛是假清高的论调，在右派口中，真不知是何居心，有何颜面！邹鲁等勾结杨希闵、刘震寰的事实谁都知道。当共产党反对这种右派政策、反对依赖军阀的时候，右派说共产党是离间国民党的“友军”（卢永祥等）——前年双十节，黄仁同志还因此而被“人”凶殴致死。共产派反对这种残杀行为时，叶楚傖等还要为“人”辩护，不肯开除。如今却说共产党勾结军阀！何等的……！国家主义派（《醒狮》）说共产党勾结军阀，竟指出上海国民党市党部督促冯玉祥为国民会议奋斗的电报作证据。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的政策是看清现在军阀的崩溃和分化，主张平民召集国民会议，将一切倾向民众或表面上赞助民众的军阀，放在平民的国民会议之统治之下，使他们无可遁形。帝国主义者反对冯玉祥、蒋介石等，说他们是赤化军阀，正是要恐吓他们，使他们离开民众。国家主义派也帮着谩骂冯、蒋联俄卖国。国民党右派最近已不敢反对国民军，对蒋介石更从来不敢“开罪”，然而还空口地说共产党勾结军阀。他们这种行为何等的“对内一致”——与帝国主义者一致呵！冯玉祥等的国民军，当然还包含着不少反动成分，其中有吴佩孚余党，有犹豫畏怯、冯玉祥式的政策。可是人民方面，只有督促着国民军往革命道路上走，才能肃清它内部的反动分子和反动政策；决不能将所有中国的武力一概视作军阀而反对之，都送给帝国主义者御用。人民与武力的结合，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策略。这一策略的运用，一方面是造成国民革命军和武装工

农平民，别方面是将现有的军队、兵士、下级士官以至于忠实于革命的“将军”，置于人民的统治及指导之下。这种策略运用得不好，弄得国民政府受军阀的挟制操纵，如以前杨希闵等的所作所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以至一般人民都要反对，并且要力求肃清这些势力的。我们对于国民军，亦是这样主张。至于蒋介石等，现时的国民革命军，恐怕唯一的“罪状”，便是遵照人民的意志，肃清了反动军阀，停止了拉夫，勒派饷项，擅收租税、杂捐等的事罢了。国家主义派要反对这种军队，何不直说反对国民革命的成功呢？

奇巧不巧，《革命导报》居然说：“他们（左派）之反对军阀，目的在利用少数军阀，以促成名义上的劳农专政，实际上的寡头政治。”共产党在国民革命时代并未主张无产阶级独裁制，这是谁都知道的；右派的这种攻击，和其他攻击一样，故意自制其“共产主义政策”来做对象，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在理论上驳难共产主义政策的能力，所以只好以造谣的伎俩来中伤。共产党所主张的——国民党左派当然也可赞成——正是在国民革命时代必须革命的，各革命党联合战线的，对于保皇党、帝国主义党、军阀党、买办党、土豪党，对于一切反动势力的独裁制——国民革命的革命派独裁制。一切革命没有独裁制便完全是空想：难道革命胜利之后，还能容许反革命派的自由，以便他们推翻革命？至于《醒狮》《独立青年》等，更宣言反对一党的专政，可是《独立青年》第一号《民众势力与军阀势力》一篇论文说：“由真诚了解民治主义者，抱我入地狱长期牺牲之决心，分途躋入各机关团体，加以切实之整顿、有力之指导、严固之组织。”这不是政党作用又是什么？如果这些机关组织内，推而至于一国内，有买办、军阀等反革命分子，不服从所谓“有力之指导”，那时怎样呢？难道照德谟克拉西的原则，应当放任？推而至于国家的政治，应当由国内一切阶级，所谓全民：军阀、买办、土豪、人民等等的“联合政府”来治理？真正的民权主义，只有拥护保障真正平民的政权。至于无产阶级一阶级的独裁制，诚然不错，是共产主义，可是这一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事实上当然只在社会内其他阶级，如资产阶级完全变成反革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现时认为国民革命时代中，应当实行对于军阀、买办等帝国主义的走狗之革命独裁制。这是中国唯一的出路，这种政策，已经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国民党所接受（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灵光君对于无产阶级独裁制怀疑，他以为：“无产者的志愿是在乘机得到一些财产……所谓成功，不是共产革命成功，而是他们个人的致富成功”（《独立青年》，灵光：“质郭沫若……”）。又说，共产党有什么“不投降便打倒”的政策，这和误解劳农专政是寡头政治是一样的。灵光君不曾研究一研究：俄国现时——革命胜利后第八年，无产阶级是怎样“团体致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生产、工人农民的俱乐部、合作社、公共寄宿舍等；他也不曾研究一研究：俄国现

时的选举制度，各省、各县及中央的国家职员有多少农民、工人（这些都有统计和事实可以复按的，最好要不以耳代目）。至于说中国工人幼稚，甚至于如《商报》上的姚公鹤，说女工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都是出钱买她们来的。这种对于劳农平民的不信任，实是知识阶级傲慢与无知的结果。俄国工人、农民当初也是很无智识、很幼稚，而革命斗争的经验和共产党的工作，使他们现在做了苏联的主人。就是中国的女工，受着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和五卅斗争中的经验，也有一部分比以前的智识、能力长进得多了。假使说这都要用钱去买，岂非大笑话？五卅时期，上海大街小巷都贴着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大半都是一般普通人民所写的，难道都是钱买来的？这种意见，简直认农工民众中，永无增进智识的变化，显然是不切事实的。“不投降便打倒”和“寡头政治”的说法，尤其是“海外奇谈”——欧洲的帝国主义者和投降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也往往这样地骂俄国共产党，事实上俄国政治的实际状况和各国共产党的政治行动，都可以证明这完全是谣言。共产党不但不抱着“不投降便打倒”的原则，而且处处都是引导革命派的统一联合。譬如广东政府里的汪精卫、蒋介石，现在更加上胡汉民，甚至于伍朝枢、孙科，他们何尝投降了共产党，而并没有被打倒；上海最近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固然仅仅只有左派而无共产党，然而共产党是赞助它的），极力与孙文主义学会去合作，只见右派拒绝，却不见左派打倒它们。总之，社会革命时代无产阶级独裁制之可能与必要，正和国民革命时代革命派的独裁制之可能与必要是一样的，现时都有具体的事实证明。

中国最近几年来的国民革命运动，尤其是五卅运动，已经有很广大的发展，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所谓“民族精神”或“国家主义”，也就因此而发现出来，国民革命运动里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已经确有明显的表示。虽然戴季陶先生、上海孙文主义学会、邹鲁、周佛海派的国民党“中央”、《独立青年》派、《醒狮》派等相互之间互相矛盾，尤其是对于帝国主义及联合世界革命势力的问题上：季陶先生赞成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上海孙文主义学会只赞成和被压迫民族联合，可是还要促起帝国主义的崩溃；周佛海则反对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右派之中已经互相违背“党的纪律”；国家主义派更连帝国主义的名词也不肯用，他们内部也有冲突：孤军社（《独立青年》）和醒狮社共同署名答复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信，居然在《独立青年》杂志和《醒狮周报》上发表的互相不同，听说中间经过曾琦个人擅自地削改（这真是寡头政治）。然而这不过是聪明的和愚笨的、远见的和近视的、不愿受帝国主义利用的和宁愿受买办阶级指导的种种式子的资产阶级政见之冲突。他们比较有一共同的目标：消灭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破坏共产党的政治势力，以民族或国家的笼统名词欺蒙无产阶级，

以口头上的保护劳动社会政策诱惑无产阶级，使为己用而专擅国民革命的指导权。这种“指导”，像我们上面的分析，其势必定使国民革命失败或妥协：以反对阶级斗争而灭杀劳农、平民参加国民革命的势力，以反对联合各国革命势力而巩固帝国主义的国家。

共产党的政策和共产主义，正因此而不得不加劲发展，否则，共产党的失败，不仅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失败，而且同时也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失败。中国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只有和无产阶级携手共进，在无产阶级之政治领袖之下，结合革命的联合战线。中国现时正是格外需要共产主义之宣传，不但对于工人、农民，而且对于一般人民，甚至于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使他们知道人类历史的演进，最终的目的地必然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政策——从国民革命以至于社会革命的，不过是革命的，亦就是所谓“赤化”的政策罢了，并没有什么洪水猛兽似的可怕；使他们知道，世界以及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必然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的末日，中国国民革命和世界社会革命的胜利，不久便要临到；他们那所谓的顽蛮的抵抗，只能帮助帝国主义压迫自己，没有别的好结果。共产主义的发展在中国今日决不太早，只嫌太迟而太缓——以至于增加资产阶级许多愚妄、自欺、野蛮、残狠的、枉然的顽抗和梦想。

中国国民革命中的阶级分化虽然开始，然而因为中国的经济状况——使资产阶级知道别无出路，不能得到帝国主义的让步，使小资产阶级知道自己的犹豫畏怯只是造成帝国主义巩固其统治之机会与可能。这种分化的结果，只能使大多数革命青年和劳农阶级，在经验上更加确定自己的革命意志，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治指导；使小资产阶级等逐步觉悟，因而逐次巩固一般平民阶级的革命联合战线；只有极少数的反动“领袖”将来完全倒到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土豪的怀里去，变成明显的反革命党。

一九二六·一·二十九

从凡尔塞到洛迦诺

郑超麟

(一)

在这所谓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时期里，最近一年来国际政治上最重大的一件事，便是去年十月之英、法、德、比、意、波、捷的洛迦诺会议。洛迦诺会议不仅是最近一年国际政治上一件重大的事，而且也是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帝国主义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间关系的一大变化。凡尔塞会议下的国际关系，经过六年余国际经济政治之进展，遂潜移默化，而终于形成目今之洛迦诺会议下的国际关系。换一句话说，即现在的国际关系已经不是帝国主义战争告终、《凡尔塞和约》签字时的国际关系了。当帝国主义战争告终、《凡尔塞和约》签字之时，是战胜的国家英、法、意、日等宰割战败国家德、奥、土等的局面。当时，法国乘战胜之余威，俨然有支配全欧陆之势。如今，形势已经大变了——一方面，德国以平等资格与英、法、意诸国折冲尊俎之间，且加入国际联盟为一会员；他方面，法国财政日陷于破产地位，隐然隶属于美国的财政资本，而战中获利及战后发展的美国财政资本的势力又日加增长，英、美财政资本联合起来，造成经济上、政治上统治全资本主义世界的局面。洛迦诺会议结果便是这局面之事实的造成。

世界革命的进展是与帝国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变化息息相关的。从事于世界革命，决不能忽略了国际政治的研究。而当这所谓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时期中，各国既无直接的革命状况，则于此时研究帝国主义国家间相互的关系及其势力的消长，尤其是我们切实的责任。何况在洛迦诺会议这一重大事件下，我们尤应该明了其意义及其趋向。但这一会议乃是战后凡尔塞会议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势力消长之一新的形势，所以要明了这一会议的意义及其趋向，便非研究从凡尔塞会议以来，帝国主义国家间关系变化过程中几个大阶段及促成其变化的主要原动力不可。故我们应该从凡尔塞会议说起，再叙述洛迦诺会议的经过及其主要结果并说明其意义，然后对于现在的国际政治才能有正确的明了。

(二)

德国的改良派社会党人、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于洛迦诺会议闭幕之日，雀跃欢呼庆贺这次会议的成功，以为从此世界将没有战争，而人类的永久和平时期开始了。他们的报纸祝贺说：“旧的协约国消灭了，而被新的英、法、德的联合起来所代替。”事实上，绝不是这样。不错，协约国消灭了，但并非消灭于洛迦诺会议，而早于凡尔塞会议中便种下消灭之根。

到了凡尔塞会议，协约国存在之主要任务便已经尽过了。实际上，为什么有协约国的组织呢？协约国乃是英、法、俄等为扑灭德国帝国主义的一种结合。德国帝国主义已被扑灭之后，于是协约国的主要作用即便消失，这时所剩下来的任务只是怎样去分赃。凡尔塞会议就是协约国的分赃会议，而赃物份量之分配，则视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势力的比较如何。

当时，虽然靠着美国的出兵协约国才能战败德国，但德国失败之后，美国帝国主义的威势影响于凡尔塞会议的决定是很小的：美国的军事势力那时已失其作用，而当这共同作战刚得胜利之后，美国亦不便即刻以严厉的债主资格向“同盟者”讨账，如此，英、法等最近、将来受美国的物质帮助是靠得住的。所以，在凡尔塞会议上，我们只看见英国帝国主义和法国帝国主义的严重冲突。照《凡尔塞和约》的规定，亡国的波兰恢复起来，法国的疆界向东展长至莱茵河左岸。此时法国的军事势力统治欧洲的范围已大过于拿破仑最盛时期；因为波兰实际上已成了法国的附庸，而其邻近诸国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也就法国的轨范了。法国利用波兰和罗马尼亚对付苏维埃俄罗斯，利用南斯拉夫牵制意大利，同时又利用波兰和捷克斯拉夫胁迫德国履行《凡尔塞和约》。英国呢，它拒绝了和会中各国航海自由的要求，仍得保持其海上霸权，苏彝士运河、亚丁湾、新嘉坡岛等仍在其掌握之中；它在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权威是仍旧完好无缺的，它在太平洋也占很大的权力，它在大西洋的霸权也由许多舰队保持着；他在近东的势力也是增高了，土耳其、亚拉伯、美索不达美亚都增加了英国的势力，叙利亚虽然归于法国，但法国创痕未复，是不能利用叙利亚的战术地位以危害于苏彝士运河之运输的。总而言之，法国实际上建设了欧陆霸权的基础，而英国则分得近东和海上的霸权。但战争胜利品这样分配，并不能使一切强盗国家都能满意的，尤以对德问题为甚。英、法二国都把战败的德国看做是应得的赃物，但这二国的目的是不同的，因此所拟的办法便自然不同。

英国的主要目的是消灭德国的海上势力，减少德国的工业竞争力和铲除德国在殖民地的力量。法国的目的则在完全解除德国的武装，使德国万不能准备未来的复仇战

争。所以法国尽力去割据莱茵河流域诸省，规定莱茵河为德国西境的边界，而波兰的边界亦被规定，使波兰与德国日处于仇敌的状态。法国的福煦元帅且拟好了建立一莱茵缓冲国的计划：此缓冲国在法国帝国主义手中可以支配鲁尔区域，一旦有事又可在德国领土内作战。这样恰好是英国帝国主义所反对的，英国帝国主义极力反对福煦元帅的计划，而其反对的理由则借口于“和平主义”。此种论调得着威尔逊主张和疲倦的舆论之同情，以为这样的割据，将引起几百万德国人的愤怒，而种下新战争之根。我们明白英国反对福煦元帅的计划绝不是为什么和平主义，我们看见英国并不抗议法国割据亚尔撒斯劳兰，也不抗议法国兼并沙尔煤炭区域，就可以知道了。英国只是反对莱茵归于法国之后，德国将完全受法国所支配，如此，则法国获得全欧的霸权，占有巨大财富的经济，将危害于英国本身的安全。

在凡尔塞会议席上，英国和法国这样斗争的形势，结果并未曾得着完满的解决。克列孟梭虽然经英、美的压迫，不得不放弃福煦元帅的计划，但他要求与英、美订一《保安条约》，迫英、美于未来德国反攻时以武装帮助法国。他又声明：如果德国不履行《凡尔塞和约》的规定，则法国保留有实行福煦元帅计划的权利。

以上便是凡尔塞会议时，协约国中最重要的二个国家——英、法——之间的关系，其他诸国间的冲突，则我们可以用不着说了。

自此以后直至现在，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已起了几次的变化。《凡尔塞和约》，即是说战争告终时国际关系之反映，已经不适应于和会后的国际关系了。《凡尔塞和约》即开始入于“取消”的过程。而每次国际关系的变化，亦即适应于取消凡尔塞和约之过程的一个阶段。从凡尔塞到洛迦诺，国际关系变化有几个主要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乃是美国干涉欧洲政治和法国的财政危机，而每次国际关系的变化又各以对德问题为其枢纽。

从凡尔塞到洛迦诺，国际关系的变化大约可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一）从凡尔塞会议（一九一九年）到鲁尔之占据（一九二三年），（二）从鲁尔之占据到伦敦会议的《道威斯计划》（一九二四年），（三）从《道威斯计划》到洛迦诺会议（一九二五年）。

第一期国际关系变化的枢纽是赔偿问题。协约国没收了德国舰队及其在外国投资的全部，取去了百分之八十三的铁和百分之十五的农产品，此外又加以繁重的经济负担。在凡尔塞会议时已经决定德国须赔偿法、比战时的损失并出金赡养战中的残废者，但那时尚未决定德国须赔偿若干数目。到了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法国才宣布德国须赔偿总数二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马克。设估计法国全国一切财富的总和为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马克，则所拟德国赔偿的总数恰将与法国全国财富相等，于此可见帝国主义之惨无人道的残酷，欲陷战败国家于万劫不得翻身的地步

了。最后，一九二一年五月协约国伦敦会议才正式决定德国须赔偿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马克，但此数目，德国仍是无能力拿出来的。其结果，这样的赔偿问题，自然永无解决的一日。此决议出来之后不数月，德国即凑出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马克为赔偿费，但即刻德国马克便开始跌价，而德国经济便开始破产。德国经济之破产不仅影响德国本身，而且影响到向它索取赔偿的协约国。最初感觉德国经济破产影响的便是英国。当一九二二年一月协约国在开痕开会时，路易·乔治即指明德国是英国最重要的商品购买者之一，英国是不容德国破产的；德国破产，全世界经济都要受极大打击。法国对于国外贸易关系较英国为轻，因法国自己有多量的农产品及原料，而法国所注意的乃在领土安全的保证。英国愿意保证法国领土安全至十年为期，但须法国宣布愿意修改《凡尔塞和约》的经济决议。路易·乔治这种提议在开痕被法国拒绝了。但于此可见凡尔塞会议之后，英、法利害的冲突更趋紧张。然而他方面，法国虽然拒绝英国的提议，但德国仍然不能按期如数交出应付的赔偿费，于是结果法国出兵占据德国之最富的产业区——鲁尔。在这时期中，《凡尔塞和约》的签字者居然自己提出修改和约的主张，而法国亦曲解和约之规定，竟然进兵占据德国的土地了。《凡尔塞和约》的取消遂经过其第一时期的过程。

第二时期，国际关系变化的枢纽是恢复德国破产之经济的问题。鲁尔占据前后，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为英、法冲突最高的时期。法国占据了鲁尔，实际上既损耗了许多国币而一无所得，而德国方面的经济愈陷于破产！马克价格为空前的跌落，造成一般人民的贫困，结果发生一九二三年十月震动全世界之德国无产阶级革命风潮。虽因国外资产阶级的协助及国内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未能成功，然而此次风潮已给鲁尔的占据者法国帝国主义以严重考虑其政策的机会。同时，法国内部突发财政恐慌，不得不求助于美国的财政资本。有二种动力：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恐吓和法国内部的财政恐慌，所以法国占据鲁尔之后许久，不仅不能实行福煦元帅的计划，并且把赔偿问题的解决权让给了美国的财政资本。道威斯计划便从此实行起来。

美国聚集了全世界现金之过半数于纽约银行的钱库之内，它有多量的资本投放于欧洲（据一九二二年的统计，协约国欠美国的债务共有一〇·一五〇·三〇〇·〇〇〇美金的资本和一·一七二·二〇〇·〇〇〇美金的利息；现在自然更多，不待说了），他又有多量自由资本必须输出国外。为保证其已输出的资本之安全计，为输出其国内的资本计，美国都非维持欧洲的安全、和平不可。而德国恰是最好的投资处，又是最受无产阶级革命恐吓的国家，所以美国于一九二三年复带了确定的经济纲领重新出现于欧洲的政治舞台，干涉协约国对德的政策，即是说以财政政策制服疯狂的法

国帝国主义，使之交出赔偿问题的解决权于美国的财政资本。法国在伦敦会议接受了专家委员会的计划，于是美国财政资本便支配了欧洲特别是德、法二国了。在这时期中，《凡尔塞和约》之为英、法共同行动的作用，到此已经消失了。剥削榨取德国之权，实际上已属于美国的财政资本。《凡尔塞和约》的取消遂经过其第二时期的过程。

(三)

如今，从道威斯计划到洛迦诺会议，《凡尔塞和约》之取消遂经过其第三时期的过程。

在这时期中，国际关系已非昔日《凡尔塞和约》初签订时的国际关系了。法国帝国主义咄咄迫人的气焰已折服于美国的财政资本之前。旧时虎视欧陆霸权的法国帝国主义，现在竟然真实提出自己的安全问题，深深感觉自己孤立的危险了。《保安条约》谈判遂从此开始。《保安条约》谈判时期的枢纽就是得势的美国财政资本与英国联合怎样去支配那经济恢复后的德国政治势力之问题。我们只要研究《保安条约》谈判的历史，便可以明了这个局势。

《保安条约》谈判的起源，远在一九二四年。当道威斯计划实施以后，美国财政资本既然得势，法国帝国主义已不能视战败的德国为自己的战利品，由自己意志去宰割，于是便发生孤立危险的感觉。当时赫里欧欲乘英国工党政府在权机会，根据日内瓦的和平议定书与英国缔结一纯然利于法国的《保安条约》。不幸，此条约正在进行中，工党政府便已下台，继起的保守党政府竟拒绝通过日内瓦的议定书，而另进行英、法、德三国的《保安条约》之谈判，怂恿德国提出《保安条约》问题。这谈判的结果便是洛迦诺会议。

所以在外交记录上，《保安条约》谈判之开始只能算在一九二五年一月的下旬，当德国提出《保安条约》的第一个计划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二件事是与《保安条约》谈判之动机有密切关系的。第一件事是协约国，以德国不能履行解除军备之约定为借口，拒绝撤退《凡尔塞和约》规定之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应撤退的柯罗尼区域的驻军。第二件事是法、德商约谈判此时更陷于停顿状态。法、德商约谈判开始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在商业政治自由的基础上进行，这种自由，依《凡尔塞和约》的规定，也是德国应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取得的。这二件事固然不能便看做是德国提出《保安条约》问题的根本动机，但与此问题确有密切的关系。

《保安条约》谈判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从这谈判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其内容经过了四次的变化。

最初是法国的草案。法国本只欲签订一英、法、比三国的《保安条约》，保证德、

法和德、比边界的安全，即一旦德国侵犯了法、比二国的边界，英国应该立刻以武力帮助法、比二国。这样规定，英国便突然加重了军事政治的责任，而英国的外交亦为此条约所束缚，无其他活动的余地了。他方面，法国财政的地位日趋恶劣，不能以偿还英国债务为拉拢英国的交换品，而且此种条约亦不利于英国的殖民地，引起了议会的反对。所以法国的草案不能取得英国之赞同，终至于搁浅。

其次是德国的提议。可以说是英、德的提议，因为有驻德英使亚伯伦爵士的活动，才有一九二五年一月德国的保安条约谈判之请求，即使不是英国指使，至少也是经过英国同意的。德国的提议之要点有二：一、保证莱茵流域现在的边界，各关系国要共同负起这种保证的责任；二、签约国家应根据《凡尔塞和约》第四十二条和四十三条，保证莱茵流域撤兵的执行。德国的草案显然包含三种意义：一、双方保证莱茵流域的边界，德国自然也参加在内；二、撤退莱茵河边界驻军，因此法国便不能再利用这区域为对德的军事压迫；三、德国提起了波兰和捷克斯拉夫二国。德国欲与其邻国各订立一仲裁条约。当时德国并无一字提及国际联盟及其与此仲裁条约的关系，仅仅在几个月之后，才开始谈起国际联盟。德国一月的提议经过英国政府考虑之后，才于三月四日由驻各国德国公使正式提交伦敦、巴黎、不律塞尔的政府。

再其次是英、法意见交换后的英、法协议。接到德国正式提案后，法、德政府的答案去德国的主张尚远。三月至六月之间，英、法二国交换意见，其中心大致是底下的三个问题：一、撤退柯罗尼驻军及与此有关之解除德国武装问题；二、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及其加入的条件问题；三、保安条约本身的形式和内容问题。对这三个问题，英、法的观点相差甚远，到了六月初旬，才有一新的转机。六月十日英国首相鲍德温即在议会宣言，英、法对这问题的意见已经一致了，且说意大利和比利时也同意。这个一致的意见由哈华士通信社发表出来，大意是：德国西境经《凡尔塞和约》规定的边界，若被德国侵犯时，英国将以其一切陆、海、空军事势力帮助法、比二国；说到德国东境边界，则英国仍声明遵守《凡尔塞和约》的决议，波兰和捷克斯拉夫有国际联盟为之保护；法国的东方同盟国一波捷一若受侵犯，则法国有权利用不驻兵的莱茵区域为军事行动地，以援助其同盟国；德国实行加入国际联盟，仅仅在适合于上述条件之《保安条约》经过德国签字之后。

六月十六日，法国政府又将协约国这种一致的意见做一通牒答复德国。这通牒共分七部分：大意第一部分声明要实现《保安条约》非德国按照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三日规定之条件加入国际联盟不可；第二部分声明任何条约都不能改变或修正《凡尔塞和约》的规定；第三部分声明法国以为无重申《凡尔塞和约》所规定的责任之价值；第四部分声明德国与法、比二国各须立一仲裁条约，此条约又须经英国的保证；第五部

分声明德国须与波兰和捷克斯拉夫各立一仲裁条约（但未声明须经英国保证，因英、法交换意见中，英国不肯允许法国此种要求）；第六部分声明任何条约都不能妨害国际联盟会员的权利和义务；第七部分声明一切条约同时发生效力，且附言如果美国愿意参加签订此条约，则法国必竭诚欢迎之。此通牒与德国意见尚未接近，故又经变化，才得成功召集洛迦诺会议。

最后是洛迦诺会议召集前共同的意见。法国六月十六日给德国的通牒，即根据协约国一致的意见做成的，但此所谓一致的意见，其中实包含许多笼统不明之点，以致引起英、法、德各国报纸各不相同甚至极端相反的解释。最明显的例，我们可以举德国东境边界的问题。我们知道英国显然拒绝法国请求对于波、捷二国边界的保证。假设德国不遵守《仲裁条约》，因而与波兰或与捷克斯拉夫作战，那时将怎样办呢？那时英国只能以一简单的国际联盟会员的资格予以帮助，而不能如对法、比被侵犯时的帮助；法国则能利用不驻军之莱茵区域为军事行动地，以援助波兰或捷克斯拉夫。这里便是最笼统不明之一点。究竟法国能完全自由利用这区域吗？抑或仍在国际联盟条约限制之下？关于这一点，各关系国报纸的解释各不相同。法国报纸自然说这个权利是绝对的；英国报纸则承认法国这种权利是有限制的；而德国报纸则竭力引证英国要人的言论，来证明法国并没有出兵经过德境的权利。从这一点可以看见，所谓协约国一致的意见之下，各国的意见尚未曾接近的。所以德国政府接到法国的通牒之后，于七月二十日作成一复文，由驻法德使递交法国政府。这复文的大意说：德国相信《保安条约》成立之后，《凡尔塞和约》关于军事占领问题之条款，必将有变更；协约国劝德国与邻邦结《仲裁条约》，但究竟德国是否应负扰乱和平的责任呢？至于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一事，这本是德国所愿意的，但《国际联盟会章》第十六条之规定对于德国甚为不利，必须修改后，德国才有加入之可能。德国此种复文送达之后，已经“一致”的英、法意见又起“分歧”。最重要的二点：一、假使德国侵犯莱茵区域的边界时，法国主张立即采取军事行动，而英国则主张先提出于国际联盟，为和平的解决；二、法国欲德国与波、捷二国各立《仲裁条约》，而自己隐然为其保证人，此点为德国所反对，而英国亦站在德国的一边。因此分歧，白里安乃于八月十日亲至伦敦与张伯伦谈判，结果双方都有让步，遂构成英、法之协议，此协议成，法国再做一通牒答复德国。这通牒最后且声言，法国和协约国政府一致希望，根据此通牒所定原则，与德国政府为直接的会商，来签订《保安条约》。同时，法国并发邀请书致德国外交总长斯特莱斯曼，请其参加《保安条约》会议。从此，有名的洛迦诺会议便开幕了。

(四)

洛迦诺会议先后经过共十二日，自一九二五年十月五日起至十六日止。参加会议

之代表，为英国之张伯伦，法国之白里安，比利时之王德威尔，德国之路德博士和斯特莱斯曼，意大利之墨索里尼，波兰之斯根斯基，捷克斯拉夫之俾尼斯。会议结果，成立的条约，除严守秘密至今尚未为局外人知道之外，其已正式公布的条约有八：（一）议定书；（二）英、法、德、比、意五国总约；（三）德、比《仲裁条约》；（四）德、法《仲裁条约》；（五）德、波《仲裁条约》；（六）德、捷《仲裁条约》；（七）《法波条约》；（八）《法捷条约》。这些条约缔结之后，到了十二月一日才在伦敦由各国代表正式签字。这些条约系根据九月二日伦敦各国法律专家会议所拟就之草约为基础的，专家会议之草约又是根据于最后之英法协议。这些条约的重要内容可分成几点来说。关于西境的，英、意二国为德国与法、比二国间条约的保证人，如果德国侵犯法、比二国，则英、意帮助法、比，如果法、比二国侵犯德国，则英、意帮助德国。此种规定已非法国的初意，因法国原只欲英国为法、比的同盟者，如今则一旦有事，英国会变成德国的同盟者攻击法、比二国之可能。关于东境方面，则英国不愿为《德波条约》与《德捷条约》的保证人，而一旦有事，法国亦不能不问国际之决定而自由行动。至关于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则是无条件的，即是说《国际联盟会章》第十六条不能因德国要求而加修改（按：这条会章言明，国际联盟会员若被侵犯时，则其他会员须供给相当军备，并允许其他会员军队通过其国境以援救此被侵犯的国家，德国曾经以自己系解除武装之国，不能适用此规定为理由而请求修改此条会章，以为加入国际联盟之条件）。

结束一年来《保安条约》谈判之洛迦诺会议签订的这些条约，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首先应该研究促成各国签订这些条约之根本的动力，然后我们才能明了其真正的意义。这就是说，我们应该研究洛迦诺会议开幕之际，国际势力之比较和签约各国之状况及其当前的问题。

洛迦诺会议开幕之际的国际关系已经不是凡尔塞会议的国际关系了，而且也不是《道威斯计划》时的国际关系了。上面已经说过，美国帝国主义的势力在凡尔塞会议时影响于和会决议是很少的；当时苏维埃共和国正处在内乱、饥荒、岌岌可危的状态，不能影响于这些强盗国家分赃的决议；当时殖民地民族正沉迷于资产阶级德漠克拉西的幻想和威尔逊的所谓“民族自决”口号，尚无积极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和明确的民族革命思想。现在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首先，我们看见美国帝国主义的势力日益增长，到如今变成了全资本主义国家的唯一的主人翁、强有力者。先从经济方面来说。现在的世界经济状况之一特征，便是流动资本之缺乏。欧洲固定资本在战时的损失，到了战后，则以强烈集中生产为弥缝，所以战后生产机关的生产力高出于战前，但除开美国之外，全世界都缺乏流动资本。

战后，世界的流动资本遂为美国一国所垄断。美国有这地位，所以握得全世界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优先权。即以战时损失最少的英国而论，英国禁止借款给外国；其他各国则群向美国资本家借款。美国遂成为各国财政总长、银行经理、托辣斯主人等的朝拜圣地。纽约银行库中聚集了全世界过半数的金子，美国资本渴欲输出其剩余资本于外国，一方面既可减轻国内的资本膨胀病，他方面又可增加各国的购买力，以提高本国的工业。所以美国在经济上独步一世，无一别个国家能够与之竞争的。美国政治上的势力自然便因此增长起来，因为各国财政上既须仰美国的鼻息，政治上自然不能不唯美国之马首是瞻了。即以英国来说，英国在工业上、商业上、信托上都受美国竞争的打击，即在海上霸权方面，几世纪独霸海上的英国，到了华盛顿会议时就不得不依“五·五·三”的规定，与美国处同等地位。最近，英国的殖民地尤将渐次受美国势力所支配——其他各国附属于美国的地位也就可推想而知了。美国帝国主义势力的增长便是《洛迦诺条约》之一大原动力。美国因为已经有多量的资本投放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而且将输出更多的资本到欧洲来，因为要保障这些资本的安全，自然非欧洲“安全”不可，所以便促成这一《保安条约》的成立。

其次，我们看见苏维埃共和国势力的增长为世界革命运动之中心及殖民地民族运动之崛起，有明确的民族自觉，危害于帝国主义统治，特别是危害于大英帝国。凡尔塞会议之后二年，苏俄逐渐铲平了内乱、饥荒，新经济政策之实施，使苏俄经济恢复起来，因而外交上着着取得胜利，除美国外，取得世界各国正式承认。现在，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的居民，居住占世界六分之一土地，而又有丰富的天产品，这样的苏俄在世界上的重要，是不弱于美国的；加以各国无产阶级的赞助和殖民地民族的同情，苏俄的政治势力自然为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畏惧的。特别以英国帝国主义为甚。大英帝国的基础建筑在其殖民地上面，受苏俄影响而勃发的殖民地民族运动，如最近中国之五卅运动，便首先危害于大英帝国。苏俄及殖民地民族运动势力的增长，又是《洛迦诺条约》之一大原动力。为要扑灭苏俄势力及镇压殖民地民族运动，帝国主义自然先要注意内部的“安全”，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要调解德、法等国中间的冲突以一致对俄，所以便促成这一《保安条约》的成立。

此外，协约国内部及其与德国等的关系也有很大的更变了。

英国的经济基础，因美国势力的增长和殖民地民族运动的勃兴，已经动摇起来。潜水艇和航空队的发展，使英国的海上势力减少了意义。为要保持其在国际上的势力，英国知道是无能与美国竞争的，所以只好与美国妥协而一心一意向苏俄进攻，并与法国争欧陆的霸权。这次洛迦诺会议，可以说是英国发动的。英国进行《保安条约》有三个主要的目的：第一，可以打断了德国重工业与法国妥协的倾向；第二，可以离间

德、俄的关系，利用德国为反苏俄的一个工具；第三，可以削弱法国的势力。

法国财政日益破产，不仅使福煦元帅的计划没有实现的可能，而且使法国经济政治生活都受美国财政资本所支配。《道威斯计划》之实施已经是法国对美国财政资本之投降行为，德国经济救活后，尤使法国感觉自己在欧陆的孤立地位，所以急欲取得英国对莱茵边境之保证。此种愿望，法国从凡尔塞会议起就已经有了，财政破产愈速，则实现此愿望亦愈迫切；但法国同时亦愿其东方同盟国波兰和捷克斯拉夫边境也得有同样的保证，所以其最初提出之计划便极注意于东境的问题。

德国怎样呢？德国原来的外交政策是利用英国和法国的冲突，而从中取利。法国单独占据鲁尔分明是英、法冲突之反映；当时驻德英使亚伯伦爵士即示意于古诺，谓：如果法国占据鲁尔，则英国可以帮助德国。结果，英国因为分明看见法国占据鲁尔必不会得着多大利益，就放任法国做去，只由克尔松口头上的攻击法国，而不实行帮助德国。随后，鲁尔冒险失败，法国无所得，反加紧财政的恐慌，终致屈服于美国财政资本。此时，苏俄的国际地位已经增高，英、俄利益冲突日益明显，苏俄外交上占一重要位置。所以德国的外交政策开始更变。即由利用英、法冲突的政策，改变为利用英、俄冲突的政策。德国一方面求英国为其西境边界的保证者，他方面又自以为列强反苏联的工具之资格向英国示好，希望交换得一点好处，所以加入国际联盟，表示不再与苏俄接近合作。德国希望英、美的帮助是很急迫的。《道威斯计划》实施之后，德国的经济完全须仰给美国财政资本的维持。当马克跌价时，工业的设施机器的购置都是趁便宜咄嗟立办的，所以不适合于任何计划，因此这时的资本要求更加迫切。资本既难于借得，一部分工厂遂破产了，譬如著名的司丁纳公司之破产便是一例。所以此时要改造那马克跌价间混乱了的工业组织，非借外资不可，而外资又必须向英、美想法。有这需要，所以德国才决然签订了《保安条约》。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明了洛迦诺会议的根本意义了。无论《洛迦诺条约》中怎样郑重声明不妨害《凡尔塞和约》，但实际上，《凡尔塞和约》到此又经过其“取消”之一过程。现在已经不是协约国自由支配莱茵区域的边界，而是英、法、德三国共同处理的形式了。《凡尔塞和约》之为英法胜利这一点完全消失。

《洛迦诺条约》的意义归结起来有底下重要的五点：

（一）美国财政资本的胜利。美国虽然未曾参加此会议，但此会议背后有美国的指挥，这是明眼人所能看得到的。美国向来不屑参加欧洲的会议，一切会议，只派一个“观察者”去“观察”便够了。此次洛迦诺会议也是这样。我们说过美国极需要欧洲的“安全”，以保障其在欧投资的安全。现在这种“安全”果然得到了，即是说美国的计划实现了，美国得着胜利了。

(二) 英国联合资本主义国家进攻苏俄之企图。苏俄存在，资本主义世界根本即起了危险，尤以英国帝国主义直接受此危险之恐吓。一九二五年夏天英国几乎与苏俄绝交，几乎向苏俄宣战，所以不能实现之故，乃因英国尚不能联合起资本主义国家向苏俄进攻。现在这种局势勉强造成了。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即表明一旦战事发生，德国至少要遵守第十六条会章，假道于英、法等国，运兵向苏俄进攻。

(三) 德国失去了独立的地位。德国经过《道威斯计划》实施后，经济上的独立已经消失。到了现在加入国际联盟以后，因为《会章》第十六条的规定，一旦有事德国须允许别国军队通过其国境，实际上即成了英国进攻苏俄的工具，实际上政治上的独立也就消失了，完全成了国际联盟的附庸，即完全成了英国的附庸。

(四) 法国的活动受限制。法国现在是欧洲军事上最强有力的国家，在这一点英国是不能与之竞争的，只好从财政上制服之。为这缘故，英国虽然在世界范围上与美国冲突甚烈，然对于欧洲政治则与美国妥协，借美国财政资本势力制服法国。法国迫得签订了《洛迦诺条约》。从此，法国对德的军事行动没有从前那样自由，法、波和法、捷的同盟也失却了一部分的意义。

(五) 协约国解散了。社会民主党报纸高呼“旧协约国解体了！”这是不错的。协约国成立之主要任务本在扑灭德国帝国主义。战后德国帝国主义已经扑灭了，那时则只剩下分赃问题。现在战败国的德国既然加入了《凡尔塞条约》所产生的国际联盟，与战胜国的英、法等分庭抗礼，于是协约国连分赃的任务也没有了，边境问题，德国也有了参加解决的权利。从此协约国实际上便不存在了。英国脱离了协约国的束缚之后，因为在国际联盟中取得了独裁的地位，又因为当了欧洲政治和美国资本的中间人，遂成了唯一的欧洲霸王。欧洲所需要的是流动资本，美国则有剩余的资本，但美国输出资本于欧洲，向来大半是经过英国政府银行家之手的。所谓英、美资本的联合只是这个意义。

(五)

以上便是洛迦诺会议之重要的意义。此会议自然还有其他的意义。譬如帝国主义的外交议定一致地准备压迫各国的共产党人，准备向殖民地民族进攻。我们不要忘记，除正式公布之外，洛迦诺会议席上各国还签订了许多秘密条约未曾公布。犹忆中国五卅运动初起时，法国报纸则向英国做一买卖，声明如果英国帮助法国在莱茵区域的行动，则法国可放任英国在中国的行动。由这一点，我们更可明了洛迦诺会议尚不止上述之重要意义了。

帝国主义的“舆论”和社会民主党的舆论，都把洛迦诺会议看做是和平主义之胜

利，仿佛以为从此不会有战争了。这些完全是自欺又欺骗民众的话。我们从国际关系变迁的概况和洛迦诺会议时各国的情形以及所订条约的内容分析看来，很明显看出，此次会议只是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不可调解之矛盾的新的处理，同时又是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之新的准备，创立反苏俄的帝国主义联合的一种企图。这不但是我们观察的结论，而且一部分资产阶级和新闻记者也是这样说了。英国一家有名的杂志，而且和外交界素有往来的——*Bound Table*——就是代表这个意见。我们现在即引用这杂志的一段话以为本文的结束：

我们不应该相信，以为借助于新的保安条约便可在欧洲建立一长时期的均势。无论任何外交公文，任何议定书，任何保安条约，都不能变更本就摇动的事物为一件稳固的事物。有许多复杂的常变的欧洲问题已经变成了危险问题，在最近的将来能够引导我们到暴烈的冲突。

一九二六·二·二十八

重要参考材料

La Liquidation de la Paix de Versailles——Radek.

La Pacte de Garantie——Radek.

Les pourparlers de la Pacte de Garantie——Steine.

La conferance de Locano——Varga.

Le mouvement ouvrier et la Situation Internationale——Zinoviev.

Quelques Editoriales de "Pravda".

《国闻周报》第三卷第三期《保安条约》的译文。

《东方杂志》第二十二卷第二十三号《欧洲保安条约与洛迦诺会议》——幼雄。

《向导周报》第一百三十八期《洛迦诺会议与反对苏联的帝国主义联合》——超麟。

印度民族革命运动与工人阶级的奋斗

梳罗达古

印度与中国表面上的差异，只是印度没有形式的独立政治，它是最凶残的英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所以英国资产阶级对付印度是任意处置的！

印度全国的铁路、印度土地里的财富（石油、煤、金及一切矿产）多在英国人的手里；此外，英国人又占有很重要的一种生产——橡皮业。印度国家机关里一切重要位置，也均是英国人充当，这班人，自然是消用印度国税的大人物！且因为不相信本地人（印度人）的军队，肯真心保护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所以又在印度，用印度人民的血汗，豢养大队纯粹的英国兵，以备对付印度人民！

印度预算中最大的收入，自然要算赋田，仅此一项，每年可从印度农民征收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元（印度币）之巨款。印度农民生活的困苦，除了中国的农民以外，很难比较！当印度人民起来要求独立时，英国帝国主义者就这样回答：“你们看！独立的中国现在怎样？那边不是经常的内乱么？那边不是农民离开耕地，工人离开工厂，把整千整万的生命牺牲吗？但你们印度人，在我们保护之下，能够过很平安的生活，在很和平的世界做事情！”

事实如此么？不，决不！印度现在虽没有像中国的内乱，而大多数的印度农民，时常受饥荒的苦痛，饥荒是印度农村“不速之客”！仅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一次饥荒，及因此发生的时疫，一共死亡一千一百万人！农民的困苦，就可想见！

可是，这一些常受饥荒的印度农民，就是向英国帝国主义缴大批租税的穷汉！

印度资产阶级的的发展

印度重要工业虽为英人所占，但也有很重要的纺织生产，大战前（一九一四年）已经是本地资本（印度）占优胜！当大战正厉害时，英国忙于西欧战场，对于东方商业竞争不免松懈，遂使东方各国（日本、中国、印度等）乘此时机，大力发展本国工业。大战前，日本货运往印度者只占英货4%，及至大战将终时，增至22%；印度资本

家，亦乘英国为难之时，努力发展印度的工业，如此纺织厂的增加，皮厂、化学工业、玻璃厂、棉、纸等企业迅速扩大或新为建设！又有名的印度钢铁厂“德大”（Ta Ta Co）也在大战中大为增扩，它现在不仅在印度工业中起很大的作用，并能制造生产品，输出国外。此时印度工业的猛进，便得到了一个稳固的基础，后来大战虽停，而工业则尚自往前发展，印度工业既如此发展，于是亦发展了并强固了新兴的印度资产阶级。

民族独立斗争

印度资产阶级在经济方面，既如此发展，其作用骤然增大，然而他在政治上，仍是毫无权力，经济力与政治力，两相比较，未免相差太远！印度资产阶级既无权力参加国家管理，复不能向外来商品征收高税，以保障本国产业的发展，更不能减少印度预算中的大漏卮——巨大军费，只好瞪目看着英国官吏，每年在印度剥削大款，无归还地运往英国！

印度资产阶级，当大战时，一方面大为发展本国工业，一方面亦曾实力帮助英国战事，及战争终了，也便宣示自己的要求！他要求有本国的统治权，他要求印度自治、民族政府、责任内阁等，而为实现这些要求起见，印度资产阶级初时曾用温和的方法，譬如向英国国会请愿，引起英国社会舆论注意，在印度知识阶级中宣传——这些方法，是印度资产阶级欲得印度独立的唯一门径。惟印度革命的知识阶级，他们的经济地位比资产阶级低得多，所以他们关于争独立的要求和奋斗的方法，就比较地决断，他们即提出印度须完全独立，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他们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在奋斗过程中，甚至不惜用恐怖手段（如暗杀）以对付最反动的英国官吏，一九一五年扁哈林区剧烈的恐怖行为，就是一例！

帝国主义的英国眼看着印度革命潮流已遍及全印，于是便用其压迫殖民地惯用的缓兵计，宣言大战后许印度自治！及大战终了，英国遂不顾前言，只钦赐印度一点可怜的改良，以代替印度自治！

失望的印度资产阶级，于是始渐帮助民族革命运动，而参加民族革命的战线！但印度民族运动，至大战将完时，已不仅只限于印度上层人物，大多数的工农群众，已加入这个战线，而为民族战争中的生力军了。至于工农所以积极参加革命的原因，不仅上述的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饥荒大有影响，尤以大战本身所起的影响为大！因为战争一起，工人生活逐年变坏，使农民担负高度租税，强迫他们去当兵；城市工人的工资降至很低，而物价则十分昂贵——凡此种种，均是催促印度人民群众革命化的动力！

领导印度民族革命运动的印度“国民大会”在一九一九年以前英人讥为“徒说”而已！及既有上述许多事实，逼着印度各阶级人民革命化，所以一九一九年的“国民大会”便受了影响，大变党纲，而很紧张地走往革命道中去！这次大会，居然宣布抵

制英货、商船、学校及英人钦赐而毫无实力的国会！

大会宣言，农民不要向政府缴租税；工人、手工业者、商人等，则宣布全体罢市、罢工！于是革命潮流弥漫全国，并逐日增高！

但是，印度本国的剥削者，对于印度工农，也未见得比英国资本家好些！印度工人，既为改良自己生活，已积极参加全国紧张的民族革命战阵中；同时，农人自然也不愿意偿付掠夺的地租，给本国的地主；工人也要求不仅在英厂中的工人要加工资，即在本国资本家的工厂中的工人，也须增加工资！总之，彼时印度的国民运动，差不多与中国五卅相仿，含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及本国劳、资两方的阶级斗争的两重意义，于是站在“国民会议”方面的印度资产阶级，大起恐慌，震怒地说：“工人罢工，是反对英人，怎敢无礼反对本国工厂主起来！！”于是怕着民族革命运动之增长，印度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战争中，便实行怠工了。

印度“国民大会”，受了资产阶级的打击，即放弃革命的党纲。一般革命群众，既被欺骗，又失首领，且无斗争的计划，自然易趋散漫，而为英军警所压迫！于是整千整万的奋斗者，被拘捕、放逐、残杀……而最反动、最凶残的黑暗时期，便继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紧张的革命高潮后而起！这个时期，一直继续迄今！

印度的工人

自从经过这次革命怒潮后，印度资产阶级便渐渐放弃一切革命口实，揭开从前种种假革命的面目，而“我行我素”！现在印度最有力的资产阶级政党，要算斯槐顿特派，但它是挂上革命招牌，而实际是愿意与英人妥协的！不过现在印度无紧张的革命运动，斯槐顿特党尚有几分对抗英人统治；将来革命紧张时，此党也许卷入革命旋涡中，但是印度资产阶级始终已失掉革命中指导的地位，则可断言！此指导的责任必归新兴的最有力的阶级，即印度无产阶级，现在他虽比较地无组织、比较地落后，但他在过去的许多奋斗中，已经表明印度各社会阶级中，只有他能实行奋斗，只有他能奋斗到底！根据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二年所经过的忠勇的种种奋斗，更可明显！又比如去年北贝纺织工人罢工，人数达一五〇·〇〇〇（其中三〇·〇〇〇女工），既无预备金，又未得西欧无产阶级互助，能维持四月之久，不愿与印度工厂主减工资的提议妥协，其奋斗之忠勇，概可想见！

最近几月内，北贝工人又因为新减工资而罢工，尤证明印度无产阶级的奋斗精神，他能继续不断地奋斗！至于印度资产阶级，则适得其反，他们现在正努力向印度无产阶级进攻！这种情形，与中国目下情形，有许多相像处，尤以上海为甚，所以工人阶级的敌人，是不分国界的。吾人谨祝北贝工人的胜利，亦犹印度工人，庆祝中国五卅胜利一样！

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

布哈林 著 郑超麟 译

(一) 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任何学说一样，与任何理论的结构一样——无论在纯粹理论的范围或在实用理论的范围——均是一种活体，发展而变化。马克思主义在变化中，其数量方面的变化能够过渡到质量方面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与任何学说一样，能够于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起变性的现象；马克思主义并非处于同一的状态而不变的。我以为现在，在我们这个时期，十分明显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在其历史发展上经过了三大阶段。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上这三阶段，恰适应于工人运动史的三大段落，而工人运动史的三段落又联系于总的人类社会发展，首先是欧洲社会发展的三大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是科学的共产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历史地形成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背景绝不是欧洲发展之有机的和平的时期，这是欧洲经过无数震动的时代——其最明显的表示就是一八四八年的革命。

理论结构的主要材料，即社会方面替革命的学理装上了火药，乃是欧洲发展的条件及其突变的性质。发生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给了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学说，以十分奇特的面貌，在新生的马克思主义之逻辑的构成上面，印了一个印象。我们十分明显能够找得那替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装上革命火药的一些根本的线索：首先是联合抽象理论之伟大势力于革命的实际。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其最高的抽象理论上，在其《论费尔巴赫的纲要》上，即提出底下的几句话，为其哲学的基础：“以前的哲学家解释宇宙，我们应该改造宇宙。”自然可以明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中，这种实际的现实的倾向是有其社会背景的。而且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也明确表现出破坏性，这个理论本质，从思想结构的最高层直至其实际政治的结论，都是异常革命的。无论在纯粹理论的范围或在实用理论的范围，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内容都是异常革命的。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这一问题，马克思答复说，他的学说不在阶级斗争论，因为阶级斗争论前人已经知道了，他的学说乃在看出社会发展必然要达到无产阶级专政。通常关于马克

思主义的一断语，说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代数，拿来对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说是十分对的。这是一架神奇的机器，用来做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最有效的一种工具，无论在其理论方面或在其实政治结论方面，都是很有用的。

(二)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以上便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上的第一形态，其第一个历史的面貌。但我们明显知道，往后便开始第二时代和别一种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种马克思主义可以称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过渡，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过渡到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自然不是突变的。这是进化的过程，而工人运动思想上的这种进化有其根源，有欧洲资本主义及世界资本主义所经过的进化为其基础。首先是欧洲资本主义。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后，来了资本主义制度相当的稳定，开始资本主义有机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最明显的矛盾点便移往殖民地。在那正在增长的大工业的根基上，我们看见生产力有机增长的过程，连着工人阶级的相当的繁盛。在这社会经济基础上，我们看见与此相应的政治建筑物：巩固的民族国家——“祖国”。资产阶级的政策开始了，特别表现在过去世纪之八十年代以后。在工人阶级生活程度提高和“工人贵族”的分出及其迅速发展之基础上，发现了在总的资本主义机体系统中，由内心的思想上蜕化的工人组织，以渐进、进步的方式长大起来。此进步之主要的反映、其最合理的反映，乃在资本的政治头脑，即在统治的资产阶级之政权。这种过程便成了工人运动中流行思想的蜕化之基础。人们知道，思想和实际中间总是有点间隔的。因此，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发展和纯粹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发展，二者中间就有了不调和的发现。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二种根本的形式。这种变性之最明显的倾向，便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修正主义的倾向。在确定的理论结构方面说，我们在别的国家找不到更切合的例子。因有许多历史的条件（我此处不能分析这些条件），机会主义的的实际的表现，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比在“哲学家和诗人之国”那样明显而确定。在德国，修正主义倾向不但出现，且很完全表示离开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及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其他一派的马克思主义，即考茨基领导的自命为急进派的或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其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痕迹则比较不十分明显。关于这一点，我在别处要说，这里我只指明，那种观察，以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考茨基的堕落乃开始于一九一四年是不对的。我以为（现在我们能够肯定），长期领导全国际之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这一派，离开了真正正统的、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思想发展初期的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很久了，纵然没有修正主义者那样急速。

在这时期的开始，发现了理论和实际中间的不能调和。修正派里最前进的思想家，

定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际，而制造出与此实际相应的理论。社会民主党其他一部分则仍坚持其理论，但他们的理论已经没有力量，且也不很想从实际上去制服了这些有害的倾向。考茨基一派就采取这种态度。可是到了这时期的结尾，当历史严重提出许多最原则的和最实质的问题之时——世界大战开始之时——“一下”表现出：在理论上和在实际上，这二派中间并没有实质的差别。根本上，这二派——修正派和考茨基派——表现同样的倾向，附会马克思主义，使之适应于——往不好方面的意思说——那产生于欧洲、为欧洲这时期发展特性的一些新的社会条件；这二派表现同样的理论倾向，远离了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由一般的观点看来，可以说，这二派的差别在乎纯粹修正派的“马克思主义”，在其一贯的形式内，明显表现其对于国家政权、资本主义制度等宿命论的性质；而考茨基派的马克思主义，则带德谟克拉西和平主义的性质。这个界限是相对的，最后几年就逐渐消灭了，这二派逐渐在同一条轨道上走，逐渐确定地远离了马克思主义。这个过程的根本点就在去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革命的辩证法、论资本主义崩溃的革命学说、论资本主义发展的革命学说、论专政的革命学说等，而代之以凡庸的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进化论的学说。我们能够详细指明这种倾向怎样很明显表现在许多理论问题之中。这种分析，我已经部分地在某次国际大会上关于共产国际党纲问题的演说中说过了。这种修正主义的倾向，蒲列哈诺夫和考茨基都有，譬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上中心点之一点：国家政权论。国家论中有这种修正主义，就可完全明白考茨基派于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中，为什么要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态度。真正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权论中的观点，我们都知道。这学说的要点可以这样说：在社会革命的时期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破坏了，新的专政——“反德谟克拉西”的，同时又是无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国家——开始创立起来，这是十分新奇的和特别的政权形式，这政权往后便开始毁灭。考茨基就绝不是这样说；考茨基和一切修正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对于这一点，都解释说，国家政权从这一阶级手里过渡到别一阶级手里，好像一架机器从这一阶级手里过渡到别一阶级手里一样，用不着这一新阶级把一切螺丝拆开，然后依新形式装置的。从这种论调，便逻辑地一贯地产生出战时保护祖国的政策。我们于战争开始时，时常在社会爱国派会议上听见这种论断，这种异常幼稚的论断成了保护祖国派的基础，有不小的成效。某个资产阶级国家既然明天要归到我们的手里，自然我们不应该破坏它，而要保护它。这样，我们的任务便完全与马克思所说的不同了。既然不该破坏国家，因为它明天将到我们手里，那么我们便不能破坏军队，因为这是组成国家的一部分，也不能破坏任何的国家纪律及其他。所有这些论调都是一贯的，自然当国家间因相互战争而濒于危险之时，考茨基派和修正派，完全适应于其理论的

前提，便要作出相应的实际结论。可见，以为欧战起时，他们是一时的突变的堕落——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他们在理论上完全是保护祖国的。我们不过未曾在所谓“正统派”里发现出这种内部的蜕化，所谓“正统派”和真正的正统派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其他如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崩溃的理论，如关于贫困的理论，如关于殖民地和民族问题，如关于德谟克拉西和专政的学说，如关于论群众斗争策略的学说等，都是这样。我可以介绍你们去读考茨基的一部著名的小册子——《社会革命》。这本书我们早就读过了，可是我们现在换一种眼光再读一遍，因为现在从这本书中，不难发现许多附会马克思主义的话和机会主义的公式——这些现在我们都明白了。这些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看见了资本主义制度上经济和政治关系上一些新的改变，他们如果从其理论的显微镜底下发现了现实生活中的新现象，那他们根本就永远用一种观点去观察这些新的现象——工人组织以进化的道路，在总的资本主义机体的系统中长大起来之一种观点。

譬如股份公司的新形式发现了，他们即刻就拿来“证明”资本的德谟克拉西化。欧陆工人阶级的状况改良了，他们即刻就作出结论说，革命或许没有必要，而我们能够以和平手段去做一切。怎样依据马克思的学说呢？只引用马克思的话，从复杂的段落或句子之中生剥活割出一二句就够了。大家知道，马克思曾经论英国说：“在英国，或者可以不经过流血。”这句话便给他们用去说明一切。大家知道，恩格斯曾有一次说点不十分有利于巷战的话。从这里，他们又作出许多结论。这样，一切现象都在工人阶级在总的资本主义系统中长大这一观点下去观察，这一观点在一定条件之内，可以说是“国内和平”的观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之中，结果革命的实质被去除了，于是发生了历史上常见的事实：同样的话，同样的名词，同样的辞句，同样的标语，同样的信条，竟有别样的社会政治的含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某个时候是个模范的党，在这党内还保存着马克思主义的口头禅，还保存着马克思主义的信条，还保存着马克思主义的字句的外壳，但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只存下一种学说的字句的外壳而已——这学说是过去世纪中叶社会震动时期所造成的。革命的精神飞往九霄云外去了，在我们面前根本上只上剩一种学说——适应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客观上变节了和被各该国内产阶级国家收买了的政党的机会主义的实际学说。而且我们能够画出一张特种的社会政治地图，表示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变节无耻的程度。这国家在世界市场的力量越大，这国家的地位越强，这国家及其资产阶级施行的帝国主义政策越贪心无厌，工人贵族越大越有力，联系工人阶级与其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组织的锁链越坚固越粗大，则这国家工人运动上的理论越更是机会主义的，越更是无耻的，无论这些理论是否带着马克思主义的标语。重复一遍说，我们能够画出这一

张地图，来十分明显地表示社会政治发展和思想发展（某种状况下，可说是工人运动思想发展）中间的联系。

以上便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上的第二阶段。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面貌绝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的面貌。我们看见这里有另外一种社会政治结构，我们就有另外一种思想，因为至少已经有了为这思想的另外一个支柱了。这支柱就是最凶残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特别是这些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贵族。当社会政治上变质的过程表现得最明显，则其一切方面离开真正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理论亦表现得最明显。

（三）列宁的马克思主义

我现在说到列宁主义的问题了。有人对我说，在红色教授学院的一面旗帜之上，写着：“科学上的马克思主义，策略上的列宁主义——这便是我们的旗帜。”我以为这样区分是不成功的，而且也不适宜于那以“思想战线上的先锋队”自命之红色教授，因为理论从斗争的实际这样分离出来，是绝对不应该的。如果列宁主义是实际——和马克思主义不一样，这恰好就是理论和实际隔离，而这又特别对于像红色教授学院那样的机关是很有害的。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是特种的理论构成，简单只因为他自己就是别一个时代的产儿。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够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之单纯的复演，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并不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之单纯的复演。那时代和这时代中间有共同之点：那时代不是有机的时代，而这时代更不是有机的时代。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时代的产物。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是异常骚动、异常革命时代的产物。可是大家自然了解，这里，在社会发展进程的本身，在构成理论材料之经验材料的本身，在提出于革命无产阶级前面而需要相应答案和相应的反应的任务上，既然发现了许多新的事物，所以我们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就不是马克思提出的思想总和之单纯的复演。

我们必须以最坚决态度申言，我们绝不应该拿列宁主义去和马克思主义对抗，我也绝不愿意拿这个学说去对抗别个学说。这个学说乃是别个学说之逻辑的和历史的完成和发展。但我今天愿意先提出那为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之基础的社会经济、政治上的一些新的事实。事实上，在这范围里，我们究竟看见了哪些新的事物为马克思所未曾注意到的，——因为马克思当时没有这些事物呢？我们首先看见了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上一种新的阶段。马克思了解在他以前的商业资本时代，马克思了解工业资本。工业资本时代可以算做总的资本主义之模范的形式。你们明白知道，只在恩格斯晚年才开始形成新提嘉和托辣斯一类的组织。而列宁所指出的垄断的资本主义，乃是资本主

义发展史上全新的阶段，带着大改造过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不能知道这个，因为当时并没有这个，有此简单的原因，马克思所以不能够用理论分析这些现象。

这些新的现象，应该从理论上研究之，用理论发挥而沟通之，使之成了理论上的推论和公式之旧练中的一个新环。这些便是财政资本上的现象，这财政资本所用的帝国主义政策上的现象。创立并固结资本的世界经济组织及其国家组织问题和表现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资本主义特殊结构中生出的许多类此的问题——这些便是马克思所不知道，而又应加以理论分析的问题，这是第一类的问题。第二类的问题，乃是与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关系之崩坏有关的一些问题。我现在用不着估定资本主义关系崩溃的程度，我用不着指出这关系上的病症，我用不着特别估计西欧目前的经济状况，我用不着说明严重的恐慌或破产，我也用不着拿激烈的言辞来形容这个或那个，你们仍旧可以十分明白此类现象是以前所没有的。无论国家资本主义，无论资本主义机体之崩坏和涣散，无论从生产的基础到货币的流通上各方面之日趋于破坏——这些现象都是科学的共产主义之创立者所处时代所没有的。这些现象在我们面前提出了许多有趣的和新的理论问题，跟着这些理论问题自然生出相应的实际政治结论，这些结论是建立于理论问题上，而联系于理论问题的。这一类现象是很容易形成一时代的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未曾知道。第三类的现象是直接和资本主义关系崩坏时期工人的暴动有关的。这时期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其战争中的大冲突之结果，这种战争就是资本主义竞争的特殊形式，为马克思自己及其接近的朋友所处时代所不知道的。现在这些问题便直接联系于社会革命的过程，这些问题也是大的社会现象，完全客观的社会现象，也需要理论的研究，也有特殊的规律性，也提出许多理论的和实际政治的问题于我们前面。我们明白，在马克思那时对这些问题只能给个最概括的观念，而现在的经验材料则给了我们许多新的现象供理论研究。这便是第三类现象及与此现象有关的问题及与解决此问题有关的实际政治结论。这是第三类的理论的和实际的问题，这些问题是马克思所不知道的，因为那时谁也不知道。最后，还有第四类的现象，这就是与统治的工人阶级时代有关的许多现象。马克思说过：“我的学说及其根本不在于论阶级斗争，而在于说阶级斗争必然要达到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一条界线。当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成了事实，那我们自然更进一步，已经跨过了这条界线。马克思学说的本质就在不可免的无产阶级专政，且亦只限于此。^①在那个历史的时期也只能有这样一种学说，因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真实的事实，亦没有连带的现象为经验的和观察的材料，以供理论分析或实际反应的对象。所以这许多重大现象完全是新的，因为我们自己已经跨过了马克思自己所说的那条界线了。现在我们有跨过这条界线的一类现象。这些现象在原则上越新颖，则其在理论上亦当越更新颖；因此

观察一切过去时代所没有的现象中所用的观念，亦应该越更奇特。以上便是做工人阶级方面理论观察的对象和理论整理的行动标准的对象之社会经济、政治及其他现象之第四类现象。我这里举出了四类来说。显然这四类的现象不仅形成欧洲发展的大时代，而是形成世界总的发展的大时代。这整个时代，由其复杂性和具体性，含着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大财富，这位辩证法学者和实际家把理论问题的研究和建立在这经验的材料上面之实际联合起来，他已经跨过旧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之外了。

这里，我为不至惹起误会起见，须得申明一点。在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底下，我们究竟了解什么意义呢？在这个名词底下，我们可有二种意义：一是方法论——研究社会现象方法的系统；二是思想之总和——这里包括历史的唯物论、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学说等。此外，又包括许多具体的断语：这就是说我们不仅拿马克思主义当作方法或理论形成的方法论来看，我们而且拿它当这方法之许多具体的应用，由这应用结果所得思想之总和。由最后一个观点，十分明显看见，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比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要宽大得多，这是很明白的。因为在旧有的思想总和上面，由新的现象、新的历史区域分析之结果，添加了具体问题的新的总和。在这种意义底下，列宁主义是跨过马克思主义界线的结论。但如果我们在马克思主义这一名词底下不解作马克思所有思想的总和，而解作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工具、一种方法论，那么自然列宁主义绝不是变性的或修正的马克思学说的方法论。恰恰相反，在这种意义底下，列宁主义是完全恢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马克思主义。

我以为这样便解决了那因术语混用 < 或 > 因许多术语在不同意义底下之使用而发生的矛盾。如果现在我们自问，这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之历史面貌有什么特点？那我可以把它看做是底下三种综合：第一，这是恢复到马克思时代，但这恢复不是单纯的，而是充富了所有新的事物，即是说，这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及新的社会经济现象分析所得一切结果之综合；这里因此包括新时代给予我们的所有新的事物之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第二，这是奋斗的和胜利的工人阶级之理论和实际的综合。第三，这是工人阶级之破坏的和建设的工作之综合。我以为最后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这里，关于第三点，我须得解释几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即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有各种历史时代中各种实际问题在其前面，相应着便要有逻辑上的、思想上的选择，因为实际的问题结果是要决定我们理论上的推论的，并在联结个别的理论之环为一系统、为一理论的锁链当中，也要受实际问题的决定。当工人阶级和革命的政党正处在夺取政权斗争的地位时候，在一切坚决的思想工作中，到处我们都必然应该加紧打击，并特别分析一切矛盾的方面。我们应该指明资本主义社会之一切根本的不调和，我们应该精密指明、收集，并在理论上阐明这社会各种元素

是日益涣散的。这是因为我们所注重的乃在实际，乃在找寻裂痕，乃在以最尖利的器具塞进这裂痕之内。我们面前是破坏的责任，我们需要推倒资本主义制度，因此，自然一切理论之环的首要选择是在这一方面。我们在理论上注重于提明那在实际上注重加深的一切冲突，需要从总的理论问题穿过中间的环，穿过我们的煽动家，向前进，因为这里，在我们面前是根本的破坏推翻的责任。马克思的一切理论整个特点，就在于建立在这个方向。当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在其面前就有了另一种责任，即在工人阶级确定的指导权之下，缀合社会整体的各部分。实际的利益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从前是没有利益的，而且现在则要我们注意思索了。我们现在不应破坏，而应建设。这完全是另一种景象，完全是别一种观点。我想，我们每个人当看见了许多事物或甚至做过了许多对于现实生活的观察，必会说，他有时对于从前用另一眼光所看的现象，现在看来竟是完全别样的景象。单因为从前他实际上应该破坏某种复合物，而现在他应该建设之，这样或那样缀合之。所以，我以为这个潮流找到了其理论表现和理论反映于许多问题上。这些，在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时代是不能提出的。在第二国际时代，乃是以资产阶级国家中工人组织长大起来的观点提出。既是用这观点提出，即是说，社会民主机会主义党提出和平的文化建设为其责任。既然不是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为适应并分子进化式地改造这个资本主义制度，所以明显的，这种“建设”理论的责任遭了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因为所有这些观点，正是我们所要破坏的。可是历史的辩证法是这样的：当我们夺得政权时候，我们十分明白，实际上和理论上别一种景象是不可免的。我们应该一方面破坏，他方面建设。我们应该在自己面前提出一些问题，使之能给我们以破坏旧的和建设新的之综合，这些不同景象在某种整体内的综合。根据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列宁给了我们这种综合了。这里，我们非常难于从这范围内形成总的、根本的说明，因为这里我们仍然有许多零碎的文字，分散在浩大的《列宁全集》里头，特别是在他的演说之中。但我们十分明白，这是马克思主义之长远发展成为理论系统之列宁主义的最新、最有意义的一点。当然，在破坏方向上，于理论中已有许多了，但在创造方向，则很少能在马克思固有的理论中找得到依靠点。这里也是需要从新建立，因此我以为列宁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和实际之最伟大的贡献。可以这样说：在马克思主要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和革命实际的代数，而在列宁则是这个代数和现象（破坏的和建设的）的代数及其数学，即是说以更具体的、更实际的眼光把代数公式演成了数目。

注①：巴黎公社只是一种暗示，供给马克思做许多天才预言的基础。但马克思自然还不能深刻研究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未完）

《马克思通俗资本论》序言

李 季

在欧洲留学时，常听见友人说，近三四年中，国内批评马克思学说的著作逐渐多起来了。我当时虽想罗致此等作品，一饱眼福，竟不能达到目的，直到今年九月归国后，才能如愿相偿。不过我读了这些大著之后，实在有点失望。因为这一般“批评家”对于马克思的学说，大都是些门外汉，他们自己没有研究过这种学说，偏好将他们的一知半解发表出来。他们的议论，本来是信口开河，丝毫没有价值。然因他们在著作界中各占有相当的地位，而国人鉴赏能力又极薄弱，所以他们的话，居然能够哗众取宠，惑世诬民！

举例来说，胡适之先生不是国内有名的学者么？他不是顶着哲学博士头衔的哲学专家么？他不是时常劝大家对于一种学说当深加研究，然后加以介绍或批评，“免去现在许多……半生不熟，生吞活剥……的弊病”“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去做口头禅”么（参看《胡适文存》一卷一五三和一九七等页）？然他自己谈马克思的哲学——唯物史观——就犯了这种毛病。他驳陈独秀先生道：“其实独秀也只承认‘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决大部分问题’。他若不相信思想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那么，他尽可以袖着手坐待经济组织的变更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宣传事业，谋思想的革新呢？”（见《科学与人生观》上卷《序言》三二至三三页）照适之先生上面一段话看来，他以为唯物史观仅认经济是社会发展中发生积极作用的唯一要素，至于思想、知识、言论、教育等等都是消极的，都是不发生作用，而专待经济去促它们进步的。这种拙劣的见解与唯物史观的本义真是相去十万八千里！适之先生更荒谬的地方，就在他认为唯物史观的任务是在“解决”社会上单个的事件——如适之先生见着溥仪连呼“皇上”；因冯玉祥逼走溥仪，大叫丧失“国际信用”；看见人家发传单反对印度圣人泰戈尔，斥为非“君子国”待人之道；见人家提倡反对文化侵略讥为“无识妄人”。又如五四运动中打伤了章宗祥、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等，怎样用唯物史观去“解决”之类——他自己对于这样的“解决”也许是费过气

力，没有获得很好的结果，于是觉得唯物史观对于“解决”社会上一切零星事件，包办不了，所以不得不承认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决”大部分问题。其实唯物史观的任务不在“解决”（应当说“解释”）社会上单个的事件，但在供给我们以了解社会革命的锁钥，但在解释社会革命（参看博洽德《历史的唯物论》，特别是三二和三三页，一九二二年第二版。Julian Borschardt: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关于这一点，主张埋头研究学问的适之先生何尝梦见过？可是像适之先生上面那样“半生不熟，生吞活剥”地解释唯物史观，不怕“一知半解的人拾了……去做口头禅”么？

其次，马寅初先生不是国内有名的经济学教授么？他不是劝告人家莫高谈马克思的学说，免作“皮肤之论”么？他不是特别劝告研究经济的学者要深思博览，避开“言之不慎”的弊病么？（参看《马寅初演讲集》第一集二二二页）但可惜他只知劝人家，却忘记了劝一劝自己！我们且看他对于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学说是怎样描写的：“马氏曾有资本主义自杀政策之说。夫资本主义自杀政策者何？即谓现在实业发达，一切产业集营于公司，而公司换以股票，是昔日有形之产业，忽变而为一张纸片，一切权利，皆可以过渡之方法转移之。以此之故，主张共产者，谓若欲实行共产，惟在公司账户上划之而已。手续异常简便，如张某之户可以划入共产之户是也。并无如昔时有物质上之产业转移困难。此说一出，又兼欧战后，俄国之实行，世势因之巨变，而马氏社会主义之说，亦以之大勃兴也”。（见同书同页）马寅初先生以为马克思认“一切产业集营于公司”，换得“一张纸片”的股票，容易转移，这就是“资本主义自杀政策”，“实行共产”只须将此等产业从“公司账户”“划入共产之户”；而“欧战后俄国之实行”，也只是用整千整万的书记干这种将产业从“公司账户”“划入共产户”的勾当！这种说法，不仅是“皮肤之论”，简直是“言之不慎”，简直是大错特错！

又马寅初先生驳马克思等的劳动价值说，列举五个疑问，以相非难，完全暴露他丝毫不懂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说是什么一回事！最好笑的是下列一个问题：“如公园之大柏树，锯之则价值小，不锯则价值大，是虽费劳力而价值反小也，是何故欤？”（见《马寅初演讲集》第二集五七页）大柏树“锯之则价值小”，这是就出卖给别人而言，即指交换价值。“不锯则价值大”，这是就供游客赏玩而言，即指使用价值。马寅初先生对于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混为一谈，没有划分清楚，偏要执此而非难马克思的价值说，岂不是太冤枉了么？

此外，如陶孟和在《马克思价值价格及利润》一书中所作序言，谢瀛洲在广东大学《法科学院季刊》上所发表《马克思学说之批评》，对于马氏学说的介绍与批评，错得一塌糊涂，几令人无从指摘起！这些鼎鼎大名的“学者”谈马克思的学说，既如此讹错百出，至于其他学力不及这些“学者”的人以及故意反对马氏学说的宣传家，

其议论的每况愈下，更不待言了。好在此处不是作统计表，所以也用不着再浪费笔墨举出他们的尊姓大名来。

我们现在对于这一批“学者”的议论，如果一一加以反驳，便是驳不胜驳，如果听其流行，则许多直接或间接和他们议论、接触的人都会受他们的欺骗。这倒是学术界一桩很不幸的事。可是他们所以敢公然将他们的一知半解发表出来，是明明以国人的鉴赏能力薄弱，容易受其愚弄；而国人的鉴赏能力薄弱，是因国内缺少真正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著作，大家得不到一个比较，故无从辨其真伪。因此我们要对付这一批“学者”，用不着疲精费神，枝枝节节去反驳他们，我们只要很忠实地将马克思的学说尽量介绍过来，他们自然而然不敢再信口开河了。

我们要尽量介绍马克思的学说，应当把他的一切著作翻译过来，尤当首先翻译他的《资本论》。因为《资本论》是他竭大半生精力创作出来的，是他自己认为“主要著作”的（参看《昂格思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三三二页，一九二一年出版——*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F. Engels und K. Marx*），也是欧洲大陆称为“劳动阶级的圣经”的（见英文《资本论》第一卷三〇页，一九二一年芝加哥出版）。不过《资本论》有三大卷共二千二百余页，译成中文当在一百二十万字以上。如此宏篇巨制，不独非短时间所能译成，殊嫌缓不济急，即令译成问世，也必定很少人具有读这著作的要求。这并不是我们妄为臆断，德国实在有先例给我们看的。《资本论》是用德文著成的，而德国又为学术最发达和劳动阶级教育程度最高之国。可是无论德国学术界人士也好，劳动阶级的人也好，绝少读过全部《资本论》的。他们至多只读《资本论》第一卷。有产阶级著名的经济学教授施班（O. Spann）指示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开列马克思的《资本论》，只及于第一卷（参看施氏《国民经济学的主要学说》一七六页，一九二二年莱比锡出版——*Die Haupttheorien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于一九一四年命考茨基（Kautsky）注释《资本论》，也只及于第一卷，考氏且说，“寻常的读者通晓了《资本论》第一卷，已经是大成就，此卷对于工人最为重要，因为其中所讨论的种种定律是支配生产中资本与劳动之关系的”（见考茨基注释的德文《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三四页，一九二三年第七版）。在《资本论》出现的本国，尚少人去全读，难道译成中文，能逃出例外么？

然照上面所述，《资本论》的第一卷既是对于工人最为重要，而世人又通常只读这一卷，我们如果将这一卷译成中文，岂不是将《资本论》的要点介绍过来了么？不过，“第一卷表现最大的难关。作者为着创造一种名著起见，以极大的努力，使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学说达到一种哲学——一种黑格尔逻辑——的高程度，这本是非必要的。作者是以一个精神上角力者‘的精神’去对付他的对象的”。（见俾尔《马克思传及其学

说》一〇六页，一九二二年柏林出版——M. Beer: *Karl Marx sein Leben und seine Lehre*) 马克思自己也承认第一卷的起首几章最难，所以他开一个读书方子给他的朋友的夫人，叫她先从中间和后面读起（参看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三一页）。可是我们不单独介绍《资本论》第一卷，不仅因它本身比其余两卷更难读，还因它和其余两卷是一气呵成，互相贯串，互相说明。倘若遗弃后面两卷，使之偏而不全，则第一卷的意义愈加容易为人误解，至少也是愈加不容易显明了。所以考茨基说：“要完全了解其中的一部分，必须知道全体。没有第二和第三卷，不会充分了解第一卷，第一卷中有许多‘部分’——即第一卷讲商品和货币的最大部分——构成二、三两卷的预备‘材料’，比构成第一卷后面的发挥‘张本’更多，并且对于了解流通进程，比了解生产进程更为重要（见同书《序言》三四页）。”

《资本论》的全部既不能仓促译成，且出书后未必有多少人过问，而《资本论》的一部又不宜单独行世，我们介绍此书的计划，岂不是终成泡影么？决不会。拿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Karl Marx's Oekonomische Lehre*）、阿卫灵（Edward Aveling）的《学生的马克思》（*Student's Marx*）和黄特曼（Untermann）的《马克思经济学》（*Marxian Economics*）这一类的书来作替身么？也不是。到底是什么书呢？就是博洽德所编的《马克思通俗资本论》。（*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Gemeinverständliche Ausgabe*）

博洽德为德国治马克思学说有名的学者，他潜心研究《资本论》至三十年之久，并于二十年前应比国京城不律塞社会科学院之请，与比国一个同志将《资本论》二、三两卷译成法文。自欧洲大战爆发后，他得着闲暇时间，编纂他多年想像的《马克思通俗资本论》，至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脱稿付印。出书后十五个月之内，即销去一万部，未几又被次第译成英、俄、法、日等文字，真是风行全球了。上述考茨基、阿卫灵和黄特曼等的著作不是仅限于描写《资本论》第一卷的学说，就是挂一漏万地将三卷中的学说略说一下，并且全是用他们自己的语法表现出来的。博氏所编纂的《通俗资本论》则含有三卷中最重要的学说，其中文字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出自马克思自己的手笔，博氏的任务只在用些承接的文字，将马氏的作品结合起来，或是将马氏艰深的文句使之通俗化。因此，我们一读此书，即真正读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简明本，这是本书比其他任何类似著作的价值独高的地方。

《马克思通俗资本论》为《资本论》的缩本既如上所述，然就编制上讲，两者是不相同的。《资本论》第一卷所论的为资本的生产进程，它首先探讨构成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商品，次则及于货币，再次则为货币的资本化、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工钱、资本的蓄积，而以原始的蓄积为殿，因此追溯到大工业资本的前

史，并推论其将来的出路。我们在此处所看见的主要事件，是劳动者在工厂中替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第二卷所论的为资本的流通进程，资本家将已经生产的商品从工厂中运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再投入生产中，使生产进程得因此继续下去。第三卷所论的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进程，资本家在流通进程中既因商品的出卖而实现了剩余价值，此时就将其转变为利润、利息和地租，分配于全资产阶级。马克思这样做，本造成一种极自然的统系。所以卢森堡女士（Rosa Luxemburg）说：“就这部大著作的全体观，我们可以说，第一卷及其中所发挥的价值律、工钱和剩余价值，将现社会的基础赤条条地暴露出来了，第二和第三两卷则表现立于这种基础上面的上层建筑物。我们还可以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图形形容出来，就是第一卷示我们以社会有机体的心脏，而血液是由此心脏中产生出来的，第二和第三卷示我们以全体的血液循环及营养，一直到最外部的表皮细胞为止”。（见墨尔林《马克思传》三八四页，一九二〇年第三版——*Franz Merring Karl Marx genehichte seines Lebens*）

然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资本论》以第一卷为最难，而第一卷又以起首几章为最难，博洽德编《通俗资本论》，如果仍旧依样〈画〉葫芦，则普通一般人起首就遇着难关，所谓《通俗资本论》，那便是名不符实了。所以他特变更计划，将其中次序稍微颠倒一下，由浅入深，由易入难，务必引人入胜，使不感到任何困难，而全书自成一气，丝毫不露出割裂的痕迹，这是编者手段高妙之处。他自认在一方面是很忠实地保持马克思学说的意义和内容，在他方面又使平常人和初学者容易了解（参看《通俗资本论》序言一六页），这两点他确是做到的。英文译本称此书为《民众的马克思》（*The People's Marx*），也就是表示此为民众所能读的书了。

《通俗资本论》既为民众所能读的书，则民众万不可不读。为什么呢？因为《资本论》的终极目的是在“表现近世社会的经济运动律”（引马克思语，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三八页）。并且“世界上自有资本家与劳动者以来，没有一部书对于劳动者像本书这样重要。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现社会全部制度的枢纽，这种关系在本书中才第一次依据学理发挥出来，其持论既彻底，又复锐利无匹……”（引昂格斯语，见哥郎瓦尔德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一八页，一九一二年出版——*M. Grundwald; Zur Einführung in Marx' Kapital*）生息于现社会的民众要知道他们自己所处的地位，要了解现社会制度的枢纽，对于本书不可不人手一编，借资考镜。

不过民众要读此书，在未开卷之前，望着书名，马上会发生一个疑问，就是“资本到底是什么？”关于资本的学说，种类很多，我们对于已经陈腐的，或过于怪诞的（例如中古时代的人以及重商主义的学者认一种出贷的货币额为资本，黑尔曼（Herrmann）认一切有交换价值而又继续耐用的货物为资本，李斯特（F. List）于物质资本

之外，又有所谓精神资本，罗歇（Roscher）也有无形资产之说，等等）一概从略，只介绍一二最著名的学者的学说如下。经济学的始祖亚当斯密士（Adam Smith）以为一个人的“全部财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他希望借以获得一种收入的，这就叫做资本。另一部分是满足他的直接欲望的……”（见亚氏的《原富》德文译本第二卷四页，一九二〇年出版——*Eine Untersuchung Ueber Natur und Wesen des Volkswohlstandes*）；他又说：“一个人总希望从他所用为资本的每种财富中获得一种利润。因此他仅用这种财富去维持生产的劳动力，当将此用作资本时，即构成一种收入。可是他如果用这种财富的任何部分去维持任何种不生产的劳动力，则这一部分即刻就从资本中取出而列入直接消费的财富了”（见同书八三至八四页）。亚氏齐名的李嘉图（David Ricardo）说：“资本是一国用于生产的财富部分，这是由维持劳动活动所必需的食料、衣服、器具、原料和机器等等成立的”（见李氏《经济学与赋税的原则》一九二一年伦敦第二版——*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上述亚当斯密士和李嘉图对于资本的学说，一直到现在，还是为有产阶级的经济学所公认。他们以为凡用于生产中的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等等就是资本，用于享乐消费的财富即非资本。照他们的说法看来，不独四千年前唐尧帝时代因“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所用的食料和工具是资本，此等凿井、耕田的自耕农是资本家，即原始共产社会一切用于生产方面的食料和工具也都是资本，而原始共产社会的人尽成为资本家，因为当时的人都从事于生产，没有无故而不劳动的。不仅是这样。婆罗洲的猿类能用木材架屋，能运用木石去获取各种食物，即下至于猴子也能用石头去击碎硬壳果，吸取果仁，是猿猴所用的养料和木石也是资本，而猿猴都变成资本家了！不独兽类如此，即昆虫类如蜜蜂等在生产中也有资本，蜜蜂也是资本家了！所以照此推论起来，有产阶级经济学者对于资本的学说实在是太滑稽了！

然资本到底是什么呢？科学的社会主义始祖马克思告诉我们说：“资本是一种社会的生产关系。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见马氏《工钱劳动与资本》二五页，一九〇七年柏林出版——*Lohnarbeit und Kapital*），“一种人如果不遇着另一种人——即工钱劳动者——因受压迫而自愿出卖自己，则前者虽据有货币、生活资料和其他生产工具，尚不能变成资本家……资本不是一种物品（Eine Sache），但是一种借物品表现出来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六九三页）。所以“一个黑人只是一个黑人，要在一定的关系之下，他才变成奴隶。一架棉花机只是一架纺棉花机器，要在一定的关系之下，他才变成资本。他一离开此等关系，即不是资本，恰如金子自身不是货币，沙糖不是糖价一样。”（见马氏《工钱劳动与资本》二四页）更明白些说：“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为直接生产者——即

劳动者自身——的财产时，即非资本。此等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同时用作剥削和宰割劳动者的工具——只有在这种条件之下，才变成资本。”（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六九三页）。“资本是死的劳动，他和吸血鬼一样，要吸取生的劳动，才能够生存，他吸取愈多，则生存愈好。”（见同书一八二页）马克思对于资本的学说，真是精彩绝伦！照他的说法，不独蜜蜂与猿猴所用的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非资本，蜜蜂与猿猴自己非资本家，即原始共产社会中所用的食料与工具也非资本，这种社会中的人，也非资本家，即“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所用的食物与农具也非资本，此等自耕农也非资本家。只有剥削和宰割劳动者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才是资本，只有凭借此等工具和资料不劳而获的人，才是资本家。

大家对于资本的意义既明白了，便可以开始去读《通俗资本论》。不过还有几点是要预先注意的，今特介绍俾尔的一段话如下：“要懂得《资本论》，必须记着下列各点：（一）马克思没有下永久有效的解说。如资本、工钱和价值等等的观念都是历史的范畴，这就是说，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时代中有一定的意义，在别种时代中便没有此等意义。例如价值的观念在别种时代中可以只指物品的有用性讲；在又一种时代中，价值是可以由一种物品表现的功效或美丽做标准去决定的。但在现社会中，价值是由生产费决定的，而这种生产费由马克思用科学的分析，化为劳动。（二）马克思对于科学上发现的诸原则，视为事物内部的真正的性质，对于与之对峙的实践，视为事物表面的和由经验得来的现象。例如：价值是理论的说明，价格则为经验的说明；剩余价值是理论的说明，利润则为经验的说明。由经验得来的诸现象（价格与利润）固然和理论有参差之处，但没有理论，此等现象是不能为人所了解的。（三）他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进程，在本质上视为不受外界的阻碍与扰乱的，视为不受国家和无产阶级严重干涉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工人斗争与工厂立法，与其说是用为限制独立资本的剥削作用，毋宁说是用为完成生产力的发展。（四）他的心目中总是看着资产阶级，而不是看着单个资本家的。”（见俾尔《马克思传及其学说》一〇六至一〇七页）

末了，还有五点是要声明的：第一，博洽德编《通俗资本论》的目的，不是用此书去代替三大卷的《资本论》，使原书从此可以废置不用，他的意思是要借此书为初阶，引导许多人去读原书（参看《通俗资本论·序言》十五和十七页）。我们译此书的目的也不是用它去代替三大卷的《资本论》，但是借它为初阶，引导许多人去读大部头的《资本论》。我们在上面虽指出世间很少人有读这部大著作的要求，然我们决不因噎废食，遂不尽介绍原书的责任。因此我们只要稍得闲暇，即将着手翻译三大卷的《资本论》。第二，本书系从一九二二年第四版的《通俗资本论》德文原本译出，一切内容，均以此为根据（英文译本与德文原本间有出入之处）。第三，译书本分直译与意

译两种，各自有其价值。本书几全用直译，希望借此保持原文的精神。不过中西文法不同，有时须加些字句，才能显出原文的真意思；译者对于自由加入的字句，均用方括符〔 〕作标记，以明责任。第四，原书所征引的书籍，如系英文，即直接用英文原名附入本书中，不再沿用德文译名。第五，本书对于原书一切文字均很忠实地译出，半点不敢遗弃，唯对于原书第三版所附加的检查表，因比较不甚重要，故暂时从略。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序于上海大学

战壕断语

——中国革命者的杂记

屈维它

赤潮澎湃的世界社会革命运动里，我们在中国国民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战线上，是四面受着种种式式敌人的包围侵袭，我们天天过的是战壕里的生涯。中国的革命者，也许因为在枪林弹雨之中，只能顾着眼前的仇敌，刻刻提防着对面的刺刀、头上的炸弹。然而我们中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两大阶级长期决战里的一战线——战场的范围其实是全世界；别的战线：如英、美等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印度、非洲、菲列滨、高丽、安南等处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中国革命的成败是有声息相通的密切关系的；便是无产阶级已经战胜的苏联，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工程，在无产阶级独裁制之下，和资产阶级的决斗，更是世界社会革命进退的关键。我们最好能有整部的著作——详细的谍报，因为我们应当知道别的战线上的形势，才能正确地决定我们的战略。可是，我们的战壕生活，不能容许我们立刻便实现这种希望，我们只是偶然在枪声炮火中，能和我们别的战线上战友遥遥地问答几句。自然轰天动地的炮声里、挣扎苦斗的战壕里，连这几句的问话、答话，也是时时为庞杂的声浪所间断，为作战紧急而停止。“人语风吹断”——这是好悠闲的中国名士荡桨中流的生涯；如今我们的革命赤潮中，狂风激荡，也正是这个景况。不过这些断断续续的消息、战鼓声中的传语，不是悠闲的生涯，而是斗争的资料，我们且先记录这些战壕里的断语，至少对于世界革命战线的情形，可以得其一二。

一、摩洛哥和叙利亚

法国国会里，钻进了几个赤化分子，中国现时正认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东西：一个叫做顾都埃，一个叫做铎黎沃（共产党议员）。他们大作其赤化宣传！章太炎说：

“今日国内之问题在如何打倒赤化……护法、倒段题目虽大，而与赤化相较，则后者尤易引人注目”（一月三十一日《申报》），原来赤化的危险如此之大，我们倒要研究研究，——看看法国过激派的宣传，是否“今日国际之问题亦在打倒赤化”！

顾都埃在国会里演说道：洛迦诺会议说什么减少军备！法国政府仍旧用十万万金佛郎的战费去打摩洛哥和叙利亚——教育部、农业部、劳动部的一年费用总共不过二十五万万，海军部、陆军部的费用却有六十五万万。苏联每万人中只有四十一个赤军；波兰、战美尼亚——却有一百个兵，法国竟达到二百个。这是所谓资本家的和平主义！铎黎沃的演说更为“过激”：法国为什么打叙利亚，难道弱小民族的革命真能“杀尽了白种人”——像一班宣传阶级妥协的法国“社会党”所说的，这是他们拥护政府出兵的理由？实际上，法国银行家攫取叙利亚的矿产、银行、口岸、市政，法国政府要保护这些人的“特殊利益”，便叫几十万法国工人、农民、（兵士）去流血，便整千、整万屠杀叙利亚人！法国政府和英国订立密约，法国赞助英国夺取土耳其的摩塞尔煤油，英国便任法国自由在叙利亚行动。铎黎沃在演说末了时高呼道：可见，“只有殖民地民众暴动革命，能达到自己的独立，能使人类有自由和平的发展，法国民众的责任便是赞助这种革命！”中国的国家主义派，说土耳其只要利用英、法等国冲突便能得到独立，这里所引的事实想来便是“证据”了！

摩洛哥独立运动的首领亚白埃尔吉林（Abd-El-Kerim）的代表克宁（Kaning），去年年底便到了巴黎。因为力弱不能不求和。可是法国政府拒绝和他谈判。白里昂总理，在国会里说明这个理由，是“亚氏不能代表全族，我们要和全族谈判，不能和他们的国王谈判”（一月一日巴黎电）；但是他到后来说出了真“理由”来：原来法国和西班牙对于摩洛哥问题订立了协约，仿佛国会的多数曾经赞同这个协约。共产党议员一致地攻击政府，要求立刻和克宁谈判。到这时候，社会党议员也觉得太难为情了，站起来声明：国会并未赞同和西班牙订立的密约，并且亦没委托政府订这类条约，以前的事不用说，以后社会党议员也不能再对政府提取摩洛哥战费投同意票了。

叙利亚的特鲁斯人从欧战割归法国“代管”之后，这国际联盟威尔逊式的“民族自决”政策，使他们受着无限的痛苦和压迫。去年七八月间，特鲁斯奋起革命，受法国的屠杀，经过半年的苦斗，最终又被征服。我们得到那地同志来的通信，还是去年年底发出的，我们那同志去的时候，已在十一月间，原是只为着调查。那里的无产阶级还不曾组织自己的政党，革命运动的指导，可惜还没有正确的政纲和策略。我们且就这封通信略叙革命运动失败的经过。

叙利亚的暴动，法国报纸上总说不过是宵小、匪徒在达马斯克一带地方的骚乱而已。其实全叙利亚都在暴动之中：哈马、哈摩斯、亚拉乌塔等处都有民军出没，

达马斯克至贝鲁德途中，革命军不断地袭击法军。因此，法军的力量分散，失败不少次。然而对于法国最危险的，始终是达马斯克——革命运动的中心。达马斯克有三十万居民，大半是手工业者或农业雇工，城市的四围有不少园林、田圃，极便于革命军的出没。法军占领达马斯克之后，立刻便着手进行引起暴动的阴谋，因为在这森林包围的城市里，法国军队知道如果革命军有长期的准备，对于法国军队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法国军队初到时，革命军并无动静。法国人故意要挑动过早的暴动，便不问情由地乱杀，借口消灭“匪徒”，在工人区域用飞机乱抛掷炸弹，近市的园林里亦是如此；法国军官在田里见到耕地的农民便杀，说他们窝藏匪徒；城里军政执法处每天绞死几十人，暴尸示众。同时，法国人竭力挑拨居民之中的基督教徒、亚美尼亚人及特鲁斯人的恶感，使其自相残杀。然而这些方法都没有用。于是法军总司令塞莱（Sarraïl）——“社会主义的将军”——想出来别的阴谋方法了。他命令被虏的土人肩着打死的革命党满街满巷整天到晚地走，命令“惩罚战争”的兵士“开刀”——像中国古代的野蛮办法，个个兵士可以任意杀人抢掠，于是附近乡村里的妇女、儿童整千整百被奸淫或鸡奸，奸后再行杀死。达马斯克郊外有好几个乡村，如摩莱社、腊蒲勒、直黎孟等，整个儿的焚毁，居民屠杀净尽。这样，叙利亚的忍耐性自然再不能持久了，普通的土人自然不能得革命军的指导和计划而自行动手——有一晚在达马斯克城里，各处总共杀死了一百五十多个法国兵。于是“社会主义的”塞莱将军便有了“口实”了：“叙利亚人都是野蛮的暴徒！”当晚城市里的暴动便不得不开始，革命军想要一举而占领政府机关。最大的巷战便发生于埃勒亚依摩（El-Eaim）（叙利亚有名的贵族）的邸宅旁边，那时塞莱将军住在这所房子里。可是他早知道他的计划和阴谋一定发生效果，所以前一天已经离去达马斯克。那时法国军队用五十架飞机轰城，尤其集中注意于贫民区域。革命党占领城市之后，还持久地抗御，满街满巷都架起堡垒，以革命军的勇敢，至少还可支持一星期之久。但是法国军必定要把整个儿达马斯克变成灰烬，革命军只能退兵。这次战役，叙利亚人被杀的至少有一万，尸身在街上堆了五六天，全城损失总在一千万金磅以上。法国政府机关报竟故意造谣，说这是基督教徒和亚美尼亚人反对革命军的暴动所烧、所杀的。可是实际上叙利亚的各民族至今也没有中这种离间之计。革命军败后，达马斯克政府忽然“仁爱”起来了，说都是革命党和亚美尼亚人丧失了东方民族的仁爱天性，因此，公布没收革命党财产的命令。叙利亚政府是大贵族的政府；叙利亚贵族阶级的利益是和法国资产阶级相同的，他们是法国资产阶级的走狗，所以受命法人，要用这种政策打击叙利亚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和智识阶级。叙利亚革命暂时是失败了，贫民阶级的斗争和暴动暂时是镇服了，然而这仅仅在达马斯克一个地方，

反帝国主义的思潮，也和我们的五卅运动一样，从此普遍于全叙利亚一般的平民群众，不久要有更伟大更有组织的革命起来！

叙利亚的革命党代表萨毗尔（Isan Jabir）等曾经到日内瓦国际联盟去，但是国际联盟拒绝招待，拒绝他们作报告。萨毗尔等发表宣言说：叙利亚革命民众的代表团来到此地，并不是请求什么“公判”，而是要抗议法国人的屠杀——“如果国际联盟没有相当的办法，我们一定要继续力战，驱逐法国势力出叙利亚以外，求得叙利亚的完全解放。我们境内还有很好、很有力量的军队，一切必需的军械都很充足，我们所准备的是胜利，不是投降！”（日内瓦一月十四日电）

二、摩塞尔问题、土耳其、蒙古、爪哇

摩塞尔地方隶属于土耳其之下已经四百多年。一九一六年以来，摩塞尔便成国际上的争执，帝国主义的列强大家都想抢它的煤、油。可是，在欧战的时候，英国看着俄帝国的军队有进占土耳其之势，便和法国订立瓜分土耳其的密约，把摩塞尔让给法国，想利用俄、法之争而从中取利。等到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帝国主义解体，英国便在一九一八年派兵进占摩塞尔。此后英、法之间的争执，便只能以英国承认法国扩大管理叙利亚的权限为英国占摩塞尔的交换条件。英国将摩塞尔并入所谓“国际委任他管理”的伊腊克王国。此后的争端，表面上是土耳其和伊腊克之争，实际上便是土耳其和英国之争。

经过一九二三年的洛桑会议、一九二四年五月的英土会议、十月的国际联盟的白鲁塞尔会议、一九二五年九月的国际联盟会议，这一问题始终不能解决。因为每次“国际联盟”判归英国，土耳其总是提出严重抗议，直到海牙国际法庭，方才强迫判定摩塞尔归英国管理。这次的解决，完全因为英、法对叙利亚的密约关系，英国答应帮助法国“平叙利亚之乱”，法国在国际联盟里赞成英国的提案。

摩塞尔地方既有极丰富的煤油矿产，又是美沙波达美亚、土耳其、波斯等国的通道。土耳其为保证自己的安全起见，在经济上、军事上都必须争得摩塞尔。海牙及国际联盟的决定决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土耳其国民革命政府已经决定以武力收回摩塞尔了——因为它已经知道中国式的国家主义派政策——利用列强冲突的政策“太切实际”了！

土耳其国民革命虽然成功，却不能说完全胜利，土耳其的民族，更不用说大多数劳动平民，还没有得到澈底的解放，因为帝国主义没有推翻，弱小民族时时刻刻都在

受列强的侵袭。摩塞尔问题便可证明周佛海等“只须打倒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或国家主义派的“只是外抗强权”，而不是联合世界无产阶级推翻帝国主义制度的“学说”，完全是空想。帝国主义在乱放“苏联赤色侵略”“土耳其杀戮基督教徒”的谣言时，制造第二次大战争空气。洛迦诺会议和摩塞尔问题，便是列强联合进攻苏联、土耳其之战争的准备。帝国主义和弱小民族及无产阶级对抗的形势中，土耳其等一切弱小民族，不得不和苏联及各国无产阶级建立巩固的斗争同盟。国民革命的土耳其于是便和苏联订定军事上的防御同盟，互守中立的盟约了（去年十二月十七日签订于巴黎）。

蒙古民族最近三四百年来，受着满、蒙贵族和汉族巨商的压迫和剥削，文化经济落后不堪，人民困苦万分。旧俄帝国主义和恩格儿白党又从中操纵它的“自治”，占领它的领土。只有苏联无产阶级的革命和赞助，使蒙古民族脱离这种压迫，自己建立国民革命的共和国。活佛去世，政权完全转移于国民会议之手，然后才开辟了改良进步的光明之路。去年十一月国民会议第二次代表大会，九十多个国民代表（有五个女代表）之中，大半都是平民劳动者，王公的权势已经消灭。大会之后，国民会议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决定增至四十五人（以前是三十人），更加扩大平民的政权。国务院也由新中央委员会重新改任；国务总理赤伦多治（Zren-Darji）原任，没有变动，他是农民奴隶出身；外交、内务、财政、司法、监察等部的总长都是平民；内务部前任总长赤汗（Zeze-Han）本是成吉思汗后裔的王公，现在的内务总长奈唐苏伦（Naidan Suaun）便是牧儿出身。荒凉的库伦现在已经有了许多新的建设，蒙古平民从今有了自己的大学，许多旧时的迷信风俗都逐渐地变更，蒙古的青年已经组织革命童子军，妇女运动也已经发生，甚至于青年女子也剪发了。蒙古民族的进步、自决革命，不但解放自己，并且是中国革命的友军，在推翻中国军阀统治的斗争里，是我们极大的助力。可是，中国的国家主义派却要把蒙古改成行省。蒙古的平民咧！中国这种帝国主义者不过是狂妄的士大夫而已，他们哪里有实际力量对你们实行帝国主义！你们民族自由的保证，有中国国民革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你们奋斗，打倒这些中国帝国主义者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你们可以放心地和中国劳动平民携手，赞助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打倒中国、俄皇以及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那时革命的中国、蒙古及其他民族之联邦，才能彻底地解放中国和蒙古。

我们怎的比牛还笨！
它带着满身的鞭痕，
还能角挑起残暴的牧牛人，

践踏时，那管得蹄下无情。

——爪哇民歌

荷兰资产阶级可算是最早的殖民家，三百年前便占领爪哇等处南洋群岛。一直倒很“安宁”的。可是最近俄国革命之后，中国的五四，高丽的国民运动，蒙古、印度等处革命斗争开始之后，爪哇地方也就不“太平”了！几年前荷兰政府驱逐劳工运动领袖马腊古（Malakku）和谢孟（Zemon）同志出境，然而他们的工作还仍旧继续着。最近，去年八月十二日，又逮捕达尔苏诺（Darsono）同志。那前几个月，因警察的高压政策，一次大会及罢工都没有发生，反动派的报纸《爪哇新闻》便说共产党的势力低落了。但是，它不得不说：“因为警察禁止集会，共产党现在格外努力作起口头的个人宣传来了，每一星期日、节日，每有四五个人的地方，他们都利用机会宣传赤化……共产党专门鼓动工人组织工会，毗登若尔（Bitinyorg）及白达维亚（Batavia）地方的车夫工会又成立了，听〈说〉他们快要罢工。白达维亚的织呢业工会已经受共产党的影响，爪哇的码头工人也要求增加工资了。……”《爪哇新闻》看着这些赤化运动，害怕得不得了，希望警察严重地办理。可是，实际上警察的手段已经高明到万分，他们雇用流氓，武装他们和工会捣乱，暗杀工人领袖，指使许多工贼分裂工会，在内中做暗探。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作者亲身受到这种袭击！

然而，警察的压迫虽然厉害，禁止一切集会和游行，去年中国五卅运动时，爪哇共产党始终举行了各地的大示威，援助中国。如萨腊勃（Sarabuy）地方的示威游行，有一万工人到会，其中有二千中国人。共产党员亚里明（Alimin）、摩勒莎（Molso）、谢第波（Sedibio）等都有演说。亚里明同志已经为了在糖厂里宣传坐了好几年监狱，这次又被逮捕，想必一定要驱逐出境了。警察甚至逮捕共产主义妇女俱乐部职员，说俱乐部中容纳十八岁以下的女子做会员是犯法的。棉兰（Medin）地方被捕工人的妻子几百人示威，警察竟用“克别皇刀”（Klevanti）和皮鞭乱砍乱打，受伤的不计其数。

可怜爪哇的平民，你们没有懂得上海的所谓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主义”，没有懂得这些中央委员：邹鲁、居正、谢持、叶楚伦、邵元冲、沈玄庐等等的“学说”（见该中央委员会告国民书，参考新青年本号《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篇）——你们在自己民族没有独立之前，不好援助中国的呵！你们也不懂得戴季陶先生的“仁爱性能说”，你们也应当劝告荷兰资产阶级，诱发他们的仁爱性能，你们不应当实行阶级斗争。他们没有发现仁爱心之前，你们没有示威、游行、罢工等的资格和权利。可怜的爪哇男女平民呵，你们怎么不先研究研究我们“东方”的这些大哲学家的学说！

三、危机中的波兰

列宁在五年前便说的：波兰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必然要破产，波兰的民众不久便可以看透他们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的内幕。（列宁一九二一年《致波兰同志》书里的话）果然，这所谓国家主义政策的结果，已经彻底暴露了。

现在波兰的工业陷于极大的危机。农工银行业家联合会上波兰总统魏赤霍夫斯基（Voisehovsky）的呈文，都直说波兰全国大工厂工人之中，已有百分之四十失业，还要加上小工业、手工业中失业的二十万人——因为大多数工厂倒闭。波兰国库每年的支出现在要二百万“兹洛托”（Zlotoy，波币名），而据英国财政专家犹葛的计算，波兰的国库支出无论如何不能超出八十四万，所以即使政府能减少支出到一百五十万，还是相差太远。因此，政府便不得不大批地发行纸币，弄得纸币价格大跌而特跌。一般民众穷困不堪，国内市场因此大大缩小，工业自然要破产。国外市场呢，也是如此。照理说，波兰东邻苏联、西接德国，应当和这两国的经济关系弄得好些，便不愁国外贸易不能周转。事实上却因为波兰资产阶级受法国的操纵，对俄、对德都想实行侵略，外交关系至今没有弄好，到如今还不肯签订平等的商约。波兰的农民问题，也是至今没有解决。波兰的“赛摩”（Seim即国会）所通过的《农地改良法案》，完全只顾及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地主阶级尚且还要反对这种改良。波兰即在这种各方面的经济危机里，政治上的紊乱也就继续不断。“赛摩”已经成了中国式的国会，万人唾骂。官僚的贪婪简直不堪言状，据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官式报告，尚且说国家预算四分之一以上是被官吏侵吞的。波兰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所谓社会党的唯一宗旨，便是防御民众的革命，因此，军警的用费超过国家预算的二分之一。资产阶级政党现在尽着想法借外债（大半是向英、美借），拼命地卖国——将波兰的一切矿产及国家专利的工业，都零零碎碎地抵押出去。同时，国家民主党的军阀西夸尔斯基（Sikorsk）将军及独夫白尔摩斯尼茨基（Dovber-Mucnitsky）将军和小资产阶级国家主义派的俾勒苏德斯基（Pilsudsky）将军等，却正在商量怎样实行军阀专政，取消劳工立法，镇压革命运动。资产阶级的报纸已经公开承认，说波兰的政局是“或者莫斯科，或者罗马”，便是非无产阶级独裁制，即资产阶级军阀专政。可是工人、农民之中，革命运动最近大大地奋进。一月八日的华沙（波兰京城）电说：那天有好几处失业工人的集会，人数总共在五万以上，想举行示威运动，到国会门口去要求，警察虽然竭力地驱散群众，然而国会议长始终不能不招待代表团，答应代他们向政府要求发给失业津贴。共产党议员斯克里泼（Skripa）演说：“我们共产党认为现时组织工农联合战线已成历史的必要，国会里的共产党党团已经公开地邀请一切反政府派（中兴党、独立农民党、白俄工农联合会、农民

联合会），共同为工农政府而奋斗……（《共产党告各党书》），只有劳动平民的政府，能解决工业、农业的经济危机，能脱离西欧、美洲各国帝国主义的操纵，能和苏联无产阶级合作，而保证波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波兰共产党首领之中，现在有许多人如朗楚茨基（Lantsutsky）等还在监狱里，有些如郭腊史（Gorach）已经因受狱中的虐待而死。波兰监狱中的政治犯超过六千人，竟受着非刑拷打。“民权主义的波兰”早已在民众眼里完全破产。一月十七八日的波兰电信说，最近失业人数的增加每星期总在一万人以上，官场报告失业工人总数已有二十七万，上西里地方的冶铁业，算是波兰最大的工业，现时只有一万人做工，而三万工人已经歇业。其余地方可想而知，大半便是在厂，工人也不过一星期做三四天，只得三四天的工资。这许多失业群众里只有九万多人领得到极少的津贴。波兰劳农民众已经彻底觉悟到无产阶级独裁制的必要，革命潮流这次恐怕一发而不可止的了。

四、德国的革命新潮

德国自从第一次革命（一九一八年）为社会民主党所出卖之后，已经逐渐地变成完全的大资产阶级专政，对外也成了列强的半殖民地，担负巨额的赔款，经济恐慌，纸币跌落，一直到最近，总是继续不断。这中间已经经过两次革命潮流：一是在一九二一年，一是在一九二三年，都因社会民主党的阻滞破坏，甚至于暗杀李卜克纳黑德和卢森堡女士及共产党自身指导的薄弱而失败。自从《道威斯计划》实行，资本主义略略得了些稳定，社会民主党又急呼大叫其“改良主义”胜利。可是最近二三个月来，情形又大变了。一月初的柏林电讯说：德国所有的工业区里失业者又大增加，去年十一月下旬，失业者从四七一·〇〇〇人增加到六六九·〇〇〇。汉堡、吉尔、刘纳堡等处，都有失业工人的示威运动，虽然社会民主党中央和德国黄色总工会的首领拒绝指导这些运动，而在各地方它们的支部和分会却不得不与共产党合作。共产党领袖赤德经女士（Klars Zetkin）在鲁尔群众中的工作，取得了非常大的影响，工人大半都赞成共产党的主张——将鲁尔区房屋所有权付之全民投票，以决定是否将法兵所据房屋归还地主还是收归市有。

这种经济大危机和民众革命化的形势，使各阶级及政党都不能不急急公布对于时局的主张，而进行革命的阶级奋斗。德国工业家总会、黄色的总工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经济政纲，都在今年年初公布。资产阶级对于经济危机的观察和社会民主党是相同的：它们都以为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照例的循环危机，过这难关，不久便有工业大兴盛的时期来到。因此，社会民主党也不过劝告资本家，不可利用停闭企业而同时减低工资。它们俩都主张实行“欧洲关税同盟”以抗美国的输入。社会民主党和资产

阶级不同的主张仅仅在于内政方面：工业家总会要求减低直接税，尤其是收入税，“以助资本之积累”（戴季陶的《劝告主义在德国“仿佛”也行不通》），它们并且主张减低工资废除八小时制的契约（有些工厂已因罢工而订立了这种契约），取消输出的限制，赞助“加迭尔”（各资本家联合规定同业货价）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则主张增高工资并增加社会保证的津贴费，要求八小时制的法律——即批准华盛顿一九一九年的劳资会议，“以医治资本主义之病态”。共产党呢，认为德国现时经济的危机，已经不是通常的循环式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的末路。因此，以为要救德国的社会经济，非一切大生产收归国有不可；现时的失业问题，只有由国家支出公费继续开办已停工厂来解决，而失业工人的工资应照常发给——至少也需百分之八十（国会共产党党团新年时的宣言），并对于日常用品免税，禁止勒收小农的田租和赋税，与苏联订立宽大的商约，以推广德货的销路而救济失业。

德国新近在洛迦诺会议上又受了几重的束缚——得了加入国际联盟的“大荣幸”，可是要帮助列强用兵侵袭苏联。洛迦诺会议之后，美国竟邀它加入华盛顿对华的九国盟约，这当然和一九二一年的《中德条约》废除领事裁判权等相冲突。列强强制德国加入它们反苏联和一切弱小民族的联合战线，只有使德国变成波兰等相似的半附庸国，无从保障自己国家的利益。现在德国的革命潮正在继续昂进。一月初旬，柏林一市的失业工人从十六万增加到十七万一千，莱茵区域已经有二十四万六千失业工人领国家的津贴。最近柏林市议会选举中共产党票数骤然增加，群众的左倾，便可以看出。社会民主党因此都不敢加入内阁，甚至于国会中的右派，所谓国家党，也不得不承认《道威斯计划》之不可能（一月二十八日路透社电）。同时极右派的路德内阁竟以极可笑的投票法（一五〇人拒绝投票，一四九票反对，一六〇票赞成）得到所谓“国会”的信任，加入国际联盟（可见国会制度的破产），政府正准备着高压政策对付工人。最近，失业工人不久便要到百万之数；农业虽然丰收，却因大地主和奸商的操纵，物价日益高涨，贫民饥荒不堪；国家的关税既受外人操纵，便拼命剥削业税，以三分之一的全国收入付赔款和外债利息……这种形势之下，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终究要刷除德国资产阶级，不容它做列强的爪牙呵！

五、寡头政治的美国

美国一九二五年九月开始，便有煤矿工人的罢工，直到今年二月初还没有解决（一月底的新闻仿佛说是解决了，可是二月二日的电讯又说决裂了）。美国资产阶级现在总算是混世魔王，它既有大多数的“异种奴隶替他做牛马（美国的苦力和下等工人

都是东欧、亚洲等小民族)，自然就有剩余的利润“贿赂”劳工贵族。可是欧战以来，美国资本的“和平”发展已经不能再继续了。资本家的向外发展和对欧亚的投资，使他们不得不揭去一切民主主义社会改良的假面具，努力榨取工人的血汗，以取得这些资本。欧战直到一九二三年，资产阶级拼命地向工人进攻，要想收回战时贿赂高等工人的一切“改良”政策。于是职工运动里的“官僚”——工贼的一切阶级妥协理论，都变成了资本进攻的武器，群众之中开始左倾的运动，职工运动的左派形成了“劳工党”（Workers Party）及“职工运动宣传同盟”。前年和去年两年之中，左派的发展和群众的革命化虽不能说很快，然而，因为工业的恐慌和失业者的增多——尤其是煤矿里（去年无烟煤矿有十六万工人的大罢工，而其他煤矿中有二十万工人失业）加上反动的、妥协的工会首领勾结资本家政府压迫、暗杀左派领袖，工人之中对于首领的不满，已经非常激进。譬如缝业工会里，左派便占了胜利（纽约缝业工会，共产派已被选），煤矿里左派的势力尤其膨胀。刚白思（Gompers）派的“改良主义”（如矿工会长路维思等），现在专心于排斥共产党，处处表现他们站在资本家方面，尤其促进工人群众的共产化〔刚白思死后，葛林（Green）继他做美国劳动联盟的会长，竟直接受银行家的命令，开除工会中的共产派〕。这次罢工里，改良派的妥协一定更使这一过程有深入广出的发展。

美国的“民主主义”，真可算天下闻名的了，可是实际上的政权，只在几个银行家手里。美国的资本，现在已经有侵吞全球的气概：一九二四年美国输出的资本有一·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一九二五年存一·三四六·〇〇〇·〇〇〇美金，欧洲、南美、加拿大、澳洲、亚洲都有它的资本。因此，财政资本界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便占绝大的势力，力求操纵指挥。最近美国参议院里，代表地主与工业资本的政党（美国本来并无所谓民主党和共和党，实际上只是实业党和银行党罢了）竭力攻击政府与意大利订立的外债契约，指出大银行家莫尔冈（Morgan）的操纵外交：政府与意大利订的外债不满一分钱的利息，而莫尔冈私人在这约签订后十天，便借给意大利一笔债，利息有七分之多，而且有极大的回扣，显系私人谋利，使国家吃亏。总之，美国的对外侵略，因为国内资本的膨胀，已经不能不引起内部的种种冲突，资产阶级各派都想操纵政权以求私利。结果，当然是财神的全胜。所以美国不但说不上“民权”，连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都说不上，只是寡头的财神政治罢了。意大利债约问题，始终是银行界胜了。美国《道威斯计划》的对于德国、波兰，煤油政策的对于墨西哥、土耳其、苏联，处处都表现这种侵略。

美国的殖民政策比较别国要晚些，可是欧战后它成了世界的财政大王，甚至于要想以资本力量使德国、波兰都变成它的殖民地。美国殖民地政策也因此和荷兰、西班牙、英国、日本、法国等不同。英、法等大概以商业开始侵略，结果竟使弱小民族完全变成属地（如印度、安南），直接受它们的统治；美国却以投资政策攫取别国的财政权，表面虽然不用显露的、残酷的直接统治方法，实际却能掌握弱小民族全体的经济命运。可是，读者不要以为美国的殖民地政策仅仅有“文明式”的，而没有野蛮式的。菲列滨的美国统治也就够野蛮的了！菲列滨的国民党和民主党现在已经联合，各地都有了这一联合党的支部，最近它发表反抗美国帝国主义，要求独立的宣言：“所谓民主主义的美国侵略，何尝比日本、英国的野蛮殖民地政策好些！”菲列滨的民族解放运动近年来有极大的发展，甚至于“土人”军队里的兵士群众中，都已伏着极大的“危机”。美国人机关报上说：小吕宋地方，时常有极大的示威运动，民众和兵士参加的往往在五万人以上。罢工运动在近年来差不多没有一个月间断过。最近——一九二五年年初、小吕宋的烟厂罢工，人数虽只九百，却已坚持了三个多星期；汽车夫的罢工里，甚至于焚毁了好几家汽车行。美国资本家利用白党俄人去破坏罢工，弄得和罢工工人双方惹起极大的冲突（一月初）。小吕宋地方的民众，对于苏联极表同情，他们反抗美国帝国主义的表示，往往和同情于共产党是相并而行的。小吕宋美国军队里的士兵每每公开地说：

I am a bolshevik!（我是布尔塞维克！）

六、所谓大英帝国主义

英国现时的经济状况也趋于恐慌了，尤其是煤业里的劳资争执问题和生产过剩问题。自从工业汽机应用煤油以来，煤的销路，不免大减，因为煤油比较便宜。于是英国资产阶级大宣传其“煤市赤化”——仿佛苏联输入英国的那一些儿煤油，会把英国煤的销路都夺了去似的，这当然是挑拨恶感的谣言。他们同时便主张增加煤矿工人的工作时间，并减少工资，以“减轻煤的成本”；煤业家联合会一月十日便发出的声明书上，甚至于要减少铁路工人的工资，“这才可以减轻煤的运费”！最近，包尔温首相在国会开幕的时候，竟说：“华盛顿国际劳资会议（八小时的工作制）议决案，英国在其他各国没有批准的时候，是万不能批准的。”（一月二日电）英国经济的恐慌，只要看资产阶级这样窘迫地进攻，便可以了然的了。

英国在国外贸易上，去年已经敌不过美国，这是“大英帝国”的命根。于是它不能不出死力争来，不用说对于中国（五卅案），对于土耳其（摩塞尔问题）施行侵略，并且去年英国从印度边境造了一条铁路到阿富汗，对于亚洲原料的掠取，现在已是一

步都不能放松的了。便是对于澳洲，英国也更加加重地剥削和压迫——殖民地政府在今年国会开幕的时候，便提出镇压革命党和取缔妨碍交通的法案。可是大英帝国的基础，却并不因这些政策而比较稳固些。英国工人阶级之中已经有显然革命化的左翼形成；英国的工会运动（Trad union），从此决不再和“改良主义”同一意义了。左派的工会已经有百余万的群众，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伦敦工人的示威运动，派出六百个代表（代表八十余万工人的伦敦各工会），要求释放被捕的十二个共产党员；监狱前万余人的群众集会，主席便是全英矿工工会会长顾克；独立劳动党的议员伦斯白黎等的声望，在工人群众中已经打倒了麦克唐纳的劳动党。顾克、伦斯白黎、矿工总会、独立劳动党等等，这便是英国无产阶级左派的大联盟，他们反对麦克唐纳等妥协派。在去年年初，他们已经在英国全国总工会里通过赞助“世界职工运动统一”的议案，因此成立了英俄工会联席委员会，进行统一运动，这一委员会的职任，便是实现各派联合的世界总工会——工会国际。虽然黄色职工国际的首领到处造谣，反对工会统一，然而这一委员会的宣传和工作，确有非常之大的影响，法、德、美、瑞典、挪威等国工人群众之中，统一的口号现在已经非常普遍。去年八月间，英国工会在斯加波罗开全国代表大会，左派居然得到优势，如今英国总工会的执行机关中，左派已占多数。我们看斯加波罗大会的议决案：如（一）英国工人阶级应当赞助殖民地独立运动，甚至于赞助它们脱离大英帝国；（二）主张容纳一切派别，共产党当然在内，组织真正的世界总工会；（三）主张组织工厂委员会，打破限于职工组织的习惯；（四）反对《道威斯计划》。这岂不是英国工人运动中极大的关键？工人群众的革命化，非常明显地已经抛弃了“英国式”的守旧主义了。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如何能不动摇呢？洛迦诺会议之后，英国各殖民地，如印度、澳洲等，都表示反对，声明这一协约不能束缚殖民地。英国军舰“Vindictive”号上，最近（一月十五日消息）发现许多“赤化份子”，据说英国海军里“到处都有英国共产党的宣传品发现。大英帝国之‘大’，恐怕也不久了！”

一九二六年二月

并非闲话

蒋光赤

一、先从反共产说起——反共产与吊膀子

“夫反共产与吊膀子，迥然两事也；以迥然不同之两事，而硬拉之为一谈，此岂非别扭而且不通也哉？……”在下本欲写将下去，好完成一篇美丽的古文，但重复回头一读，则觉着自己所写的几句文言，简直不成东西：既无“吾兄太炎”章士钊总长老虎口中的风格，又没有“克莱孟梭是吾师”曾琦先生老狮屁下的香味，而又欲自称之为美丽的古文，这岂不是不知自量，而犯狂妄的毛病吗？因此，在下写了这几句之后，就决意不再写所谓士大夫所崇尚的文言文了。好在我生为民国之民，不顾做及第龙门、挂名金榜之想，就是做不好文言文，也没有什么大要紧，不算得一回丑事。

这是几句闲话，现在且说说“并非闲话”。

现在顶出风头的，要算反共产这位先生了！无论我们拿任何一种出版物来看，我们都可以找出反共产这几个字来，并且还有一些爱国（？）的先生们，不辞劳苦，精心致意地专门办周刊杂志为反共产鼓吹，如《革命（？）导报》《醒狮周报》《国魂》《国光》《独立评论》《独立青年》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所出版的东西，几乎以反共产为唯一的材料，倘若把反共产这三个字取消不说，那他们就不能下笔，好文章就做不成了！反共产有保皇党、无政府党、军阀、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文明绅士……他们头上所顶的徽号虽不一样，而他们异口同声，义愤（？）填胸，热心反对共产是一样的。他们这一种联合战线，简直极今古之奇观！例如保皇党可以与无政府主义者相联合，文明绅士可以与帝国主义者相联合……五花八门，奇妙无穷，就是孙悟空齐天大圣下世，其所做出来的花样，也不过如此的奇特罢！当今之世，有观看这种从前大战所未有的联合战线之机会，岂不是一件幸事吗？幸事，幸事，的确是幸事啊！

我于十分荣幸之中，发现了联合战线中之吊膀子的作用。我这种发现虽然比不上牛顿对于地心吸力和爱因斯坦对于相对论的阐明，但诸位也不能加以小觑呵！即如我把反共产与吊膀子这两件事体拉在一起，就足能够使诸位大吃一惊，并且非同小可。

不过在另一方面，我请诸位又不必过于惊奇，因为我所发现的这种吊膀子，说穿了，真是卑之无甚高论，没有什么可以令人惊奇的地方。

“你把反共产和吊膀子拉为一谈，这简直是胡闹！反共产为一事，而吊膀子又为一事，如何有拉得拢的可能呢？”

“反共产是政治上、主义上的事情，而吊膀子则为男女间眉去眼来的事情，分明是迥然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情，而你先生居然拉在一起，而且当做文章做，这不是胡闹，就是莫明其妙，此外没有二话讲！”

“……………”

我知道如此骂我的人一定很多，但在我未将我的理由说出来时，我认为这种骂是合理的。现在且说一说反共产中吊膀子的作用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你们大家都知道鼎鼎大名的以社会党首领兼复辟党大将的江亢虎先生罢？他不是被段祺瑞聘请为善后会议的会员么？他的这个善后会议的会员从什么地方得来的？段祺瑞请他在善后会议中宣传社会主义？他是被人民选举出来的？不，不是呵！他的这个善后会议会员的地位，是用吊膀子的手段得来的。你们大家当然都知道段祺瑞痛恨共产主义并不亚于曾琦、张作霖或英、美、日帝国主义者。江亢虎先生顶着社会党首领的资格，极力陈述于段祺瑞陛下之前，表明自己是反共产的大将，段祺瑞龙颜大喜，遂说：“好宝贝！你反对共产吗？这真是我的好小子呵！虽然你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但这不要紧，只要你反对共产就可以了。来，来，我娶你做一房小老婆！”于是，呵，于是江亢虎先生就摇摇摆摆地进了善后会议大厅，备尝荣宠之味了。这不是反共产与吊膀子联合一起么？

论起主义来，则保皇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算是极相反对的了。照逻辑学来说，凡相反对的东西当然是不会相联合的，但是现在世道变了，逻辑先生之道不行，不能再施行自己的法力了。保皇党偏偏能与无政府党组成联合战线，保皇党报纸的社论，无政府党可以为之执笔。这也许是达尔文进化论是真的罢？什么东西是都可以进化的，都可以改良的，大约现在的保皇主义变成为改良的保皇主义了，无政府主义变为进化的无政府主义了。在下学识浅陋，对于改良的保皇主义和进化的无政府主义，没有深刻的研究，不敢多有所批评。不过他俩既然能结成联合战线了，这联合的中间必定有一条牵线，使他俩有联合的机会。于是在下虽非天才，然由精心寻找之所致，遂发现这一条牵线，是“反共产”这位红娘。张君瑞向莺莺送一秋波，悄悄地说一声反共产；莺莺也就点点头，嫣然一笑，柔媚地说：“我的心意同你的一样，你真是我的如意郎君啊……”这么一来，诸位保皇党与无政府党就鱼水合欢了。

这种新式的吊膀子，实在是时髦第一，到处风行。陈炯明叛变革命政府时，不曰

自己是反革命，而曰自己是反共产，借此可以送秋波于香港，吊膀子于北京。张胡子、吴秀才、李景林、孙传芳……哪一个军阀的通电上，不标明自己是反共产的大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肉麻呢？这件事情很明白了，欲得帝国主义者的欢心，就不得不秋波一大转，而反共产的一口号，于是成为吊膀子的工具了。

至于现在专门办周刊、杂志鼓吹反共产的一些先生们，虽然蒙着什么什么主义的假面具，但在实际上，又谁知他们不是借着反共产的莺喉，而要博得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宠爱呢？

呵！反共产与吊膀子……

二、谁个主张在现在中国就共起来？

“夫共产主义乃一极好之理想也，然无实行之可能；若有人不问社会之实际，而冒然胡行共产主义，则吾人必极端反对之也！”文明的绅士文质彬彬地这样说。

“共产主义实行之日，即中国亡国、亡种之时，故共产党较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尤为可恨！”国家主义者板起爱国的面孔，大声急呼地这样说。

“今日之中国乃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实行共产，于国民革命本身上有绝大的妨碍。”国民党右派冒着中山先生的招牌，张着反共产的专门特口，像煞有介事地这样说。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我们的财产好容易用许多精力赚得来的，共产党要来共我们的产，这还了得！我们非拼命不可！”一般资本家、商人、地主……惊慌失色地这样说。

“共产之祸过于洪水猛兽，赤化之徒实真害国殃民……”，军阀在自己的通电上、布告上、口头上，摆着为国为民的架子这样说。

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又要摹仿两句八股式的文笔，作为以上的结论：“甚矣哉，共产之为害也！国家主义者、资本家、国民党右派、军阀以及文明绅士诸先生，咸以共产为隐忧，甚有饮食不安之大虞。呜呼！共产之为害甚矣哉！”唉！糟糕！这几句又被我写得牛头不对马嘴了！幸亏科举制度未恢复，不然，我一辈子连个秀才也中不了，又怎能像曾琦先生有中状元的希望呢？

举国汹汹，众口啧啧，就同共产的大祸就要临头的样子，说不定明天，或后天，或再过一个月，中国共产党就要大共产起来。小子不敏，但对于共产一端，自问也甚为注意，虽不敢自夸为赤化之流，然却深恨白化之人（读者注意！这几句文不文，白不白，真是有点不通罢？不过我说的并非闲话，请读者勿以辞害意！）我想，中国共产党主张现在就共产与否，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知道，非他人所得乱为推测。于是我搜

集中国共产党所刊行的出版物，寻访中国共产党党人，研究一研究他们是否今天或明天或后天就要实行共产起来。但是没有一种出版物和一个共产党人对我说过，他们现在就要共起产来。他们都似乎说：“中国现在还未到可以共产的程度。我们现在首先的工作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我们现在虽然从事共产主义的预备，但现在并不主张就共起产来。”

我真莫明其妙了！究竟谁个主张在现在中国就共起产来？中国共产党本身既不主张现在就共起产来，那么，可见得今天，明天，后天，或再过一个月，不至于发现共产的恐慌了。为什么出过洋的国家主义者、学问过人的文明绅士们，也跟着军阀、资本家、地主……吓得屎尿横流，大喊反共产不亦乐乎呢？这些先生们放着国不去爱，放着“外抗列强”不去做，放着“内除国贼”不去行，而天天以反共产为做文章之资料，为自身唯一之天职，这岂非浑蛋也哉？

“不！不！你先生说错了！他们并不是浑蛋：第一，他们以为共产党比军阀和帝国主义者还可恨，国可亡，而共产则不可实行。第二，反对帝国主义者则必受帝国主义的忌恨，反对军阀者则必受军阀之摧残，这都是危险的勾当，为智者所不为；智者既不愿冒险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而同时又何乐而不反共产以吊“帝”“军”之膀子。反正他们被警察、巡捕赶在“地底下”，无奈我何，于是就得到了这个反共产的题目。这个题目比一切都容易做，真是一可以借之以出风头，二可以借此摆摆中兴名将的架子。先生！你想想，这是多么聪明，如何能说是浑蛋呢？”

呵！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呵！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革命日志

(一九二六年一月)

一月一日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会，到会代表一百七十余人。汪精卫主席演说，略谓：总理虽死，而总理之主义未死；总理之生命在主义，故吾人应本总理之主义而奋斗。

天津市民为欢迎国民军入津及释放出狱之各界联合会代表（前被李景林拘捕），在南开操场举行市民大会，到会群众一万余，切实提出国民军应与人民结合之口号，并主张反对日本出兵。

湖南教育界反日大同盟召集各界在教育会开国民大会，军警压迫无效。开会后由熊亨瀚主持，议决：（一）对日断绝国交，即刻驱逐日领、日侨、日舰；（二）继续经济绝交；（三）请国民政府及国民军以实力解除日本在华武装；（四）声讨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李景林；（五）反对沪案重查，解散关税会议；（六）拥护广州政府，并请召集国民会议，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

河南成立女界联合会。

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正式成立。是日到会各区党部代表八十一人，恽代英主持，选出委员。议决：（一）发表成立宣言；（二）要求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除西山会议之首领林森、邹鲁、谢持并分别惩戒其他参与之分子；（三）电勉国民军。

汕头各界举行市民大会，庆祝广东统一，并督促国民政府在最短期间出师北伐。由市党部代表廖其清主席通过：（一）驱逐段祺瑞；（二）反抗日本出兵；（三）督促国民军及郭松龄；（四）援助上海被捕学生；（五）拥护广州国民政府等五决议。

上海丝厂女工会会长穆志英，五卅时反对对外罢工，各丝厂颇受其惠，又曾呈请军警当局及租界捕房，禁止工人运动。是日有工人七八十人因某项事故，前往责问；双方冲突，穆被殴伤。

上海浦东各工会所联合开办之浦东工人医院，突被当地流氓雇用打手捣毁。

北京总工会正式成立，发表对时局宣言。

一月二日

开封各界举行反日出兵市民大会议决：（一）电全国各界一致进行；（二）电驻京日使请速撤兵；（三）电外交部向日本严重交涉；（四）请速免张作霖职，会后出发游行。

北京外交部电令上海特派交涉员许沅，退还工部局所交与之七万五千元恤金。

上海学生联合会致电国民军诸将领，请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并保障人民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厦门各界集议筹备反日出兵市民大会。

一月三日

上海学生联合会举行同乐大会，由代表大会主席报告半年来会务，指明过去偏重政治工作，表示此后应分力注意于学生本身利益问题。

河南青年学社、河南青年社、河南青年干社、河南青年救国团四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决议联合组织河南青年协社。

湖北省农民协会开成立大会，到会有黄冈、黄梅、汉川、黄安、黄陂、枣阳、应城等十余县代表，选出委员，并议决发表成立宣言。

一月四日

上海特派交涉员许沅将七万五千元恤款退还工部局。

中华民国全国学生总会为否认沪案重案结果，致电北京外交部及全国国民。并派代表向各团体接洽，请一致行动。

上海复旦、南洋、大同、光华、政治、大夏、国民、持志等八大学联名致电北京外交部，请贯彻旧提十三条件，为解决沪案标准。

九江学生联合会为反对日本出兵满洲，发表宣言。

前因援助同兴纱厂工潮及反对日本出兵，在上海小沙渡一带被捕之学生，由公共廨判决，除将传单没收外，各罚大洋三五元不等，其所指之罪名为学生不应参加政治集会。

汕头艇夫郑丁、郑灶，载日人两名，往搭乾坤丸日轮，日人不给船资，反动手殴打，并将郑灶推落海水，生死未明。后经汕头交涉员马文车向日领提出五项要求：（一）拘拿凶手，依法惩办；（二）审讯时须知照中国官厅观审；（三）向汕头市民及国民政府道歉；（四）赔偿损失并优恤家属；（五）担保在汕日侨不再有野蛮举动，并速电日政府撤退调往东三省军队及履行汕头复工条件。日领鉴于国民政府历来外交之强硬，遂于狡辩日本出兵业已撤退之下，承认五项条件。

一月五日

何应钦在汕发表《告国民党同志书》，申述中国国民革命之成功，必须依赖全国最被压迫之工农阶级，而共产党与国民党既同立于打倒帝国主义之战线，值此帝国主义勾结军阀一致进攻之时，何可遽行分裂。并谓愿守蒋介石“不为革命，即为叛徒”之训言。

沙面英领杰尔逊以迩来港政府破坏罢工之阴谋，屡为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所烛破，拿获人犯，又多按照罢工条件从严办理，特组织水陆纠察队两队，每队五十名，出巡沙面及白鹅潭一带，防止截缉仇货。

定海市民大会发表反对日本出兵通电。

厦门反对日本出兵满洲大会，到团体数十，先游行。以警厅干涉，改在十三中学开会，全体罢课罢业。

一月六日

淞沪警察厅厅长严春阳向各岗警散发传单，说过激党比洪水猛兽还要厉害，中国人同是黄帝子孙不必学他们干。

上海内外棉纱厂第五厂工人要求释放工人钟小工子，厂方不允，晚间全体罢工，次日第四厂等工人亦相继罢工，后以捕房将钟释回，风潮乃息。

留日关西同学会回国代表邱浩抵沪，宣传日本出兵之真相及奉、日密约内容。

一月七日

浙江省会各公团联合会发出通电，反对日本出兵满洲。

武汉各界团体召集二次代表会，议决发表宣言：（一）反对日本出兵满洲；（二）反对任何帝国主义者派兵驻华及参加内战；（三）请国人一致声讨张作霖；（四）主张对日经济绝交。

无锡申新、振新、广勤、业勤、豫康、庆丰六纱厂工人四百余人，在惠泉山至德祠内开谈话会，议决每人每月提工资一日，组织公所。

全国海员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开幕礼，到会代表一百余人，对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打破帮口、组织问题、运输工人大联合等均有重要决议。

名古屋留学生在青年会追悼郭松龄，被日警捕去三人，翌日又捕去三人。

一月八日

汕头木业工会纠察队将破坏罢工之邓阿木扭交警署，署员袒邓，压抑工会，工会乃群赴警署质问，并游行示威。至十一日晚，岗警突然罢岗。

南京学生联合会为求反日运动之持久起见，特议决组织反日出兵行动委员会，并邀各团体一致加入合作。

上海孙文主义学会亦通电主张召集国民会议。

上海学生联合会为否认沪案重查结果，致电北京外交部并通告各校学生会。

一月九日

苏州蜡烛业工人六百余人全体罢工，要求工资由每月九元六角增至十元，并改除每年六、七两月工资以十月计算之向例，增为十二月计算，警厅严加压迫。

孙科、吴铁城回粤。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通电否认沪案重查结果。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否认沪案重查结果。

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否认沪案重查结果，并主张民众团体继续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出通电，否认林森、邹鲁、叶楚傖、沈定一、居正等在沪、汉等地所设之中央委员会与党部及其他一切行动。

一月十日

上海各团体联合会开成立大会，到会团体七十余人。由学联代表余泽鸿主持，议决：（一）反对日本出兵满洲；（二）对沪案主张贯彻十三条件。并发表成立通电，选出委员。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在中山中学开成立大会，到会代表二百余人，议决反对沪案重查结果，继续五卅运动，反对日本出兵及注重农工、妇女运动等要案。

上海各公团联合会通电，主张召集国民会议。

中华女子参政协进会、太仓旅沪青年会、河南青年学社上海特别分社，通电力争五卅惨案结果。

张家口举行反日示威运动大会，议决：（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东三省，侵犯中国主权；（二）全国民众对日一致示威；（三）否认奉、日一切密约；（四）继续抵制日货，与日本经济绝交；（五）帮助国民党和国民军继续反奉战争，根本铲除奉系军阀，惩办国贼张作霖；（六）推翻勾通奉系的段政府，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集真正国民会议，建立国民政府；（七）反对关税会议，宣布关税自主；（八）反对直系军阀萧耀南、孙传芳、方本仁压迫民众运动；（九）援助沪、汉被捕爱国同胞；（十）否认沪案司法重查报告；（十一）力争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十二）追悼反奉战争阵亡兵将。

一月十一日

全国学生总会召集特别执行委员会，议决对时局主张：（一）促国民军与人民联合，继续反奉；（二）警告冯玉祥勿停止反奉；（三）反对直、奉之反国民军联合；

(四) 反对护宪、反对法统；(五) 促段祺瑞下台，并反对许世英组阁；(六) 由人民团体与国民党、国民军、广州政府组织临时中央国民政府，并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议。

上海总工会发表对时局宣言，主张：(一) 促段祺瑞立即下野，肃清安福余孽在政治上的势力；(二) 劝冯玉祥勿取消极态度；(三) 督促国民军与人民结合，加紧反奉战争；(四) 反对奉、直之反国民军联合；(五) 组织临时中央政府。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发表对时局宣言。

一月十二日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致电广州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请令党军速行率师北伐。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致电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冯玉祥，并通电全国，宣布对时局之意见。

国民党开除之反动派辛亥同志俱乐部，集议捧黎黄陂上台。

旅沪川人集议为刘华雪冤。

苏州成衣工人要求增加工资。

上海新怡和纱厂工人袁德永因早晨进厂时，迟到三分钟，被看门人扭住痛打，倒地后看门人以其假死，更拳足交加，送院诊治无效，未几毙命。

一月十三日

丁晓先等四十余人于刘华被淞沪戒严司令部秘密执行枪决事件发表《人权保障宣言》，主张：(一) 非确有犯罪嫌疑之人不得逮捕，逮捕应由法院发拘票，其为军警依法逮捕者，二十四小时内移送法院；(二) 非现役军人不受军事机关审判；(三) 无害公安之集会、结社应加保护，非详明宣示其理由不得限制其活动；(四) 游街、斩首及秘密行刑，应一律禁止。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宣言：内容详述国际、国内政治状况，并如何接受总理遗嘱等。

日本公使照会北京外交部，请制止人民反日运动。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通电主张组织临时中央国民政府。

上海各团体联合会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对时局发表宣言，并致电广州国民政府国民军诸将领，且警告吴佩孚。

广州海员总会及联义社在广大礼堂开会追悼刺杀洪兆麟而自杀之韦德烈士。

一月十四日

北京市民在天安门开反日国民大会，到数千人，徐谦主持，议决：(一) 抗议日本进兵南满及一切暗中援助卖国贼之行动；(二) 通电全国各界，组织全国反日敢死军，准备对日宣战；(三) 抵制日货，经济绝交；(四) 推举筹备员，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义协会；（五）惩办卖国贼段祺瑞、龚心湛、曾毓隽、汤漪、章士钊、梁鸿志、陈宦、段宏业、姚震、李思浩、朱深、屈映光，由军警当局负责逮捕，交由国民大会审判；（六）照中山主张，召集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七）制定《工会条例》；（八）取消《治安警察法》；（九）撤消领事裁判权。

上海总工会举行救济失业工人周，并致函各团体，请一致赞助号召。

全国学生总会通告各地学联会：（一）按照总会对时局之意见，一致努力宣传；（二）一致援助学总会代表及武昌、福州两地学联职员被捕事件；（三）声讨萧耀南压迫学生运动。

上海学生联合会为否认沪案重查，发出致各校同学书。

广州国民政府责成李福林、吴铁城，限一月内将刺廖凶手朱卓文拿获，逾限严惩；又加委林祖涵、王懋功、卢兴原、沈应时四人为审判委员。

国民二军将领邓宝珊通电：（一）军阀议员口衔天宪，以法为市，名为恢复法统，实则儿戏大法，法统问题，应付国民会议解决；（二）段为民敌，无待犹豫，应勿恋栈，以重民怒。

一月十五日

上海各团体联合会通电否认沪案重查结果，并反对日本出兵满洲。

杭州学生联合会发出告全国同胞书，略谓：吾学生处恶势力压迫之下，种种自由，尽被剥削；宜唤醒全体同学与帝国主义者作猛烈之奋斗，并望全国同胞一致援助，必得获澈底之自由。

九江圣约翰学校因当局无故开除学生八人，激成全体退学风潮，发表宣言，组织“全体学生退学委员会”。

北京国民反日进兵南满大会开代表大会，议决：（一）由大会名义向日本帝国主义提出抗议书；（二）组织追悼郭松龄筹备委员会；（三）函促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总会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议。

一月十六日

汕头市民为反对日本出兵满洲，并表示对日人凶殴艇夫案之愤慨起见，举行反日大示威，到会者一万余人，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演说：应捐弃日前工警冲突之嫌，一致对外打倒帝国主义。会后出发游行。

上海国民党女党员举行大会，改选委员，并纪念妇女革命领袖卢森堡女士。

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发表对时局宣言，主张人民乘此时机夺取政权，并致电广州国民政府，请率师北伐。

广东惠州各界举行反段大游行。

一月十七日

江苏江阴顾山乡人周水平因组织佃户合作自救会，被地主劣绅控于县署，逮捕入狱，于晨间六时枭首示众。据县署宣布，其罪名为意图扰乱治安，阴谋不轨。周临刑时大呼：我是国民党党员，非盗非贼；为平民而死，死何足惧！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永远开除邹鲁、谢持党籍。

中东路局长伊万诺夫因抗议军士擅自开车，被张焕相部下拘捕。

浙江嘉兴市民举行市民大会，反对日本出兵，会后游行并高呼口号。

上海新怡和纱厂因门役程阿金毆毙工人袁德永，全体罢工，提出五项条件：（一）惩办凶手程阿金，开除大肚皮外国人；（二）抚恤家属八百元；（三）此后厂中无论何人不准殴打；（四）履行上次复工条件；（五）不准干涉工会收月费。

中国济难会举行募捐游艺大会，上海市总会同日成立，到会群众并为刘华举行哀悼。

上海学生联合会议决派二代表赴京、粤两地，与京、粤两地学联切实合作，并鼓吹国民会议。

上海各团体联合会召集代表大会，议决：（一）以代表大会名义，请求原有之国民会议促成会即时恢复；（二）由各团体联名发表宣言，攻击秘密枪杀刘华之军阀。

一月十八日

统一广东各界代表大会，为反对日本出兵满洲，召集各界在东校场举行大游行。到会群众三万余，议决：组织广东各界反抗日本出兵满洲行动委员会，为永久行动机关。

上海各团体联合会致电国民政府及北京国民党执行部，请速组织人民政府。

江苏镇江素茶馆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一律罢工。后由馆主允加工资二成而解决。

上海小沙渡内外棉第三、第十四、第十五三厂工人、童子团二百余名，为救济失业工人，在公共租界静安寺戈登路一带募捐，被捕拘去，将其募款没收，人未几即释出。

奉军张宗昌部下方振武通电改称国民军第五军，一致反奉。

一月十九日

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恢复，开委员会，定期开代表大会，实行改选，并要求各团体加入，扩大组织。

国民党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闭幕，汪精卫演说：从第一次代表大会至第二次代表大会已有不少成绩，由此可知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赖各同志努力之结果，必能获得更大之成功。今日是第二次代表大会闭会的日子，希望第三次大会大家能在北京、南京、

武汉相见。

湖北全省学生总会派赴襄樊宣传反日出兵代表包泽英，被该县知事无故逮捕，学生求释，该县知事嗾使卫队开枪轰击，伤数十人，捕去二十九人。

潮、梅关监督将五十里内常关各口完全收回。

一月二十日

上海新怡和日厂工潮解决，由老怡和工会会长调停，厂方承认三条件：（一）惩办凶手程阿金；（二）抚恤袁德永家属洋二百元；（三）不准干涉工会收月费。

一月二十一日

重庆市民举行反日出兵大会，议决《告日政府、告日国民、告国内军阀及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书》，并致电国民政府国民军。

宁波各团体及学校联合在小教场开市民大会，反对沪案重查结果，到三千余人，议决电文四通。

中国济难会以江阴周水平为主张改善农民生活，惨遭戮首，特致函周之家属表示哀恤，并赠洋五十元为治丧费用。

本日为世界革命导师列宁逝世第二周纪念，全国各市民如北京、南京、上海等处，均开会表示纪念。

一月二十二日

奉舰在大沽海面向南炮台轰击，威胁国民军。

一月二十三日

国民党右派童理璋等，借中东路事件之名，大召集其所谓“中华民国各团体联合会”，议决组织对俄外交委员会，并发表宣言，谓苏俄之共产宣传“为害尤其于列强经济之侵略”。

国民党右派沈定一在浙江召集全省代表大会，由沈报告西山会议议决案。

全国学生总会等一百卅余团体联名发表《人权保障宣言》，响应丁晓先等，表示对军阀秘密枪决刘华之愤慨。

一月二十四日

江苏松江国民外交会发起反日市民大会，议决致电北京外交团，请抗议日、奉密约，并主沪案须按照十三条件解决。会毕游行，军警有戒备未干涉。

上海总工会发起筹备“二七”三周纪念。

中华全国学生总会致电湖北萧耀南及襄阳镇守使、襄阳县知事，质问何故开枪轰击学生，并请撤换县知事叶干藩。

天津市民在南开会场开国民大会，到万余人，议决：（一）请政府速免张作霖职并

下讨伐令；（二）通电全国讨张排日；（三）反对抗国民军之一切军阀；（四）反对吴佩孚联张祸国；（五）督促国民军从速讨张；（六）鼓励慰问前敌兵士；（七）致电警告日政府；（八）致电日本国民使其觉悟；（九）对日绝交；（十）否认奉张与日所订一切密约；（十一）致电广州国民政府请一致讨张；（十二）组织国民代表大会。

一月二十五日

前被张焕相拘捕之中东路俄局长伊万诺夫已释放。

周水平之两兄弟并江阴星光社、佃户合作自救会两团体，在沪发表哀启宣言，为周鸣冤，并攻击军阀无故杀人之罪恶。

广州各界在国民党省党部开反日大会，教育界代表提出《日货调查表》及《经济绝交条例》，当场修正通过。

一月二十六日

北京许阁阁议，马君武提议废止《出版法》，通过。

国民党反动派冯自由在京发起对俄外交大会。

北京一部分学生及留日回国学生举行反对张作霖游行，反对奉、日密约。

上海总工会发表对中东路事件宣言，说明此次中东路事件全为日本帝国主义指使奉张为转移民众视线之计，并指明革命民众应了解苏俄过去援助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实为中国之好友，亦即因此受帝国主义者之嫉视，故民众在此时万不可上彼等之当，而为日本帝国主义及奉张张目。

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为江阴周水平被害事件，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并致电孙传芳质问。

一月二十七日

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园追悼郭松龄；阁员及国民军各要人均到会。徐谦主席演说：反奉战争因日本帝国主义出兵援奉之影响，而受阻碍，故吾人应联络苏俄，以求反奉、反日之贯彻。

工贼童理璋等所组织之中华各团体对俄外交大会发表对内宣言，根据“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原则，为帝国主者大肆簧舌；并妄想排斥共产主义之宣传，制止（？）过激党人之活动。

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恢复。

全国学生总会召集委员会，议决对中东路事件之态度：（一）此次纠纷，系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张作霖与苏俄起衅，借以转移国人视线，以缓和反日、反奉的空气；（二）中东路退还问题及中、俄一切悬案，应由中国政府与苏俄政府另行交涉，以求根本解决，不应受日本帝国主义及张作霖之愚弄，反为彼等张目；（三）苏俄是否绝对为中国

人好友，吾人等不能盲目肯定，唯从过去事实观察，苏俄对中国之反帝国主义运动，已表示充分之同情，在联络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奋斗之战线中，须严防敌人之挑拨离间；（四）目前日本帝国主义扶植奉系军阀重新向内伸张之时，继续反奉、反日，实为当今要务。

学生总会致电孙传芳，质问其无故杀戮周水平之罪恶。

一月二十八日

上海各团体联合会发表对中东路事件宣言，从民族解放运动之立脚点上，说明中俄两国之关系，并力辟反动派各团体联合会言论之荒谬。

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致电全国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请一致恢复，并电北京全国总会，报告恢复经过，请立即召集总会委员会讨论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之办法。

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通电反对吴佩孚进兵攻豫。

学生总会与上海各团体联合会致电鄂萧，营救襄阳被捕代表。

上海总工会致电孙传芳，质问其谋害周水平。

汕头举行市民大会，议决经济绝交条例：（一）不起落日轮客货；（二）调查旧存日货，不许再运入汕；（三）对日再罢工。

一月二十九日

中国济难会全国临时总会通告各会员：努力宣传周水平被害事件。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通电，反对吴佩孚勾结奉张进攻河南。

北京留日归国学生在通衢演讲日、奉密约内容，冀促民众之觉悟。

上海总工会通电赞助废止《出版法》，并主张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并颁布《工会法》。

一月卅日

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发表对时局宣言，主张援助国民政府及国民军，消灭进攻河南的吴佩孚，扫除奉系军阀，并以国民会议实现真正民众的政权。

全国学生总会通电声讨直系军阀吴佩孚，并通电各地学生联合会一致反对。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通电赞助废止《出版法》，亦要求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工会法》。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发起追悼郭松龄。

上海总工会发表对时局宣言，主张：（一）打倒反动军阀吴佩孚；（二）破坏直、奉反国民军的联合战线；（三）肃清国民军内部的直系余孽靳云鹗及其他；（四）赞助国民军从速结果关内的奉系余孽李景林、张宗昌；（五）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张作霖在关外势力；（六）反对荒谬的护法及护宪说；（七）由全国人民团体广州国民政

府及北方国民军，共同组织临时政府，召集国民会议，产生真正的人民政府。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致电孙传芳，请宣布枪杀周水平罪状。

北京市民举行反日、讨张二次大会，陈启修主持，会毕游行。

一月卅一日

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致函右派之孙文主义学会，请一致进行讨奉、反吴运动。

上海总工会所发起之二七纪念筹备会举行第一次筹备大会。

江西旅沪各界联合会、上海大学江西同乡会两团体致电方本仁，责其无故拘捕学生王立生、邹鲁、朱由铿。

上海日商内外棉第一厂工人因厂中无故开除细纱间工人乐阿二，全体罢工。未几第二厂工人亦一致响应，后由厂中将乐恢复工作，工人乃告胜利。

上海工商联合会致电奉系军阀张作霖，反对奉、日密约。

第四号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

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

瞿秋白

(一) 帝国主义进攻之战略

从五卅屠杀到北京屠杀，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经过了一个伟大的高潮，表面上似乎告一个段落。中国一般人现在都有意无意地想着：五卅的国民革命运动已经停顿了么？此后革命的前途是退后呢还是前进？是失败呢还是胜利？

北京屠杀诚然是革命运动的挫折，但是这个屠杀所以能使革命民众除“哭”——追悼以外不能前进一步去奋斗，换句话说，北京屠杀所以能挫折革命运动的原因，却在于帝国主义进攻的总计划之部分的实现。民众运动的受挫折，并不因为段政府卫队的残杀比上海工部局更加厉害，却是因为帝国主义能以假手于军阀来屠杀，能以在五卅之后重新假手于军阀来压迫一切民众运动。帝国主义在五卅之后要达到这个目的，实在费了不少心血，用了种种手段和工具，按照了整个儿的计划进攻——反守为攻的计划，才得到现时的形势。

帝国主义进攻的战略及其“胜利”，可以分四方面来说：

第一，军事行动。奉系军阀崩败、郭松龄反戈的时候，天津快入国民军之手，帝国主义势力处于极危殆的地位，日本帝国主义者立刻亲自派兵助战，扑灭郭松龄的“叛逆”。英、日帝国主义迅速地建立张、吴联合战线，从河南、山东、满洲、陕西四方进攻国民军：天津战役中日本帝国主义者直接指挥战事、英国帝国主义者馈赠吴佩孚一万五千枝枪械，都是彰明较著的事实。到三月六七日河南已经完全入吴佩孚（靳云鹗）之手。当时张、吴联合战线的后顾之忧，便是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所以二月中二十日，英国便封锁粤海关，随后还伴着威吓，说要派十万大兵征服中国。北方这次战事，最初在三月初国民一军在沧洲方面仍是日有进展的形势，日本帝国主义者急急地护送奉军舰队从大沽攻天津，故意挑衅，炮击大沽炮台——随之以列强通牒，造成

北京屠杀的近因。国民军被压迫而不得不败退——段祺瑞不敢在首都革命（去年十一月底）时屠杀民众，因为那时是国民军克服天津；到了现在，李景林（三月二十二日）将要占据天津的时候，保定方面吴佩孚势力将要进攻的时候，自然敢于屠杀，以求取媚列强，得到张或吴的谅解。中国政局的形势，在北京屠杀的时候，正是英、日、张、吴联合战线战胜的形势，正在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又从湖北、山东、满洲进展到河南、热河、直隶、京兆——“中央政府”的过程里。北京屠杀不过是这种帝国主义胜利的小小反映，国务院门前的血，也许是此后四万万劳动平民汗血的点滴的渊泉罢了！

第二，宣传力量。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所以能得到这种胜利，并不单靠张、吴大军阀的兵力。他们虽然强迫苏联签订不准在东方宣传民族解放，他们虽然禁止中国人民宣传“排外”，仿佛是根据什么不可干涉别国内政，应当专重友邦交谊的“国际法”的天经地义。然而他们自己却尽量地宣传，破坏国民运动。他们在唐山——英国矿局，以金钱运动鼓惑警察反对国民军，故意停闭矿内工作想激起工人扰乱，以扰国民军之后防。他们在河南，帮助并指使吴佩孚宣传、运动土豪劣绅（红枪会里的坏份子）。英、日自己的机关报上拼命地宣传南蒋北冯是赤化军队，他们在上海组织什么“万国护宪会”作反赤宣传。这是民众里的外国宣传，其实力量还不十分大。最凑巧的是中国人民里最近发生了一种宣传力量来帮助帝国主义的忙。什么反赤同盟固然不必说起，就是自称“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国家主义派等类也很出力。日本出兵满洲时，这些分子忽然反对莫须有的俄国出兵；接着便反对中东路停车——各铁路交通受军阀的摧残扰乱，没有一个中国人的路局长敢于反抗一下，以尽自己对于国家财产的天职，中东路局长执行了这种对于中国政府（同时当然也是对于苏联政府）的职责，国家主义派却来反对这种反抗军阀的“强权”了。英国封锁粤海关，这些“外抗强权”的国家主义派一句话都没有说。张、吴联合战线进攻国民军，以致于封闭河南工会、农民协会，天津的总工会，逮捕工农领袖，这些“内除国贼”的国家主义派也许还幸灾乐祸呢。他们的反对帝国主义，便是十二分费力地作反苏联的宣传，他们的反对军阀，便是宣传蒋介石、冯玉祥赤化，说他们接受苏联的枪械。照他们的意思，把蒋介石、冯玉祥等武装解除了，等英、日、张、吴完全战胜，这便算“内不妥协，外不亲善”，便可以“对外独立对内统一”了。北京屠杀后，他们更一致地拥护段祺瑞的通缉令——只恨政府卫队不会准备，没有把李大钊等打死。总之，每次帝国主义向民众进攻时，总有“人”出来反俄、反共、反蒋、反冯，使民众的视线和注意混乱，不能一致地建立民众的革命联合战线，去反抗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宣传力量实在伟大，国家主义派实在是功高难赏。国内的报界及所谓舆论，既然有了这一小部分的反革命空气——和五卅以后不同了——段祺瑞何乐而不恣意屠杀呢？

第三，政治影响。当国民军取得天津，中国民众普遍地反对帝国主义和要求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的时候，国民军、国民政府和民众的联合战线正在要求政治上的巩固、政纲的统一。如果这三方面真正建立革命政府而召集国民会议，国内的大部分武力可以由民众指挥而战胜帝国主义——奉直军阀。所以帝国主义坚决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和反赤宣传。同时，国民军战胜而取得天津的时候，政治局面当然迅速地左倾——首都革命，驱段下野的民众运动日益高涨。“中央政府”的改造，必然给帝国主义以巨大的打击。因此，帝国主义可以承认贿选的曹政府，可以容忍临时的段执政，到了现在——段祺瑞如果下野而代以更左的政府，却不得不直接威吓而制止了。于是公使团宣传，如果老段下野，他们也下旗归国。再则，许世英、易培基、于右任等的内阁成立之后（十二月二十八），帝国主义者在财政上百端掣肘——税务司安格联直接听张作霖、吴佩孚指挥——所以这一期的中国政府，事实上（Defacto）为列强所不承认。汤漪等的挽段运动，固然临时帮了帝国主义不少忙；而吴佩孚等的法统、护宪居然成了“万国护宪会”的政纲。在这种局势之下，帝国主义和张、吴的攻势非常紧迫，而革命民众的政治要求也十分明晰，冯玉祥和资产阶级便遇着了“试金石”了：各地商会和一般高等华人大都消极犹豫，甚至于接受帝国主义宣传（《顺天时报》《天津日日新闻》《新天津》……），还仰望着吴佩孚（尤其是京津）。冯玉祥呢，处于民众运动之中，也同样地开始动摇，终至下野，“不问政治”。其实他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反赤宣传的恐吓，在这时候已经慌了手足，广州国民政府对于他又是鞭长莫及。他既不能公开地、明显地接受民众的政纲——国民党的政纲，勇猛地往前奋斗，他便不能不做往右结合的尝试。假内阁的最终局面（三月初），其实是引进了许多吴佩孚、张作霖的奸细（如卢信、颜惠庆）；讨吴令的发表不过是一种阴谋。那时章士钊、马君武等的气焰正在高涨起来，列强妨碍津沽战事的计谋既已早有预定，那讨吴令不过敷衍冯玉祥而做遮盖屠杀的破盾牌罢了。冯玉祥这种小资产阶级式的犹豫、妥协、愚蠢的政策，哪能不造成北京屠杀的条件？哪能不破坏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而成就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胜利？

刚巧在三月十八北京屠杀的时候，广州国民政府之下的反动派阴谋，也在这时候爆发出来。上海的孙文主义学会虽然和工人及一切革命民众合作，反对屠杀，可是广州孙文主义学会里的反动分子，却甚至于违反了戴季陶主义，进行卑劣地离间蒋介石和罢工委员会、俄国顾问及共产派的阴谋。他们的行动虽然只暗算了李之龙（调动中山舰的事，最近已证实为欧阳格、欧阳忠等所陷害。——四月十九日注），虽然只证明了“俄人”并不统治着广东，却可以随意“驱逐”。然而他们这种行动，立刻给帝国主义以进攻的机会：香港的通信、电报都急急乎表示以解决罢工的时机已到——帝国

主义的眼中钉，革命的广州政府分裂、崩败了！再则，也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的反动派邹鲁、谢持、沈玄庐等，因为戴季陶先生表示不接受广州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选举，所以壮着胆在上海召集反动派的“第二次”大会——他们也欣欣然地谈“移粤开会”，想必是梦想蒋介石能真变成香港所赞许的强有力的政府。这种所谓国民党的反动派之阴谋和国民党右派的犹豫中立的政策，增加了帝国主义进攻胜利的形势。

总之，反动势力方面的军事行动、反赤宣传和政策，都可以证明帝国主义的大政方针是：一、资助反动军阀组织中央政权——使团方面曾经有一种表示，说如果张吴能联合巩固中央，“财政不成问题”（可证之于三月底至四月初的东方电通、路透社的宣传）；二、肃清国民军的势力——四月五日汉口电通社的电报还是这样说；三、“讨伐”广东政府——东方社的奉天电屡次宣传这一计划；四、以强力镇压一切民众反抗运动——所谓取缔赤化。但是这种大政方针的施行，除联合帝国主义力量之外，还必须有分散国民运动力量的政策。

第四，改良政策。贵族阶级的君主国家，遇着革命运动发生，必然赶紧表面上让步，说什么“筹备立宪”；资产阶级的独裁政府，遇着无产阶级革命潮流，也是赶紧实行些表面上的社会改良政策。如今中国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经过一年来的民族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于武力屠杀政策之外，也就不得不实行些“民族改良政策”。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这种分散革命运动政策，必须有立宪派和改良派做助手，帝国主义现时在中国，也就需要帝国主义之下的立宪党或“民族改良党”。帝国主义于上海总工会封闭之后便进行关税会议、法权会议，答应一九二九年关税自主；于北京屠杀前后，更“准予”华董加入汉口英租界市政局，提出上海工部局的华董问题，对上海越界筑路案让步，仿佛上海的会审公堂也可以归还，福建鼓浪屿的市政也有同样的讨论。它们这些诡计，无非是暂时想以空口的让步稳住中国的资产阶级，使它们不来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想在中国高等华人之中造出些“民族改良派”的势力，来帮它们镇压革命运动。北京屠杀前一天，上海工部局总董请商会会长等吃饭，训练了他们一番：只要高等华人帮助它们镇压工人，反对民族革命的宣传，一切华董等类的问题都可以商量。果不其然！上海市民——小商人、工人、学生等反抗北京屠杀的时候，总商会“暂停办公”了（请参看《向导》第一百四十七期）。帝国主义的这种政策，也和君主、贵族或资产阶级政府一样：暂时答应立宪或实行社会改良政策，等革命潮流低落，这些“让步”必然大半收回。其结果——在社会革命里，无产阶级固然因社会改良派的妥协而失败，社会改良派亦因群众革命潮流低落而丧失政权，胜利的只是资产阶级（德国革命和英国工党内阁都是证据）；同样，在国民革命里，劳动平民固然因为资产阶级退出战线而失败，资产阶级亦因革命运动停止而重受帝国主义、军阀或皇帝、贵族的压迫，胜利

的只是反动势力。帝国主义者现在正用得着这种政策来分裂中国人民而达到他们完全恢复反动统治的目的。

总之，帝国主义的战略是：帝国主义军阀的联合战线利用买办资产阶级的力量，趁小资产政策的犹豫、妥协而进攻，以破坏、分裂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

(二) 中国各阶级力量之相互关系

诚然不错，帝国主义有这样精明的策略，实行起来又逐步地有些得手，北京屠杀之后，中国尤其是北部的民众运动，自然要受着一时的压迫，而不能立刻有广大的发展。然而它们这种战略究竟有几分胜利呢？究竟能不能像它们的如意算盘那样，完全扑灭革命运动呢？真正相反！北京屠杀之后，第一，立刻看见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内开始分裂；第二，民众革命运动必然更加深入地发展，革命势力更在潜伏地增长，伟大的前途已经使国民革命的胜利不久便可以来到了。北京市民的血，也许是最后一轮的“请愿血”——那革命战场的血，在最近的将来已经可以灌溉培植出平民自由之花呢！

北京屠杀后，奉系军阀带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迅速地想攫取中央政权，可是李景林暗联吴佩孚的倾向，做了英帝国主义的工具，张、李内讧阻挡奉系军阀的前进。同时，吴佩孚的势力努力前进，河南寇英杰、靳云鹗的冲突虽然暗斗也很烈，但是靳军不久便到保定，并且已经遣派代表到北京和国民军议和。张、吴之间的冲突已经开始。段祺瑞在这冲突中间，又想利用机会联奉、反吴。亦许英、日帝国主义为镇压革命（赤化）起见，暂时保持张、吴的联合而始终去段，然而就大势看来，张的势力在最近必占优胜，吴派的反张必不能免。而且张、吴内部的小军阀各自争功，冲突异常复杂。固然，吴佩孚的势力比较地扩大，他和孙传芳开始接近，利用邓如琢占江西；他还想利用孙传芳内部的冲突而发展其势力于长江下游；但是吴的湖北、河南，内部亦是非常不稳，湖南唐生智驱赵，比较地接近广东政府，又添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最近，贵州和江西方本仁也派代表到广州。固然，张的势力有称霸中央的趋势，但是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现在已经仿佛在奉系之外另树一帜，李景林和张宗昌的冲突虽然受“日本监督”的指挥而强迫地消弥下去，其他的冲突已经又在酝酿之中。况且张作霖西有吴佩孚，南有孙传芳，北有国民军，将来局势的发展也难有全胜的希望。由此看来，帝国主义的自相冲突、军阀的崩败分裂互争，凡此一切，在稍稍战胜国民军之后，便渐渐更明显地暴露出来。同时，国民军虽然败退，却因帝国主义工具的内讧，至此还能保持察、绥、陕西、甘肃。广州国民政府虽经过反动分子的捣乱，稍稍受伤，却仍旧有能力应付西南诸省，待时而动。无论英、日帝国主义者怎样急急乎要黏合张、吴，巩固反动政权，一致“反赤”，在这种形势之下，即使万一能成就这一计

划，它的基础也是非常脆薄的。

再则，军阀——帝国主义与中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也因战胜民众而开始暴露。李景林等一到天津，便强迫行使军用票，弄得商人罢市；他们更用飞机抛掷炸弹，想焚毁北京，弄得市民团体群起抗议。河南方面，吴佩孚军队一到便勒索军饷，山东更是久处于张宗昌铁蹄之下。固然，中国资产阶级化的士绅阶级，各地商阀这类的大人物——把持商会、农会、教会的士绅政客，他们实际上是城乡贫民的最切近的剥削阶级，他们这少数人的利益不大受军阀的摧残。因此，他们往往以商会等名义，代表人民欢迎这些反动军阀，替军阀包税、包捐，设法剥削商民，从中取利。然而，士绅阶级内部在这种时期，不免也要互相冲突，而且他们的媚侍军阀到了现时分外地显露，甚至于要激起一般资产阶级群众的反抗。总之，帝国主义的互相冲突，军阀、士绅之间的互相冲突，帝国主义、军阀、士绅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正因为镇压了民众和战胜了国民军，而不得不急剧地暴露出来，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便不能不开始破裂。帝国主义的文、武两种大臣，军阀和士绅，已经不能不各自自相互哄，它们的压迫已经不能不使资产阶级都受到切身的痛苦，于是卖好于资产阶级的政策也不大行了。

反动势力方面的形势大概如此，我们再看中间势力的形势又是怎样。

中国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里，总是处于中立的地位，时而从中取利，时而背叛平民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五卅以来的事实都是证明（参看《新青年》第三期）。这种中间势力，以前在革命斗争中往往可以举足轻重，因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统治着一班小资产阶级，它的动摇，足以影响到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如今这一势力是否能满意帝国主义的让步，而完全倒到反动势力的怀抱里去呢？上海的资产阶级比较有力量，五卅之后，总商会居然办了自己的英文机关报〔《中国公论周报》（*The China Tribune*）〕，他还在努力着鼓吹虞洽卿先生的“国家主权民族平等”，并且说：“凡此情状，非由人民自身推翻军阀政治制度不可，吾谓此言，盖指将来必更有一新革命……必置国家工商于暂时流离颠沛之境，实则最后所得，必能偿此牺牲……”（第三期——三月二十七日）。虞洽卿更明白对帝国主义说：中国人虽爱和平，对于外国压迫仍要反抗。汉口英界的华董已经到手，上海仿佛也有这个可能，可是关税管理尚且没有，更不用说关税自主……凡此一切，都还是不足以使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满意。所以他们还继续着强硬态度，高唱革命。至于资产阶级对于军阀——帝国主义的工具，那么，上面已经说过，在现时的政潮里，双方的斗争只有格外剧烈起来。除天津、河南以外，汉口吴佩孚抽捐勒饷、盐斤加价，上海闸北市自治备受孙传芳的摧残。军阀于战胜革命民众之后，为发展自己，实行封建地主式的政策起见，有时不得不勾结士

绅，压迫商民——比较有力的资产阶级只有因此而更加反抗，更加觉悟：譬如奉天军阀失败，忽然提倡省宪，得胜又立刻取消；孙传芳初到江苏敦请上海商人江政卿去做警察厅长，民众革命潮流稍稍低落，立刻进攻，摧残自治。总之，帝国主义既然还没有真正地让步，中国资产阶级暂时不能完全变得反动；军阀战胜民众而更加压迫，便使资产阶级与军阀的合作（如上海总工会被封数月）渐不可能。资产阶级之中，在这种时期便会发生较左的派别，不便对帝国主义军阀进一步的要求，“多讨些价”，并且反对买办士绅的政治势力——霸占商会、自治会等的大人物。

可是，在暂时的局面之中，资产阶级固然还没有完全反动——帝国主义离间国民运动之诡计，固然还没有完全奏效，然而这并不是说：资产阶级可以领导国民革命运动，还能诚意地再站到革命方面来。只能说这种“中立势力”现在还在徘徊犹豫之中，暂时没有增加反动势力的力量。如果帝国主义方面，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真正的让步，中国资产阶级立刻便可以完全背叛平民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亦许会利用军阀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对于资产阶级再让一步，而委罪于军阀。那时，或者又成更进一步的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局面。《中国公论报》的第四期（四月三日）便已经歌颂汉口、上海、香港帝国主义的让步，自称华人容忍、镇静之得策，还说外国人若知中国心理，就“一经尝试便不能舍”。他们已经只要求帝国主义实行允诺的几件事（会审公廨、华董等），赶紧想解决五卅案〔四月十五日，上海华董三名已通过于上海国会（西人纳税会），资产阶级虽在力争，可是力争的方法，是研究修改上海宪法（《洋经浜章程》）。“民族立宪派”的形成已露端倪，只求限制帝国主义的治权，而不求民族独立的倾向已经暴露了——四月廿日注〕。反对军阀的运动，在资产阶级也是这样妥协的想头，譬如闸北市自治问题，已经有一派只要求官厅勿干涉闸北，闸北以外的新开市面，完全可以由官办。它们只求这一些让步，便可以在“华人”之中撇开大多数不能直接纳税的中国市民，更可以在“市民”之中再撇开许多工人劳动者。收回租界的“国家主权”，民众普选的自治制度，都可以不顾了。

那么，假定资产阶级现在再妥协、更妥协一步而加入反动势力，是否还有从前的举足轻重的意义，是否因此而劳动阶级完全陷于孤立，而使国民革命受长期的挫折呢？帝国主义、军阀每行一次改良政策而又欺诳一次，足以在群众之中打击首先与之妥协的士绅阶级之政治威信一次；资产阶级领袖加入这种“妥协同盟”一次，也足以使自己受打击一次。如今全国民众，经过五卅怒潮直到北京屠杀，已经增高革命的觉悟不少，资产阶级更进一步地妥协，适足以解放小资产阶级于他们的政治思想之下。现时上海的各马路联合会、江西的商帮协会以及其他各地的小资产阶级组织，都渐渐地昂起头来，渐渐地站到革命方面来。何况，一方面，北方及内地士

绅、土豪阶级把持的商会等，媚侍帝国主义与军阀，上海、汉口等买办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商会等，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而实行改良派式的卖国行为，小资产阶级商人因此备受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广州劳农平民为主干的国民政府确能为国家争主权，为人民谋幸福，不但小资产阶级倾向革命，便是广州总商会也与革命政府合作，如抗议封锁粤海关等。两方面的比较，尤其使全国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潜移默化地日渐趋向革命，尤其使他们容易觉悟妥协政策之卖国、卖民。所以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革命化，正在迅速地激流昂进。

中立势力内部的分化，资产阶级妥协而政治威信堕落，小资产阶级感觉压迫而倾向革命，都是无疑的。我们再看革命势力方面怎样。

小资产阶级倾向革命，还有一个根本原因：去年一年来，中国部分地受帝国主义封锁（广州）和全国军阀战争的扰乱，买办阶级运贱价的原料出洋，甚至于粮食，弄得中国市场上米、麦等项，都需要再从国外高价地输入，再加以湖北、湖南、直隶等处的大荒歉，全国的生活必需品，如米、柴、肉等的价格，都在飞涨，尤其是上海。这种广大普遍的经济紊乱和生活增高，使一般人民感受到非常地窘迫。帝国主义可以“贿买”少数高等华人，却决不能“贿买”大多数濒于饿死的人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化是无可遏制的。然而革命的主力还决不在此。

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农民，他们的劳动差不多百分之七十都被士绅、土豪、买办、军阀、帝国主义剥削了去，这是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的经济基础。五卅之后，不但广州、河南的农民组织发展起来，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先锋。并且一般的经济恐慌、预征田赋和灾荒，使农民的地位窘迫到万分，反抗运动自然而然到处爆发。农民群众自己又继续中国向来所有的秘密组织，如红枪会（河南、山东等省）、大刀会（江苏、安徽等省）等，虽是迷信，虽是无计划、无策略的组织，然而一有些须组织，便不能不暴动起来。国民革命之中，如今已经有无产阶级领导，又有真正革命政党的工作，这种农民运动如果纳入农民协会的轨道，有相当的农民政纲，立刻便可以成为极伟大的革命力量。不用说耕地农民的运动，便是减租、减税的运动——直接就是给地主、土豪，间接给军阀、帝国主义极大的打击。这一革命的伟大力量正在滋生猛长呢。

至于工人阶级，在上海、天津、河南、唐山铁路海员、粤、港、湖南、湖北各方面，无论是受压迫不受压迫，他们一年来的组织工作和斗争经验，自然使他们积极地准备自己的力量，继续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何况，经济恐慌和物价高涨使五卅以来所争到的增加工资，事实上已经等于没有。再加以反动重来所受的政治压迫，尤其是使他们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奋斗。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正在加紧集中训练，

去和农民携手。这工、农联盟的革命力量，在这北京屠杀高压重来的时候，愈益要迅速地伸长。

再则，就是智识阶级和游民阶级，虽则都是游离势力，可以为革命所用，亦可以为反革命所用，然而大多数的力量总在革命方面。尤其是在现时的局势之下。固然，智识阶级之中分化最为剧烈，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自捞取小部分的力量来做工具，但是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必然倾向革命。固然，游民阶级会受买办、土豪的雇用武装起来——如商团、民团、团防、工贼、流氓来屠杀工人、农民，红枪会、大刀会等旧式团体，也会受人运动，甚至于还有大多数在军阀的军队里。但是，这是因为以前没有政治上、组织上的宣传训练。这些土匪式首领，往往只知私利，或者浪漫，或者妥协——如岳维峻的军队，一方面容受吴佩孚遗孽扰乱人民，一面又仿佛站在民众革命方面。可是，如果组织他们在革命军里，予以国民革命之政纲、策略的正确领导，这极大多数的民众，可以成为殖民地革命所不可少的力量。因为，一则他们本是破产失业的农民，革命的需要非常之强；二则现时的军阀层层崩溃，帝国主义者没有这个能力和本领，完全收容、雇用、安置这些日益增多的游民。革命方面的实力，却因广州政府的确立而逐渐增加，国民革命的政纲、策略愈益鲜明，足以团结组织这些力量。

因此，北京屠杀之后的革命势力，不但日益团结、集中、扩大，并且迅速地武装起来，革命的政纲和策略——农民、工人、军队等各方面，都更加深切而明显出来。尤其重要的，便是工、农的革命同盟立刻有切实建立起来的希望，做国民革命的主干。

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的战略中，反动势力已经又开始崩败、分裂；中立势力虽有一部分要妥协而反动，然而一大部分迅速地革命化；革命势力更加扩张、集中而且强固起来。帝国主义胜利的希望能有多少呢？

(三) 国民革命之前途

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策略，虽然在北京屠杀的时候，得到最胜利的形势，但是，恐怕就算这次联合战线中最一致地共同胜利——从帝国主义直到国家主义都内外一致的喊杀民众领袖——当然亦就是最后一次的胜利。过此之后，它们自己已经开始分裂而冲突了。帝国主义分裂国民革命运动的策略，做到北京屠杀和改良政策，至多也不过吸引买办、士绅的资产阶级，可是就此打破他们对于群众的魔力。结果，大多数民众更急剧地革命化，民众联合战线要更加广大地扩张，不过在帝国主义军事上战胜的局势之下，暂时只能潜流猛进罢了。从此，一切改良、妥协、避嫌等幻想，在革命的政党、一般民众及其他方面，都更加容易被逐渐地打破。革命势力的扩大和深入，客

观上使国民革命的成败渐渐逼近了生死关头。总之，客观上的革命条件，无疑地日益完成。只看革命政党主观上的领导力量，是否能执行这个历史使命。

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已经明显地指示出来：虽然在中国范围内，这一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国民革命的使命，是解放资产阶级的中国，使它脱离封建宗法制度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剥削。但是因为：一、中国农民占绝大多数，并且是帝国主义剥削的最大的对象和最深的基础；二、中国资产阶级大半只能做买办事业，搜括农民原料，推销外国商品，经营投机的金融事业等，它绝不能有独立的政治势力；三、中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机器工业的发展）异常困难——一方面有帝国主义的极重的压迫，另一方面又有宗法制度的束缚、士绅阶级的障碍和过剩劳动的充牣；四、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在残酷的阶级斗争经验里，很早便有了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的能力。因为有这些特点，中国资产阶级非常之懦弱、畏惧、妥协、软弱，它宁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丧失巨万资本，却不敢牺牲几分钱去接受工人的要求，对工人让步。所以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却不会是资产阶级的。

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一革命的主要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便是民主主义的自由和民族经济的解放，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条件。可是，何以胜利又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呢？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有很深的经济基础。如果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它很快便和敌人妥协——五卅以来一直到现在，逐日都有事实可以证明——胜利，真正革命的胜利，始终是不会有有的。

因此，客观上工、农群众已经要求革命，积聚实力，准备决死的斗争，自然而然，只有工人阶级与农民联盟，来做国民革命的先锋和领导者。中国革命的政党，尤其是共产党，应当深切地了解这一革命的性质和主力。所以在现时——北京屠杀后，一切革命势力是迅速地增长凝聚的时候，不要放过这个历史时机：第一，坚决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关税自主等，特别要注意加入一切的地方政治斗争，在每一实际问题上指示群众以革命的前途，打破“民族改良”的幻想；第二，努力参加一切民权主义的斗争，不论是全国的、是地方的、是乡村的、是都市的——国民会议、地方自治等——总要力求深入群众，在实际斗争中争取资产阶级反动派、改良派中的群众；第三，努力组织农民，指出耕地农有的目标，指导减租、减税、合作互助的运动，使农民群众在反对士绅、军阀的斗争里，和城市工人以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结合巩固的同盟；第四，巩固发展工人的组织，在不断的日常改善生活的斗争里，指示工人阶级的总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按物价递加工资等，一直到一般劳动平民夺取政权。这种革命政纲，才能巩固结合工、农的革命联盟，强大国民革命的主力军，集中提高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于全国；才能组织、训练革命的军队，吸收敌人军队的群

众——扩大武装势力；才能武装工人农民，实行革命战争；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才能真正以解放一般平民为使命，全国民众对它的响应可以在最短期间颠覆军阀统治、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

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小小胜利——北京屠杀——开始暴露自己之间的破裂，暴露中国各社会阶级力量的转移，更明显地、更深切地拥出工农联盟的国民革命主力军，并且更紧切地逼得民众不得不力求武装——军队和工农军——准备直接革命。国民革命的前途已经释放出伟大的光明，照耀那北京屠杀中的血痕！

一九二六·四·七

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是不是国家主义？

陈独秀

有许多人，尤其是国家主义派，说中山先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的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就是国家主义。不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爱他的祖国——中国，为他的祖国——中国奋斗的，他是极力劝中国同胞要恢复民族主义来救国的，他是极力指责现在提倡世界大同主义未免过早的。然而，因此便说中山先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那就未免对于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理论之研究过于浅薄了。

孙中山先生是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的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是不是立脚在国家主义上面，这一问题，关于中国民族运动，尤其是关于国民党的政治宣传，有重大的影响。这也就是国民党中及国民运动中左右派之根本争点，应该有一个明白确定的解答。

要解答这一问题，第一须分析历史上各时代民族运动的特性，第二须检查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理论属于那一时代的特性。

因各时代的经济关系日渐复杂，民族运动在历史上乃有三个时代不同的特性：（一）宗法社会时代之封建贵族的民族运动；（二）军国社会时代之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三）帝国主义时代之殖民地的民族运动。

宗法社会时代的民族运动，即是资产主义、国家主义前的民族运动。这时代的民族运动之特性，富于血统及宗教的色彩，实际上乃是由于民族的封建贵族争夺疆土。因为宗法社会的经济生活完全是农业的，如日耳曼人对于蒙古民族西侵之反抗，中国汉人对于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之反抗，回民对于十字军之战争，回、准等族对于汉人之争斗，皆属此类。

军国社会时代的民族运动，即是资本主义前半期的民族运动。这时代的民族运动之特性，乃是十八世纪新兴的资产阶级运动，此期运动已渐渐脱离前时代血统及宗教的色彩，而立脚在国家主义上面。因为这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已不限于农业，已需要商业的发展更进的工业的发展，已非宗法社会制度血统、宗教等所能支配，并且在

经济的需要上，已有了血统不同或宗教不同之民族所合成的国家。这些民族中的资产阶级，正需要一个军国制度的国家机关，即超越民族血统及宗教信仰之上的国家权力，以供其资本主义发展之用。这种国家主义的民族运动，亦即民族的国家主义运动，由日耳曼、意大利渐渐蔓延到全欧洲，民族运动渐渐成了国家主义的工具，由日耳曼、意大利之成功，渐渐由自卫的国家主义变成侵略的国家主义——资本帝国主义。这些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即国家主义者，对外则利用“民族统一”的口号，扩张本国的领土与主权（如俄国之大斯拉夫主义、德国之大日耳曼主义、日本之大亚细亚主义等），对内则利用“民族同化”的口号，征服境内的少数民族（如俄国之大俄罗斯主义、土耳其之大土耳其主义、中国之大中华主义、外蒙之大蒙古主义等），复利用“民族生存”及“保卫祖国”等口号，欺骗国内的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的国家牺牲。在这时代，不但民族运动是国家主义之工具，并且国家主义也就是资产阶级之工具。

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运动，即是现代资本主义末期的民族运动。这时代的民族运动之特性，乃是二十世纪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及被压迫国家之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联合反抗他们的压迫者——资本帝国主义，不像前时代的民族运动是单纯的资产阶级运动。因为资产帝国主义有国际性，反抗它们之民族运动也不得不含有国际性，和前时代民族运动之对象及作战策略随之不同，这也是此时代民族运动和前时代民族运动特性不同之一。若埃及之独立运动，若土耳其之国民革命，若印度之不合作运动及农民暴动，若爪哇工、农之反抗荷兰，若菲律宾之独立要求，若摩洛哥及叙利亚之反抗法国，若里夫民族之反抗西班牙与法兰西，若波斯、亚喇伯及阿富汗之反英运动，若高丽、安南之独立运动，若中国之国民革命运动，这些运动是紧接着苏俄十月革命兴盛起来的，都有无产阶级的力量参加运动，使这些运动渐渐减少了前时代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增加了新的色彩——反资本帝国主义之世界革命的色彩。国家主义派说这些运动都是国家主义的运动，这显然犯了时代错误的毛病，这是因为他们不曾懂得此时代的民族运动之特性和前时代完全不同。前时代的民族运动是：纯资产阶级的、没有国际性的、造成资本帝国主义的运动；此时代的民族运动是：各阶级联合的、含有国际性的、反资本帝国主义的。

我们既已看清了历史上民族运动之三时代各有不同的特性，更进而检查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理论是属于哪一时代的特性，便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了。

中山先生在他的《民族主义讲演》上说：

但民族和国家是有一定界限的，我们要把它来分别清楚，有什么方法呢？最适当的方法，是民族和国家根本上是用什么力造成的。简单的分别：民族是由于

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所以一个团体，由于王道、自然力结合而成的是民族，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便是国家，这便是国家和民族的分别。

但自俄国新变动发生之后，就我个人观察已往的大势，预料将来的潮流，国际间大战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种战争，不是起于不同种之间，是起于同种之间。白种与白种分开来战，黄种同黄种分开来战。那种战争是阶级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

将来的趋势，一定是无论哪一个民族或哪一个国家，只要被压迫或委曲的，必联合一致，去抵抗强权……今日德国是欧洲受压迫的国家，亚洲除日本以外，所有的弱小民族，都是被强暴地压制，受种种痛苦。它们同病相怜，将来一定联合起来，去抵抗强暴的国家，那些被压迫的国家联合，一定去和那些强暴的国家拼命一战。

现在欧洲列强正用帝国主义和经济力量来压迫中国……弄到中国各地都变成了列强的殖民地……故此世界人类，要分为两方面去决斗：一方面是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一方面是二万万五千万人。第二方面的人数虽然很少，但是他们占了世界上顶强盛的地位，他们的政治力和经济力都很大，总是用这两种力量去侵略弱小的民族……但是天不从人愿，忽然生出了斯拉夫民族的一万万五千万人，去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列强所以诋毁列宁的原因，是因为他说世界多数的民族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为少数的民族二万万五千万人所压迫。列宁不但说出这种话，并且还提倡被压迫的民族去自决，为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打不平。列强之所以攻击列宁，是要消灭人类中的先知先觉，为它们自己求安全；但是现在人类都觉悟了，知道列强所造的谣言都是假的，所以再不被它们欺骗，这就是世界民族的政治思想进步到光明地位的情况。

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么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它们的覆辙。

在以上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理论之几个要点：第一，他把民族和国家分得很清楚，他又一向是赞成王道而反对霸道的。因此，我们应该知道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根本不同。第二，他观察未来的国际战争，是十二万万

五千万被压迫者联合起来对二万万五千万横暴者的战争，是超越种族和国家之多数弱小民族反对少数民族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山先生这种代表“世界民族的政治思想”显<然>是国际的，决不是国家的。第三，他明白中国是帝国主义之殖民地，他并且力说：这殖民地之我们不但要反抗帝国主义以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自己不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中山先生这种民族主义的理论，明明是属于现代殖民地国际民族运动之特性，而不是属于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国家主义的民族运动之特性。我们明白了这些要点，便不能诬蔑中山先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也不能说他的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就是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是十八世纪欧洲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之产物，是资本帝国主义之前身及其工具，若在现代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时代提倡国家主义，不仅有时代的错误，并且有药不对症、使病加剧的危险。第一，我们要懂得国家是什么？清朝皇帝常说：“我国家二百年深仁厚泽”，如此清室就是国家；袁世凯曾印发一个小册子叫做“国贼孙、黄”，如此反对袁世凯就是反对国家；段祺瑞、吴佩孚都自以为“北洋正统武力统一”是救国政策，如此北洋派就是国家；最近奉军亦称反奉的民众有害于国家，如此奉天军阀就是国家；法王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打破那些朕的国家，取得了那些国家的统治权，便造成了那些资产阶级的国家。这都是他们的僭窃吗？不是的。国家这一个抽象名词，本来就是一切统治阶级的所有物，谁取得统治权，谁便有权拿国家这一名义做统治全国人民之工具；国家权就是统治权，国家的利益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如此，则所谓国家主义也就是“统治阶级主义”。第二，我们要懂得国家主义是什么？欧洲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推翻封建阶级夺得统治权后，都已变成反动的势力。所谓国家主义，正是这班反动势力（尤其是法西斯派）用作对外扩张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对内压迫平民或欺骗平民为资产阶级牺牲之工具，即资本帝国主义之工具。第三，我们要懂得国家主义若应用在殖民地是怎样？殖民地不会有强大的资产阶级，便不会有纯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它的民族运动必须有无产阶级参加合作才会成功；殖民地民族运动之对象，不仅是近邻某一民族。因此，若应用纯资产阶级性的、非国际性的国家主义在殖民地做民族运动，则对内失去无产阶级参加的力量，对外失去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联合作战的力量。

中国是一个被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压迫的国家，我们决不向帝国主义者讲什么世界大同主义。我们自然急于要救中国、爱中国，然而我们不是什么国家主义者。无产阶级本来无祖国，然而他们在救祖国的实际工作上，比任何阶级都出力：在普法战争之巴黎围城中，法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投降了，只有无产阶级尚力奋其最后决战；俄

国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的政策是要仍旧和协约国妥协的，只有无产阶级急起没收了欧、美各帝国主义在俄权利，使俄国脱离了外国的羁绊而完全独立；德国的资产阶级一致接受英、美、法帝国主义者奴隶德国之道威斯计划，只有德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始终反对。这些法国、俄国、德国为祖国奋斗的无产阶级，都不曾向帝国主义者讲什么世界大同主义，然而他们决不是什么国家主义者。孙中山先生一生爱他的祖国，一生为他的祖国奋斗，然而他也决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

纯资产阶级性的非国际性的国家主义，是前时代欧洲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口号，这一口号，已属过去的而且是反动的了。在现代各阶级联合的含有国际性的殖民地民族运动中，它已经是分散此运动在内外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障碍物，凡是一个忠于民族革命运动的人，都应该起来埋葬这一过去的反动的障碍物——国家主义！

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问题

——革命战争的意义和种种革命斗争的方式

瞿秋白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最近几年来的发展，到了现在，已经有由扩大而深入，由渐进潜变而猛发突变的趋势。一则社会各阶级的相对关系，在革命运动的过程里，已经逐渐明显——中国平民和帝国主义相对抗的形势，对于一般民众已经澈底明了：帝国主义方面，在中国境内利用军阀、士绅、买办阶级的政治势力，最近——五卅及北京屠杀之后——也更加公开起来；中国平民方面，在国际联合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策略，也在这个时候更加确定。中国革命战场的阵势已经了如指掌：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平民之搏战——不像三四年前，胡适博士尚且以为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国民党右派尚且以为打倒帝国主义是开罪友邦。再则中国平民方面革命觉悟已经大大地增高，革命力量正在积聚，商人、农民政治行动上的积极日益增高，尤其是工人的组织和斗争日益扩大。中国革命力量的增长和团结，已成历史上的伟大动力——以前的消极昏睡状态已经消灭了不少。三则帝国主义、军阀虽然勉强以“反赤”统一自己的战线，然而它们内部的冲突和崩败的过程，正因革命运动的发展而日益加剧。中国革命敌人的削弱和自乱，已经使它们无法巩固自己的统治——以前比较长期的各派均势（英、日、法、美、直、皖、奉等的均势）渐不可能。四则近年以革命斗争的方式，如请愿、示威、抵货、罢工等，已经使民众得到多量的经验。尤其因为现在的社会政治形势，民众不得不利用这些经验，准备从消极的反抗进于积极的反抗。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已经造成武装革命的必要条件。因此，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以求于最短期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

革命的发生、发展和胜利，大致总是从消极的反抗运动逐渐发展，逐渐普遍于一般民众，一直到革命中领袖阶级的政治势力形成而巩固，领导民众实行积极的反抗，推翻旧统治。这种发展过程里，革命斗争的方式自然适应之而增加、递变、进步。中

国近年来的经验便足以证明。

革命斗争的方式，大致有：示威、抵制、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革命战争。这些方式，中国民众都已经实行应用。但是，从“五四”“二七”“五卅”“三一八”和广州战争直到现在，革命的波澜旋起旋落地昂首前进，运用这种种斗争方式，已经到了武装直接决战的准备时期，已经到了将近决死战争的时机——中国平民和帝国主义短兵相接一决生死的时机，中国平民正要从消极反抗的方式进入大规模的积极反抗的方式，帝国主义便努力在中国境内找自己的救兵。帝国主义对付中国平民的这种种革命斗争，往往用屠杀、封锁的方法，往往压迫中国政府代行镇压，勾结军阀用兵作战。如今到了短兵相接将近的时期，它便不得不在军阀之外，另找破坏革命的工具。于是北京屠杀之后，中国社会的舆论里，发见种种论调，不敢再说帝国主义是友邦，军阀政府是国家，都是不可侵犯的，却说革命斗争的各种方式不可用或是没有力量，这亦不好，那亦不好，或是禁阻用切近可能的方式而故意唱高调。这些论调之中，尤其是反对革命战争一说鼓吹得最厉害、最巧妙。这无异乎说：革命是要的，帝国主义和军阀是应当打倒的，国权是要争的，国贼是要除的，但是……但是向来革命的方法和手段都不好，赶紧停止，还是不革命的好！

因为如此，我们以为现在有详细讨论革命斗争的方式（Form）之必要；我们应当指出各种方式的必要和应用，尤其在这一时期，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其他方式都应当应用，直接地或间接地作革命战争的准备。

（一）示威。革命运动中，示威是一种最原始、最简单的方式。示威的意义是检阅革命平民的力量，是表示民众反抗统治者阶级的意思。这种革命行动常常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仅仅对于治者阶级表示反抗，一方面是针对一般民众作大规模的鼓动（Agitation）。革命鼓动的经常形式是演讲、集会、传单、小册子，对于革命的目标——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作不断的指示和分析，唤起民众对于政治的积极和革命的觉悟。到了有特殊事故，这种鼓动便需有征集群众的力量，便是示威运动——实际上是群众的、特殊的革命鼓动、革命宣传，在平时只是对于民众从理论解释革命的必要，指示革命的目标。这种宣传和鼓动不能使群众自己参与，不能使群众一致地表现自己的意志。示威运动呢，当然是平日宣传、鼓动的结果，但是它以目前具体的事实，能征集最积极的民众自己来作鼓动。同时，它使理论的宣传，变成事实的宣传——不是某个人对于治者阶级的叙述和论列，而是几千、几万人的集会游行，对于统治者阶级表现革命的觉悟。这种示威的鼓动，效果胜于平日的宣传百倍：它使几千百人参与示威的事实，引起其他比较消极的民众之注意，革命的潮流，从这几千百人扬波推澜地

及于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人。五卅运动中的集会、游行，便是明证。为什么？因为它使革命的思想开始变成革命的行动。所以不论示威的形式是向政府反抗，还是向政府请愿，它的宣传上的意义 <是>丝毫不变的。中国古代民众的哄堂（围迫官署）和跪香，其实同是一种示威运动。示威而仅仅是游行、集会（哄堂）、通过表示民众意志的议决（通电），固然是反抗治者阶级；示威而以请愿（跪香）的形式出之，也是反抗治者阶级，而且更加进了一步：要治者阶级对于民众表示的答复。这种答复，当然是更使民众革命化的工具，不论是容纳请求或者是拒绝请求。或者以为请愿是哀恳，是承认政府的权力。其实，这并没有关系。于治者阶级权力未倒以前，并不是空口可使一般民众都否认政府的。即使能一致消极地否认，也没有用处，只看平民是否是积极地准备推翻政府，而示威（请愿）正是这种积极准备的最初一步——群众的革命鼓动。实际上说来，示威的其他形式，如不要求答复的罢工、罢课、罢市等（五一一天的罢工，一定期间的“示威罢课”“示威罢市”），表面上虽然比请愿急激，事实上却仅仅表示群众一致的决心和力量，并不要求立时答复或者满足要求。请愿的意义，正因此而是示威运动中实质上最急进的形式。北京屠杀之后，不但有人反对请愿，并且有人反对一切群众示威运动和罢课等。他们的理由可以分做两种：一种是说统治者阶级权力，大会屠杀，民众不要想革命，还是安心读书、安居乐业罢，一班遗老遗少都是这样主张的；一种是说和平的“无组织”的群众运动推不倒治者阶级，赶快停止运动，预备“全民武装”罢，一班国家主义派是这样主张的。前一种的理由，不必多说，显然是帝国主义的的说法。后一种说法，则貌为革命，实际是破坏革命的宣传。固然，没有武装的群众不能抵抗豺狼成性的军阀，然而示威运动的组织，除维持大众秩序、灵通消息外（这些事北京请愿中都有准备），本无武装的职任。如果军阀屠杀阴谋很周密，民众组织没有能及时逃避，这是客观上所不能免的牺牲。武装示威固然可以，去年十一月廿九的北京示威便是如此，那时国家主义派说是共产党扰乱和平秩序。示威而不武装，尤其是通常的事，可是国家主义派又说是共产党有意牺牲民众。这岂不是破坏革命战线，挑拨、造谣、中伤革命政党的伎俩？固然，仅仅是示威，革命决做不成，必须武装斗争；然而所谓“全民武装”，不知要准备多少时间？难道在这时间应当完全停止群众的革命宣传——示威？难道对于治者阶级的种种压迫，民众便不应当每次表示强烈的群众反抗？如果民众的心理是如此，如果民众心上根本不反对治者阶级，如果因为停止示威而使民众反抗的情绪低落、革命潮流退落，只剩一班“理论家”空口讨论革命，那么，即使实行“全民武装”也没有用，或者这些武装反而被帝国主义、军阀所利用，譬如广州的商团便是实例。

总之，示威运动（集会、游行、哄堂、罢课、罢工、罢市、请愿、跪香），在现时

不但不可停止，而且要增加扩大，以激发民众的革命情绪、训练民众的革命行动、推广民众的革命鼓动——时时对于治者阶级的压迫表示群众的反抗，群众参加示威次次地增加……这是准备武装斗争的一种步骤。

（二）抵制。示威仅仅是反抗统治者阶级的群众表示而已，虽然开始从言语、文字的宣传进入群众行动的宣传，然而对于统治者阶级并无实际上的损害。革命运动开始于示威，必然急转直下进入抵制统治者阶级的行动——五四运动时从示威集会进而实行群众请愿和罢市请愿，要求政府拒签《巴黎和约》并罢免曹、章、陆，再进而实行抵制日货，使中国的间接的治者阶级——日本资产阶级，受经济上的损失，而要求他交还青岛，取消《二十一条》，这便是实际经验里的证据。这种非买同盟（抵制仇货）是殖民地革命的特殊方式。帝国主义的侵略，根本上都是经济的，所以这种斗争方法便在殖民地上自然发生出来。五四以来，中国人差不多认抵制货物是主要的斗争方法。然而非买同盟的主要的执行者，实际上是商人。中国自己工业不发达，商人之中，不但强大的买办阶级用种种方法作弊、怠工，甚至于内地的洋货商也是反对。因此，实际上非买同盟对于帝国主义的损害非常之小，五卅运动的一年中，日货的输入反较往年增多，有海关贸易册为证。然而这并不是说抵制货物的方法不可以用，或者简直没有效力。抵制货物的非买同盟，如果有强大的劳动平民的革命战线，能够强制买办阶级执行——如广东五卅运动中的罢工委员会，便足以给帝国主义以实际的打击。再则，即便抵货方法始终不能对于革命的敌人有多么重大的损害，至少也是以行动实行群众的革命宣传之一法。不过这决不是革命斗争的主要方法，却是很明显的了。

五卅运动的实际斗争中，发现更有力的斗争方式，便是罢工。帝国主义的侵略，于推销货物以外，进一步投资中国，开办工厂。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奋起斗争，自然实行罢工——这是普通的对于资本主义的斗争方法。这种方法在五卅之中已经使上海英、日帝国主义受重大的损失，虽然因资产阶级的妥协而破坏，可是在广州革命战线巩固的地方，几乎使英国的香港变成荒岛。罢工方法的比非买方法有力，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可是，非买与罢工都还是消极的反抗。我们没有能以五四抵货取消《二十一条》，以五卅罢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是很不足怪的事。本来革命运动的发展，从宣传而行动，第一步的消极方式，当然只能使统治者阶级受到部分的损失，而争得部分的胜利，不过在旧统治之下稍稍改良受统治阶级的地位，以逐渐争得继续斗争的自由和条件。工人的罢工和商人的罢税、农民的罢租一样，至多只能争到待遇的改良、政治上的自由权利，或者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免除或减轻某种租税。如此逐步地增长平民的力量，而灭杀帝国主义、军阀、士绅、土豪、买办等的势力。这只是革命的准备，

只是行动上实力的斗争，只是革命运动，而还不是革命。

总之，抵制行动（非买、罢工、罢租、罢税）的陆续继起，不但使中国的统治者阶级及其爪牙——军阀、士绅、买办的势力不断地受着打击，他们每次的压迫都受着实力的反抗。而且劳动平民在这日常的实际斗争里逐步地锻炼自己的力量，扩大自己的组织，巩固革命的战线，争得革命的势力，利用治者阶级的部分让步而愈益发展革命的运动，受着治者阶级的镇压，屠杀而愈益坚定革命的决心——这是武装斗争前必不可少的长期准备。

（三）总罢业。示威运动和抵制行动的陆续发展，那渐进的革命运动便应着客观的社会形势而转入突变的革命。消极的反抗转变到积极的反抗。这种时候，往往有短期的总同盟罢业的过渡时期，以便转入武装斗争而建立平民政权。例如俄国一九〇五年及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形势，便是如此——无产阶级参加及主动的革命便是总同盟罢工；资产阶级参加的革命便是总同盟罢业——罢市、罢工、罢课全国举行。中国是帝国主义、军阀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国家，革命民众里可以包含资产阶级的成份，这罢业里便自然会有商人参加。中国革命运动史上已经有两次经验：五四时的罢课、罢市，五卅时的罢工、罢课、罢市。当时都可以有转入积极斗争和直接革命的趋势，当然具体而论，那时客观的社会形势和主观的革命目标，都使这种运动不能急转直下，结果成为普通的革命运动。这种总罢业的意义，必须不仅仅是要求部分的改革、部分的让步，而是停止社会的经常生活，使极广泛的民众注全力于革命，以消极抵制形式，实行各方面直接的积极反抗的准备。中国现在革命运动的发展，使民众不得不预备将来有这种形势之来到。所以我们应当明白，总罢业的斗争方式，本不在抵制治者阶级，使它们受逼迫而让步，这时的罢工、罢税、罢租等，目的不仅仅在乎使治者阶级受些经济损失，而是使它们失去调兵遣将向民众作战的可能（如有时警察、巡捕罢岗参加，兵士离队加入民众，反动报纸不能宣传，财政当局不能筹饷，铁路、海道不能运兵，断绝反革命势力的各种交通……）；这时的罢市、罢课、罢卖（如五卅时断绝外国人粮食），目的当然不在商人、学生自己停止营业和读书，而是使革命潮流扩大勇猛，消灭平时的旧统治下的秩序。这种形势之下，必然要全社会革命民众有组织地准备武装行动，停止一切工作的时候，正是准备直接革命的时候。所以总罢业不是斗争的本身，而是斗争的准备。如果没有急转直下的形势和直接继以武装行动的决心，这种运动自然不能持久，自然不能推翻统治者阶级，而至多只能得到部分的让步。

总之，总罢业的斗争方式，在革命的高潮时是革命运动发展的顶点。过此以往，不是统治者阶级以武力镇压革命，或以让步缓和革命，便是平民阶级直接继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这时的问题，已经不是要求治者阶级让步，而是转入武装的积极反抗，迫使

治者阶级让位，不是平民能否部分地损害治者阶级，而是治者阶级能否保持统治的问题。

（四）武装暴动。武装行动的准备和暴发，固然必须在革命高潮的时候，可是武装民众的工作，却不能和示威、抵制等组织群众的经常的平时运动分开。国家主义派说，国民革命必须全民武装。诚然不错！革命运动发展到顶点时，总罢业之后，必须继以民众的革命武装行动。这种时候，就看武装在谁手里。如果说是“全民”，那么，军阀、土豪、买办、士绅都早已有了武装，不劳国家主义派费心。再加上他们主张停止示威运动等最有力的群众宣传，弄得即使武装人民，其结果，如兵士、警察、保卫团、民团、商团、团防、团练等，也都在反动派手里。那时斗争的形势，农、工、小商的平民，无论如何都来不及取得必要数量的武器，结果必归失败。所以应当说：“武装平民”——就是城市中工会的秘密武装、保卫团等使受充分的革命宣传，准备着他们内部的种种必要线索；乡村中农民协会的武装、团防、民团、土匪等使受特殊的革命宣传，运动他们内部的种种可能成分。总之，要使武力转移于真正的革命平民方面。而这种工作，只有罢工、抗租、示威、游行等实际的日常斗争，能够从政治意义上去锻炼准备；在民众方面，逐次以事实证明他们武装之必要；在团防、商团、警察等方面，逐次以斗争宣传的接触，打破他们拥护旧秩序的信念。这种工作的多方面进行，能一旦有事，城市之中民众立刻能征调自己的力量，开始城市巷战，乡村之中民众能自己估定阵线，开始堡垒战。武装暴动在城市里反抗军警，自然不能时常进行，必须要等待适当的时机；在乡村里反抗土豪、军阀，却可以自筑堡垒，以逸待劳。北京去年的首都革命、广东今年的农民运动，都已经小试民众的武装暴动。这种斗争方式，在欧、美独立国家里，如果革命党能够破坏国家军队的内部，使之中立或革命化，那么，工人的巷战，未始不能使革命胜利。但是，在中国国民革命之中，单是市民、工人、农民的武装暴动，便难以战胜。原因是：一、中国经济落后交通阻梗，乡村里的堡垒战，即使胜利，也只是地方的——全国同时暴动，又是技术上不可能的事；二、城市里大半有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驻军，他们如果用全力扑击，甚至于从日本、印度调遣坚军利兵，那就即使城市巷战暂时胜利，也很难持久；三、再加上殖民地的特殊政治经济状况，使中国军队异常之多，而且大半间接受帝国主义指挥，所以单是民众草创的义军（Partisan），军事技术及军事器械上，能力都不能和敌人抗衡。

总之，武装平民的工作急需进行，要在日常的示威抵制运动里，造成武装在政治上的基础，乡村之中可以进行罢租与义军作战相连的局部斗争，城市之中秘密武装训练，以备革命高潮时随着各地方的总罢业而奋起作战；但是草创的民间武力，既然只能在内地得到局部的胜利，城市里又无持久之可能，所以在中国条件之下必须有规模扩大的武装暴动——革命的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

(五) 革命战争。中国民间的武装暴动，如果没有革命军队的援助和革命党的指导，始终难以战胜。现在的经验，如豫鲁的红枪会、苏皖的大刀会，本是农民失业的暴动反抗，可是他们和政治宣传隔离，和城市工人不能极敏捷地呼应，又没有革命政党和军队的指导援助，势必至于困守一隅。其结果，当然要化为土匪、教匪，或者受军阀、土豪所收买利用，反而变成压迫农民的武装势力。至于城市里，我们还没有一次真正暴动的经验，却只看见所谓商团、保卫团的反动。我们设想平民巷战在某一城市胜利之后，如果革命军队不能和他很快的携手，即使中国军队、警察、商团等能够中立，那时对外的战争，也很不容易抗御帝国主义。因此，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况且帝国主义统治中国，至今是用指挥军阀间接征服民众的方法，用尽种种手段使中国军阀的军队完全以对内作战为目的；民众可以努力宣传兵士，以求取得多数的武力，却不能希望现时的国内军队大部分加入革命如辛亥的旧事，或者最近德、俄革命的经过一样。因此，我们在战略上可以于革命初期，暂时避免和帝国主义的军事冲突，却决不能避免革命军队与反革命军阀大规模的战斗——革命战争。

革命军队既有这样的必要，同时也有充分的可能。一则，中国失业的农民、工人、小商智识阶级，因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充满全国，可以编制他们入正式的军队而加以革命的训练。如今广东的国民革命军（虽然还不完善，然而正可日益巩固、改良），便是已成的事实。只有这种革命军，能做革命战争的主体。再则，帝国主义者虽然力能供给强大的军阀军队，如张作霖、吴佩孚等，可是他们的侵略性自然借此要攫取中国权利，以重价卖军械，以重利借大款，而且必须设法霸持中央政权，于是小军阀便渐渐地没有可能分肥，也没有资格勾结。这些小军阀的困兽之斗，必然使他们反对大军阀，而造成民众宣传这些军队的条件，如岳维峻等简直自愿号称国民军，也是已成的事实。可是这种军队在革命战争里只能作军事上别动队的策应，决非主体。三则，革命军队的训练和武装——军阀既可受之于帝国主义——我们有时便也非常需要无产阶级国家的必要赞助。革命的世界无产阶级，既然因为要完成世界革命而以实力赞助殖民地革命，自然不能需索丝毫中国的权利，甚至于军械的价钱。反动派、妥协派不承认革命战争的必要，所以在革命政府向国内商民筹饷时，便说是“压迫人民”，丝毫都不肯担任革命时不可免的牺牲；在革命政府受国外无产阶级的赞助时，又说是“卖国行为”。这简直是要完全解除革命势力的武装，而使人民听凭帝国主义军阀的宰割。所以造成革命军队的必要，我们应当真切地认识；而造成革命军队的可能，我们应当尽量地应用。自然要认清主体与副手的区别。

至于革命战争的必要，应当认为现时主要的革命职任。况且，反奉战争以来，已经证明军阀间的战争，在现时已经有变成人民与军阀战争的趋势。张、吴联合进攻国

民军，显然是帝国主义间接征服中国的战争。中国人民的革命的防御战已成不可避免的事实。其他各地小军阀的内讧和压迫人民，都不是空口吁求和平所能避免。这些零星的战争、各派军阀之间的纵横捭阖，愈益证明必须武装平民，并利用军阀内争而进展革命运动，使战争变成达到较和平、较自由的境遇之手段，以为总解决的革命战争之战略上的准备。如最近湖南唐生智驱赵，便是一个实例。现时这种局势：北京屠杀，张、吴战胜，民众革命运动深入，准备武装斗争……其势中国平民必须在革命政党指导之下，积极从各方面下手，去建立国民革命伟大的联合战线，实行总解决的革命战争——国民政府的北伐；运用胜利的策略，使敌人武力分散削弱，而革命武力少所牵掣，而后能响应或造成革命运动的最高潮——总同盟罢业和城乡各地的武装暴动；政治上以革命民众的政党为主体，军事上以正式的革命军队为主体，从事于革命的作战……而后中国平民才有澈底解放的希望。革命战争的胜利，先行扫灭帝国主义的种种爪牙，打倒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军阀制度，召集国民会议，从而建立真正民权的独立的政府。那时真正的和平、利于一般平民的和平，才有达到的希望。反动派和短视的士绅资产阶级，只知一味地反对战争。军阀战争时，他们空口哀求和平，结果是为战胜的军阀所利用，以此“和平”抵制战败者的“兴戎”防御。例如张、吴战胜后的王士珍式的和平，只是使北京商民受强迫行使军用票，一般市民、学生、工人都受严重的压迫罢了。革命战争时，他们想必又要大呼“和平”，其实是替受革命平民攻击的军阀说项，保持反革命势力的存在。所以我们对于革命战争的必要，应当尽力宣传，打破伪和平的幻想；我们对于革命战争的不可避免，应当因此而更加积极准备，以免政治上、宣传上、战略上的临时疏忽，弄得失败而延长中国革命的难产。

中国现时的革命时机，正是一切革命斗争的方式都要善于运用，以适应革命战争的主要职任。然而反动派的宣传，却正以灭杀民众对于革命斗争方式的认识为目标。帝国主义的工具有真正尽力，“桀犬吠尧，各为其主呵！”

中国平民的革命政党在这种时机，当然要努力领导民众去从消极反抗进于积极反抗；而民众的客观形势，也必然在这伏流昂进的革命运动里，努力进入猛发突变的革命胜利。中国革命的过去经验和现时形势，正从示威、抵制的斗争之中，要再造成总罢业的革命高潮，各方面准备武装暴动，以实行革命战争。这长期间的艰苦斗争，必然在群众自己的实际生活里，锻炼出革命的武器——各种消极、积极的斗争方式和敏捷致胜的斗争策略，以引导中国平民到胜利的道路上去，与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携手，澈底地打倒帝国主义，免除国际国内的一切战争。

一九二六·四·一二

从洛迦诺到日内瓦

任卓宣

(一) 帝国主义的冲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形态。然从别一方面看来，又是资本主义走到日暮途穷的最后一步，所以帝国主义时代，是资本主义死灭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根据列宁主义的见地，历史上每一个革命之爆发，不仅在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有极大冲突的时期，还要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冲突的时期，只有在这个时期，革命的机会才算成熟，革命的运动才能成功。

在帝国主义时代，最普遍、最显著的冲突是：劳动者与资本家；殖民地与宗主国。但这两种冲突，都是革命阶级形成后的表现。但倘若客观方面——资本家和宗主国的自身，没有冲突，则他们仍有存在之可能。或者他们不是将压服革命势力而得着长治久安，便是两败俱伤，没有出路。

但是现在我们所处的是什么时代呢？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国家除有上面所说那两种冲突外，还有在其本身方面之帝国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冲突。并且这种冲突与那两种冲突一样，日益发展，其速度可说与时俱进。在帝国主义未消灭以前，这种冲突总是一天猛烈一天，一天复杂一天。在平常时，互竞军备，互缔条约，纵横捭阖，千变万化，把一部近代史弄得令读者头痛而还清不出条理来。在战时战后，更不用说了。从普法之战——正是帝国主义开始的时代——以至现在，不都是这个样子的么？

由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战，就是这种帝国主义本身冲突的大爆发。由大战迄今，为时已将八年，不独战败国、战胜国都疮痍未复，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弄得一团糟，而且生出了许多很难解决的问题，如赔偿、债务、仲裁、解除军备等等。因为这样，所以帝国主义的外交家，不得不四处去找办法。不律塞尔、伦敦、巴黎、华盛顿、开恩、热诺、海牙、洛桑、汤吉尔、日内瓦，到处开会，弄得一点安宁没有，而且大大地发生了安宁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真是不独被统治阶级不安宁，统治阶级尤其不安宁；不独战败国家不安宁，战胜国家尤其不安宁。并且事实告诉我们，战胜国中之愈强大的，愈感觉不安宁。这是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和自呈崩溃现象的铁证。但是资本主义是不自死的，所以拥护它的阶级到处去延医救治，及到一九二五年十月五日，张伯伦（Chamberlain）、伯里安（Briand）、路德（Luther）、谢罗热（Scialoja）和帝国主义的佣仆波尔朋古（Paul Boncour）、王德威尔（Vandervelde）等又跑到洛迦诺（Locarno）去，讨论安宁问题。

（二）新的神圣同盟

这个问题到一九二五年才成熟，所以德国在是年二月七日才把它提了出来，自此以后，欧洲报纸，便大讨论而特讨论，列入了各国内阁会议的议事程序。这个问题果真是德国提出的么？不是，这是英国提出的，不过为方便计，由英国驻柏林大使亚伯伦（Abernon）指挥德国奉行罢了。

英国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

英国在现在有两个同阶级的敌人：帝国主义的美和法国。美国财富充实，侵入欧洲的势力日益浩大，显然有把欧洲改成为它的债务国进而为它的殖民地的倾向。这种情形，不独使英国失掉在世界第一强国地位，而且将使英国失掉在欧洲第一强国地位，同时，在中国、在墨西哥等处，又都有利益的冲突。法国自大战后，收回亚尔萨斯罗兰，压服德国，占领鲁尔，经济势力日益膨胀而巩固。并且把中欧、东欧的捷克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夷为附庸。因此，法国在此时实在继承了战前在欧洲与英对抗的德意志。英国为要抵御美国势力，保持欧洲霸主地位，并用其遗传下来的外交手段扶德抑法，罗致小协约诸国使法孤立，就不得不乘着大家都不安宁的时候，挺身而出保障大家的安宁，以巩固自己的势力。此外，英国还有两个异阶级的敌人，就是苏联和殖民地。自苏联出世以后，本其国际无产阶级之前锋和世界被压迫民族之同盟的使命，到处煽动，以致英国殖民地如埃及、印度和中国都起了剧烈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弄得英国的统治摇动不安，至于它本国内的无产阶级，又受共产党和苏联工会之影响，日益革命化。因此，苏联便成为了英帝国主义眼中之钉。团结欧洲各强国来阻止布尔塞维克之西侵，有远见的英帝国主义，自然要出来当一个勇敢的前锋。所以英国必然要发起洛迦诺会议，而且去站在领导的地位。

德国为什么要来奉承英国意旨呢？

德国已经被战胜国压迫得不堪了。然它那帝国主义的野心还在逼它时时去找寻出路，企图恢复旧观。它时时都有如乌尔夫（Wolf）通牒所说的愿望：当德认为适当时，

即要求审查已成为不可施行的条约，并想加入国际联盟去，以会员资格，乘时提出沙尔（Sarre）问题和但泽（Dantzig）问题。何况加入国际联盟和洛迦诺会议去，又可以获得平等地位，而打破协约国对德联合，德国又何乐而不为呢？又，在大战后，土地被分割，德国人在捷克有三·七〇〇·〇〇〇人，在波兰有二·〇〇〇·〇〇〇人，在巨哥有六〇〇·〇〇〇人，在梯罗（Tyrol）有二〇〇·〇〇〇人，以至德国有进国际联盟内去实现它的广泛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必要。至于方兴未艾的无产阶级革命潮，单是美国来帮它遏抑了一下，还嫌不足，必须要另借实业债款来发展生产，从根本上消灭无产阶级革命潮。可是哪一国能够帮助它满足这些欲望呢？四面一看，只有英国，因此，德国便甘心去为英国当佣人，提出安宁问题来。

其他协约国为什么要随声附和呢？

法国、比国、意国、捷克、波兰都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打算。为简明计，我们只须知道这些国家都是英国的债务者和美国的债务者及它们各自的经济困难和阶级敌人，便够了。经济是支配一切的基础，债务者能不将就债权人么？它们不是常常以美银行家为财政上的救星么？美国已放了许多债于欧洲，将来还想继续输出其剩余资本，不是很希望欧洲的和平能够实现么？它们不是都欲痛恨其内面的无产阶级和外面的无产阶级国家么？既然如此，英国提出了的和美国赞同了的安宁问题，法、比、意、捷等国除随声附和，还有什么话可讲？

因为这些缘故，所以安宁问题，就在英美的指导之下，提出了，解决了，定下一个洛迦诺同盟，共包含有七个条约。因为这些缘故，所以洛迦诺是帝国主义化除其内部纷争，以一致对付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之大本营苏联的一个新的神圣同盟。这个新的神圣同盟是以美国为靠山，英国为盟主，法、意等国为侍从的。帝国主义在现在有两条战线：一是对付异阶级的敌人，一是对付同阶级的竞争者。英国方面说来，以及就其他加盟各国方面说来，这个新的神圣同盟，都是把对外、对内两条战线合而为一的统一战线——帝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

（三）国际联盟不中用了

英国为要完成其削弱法国、增加附庸、西抵美利坚、东抗苏联的雄图，而巩固其建筑在无产阶级之掠夺和被压迫民族之臣服这两个基础上的帝国主义，非拉拢德国不成功。因为德国地处中欧，与苏联接壤，若把它孤立起来，则不独自己丧失了一个帮手，而且逼它去亲近苏联。德国也因为它有这种地位，遂以加入国际联盟和其议事会为与英交换的条件。所以《洛迦诺条约》的先决问题，在于拉拢德国；而允许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和其议事会，又是拉拢德国的一个先决问题。

因为这样，所以洛迦诺会议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完毕后，不到五个月，便开国际联盟的特别大会于日内瓦，来解决允许德国加入的问题。这个会共到了五十国代表，由一九二六年三月七日开到十七日，结果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反弄得一班帝国主义者扫兴而去。到日内瓦会议的人，仍然是到洛迦诺会议的人——一班帝国主义者，张伯伦、伯里安、路德、谢罗热及其佣人波尔朋古、王德威尔等。

为什么这次没有成功呢？

任何帝国主义者都有与人共同的利益和独自享有的利益。当这两个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他们不能牺牲任何一个。所以在反苏联的神圣同盟缔结以后，在执行《洛迦诺条约》的日内瓦会议中，他们对于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和其议事会一问题，竟吵闹起来。德国如果加入了国际联盟议事会，英国便多有一个赞成人，势力顿然增大。但在相反一方面，法国势力就要为之削小。因此，法国便为波兰要求一席。同时意国不利于德国势力之扩张，加之德国未来所要提出的少数民族问题，德与奥之合并运动和德国在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地之商业利益，俱在与意冲突，于是意国就赞成波兰的要求。这时乘机起来要求加入议事会的国家，还有西班牙、巴西等国，英国对于这些要求，通通反对，只主张德国加入。因此，双方争执甚力，巴西代表墨龙佛兰果（Mello Franco）以民族的平等和国际联盟的世界性为原则，西班牙代表基龙达隆（Quinones de Leon）甚至以退出相要胁。这时，国际联盟中重要国家便分成了两派：英、瑞（瑞典）、日、比、乌（乌拉圭）五国反对波、西、巴三国的要求；法、意、捷（捷克）西、巴五国赞成。

在这种情形中，于是帝国主义的外交家，遂大弄其把戏，什么全体会、公开会、秘密会、宴客、拜访等，不一而足。可是经过十天的努力，仍然还是一场空。在最后一天，伯里安遂提出了下列的决议文来做结束：

因为遇着了困难，没有把召集此会的目的达到，大会对此，殊为抱歉。它的心愿，渴望这些困难能在九月常会时完全消灭，以便德国届时有加入国际联盟的可能。

自从这个提议通过后，国际联盟大会遂告结束了。然而国际联盟之无能，从此大暴露而特暴露。国际联盟本是帝国主义用以压榨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世界组织，现在连它们内部的问题都不能解决，这不是资本主义崩溃之又一证明么？所以有些报纸说，这次会议“是最重的失败，为自有国际联盟以来所未有”。可是统治阶级始终是要求生存的，所以在散会那时，帝国主义者又决定组织一改组委员会，去讨论改良其

组织事宜，由下次常年大会来取决。

(四) 到安宁之路

日内瓦会议的结果既然如此，《洛迦诺条约》又怎样呢？在日内瓦会议完毕后，洛迦诺派先生们——路德、士托列斯曼（Stresseman）、王德威尔、伯里安、张伯伦、谢罗热、士克冷斯基（Skrzynski）、伯纳士（Benés）八人，曾经发出一个宣言说道：“假使这些困难（障碍他们的共同愿意的困难）永远存在，签字于《洛迦诺条约》的七强代表将抱歉其不能在现时达到它们所曾审定的目的。但是它们是欣喜地来证明一点也不会损害及于它们曾在洛迦诺所实现了的和平——这个和平是同它的价值和力量仍旧存在着的。它们今天依然如昨天一样地结合起来，而坚决地来共同维持它（和平）发展它”。

这些话是实在的么？不然，这完全是骗人的谜语。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就是现社会一切战争的种子、一切混乱的根源。它们结条约，时常都是以和平为名，在那里制造战争。从前的德、奥、意同盟，法、俄结约，英、法协商，哪一次不是大呼和平，哪一次不是制造战争？一九一四年的大战争，根本就是这些同盟、协商的结果。这不是帝国主义的外交史明为我们证明了的么？何况当他们在洛迦诺高呼和平的时候，英、法等国都正在大大地攻打摩洛哥，压迫叙利亚，屠杀中国、印度人民哩！所以“洛迦诺……是一个很小的萌芽”（波尔朋古在法国议院内的话），是一个未来战争的萌芽啊！

《洛迦诺条约》本是名动一时的安宁条约，日内瓦会议本是到安宁之路的会议，无奈在安宁之路上，又生出了不安宁。日内瓦会议之无结果，虽还不能说《洛迦诺条约》就成了一九二四年日内瓦规定的第二，但至少是给予《洛迦诺条约》以莫大打击，而且是又增加了一种冲突。伯里安在此次日内瓦的秘密会中第一次说话就像这样说过：“世界的政治在以后不是向着和平便是向着战争。假使和好在日内瓦破坏了，我们又将在一个互相猜疑的领域之中，各国又重新来互相仇恨，直至互相攻击之日。”以此可知日内瓦之失败，已无异宣布《洛迦诺条约》无效，已完全为我们证明了洛迦诺又是一条不通之路！

这样看来，人类如果要和平、要安宁，只有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一齐团结于世界革命的大营寨——苏维埃，向帝国主义进攻才能得着。帝国主义必然消灭的事实，已日益暴露了。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快快联合起来，到安宁之路！

三月三十日

新经济政策之第五年与苏维埃 政权底下的农民问题

郑超麟

(一)

到一九二六年四月，苏维埃政权底下新经济政策之施行已满足五个年头了。从这个日期推算上去五年，一九二一年四月，是无产阶级国家的一个最大的难关。当时，国内战争是终止了，旧制度的反攻和国外的干涉也因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农民之抵抗而不得逞。在世界战争和国内战争底下呻吟七年的俄国工、农，从此应该可以过和平生活了。然而新的困难又呈现出来：苏维埃工业的生产力仍然不能发展；农民自愿缩减生产；小资产阶级的怨望一天天地增加；农村不自觉地起来反对城市；农民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工、农联合发现破裂的危险，克龙斯德的暴动就是这种危险状况的表示。这时候是必须找得一条出路的。这时候迫得专政的无产阶级对于当时的状况及其现行的制度，加以一番详细的考虑。当时，专政的无产阶级须得了解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的历史相对性，须得确定正确的政策，以度过此难关，而引导无产阶级至革命的最终目的地。

这正确的政策，就是有名的新经济政策。

天才的列宁指示出这新经济政策的道路。也要有他那般的毅力，才能够制服当时流行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心理与幻想，毅然决然施行这新经济政策。

我们都还记得，当新经济政策施行之初，十月革命的一切敌人是怎样欢呼的呢？他们，自帝国主义的政治家至俄国的孟雪维克党人，都欢呼着说：波尔札维克党人“投降了”，共产主义的试验失败了，俄国的资本主义复活了，共产主义已被证明是一种永世不能实现的幻想了。一直到现在，不管新经济政策在这施行的最初五年内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怎样，他们仍然有不少始终认定新经济政策施行是共产主义试验失败的铁证。尤其是目前反赤运动高潮中的中国国家主义者及其他，仍然用这口吻为他们“反赤”的最有力的论据。最近半年前，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大会上的辩论，尤

给国际的和中国的反赤者以新的论据，去证明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的和各国的所谓国情。我们从他们的欢呼中，看出他们完全不了解新经济政策是怎样一回事，其实他们本也就不愿意去了解新经济政策。所以我愿意借新经济政策施行之第五周年的机会，把新经济政策的真正意义指明出来，举出施行后已得的成绩，并叙述由此政策而生的苏维埃政权底下的农民问题。这样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解除一般人向来对苏联的误解，他方面又可以使读者明了最近苏联的状况及其发展前途。

(二)

新经济政策果真是资本主义的复活吗？苏联最近五年经济的发展可以答复我们。

我们试拿五年前新经济政策未曾施行时的状况去比较现在新经济政策施行五年后的状况，则不难看出这中间有很大的进步。五年前，经过大乱之后，社会生产，无论工业的或农业的，都混乱已极。当时谈不上有计划的建设的生产，当时一切工业生产首先是供给军事需要的，一切农产品都尽量拿去维持兵士和工人的生活，生产品不能流通，工业和农业中间仿佛是没有关系的不相交易的。而今则大不相同了。现在，大体说，苏联的经济已将近恢复战前状况。尤以过去一年发展最快。工人的工资差不多达到战前的购买力；工业和农业已与战前相去不个远了。同时，最重要的，还是经济中社会主义元素之迅速的发展。国有的产业大大发达起来，社会主义的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新经济政策乃是走向社会主义必经的步骤，决不是恢复资本主义。

十月革命的敌人自然否认这个。他们无非要证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毕竟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他们所持的许多论据当中，有一种论据这样说：即许依据你们所说，假定社会主义社会是可以实现的，但按照你们的理论，现在的经济既然是国际的经济，各国间有极密切的联系，那么在四周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里一个国家如苏联，安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呢？这种论据可以说是他们的最有力的论据了。在一个国家里如苏联究竟能不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呢？我们须得先解答这个问题，然后才能真正了解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即才能确信新经济政策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而不是恢复资本主义的。

这个问题——苏联能否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是与别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先发生在技术经济落后的俄国，有连带关系的。因为十月革命敌人，既然假充马克思主义的内行，认定必须各国无产阶级同时起来革命，然后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成功；他们既然否认任何一国中的无产阶级有先起革命的可能，何况这革命又起在技术经济落后的俄国？然而俄国无产阶级毕竟违反了他们的意志而起来革命而夺得政权了，于是，他们只好武断预言说：这种政权是不能持久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久即将覆灭，而

俄国不久即将恢复资本主义——这就是说：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这二个问题中间就是怎么一种连带关系。关于俄国为什么先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这一问题，列宁已经解答过了。十月革命不仅是“俄国的”革命，乃是世界革命的开始。惟其因为现代经济组织是国际的，而革命亦是国际的，所以帝国主义大战既然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这革命既然必须爆发，这革命究竟先在哪个国家爆发呢？那是次要的问题。而这革命结果在俄国爆发出来，则因为有特别的原因，如俄皇压迫过甚、农民运动易于联合无产阶级运动、有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宣传和经验……（见《新青年》列宁号《列宁的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位置》）认真说，十月革命乃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俄国无产阶级，与世界资产阶级的作战，假使没有世界无产阶级大队的后援，俄国无产阶级是不会夺得政权，即夺得亦不能持久的。国际帝国主义为什么不帮助克伦斯基镇压一九一七年的俄国赤化呢？随后为什么不继续封锁俄国呢？随后为什么不继续资助反革命党，致台尼金、高尔恰克、维昂克等先后支持不住而覆灭了？随后又为什么承认苏联呢？换一句话说：国际帝国主义为什么不扑灭这一无产阶级革命呢？这并非因为帝国主义的慈悲，这乃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援助俄国无产阶级及帝国主义国家中间的互相冲突。即此便是俄国革命之国际性的说明；即此亦便是技术经济落后国家能够先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且能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明。

这样的说明，同样亦可应用于别一个问题，即在这技术经济落后的国家里，能否单独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十月革命的爆发已经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到第九年，已经是一个国家里单独建设社会主义初步之最大的成绩。肯定十月革命，而又否定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建设社会主义——那是一种矛盾。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势力，既然爆发这一俄国革命，既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至第九年，这革命势力若不日就消沉下去，安见得再不能巩固这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发展，同时也是助长世界革命势力的一最有力的元素。帝国主义不能进攻苏联是因各国无产阶级运动及殖民地运动的牵制，但帝国主义未敢十分剥削、压迫各国无产阶级运动和殖民地运动，也是因苏联的牵制。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继续巩固和发展，同时亦就是在俄国里建设社会主义。所以，若世界革命势力继续发展，不至于日就消沉下去，不问各国无产阶级是否夺得政权，在苏联是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据国际环境为理由，笼统断定苏联单独是一个国家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论据，而今不攻自破了。

现在，我们还须打破另一理由，即根据俄国技术经济的落后去断定俄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由尤其不能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存在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保证。所谓技术经济落后的缺点，当然不是指技术经济本身不够建设社会主义——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能够促成技术经济进步的，当然是指因这种落后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关系（小资产

阶级农民占多数)足以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国家里,无产阶级既然占少数,则自然应有巧妙的政策对于农民及一班小资产阶级:工、农的亲密联合是这种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要件。在这种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底下,工农联合的破裂是可能的,然而不是必然的,列宁十分明了这个。他说:“自然,在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建立在工、农二阶级的合作上面的……在相当范围之内,所谓‘新经济政策者’(Nepman)即资产阶级也加入这合作之内。如果这些阶级中间发生了严重的阶级冲突,那么破裂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并不必定含有这种破裂的根源,而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全党的主要任务,即在留心可以引起这种破裂的环境,并预防这种环境的发生。因为我们的共和国之命运,终究是要看农民群众还是与工人阶级携手并进,保存相互间的诚意联合呢,还是结合于‘新经济政策者’即新资产阶级,而离开工人与工人破裂呢?我们愈加看清白了这二条出路,工人和农民愈加了解了这二条出路,则我们愈有幸运可以避免这种足以倾覆苏维埃共和国的破裂。”总之,列宁明显看出工、农联合的破裂能够倾覆苏维埃共和国,提起我们注意。但他同时又说明这种倾覆不是必然的,即工农是能联合到底,即无产阶级专政是能日趋巩固而逐渐改良技术经济之落后的,亦即社会主义是能在一个国家内建设起来的。

无论是国外的困难(国际帝国主义的进攻)或是国内的困难(技术经济的落后),一个国家如苏联,仍然可以单独建设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敌人的那种论据各方面都不能成立了。

(三)

了解了在一个国家里,纵然他国无产阶级未曾夺得政权,纵然技术经济比较落后,仍然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然后,我们才能够了解新经济政策的意义。

他们既然说苏联不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自然把新经济政策看做是无产阶级的退守,看做是俄国资本主义的恢复。实际上不是这种简单的。不错,一九二一年春天,新经济政策之施行确含有退守的意义。上面说过,在一九二一年春天的时候,国外的干涉国内的战争固然停止,但现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新经济政策未施行以前,各地方即自然而然地发生自由的交易,此种现象日益扩大而普遍起来。这是经济的必然的要求。必须适应这种要求,才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之最大胜利品——的存在。军事共产主义之历史相对性到此是很明显的。革命后施行的军事共产主义,绝不如一般人所想象,以为就是“共产”,其实乃是封锁内乱中之必要的一种设施,亦不过像古代或欧战中围城里食粮及一切必需品之公共分配而已。当时只顾怎样分配这些必需品于前敌的兵士和城市饥饿的工人,维持他们的生存以抵御敌

人的进攻并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初非怎样发展城市工业和农村生产的意思。所谓军事共产主义就是这么一种任务。军事共产主义并非就是“共产主义的生产”。凡以为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即刻便可“宣布共产”，即刻便可组织完成的共产主义制度，那是完全不明了革命的、复杂的、具体的问题，完全不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后，社会里（不仅是俄国如此）前时代的遗留在经济生活上还占很大的位置。这些遗留中最有力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上个人利益的动机。个人动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要素，自然与共产主义生产之集体利益的动机不能相容，然而在无产阶级初初夺得政权之后，这种个人动机是很强的，是一时不易铲除的，若决然违反这些动机做去，则一切生产皆将不可能，当时农民及其他小资产者的怠工便是一个明证。所以新经济政策不得不施行，无产阶级政权不得不给予私人生产以一些自由，不得不恢复若干的资本主义关系，不得不有市场的流通货币交易所银行等。在这点关系上说，新经济政策自然是一种让步，一种退守。

然而新经济政策仅仅有这样的一种退守的意义吗？不然。新经济政策一方面是退守，他方面又是改造经济生活，又是进攻。

我们既然知道，完成的共产主义制度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即刻便能实现的，若强行做去，则结果连无产阶级政权都保持不住。此时的主要任务就在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政权保持住了，已经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之最有力的保证。新经济政策问题提出来，适足证明无产阶级的任务已经不只要保持其政权的存在，而且也要发展其政权底下的生产力了。新经济政策施行结果，战争革命中破产、混乱的经济得以整理、改造起来，得以向前发展。而最重要的，便是无产阶级政权也跟着日就巩固和发展，便是这种经济的复活是在无产阶级政权指导之下进行的。现在，大工业百分之九十五操在无产阶级手里，私人资本虽然能够存在且也能发展，但私人资本的自由是有限制的。一九二一年春天，无产阶级政权提出了本身存在的问题，到了现在，经过新经济政策施行五年之后，无产阶级政权已经巩固了，而且有无限的发展前途。这一件明显的事实证明出来，怎样还能够说，新经济政策仅仅是退守的呢？怎样还能够说新经济政策不是进攻的呢？

新经济政策不仅是退守的，而且是进攻的，不仅是恢复若干的资本主义关系，而且即以此建设社会主义。列宁不止一次说，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将进展到社会主义的俄罗斯。这是怎样说呢？如果新经济政策仅仅是退守的，则只能够恢复到资本主义的俄罗斯。惟其因为新经济政策兼有进攻的意义，所以施行新经济政策，同时即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所以斯大林在半年前俄国共产党第十四大会上确定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说：“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的特殊政策，允许资本主义存在而操最高权于无产

阶级国家手中，预计资本主义元素和社会主义元素的斗争，预计社会主义元素的作用日益长大起来制服资本主义元素，预计社会主义元素克胜资本主义元素，预计消灭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地基。谁不了解新经济政策这个过渡的二重性，谁就离开了列宁主义。”

我们既然驳斥了那以为新经济政策仅仅是退守的这—种错误观念之后，则其他种种以为新经济政策是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等谣言就可不攻自破了。但另外还有二种观念：以为新经济政策是世界革命停顿中的政策或，以为新经济政策是小资产阶级国家的政策，也需要我们加以纠正。

第一种观念是错误的。因为世界革命固然能够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但新经济政策并非因为世界革命停顿才去施行。新经济政策底下有市场卖买的关系，这种关系结果是要消灭的。但是怎样消灭呢？显然是由农民小资产者逐渐组织起来，由协作社组织发展逐渐结合于国家工业，以消灭一切市场卖买关系的需要，绝不是经政府下一道命令“宣布共产”可以做到。世界革命成功，各国无产阶级能够在技术经济上帮助俄国，促成社会主义的建设，缩短新经济政策的时期，这自然不错，然而即许世界革命迅速发展新经济政策本身还是需要的。这就是说，世界革命停顿，并不能用来说明施行新经济政策的理由。

第二种观念也是错误的。因为小资产阶级占很大势力的国家如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后，固然非施行新经济政策不可，但即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如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后，又何尝即刻便可“宣布共产”？无论在任何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商业是不能即刻废除的，因为无论任何国家都有复杂的经济组织，由农民手工业的小生产一直到大生产。纯粹大生产的国家是没有的。小生产不消灭，则商业必不能消灭，即必须施行新经济政策。不过小生产势力较小农民占全国人口较少数数的国家，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时期短些，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速些罢了。这种意义是很重要的。第三国际第五次大会中，郑重指出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意义，告诉各国共产党人说：新经济政策不是俄国单独适用的政策，是适合各国的政策。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后，即许世界革命成功后，新经济政策的施行也是不可免的。

“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唯一正确的经济政策”（列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代之经济组织。新经济政策不仅是退守的，不仅是暂时的，不仅是小资产阶级国家中特有的，乃是这过渡时代之必然的经济组织。

（四）

与新经济政策意义连带而生的—个问题，便是苏联的国家工业是不是国家资本

主义？

十月革命的敌人既然把新经济政策之施行看做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退守、让步，他们现在纵然看见这五年的成绩使俄国的经济恢复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自然要把这恢复看做是资本主义的恢复，即自然要说新经济政策下的生产关系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

新经济政策底下的俄国有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实在的。列宁自己而且屡屡提起来说。在这里，他们很可以从《列宁全集》中找出许多论据，去证明新经济政策底下的俄国的确有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的国家主义者和无政府研究系党人，为他们的反赤利益，喜欢拿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来证明“赤色帝国主义”和白色帝国主义根本上是一件东西。他们的论据是假借于国际反赤党的消息游记和论文的，可惜他们不曾直接从《列宁全集》里去找寻更有力的论据。我们可以替他们做这工作。列宁的论文演说和其著作里，说到苏俄有国家资本主义存在，是有很多处的。

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即新经济政策施行以前三年，列宁即讲演说：“实在说来，国家资本主义是能使我们向前进一步。如果我们于不久之后能在俄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那就是我们的胜利。”正当开始施行新经济政策时（一九二一年四月），列宁又讲演说：“在这环境底下，国家资本主义是什么？就是小生产的结合。资本结合小生产，资本是从小生产中生长出来的。人们不能忽略这个。是的，贸易自由即表明资本主义的增长，……只要小经济存在，只要交易自由存在，资本主义便发现出来。”“一九二一年春天的政治局面指出，在许多经济问题上，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回转到国家资本主义的位置……”“在一九二一年春天，我们处在明显的局势：没有直接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要在许多经济范围内回转到国家资本主义。”

这些例，我们再可举出许多。但以上这些，已经足供我们的反赤者拿去说明，列宁自己也承认苏俄是国家资本主义了。他们的逻辑自然允许他们推论出：凡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就有帝国主义的倾向，苏俄既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故苏俄亦有帝国主义的倾向，即是赤色帝国主义。事实是如此吗？中国的以及国际的反赤者不要太高兴了。说苏俄有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是承认的。然而苏俄不是仅仅有国家资本主义。

苏俄有非常复杂的经济组织，其中认真说起来，从原始的经济组织到最高的经济组织，种种都有。大体言之，列宁分苏俄的经济组织为五种不同的形式：“第一，是宗法的经济，如自给的农民经济，游荡的或半游荡的经济皆是——这种经济，俄国非常之多；第二，是小商品的经济，在市场出卖其生产品；第三，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有资本家的出现，具有小的私人经济的资本；第四，是国家资本主义；第五，是社会主义。”可见，国家资本主义不过是苏俄复杂的经济组织中之一种，此外还有别的经济，

还有比国家资本主义更高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

我们只能够承认苏俄有国家资本主义，但不能承认苏俄全部经济完全是国家资本主义。

苏俄最高的、最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是国家工业。国家工业是社会主义的性质，绝不能混合于国家资本主义。一般的错误，便在把这国家工业和国家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这是应该纠正的。苏俄的国家工业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为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无论是在资产阶级专政底下或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都必然表现出二阶级的对抗：剥削的、占有生产机关的阶级和被剥削的、没有生产机关的阶级。苏俄的国家工业则不然，在这国家工业中，只有一个阶级——无产阶级，占有生产机关的是它，生产的也是它。试举例来说，譬如租借某个矿山给外国资本家开采，这产业自然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在这产业里显然分化二个阶级：外国的资本家和俄国的工人。譬如国家经营的某条铁道，这产业自然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在这产业里，工人不是被剥削的，是占有生产机关的，营业的赢余是用来发展经济并改善工人的生活。这种差别异常明显。苏俄最高的、最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国家工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我们的反赤者之所谓赤色帝国主义论，是未曾明了这一重要之点。他们把国家工业也看做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忘记了在苏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普通只指外国资本所租借的产业及少数私人所经营的大产业而言，其意义、其作用远不及国家工业，更说不到能够支配全国的经济。

何况，国家资本主义本身，在资产阶级专政底下和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又各不同。在苏俄，资本主义的产业不是绝对自由的，而是有限制的，而是要受无产阶级政权的监督和指挥。

在这里，中国的以及国际的反赤者，自然有个驳难。以为苏俄的国家工业即许不是资本主义，但也不是社会主义，因为里头管理上譬如有许多官僚习气等。不错，苏俄的国家工业现时自然还有许多前代遗留下来的缺点，自然还不算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生产。然而，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缺点，便以为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生产。无论这些缺点是很多的、很大的，但苏俄国家工业的根本性质仍是不变的，即这种工业无论如何是无产阶级所有，为自己利益生产，营业所得绝不归于资本家，而归于提高无产阶级自己生活或用在发展经济上面。这个根本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切不可忽视了。这同样可以拿无产阶级的国家相比较。现在就国家的组织来说，自然有许多资产阶级国家组织得比较苏维埃政府还完善而周密，苏维埃政府自然有许多缺点。然而这些国家和苏维埃政府有个根本的差别，即这些国家是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而苏维埃政府是保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无论苏维埃政府有若何缺点，但其根本的无产阶级国家意义，仍

然保存着不会失去，同样，也就可以说明苏俄国家工业确实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性质。

我们指出了苏俄经济组织中之社会主义的元素，而且说这元素在苏俄经济是很重要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指出其资本主义的元素，因为苏俄确实除国家资本主义之外，还有私人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生产以及自给的农民经济，这也是产生资本主义元素的泉源。新经济政策施行五年以来，社会主义元素日益发展，同时资本主义元素亦跟着发展，四面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及与这些国家发生密切的商业关系，都是促成苏俄资本主义元素发展之有力的条件。于是这二种不同元素势力的比较，遂成了一重要的问题。在一九二三—二四年，国家资本（社会主义元素）占全部生产之百分之七六，私人资本（资本主义元素）则占百分之二三·七；在一九二四—二五年，国家资本占百分之七九·三，私人资本则占百分之二〇·七；预算一九二五—二六年，国家资本至少将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私人资本则占百分之二十以下。在绝对的数目上，私人资本是年年增加的，但国家资本增加得更快；所以在百分比上，国家资本势力本就高出于私人资本之上，何况且年年还在增加？这都证明在这二种元素的竞争当中，社会主义是占优势的，将能制胜资本主义而达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于此益加可以证明：即令他国无产阶级革命尚未成功，苏俄无产阶级亦有能力建设社会主义；而今社会主义元素的发展，乃是新经济政策施行的结果，更可证明新经济政策确有进攻的作用了。

（五）

以上这些问题——在一个国家内单独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新经济政策的意义问题、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其实并不是新的问题，然而在现在，新经济政策施行之第五年，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五年的实际经验已经能够允许我们对这些问题给个确定的答复；他方面，不久之前俄国共产党第十四大会恰正提出这些问题，恰正为这些问题发生剧烈的辩论。因此，这些旧问题就重新提出来，不仅在俄国共产党内部，而且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前面。

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大会席上，因这些问题形成了新的反对派。他们对这些问题的主张，可惜恰同十月革命的敌人有类似的见解。国际帝国主义及其佣仆——社会民主派，所以当大会开会时，散放许多谣言，甚至于说俄国共产党的分裂此次必不可避免了。然而经过大会决议之后，这新反对派已宣布服从，俄国共产党仍然是整个的列宁主义的党，帝国主义及其佣仆终于失望，他们的造谣亦无施其技了。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抵抗他们的造谣，特于闭会后给各国共产党一封公开的信，说明这次大会的真相。这次大会为什么发生新的反对派而引起剧烈的辩论？这封信中就指明其客观

的原因出来：

过去的一年是经济大发展之年：工业和农业差不多已经达到战前的水平线；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元素大有进步并增加其密度。他方面，这农民占人口多数的社会里的过渡性和矛盾性，不可免地要表现出来，即与社会主义元素并行进步的，还有——纵然是在很低的程度——资本主义元素（特别在商业资本中）和农村的富农分子。目前这一发展的阶段，在农村有过剩的劳动力，在城市有失业和不熟练的、尚未分配工作的工人分子（特别是才从农村来的工人）——这种社会矛盾的增加，就在党的前面提出了俄国进化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之具体的问题。

世界革命之延缓、资本主义之相对的稳定以及国内阶级矛盾的增加，使党内发生某种的失望。这种失望，便由反对派所提出而为我们辩论对象的各种提案，从思想上表现出来。

可知，新经济政策施行五年之后，这些旧问题重新提出来，其中是有这么一种客观的原因。惟其有上述的足令人发生某种失望的环境，所以有许多人，甚至俄国共产党内部重要的分子，忘记了五年来新经济政策的成绩，而对于新经济政策本身起了怀疑。他们致疑于一个国家有单独建设社会主义之可能；他们致疑于新经济政策有进攻的意义；他们致疑于俄国国家工业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性质。这些怀疑结果必然要引起了别一个更重大的问题——苏维埃政权底下的农民问题。因为工、农二阶级的关系是无产阶级政权之生死关头，这一个国家施行新经济政策能否建设社会主义成功，也必须看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政策怎样，工、农的联合是怎样。

这是重要的问题。我们须注意这是无产阶级政权巩固底下的农民问题。要了解这问题的特殊意义，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农民问题一般的意义。

无产阶级专政底下，农民的阶级地位比在资本主义社会内的不同，比在封建社会内的更加不同。在封建社会，农民真正是一个阶级，而且是根本的社会阶级之一。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认真说，农民已经不是一个阶级了，因为在资本主义剥削下，农民不断地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但资本主义社会毕竟还保存许多封建社会的元素，还有多量农民群众存在，因此，资本主义社会里农民的地位是矛盾的：对地主而言，农民可当作一个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而言，农民不是一个阶级。资本主义推倒后，农民的社会地位更加不同，可想而知了。所以，我们在农民问题中应该注意农民的分化，随各时代的社会、随各时代革命的性质，去解决此问题，去确定无产阶级与农民应该处在哪种关系之上。

在落后的国家里，封建社会的元素还保存着，而在农业革命即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正当时令时，譬如在殖民地及东欧资本主义尚未发达的国家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前的俄国，无产阶级能够把农民看做整个的阶级，看做可以变成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进行中，一切农民连富农在内，都联合于无产阶级一致起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当时列宁发出的口号是：“与整个的农民阶级联合反对俄皇和地主，而使自由派资产阶级中立。”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当无产阶级革命时，形势就改变了。农民之中只有一部分——小农——可以变成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其余则或趋于反动（富农）或站在中立的地位。俄国十月革命及以后内乱的几年中，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当时列宁发出的口号是：“与贫农联合反对整个的资产阶级，而使中农中立。”此时，再不能发出“联合整个的农民阶级”口号了，因为富农——农村资产阶级——已联合于城市资产阶级，只有反对无产阶级，决不能与无产阶级联合，即中农亦只好使之中立。因为中农是工于计算的：谁有势力些，就与谁联合起来，中农要和无产阶级联合，一定是要等无产阶级确实估得优势以后。可是到了革命确定胜利，无产阶级政权巩固了之后，形势又改变了。中农已经看出无产阶级的优势，已经愿意和无产阶级联合了。现在的俄国就是唯一的例。这时，列宁也就看清了局势，而发出最新的口号：“无产阶级和小农与中农联合起来。”这口号是唯一正确的。这时与中农联合不仅客观上已有可能，而且为社会主义建设计，非有中农切实参加不可，只是使中农中立是不够的。可见，农民问题是十分具体而复杂的问题，是随各时代革命进行步骤而改变其形态，因而各异其解决方法的。

列宁的农民问题之三个不同的口号，正适合于革命进行步骤的三个不同的时代。由第一口号过渡到第二口号和由第二口号过渡到第三口号，这二个过渡算是革命进行上的紧要关头，在这紧要关头必须有远大的、深切的慧眼，及时改变口号，才可避免陷革命于失败的危险。列宁真是天才！他在十月革命之际，立即丢去了旧的联合整个农民阶级的口号，而专在小农里去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他到了无产阶级政权将近巩固的时候，俄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大会之际，又立即发出新的口号。他在这次大会的演说中，即有一段：“旧时代的社会主义之最优良的代表者，当他们还相信革命、还以理论准备革命的时代，他们常说到农民阶级的中立。换一句话说，即使这中等的农民阶级纵然不积极地赞助无产阶级革命，至少也不要来妨碍我们的工作。这问题这样抽象的理论地提出，我们是完全明了的，可是还不够用。我们已经来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根据农村工作的经验，必然具体地、详细地确定建立与中农密切联盟的政策之主要的法则。”列宁这段演说就成了俄国共产党目前的农民政策之理论的基础了。要解决农民问题，尤其是要解决苏维埃政权底下目前的农民问题，我们必须十分了解列宁的

这个教训。

俄国共产党此次大会，既如前所说，不可免地要提出目前的农民问题。在这大会上，对这问题不幸发生了二种错误的倾向，正因为不了解列宁的这个教训。

第一种错误倾向是忽视了富农的危险。他们看见俄国经济中社会主义元素的发展，而忘记了资本主义元素也跟着发展，虽然缓些，但富农在农村中积聚其势力，且逐渐与城市资产阶级势力有联合的倾向，都是明显的事实。忘记了这事实，而忽视富农的危险，则任其自由发展，结果必将摇动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本身。这种倾向分明忘记列宁的教训，分明没有知道在这时代，富农尤其不能与无产阶级联合，而时时想抬头起来，去恢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但这种倾向的错误是一般人所能明了的，是比较容易纠正的，故其危险性并不十分大。

第二种错误的倾向则恰相反，是重视了富农的危险，即忽视了中农的作用。他们同样也因为不了解列宁的教训，他们还只记着无产阶级革命中及其政权未巩固时的农民问题口号，即他们仍采用联合小农、攻击富农的政策，对于中农并不积极与之作亲密的联合。他们忽视了中农的作用，因为他们只记得旧理论，仍以为农民是继续分化的，一部分变成富农，一部分变成中农，殊不知这种分化的过程已经改变了。不错，无产阶级革命后，农民自然要继续分化，当然不会仍旧保存着整个的农民阶级，但这种分化的过程，因新的环境，而改变其方向。这新的环境是什么？就是十月革命的分给土地于农民。以前地主、贵族的土地被革命没收后，即分给农民，因此中农不惟未曾分化而减少，反倒增加了势力，即列宁所谓俄国“中农化了”。他们未曾了解“中农化”的俄国，所以看见富农的危险，即惊惶万状，因而怀疑到新经济政策的本身，以为其施行只造成了国家资本主义，而在一个国家内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种倾向的错误是比较少有人明了的，是比较难纠正的，故其危险性就比较得大。

此次俄国共产党大会注意打击这二种错误的倾向，特别打击第二种倾向。大会上所谓新反对派就是代表第二种倾向，大会的辩论因此倾向遂连类涉及于以上列举诸问题，如一个国家能否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是否只是退守的、俄国国家主义是否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等。辩论结果，大会明显指出新反对派的错误，而对于这些问题，都有很明显、很确定的决议。

(六)

这次俄国共产党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议决案中，对于一个国家能否单独建设社会主义一问题，指出：

我们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有“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之一切必要的条件”（列宁），大会以为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乃是吾党的根本任务。过去一年完全证实这话的正确性。其他各国无产阶级必然帮助我们，但在其尚未取得政权以前，工人阶级没有外国资本的所谓“帮助”，又与国内私人资本争斗之中，它与农民的根本群众联合起来，已经达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之初步的重大的成绩。

对于新经济政策是否只是退守的和国家工业是否属于国家资本主义二问题，议决案指出：

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是进攻的，苏联经济是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业渐渐变成人民经济的前锋，领导全部的人民经济。

解决这些任务（即大会委托新的中央去执行的经济建设的任务）的必要条件之一，即是与那不信我们的国家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作战，即是与那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性”（列宁）的企业看做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人作战。这种思想的倾向，使群众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尤其对于社会主义的工业没有自觉的关系，阻碍经济中社会主义元素的增长，并促进私人资本易于制胜社会主义元素。因此，大会认为必须有广大的教育工作，去制服这种违反列宁主义的倾向。

对于苏维埃政权巩固底下的农民问题，议决案指出：

如果小农，首先是农工，是无产阶级在农村的支柱，那么中农是而且应该是无产阶级之亲密的同盟者。一分钟亦切勿忘记了，取消地主田产和给予地主土地于农民手中之结果，削弱农村中富农势力之结果，以及禁止土地买卖（土地收归国有）的结果，中农异常强盛起来，这些分子现在纵然尚在分化过程中，却形成农民的根本群众。没有这些分子为亲密的同盟者，或者只限于使这些分子中立，那么，现在，无产阶级阶级专政巩固之后，是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因为农村中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道路，就在于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国家信托机关以及在无产阶级手里其他机关之经济指导权的生长底下，引导农民根本群众进于协作社的组织，并保证这种组织之社会主义的发展，利用、制服并限制其资本主义的元素。因此，凡忽视中农，不了解其特别重要的作用，企图使党放弃与之亲密联合的口号而回转于过时的使之中立的口号“惧怕中农”——客观上就要达到破坏无产阶

级专政，因为这样便分裂了工、农联合了。

从此，无产阶级国家之真相愈明显排列于吾人的面前。苏联成了全世界革命的灯塔。全世界的被压迫者都随这灯塔的指示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

今日的美国

觉 奴

（一）虎视全世界的美国帝国主义

为什么美国的资产阶级很傲然地在去年（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举行空前的海陆军会操式，并举行空前的工业展览会，以表示出他在全世界的权威和帝国主义的贪欲？为什么美国的资产阶级居然选择美洲宣告独立的日子来完成这种政治和经济的示威？

这种选择并没有什么可怪；在合众国的资产阶级看来，七月四日已经不是脱离大不列颠之束缚的民族解放的历史的标记。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这个日子乃是表示美国帝国主义在国际的政治舞台上大施威吓的日子，这种威吓照准无数民族的独立自由施行打击，并照准国际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大举进攻。

（二）美国帝国主义的发展

合众国发展的历史，从他反抗英吉利起，可以分作三个时期，这些时期表明经济进化的各种相异的阶段。

从一七六三年到一八一五年，美国的资产阶级正在为他们的民族独立的生存权奋斗。

从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九三年，美国的资产阶级便实行巩固他们的权力，并且把生产和交通机关集中在他们手里。经济的发展经过了这样一个阶段，美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得到了非常集中的政治权力的基础，从此他们可以无限制的开发全国的富源。

从经济的观点上看，一八九三年实在是第三时期的序幕：这便是美国帝国主义发展到最后一步的帝国主义的时期。此后美国资产阶级所谈的是：“势力范围”“远东门户开放”“太平洋上的霸权”。

从政治的观点上看，美国入于帝国主义时期在一八九八年。这就是美、西战争美国得胜的那一年。在和约签定以后，美国的资产阶级马上把墨西哥和加来比都变亚美

利坚的湖沼。古巴（Cuba）、波尔多利哥（Porto-Rioo）菲律宾（Philipines）和夏威夷群岛（Les ils Hawai）都马上落在瓦儿街（Wall Street）银行家的经理人——华盛顿政府的统治下。从此时起，美国帝国主义已经按着一日千里的加速步调向前发展。

（三）美国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

在美洲中部和加来比海（La mer des Caraibes）沿岸的地方，合众国的资产阶级此时已占有一五〇·〇〇〇方英里地积，在中间生息的居民为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人。瓦儿街的海军旗雄飞于太平洋上的诸岛，这些岛的面积大约为一二五·〇〇〇方英里，而生息其中的居民差不多到一五·〇〇〇·〇〇〇人。这些土地面积的总和等于英、法、比三国面积的全部。

美洲真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源泉。这中间有一个原因是很重大的。帝国主义的亚美利加并不是为合众国与亚拉斯加所占有的一大片土地。帝国主义的亚美利加现在至少已经有一洲。实际上它已不仅是一洲而是两个大陆。在某些关系上说，它乃是一个特殊世界。合众国此时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资产阶级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有良好无比的港口。美国的资产阶级有布满北美、中美、南美的铁道。

辛普来（Simple）在他所著的《美洲的历史及其地理形势》（*Histoire et conditions Geographiques de l' Amerique*）一书中很明白地说出美国帝国主义政略之关键。

合众国历史上的最重要的地理的特质，在昔它的地位是正对着大西洋前面的欧洲。它的将来的历史上的最重要的地理的特质似乎将使它的地位对着太平洋对岸的亚洲。

没有人相信世界大战能把合众国弄成支配帝国主义的强力，这种判断，就好的方面说，只含有一半真理。

美国帝国主义变成国际帝国主义政治舞台上的统治力量仅仅是时间的问题。在一个独霸局面之下，拥有无限制的自然的富源，开发国家财富的优良的技术，在地理上的战略的优越地位，所有这些重要的元素，都是足以使美国帝国主义达到统治世界之重要基件。

世界大战虽不能把合众国弄成支配帝国主义的强力，但它确实使这个发展的步调特别加速的唯一力量。消灭了欧洲对美洲的仇恨，帮助了合众国经济力的发展，世界大战不过巩固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罢了。

(四) 美洲的富源

我们现在已经有同等重要的三种经济力量在我们手里：铁、钢和煤炭。此外，我们有很丰富的农产。现在我们要希望成为这种经济力量的制造场，更应该成为它的银行家。

这是美国银行家协会在三十年前举行开幕式，该会主席的演说词中的几句话。到现在，这些希望已经变成了事实。美洲有超过世界一半的金子；它出产的煤为世界额的43%；铁为54%；钢为64%；棉花为70%；木料为52%。就靴子说，美洲制造的为世界制造的总数的40%，而摩托车的产额竟占世界产出总额的90%。

亚美利坚所有的铁道超过全世界铁道之半。世界四分之三的电话完全在美国境内。

至于劳动生产额，美国劳动者是非常健壮的，他们是构成这种有组织的、优良的生产和交换机关的机轮。现在一个美国金属工人每天工作的产额多于美国宣告独立（一八七六年七月四日）之前十倍。一个炼铁工人每天的产额多于大不列颠工人三倍有余。一个美国矿工每天所掘的煤炭比合众国宪法公布之年（一七九七）以前多八倍。在同样的时间，一个美国矿工比英国矿工要多掘二倍至三倍的煤炭。

(五) 海陆军势力之巩固

美国的资产阶级不断地努力扩张殖民地。美国的资产阶级同时也特别注意尽可能地提防反对他们的帝国主义政策之内部冲突。为得要保障他们现在的权力、他们的势力范围、他们的资本独霸范围，并且要消灭一切足以阻止他们的计划和内部的帝国主义的行动的仇敌，以达到对于全世界富源与市场之统治，瓦儿街的银行家自不能不预备着强大无比的海、陆军势力。

因此美国帝国主义的国防预算，用最近十年比较，已增加超过两倍。从一九一五年，美国的陆军已经由二〇〇·〇〇〇人扩充到四〇〇·〇〇〇人。在此时代，普通人民受过军事教育的已由二四三·八六五人增加到五〇四·〇〇〇人。

依照一九二〇年公布的关于国防的法令，美国全国的军区都已重新编制，并且集中化。它们已经安置好了创造全国强大军队之基础。合众国现在共分九大军区。参谋局副长曾经宣布，现在的计划是要组织成一个可以出动的三百万人之谱的军事势力。他并且说，在去年，美国政府为创设初级的和中级的军官养成所，已用去三·〇〇〇·〇〇〇美金。

为得要使所有的军队可攻可守，必须要能够调动迅速。要保证这种调动之成功，柯立基（Coolidge）曾经号召全国人民演习。在一九二四年，有一六·〇〇〇·〇〇〇人曾经参加这种演习，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全国各地共组织六·五〇〇个军队示威运动。就有九二·五六一个军官和正规的军队、一六七·六六三个国防军和五九·一六八个有组织的后备兵，都参加这个运动。一九二五年的表示，自然更超过了一九二四年。

帝国主义的政策，即是说美国的对外政策，现在是建基在它的海军上。美国的海军就是合众国外交的基础。华盛顿已经采用了海上军事专家之马罕大将（L' Amiral Mahan）的学说。马罕曾经宣言：“统治海上，便是统治全世界。”海军局的副书记罗斯福（Roosevelt）更引申此种理想，用更明白的形式说出：“所有我们的外交部的宣言，都须依靠我们的海军势力。我们的海军势力足以昭示我们前进的方针，而应为合众各邦所重视。”

合众国的海军势力特别寄托在潜水艇、轻便巡洋舰、鱼雷艇之建造上面。现在已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用于海上军事。一九二四年，美国的海军曾在加来比海进行战争的工作。一九二五年，又在太平洋大演习。本年——一九二六——《道威斯计划》引出的不可避免的纠纷，美国的海军或者会在广大的大西洋开始战争的工作都是不可知的。

依柯立基的意见，美国帝国主义者的目的是“海上的飞机和陆地的飞机的势力应该为各国之冠”。所以美国此时已有一包含一三·〇〇〇人的飞机队。同时他们更没有忽略准备一切化学战争的工具。

（六）美国的辘轳

除苏维埃共和国联合以外，全世界都大半做了美国帝国主义财政的隶属。昔日掌握财政霸权的大不列颠，现在每年须付千数百万美金给美国资产阶级，而且要继续至六十年之久。在一九二四年，美国资本家用各种形式输出的资本达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

在最近十年间，美国资产阶级输出的资本达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大战以前，他们只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安置在外国。这个数目比之欧洲资产阶级所储蓄的数目是很小的。现在，美金差不多节制了各国政府。美国银行家现在差不多已借出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与世界各国。倘若我们加上美国政府为各国垫付的债额，我们可以断定美国资产阶级的蓄积已经超过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

拉丁民族的美洲诸国（南美）负合众国资产阶级的债额已超出四·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美金以外。

欧洲至少欠美国资产阶级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道威斯计划》已开出绝大的孔道，让美国资本侵入欧洲。此时合众国与大不列颠互相仇视，为的彼此都要夺取德国工业上的霸权。美国银行家以金钱供给挪威公司，为的要采取并制造淡气的化学原料。对意大利通融，为得要取得法国的采矿权和铁路权、德国的市政权和电气企业。制造白矾的美国公司实际上是在合众国财政总长墨伦（Mellon）手里，他同时在挪威公司有资本总额（五·〇〇〇·〇〇〇挪威币）的三分之一的股本。最近美国和波兰又已经签定一个三五·〇〇〇·〇〇〇美金的借款合同。合同所包含的要件是：“倘若借款的条件在不拘什么理由不能由借债者履行的时候，债权人他的利益上有权利取得铁路的管理权。”人们很容易看到在此这些条件上可以召起波兰总同盟罢工或革命。

亚洲和非洲每年付给瓦儿街的债务的息金已快增到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美国对于日本在南满洲的租借地常常都想染指，对于南满的铁道和采矿权尤其注意。瓦儿街的经纪人现在立意要把英国资本家从开滦的煤矿区域排斥出去，这里是中国产煤最多的地方。

（七）美国财政资本的独裁制

美国帝国主义已经和许多国家有债权的关系，凡是太阳所照到的地方都飞扬着合众国的国旗，因为合众国的金子已经握着了全世界的霸权。

热里米斯密斯（Jeremie）是波士顿（Poston）托拉斯的创始人，此时已成为匈牙利的财政资本的独裁首领。

纽约的银行家麦克加拉（Mac Garra）和纽约托拉斯的买办帕克季白（Parker Gilbert）都是现在德国的事实上的政府。

波斯经过了美国银行家的光顾，驻波斯的美国代办已经在一块亚洲的土地树立并巩固起瓦儿街的经济统治。

在波里维亚（Bolivie）、在海地（Haiti）、在桑萨儿瓦多儿诸共和国及厄瓜拉瓜，海关权和税金都操在美国资本家手里。最近卸任的合众国银行会计皓尔（J. Hord）又被任为厄瓜多的财政审查员。

（八）美国与弱小民族和国际工人阶级

美国帝国主义的结构是立在强力与残暴上面，这种强力和残暴是用来压迫殖民地民族和国际的，尤其是美国的工人阶级的。

从一九二二年七月一日到一九二三年六月三十日，美国的国防军曾经被政府命令去镇压二十一邦的罢工工人。美国的纺织工人、矿工和铁路工人曾经受政府非分的军事压迫，而这些军事压迫是资产阶级为减少工资、增加利润而使用的。

去年秋间，海军大将康慈（L' Amiral R. I. Kuntz）在他的演说词里曾申述海军的任务：“在安抵来斯海（La mendes Antilles）应有充分的海军力量，为得要扑灭革命，维持商业，保护美国人民的生命安在。”

美国的海军在近东已经竭力地保护他们的淡巴菰种植场。

在远东，美国的潜水艇、巡洋舰、水电驱逐舰曾不断地威逼广东政府及上海的中国人民。美国政府不惜用数百万美金来供养这些船只。瓦儿街的权贵所谓的海上军队，是代表国际帝国主义威吓中国的最重要的势力。美国的海军曾经做过罢工运动的摧残者。色巴（开都拉斯）的种香蕉的工人所组织的工会，因美国海军的干涉不能不终止罢工运动。现在这些工人每日工作十六时，工资仅十五个仙（一角五分美金）。

巴尔地摩耳（Baltimore）的裁判官乔治华盛顿廉虐待毫无防卫的圣马利群岛的人民，他用子弹和刺刀来表明美国的“德漠克拉西的光荣”。

夏威夷群岛的美国裁判官约翰瓦林登，他本身就是制糖大王，他虐待并屠杀该地种甘蔗的罢工工人。

在南美洲，美国帝国主义用尽方法来挑拨民族的敌视和仇恨。在智利，若没有华盛顿政府和瓦儿街的帮助，法西斯蒂的政府决不会成立。

同样在欧洲，白色恐怖和法西斯主义的流行都是受的美利坚之鹰的赐予。这只鹰的爪浸在石脑油中间，他的胃囊里的金子是充满的。

（九）新美洲

我们现在只觉得美国是帝国主义的王国。美国昔日是世界的农国，现在它成为农国的制造场和银行家。而对于世界资产阶级，现在的美国却是他们的包探。

现在世界上所有资产阶级政府都在美国的掌握。美金在现时是国际资产阶级的交换和借贷的根基。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和法律上的重大问题，它有推翻或否认的权利。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都被美金掩盖了。

合众国的银行协会现在是全世界的库藏司，一九二四年，美国有位大银行家宣言：“我们应该留意我们的金子，不只是为合众国而储藏的，而是为全世界的。”这几句话不是骄傲，也不是威吓，乃是真实的吐露。

一九二四年，法国在经济上非常失败，后来向美国借得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佛郎跌价马上挡住。为实现《道威斯计划》所决定的大借款，已经使德国资产

阶级得转一口气。最近摩尔根银行已成为莫索里尼的助手，他借了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救济法西斯主义。大不列颠仅仅因为得到美国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的借与，乃能使它的金本位回复。

合众国的银行大联合之组织自成立以来，早已是美国内政、外交势力之源泉。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号施令，不注意到美国的颜色的。力量薄弱的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人民对美国的畏惧日甚一日。对于美国债主利益很轻的伤害，都可以引起华盛顿外交秘书处的重大干涉。

美洲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强力，它还在青年时代，发达正未有艾。美国的各业独营大王和财政资本家要想统治全世界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生命。

美国的托拉斯战胜了世界上各种民族，在世界所有的市场上。我们不应该妄信合众国的疆域是有定的。资本主义的列强早已实行瓜分了地球，但美国帝国主义者并没有睡觉：他无时不力谋领土之扩张。

（十）美国的阶级争斗

在合众国的阶级争斗业已国际化。美国帝国主义已造成美国阶级争斗的新的形势。在这种顺利的经济情况之下，美国资产阶级竭力拉拢若干工人团体为资本家及资本制度的保护者。这就是表明：美国工人运动中已为资本家培养了许多机会主义者。美国一班资产阶级化的工人，他们的势力在创立工人银行及协作社等事业上发展。这种机会主义弥漫了美国无产阶级之各种形色的组织。

合众国阶级争斗的真实领导机关，只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之实现，只有共产国际的革命运动——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和殖民地弱小民族的解放联合而建立极伟大的反帝国主义战线，才能从美国资产阶级铁腕之下救出世界的劳动平民！

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续)

布哈林 著 郑超麟 译

(四) 列宁的理论和实际

在这些总的观察之后，我愿意引起你们注意于许多理论的和实际的特点，足为上述诸概说之例证者。我以为，列宁形成其理论时所处的环境是复杂的，这环境自然与列宁整个行动中之注意实际有连带关系，而列宁的行动又与我们的时代——实质上就是行动的时代——有连带的关系。除非是理论在你的手里成了一种工具、一种武器，你完全占有这种工具或武器。理论的系统、理论的学说不来束缚你而是被你所占有；那时，你才能好好地行动。在某次演说里——我不记得在哪一次——我曾经这样解说：是列宁占有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占有列宁。我的意思是说，列宁最明显的特点之一，他的最奇异的特点之一，就在他指出任何一种理论之实际的意义。我们中间有时甚至于常常讥诮列宁把许多理论的问题太看成实际了。可是，同志们，现在当我们将已经很多年在革命的汤锅中热蒸了，当我们已经看得见很多和尝试得很多了，我以为我们这种讥诮应该完全转过来嘲笑我们自己。因为在这种讥诮中，所表现的不外就是智识者专有的狭隘、“书痴子”的积习、狭隘的专门家的偏见——新闻记者、文学家、或多少当研究理论为其本分职业之人的偏见。列宁不高兴说废话而纯粹拿实际去看理论的概念和学说，亦犹他不爱字眼上的争论和专门化的博学一样；我们也时常不高兴与这些，而他以此嘲笑我们。这些理论的概念和学说，除了实际的意义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意思呢？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显然没有别意思。但因我们在某种程度底下是一些专门家，所以有了偏见，而在这关系上列宁将远走在我们——沉溺者——的前面，因为在他以为分明讨厌的东西，而我们对之还有点留恋。所以，我以为这种指示——完全指示出任何理论之实际的意义，乃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之异常宝贵的和积极的特点。

连带着还有别一特点，这一特点若无前一特点，则我们是永世不会了解的——这特点可以称为反拜物教性，去除任何理论、信条等之一切拜物教性的外壳。初时我们

时常惊讶，列宁那样非常地果敢提出一些理论的或实际的问题。你们试回想《不列斯特和约》时代，当列宁提出一问题，以为可以从任何强国拿取武器去攻击别个强国之时，这问题激动我们心坎里的国际的意识，究其实，我们的“国际主义”乃根据于理论上不了解我们取得政权之后所有形态改变至若何程度。你们试回想“学做生意罢！”口号，这口号使许多好的革命者失笑，但他有理论的根据，并与许多理论问题有连带的关系。只有这种人，这种思想家、理论家和实行家，自己具有异常锋利的马克思主义武器，而同时又会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方法，是在某种环境内确定方向的一种<指>南针，而不看成是呆板的信条；只有这种人才会有这种理论上的勇气——密切联系于实际之理论上的勇气；这种人十分明了所有新的外表的相互关系，必然应该引起工人政党和工人阶级方面之另一种的反感。你们试看列宁怎样以总的形式形成他这种理论。我绝不愿意多多征引以搅混你们，也不带来任何的摘录文字，且也未做过这种工作；可是我应该提起列宁给我们的许多理论。他论错误的最普通的策略之一，便是：“很多的错误，就在拿某种历史时机里某种状况里应用得十分正确的口号、办法等，机械地移用于别一种历史环境、别一种关系、别一种状况。”这是总的策略之一。我们再看反对派的思想，试拿德谟克拉西问题来看。我们在某种时代都是“德谟克拉西者”，在我们未解散宪法会议前几个月，我们都要求德谟克拉西共和国和宪法会议。当然，然而仍然只有了解这些口号之相对的社会作用的人，只有了解在资本主义制度底下我们不能向资本家提出要求“破坏你们的资本主义组织而给我们工人组织以自由罢！”的人，只有了解我们的工人组织的自由不可免地要标出“一切的自由”的人，只有了解当我们到了新的历史时机和状况必须放弃这个旧的口号的人，才能够改换新的方向。谁不思考这个，谁拜物教化了旧的口号，谁便不能跟着潮流前进，并要走过敌人的壁垒中去。这是微小的例中之一个，但这种例的数量是无穷的。列宁在这里，表现出十分惊人的勇气。

试拿别一个问题来看。这里，我说的是关于革命以后必须有的进化的观点。试拿列宁的“学做生意吧！”或“一个商人比几个共产党人还要好些”等类的口号来看。现在我们明了这些口号之实际的意义。这些口号是十分正确的，但要提出来，则非有深刻的用理论分析问题不可。关于共产党干部问题，关于初期非改换方法不能建设的问题，关于资本主义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先从理论上解决，然后实际发出口号。如果以前每个革命者都看“做买卖”“经商”“银行”等名词是怪难听的名词，那么要发出“学做生意吧！”的口号来，必须深信许多十分新的而有重大原则上意义的理论之正确。到现在我们才以为毫无疑问的事物，在列宁当时则早已十分仔细考虑过了。只有我们的敌人的平庸的、皮面的意识，才以为列宁是斧头削成的人物，

像石器时代的雕刻像一样。这实在是绝对错误的。如果列宁发出了简单的、俚鄙的口号，使我们的“文明的”敌人的惊怖，那么这些口号一定是把当时应发何种口号、当时群众心理如何、当时哪些是群众所懂得哪些是群众所不懂得的，一一加以理论的分析后之结果。列宁时时刻刻发问：怎样才能吸引最大限度的群众、最大限度的人，使他们在反对阶级敌人的争斗中占有利的地位。这是需要很复杂的理论的“思考”的。当列宁说：“应该学做生意！”时，我们以为这是很荒谬的。但现在我们则以为是毫无足怪的了。列宁在理论的和实际的范围内每走一步，都是哥伦布式的鸡蛋安置。当哥伦布安置一个鸡蛋时候，显然是最稳妥的，再没有别的方法了。“简单的”口号：“学做生意吧！”乃建立在许多先决的复杂的理论问题上：城市和乡村关系问题、一般交易过程之作用问题、在这过程中商业机关之作用问题等。这并不是从天而下的口号，这乃是把一环又一环都经过思考的整个理论锁练，用简单的口号的实际方式表现出来。只有在你一本又一本读过列宁著作并找出列宁思想之确定的方向以后，你才能看出列宁研究这些问题时所经行的思想的道路。列宁所以成一战术家，将一切局势之大的变化都应付得很好，这乃因为他是个伟大的理论家，他能够十分明显分析阶级的关系，把这关系说出来，构成理论，由这理论作出适应的实际政治的结论。根本上，这里列宁是能够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武器的，这武器在列宁手里，绝不是死板的，而是活动的，能随实际行动所需要而向各方面运用的。这种马克思主义，老实说，除了为社会革命的利益之外，别没有什么神圣的作用。这种思想的武器，没有任何的拜物教性，清晰了解任何理论的学理、任何辩难、任何单个的理论之真义，并知道绝对没有死板的东西。列宁怎样对付思想上的问题呢？当党内或党外发生某种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倾向时，他即刻用实际的办法去纠正，因为他明显地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明显地扯破了字句的外壳。我上面已经说过：如果在马克思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代数和革命的代数；则在列宁的，就是新时代的代数及其算术。试举一例来看：马克思《资本论》的分析中，关于农民的，是逐渐忽略的，因为农民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特别的阶级，这是最高的代数。显然，在算术的演算上，这里需要别的事物。列宁的特点就在联合最高的代数（在数学上是数字通论等）于算术（即以算术演算代数的公式）；就在联合大的和小的：在实际方面注意全国的电气化以至于节省任何细小的漏卮，在理论方面研究高深的理论问题，从哲学问题起，同时又不放过每个细小的能危及未来发展的理论上的错误。这种能力，可以看是时代看见每个琐事，分析、观察像“内在之物”这一类的问题，同是又可以了解任何议决案中单个的论证之理论的意义（你们都记得列宁在他的《论二种策略》的一本小册子内有许多页讲到“怎样不应去写议决案”）——这种无比的能力，看见政治战术的和理论的棋盘上所有最大的和最小

的，都应该根据工人阶级利益观点和实际政治行动观点排置起来——这种能力就表现出在理论和实际综合上头。

(五) 帝国主义、民族问题、殖民地

现在我们说到列宁给我们最有意义的新的几个问题。这些大问题之一就是帝国主义问题。列宁论述帝国主义问题在其所著一本著名的著作中，这里我们用不着简单介绍其内容。可是，同志们，我要你们注意底下的一点。你们在关于帝国主义的许多理论的著作中间，决不能找到一部像列宁这部著作那样现实的，因为在他的著作里，所有理论及其统计数目，都与他所作出的实际政治结论息息相关。

这是某个时代之简单的分析、理论的分析。这种分析立刻便十分明显指出工人阶级跟着统治阶级发展、跟着帝国主义发展所必由之路。与这总的问题连带而起的，便是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这是在任何理论的著作中都未曾解决过的。应该注意，这里，我以为列宁做过理论上很伟大的工作。我再说一遍。我们没有一本书能把这问题整理成系统。可是，我们有列宁的许多著作，十分正确提出这民族的和殖民地的问题，列宁对这问题的设问已经完全由我们的实际证明其正确了。这里实际上列宁的学理自成一家言。根本上因为马克思对于许多问题的抽象化之程度是很大的，需要中间加入许多逻辑的环，才能作出直接的、实际的结论。我已经说过，在《资本论》中分析三个阶级。在《资本论》中不是我们的真实，那里是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那里的问题不直接联系于那些事物，像世界经济、各种资本主义体的冲突、在敌人手中的国家问题、国民经济生活上国家作用问题等——这就是说，许多更具体的问题，在《资本论》里是未经分析的。为着引导这理论的系统到实际的行动去，特别是在我们的时代，必须中间加入许多逻辑的环，这些环自己又成了大的理论问题。在机会主义时代，凡研究殖民地政策问题的人，除极少数人外，差不多一切都是最明显的修正主义者，他们特别是在殖民地宣传资本主义文化的使徒。马克思有许多单个的批评和许多单个的观察，可是他不能澈底提出这问题，因为那时这问题还没有以后那样严重。第二国际派根本上也不能这样提出这问题，因为这是那时神圣的资产阶级政策的神圣问题，是丝毫不能触及的。那时注意这问题的，是希尔德、白朗德先生们，他们发挥“马克思主义”对殖民地的理论，是为的证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是对的。在这关系上，真正形成起来的列宁派，就做过了一番大革命。列宁派的实际意义现在已十分明显了。不错，在其发展的初期，列宁派这种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学理不是时时刻刻把整个观点指示出来，但现在这学理的意义是十分正确的了。在我们面前是世界战争时代，这崩坏时代的国家，按照历来定律，是应该“摧残”的。为摧残这种国家，我们必须赞助

这总体的各种崩坏元素：殖民地的分离、民族运动等。换一句话说，即须赞助一切破坏的势力——客观上削弱资产阶级最有力最合理的铁的国家组织之势力。因此，从这实际的设问，便产出特殊的理论和实际的口号（民族分离权等）。这里也就看出一种征兆，指示在不远将来要发生许多间接的革命、殖民地暴动、民族战争、被压迫民族反抗强国求自由的斗争等。所有这些征兆，适应于资本主义关系崩坏总的过程中的许多中间的阶段，自然都是列宁所研究的复杂的理论。我请你们去读战中列宁反对卢森堡的论战文中关于这方面的文字。你们能够惊讶，何以很精细的过渡的要点，在我们全体，至少是多数人，到后来成为事实时才能看出的，而当时列宁则早从理论上指明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位巧妙的策略家和战术家吗？他怎样能如此呢？因为他依靠在伟大的理论的预知，而他的预知又是异常慎重，由其一切复杂性和具体性分析现在的资本主义关系之结果。其他一个发展的时代亦然。当工人阶级已经夺取政权在手之时，必须尽可能去了解旧的列强帝国主义关系崩坏后所生的现象。这些现象，我们应该从理论上去研究，为的实际上消灭之，所有这些都是问题的根本，而完全未经研究的。这些问题的解决，散布于列宁的许多论文之中，我们现在完全能澈底了解其观念。从这些观念，一方面锻炼出攻击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武器，他方面则利用无产阶级政权在另一原则上建设新的政治组织，这种组织中最大的便是我们的苏维埃联合。于是我们这里就有新现象的基础上理论和实际的联合，这些现象一方面是崩坏的产品，他方面又是新建设的产品。所有这些都总括在和联系在一个理论的系统里头。这绝不是一件小的事情；这供给我们，在远的将来、在最近几十年间，理论的和实际的最重要武器之一。如果我们只要记得，在现在的资本主义关系之总的崩坏过程中，殖民地暴动和民族战争将有何种作用；如果我们意想中把革命过程延长到别个大陆去，使之出于西欧之外；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见列宁对这问题的理论系统给我们以何等有力的工具，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学理给我们以何等巨大的力量，何等有效的调动群众的方法啊！

（六）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

我想我们应该注意的次一个理论问题，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国家问题。这里，列宁自然没有新的概念，但他的伟大的功绩，就在他一方面恢复了马克思关于国家及其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作用的原本的学理——这里指国家政权破坏论和国家关系之客观历史必然崩坏论，而他方面具体提出，或者说用算术演算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即苏维埃政权为工人专政形式的学说。现在，这方面事情我们已经很明了，无须再加解说了，因为我们自己，用自己的手，在新的阶级基础上按照新的原则建设了国

家。可是我们应该回忆过去，应该拿毫无足怪的、现在明了的事物在总的历史关连中，在真正的历史发展中来看。如果我们拿关于这问题的旧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来看，我们这里就看出十分无耻的曲解马克思学说。不但没有一点新的思想可以称为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政权论，或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论，或在过渡时代国家法律等变化的问题，而且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过程的本身，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后的状况，这里竟没有一字说到。恢复正确的马克思学说，使这学说具体化，即给工人专政学说以具体的外壳——这乃是无产阶级思想之中心的任务。因为对于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当然是目前中心的问题，是一切问题的问题。对敌人阶级的关系、对其聚集的势力之革命的关系——这首先就是对付这统治阶级之最有力的、最集中的、最合理的组织——它的国家政权。这方面，大家都十分知道，以新原则改造社会的根本杠杆、改造现存生产关系的原动力，乃是胜利的工人阶级所推动所组织的新的国家政权。这里有许多同性质的问题，理论的和实际的。这些问题的总和，完全在列宁著名一本小册子《国家与革命》里头。可是列宁所发挥的这种学理，绝不是单纯恢复到马克思自己所发挥的观点。这是旧的马克思正统观点与许多新事实构成成功的理论及马克思在世时所不能有的先见之综合。这问题，我已经说过，乃是革命的工人运动之中心问题，乃是当代中心问题，我们现在还不能够澈底估量列宁这本理论的著作之价值。与这问题连带而起的，同时还提出并解决了德谟克拉西问题。德谟克拉西问题已经完全被第二国际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拜物教化了，变成信条了，完全隔离其历史的根源了，因此达到绝对错误的、历史反动的实际政治结论了。苏维埃政权现在已是我们的最凶暴的敌人资产阶级法律上所承认为一种“现象”的。这观念、这苏维埃政权学说之理论的和实际的意义，实在是很大的。如果我们拿口号来看，拿现在流行于全世界之无量数的口号来看，那么最普遍的口号之一，即是说包括大多数领导、大多数组织、大多数民众——工人阶级的口号之一，无疑是苏维埃政权口号。你们试回忆列宁出国多年后初次回俄国来的时候，你们试回忆列宁有名的《四月提案》出来，一般人作何感想，当时吾党本身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小的部分，几乎以为这提案是违背通常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显然，这里一点也不违背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我们现在完全明白，这是马克思学说，正统派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论之展开。生活确定证明，苏维埃政权是工人专政存在之最坚固的形式，这种形式对于胜利的工人阶级有许多实际的大便利。但同时，如果我们拿这一般人承认的去比较当时吾党内（竟用不着说我们的敌人了）对于此提案之态度，那么我们就可以明了列宁当时所说的话，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哩！在生活急剧变化时候，时常看见许多新的事物，不久即变成毫不足怪的事物。可是当我们对这新的事物作历史的估价时，我们应该忘记了这些新的事物对于我们是习见的；

我们应该回忆从前一般人对于这理论的概念之感想如何，对于由这理论产出的实际结论又如何。我再说一遍，这些当时不仅不是公认的，而且反受剧烈地攻击。现在这些都被公认了，这就证明，由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之理论之思考，由政权论，由这政权的规律等观点看来，并由实际的观点看来，这里，真正做了一件大事。你们须知道，纵然我说过实际终归是唯一紧要的，但这个不仅是实际问题，这是大的理论问题。因为阶级统治形式的学说对于资产阶级是理论的和实际的问题。资产阶级统治形式问题是值得注意的，在工人阶级方面也是一样；不过在工人方面多倍的注意和多倍的困难。因为各种不同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有若干历史上的承继权，而无产阶级则从没有过这种政权。资产阶级国家很早就建立了。其结构上种种变化、国家机关的改造——都依靠在巨大的、长久的传统上面，当国家制度形式建立的时候，重大经验取得的时候……至于工人阶级，则须重新建设，没有先验的证明。这新国家没有国家生活之连贯的形式，这里必须做原则上新的工作。无产阶级专政之具体形式是活的，是坚固的，能够抵抗敌人势力进攻的——这种形式之发现乃是列宁的理论和实际的功绩，列宁是工人国家的理论家，是这国家的积极的实行建设者，是这国家的指导者，是国际无产阶级中海人不倦的使徒。

(未完)

马克思的家庭教育

季子

前在德国所计划的《马克思——其生平其著作及其学说》一书，上编久已草成（约五十万言）。去年因游历东欧，今年因任学校教课，未能早日将其滕正付印。今特于课余将草稿略加整理，择要在《新青年》上发表。预计三个月后，上编第一册即可付印。这里便是这部书的第一篇第一章——家庭教育。

作者识

人类的意识并不决定他们的生存，反之，他们在社会中的生存却决定他们的意识。”这句名言是本书主人卡尔马克思于出世四十年后在他著的《政治经济学批评》（*Zur Kritik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序言（见原书第八版序言五五页）中说出来的。我们相信他这句话是真理，因此，我们替他作传，首先要说明他出世前后的社会状况和环境。

自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期，代表欧洲最□文化的英、法、德三大国发生三大革命，即英国的产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和德国的哲学革命。马克思承受这三大革命的精华，融会贯通，造成马克思主义，这不是一桩偶然的事。因为在他产生的莱因省，当时就是这三大革命潮流的交叉点。

莱因省位于德意志的西部，有德国最美丽和最大的莱因河纵贯其中，交通便利，物产丰富，一端隔比、荷两国而遥遥与英国相望（自一八一七年起，即有汽船往来伦敦），一端与法国毗连，故德意志容易感受英、法两国文化的熏陶，当以莱因省为第一。此地自十八世纪末年起，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至二十年之久；到了十九世纪初年，莱因省的一部分且受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间接的统治，盛行一种法国化，至一八一五年全省才归入普鲁士统治之下。当十九世纪初叶，发源于英国的资本主义的纺织工业在此地正开始萌芽，新兴的资产阶级很富于反抗封建制度的革命精神，而无产阶级也因工业的发轫，跟着出现了。又自一八一八年起，有邦恩（Bonn）大学出现，

所以莱茵省对于德国伟大的学术思潮也有接受的机关了。总之，莱茵省在当时的德国，几乎无论在任何方面，要算是首屈一指，特别是它的工业的发达（比较的）、政治的进步、维新的气象和革命的精神，为全国之冠。

可是马克思要于不知不觉之间，感受上述三种伟大的潮流，当在年纪稍长的时候；到于他幼年，还没有直接与此等环境接触，还处于另一种环境中。他是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在德国莱茵省居利（Trier，按：此地在前又名居列夫——Trevés）产生的。居利为德国最古的城市之一，曾为古罗马帝王游息之所，自中世纪至法国大革命时，复为神圣罗马帝国大教主兼德意志选帝侯的住在所，又为天主教牧师大学的区域，所以此处有罗马皇宫和圆形剧场的遗迹，有黑门（Portanigra）的伟大纪念物，并且有罗马时代和哥特（Gothic）时代的礼拜堂。列文多尔之（Reugen Lewin-Dorsch）谓此等古迹“使这个活泼的孩子，感觉灵敏的心神，获益非浅，使他的思想已经很早地注射到世界史上的对象”（见《钟声周报》第九年度第一卷三四五页，列氏作的《马克思家庭与家谱》一文——*Die Glock Familie and Stammbaum Von Karl Marx*），这是不错的。当马克思出生的一年，居利有居民一万一千四百，这还算是一个中等的城市了。

关于马克思出生前后的社会状况和环境，已如上所述。我们现在再讲他的家世。他出身于犹太人的家庭，据维也纳图书馆员瓦哈斯台（Wachstain）博士的考据，远溯他的祖先至十五世纪初叶（参看《钟声周刊》第九年度第一卷三四〇页至三四二页），他们世代相传，均为犹太法律博士（Rabbi）和学者。一直到他的父亲海恩利系马克思犹守此业。原来在犹太教解放以前，犹太教社对于犹太人中的民事大部分自有其法律和裁判，因此，需要娴于犹太法律的学者，马克思的祖先世习此业，当是应这种需要而起的。马克思说：“一切过去世代的遗传，像阿卑山（Alps）一样压在活人的头脑上。”（见马克思著的《路易拿破仑的二月十八日》第七页，一九二一年出版，*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Bonapart, Stuttgart*）。马克思生平观察事物，精细透彻，无以复加，这是由于他出身于这种“精神贵族”（引列文多尔之语，见《钟声周刊》第九年度第一卷三四四页），有这样久的精细分析法律的世代遗传性，这一点我们是不当轻轻看过的。

海恩利系马克思夫妇虽属犹太种族，然他们却不为犹太人一脉相传的旧习或成见所拘束，当卡尔六岁的时候（一八二四年），他们舍弃犹太教而改奉基督新教。世人因此误传他们的改教是出于普鲁士政府强迫一切担任公家职务的犹太人舍弃犹太教，否则解除职务的命令。但据墨尔林的考证，此说毫无根据，他们此举完全是出于自由意志的。（参看墨氏校的《马克思与昂格斯文汇》一卷第三至四页）居利本是天主教盛行的城市，至于基督新教并不占势力，“当一八一六年的时候，此处才有三百个教徒，

一直到一八一九年，还没有自己的教堂。”（见《钟声周刊》第九年度一卷三四五页）然海恩利系马克思夫妇不信盛行全市的旧教，而偏信没有势力的新教，可见他们的改教是确有主宰，并不是随波逐流的。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见《马克思与昂格斯文汇》一卷三八五页）宗教本是一种麻醉人心的催眠药。自反对宗教和不信宗教的人看来，他的父母由犹太教改奉基督教，并没有脱去迷信的圈套，这至多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比较，那里值得我们大书特书？其实不然，他们此举对于卡尔精神上的发达是很关重要的。德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诗人汉讷（Heinrich Heine）也和卡尔一样是犹太人的儿子，他的出生比卡尔早二十一年，可是他改奉基督教却比卡尔迟一年（一八二五年），他称那种受基督教洗礼的券是一张“欧洲文化入门券”（Eintrittsahein Zur europaischen Kultur）。卡尔后来研究欧洲各国的学术，成为一个自由思想家，全是由于他从小时起受了他们父母之赐，得脱去犹太教一切深痼巨蔽的成见，全是由于他预先获得一张“欧洲文化入门券”。所以关于他的父母改教一事，并不像脱尼斯所说的一样：“在表面上是很有意义的，在里面是很少意义的。”（见脱氏《马克思传及其学说》第三页）

卡尔生长于一个具有高深教育和处境丰裕的美满的家庭中，他幼时的景状是很优美的。关于他幼年的经过情形，虽很少表见于世，然就曾经留下来的一鳞半爪看来，他所受的家庭教育是普通的中等家庭儿童所梦想不到的。他秉性刚强勇猛，沉毅果敢，并且聪颖绝伦，当他到了能读书识字的时候，他的父亲即尽心竭力教他读书，后来并授以德、法名人关于哲学和历史等等的著作。他对于所教的东西很容易了解和领悟，因此特别为他的父母所钟爱。他的父亲看见他具有一种天才和优美的性质，对他便抱有无限的希望，断定他将来当为人类造幸福。同时他的母亲则相信他将来必定得到好处，必定是诸事如意，所以常呼他为“幸运儿”（Ein gluckskind）。我们看他此后一生的努力毕竟是为人类谋幸福，而他的遭遇也是一个“幸运儿”应有的遭遇（指他得到绝无仅有的妻子和朋友等事），果然像他的父母所期望的了。

卡尔小时从他的父亲受得德、法优美的教育，这已经不是寻常儿童所能希冀的，然我们所谓“家庭教育”，还不止此。居利尚住有一家贵族，与马家为比邻，家主为威斯特华伦男爵（Baron Ludwig von Westphalen）。他于一八一六年才迁居此地，来就居利政府顾问之职。他到居利后，与海恩利系马克思成为很好的朋友，因此卡尔自小时起即出入他的家中，与他的小女儿燕妮（Johanna Bertha Tului Tenny von Westphalen）共同嬉戏。威斯特华伦擅长于希腊和英国的诗歌戏曲，他常以希腊最著名的诗人荷马（Homer 生于纪元前九百年之间）的叙事诗和英国最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戏曲教卡尔和他的女儿等等。卡尔的资质既非常聪颖，所以威斯特华伦非常爱他，

并且乐于教训他。他在此处所受的教育，又是他的家庭中所没有的。墨尔林谓“幼年时代的马克思在这位自由思想官吏的家中找着一个第二家庭”（见墨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二〇八页，一九二一年第十一版），这是丝毫不错的。

卡尔的家庭教育既是合德、法、英、希等国著名学者的作品而成的，所以他幼年的学业已大有可观；他以后做学问，所涉的范围非常之广，这是因为他的家庭教育预先替他安下一种坚固不拔的、宽广的基础，所以他能够造成宏大的建筑物。概括说起来，他从他的父亲所受的教育，是偏于哲学一方面的，因此，引起他后来研究哲学的兴味；他从威斯特华伦男爵所受的教育，是偏于文学一方面的，因此，引起他后来嗜好诗歌、戏曲，要做诗人的念头，他并且对于荷马和莎氏比亚的著作，是终身向往，不时诵读的。

卡尔幼时在教育上既获得他的父亲和威斯特华伦男爵绝大的益处，所以他对于他们两人是特别感恩，终身不忘的。关于他不忘父恩一事，我们可以从他的女儿伊利安乐的一段话中看出来：“他（指卡尔马克思）讲他的父亲的事，从来不觉得疲倦，他把他父亲的相片放在身上……当马克思于他的妻子死后，作长途的悲惨旅行，去恢复他已经丧失的康健之际——因为他要完成他的著作——他仍以他父亲这个相片和我母亲一个玻璃制的旧相片（装在盒子里面）及我姐姐‘小’燕妮一个相片自随，我们于他死后，在他的胸前衣袋中发见这些相片。昂格斯将这些相片放在他的棺材里面。”（见《新时代杂志》第十六年度一卷第五页）至于马克思对于威斯特华伦，也有一种特别的表示。当他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他草就一本数十百页的论文膳正预备付印，他在卷首题名篇上大书特书：“‘敬献此书’于亲爱如父亲的居利政府顾问威斯特华伦先生，借志子侄之爱”等字（参看《马克思与昂格斯文汇》第一卷六三页），由此可见他敬爱威氏是至深且切了。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观

——节译卜克洛夫斯基《俄国略史》序言

王伊维

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过去？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前的事迹之研究，有什么用意？去知道环绕我们，与我们生活有关系的现在事实，不是更好吗？

我们研究过去，正因为要知道现在所发生的是什麼。宇宙间一切均发展了，换言之，即一切均变换了。几万万年前，地球是一个很大而烧红的圆球，周围尽是蒸汽，此时地球上毫无生物，也不能有生物。几千万年前，地球上已经有生物了，至几百万年前，地球上已经有许多植物、伟大的森林、各种动物（水里的、陆上的）了。但是这样的宇宙，不与现在的宇宙相像，在现代宇宙当中的一切东西，系经过长期间不断的变化而来，由旧的发展而成的。现代宇宙间的植物、动物均为百万年前地球上植物、动物之苗裔。

这些变换，怎样的经过呢？不是偶然的，而循着一定的公律（Law）的。不过我们如果仅观察现实生活如何地过去，那么，这些公律（即一切生物变换的规律）是不容易发见呀！当人类尚未研究最古的地理，当人类尚未发掘着百万年前动、植物的遗迹，那时候的学者，曾以为地球永久是如此的，过去的与现在的是一样的，并以为地球是一下造成的。百年前，仅有很少数的研究者，对于宇宙的认识，变了观念。他们以为地球上的生物，是由渐变而来的，经过很长期的时候（许多年）的。

考察几百世纪前动、植物的残余（埋在地中而保存迄今的），很明了地证明：这些变换的经过。即此，打破了“宇宙由七天工夫造成”的谬说。现在不论哪一个人，不用说学者，只要略有知识的人，就不肯相信：动物、植物，始终如我们现在所见的一样，永无变换的。凡念过一点书的人，尤其是住在大城市里，常游览博物馆、陈列所的人，他必知道从前的动、植物界与现在的动、植物界，有很大的差异。宇宙间万物，经过许多时间的过去，均变换了，现在尚在变换的过程中，并且将来也必有变换。这就是自然界的理法（或作自然界的规律）。可是关于宇宙（Worlde）永久不变、万物创

造于一旦的学说，存留了许多时间，其力不仅及于无知之徒，即许多学者，亦信之而不疑。其故，因为此说有益于许多人。因为世界上既一无变换的，则人类社会当然亦是不变换的了。人类社会既由一旦造成了，则不仅现在的如是，过去的如是，即将来的亦必如是，可无疑义了。旧时，却是如此地告诉了一般人。为什么旧时要使一般人这样的着想：“人类社会永久是如此地存在的，依照着现在的样儿的？”这是因为对于“在前社会中利用一切财富的人”很有利益的缘故。往往政权在手的人，必同时为占有财富的人，他们自己以为这样是应当的，并应当永久的；所以他们以为富的、有知识的应当永远在上，而平民（工人、农民）则当永远为他们做工，为他们服务。他们努力要做到自己的信仰，于是只好压制工人、农民，以为非此不可。

如果我们研究过去的地理和动、植物界，并研究地质学和古代生物学（Paleontology），即打破了宇宙由一旦造成而始终不变的瞎说，那么，历史与考古学，即所以推翻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将来”始终如此、丝毫不变的妄论。人是变换的，且将变换的（在变换的过程中），这与其他动、植物等相同。有这一类社会制度（或作社会秩序）发生，必有那一类社会制度崩坏，让其位于新制度。我们虽然不能预决这些变换的结果，但我们如果观察这些变化于几十年、几百年之久，那么，我们能知道这些变化的规律，即我们能预知这些变化的理法。所以我们不能预想几千年后的人类社会怎样，但我们可以说在这几千年中（年数之多少，不过假说而已），人类社会将往哪一条路上变换下去。谁在将来社会中占优胜，这就是使我们对于“将来”有所预备，使我们应用相当的方法，以免“将来”之不幸，而享用“将来”将给我们的种种幸福。认识，即能预知，能够预知，即为“权力”和“统治”。可见认识过去，即所以使我们能统治“将来”，这就是我们须知道过去的意义！

上面曾经说了，我们欲知人类社会中一切变换所完成的规律性，须在许多时间之中，考察这些变换所经过的过程；但不能因此就联想到：我们要知道“变换”，非从最古时入手研究不可。我们不惟不能作如是想，我们并可从与此相反入手。换言之，假使从现代社会追溯到过去的古代的社会，那人类社会一切变换的规律性，也很显而易见。

请以现在的事实言之。现在世界中，到处发生革命：工人们很努力地要想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换言之，即要推翻“剥削他们”者的政权；因为这些人借工人而生存，压迫工人“怎样地”多做点工作，“怎样地”少给点工资，他（资产阶级）又坐领“由工人造成的商品的价格与工人所得的工资之间的差额”——剩余价值。或问，莫非仅在现代有剥削（Exploitation）吗？古时有知识的富人不曾剥削了平民吗？剥削早就有了。当现在资本社会制度未发生之前，即尚无工厂、作坊、银行、铁道等之时，曾

有封建社会、农奴制度等，当时不是工厂主掠夺工人所生产的价值，而仅给少许于工人，当时却是地主掠夺农民劳动的结果，而简直不给分毫报酬于农民。但当时被剥削者曾反对了剥削者没有？当时的革命，也像现在的革命吗？是，当时曾有过，但他们时常不成功！为什么？因为，农民之间不能得相互的了解，不能够组织拢来，即不能组成很大的整个的并照着一般的计划进行的团体。怎么是这样的经过？因为农民各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相互帮助机会很少；及至农民出卖自己农产品的时候，则他们之间互相竞争，成为敌手。如果市场上的菜、果、干草、面包等愈少，其价必愈贵，则于农民有益，他们的物品均可卖出；反之，到市场里去的农产物愈多，其价必愈贱，则每个农人所得的必较少。可见，农人们之中，不能发展觉悟：大家应当共同的行动，他们之间，当有相互的关系。换言之，他们不能“团结”！工人正与上述的相反，他们共同在工厂中做工，如钟表里齿轮与齿轮之相联系，在一件工作中，而收相互帮助之效。这些工人，如无那些工人之助，一无可为，反之亦然。故凡是工人，必须帮助其他工人。可见工人阶级中，团结力很能发展，此乃农人所不及之处。这就是工人比农人易于组织，其组织易于巩固之所以然；也就是工人革命比旧时的农民暴动，比较地有力，比较地亲密之故。故农人不能处置自己的剥削者，农人暴动往往不成，而且他们从来不曾占领政权！至于工人呢，历史上的且不谈，他现在已经占了政权于一个大国中——俄罗斯，并且同样地正向着欧洲各国中爆发。

既如此，当我们观察现在的时事，或观察最近的过去，我们便于历史变换中，找到它的规律性。简单地来讲：历史的动，系根据于人们某一定的行为；历史的变换，须视社会的那一阶级，去“做历史”——即生出或此或彼的社会变史。故我们很明了，当一般人民为农民之时，历史的进行，必与“以工人为运动首领”之时不相同。

现在，这些阶级怎样地组成呢？为什么从前“生产”在农人手中之时，不仅面包、麻或毛皮等，直接得之于乡间（在此乡间，各人在自己的田上做工），即衣服、鞋履等物，亦由各独立的手工业者制成（手工业者坐在自己家中工作的）。然而现在则已为非常伟大的制衣公司与制鞋厂呢？因为在那时间人类尚均须用手劳动，可以说尚无机械，有之，亦很少，仅运用水的机器，似磨场等设备而已。二百年前，始有机器之发明，其后逐渐进步，例如，初时使机械动作为蒸汽，后来渐渐应用电气、燃料（煤炭、煤油）的发动机。自从机械降生以后，比旧时代能生产多量的物品，而其生产又很迅速。此处只要举一个例，就很明了。譬如，仅用手去清涤棉花，一个人费一天的工夫，不过清涤了一磅棉花罢了；若用机械去清涤之，则同样的劳动时间，却能清涤一百磅棉花以上。

此时，每个工人既不能自己独设机械，而孤独的个人工作，又太不利，于是许多

工人，便集在机械边了。既这样的，便降生了大生产，发现了大工厂。凡机械所属的人——企业家或资产阶级——便为一切事务的主人。主人给了工人工作（工作于机械边），乃掠夺他们的生产品，而代之以几文小钱——工资。

就是这样地形成了工人阶级：他现在不在家里工作，而工作于他人处；他现在不仅用手劳动，而借助于机械，且此机械又非他所有的。换言之，组成了无产阶级。如何才能解释任何社会阶级的发生呢？解释之，只一句话：只看怎样地经营“经济”。从前是小经济，一般人的工作是单独的——这是一个社会制度；后来大家协力工作了，于是又另是一个社会制度。总之，这些变换的根基在于经济，是经济的变动。

逼着人做经济行为的是什么？这是对于大家很明了的，用不着＜啰＞嗦的。我们只要看看从前农民所产生出的及现在工厂作坊所生产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就很明白地回答这个问题了。农民经济所生产的是：面包、肉、毡毛、麻等物产，为我们滋养、护暖的必需物；工厂作坊呢，不过由肉做成罐头食物，由毡毛做成衣服、鞋履。总之，把这些东西（保障生命的原料）造成格外利于我们使用而已，按其实，这些东西，还是为维持人类生命的必须物。可见人的经济行为，不过要得到“生存的可能”罢了。这是几岁孩童，也会知道，用不着详说和证明的。可是，既然知道一切历史的变更的根基在于经济的变更，可见□着人去做工的，不是其他，只是人自己的需要，换句话说，就是人要努力避免饥寒的物质需要，逼着他去做经济行为罢了。

从此，可知人类一切行为及一切历史，其根基在于物质的需要。如此以解释历史的，即我们现在所称为历史的唯物论。如此地明了历史，第一是由明了工人之间有共同的利益及负着现代革命的阶级。故唯物观的历史，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观。从前，教育落在资产阶级——占有生产工具、工厂、作坊、铁路、土地等的阶级，换言之，以剥削他人而生活的阶级——之手，解释历史便不是这样。他们以为人类社会一切的变更，是因为有财富、有权力者的思想变更之所致。根据他们的意见，说明之如下：当人类尚未想到“为什么”并“怎样”组成了此或彼的社会制度，而仅服从该制度之时，尚无所谓革命；到后来发生了某一类人，觉得社会中有许多缺点，于是“批评”社会，并告诉群众，说“社会有不正当之处”，一般群众听了这些话（宣传者和发起者的劝诱话），于是就暴动起来了！这就是照资产阶级的意思，“革命之所以发生”。

总而言之，资产阶级观察历史的故事，可比工厂、商店中的事务之＜经＞过相同：主人讨论、筹划、指挥；工人或仆役听从之而已！

这样的解释革命，不难一见而知其谬误。假使没有工人阶级的剥削者资本家，假使没有掠夺工人的劳动生产品，或给工人以完全的劳动报酬，那么，任凭怎样的宣传员，能逼起工人暴动吗？如果，因为宣传的缘故，因为语言或文字的劝诱，而可以引

起暴动；那么，必可以同样地在各阶级中引起暴动。所以在资产阶级中，也必可以爆发如工人的暴动，而且因为资产阶级多受教育，易于明了宣传的意义，其暴动之易于爆发，又不是显然吗？为什么现在这样的宣传，仅适合于最“穷苦”、最“愚蠢”的阶级，而有程度的资产阶级，到处反对革命，无论宣传者如何地解说，他们从未曾入耳，并且扭转脸皮讲烦话呢？因为这样的宣传，于资产阶级是无益的；因为宣传的趋向，是褫夺他们物质上的利益。只因要保护这个物质上的利益，只因须保证稳坐他人背上，而受享丰美的饮食、华丽的衣住及其他种种奢华等，资产阶级不仅不听宣传员的话，并且一见到宣传员，必欲得之而后甘心：或监禁、或放逐、或枪毙、或缢杀！他们（资产阶级）很愤怒地反对“为改良生活而奋斗”的工人！

可见，第一，历史的前进，由于阶级斗争。即被压迫的、被剥削的阶级——农民、工人，和压迫他人的、剥削他人的阶级——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第二，推动这个阶级斗争的前进，由于物质上的利益。即为满足的需要：食、衣、住等而已。人要满足这类的需要，便努力地向前，如何才能很正当地合乎这需要，换言之，凡是地上的财富，当怎样地按照各人的需要而分配之。——这就是社会主义者努力着要想实行的事。

既然说到此处，可见我们不仅由“过去”而知“现在”，并以“现在”去解释“过去”，不过以某一个长时期为观察而已。因为如果仅观察“周围我们所发生”的事实，则我们必有许多不能明了处，我们也找不出什么“阶级”来，只看见某群人的动作，以至于疑惑到“历史”乃由这“群”人造成。所以我们如果要知道历史的过程，要看见历史前进之全身，那么，看这历史的动作须宽一点，须从各方面来观察之。

从此可知，历史的本身无非是逐渐的发展，换言之，人类社会是逐渐地、有规律地发展。在这发展中最近的目的，为现在我们所能预见的，即所谓社会主义。换言之，即一切土地、生产品、生产工具、工厂、作坊及运输资料、铁道等，均归“工作者”之手。这是最近的目的。自然，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至此为限，但社会主义的社会，往下是怎样地发展，现在我们自然不能预说。如果将来有了很精确的理法，知道人类社会向此发展，那么，我们就可预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前程，不仅在最近的时期，也可以推及几十年，几百年了。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不着手研究很远的将来期，倒不如研究现在所有的及已过去的事实。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基，是因为经济的发展，换言之，人类争生存而与自然界的奋斗，争衣食、争住处等行为。从此可见，在这样的奋斗场中，第一，周围着人的“自然界”，就有很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为明了“历史过程”，或要明了各国历史的发展起见，必须先认清楚该国家的自然条件如何。试看现在地球上

所分的：有开化的民族及未开化的民族，文明人类及野蛮人类等，就不难找出“地理环境”之影响。例如，文明民族多住在温带之上，气候不热也不寒；反之，野蛮民族，或住在很热的地方，那边无经营“经济”之可能，或则住在很冷的地方。迄今尚有如几十万年前原人的民族，如爱斯基麻湫族，他们住在美洲之北极，无草木，仅以渔猎而生活而已。其他如中央阿非利加洲之加尔理哥浮耶族，地居赤道之上，故他们迄今尚为野蛮民族。由上二例观之，此二民族所住之处，永无冬日，其气候或酷热，或淋雨。

可是“经济”也能在很热的地方（例如赤道之上）发展，只要其地是高山（比较的冷）就是了。譬如在南美洲找到很开化的民族英谷夫，他们的农业已很发展，人工的培植土地，也很讲究，其他即现在之爱克伐笃尔（音译与“赤道”同意）国。但英谷夫种植所以能如此发达，也因他们所处之地高出海平线二—三里，气候的比较温和耳。可见，不仅宽广的平面——该地很冷或很热——有影响于该地的民族，即高出海平线否——或山或低洼——亦大有影响于该地人民之发展。

惟自然界影响于经济的，不仅气候一方面而已。有时各经济趋向之不同，常因各地出产某种有益动物之故。例如，北欧、北亚的居民，借鹿为生活：由鹿而得到人的食品——肉，衣服——毛皮，工具的材料——鹿角。所以这些民族以得鹿为生活，假使一旦鹿群死亡，也就足以饿死这民族（虽不至于全体）的一部分。又如，以很文明的人民来讲，法国西方及大西洋边岸的居民，一直到现在，尚以捕小鱼而营生活，因为这类鱼必成群地向海岸边游来，该地居民，即以捕这类鱼为生活。但这类鱼不是每年可得，法兰西渔人如在今年中得不到鱼，就比俄罗斯农民今年的收获不好，一样的状况。

但我们不必作如是想，以为这样的影响是经常的，任何时间中，均是一样的。不然，人类常变更的，因人类地变更，故人类与自然界的联系，也随之变更的。譬如俄罗斯平原上的原始人类尚无铁器之时，对于森林对于他们简直是很大的一个障碍。锯伐之，不可能，任其存在，则有碍交通；于是只好依木穿林而过，既感觉非常困难，又似乎有许多奇异，于是乃视森林为畏地矣！（试一记忆书眉《强盗》的小说，便见一斑。）故当时俄国的人民，多散住于森林与沙漠交界的边境，及斯拉夫族一到中央俄罗斯来，他们已经随身带了铁斧（现在发掘古迹、坟墓等，尚以铁斧之残留，作研究斯拉夫族之参考），有此，才能斫入森林，伐去树木，建筑乡村（依木筑居室）。于是森林一变从前之障碍而为人类经营经济之“支柱”，盖殖民初时之经济为森林经济。以我们所知道的而论，原始人类的经济行为多为：采蜜、打猎（取皮，食肉），然后乃是森林、农业。他们斫伐了林木，积而焚之，使成灰烬，又可为种植很好的肥料，如此可

得收获。可见该时代的经济，与森林有密切的关系。

以上不过证明因为人类本身生活的变迁，同时引起人类对于自然界关系的变迁。兹再举他例以证明之。当欧人初到美洲时，该地土人（红色人）仅以打猎为生活而已，很少数的成群的人，在非常广大的场野中流浪，以争逐禽兽；除此以外，别无他业。及欧人到此，不过二百年的经营，一变渔猎的部落，为世界最开化的国家：农业之完备，大工厂、大作坊、铁道等。例如现今的北美合众国，以“技术”（换言之，即经济的方法）一方面而言，几占世界各国之首位。可见美洲能起如此大变化的缘故，是因美洲的土人，仅会打猎，而欧人往美洲，则随带有欧洲文化，换言之，即欧洲的习惯及做工法，均输入了美洲。

现在我们且不谈普遍的，一般的举例，只将我们所要研究的俄国史的俄国本身来看一看。那么，我们就可知道俄罗斯人民所占之地为东欧，气候严寒，冬季长而夏季短（这些均为自然条件），故俄国的农业经济，仅占很短的时期，耕种收获等，以中央俄罗斯为标准而计算之，一年中不过占五个月而已。而反观相邻的德国，能够行农业工作的时期，不下七个月，故俄国农人只好缩手坐食之时，而德国农人尚在田中经营。如果由德国再向西，一到大西洋边的法兰西，则该地因气候的关系，不仅使农人冬天可以做工，简直一年中无废时的。例如，布勒达尼（法国西境）的农人、巴黎附近的菜园主，因为土地上能整年地生长瓜果、蔬菜，所以他们能于夏令、冬令，分种瓜果、蔬菜。这些国家，在这样状况之下，就不难一见而知：谁在土地上，一年中能多工作者，则比较一年中仅少许时工作者的劳动生产力必高，换言之，国家财富的积蓄比较地迅速。从此可知，俄国气候严寒，不及他国之温和，故经济发展也自然落后了！

自然，迄今俄国人民，仅经营农业，则俄国比他国的落后，自不待言。如俄国欲追赶先进国，则必须发展工业，建造工厂作坊。有此，则可以制造输入品（即非俄国本地所生产的东西），如俄国棉纱厂的棉花，多来自土耳其斯坦、美国。在这里所应注意的，就是工业、商业，均足以使经济发展，并减轻受自然条件之束缚。

此处既说到商业，就不得不说几句俄国的商业关系，简单言之，俄国商业的自然条件，也不及中欧诸国，因为商业最好的道路，以水为第一，当铁道尚未发明之时，各国的交通，往往以海为连络，以海为唯一的道路。大商业均经过海，由陆路转运的，不过少许的很贵的商品；因为陆路乘马，由此地运往彼处，运费必多，商品价格必因此增高。此理，以现在的商业证之，更为明显：不必说战后的百物昂贵，只一比较由车站坐马车回家，其价必数倍于“坐火车所能走的同数量的路”。

总之，当铁道尚未发明之时，最便当、最廉价的交通，惟海而已，大多数的商品，就在海上流通，此即欧洲近海诸国工商业先发展之原因也。例如，古时地中海边的希

腊、意大利，新时代的岛国英吉利，近海的和兰（其地低于海平线）。至于俄国，则近海处很少，发展俄国历史的中央俄罗斯，离海也不下六〇〇——八〇〇俄里之遥，而且最近的海如波罗的海的东部，白海、北冰洋的湾流等，一到冬天，水尽成冰，不能航行。其他近南俄的黑海，虽不冰冻，而离中央俄罗斯已不仅六〇〇——八〇〇俄里，而为一〇〇〇多俄里了。此外，在南俄虽有几条大河：地尼伯、顿河、复尔嘉等。但是这些河，第一，冬时冰冻不开；第二，这些河的航路进出口之为难，例如，地尼伯河虽然流入黑海，而河中多礁石，航行不便，复尔嘉河流入里海（里海不过是一个大湖而已），而里海无出路。

凡此种种的说明，无非证明中央俄罗斯的商业以及与此连带的工业，其发展与俄国的农业一样，比较各国为难。但只因俄国曾在这样很困难的条件之下，所以一到发展，便也很快地发展下去了。其故，因为商业和工业的发展，使科学和技术进步。因此，使经济得着非常地发展，也就使人不仅可以防御不适宜的自然条件（自然环境），并可以征服自然界。试举二例，说明之如下：

阿非利加洲北部，有很大的沙漠，即撒哈拉，为游牧民族亚拉伯所居。其地不能务农，某地偶发现水，即为沙漠肥地，但这样的地，究竟太少。及法国占了此地——撒哈拉——后，就在此地应用法国的技术。法国首先开掘土壤，找寻水源，其结果，知道撒哈拉有水，但在很深的地层中。于是以亚尔德齐强井（法国省名，在该省第一次使用，得名），由几百丈的深处汲水，法人既得水，于是建筑了人工的灌溉，造成了许多人工的肥地，种植棕、枣等植物，每年收获很大。至于枣子，在这些地上，已经成为亚拉伯族之必须食品，以代替面包肉类等食物。可见，变不毛之地为锦绣山河，也只因利用了高妙的欧洲技术耳。

尚有很可惊异的一例。只因科学的进步，不仅从前不能生长植物的地方，现在可以培养，即从前从未曾有的新植物，现在亦可创造。譬如，美国园艺家波尔朋克发明新核桃种，只须十四年已完全成熟，换言之，比此树的生长，要快两倍；他又发明了无核的李子等新植物。这样大的发明，不是几百年或几世纪的努力，他不过以个人的一生，利用了现代科学的工具，而得到成功的。

总观上面所说的概括起来：人与自然界有关系，历史前进的迟速，则有关于该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如何。可是，自然界的权力，加于人上，不是无限制地人可以处置自然界的；且人的经济根基，不在于自然界，自然界不过作经济的材料，而在于人的劳动。如果劳动方法愈完美，则人类愈稳固，受自然界的束缚也愈少。故不难预想而知，将来科学与技术的更完成，人类地操纵自然界，必能随心所欲而为之。

战壕断语(二)

屈维它

一、印度的革命工人

孟买的棉纱业是印度工业的精华。许多人希望着这些印度的“殷实商家”——资产阶级，想望他们能和印度古文化争一口气，反对英国皇帝。但是，印度资产阶级在压迫工人的“反赤伟业”上，始终是和英国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甚至于他们组织工贼派的工会，去帮助英国警察。印度的劳动平民是在争民族的解放，他们实际上还是赞助资产阶级反对英国的。然而在这样形势之下，印度的工人实在难以听中国谢持、沈玄卢等的劝告：“不要反对本国资本家，只应当帮着他们反对外国人！”

去年十二月间，孟买的棉纱工业家实行“同盟闭厂”，延长了十个星期，失业的有十六万工人，其中有三万女工，一万二千童工。这次同盟闭厂，原因是工业家反对英政府的棉纱品新税；但是，新税废除了，资本家省下了盈千盈万的资本，对于停业工人的工资，却一个钱也不肯发，反而还要减少工资。

印度的棉纱业，本来是趁着欧战时机，骤然间地发达起来的。等到一九二二年年底，这种“黄金时代”便终了了——英国的资本势力重新侵入，生产也实在是过剩，棉纱业的恐慌自然而然不能免。资本家便向工人进攻，减少工资，一九二四年春天实行减了百分之二十。固然，资本家的赢利那时是比以前减少些，但是一九二四年纱业的利息，还在百分之十五左右。工人的苦斗延长了三四年，结果，资本家想法使号称国家主义派的领袖用种种卑劣手段攫取了几个工会，宣传“爱国牺牲，维护印度实业”，想蒙蔽群众而达到他们吸血的目的。然而，工人的忍耐不能再持久了！去年同盟闭厂之后，因为工人群众自动的罢工，反对减少工资，资本家竟开除百分之八十的纱厂工人——十五万六千人。这种剧烈的斗争里，便使国家主义改良派的工会领袖完全丧失威信，工人真正的阶级工会成立。

原来的纱厂工会，只有一块招牌和几个自命人道主义家的办事员，他的领袖是岳时。这一工会平常只做些所谓慈善事业。一九二四年大罢工的时候，这一国家主义派

的工会完全怠工，工人自己推出领袖来指导当时的斗争。这些真正工人领袖虽然在罢工终了之后，便开除出来，然而他们组织了秘密的“工人俱乐部”——做宣传革命工会的总机关。孟买无产阶级渐渐地集中在这一组织的旗帜之下。到了去年资本家同盟闭厂的时候，这一俱乐部便奋起斗争，号召工人组织罢工委员会，一开始便吸收了一万四千人。罢工胜利——资本家承认不减工资之后，这一俱乐部和罢工委员会方正式改组成真正工人的孟买纱厂工会。本来去年一年是印度工人运动的复兴期。去年年初，印度西北铁路工人的大罢工开始这一时期，虽然那一罢工的结果是失败的，但是印度各地的工人和民众都起来响应，去年一年民众的示威运动和革命的口号弥漫印度全国。年底孟买纱厂的工人罢工胜利，便使革命的工人运动俨然成了伟大的势力。

印度原有的工会，大都是工贼派、改良派、国家主义派的。这些工会也每年有印度工会大会。去年工人运动的勃兴，便使这些招牌工会完全破产。今年一月十日召集的所谓印度工会大会，对于工人群众的苦斗，丝毫不加以考虑，绝对不管工人本身的问题，反而更加宣传劳资妥协，防止革命平民的反英“排外”运动和工人增资、减时的斗争。这些工会“首领”，其实没有丝毫群众，他们却会同英国改良派——工贼派的劳动党欺蒙工人，“维持大英帝国的统一”；或者意以印度工人代表名义，勾结黄色职工国际，宣传劳资妥协。如今革命工人的真正工会渐渐形成，不但工人阶级的力量增长，而且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也快要伟大的主力军出现了。

二、蒙古的国民革命党

蒙古在前清时代的末年，受中俄日三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欧战以前，蒙古受俄皇政府利用，趁辛亥革命时机，宣布独立，实际上完全归了俄国统治。一九一九年，俄皇政府及资产阶级已倒，俄国帝国主义消灭，于是日本帝国主义大施吞蒙野心，要实行《二十一条》而使安福系徐树铮将军征服蒙古。直到一九二〇年，安福政府倒了，日本帝国主义便抛弃中国军阀而利用俄国白党军阀恩琴占领蒙古，大施抢掠和屠杀。当然，凡是这些异族侵略蒙古的时候，他们总是利用蒙古的王公僧侣，把持政权而代行统治。

蒙古平民的备受压迫和剥削，真正是不可以言语形容。蒙古平民只有两条路：或者完全驯服，保持自己的所谓民族文化——喇嘛教的迷信和王公的尊崇，听凭一切帝国主义的压迫；或者奋起革命，推翻旧时代的遗毒和帝国主义的统治。

蒙古的民族解放运动实在不得不奋起斗争，于是国民革命党成立而领导革命的进行。这一革命的目的，便是推翻日本、俄国白党、中国军阀富豪及蒙古王公的政权。革命运动的根本动力是贫苦的牧民群众和蒙古智识阶级。最初一期的革命策略，偏重

于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势力，而反对王公的运动比较缓进。但是革命斗争的过程里，自然而然拥护中、下等人民的权利而限制王公的跋扈和卖国：实行经济上、社会上的种种改良，如没收庙产、创办协作社等。国民革命党成立已经有五年，它不但消灭了蒙古的封建牧奴制的遗毒，而且建立了劳动平民的民主共和国的基础：大多数平民日渐加入国家政治的治理，而剥削者则被剥夺政权和一切特权。五年来，国民革命党的发展，可于下表见之：

时 期	党员人数
一九二一年（成立时）	一五〇
一九二二年	一·五〇〇
一九二四年	二·五六〇
一九二五年	七·〇四三

最近党内整理之后，刷除不良分子，实数还有五千二百四十一人。党员的社会地位：

牧民	四·六六〇人
喇嘛	三一七人
贵族	二六四人

党员的财产多寡也可列表如下：

富人	五人
中产	二·八六九人
贫民	二·三六七人

这些统计还不可算很正确的，因为军队里的党员还没有计算在内。但是这一政党确然是代表中、下等人民的权利的：它能在五年之中扫除封建遗毒和帝国主义势力，建立国民会议和平民委员政府的制度，限制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权利，那么，将来它的前途正未可量——劳动平民取得政权之后，不但要联合中国革命平民共同奋斗而巩固自己的政权，铲除帝国主义势力的根源，赞助中国人民推翻军阀政府，而建立真正自由联合的中华平民联邦；并且还要和世界无产阶级携手，以求根本推翻国际的资本主义统治，同时现在便运用政权以求逐渐争得最后的经济解放。

蒙古国民革命党主持的蒙古政府，虽然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徐树铮、谢持、邹鲁、沈玄庐的眼光里，是“叛国僭窃”，可是在蒙古平民看来，确是他们的代表。而且对于中国平民，也是反帝国主义战线里的胜利的同盟军，是改造中国实现民族解放的革命势力。

三、意大利法西斯蒂的侵略政策

意大利的“法西斯蒂”，实际上就是工贼党，是一班流氓、光棍，受了资本家的雇用，专门破坏工会和罢工，殴打、杀害工人领袖，捣毁工人报馆，屠杀工农群众的党。这种工贼党，现在欧、美各国都有（如三 K 党之类），如今英国、日本人在上海也来组织，五卅后工人受这些工贼（包括流氓）的袭击，时有所闻，最近甚至有制赤会、反赤同盟等出现。这种团体自然是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工具。《东方杂志》一九二六年第三号反谓捧喝团（法西斯蒂）的功罪，还是“颇难论定”，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我举下列的一件事情，做“东方”的“证据”吧！

意大利在非洲北部原有一殖民地名吉陵纳加（Kirenaka）。意政府久已想侵占埃及的笈腊蒲白区（Jerabub），使合并于吉陵纳加。一九一九年的《英意条约》上，英国答应意大利让与这笈腊蒲白区，而自己取意大利的别一殖民地以为交换。但是，埃及不答应，所以这一条约并未实行。一九二三年埃及更宣布所谓离英“独立”，于是形式上非由意，埃双方另订条约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一九二四年，埃及比较革命的政党占多数的国会即被政府在二十小时内解散（这里当然也是英国的指使），亲英派的齐纳尔内阁成立，便立刻批准让与笈腊蒲白区问题。但是笈腊蒲白的居民反对甚烈，所以意大利不敢遽然实行占领。最近，埃及国会改选，听说要拒绝通过笈腊蒲白割让问题，或者至少要延搁这一案件。于是意大利的法西斯蒂立刻冒险先行占领该地，使埃及国会无从抗议。意大利的工贼军队强行占领的时候（二月二十七），对于反抗的笈腊蒲白居民，大施屠杀。可是，埃及的意文报纸都说，这种政策非常必要——可以震慑一切“回教的野蛮民族”，如里孚人及叙利亚人等。“这种政策是巩固意大利对于吉陵纳加和第黎波里（Tripoli——与吉陵纳加相连）之统治所必要的。而且法领的突尼斯（Tunis——第黎波里西境），居民大多数是意大利人，也应该由意大利占领，而归并于第黎波里。”法西斯蒂的报纸都是这种论调。法西斯蒂党的“功”，大概是在于善于杀人、善于掠地了！

四、帝国主义的裁兵和世界的武装

现在国际联盟很起劲地谈裁兵，实际上谁也不肯先裁：英、法、意等以及美国，冲突非常剧烈，第二次大战争正在酝酿，裁兵不过是口头禅，用以欺蒙民众、牵制敌人的工具罢了。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能以消灭战争，的根本原因——资本帝国主义。请看现时世界的武装：

（一）法国欧战前只有五十四万六千兵，现在却有六十八万五千。欧战以前法国每

一千人民之中有五·二人有轻式的枪，有二·四人有重式的机关炮。现在，千人之中有五点一人——轻式的枪，二点一人——重式的枪，四点九人——轻式的机关枪，一〇点七人——重式的机关炮。

(二) 英国欧战前有四十四万一千兵，现在只有三十二万九千，但是，一则印度的军队没有列入，二则英国现在有十万左右的秘密武装队。

(三) 意大利战前有四十万，现时固然正式军队减到二十九万一千，但是法西斯蒂的军队却增了二十九万五千。

(四) 美国战前只有二十二万六千，现在增加到四十万八千。

(五) 日本现在比战前形式上减少七万人，实际上增加十五万以上的秘密武装队。从去年起，日本学校一概“军阀主义化”，每年有五万新受武装训练的学生（大学及中学），此外还有二十万小学生。

总之，一九二五年这五国的武装总数，已在一九一三年的一百八十八万，增加到了二百九十一万八千人。

(六) 战败的德国最近也恢复了战前武装的一半；战前德国陆军有六十六万七千九百十四人，海军有七万九千八百八十九人。

(七) 芬兰一九二三年有三万兵，现时有三万三千。

(八) 爱史笃尼亚亦从一万二千增至一万四千。

(九) 腊脱维亚——从二万增至二万二千。

(十) 波兰——从二十六万四千（一九二三年）增至三十二万五千。

(十一) 罗马尼亚——从十五万三千已增至十五万八千，并有再增加二千人的计划。

(十二) 苏联，从欧战时五百五十万兵减到现在五十六万二千人之后，一直没有增加。

再则，各国国民平均每人每年所担任的军费，尤其可见帝国主义武装的破坏经济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之受此障碍，但是苏联政府使人民担负的军费，还是世界上最轻的。兹列表如下：

英国	每人每年担负军费	二·一〇元华币
法国	每人每年担负军费	一七·一〇元（殖民地战费不在此内）
美国	每人每年担负军费	九·一〇元
意国	每人每年担负军费	八·五〇元
波兰	每人每年担负军费	一一·〇〇元
芬兰	每人每年担负军费	八·〇〇元
爱史笃尼亚	每人每年担负军费	九·五〇元
腊脱维亚	每人每年担负军费	九·四〇元
苏联	每人每年担负军费	四·〇〇元

五、法国共产党反对《洛迦诺条约》

帝国主义的反赤运动，实际上武装着向民众进攻：美国逮捕罢工的纱厂工人（二月二十五日，纽折尔西邦 New Jersey），根据一六九七的法律（！）杀戮共产党机关报的主笔；波兰屠杀示威的失业工人（二月九日）；布加利亚枪毙三十二名革命党人（二月三十五日）……数不胜数。但是帝国主义者却高呼解除武装，开什么洛迦诺会议！

法国共产党议员加桑说：“洛迦诺会议是英国的诡计。英国的工人日趋于革命化，殖民地上也起暴动和解放斗争。帝国主义以为这都是苏联‘不好’，苏联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劳农革命，妨碍英国帝国主义之‘剥削自由’；所以它要造成反苏联的联合战线，以《洛迦诺条约》诱使德国离开苏联。什么是‘洛迦诺会议精神’？便是帝国主义加紧武装、装备屠杀民众，并侵袭苏联。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毒计。只有无产阶级，真正反对战争；只有无产阶级国家，真正愿意实行解除武装！”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还是尽着增加武装，无产阶级难道束手待毙？！不的。

六、德国无产阶级眼中的洛迦诺精神

德国资产阶级因为洛迦诺会议后德国得以加入国际联盟，方自己以为荣幸之至。但是《洛迦诺条约》刚刚签订之后，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首相——慕莎里尼便声言要占领非洲的南第洛尔，驱逐德国人。这是不是明明破坏所谓洛迦诺的“和平精神”？德内阁口德莱曼和社会民主党史垣蒲夫，以为慕莎里尼本是法西斯蒂的光棍，所以破坏国际联盟，英、法却不致于如此的。因此，德国只要加入国际联盟，便不至受侵略了。德国无产阶级却不能相信这种谎话。法国白里昂压迫境内的爱、洛二洲德国民族；捷克斯洛夫的白纳史压迫境内的弱小民族……何尝比慕莎里尼好些？便是德国的资产阶级，如果有力量，也是同样要压迫弱小民族，他们的衷心是和慕莎尼里相同的。德国国会里讨论慕莎里尼声明的问题时（二月九日），共产党议员史德克尔便这样说：“我们反抗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同样，我们要反抗英、法、捷克以及德国资产阶级的这种政策……慕莎里尼不过是无耻的对外对内政策的明显的代表。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都是利用对外问题，移转民众的视线，其实他们对于自国的劳动平民，一样的压迫、屠杀。欧洲各国的对外政策，完全是卑劣的卖民手段，一切欺诳政策都根据于资本主义而来的：这一国的资本家强盗嫉视别一国的资本家强盗，强盗抢强盗，强盗骗强盗——便是欧洲的所谓外交。因此，我们要知道，只有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各国的弱小民族问题才能解决，如现在的苏联一样。我们号召意大利工人和我们共同作战，反对慕莎里尼的武力侵略政策和其他国际联盟式的一切强抢、软骗政策！”

七、瑞典的共产主义运动

瑞典的共产党，本是从社会民主党里分裂出来的，所以内中有不澈底的分子，如希葛龙等，他们在一九二四年八月退出共产国际。于是瑞典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都兴高采烈地说：“我们原说共产党是俄国货，不能适用于瑞典的，从此共产主义消灭了！”可是，瑞典资产阶级忘了四十年前的旧话，那时也说社会民主主义是德国货，不能适用于瑞典，“没有一个明白的瑞典工人会相信这种主义”。事实上呢，从一九一七年以来，瑞典已经有过三次的纯粹社会民主党政府。至于布尔希维克主义，现时也正勃兴起来，资产阶级的报纸不得不鼓吹屠杀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又在大叫其抵制赤化！

一九二四年初，瑞典共产党便积极在工会中工作；那时资本家要开除十六万工人，而社会民主党的工会首领不肯领导群众奋斗。资本家的机关报，主张赶紧稍稍让步，以保持工会首领的信用于群众之中，而防止赤化——结果工人失败。然而希葛龙等不良分子开除之后，工人因为共产党的苦斗牺牲和党内的肃清，群起拥护共产党及其革命政策。

一九二五年，瑞典各城市（如孙德斯瓦及嘉勒美尔等）的市政工人屡次罢工，政府一味地压迫，而社会民主党的黄色工会暗助政府。最后，政府竟公开承认破坏罢工的武装队（法西斯蒂组织）是合法的。结果工人只得了一半的胜利，而组织示威运动的三个工人，竟被判决多年的监禁。虽然连社会民主党党员群众也要求释放这些工人，政府固然不答应，社会民主党领袖也始终不提抗议。

一九二六年一月，革命派工会的全国会议，征取了工人群众中的信仰，议决对于工贼（法西斯蒂）办法和工人阶级之统一战线及统一组织的要求。黄色工会不敢公开拒绝统一工会，但是听了资本家的反赤大宣传，竟借口共产党在工厂里组织支部，也起来附和反共产的运动。社会民主党的真正党员并不多，不过它强迫加入黄色工会的工人都加入党，所以有五十六万党员。它们蒙蔽这些群众使他们反对共产党，然而指导这一运动的竟是陆军总长御驾亲征，何况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的政策都是卖阶级的；所以反赤宣传不但不能奏效，并且不久就要自行消灭的。

再则，瑞典的贫农已经四处骚然欲动——这是欧战世界经济的总危机。所以可以说，瑞典的客观环境，群众是非常之容易革命化的。虽然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阴谋破坏，然而他们决不能制止共产主义的发展。

现时瑞典共产党的职任，便在增加主观上的努力：（一）继续改组共产党，以支部制度为原则，努力扩大党的群众；（二）加紧发展共产主义的青年运动；（三）建立强

有力的机关杂志并组织党校；（四）继续努力于工会中的工作，使成革命的群众的组织，并且竭力进行瑞典工会及国际工会的统一运动；（五）引进农村平民的积极奋斗，并且组织贫苦的农民。

八、新经济政策下的商业和社会主义

苏联自从新经济政策以来，往往有许多人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的复兴。这种错误观察，完全因为不明白下列两点：（一）新经济政策以前的战时（军事）“共产主义”，并非真正共产主义的试验，而是对付反革命战争不得已的暂时办法，如禁止商业、征收农民食粮、按口分配面包用品等；（二）俄国共产党的决定新经济政策，即以无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大工业渐渐征服小生产，而后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分配，这一政策早已由列宁决定于一九一八年四月，等到一九二一年反革命完全削平，战争停止，当然立刻实行。至于说：既有商业，便是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的进行仍有复兴资本主义的危险，这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严重问题，我们值得来研究一下。

新经济政策既容许商业自由，而“商业自由却是资本主义”，这是不错的——列宁也是这样说。但是，这并不是说，既有商业便不问环境如何，完全都是资本主义。譬如，苏联国立企业完全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如今一个国立纱厂向一个国立机器厂买机器。这是一种商业，并且绝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这都对的。但是这是资本主义吗？当然不是。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基础，最先的是商品的流通。”（《资本论》卷三上篇，下同）但是，“货币和商品流通的这种交易方法，可以为各种不同样的组织之生产范围所应用，那些生产组织的内部结构，大都还是以消费价值为生产之目的的”……“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的发展趋向于以造成交易价值为目的之生产——扩大生产的范围，增多它的式样，使它有普遍的性质，发展国际市场上的货币。所以凡是停滞不进的生产组织，大半还以造成消费价值为目的的生产组织，遇见商业的影响，必然开始崩坏。然而商业的这种崩坏影响有多么深的程度——这都要先看这一生产方法的巩固程度和它的内部结构而定。这种崩坏过程的结果如何，就是旧的生产方法崩坏之后，要发生什么样的新生产方法——那就与商业无关，却须看旧生产方法本身的性质而定。”古代各国商业资本发达很早，但是它破坏了旧生产方法，所造成的不是工业资本主义，而是奴隶制度的经济（如希腊），或是宗法社会的小农经济（如中国——从井田变成阡陌）。换句话说，便是从制造消费价值的生产方法变成制造剩余价值的特种生产方法，并不一定是工业资本主义。必须原有的生产方法是

私人的城市小手工业，方因技术进步又得商业的助援，然后会发生私人的工业资本。如果不是城市手工业发展，与农村脱离关系，那么，“与城市及其一切条件相反，则商业精神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往往不在固定居处的民族，却在游牧的民族。”从这一点看来，可见决不能说：商业便等于资本主义。

列宁著的《俄国资本主义之发展》上，也和当时否认资本主义的民粹派（Narodniki）讨论商业的问题。列宁没有说：只要有商业，便会发展成资本主义。列宁所设的问题是：“我们的商业资本及盘利资本（如中国之钱庄、当铺）是否与工业资本相联结？商业及盘利事业是否因此造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以代替旧的生产方法？”可见农村经济决不单单因有商业就能资本主义化，必须商业与城市工业资本融合生长，然后才能使农村资本主义化。

十月革命之后，无产阶级独裁制胜利，消灭封建地主制度，努力进行协作社事业，农民中抵抗资本主义分化的力量自然增高百倍。同时，这时的商业与社会主义的工业相联结。所以新经济政策之下的商业，必然使农村经济逐渐地社会主义化，而不是资本主义化——因为俄国私人资本主义（尤其是工业的）非常之弱，而社会主义的工业，因有国家的种种辅助，都逐渐强盛巩固，它本身的结构和性质，又是趋向于使交易方法由买卖的进于自然的——社会主义的。

商业能产生资本主义，但是只在旧生产方法根本上要求买卖形式的交易方法之时。苏联新经济政策之下，商业只是进于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

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发达，协作社事业——自然交易的逐渐开展：一方面小生产不能与大生产竞争而日益消灭，农业工业中电气化的事业，不但增加生产力，并且根本改变生产方法；别方面，协作社等的发展日益减少私人商业资本的势力——最终的结果，苏联的经济之中，生产交易等各方面都自然要进于社会主义的！

一九二六年四月

并非闲话

蒋光赤

三、过去的人

有一天我在 W 君处，无意地遇着了胡适之博士。我本与他不认识，这是我第一次与他见面。当 W 君向我介绍，说他是胡适之博士时，我觉着很幸福，因为我虽久仰大名，但从没有识荆的机会，今于无意中遇见了，当然是万幸之至了。不过很奇怪，在欣喜之中，我又暗暗地感觉我们之间，横着一道巨大的鸿沟，并且是很难于掩平的。我仿佛遇见了一个人，能够令我心中隐隐地发生怀疑、悲哀、忿恨种种的情绪：

难道这就是六七年前新文化运动首领的胡适之？难道这就是六七年前活泼活泼的维新人物？……好一副聪明的面孔！好一个不愚拙的头脑！但是他说青年爱国的运动是胡闹，泰戈尔不应为激烈分子所反对，帝国主义是不存在的，最近又说什么反对文化侵略是无理的举动……是思想的落后呢，还是他已跳出新的范围，而甘心倒入旧的怀里，以遂其升官、发财的迷梦？可惜！可惜！但是人各有自己的路，人各有自己的愿望，这是没有办法的呵……

胡适之博士，在六七年前，曾受过我的崇拜的。那时的他是主张白话文的，而我是欢迎他的主张的；他是反对旧礼教的，而我却与他更同意，于是他成为我所崇拜的人了。但是我的年纪渐渐大了，知识渐渐长了，感觉渐渐复杂了，因之要求也就渐渐多起来了：我不但要实行文字革命，并且要建设革命的文学；我不但要废除旧礼教，并且要废除一切不平等的人们间的关系。可是六七年来胡适之呢？一年一年地过去了，而胡适之还是站在一块地方，一点儿也不向前移动，或者一天一天地渐渐有退后的趋势。他有时竟公开反对一班向前进的新的青年，不幸我又是新的青年中之一个，于是我俩的距离相差日见其远，于是我俩中间横着一道不可掩平的鸿沟。但是他究竟是我从前所崇拜的人，我不得不对他有点可惜的心情，虽然这种可惜的心情是为他

所不愿意接受的。

现在中国社会阶级的分化，实在已经是很明显的了。资产阶级所要求的是美国式的民治，这种民治是胡适之博士始终所主张的，完全属于政治的范围，而生怕一谈论到经济的组织。至于劳动阶级呢，虽然对于民治也很热心，但根本所要求的，却是经济的解放。五六年前的中国社会，所谓阶级的文化，还不十分明显，因之大家所要求的，还不见得有什么差异；可是近年来的中国社会完全改换了面目。所谓知识阶级这个东西，名目上虽然是思想界的代表，事实上是要依附于其他阶级的。知识阶级本不是整个的东西，有的有升官发财的希望，于是就跟着资产阶级走，为资产阶级财产的辩护士；有的没有升官发财的希望，或对于被压迫者抱深切的同情，于是就跟着劳动阶级走，促进革命的运动。当胡适之博士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时候，那时因为中国社会还未表现出阶级的分化，所以那时的知识阶级的要求和口号，几乎都是一致的。但是现在呢？现在阶级分化的现象已到很明显的地步，革命的浪潮不但增高了政治的意义，并且增高了经济意义，此时大家没有再含混的可能，不得不把社会的面孔拿将出来，于是中国的知识阶级便分道扬镳了。

这实在没有办法！倘若谁个走入了反革命的道路，便就你硬拉也拉不过来，除非他自己有了觉悟。胡适之博士现在的行动和言论，真令我们要断定他陷入反革命的深窟了。他自己是不是要反革命？是不是在做升官发财的梦？是不是要自甘落伍于新青年之后？是不是？……我们不得而知，并且没有知道的必要。我们只要看看他的行动和言论，是否有反革命的趋向就得了，还问他什么动机呢？也许他太中了美国毒，也许他要升官发财，也许他现在相信自己的行动和言论是对的……

革命的浪潮也不知吓退许多人，把许多人抛到落伍的道上；也不知送了许多人进入过去的坟墓，加了他们一个死去的冠冕：胡适之博士不过是其中之一人罢了！

四、诗哲、新中国与打倒帝国主义

“……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时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我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这一段是诗哲(?)徐志摩先生在《晨报》上介绍罗曼、罗兰先生时所发出的感慨。有趣的鲁迅先生在《语丝》上，对于诗哲的这种感慨，说了几句话：“他住得远，我们一时无从质证，莫非从诗哲的眼光看来，罗兰先生的意思，是以为新中国应该欢迎帝国主义的么？诗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时也无从质证。不知孤山的古梅，着花也未，可也在那里反对中国人‘打倒帝国主义’？”

照着诗哲的意思，罗兰先生是不赞成中国人打倒帝国主义的，或者在欢迎帝国主

义的运动中，新中国才有成立的希望。不然，为什么要说这一段话？为什么要发这样深的感慨？

在诗哲的眼光中，什么打倒军阀，什么打倒帝国主义，什么救国……都是一些无理的行动，因为这些与诗的哲学太相反背了。诗哲大约从没说过救国等等的话，更不愿意听什么国民革命、社会革命、阶级斗争等等的口号——诗哲当然是要这样做，因为诗哲的责任在歌咏花月，在赞颂自然，在神游于美丽之宫，在徘徊于象牙之塔，除此而外的事情，与诗哲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将自己诗哲的责任完成，还问什么亡国不亡国、做亡国奴不做亡国奴呢？你看印度的诗哲泰戈尔，无论印度如何受英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无论自己的同胞如何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生活，无论亡国奴的名词光荣不光荣，他总是优哉游哉，自做美妙神秘的歌吟，这岂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现在我们中国也万幸产生了一个诗哲徐志摩先生，与印度相比美。照理，我们是应当引以为光荣的。为着不妨害诗哲的歌吟起见，我们应当欢迎帝国主义，取消打倒军阀等等的口号，什么反抗的运动都不要做了。如此，新中国才可以产生，诗哲的心意才可以快乐。就使段祺瑞怎么样杀北京的学生，日本军舰怎么样轰击大沽口，南京路怎么样溅满了血迹，日本资本家怎么样枪毙中国的工人……这都可以置之不问，因为这是不合乎诗意的呀！呵！美妙的诗意……

不过，我还有几句话要说。徐诗哲在感慨之余，似乎深引罗兰为同志，以为罗兰先生的思想、行动、言论，是和自己一致的。可是就我所知道的罗兰先生，几乎与徐诗哲所想像的罗兰先生完全两样。我以为徐诗哲引罗兰先生为同志，未免是“认贼(?)作父”了。我们且不言徐诗哲的思想是否是新中国的代表，看看罗兰先生到底是一个什么人物。就我所知道的，罗兰先生的心肠虽然慈软，虽然还缺少坚决的果断性，虽然还未曾大声疾呼鼓吹用武力反对强权阶级，但是他的确是旧世界、旧欧洲敌人。他说，旧欧洲在不净的、闷塞的空气中呼吸着；他又很热烈地祝贺每一次的运动的运动；他又说，凡自由陷于危险的地方，都是我的祖国，都是我的生长地。当苏维埃俄罗斯初露头的时候，一般资产阶级的诗人、学者大肆其咒骂，以为俄罗斯的文化要消灭了，可是罗兰先生首先向苏维埃俄罗斯表示敬礼，以为新俄罗斯是人类解放的根据地。这么一来，似乎罗兰先生的思想有点与徐诗哲的诗意不合了；岂但不合，而并且是走的完全相反的两条路！如此，为什么徐诗哲能引罗兰先生为同志呢？这是不是因为诗哲想入了非非？这是不是因为诗哲心目中的罗兰先生变化了？或者法国有两个罗兰先生？诗哲知道的是一个，而我所知道的又是别一个？在下学浅识陋，不敢自下断语，爰遍访名人，问问法国有几个罗兰先生，可是大家都答应过，法国只有今才做六十寿辰的一位罗兰先生。唉！奇怪！

我也佩服罗兰先生，但我所佩服的不是主张新中国应欢迎帝国主义的罗兰先生，不是赞同中国民众永远要受压迫的罗兰先生，而是为人类解放奋斗的罗兰先生，而是表同情于被压迫的罗兰先生。

但是我要向徐诗哲告罪：我所佩服的罗兰先生实在不合乎诗哲的诗意！

五、马克思逃出文庙

我现在下笔写这一段文字，是一篇小说呢，还是一则并非闲话呢？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自从郭沫若先生提出马克思进文庙一个问题来，我粗笨的脑子也实在为着这个问题想了几次，想的结果不是马克思能进文庙，或是马克思不能进文庙，而是马克思进了文庙又逃了出来。

话说孔老夫子因为尊敬自己的人们太多了，并且大家尊敬的心意都是很诚恳的，为着联络感情起见，遂在自己的文庙里大张筵席，延请门下的信徒，并欲借此机会大讲其道，以期教化人民。凡是孔子的信徒，这一天都可以赴会。这一天赴会的人非常之多，五色人种，六花八面，样样俱全，无奇不备。有些头戴红缨帽、身着马蹄袖的黄袍，手里拿着旱烟袋，大摇大摆地躬着腰，据说这是从保皇党同盟会来的，为首的是一位康圣人。有些穿着威严的军装，腰下系着指挥刀，竖眼横睁，不可向迩，据说这是督军团的代表，为首的是张宗昌、吴佩孚。有些小辫子拖得很长，然穿得不美，走路斯斯文文的，据说这是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为首的是李静斋（？）罢，我可是说不清楚了。有些穿着洋装的少年，也有穿着很时髦的中国装的，像煞有介事地举着“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招牌，据说这是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健将，为首的是会什么东西，有陶其情跟班。还有一位先生算最出色了，他背着一座孙中山的铜像，累得汗流夹背，杂在众人的中间，挤也挤不动，呈现着怪可怜的样子，据说他是戴季陶先生，不远千里把孙中山铜像从世界公园背到此地，说起来，他也可算是热心之至了！

孔老夫子派子贡为招待，因为他善于词令；派颜回为司礼，因为他文雅；派子路为童子军队长维持秩序，因为他有勇。宾客到齐，大家都在文庙的大厅中坐下，孔老夫子坐在上边，正一正衣冠，端然而起立，向诸信徒致辞道：

“今天我请诸位来，为的是联络联络感情，并欲就此机会请诸君努力奉行吾道，同心同德地做将下去，以维持斯文不致于堕落……”

孔老夫子话还未说完，戴红缨帽的康圣人起立说道：

“吾师之道首在君君臣臣，弟子深明是义。今者幼主失位，国无正君，共和乱闹，邪说横行，弟子虽有保皇之心，而无保皇之力，为之奈何？！”

督军团的代表张宗昌不问康圣人的话说完了没有，便傲然高声地说道：

“老夫子！说起来行道的话，我真是你的好学生！我禁止白话文，我提倡读经，我捉拿过激党，我枪毙了许多不良分子……你看看我是不是行你的道呢？”张宗昌将自己的功劳表说了一大篇，但还没有说到的，如拿地盘、横征暴敛、害民卖国等等。

国家主义者曾某听了张宗昌的话，似觉又表示欢迎又表示反对的样子，欢迎的是他的捉拿过激党的行为，的确是合乎国家主义的意思；反对的是张宗昌也犯有国贼的嫌疑，倘若国家主义者要贯彻内除国贼的主张，那当然是要反对张宗昌的了。但是张宗昌与曾某总还有一半同志的关系，所以当时并没在孔老夫子面前，说什么难堪的话。

曾某开始说道：

“吾师乃我们国家主义者的先进；吾师尊王攘夷，这与我们的外抗强权的宗旨相符合；诛少正卯，这与我们的内除国贼的宗旨相符合。惟有我们国家主义者才真是你的信徒！”

“放屁！难道我张宗昌不是夫子的信徒吗？”张宗昌听了曾某的话不觉勃然大怒，以为曾某太抬了自己，看不起督办大人了，竟欲上前来打曾某。幸亏子贡晓三寸不烂之舌，费了好大的工夫，才把他安慰住，没有闹大乱子。这时孔老夫子坐在上边，只是皱眉，似觉没有办法的样子。最后，戴季陶先生见着大家都说完了，于是从大殿左边谨谨慎慎地背着孙中山的铜像，走到孔老夫子面前，先鞠一躬，然后说道：

“夫子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统，中山先生承夫子之道统，而我今又承中山先生之道统……”

戴季陶先生刚说到此地，大厅中忽进来了一位卷胡子长发的老头儿，原来是无产阶级的领袖马克思。马克思久已要与孔子谈谈，交换交换意见，又巧郭沫若所谓四个抬轿子的把他抬进文庙时，正值这次大宴会。他进了文庙的大门，投上了自己的名片，说明自己来文庙的目的，招待员子贡也就把他引进了大厅，恰好这时正是戴季陶说话的时候，忽然大殿中左边有人喊道：

“你是什么东西，要来继承夫子的道统呀？你是推翻皇帝的革命党，你是国民党……滚出去！我们孔教徒是尊王攘夷的，你那国贼孙文搬了一套法国、美国、德国、俄国的邪端异说，扰乱华夏……混蛋，该当打进十八层地狱，还说继承道统，真是胆大无耻，”这时大殿上哄哄乱响，人声嘈杂，也辨不出是康圣人的声音，还是曾贤人的声音，何况一班圣贤的跟班小子也在厅下大打大吵。

“打，打，打……”

“打，打，打……”

“孔夫子是我们的！”

“放屁！是我们的……”

“打，打，打……”

于是顿时喧嚷起来，大厅中打得一塌糊涂，也不知谁打谁。这时孔老夫子急得没法，只是喊大家莫要争打，但是谁个也不听他的话。本来是请大家赴宴的，但酒席还未吃成，大家先打起来了；本来是要解释道统给大家听的，但道统还没有解释，大家先为着道统争得不可开交。当童子军队长的子路虽然有勇力，但是到此时，无论如何，秩序是维持不住的了。马克思本想同孔子谈谈，但一进大厅，即见着众信徒为着争道统打起来了，他弄得莫明其妙，以为大家闹出了什么大的乱子，于是连忙逃出文庙，不敢留停一步。走到庭中一看，四个沿途高唱“礼运大同”的轿夫早已被人打得跑了。没得法子，只好丢下空轿子急步快跑，心想不好：从中国到德国几万里途程，独个子步行怎能去得，打算也再找几人同伴回去，买座轿子轮流坐着抬着好些。马克思正在想着，信步行来，已走了一里多路。抬头一看，原来是火车站。马克思道：原来如此，此地亦已发生了资本主义，难怪文庙里也起了阶级斗争。说完，他便乘了资本主义的火车到处找中国无产阶级来解围，他心想只有一法：请孔老夫子和这班种种色色的徒子徒孙上天堂，省得在人间骚扰不清。

革命日志

——一九二六年二月

二月一日

开滦矿务局英人，因煤料出产量过剩（机车都被军人扣留，无法将煤运出销售），竟不顾工人生活，宣布停工，矿工于是召集全体大会，议决提出下列要求：（一）接济停工工人生活补助费；（二）发给外工花红；（三）早日开工。

上海曹家渡公益纱厂细纱间全体男女三百多人，因包头对待苛刻，且前次复工条件中增加工资十分之一等项，都未履行，于是全体关车怠工，要求照加十分之一的工资。厂内其他工人，继起响应。相持二小时方达到要求目的。

上海南、北市全体卷烟业者，因上宝区卷烟营业特税局，屡经总包商复令催促特税实贴，各烟业吁请从宽办法，特税局一无转圜余地，双方争执决裂，南、北大小同行，一致停市。

上海劳勃生路喜和纱厂，前日因无故开除细纱间工人乐正舫，全厂工人大愤，一致关车，表示反抗。后厂主允许恢复乐君工作，事遂平息。

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议决发表宣言反对吴佩孚联奉攻豫，并主张组织临时中央国民政府，解决国事。

二月二日

汕头华英学校改组为南强中学，乃是该校员生自英教徒手中收回该校教育权的结果。不料英教徒突于本月一日率领英人七名，闯入校内，捣毁器物，关锁校门，断绝在校员生的伙食。至二日晚，被外界得悉，即由汕头各界外交后援会，召集全市各界紧急大会，当派代表赴交涉署，促向英领事严提抗议，并即组织各界慰劳队带同食物，前去慰劳。时大门仍关着，食物由绳吊入。英教徒因见全市民气沸腾，遂于二日晚间潜行离校。后由公安局派警前去守护，员、生方各安心。

全国学生总会、中国济难会、上海总工会、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非基督教大同盟等一百余团体，因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兵满洲，援助奉系军阀，特共同组织上海反日出兵行动委员会，议决：（一）联合全国各地反日行动委员会一致进行；（二）实行

对日经济绝交；（三）执行前次反对日本出兵市民大会中所有一切决议案；（四）通电日本人民，申述日本帝国主义出兵满洲之暴行。

北京外交部电嘱驻英公使向英国声明，否认沪案司法调查报告，并电驻外各使，声明我国仍照最初提案办理。

二月三日

上海总工会召集各工会代表大会，议决：（一）各厂工人状况，须切实调查；（二）新年各厂停工，应由各工会各自向厂主要求于正月初六日开工；（三）规定“二七”前后一周为职工运动战士大追悼周，利用各种机会举行追悼；（四）反对吴佩孚进兵河南，并向工友说明吴在过去所造的罪恶；（五）对中东路事件，认定是日本唆使奉张挑拨苏俄，以为转移民众视线之计，应依据真相，向各工厂宣传。

南京提倡国货抵制仇货协进会，查获仇货的罚款一万数千元，除捐助罢工工人生活费及五卅工人学校基金外，尚余四五千元，决以此款组织一中学校，专收南京各教会男、女中学退学生，以使实行破坏教会教育。

二月四日

无锡城区四十二家人力车公司，因增加车租，各车夫群起反对，打毁公司十五家、车百余辆，损失总数达七八千金。警察当时拘去车夫十二名。车公司方面态度强硬，议决车租增至小洋四角，钱二十文，不得少收。车夫因迫于生活，不久照常租车营业。

上海学生联合会致电北京司法部，请将《治安警察法》与《出版法》同时废除。

九江圣约翰中学，前因细故开除学生多人，激成全体退学风潮。现退学各生，一致抱定自办的决心，已组织募金团，竭力募捐，期能成为事实，此为江西全省收回教育权之先声。

淞沪警察厅将上海书店发封，并传令该书店经理人到厅候讯。其发封罪名为“印刷过激书报，词句不正，妨碍治安”等语。

二月五日

杭州酱业伙友要求加薪，未达目的。于是有伙友一百多人同时罢工，手执布旗，到各坊去联络。各坊伙友，相继离园，有十多家因伙友星散，只得暂行关门。

上海各团体联合会对时局问题，议决：（一）对吴佩孚进兵河南，宣言反对，并电请广州国民政府声讨；（二）反对护法运动，主张组织临时中央国民政府，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

二月七日

广州、汉口、北京、天津、上海、杭州、长沙、九江、长辛店等各地民众，都开“二七”纪念大会，纪念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京汉铁路工人为组织工会被吴佩孚屠杀的

职工运动战士。

全国铁路工会在天津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典礼，到全国各路代表五十八人，来宾数万。

二月十四日

盘据湖北多年的直系军阀萧耀南，近因和吴佩孚意见不恰，吴为独揽鄂省政权计，将萧毒毙。

上海浦东日华纱厂英、美烟厂工人，假大舞台演剧，到二千多人。开演时，警署干涉，当场被捕去三人，被殴伤的很多，由济难会送入医院诊治。

二月十五日

在天津举行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同时宣言将完成中国国民革命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

二月十六日

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开成立大会，到六十余团体的代表，议决：（一）电请广州国民政府北伐讨吴；（二）电请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会早日恢复，为民众政权而奋斗；（三）电促国民军一、二、三军团结抵抗奉、直军阀，并请冯玉祥出任指挥；（四）函请孙传芳启封浦口工会，并速照例发给津浦路南段工人花红；（五）追悼五卅前后为爱国运动被难烈士；（六）电请北京内阁废除《治安警察法》，速颁《工会条例》。

上海、南京两地非基督教同盟，联合发起组织全苏非基督教大同盟。

二月十七日

旅沪鄂人，因萧耀南死后，吴佩孚擅委陈嘉谟、杜锡钧继任军、民两长，极为愤激，特组织旅沪鄂省人民自治会，反对吴佩孚干涉鄂政。

二月十八日

开滦矿务局因煤料出产量过剩，命令停工事件，由唐之道调停，放还机车、列车若干辆，作运煤之用。矿务局当事人才允许即日开工。

驻京英公使，向北廷外长威吓，说孙科演说排英，粤政府煽动香港工潮，予英香港以绝大打击。现奉训令，向中政府质问，究竟是否有力制止粤方排英，否则英当代加重大教训，英国会亦已同意，预算对粤军费每日一百五十万，扣关余补偿。

二月十九日

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召集各直辖党部举行联席会议，计开会三日，其重要议决案有：接受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案；党葬为农民运动奋斗而死的周水平；大规模筹备总理纪念周；通电反对吴佩孚，电促国民军及孙传芳继续反奉，促国民政府北伐；援助香港罢工；促全省民众参加革命运动并打倒江苏绅阀；纠正蔡元培赞成联治主张

之错误；主张由本国银行界保管公债等各案。

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长刘少奇，前回湖南原籍养病，被赵恒惕拘捕，后经各地工会群起声援，赵以迫于民意执行释放，本日刘君回粤任原职，备受当地工人热烈的欢迎。

英公使照会北京外交部，抗议汕头市民反基督教运动，要求制止。

上海杨树浦东方纱厂弹花工人姜国文，因事偶与同事谈话，为包头及总管所见，即妄指为煽动行为，立即开除出厂，全厂工友，大抱不平。

二月二十日

安源萍矿工人汪先宗，前会主持安源工人团体事业，后安源发生工潮，汪因而失业，就回株州原籍，鼓励乡间农民从事团体活动。因此便遭一般土豪、劣绅之忌，诬告于当地团防局清乡队，并妄指为土匪，将他处以死刑。株州一带农民得此消息，为之痛哭流涕。

上海小沙渡内外棉纱厂第五厂一部分日、夜班工人，因厂方无故克扣工资而生交涉。后厂方终于照数补发。

自动下野的国民军领袖冯玉祥，电勸国民军将士：（一）真爱民；（二）爱纪律；（三）淡权利；（四）又希望各将士“抱定三民主义，以大无畏的精神，谋人民之幸福”。

二月二十一日

广东外交代表团对上海会审公廨越权判决华人男、女一百五十多人死刑，交当地中国军事机关分期枪毙事件，认为蹂躏中国主权，仇视中国人民，特向公使团提出严重抗议，并通电全国一致反对。

上海总工会宣言反英、驱吴、倒张。

上海反日出兵行动委员会通电反对英、日侵略。

全国学生总会宣言反对英人妄言对华用兵。

陕西肤施县国民党县党部通电各地党部，报告该地党员，因做反对基督教运动被县当局拘捕多人。

二月二十二日

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会召集东江各属行政大会，本日开幕于汕头，至三月三日闭幕。潮、梅、海、陆、丰各属行政长官及农、工、商、学、妇女等人民团体代表列席者一百二十四人。绥靖委员何应钦，行政委员周恩来，省党部及潮、梅特别委员会，对于军事、政治、党务三端，各市、县行政长官，对于各该地户口、财政、教育、交通、实业、治安之状况，各人民团体代表对于各该团体组织之宗旨及活动经过，均有

详细的说明和报告。通过议案计九十三件：建设议案，如治河、浚港、造林、筑堤之进行，省道、县道、街道之开辟；教育议案、如平民教育经费之增加，平民化及革命化的教育方案之确立；民政议案、如取消保卫团，整顿警务及划分行政司法之事权；财政议案、如捐税之整理及苛捐杂税之逐渐废除；商务议案、如提倡土货，增加洋货厘金，援助收回海关运动；农工议案、如发展农村平民教育，援助罢工工人及扶植农工团体；妇女议案、如禁止贩卖人口，提倡婚姻自由及援助妇女解放等等。最后通过宣言，列述该大会的意义、经过和希望。

上海浦东日华纱厂，十九日晚放工时，电气间工人被门口巡丁打伤，后经工会方面提出条件，派代表向该厂主抗议，得圆满解决。其条件为：（一）罚东洋人松尾工资洋廿元；（二）给受伤人停工期内工资及医药费；（三）向受伤人家属道歉；（四）以后巡丁不得殴打工人。

广州税务司英人卑路，得北京总务司英人安格联的训令，借口广州罢工委员会工商检验货物处取去未纳税货物，竟于二十二日停止开关，不准轮船出入粤口，广州黄埔全被封锁。全国各地闻讯，不胜愤激，纷纷召集市民大会，通电抗争，一致主张撤惩税务司，收回海关权。

二月二十三日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发表宣言，主张召集全省人民团体代表大会，处理该省一切政事。

上海江湾游民工厂，因更换管理员发生冲突，工人相率停工，厂方主请淞沪警察厅派警弹压并开排枪威吓，旋即照常上工。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为英公使对粤政府恫吓事件发表宣言，请全国人民一致抗英。

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发表时局宣言，主张：（一）反对吴佩孚进兵攻豫，并继续反抗奉系军阀；（二）反对帝国主义援助吴佩孚助长内乱；（三）赞助国民政府北伐与香港工人之罢工抗英；（四）反对英帝国主义封锁广州及一切对国民政府之压迫；（五）赞助国民军团结内部，一致讨伐吴佩孚、张作霖；（六）由全国民众作积极之奋斗与努力，于短时间内召集国民会议，以求国是之澈底解决。

二月二十四日

奉天本汉湖煤铁公司夜班矿工，因要求加薪，不准，一致罢工，后公司承认于十日内实行加薪。

上海日商上海纱厂第二厂布机间工人，因厂主无故毁坏工人雨具，并禁止工人在车间放衣服，工人相约关车停工，提出要求条件：（一）恢复下午三时的休息时间；（二）此后厂主不得禁止工人在车间放雨具及衣服。厂主完全承认。

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宣言誓死反对吴佩孚攻豫占鄂的举动，主张促成国民会议，组织国民中央政府，以实现民主政治。

二月二十五日

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广东农、工、商、军、学各团体，为援助省港罢工事件，特开大会，议决：自二月八日起一星期为援助罢工周，做各种援助罢工的运动，如举行大演讲、开游艺会、演电影等等，组织援助罢工周委员会积极进行；一面通电全国，一致在援助罢工周内作有力的援助。

上海纱厂总工会、印刷总工会、铁厂总工会、码头总工会代表联席会议，电勉广州国民政府，勿畏英人对粤用兵之恫吓，继续努力于反帝国主义运动。

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宣言，促民众讨吴佩孚、张作霖，仍以先总理所主张的国民会议为解决时局方针。

旅京湖北同乡开大会，议决驱逐吴佩孚的方法，组织驱吴委员会积极进行。

章太炎、徐固乡、黄大伟、龚振鹏等在上海组织反赤大联合，内容分军事宣传工人各部。

二月二十六日

粤税务司封锁粤海关事件，经国民政府严重交涉，并令罢工会纠察队将尚未纳税的货物交回税关。粤税务司失其借口，宣布启关，照常验货。

杭州旱烟公司，去腊因要求加薪罢工，经该地总商会召集店东、工人两方，竭力调解，决定每日增加工资七分，并协订遵守条件，由杭县知事会同警察厅出示布告，不得违背。

国民党浙江嘉兴县党部，召集第一次全县代表大会，到所属党部代表十二人，浙江出席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宣中华、浙江各县市党部代表孙尚侠都到会报告。

湖北教职员联合会发表省政治宣言，主张：（一）不承认由特殊势力所任命之督办省长；（二）组织市民团，监察卖省投降之民意机关；（三）召集各团体联席会议，同时宣布湖北省民自决；（四）由省议会、各县议会、各法团、各职业团体起草《省制大纲》，根据此大纲组织湖北人民政府。

广东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举行成立大会，同时为反对军阀联合及抗争粤海关税务司停止验货事件，举行示威大巡行，到国民党各级党部代表及工、农、商、学、军、政各界约五万余人，当场通过《上国民政府书》及致冯玉祥孙传芳电各一通。

二月二十七日

上海日华纱厂，因担任招工员的日本人违章致招生手女工，经在厂女工阻止，该日人竟以武力相待，工人愤而罢工，当场提出三个条件：（一）日本人不准打工

人；（二）添招女工要厂中工人代荐，不准洋人在门口滥招；（三）本日工资照发。

湖北妇女协会宣言驱吴，主张由真正人民团体代表会解决省政。

北京学生总会总工会等各团体，在天安门举行反英、讨吴示威大会，议决：（一）通电全国一致声讨吴佩孚；（二）通电全国援助广州革命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并实行与英、日经济绝交；（三）通电国民政府，促其出兵北伐，并以武力抵抗帝国主义封锁政策；（四）勉励国民军团结一致，始终与民众结合，打倒吴、张；（五）通电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一致反对英帝国主义；（六）通电孙传芳，促其讨吴，并不得压迫民众运动；（七）援助香港第二次大罢工；（八）请教育部封闭教会学校。

上海日商上海纱厂第三厂布机间工人，因厂方突令每人加管机车一具，并无端克扣工资等种种压迫，不堪忍受，全部关车停工，当〈场〉向厂方提出三条要求：（一）管车仍以两具为限，如增加一具，应于每匹布上增加工资二分半；（二）不准滥罚及滥扣工资；（三）开除虐待工人的管工日人段长次郎。厂方坚执不允，段长次郎横施辱骂，当被殴伤。后巡捕到厂，解散工人，并捕去工人。工人方面就再提出一个复工先决条件：（一）厂方须担保以后不准日人任意打骂工人；（二）立即释放被捕工人。

二月二十八日

南京举行反英市民大会，到者数万人，通过三个议案：（一）反对英国无理封锁粤海关，请国民政府严厉抗争；（二）援助上海总商会收回关税保管权，设立公库存储，并驱逐安格联；（三）反对吴佩孚联奉进攻国民军，并请国民政府北伐。

广东中山县发生全城大罢工风潮。原因由于石歧果栏行不遵农工厅命令，违背约章，滥抽栏用，并率众殴伤果业工会会员多人，中山县县长又不允拿办行凶行东。于是中山县总工会议决全城大罢工以为对待。后县长向各工会劝导，并担任代补伤费及缉拿凶犯，各工会认为目的已达，就通告开工。

□属新加坡华侨，因开会筹备中山逝世周年纪念，被当地政府拘捕到会华侨一百多人，封闭华侨所开学校十余所。当地华侨各团体，非常愤激，电求国内同胞加以援助。

革命日志

(一九二六年三月)

三月一日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电斥北京政府不应颁布《取缔非基督教运动命令》，请他自行取消。

鼓浪屿华民公会，对于清代由厦门地方官与驻厦领事团所订《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认为极不平等，有丧国权，主张实行修改，工部局董事应加入华人，会审公堂应立即收回。

奉天制麻公司五百多华工和大连机器制造所五十多华工，因反抗日人的压迫行为，一致罢工。南满制糖公司亦有波及。

三月二日

全国学生总会决议：（一）电北京政府颁三月十二日为国丧日，全国各学校一律停课志哀；（二）电北京政府追究英人在粤之锁港行为，撤惩总税务司；（三）通告各地学联，一律致电北京当局，反抗《取缔非基督教运动命令》，继续进行反击运动，肃清外人在华文化侵略的势力。

沪西日商内外棉第九纱厂织布间女工要求工场设置坐位，厂主不许，于是一致罢工。经该厂经理巧言诱劝，并将被指为煽惑风潮的女工开除，风潮遂平息。

三月三日

全国非基督教大同盟，为段政府明令取缔非教运动，特通电各省非基督教同盟及各团体，谓段氏甘心做帝国主义者之走狗，当一致声讨。

革命党人胡兰山、蔡珊二氏，因演说被上海租界捕房拘捕，解送中国军警机关严办。中国济难会为此函请各界，协力援助；一面忠告本国官厅，勿中外人陷害爱国同胞的毒计。

上海总工会为援助粤港罢工工人起见，发起粤港罢工工人援助周，定三日到十日为援助期，特请就地各团体一致加入进行。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致电北京政府，请将去年上海总工会所拟《工会条例》速予宣布，并通飭各地工界参加本届国际劳动节。

中国国民党湖北省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发表对省政主张：（一）集中各派势力，打倒直系军阀；（二）反对选举任何军阀的工具当湖北省长；（三）否认湖北省议会的存在；（四）准备召集全省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委员制的省政府。

三月四日

云南旅外学界联合会，发表对于云南省政府的宣言，内容分三条：（一）中国及云南政治之背景，历述辛亥革命后，时局转变中人民的失望，并由此失望而得到之种种教训；（二）云南社会的破产，说明云南社会紊乱的原因，系由于连年向外用兵所致；（三）人民今后的努力和本会的使命，谓我们此后必须全体民众结合起来，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三月五日

宁波学生联合会通电反对吴、张联合攻豫及英国对华武力进攻计划，并电请国民政府北伐驱吴，请冯玉祥出山讨奉。

广东济难总会开成立大会，到工、兵、商、学各界万余人，其口号为：（一）反对白色恐怖；（二）反对统治阶级屠杀革命的被压迫者，救济一切为解放运动而牺牲的人们；（三）全国被压迫民众一齐联合起来，加入帮助革命的济难会；（四）中国济难会万岁！被压迫民族解放万岁！

三月六日

中国国民党浙江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六日在杭州开幕，会期五日，到十三县、市代表三十一人，通过完全接受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全省党务进行计划等十余案；选举宣中华等为执行委员，查人伟等为监察委员。

三月七日

旅沪苏、皖、湘、鄂、赣五省公民联合会，发表对时局宣言，痛斥军阀祸国之罪，主张实行平民革命。

福州学生联合会因努力救国运动为闽督周荫人所忌，竟下令封闭，并逮捕该会委员长翁良毓等五人，判以五月有期徒刑。

三月八日

各地妇女团体，多于今日举行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

中国国民党上海女党员大会发出对时局通电，略谓：卖国军阀窃据上枢之时，应以实力赞助国民军，反奉讨吴，并督促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奠定中原，俾列强帝国主义者失一依据。

无锡申新布厂工人因厂方迟发工资，领班陆某又出言不逊，被工人殴打成伤，激成全体罢工风潮。后因军政当局严加压迫，指名拘捕。工人方面见环境不好，十八日照常开工。

三月九日

上海日商东亚麻袋厂男女工人六百余，因不满意该厂主无理开除工人，一致罢工。后厂方允诺于两星期内筹一圆满办法。

三月十二日

今日为中国国民党故总理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忌日，全国各地民众及侨居国外同胞都举行悲壮的追悼会或纪念会。各地国民党部，并乘机公开征求党员，加入的非常踊跃。同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南京紫金山孙公葬地举行陵墓奠基礼，北京党部在京举行孙公铜像奠基礼，各地党部多派代表前去参加。

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举行恢复后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二百多团体的代表，当场通过宣言：首述中山先生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为人民解除压迫的唯一途径；次述该会组成、停顿、恢复的经过；末谓该会领导全上海的民众，一致戮力以促成国民会议，与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相抗，实现民主政治。

驻守大沽口炮台的国民军，为防御奉军舰队，保护天津起见，在大沽口埋设地雷，实行封锁。十二日午后，塘沽有日本驱逐舰二艘，驰驶入口，守兵疑系奉舰，因发空枪，令停进候查；日舰突用机关枪还击，守兵更疑，乃以实弹还击，日舰才退，两方各有受伤。事后日公使竟援引《辛丑条约》严重抗议，并约同各条约国联合提出最后通牒，北京政府完全屈服。全国民众得此消息后，非常愤激，认日舰此种行动，显系帮助奉、张作战，助长中国内乱，纷纷通电政府当局及全国同胞，一致抗争。

汕头邮差，因邮局长拒绝参加中山周年纪念会的要求，愤而罢工。后经市长调停，邮差提出要求：（一）赔偿薪工损失费；（二）承认邮差成立工会；（三）邮局备函请各工友复工。经局长完全承认，十五日即复工。

英、美、法、日各帝国主义旅沪侨民，近因反对共产主义宣传运动，特组织赤化防止会，今日各国会员，分别举行反赤演讲会。

三月十三日

上海英商怡和纱厂工人，因厂方不允参加孙中山周年纪念，发生冲突，相率罢工的约一千五百多人。后经调解，次日即告平息。

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南京市党部及国立中山大学南京分校附属中学等，对于此次为举行国民党总理陵墓奠基礼到宁的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代表开一欢迎大会，当场并通过请中央党部发表宣言：报告各地反动派及右派分子捣乱情形；声明各地孙文

主义学会与党不生关系，并认葬事筹备处有扶植右派分子嫌疑，应即改组。

三月十四日

上海全体邮差因邮局突令增加工作时间，一致否认，并向当局提出要求条件，限二十四小时内圆满答复，否则罢工。条件如下：（一）工作时间恢复原状，不得过八小时；（二）履行上次复工条件；（三）确定告假日数，病假不得扣工资，官医亦须由工会聘定；（四）存款及保证金，不论因何故离局时，均应立刻发还。适此时邮务长福森不在沪上，经邮务公会代表与代理邮务长及副邮务长磋商，结果：暂不增加工作时间，其余条件等正邮务长回沪再行交涉。

中国济难会，对厦门外交后援会职员林云影，因林仲馥案被诬判决死刑事，议决联合各团体，设法营救。

南浔铁路工会，电请政府速颁《劳工法》。

三月十五日

广州国民政府政治委员会通过《两广统一案》，内容：（一）广西省政府受国民政府命令，处理全省政务；（二）广西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三）两粤财政受国民政府指挥监督。李宗仁、黄绍雄通电赞成。

天津四万多市民，为抗争大沽案开紧急大会，通过通电，并决议继续抵制英日货。

三月十六日

苏州木机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不遂，全体罢工，当提出条件两项：（一）照原有工资增加二成；（二）将海尺取消，一律改为平尺。十八日劳资各派代表合商，议决解决条件，十九日全体复工。

国民政府下令，对参加上海所开之伪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者，按名通缉。

三月十七日

上海各团体联合会电请冯玉祥即日出山，统率北方健儿，讨伐吴、张。

上海总工会电恳政府外崇国誉，内念工艰，迅颁一适合于全体工人要求的《工会条例》。又电外交部反对列强为大沽事件，挟持《辛丑条约》，干我内政。

三月十八日

北京各团体，因大沽交涉，迫于眉睫，特于十七日下午召集紧急代表会议，表决分两组到执政府外交部，警告勿被各国屈服，驳复照会。其一组到府，衙队持械驱逐，当〈场〉被刺刀刺伤多人。十八日晨，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到二千多人，议决向执政府提出说帖五项：（一）撤退府卫队；（二）请段下野，组国民政府；（三）联德、俄、奥打倒帝国主义；（四）废《辛丑条约》；（五）限八国公使出京。会毕游行示威，午后，向执政府请愿，府卫队突然开枪，学生及各团体代表当场死二十多人，伤者不计

其数。到十九日下午止，查得死者已达五十三人，伤者百余。事后段祺瑞仍主严办，由章士钊起草，借口共产党，下令拿办民众领袖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等。全国各地闻耗，纷纷开会追悼，积极应援，一致以惩办段祺瑞、废除《辛丑条约》为目标，做大规模之群众运动。

上海金银工会，因庆云银楼以细故开除学徒，经该楼工人群起反抗无效，特于今日通告全埠同业，一致罢工援助，提出下列要求：（一）恢复被开除学徒工作；（二）工资应规定每月十元至十五元；（三）夜工每小时工资三角；（四）星期日休息；（五）不得因此次工潮开除工人；（六）不得扣罢工期内工资。坚持五日，始达目的。

上海各团体联合会，为抗争大沽事件召集各团体代表大会，决议举行市民大会，做强大的反抗运动，并发表宣言通电，唤起国人一致努力于废约运动。

嘉兴铜作工人，因要求作主履行增加工资原约，一律罢工。

三月十九日

上海商务印书馆无故开除工人，在馆全体工人，大抱不平，酝酿罢工。后由该馆工会派代表出任交涉，馆方完全承认工人的要求。

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召集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会期四日，到会代表四十余人，代表党员一千七百余，议决统一运动、工人运动、农民组织、妇女运动、参加民团、青年商民运动、党务进行发展组织等案，并通电反对奉、直联合。

杭州机织工人，因生计艰难，要求加薪，劳资谈判决裂，就全体同盟罢工，提出增加工资，承认工会，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及其他关于改善待遇的条件十八项。相持七日，最后由绸业会馆大会宣布铁机、木机、绸缎、纱绢一律酌加工资，风潮始息。

三月二十日

反奉战争难获胜利，国民军将领应和平会议的劝告，通电撤兵议和。

广州国民政府因中山舰未得政府命令，擅自升火移动，认为违犯纪律，当即派军登舰缴械，并将各嫌疑人扣留。此事发生后，香港英帝国主义者及国内一切反革命派乘机制造谣言，说是共产派破坏国民政府的阴谋败露；又说是国民党排斥共产派之实现。但是不过几日，就查明中山舰的异动，实为混在革命阵线上的反动分子之捏造伪命所诱骗。此事的真相，于是大白！被扣留的嫌疑人，一律释放。

三月二十一日

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各级党部，谓本党少数叛徒在沪召集伪代表会，已训令国民政府严切制止。

三月二十二日

上海老怡和纱厂女工陆金妹，夜半到老虎灶泡饭，致所管车上略断数纱头，厂方

就将伊开除。其他工人对此都抱不平，当推代表交涉，无效。次日厂方又无故开除女工三人。全厂工人大愤，一律罢工，后经工、学团体竭力调停，方得解决。

三月二十三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通电表示对北京惨案的主张，内有“即日将段祺瑞逮捕，依法审判，本会愿率全国工人，一致奋斗”等语。

三月二十四日

上海学生联合会议决罢课四天，对北京惨案作大规模的宣传，使各界齐心援助。

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各团体联合会等先后通电援助新加坡为纪念孙中山被英政府拘捕的华侨。

三月二十五日

天津总工会突被李景林封闭，上海总工会通电声援。

三月二十七日

广州国民政府为北京惨案发表宣言，主张全国人民及与人民合作之军队，一致驱除段祺瑞及一切卖国军阀，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

三月二十九日

国民党反对分子张继、谢持、邹鲁、沈定一等所召集的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今日在上海法租界开幕。

无锡铁路驳货各船伙友一百余人，因要求增加工资未遂，全体罢工。推代表与船主接洽，得满意结果而复工。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召集全体党员大会到一千人，议决：（一）接受总理遗训，联合世界革命先进之苏俄及集合国内一切革命分子，始终拥护在广州举行之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所产生之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民政府，并始终反对非法之西山会议、上海之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所召集之伪代表大会；（二）对于广州发现反动派混入革命阵线，行使捣乱破坏的阴谋，以图推倒省港罢工委员会，而与香港政府妥协，不胜其愤恨，主张严厉肃清一切反动分子。

第五号

(世界革命号)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版)

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陈独秀

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都以为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该由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做，不应该接受外力即苏俄的援助。他们的理论仿佛是一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中若夹杂了外力，便失了独立性，所谓独立便名不称实了。

他们这种形式的逻辑、这种关门革命的方法，表面上好像是他们的民族主义更高调些，他们的独立运动更彻底些。可是实际上，若是用他们这样独立的方法，想达到独立之目的，真算是缘木求鱼！他们不是民族主义而是闭关主义，他们不是独立运动而是孤立运动。照他们的方法，关起门来做中国一民族的独立运动，拒绝全世界的同情、援助，使中国一民族完全站在孤立无助的地位，此诚为我们的敌人——国际帝国主义之所喜，而陷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于更孤危、更险阻的困境中。

法国《巴黎晨报》曾说：“英、法、日、美应联合压迫中国，恢复国内秩序，以免赤俄在亚洲势力膨胀，否则莫斯科从中援助之亚洲民族自由运动将发展到中国。”可见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的计划有国际的联合，而中国的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却反对中国民族运动有国际的援助。又可见帝国主义者早已料到外力援助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对于他们的危险，而中国的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却正是专门拼命反对中国民族运动接受莫斯科的援助。这真巧极了，帝国主义者应该如何感谢他们（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

他们以为接受外力援助有损独立精神，他们忘记了美国独立战争中接受了不少的法国援助。他们更忘记了现代国际帝国主义所造成之整个的世界革命状况，和前代各国各自革命状况更大不相同。

现代资本制度已发达到最高形式——统一世界之财政资本主义，即国际帝国主义。

因此，全世界的经济成了整个的，全世界政治也直接、间接在这整个的经济影响支配之下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统治者、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成了整个的，全世界被统治者、被压迫者（工农阶级及弱小民族）对于统治者压迫者之反抗，也汇合起来成了整个的世界革命。各处弱小民族及被压迫国家的解放运动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农阶级解放运动，都是这整个的世界革命运动之一部分，而有相互的密切关系。因为现在已经是二十世纪之第二十六年，已经是对于资本主义造成的革命对象——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革命时代，而不是十八世纪各国各自对于本国统治阶级革命的时代了。

在此整个的世界革命时代，任何国家的革命运动，任何属性的革命运动——阶级的或民族的，都不是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所想象之一国家一民族关起门来独立革命可以得到成功的。

这还是理论一方面，现在再说事实。俄国十月革命总算是最成功的了，然而革命的军事终了后，仍然要对小资产阶级让步，仍然要受帝国主义不断的威吓。英国屡欲用兵力压迫苏俄，都因为英国工人反对及各殖民地革命运动之兴起而作罢。最近洛迦诺会议中进攻苏俄之密谋方定，而英国大罢工突起，势不得不暂时停顿。土耳其民族革命之成功，不用说是因为有苏俄很大的援助。土耳其的民族革命总算成功了，基玛尔居然趾高气扬地杀戮共产党了，并且想离开苏俄了。殊不知英、法两帝国主义还未倒，他们仍旧向土耳其夹攻，尤其是最近英国抢夺莫塞尔，于是基玛尔再回向苏俄。中国及波斯在俄皇时代所失各种权利，若不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如何能够收回？去年中国五卅运动初起，英、法、德美各国的资产阶级的政党及其政府，一致宣传中国五卅运动是义和团一类的排外运动，嗣因英、法、德、美、俄、日本的工人及其政党纷起援助，才不便这样宣传。中国的五卅运动，因为有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人同情、援助，使各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提出他们久已忘记了的关税会议来敷衍中国人。并且英国帝国主义者因为恐怕中国五卅运动引起印度人的觉悟，也拿出一点小小让步，和缓印度资产阶级的感情。现今弥漫全世界之民族独立运动，如欧洲之墨西托尼亚、皮沙拉比亚、布哥维那、西里西亚、克洛西亚等，如亚洲之波斯、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阿富汗、爪哇、中国、印度、高丽等，如非洲之摩洛哥、埃及、阿尔及利亚等，莫不有苏俄之后援。最近摩洛哥中悲壮震动全球的里夫民族之失败，《巴黎晨报》说：“阿白杜尔克林之降，可使俄、德不复抱法国必败于摩洛哥之梦想，法国虽死一百万人，然终能一再表示其自卫之能力，阿白杜尔克林固可依恃法国之恩慈，但宽恕非忘却前事之解，阿氏与布尔希维克及日耳曼之接洽，法人不能忘也。”小小的里夫民族，为数不及一百万，军队只六万五千，前曾击破西班牙十万大兵，继又和法国苦

战一年有余，今虽不幸失败，其所加于法国之损失如此之大，此固由于摩洛哥人勇敢善战，而俄、德、法各国共产党人援助之力亦不小，《巴黎晨报》只说法国不能忘阿氏与俄、德之接洽，却不肯说出阿氏更与它自己国中“不爱国”的法国共产党接洽也。

依据这些事实，现代整个的世界革命运动中各部分相互关系之密切，已非常明显。

现在，我们再研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和世界革命之关系是怎样。

中国是英、美、法、日、意、比等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掠夺的市场，而不是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所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第一个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而不仅仅是哪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第二个对象是国内军阀，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者用作掠夺中国利益、压制中国民众之工具。所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必须是由集中民众的组织，民众取得武装，解除军阀的武装，一直到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之胜利，才能够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

中国现有的直、奉两系军阀，只要有一系存在，都是民众的大敌，都是束缚民族解放运动之万钧锁链。国内军阀比起英、美、法、日任何一个帝国主义的力量来，却只是九牛之一毛，何况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那更是大莫与京。所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但高等华人之友谊的磋商和资产阶级之和平要求等于痴人说梦。即令有困苦的革命争斗，这种争斗，若不得到苏俄及全世界无产阶级有力的援助，使这争斗能成为长期的一直到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汇合起来，完成整个的世界革命，也是不会完全成功的。

那么，或者有人以为反正中国的民族解放，非到世界革命实现不会成功，待到世界革命实现了，国际帝国主义覆灭了，中国问题也自然解决了，现在中国民族便无须努力作这不必要的革命争斗。这种见解非常之错。

不但在主观上，世界革命是世界各民族中革命民众之共同义务，任何革命民众，都不能取这种机会主义的可耻态度。并且在客观上，被压迫国家、弱小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二者汇合起来，才能根本推翻国际帝国主义，才能成就整个的世界革命，譬如一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我们若坐待世界革命机会之到来，而自己不努力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争斗，使帝国主义者得集其全力以镇压其本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则我们所坐待之机会，或至永远不会到来。所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固然不应如国家主义者所主张，关起门来独立革命，也不应如机会主义者主张我们自己不必努力，只坐待世界革命之到来。在实际的历史现象上，全世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高潮，也是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在相互影响中平流并进。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所共同征服的国家，自然不能幻想马上就会有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的胜利之可能。但我们在这世界革命高潮中之可能的责任，

是不断地努力、不断地争斗、不断地摇动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不断地和帝国主义者争夺中国现有的武装——尚未为帝国主义者所有的武装，如冯玉祥、唐生智等军队，甚至于已为帝国主义者所有的武装，如直、奉两系军队——不断地扩张民众的武装，如民团、商团、红枪会、农民自卫团、工人自卫团、工人纠察队、学生军等。经过这样的长期努力与争斗，才能够解除军阀的武装，才有联合别的被压迫国家如苏俄等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之可能。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摇动一分，它们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潮即高涨一分。中国民众的武装及接近民众的武装扩张一分，军阀的势力即削弱一分，亦即中国民众和帝国主义武装冲突之期接近一分。如此长期争斗之结果，再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汇合起来，才能够根本推翻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才能够实现世界革命，才能够使中国民族得到完全的解放。

在政治上，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共同征服的国家；在经济上，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共同掠夺的市场，不根本推翻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中国民族不会有完全解放之可能。因此，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背景及其必然的途径，可称为一切民族解放和世界革命关系之模范的说明。

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关门革命的方法，固然不合实际。有些国民党左派，自以为赞成世界革命表示特别激进，其实这并不算什么特别激进。中国民族革命，只是整个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赞成世界革命的人无有不赞成中国民族革命。尽力中国民族革命的人也应该尽力世界革命，尽力世界革命即是尽力中国民族革命，这两件事是很难分开的，因为这两个革命的对象只是一个：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

中国的民族革命者，不但要尽力世界革命，并且要努力研究世界革命的现状及其趋势。换句话说，就是不但要懂得本国的真实状况，即其历史发展到了什么阶段，并且要懂得世界的真实状况，即其历史发展到了什么阶段，更要懂得本国和所处的世界之革命的关系是怎样一种形势。懂得了这些，然后所定革命的策略及行动，才适合实际，才不至于落后或空想。

现在已经不是闭关时代了，世界各部分的革命运动，因为相互影响之关系日渐密切，已成为整个的不能分开了，凡是一个民族革命者，头脑中若没有一个世界革命形势之具体的图画，并且时常检查这图画中是否有错误而加以改正，则口中虽说赞成世界革命，实际上仍旧是关门革命。

一九二六·五·三〇

世界的及中国的赤化与反赤之斗争

瞿秋白

(一) 国际赤化的前途

“赤化就是过激，就是洪水猛兽”——这是通常中国人对于赤化的解释。其实，赤化不过表现革命的象征，并且不限于社会革命，不一定指共产党而言。自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而发生一切种种革命运动以来，赤色早已在法国大革命时便成了革命的标志。不过，因为二十世纪资产阶级独裁制战胜，列强各国资本主义已经进于帝国主义，当初反抗贵族的“第三阶级”（资产阶级是他的领袖），早已从革命的、赤色的，完全变成反革命的、白色的了。于是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开始世界社会革命的第一声霹雳，重新展开革命的赤帜。现时的赤化，也许完全指社会革命而言。但是，世界社会革命的过程里，包含着弱小民族的国民革命在内。国民革命的世界的意义，固然是世界社会革命之不可分隔的一部分。然而就各殖民地本国而论，这种国民革命的职任，并非直接的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造，它的性质始终带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色彩，它的切近的目的是在推翻种种变相的封建制度宗法社会，打倒外国的资产阶级而解放资产阶级的本国。所以现时的赤化，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就简直等于国民革命的意义。

世界的赤化运动，就是包含列强无产阶级革命和弱小民族国民革命的世界革命运动。如果恐惧赤化而反对赤化，便是要保持列强帝国主义对于世界各国平民的统治，要拥护弱小民族内的军阀以及其他种种帝国主义工具的统治。中国民众究竟要这种统治的存在，还是要赤化呢？我想，这个答案是异常明了的。

列强资产阶级发展到欧战时代，已经完全暴露自己的弱点——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资本和政权集中于少数财阀手里，列强的互相倾轧、战争。大多数人民，从列强的无产阶级、农民、一般劳动民众，如中等阶级智识阶级甚至于小商人，一直到弱小民族的全体平民，都处于受治的地位，日益破产、失业、穷困。同时，机器生产已有充分的发展，生产、分配、交通等机关已非社会公有则不能往下发展，而一切重要的生产资料都集中于大资产阶级手里，他们掌握着世界人类的政治的、经济的生命。

于是社会革命乃不得不爆发，这一革命开始于帝国主义战线最不巩固、资产阶级统治最脆弱的俄国。

世界的资产阶级统治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独裁制已经在俄国推翻，无产阶级独裁制居然成立。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俄国），居然开始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崩败，在欧战后的欧洲，已经是日落千丈。所以，十月革命之后，世界的阶级斗争便日趋于异常激烈的形式。一方面是各国无产阶级，除夺取政权外别无可以解放人类、改善经济之道。尤其是在社会革命第一高潮中（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德、奥、匈、法、英、美、日工人大骚动时，资产阶级假意让了些步，实行了些欺人的社会政策，以后不到两年，资产阶级便不得不重新进攻。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化——赤化，便更加深入，差不多已将民众的改良和平的幻想，完全消灭了。另一方面，列强资产阶级，已经不得不抛弃其初兴时用以反抗贵族的民权主义，揭开一切和平、改良、民主、共和等类的假面，以极残暴的战争屠杀政策来压迫无产阶级，互相勾结联络以镇压一切革命运动，力求苟延垂死时的残喘。欧战后经济生活的国际化，英、美、法、日大资本家的操纵世界经济，各国资产阶级的新式神圣同盟（国际联盟）成立，列强联合压迫苏联，侵略德国以及镇压、榨取殖民地，……凡此一切，都很明显地表现资产阶级之阶级斗争的国际化。同时，各国无产阶级的联合，也抛弃第二国际时代的不彻底政策（各国社会党的爱国主义），国际革命的运动得到充分的政治觉悟之组织上的表现——第三共产国际的形成。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一九一八年德、奥、匈、芬兰的革命以及一九二三年德国、布加利亚的革命，都很自然地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响应。无产阶级胜利的国家，如俄罗斯、乌克兰等，并且组织成巩固的联邦国家——苏联，……凡此一切，又都表现无产阶级之阶级斗争的国际化。

世界革命时期，已由十月革命开始。这种过程里的阶级斗争，实在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残酷形式。列强资产阶级统治的崩败，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所以他们不能再用欺罔平民的“民权主义”，做压榨、剥削劳动民众的工具，而必须实行卑劣、残狠的种种压迫手段。列强资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之初，勾结俄国白党军阀，想征服这一劳农国家。白党本不仅是俄国哥尔察克等的徽号，而是国际资产阶级的尊称。这些白党在俄国残、杀、屠宰民众的情形，当初或许有人还以为是赤党张大其辞，如今五卅时普遍中国的帝国主义大屠杀和五卅后帝国主义指使张宗昌等雇用俄国白党，来残杀、掠夺、奸淫中国直、鲁等省的人民，都是铁一样的事实，中国人已经亲身受到，无可再怀疑的了。其他各国如意大利等，更发生法西斯的运动。最近法西斯式的团体，如美国的三K党，以及希腊、波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匈、奥、罗马尼亚、布加利亚，甚至英国，到处都有。法西斯（《东方杂志》所谓“棒喝团”），本是资本

家雇用的流氓、打手，初发生时不过像中国上海等处的“工贼”，专以捣毁工会和工党报馆，暗杀工人领袖，从事于“反赤的械斗”等等为天职。当然这种流氓团体所反对的并不限于工人，对于一切革命派都是如此，只要能破坏革命运动的手段他们便用。如俄国一九〇五年时的“反犹太暴行”及布加利亚的“反农民残杀”等。总而言之，法西斯三 K 党等类的团体，当初不过是像上海中外当局及资本家所雇流氓打手章炳麟、马育航（反赤会）等类的家伙，“工贼”“农贼”等名词都嫌太狭，我们不如叫他“民贼党”。资产阶级最初不过偶尔用用他们，“以济宪法、刑律、警察、军队、监狱之穷”，有时资产阶级政府还假意禁止他们。但是，现在局面变了，以前是“民权主义”为剥削劳动的主要工具，而“民贼主义”是副工具。如今却要以民贼主义为主要工具，而民权主义成了偶然使用的工具了。民贼主义——反赤的白祸主义（White Terror），于今时运亨通，世界上已经有五国由这种民贼党执政：意大利、西班牙、希腊、波兰、葡萄牙（五月卅一日路透电盛称葡萄牙法西斯将军柯斯泰氏，谓此次“革命”……“正以救国”）。资产阶级独裁制已经露骨地表现出来，简直以公开的屠杀政策统治民众，丝毫“民权主义”的假面具都不用戴了。至于资产阶级不假手于民贼党，而自己公开地直接地行使屠杀政策，如去年英国的巡捕及陆战队，美、意、日、法的水兵实行五卅屠杀，法国军队征服摩洛哥，屠杀叙利亚人等，更可不用解说。总之，这种国际的白祸运动正在方兴未艾。

国际的白党——资产阶级，行施如此激烈凶猛的屠杀政治以反对赤化，是否能巩固自己的地位呢？他们如果还有些许可能，他们必然要用“民权主义”“文明主义”掩饰自己的真面目。他们用到这种公开的政策，正足以证明他们灭亡的渐近，这是困兽之斗罢了。国际的赤化运动也正在深入广出地发展。因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崩败，无产阶级不但感受异常的困苦，不能不反抗，并且渐渐觉悟到夺取政权的必要。因为国际白党——资产阶级及“民贼”的屠杀压迫，无产阶级更加团结，更加趋向于反对资本的统一战线。因为改良政策完全暴露欺罔工人的实质，无产阶级的革命化，更加急遽。例如英国工会里左派的发生，法国工人的反摩洛哥战争示威，瑞典工人的反对黄色职工国际，意大利、西班牙工人的反法西斯运动，日本的无产政党运动，英国最近的工党运动及农民运动以及苏联政治经济上的日益巩固，都是实例。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社会革命运动，在现时已经实际地联合各国破产失业的农民，甚至于中等的技术智识阶级（智力劳动者）。并且欧战后的各殖民地上，无产阶级发展，农民破产穷迫的过程异常之迅速急遽，他们的赤化非常之明显，甚至于资产阶级也略略形成。而对于帝国主义者立于对抗派（Opposition）的地位，列强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引起各殖民地国民革命的怒潮。固然，美国资本主义比较稳定，欧战后它的发展更占领世界经济

的霸权，因为它的道威斯计划和黄色的机会主义（社会党的妥协派）合作，而暂时镇定世界革命的第一高潮（一九二三年德国十月革命失败之后），于是发生所谓“资本主义相对稳定（Stabilisation）”的一时期。然而，不满一年半，世界革命的第二高潮又起。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虽然是帝国主义大屠杀的一年，同时也是世界革命运动重新开始的一年。中国的五卅运动打破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稳定”：摩洛哥战争，叙利亚革命，印度发生革命的大罢工，埃及独立党的强盛，美国无烟煤矿的大罢工，英国最近的总同盟罢工，日本工人运动的陆续爆发，德国、波兰等的失业工人示威……总之，国际赤化运动的大发展，联合国际无产阶级、农民以及殖民地弱小民族，已经建立了极广大的反帝国主义战线。

国际的白党在世界政治上屡次联合起来，想扑灭国际的赤化：十月革命后的国际联盟，曾经征集十八国联军，勾结俄国白党军阀，攻打苏联，结果是失败了；他们指挥各国政府封锁苏联，结果也失败了；他们又召集华盛顿会议扼制中国的革命运动，而以假意的改良政策哄骗高等华人，却不能制止中国的赤化。随后，他们的葛奴亚会议既不能屈服社会主义的苏俄，他们的洛桑会议更不能制服赤化的土耳其。最近，国际的白党又在订定什么《洛迦诺保安条约》，想以白色军事同盟威吓苏联（看《新青年》第三、四号）。可是，这一计划又失败了！向来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反动民贼的联合战线是不能巩固的，因为他们之间自己有不少矛盾冲突。洛迦诺会议（去年十月）之后，不过五月，他们吸引德国加入反赤军事联盟的计划，便引起法、意、英、美的大冲突，今年三月的日内瓦国际联盟会议上，终致于破裂。同时，苏俄和土耳其已经结了军事防御同盟，和德国（三月间）也订立互守中立的条约，最近苏联又与波斯订立了同盟，蒙古及中国国民政府事实上也早已在这赤化同盟之中。赤化同盟之中的无产阶级国家，没有丝毫客观上的理由，可以和自己的同盟国冲突，这一世界政治上的结合，实在有很大的力量。

国际的赤化同盟和反赤同盟国家之斗争，实际上完全是阶级的斗争。现时的世界大势，可以用一句话包括它，便是：一方面，赤化的各国无产阶级、农民、殖民地弱小民族中的一切被压迫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苏俄之联合战线；另一方面，白化的欧美、日本资本家和种种式式法西斯派的民贼党之联合战线。这两方面的剧烈斗争，便造成现时的国际形势。第三共产国际便是一切赤化阶级的世界结合，国际联盟便是一切白化阶级的世界结合。戴季陶先生认国际联盟是“横断国际”，意思便是以民族或国家为单位而结合的国际组织。其实大谬不然。国际联盟所代表的，并非英、法、美、日等国民族的结合，乃只是英、法、美、日、意等国保守党、自由党、民主党、共和党、法西斯党、民贼党的国际联合。换句话说，便是国际资产阶级的结合，它也是“纵断

国际”——即以阶级为单位而结合的国际组织。欧美革命的工人和平民都在反对这种“国际”，最明显的便是英国去年工会大会反对道威斯计划及英国殖民政策。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还不止此，它联合世界各地的反帝国主义革命运动，如中国的国民党和蒙古、土耳其等的国民革命党，虽在第三国际之外，实际上也必然站在第三国际领导的战线之上。这双方的斗争里，赤化同盟有很大的力量，正因为它是大多数人类民众的结合，它的国际政治上的表现，虽则不过俄、德、土、波、华、蒙等国的外交同盟；可是它的社会上的后援军，却是各国被压迫的大多数人民，它的革命组织却是伟大的共产国际。国际的赤、白斗争中，赤化势力始终占着充分的优势。白化是什么？是屠杀，是掠夺，是帝国主义。赤化是什么？是反抗，是解放，是世界革命。白化所代表的，至多不过列强大资本家两三万人的利益。赤化所代表的，却是各国无产阶级及一般被压迫民众，几十万万人的利益。这双方的斗争，在军事、外交上的表现：一方面是洛迦诺的新式神圣同盟，另一方面便是俄、德、土、波（波斯）的军事防御同盟。在社会政治上的表现：一方面是国际联盟内各国资产阶级的白祸政策，另一方面便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各国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的赤化运动。几百年来驯服的平民群众，如今有了政治上的团结。资本主义末期的资产阶级，经济上不断的崩败，都必然引导到赤化运动的最终胜利。最近世界革命之第二高潮虽然又受挫折，如英国总罢工的散乱、摩洛哥失败、中国五卅运动受摧残……然而各国一般民众的革命化，只有因此而更加增长，最后的决死的斗争渐渐到来，国际无产阶级始终将实行解放人类的使命！

（二）帝国主义之续命汤

国际的白党，受赤化怒潮的打击，早已根本动摇它的统治。国际资产阶级内部既有种种矛盾冲突，而国际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的一切被压迫阶级又有结成伟大的革命同盟之可能，资产阶级之死灭本是非常之快的事。但是，十月革命之后，欧美、日本资产阶级居然能继续存在到如今，差不多十年了。这是什么缘故？

原来，赤白战争之中，白党正在日暮途穷危迫万分之际，“忽地”舞台上跳出一位“黄色大将”，暂时救了他的命，这位“黄色大将”是谁？便是所谓社会党的机会主义的妥协派。德、奥、比等的社会民主党，法国、意大利的社会党，英国的劳动党，尤其是美国刚伯思派的工会以及各国的黄色工会，都是帝国主义的续命汤。

革命怒潮高涨的时候，反动派必然想法从革命派内部捣乱，赞助改良主义的倾向，破坏革命民众的联合战线。这是社会学上的公律，中西一致的，无产阶级革命中是如此，国民革命中也是如此。欧、美社会党里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妥协主义、修正

主义等)，在欧战前便早已发生。这种现象的经济上的原因：便是各国资本主义向外侵略，掠夺殖民地，变成帝国主义；列强国内的经济条件早已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可能，资产阶级为要救济这种“危局”起见，便将殖民地上掠夺所得，略略分润于高等的工人（造成所谓劳工贵族）。于是社会党里便发生机会主义的修正派，代表这种劳动贵族的心理。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发展使民众无产阶级化而日益穷困。修正派却说：资本主义发展使工人生活程度提高，工资也加了，待遇也好了，《工厂法》也实行了，工会也被承认了，工人选举权也日益扩大了……如此，渐渐进化便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用不着革命。这些修正派，只看见极小一部分机器工人享着了这种“优待”；大部分无产阶级日益穷困，他们便不看见了。至于中国、印度及一切殖民地几十万万的民众，日益无产阶级化，日益穷困，在不堪言状的残酷的奴隶制度之下工作和生活，他们更是不管。所以机会主义派便赞助“自己的”资产阶级之殖民政策，甚至于赞助帝国主义的战争。欧战前，世界革命的危机没有十分迫切，资产阶级还不一定要用他们，所以“社会主义的面目”总算勉强保持到一九一四年。等到欧战到来，社会党已经破产，争起赞助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战争。随后，十月的世界革命爆发于俄国——资产阶级更急急收抚他们。于是机会主义便大大猖獗起来，一切社会主义的假面具都揭破了。

资产阶级的“纯白”统治、压迫屠杀等类的政策，在革命高潮的时候，色彩太浓，不但不能镇压革命，反而是激励革命，所以他们极端欢迎社会党的黄色机会主义来和他们解围。机会主义派仿佛还是社会党，还是工会领袖，他们的“劝告”民众，比资产阶级的直接压迫有效得多。他们的改良政策口大足以缓和革命，保持资产阶级实际的权力。因此，欧战之后，德国发现了几次社会民主党的政府，法国实现了社会党占势力的“左派”联立政府，英国经过了一期的劳动党（工党）政府。这些机会主义派的黄色政策，实际上维持住了资产阶级的白色统治。等到白色统治巩固了，这些黄色党人也就“狡兔死，走狗烹”，一切黄色改良政策更是消灭得无影无踪。一九一九年华盛顿之国际联盟的劳资会议，受机会主义派的赞助，表现上通过八小时工作制等类的改良政策，机会主义说是“社会改良”的大成功。然而各国国会政府，都是迟迟不肯通过这些劳动法案，等到革命高潮低落，各国重新又实行九小时、十小时的工作。现时资本重新进攻，黄色的社会党不但不承认改良主义的破产，却还要拦阻工人群众的反抗，说什么“法律既未确定，企业家自无遵守之义务！”各种“左派”或“工党”执政不久，革命潮流次低落之后，意、西等国的民贼党政府，英国的保守党政府，德、奥等国的反动党内阁便又一一实现了。

最近一九二五—二六年的世界革命第二高潮时，黄色的机会主义，又在大施身手，帮着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向被压迫民众进攻：五卅运动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拒绝举

行援助中国的示威运动；摩洛哥、叙利亚的革命战争时，法国机会主义派宣传“亚、非两洲的野蛮人，要杀尽白种人，所以法国工人不应当反对政府运兵去征服他们”；英国总罢工的时候，黄色的工会领袖主张妥协，停止总同盟罢工，而使矿工陷于孤军独战的困难地位；美国无烟煤矿罢工时，妥协派的领袖宣传“矿工罢工使其他工业停顿，工人受失业的痛苦”，这种宣传破坏美国工人的统一战线，摧残矿工罢工。

黄色机会主义派也有自己的国际组织，就是第二国际和黄色的职工国际（亚摩斯德丹）。他们赞助维持国际的白色统治，大概有三个方面：（1）黄色工会首领开除共产派的会员，破坏国际国内工人运动及组织之统一，替资产阶级鼓吹劳资妥协，反对社会革命，甚至于破坏工人群众的反法西斯的运动；（2）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不论在朝、在野，总是原则上赞成国际联盟、《道威斯计划》、洛迦诺会议等的政策，有时还努力反对苏联；（3）机会主义派大致总是赞助“自己”资产阶级的殖民地政策，帮着想他们想法驯服殖民地的民众，一切行动至少客观上是准备帝国主义的第二次大战的——他们以爱国主义及国家主义替资产阶级欺罔群众，助长民族间、人种间的仇恨，而蒙蔽工人的阶级意识。各国平民群众，客观上本来必然站在赤色的革命战线上，但是因为号称社会党的人，努力实行这种黄色的机会主义，所以对于白色的压迫政策便不能团结一致地反抗。

列强资产阶级统治人类的方法，本来是用着两种工具：一是白色的屠杀政策（军警、监狱、民贼、工贼等）；二是黄色的机会主义（社会民主党、劳动党、黄色工会等）。所以机会主义的颜色虽然是黄的，实质上不过是白色统治的附庸。帝国主义有黄色主义的赞助，便能继续维持它的生命，镇压赤化革命的民众。现时世界的阶级斗争里、赤化与反赤的斗争里，黄色的机会主义，实在是反赤军的一员大将，他实际上是破坏赤色的革命战线，做资产阶级的走狗。列强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无产阶级的组织”（社会党、工会、工人银行等）的名号，实行社会的“以华治华”政策，真是巧妙至于极点。然而最近民众的革命化，已经使机会主义派日益堕落自己的威信。黄色的妥协政策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或者能博得小利小惠，欺骗工人群众，可是在现时资本主义的垂死时期，他们每一次妥协，便是在群众中丧失一次信用。黄色的机会主义是帝国主义的续命汤，可以苟延残喘，却不是帝国主义的长生药。帝国主义的败灭始终是不可免的！

（三）中国境内的国际白党

帝国主义的国际白党，在自己国内能养育卵翼黄色的机会主义，做自己的续命汤，正因为他能征服殖民地，吸取殖民地劳动平民的汗血。列强资产阶级在殖民地上的统

治，尤其是对于半殖民地的中国，必须有代理统治者。前清时代他们利用满清政府，辛亥革命之后他们利用军阀，这差不多是现在中国人人公认的事实了。可是，军阀的社会性质究竟是什么呢？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的最初一步，必然是推销工业制造品及搜刮农业的原料品，所以必然要造成买办阶级。同时，它在政治上最利于利用殖民地上的旧统治阶级。中国的旧统治阶级便是士阀——地主阶级、官僚阶级（变相的贵族）。帝国主义的侵入，使士阀渐渐地买办化，于是士阀之中，便生出种种式的买办：军事上的买办（军阀），政治上的买办（猪仔议员，以卖国为业的外交系、交通系等），经济上的买办（洋行掮客、土豪巨商，专以代销外货、搜刮原料为事），文化上的买办（传教士、教徒、教会学校的教育家等）。这些人的社会来源，除少数洋行买办是商人出身外，其余差不多大半都是中国旧地主阶级的士绅（最著名的如袁世凯、吴佩孚、曹汝霖、陈廉伯、梁启超、章太炎等）。现在军阀的统治，便是代表这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使他们武的替帝国主义打仗，文的替帝国主义宣传，懂得些“洋学问”的（如法政、外交、交通等）替帝国主义经手卖国，会做生意的替帝国主义经手包办金融及商业等，下之，直到替帝国主义做打手、包探。这些人无形之中，早已加入国际的白党，世界的反革命党。

原本中国的旧社会是封建的宗法社会——士阀不但身份上比农、工、商高些，不但以官僚为业，而且同时便是地主阶级、盘剥重利的阶级。士阀之中固然也有“清贫的”，也有专以官署为企业，压榨农民、商人的组税、回扣和额外征收为积累资本的方法的。但是，大多数各地地方的绅士，都是“刮地皮”刮了钱来收买田地，甚至于简直侵占民田，或是开钱庄、当铺，盘剥重利。这种土豪、劣绅（最近当然也有普通的农民、商人发财之后化成士绅的），事实上是各县、各乡的地方政府，直接压榨农民。帝国主义侵入的第一时期，满清政府和士绅阶级曾经尝试过几次，想以闭关政策和尊王攘夷主义来反抗。这一期中，帝国主义的利益还和士绅阶级略略有些冲突。但是，经过帝国主义几次的武力压迫和勾结买办的阴谋之后，中国的经济生活又因为通商而起变化，于是使贱视商人的士阀，自己也买办化起来。何况帝国主义对华的剥削，根本上是剥削极大多数的农民，如搜刮原料、销售商品等，一方面是使农民、手工业破产，另一方面是组织起大规模的商业，收买农产原料。这两种方法的剥削，都不能不经过中国的大地主，中国的大地主阶级因此便成了帝国主义剥削农民的中间人。他们可以从取得重利，他们自己变成了直接的、间接的买办，以压榨农民所得，奉献于自己的新主人——帝国主义。农民的破产失业，非常之剧烈，自然使中国遍地都是兵匪，而军阀便应运而生。当然，也可以从匪类之中提拔几个新士阀，如张作霖等类。从此，一切政治上、军事上的士阀势力，便形成变相的新式的封建制度——买办的封

建制度，造成许多军阀、买办式的诸侯，小之如南通王张謇，大之如关外王张作霖。他们相互之间，因争夺各地域的剥削农民权（地盘），极易于冲突，而帝国主义正可利用这种大、小军阀的冲突而互争，分裂中国，灭杀其抵抗力。他们（这些新式诸侯）在各地都有更口的劣绅、政客、奸商，做压榨农民的政治上、财政上的机器，各省的省议会，也和猪仔国会相似，不过猪仔的尊号不甚著名罢了，完全是军阀的爪牙。湖南的政学系、江苏的教育会，实际上和全国的交通系、外交系是同类的；各省的钱业公会、银行公会、商会等，大半都是这些劣绅所把持，替军阀筹饷，替他们行使“不兑换券”，而以所受损失转嫁于商人、农民及一般人民。因战争的关系，他们这些奸商，更趁势提高物价并垄断货物，又加重一层对于人民的剥削。不但军阀压榨农民的田赋（如今预征钱粮最多的地方，如四川，已经收到了民国四十六年的了！），而且大地主阶级直接地增加田租，以便积累资本去做买办式的商业。再加之，茶、丝、棉、米、麦等农产品的输出，使城市买办阶级又经过几十层（土豪、行商、洋行买办等），去剥削贫苦的农民。军阀统治所维持的这种“秩序”，完全是为着帝国主义剥削中国农民以及一般人民的。这是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根本目标。因有此目标，所以关税协定制度、领事裁判权、驻华海陆军、租界统治制度、外债的盘剥、铁路矿山盐税等的抵押……和军阀士绅的统治，对于帝国主义都有同等的必要。帝国主义从中国旧社会的士绅里造成新的大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当然这些新阶级的成分里，可以夹杂着商人、流氓、土匪、游民等。可是，能为帝国主义做工具的，必定已经新式士绅化了，必定已经化成了所谓“高等的或优秀的华人”了。新的买办士绅阶级在各地总处于特权者的地位，受帝国主义军阀的保护，做帝国主义军阀的爪牙；而军阀则更公开些做帝国主义的爪牙。军阀的军事势力必然代表这一阶级。那不代表这一阶级的武装势力，当然便不是军阀，不能做帝国主义的工具而被呼为“赤军”。

中国的军阀、士绅、买办，不过是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境内的三个化身。现在一身而兼为此三者的人，也有不少了。他们所行的政策，无一不是帝国主义所需要的。五卅之后，一年多来，这种情形尤其明显起来。吴、张代表英、日征服国民军，攻打湘、粤，屠杀工人农民，行使军用票；康、梁保皇党传统的研究系，新生的劣绅政党国家主义派，各省种种式式的政客，国民党极右派的冯自由、邹鲁、林森等，章太炎、陈炯明（马育航）等的反赤流氓——一致地反对赤化，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与国际革命运动的联合战线。他们用种种造谣、殴打、暗杀、告密等的卑劣手段，破坏革命运动。章太炎等的反赤团体更是公开地使用法西斯的手段，赞颂军阀的南征北伐的战争和屠杀。凡此一切，都是五卅运动后，帝国主义者所亟亟需要以摧残中国民众的政策，而且这些政策的实行方法，和欧美白党施行于俄国及自己无产阶级农民的，是一模一样。

所以现时的中国问题里，不但中国的革命是国际的，就是反革命也是国际的；不但中国赤化的性质是世界的，就是中国白党的性质，也是世界的。

(四) 中国赤化的世界意义

中国士绅、买办阶级及其军事代表的军阀，因为经济的环境，只能做帝国主义治理中国的代理人。同时，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近年来更进了一步，在上海、汉口、青岛、天津等处设立工厂，中国的工业资本也渐渐有些发展，尤其是欧战期间。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此发生。中国无产阶级直接地、间接地受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他们在中国农业破产的急剧过程里，在贱价劳动充牣的市场里，无论如何不能争得丝毫生活待遇的改善，所以他们不能不做国民革命的急先锋。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之坚决勇猛和士绅、买办阶级（即军阀）的压迫之残暴狠毒，正是针锋相对的。他们的斗争一开始便是政治的。不但他们所受剥削和压迫比农民切近得多，容易得着革命的觉悟和阶级的意识，而且他们生性是易于团结，有很直接的、一致的利害。他们的政治要求和经济斗争，已经在五卅运动中明确地证明他们处于国民革命的领袖地位。因此，数量上多得几十倍，受剥削久得几十年的中国农民，却一直等到无产阶级斗争形成了伟大的势力，方才开始发生比较有系统有组织的反抗。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又自然而然和欧美、日本的革命无产阶级（共产国际）相联合，和其他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相呼应。于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加入国际的革命运动，这简直是砍断帝国主义的命根。中国赤化运动，尤其是五卅之后，不断地打击帝国主义，它的规模的伟大，不但根本动摇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势力——军阀的统治，渐渐造成人民方面的武力（如国民革命军以至于国民军），而且冲破了西欧资本主义最近的稳定状态，香港、上海的罢工，引起了英国的总同盟罢工。中国赤化运动的世界的意义是非常之明显的。

五卅之后，帝国主义感觉在华势力根本动摇的危险，而且各殖民地，如印度、埃及、摩洛哥、叙利亚等的革命运动兴起，欧洲的无产阶级左倾……他们便竭尽全力来进行中国的白祸政策：反赤的屠杀、战争以及雇用种种章太炎等类走狗的手段，准备大借款再来收买中国士绅、买办、军阀的政府。这种政策的结果，引起中国经济、财政上的大危机：奉天、湖北、京津、直隶、山东、河南以及其他各省，都发现不兑现的军用票、纸币等，一般人民又增进一度急剧的破产失业的过程。这些吴佩孚、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内对于商人的税捐重重叠叠，尤其是对于农民的田赋——最主要的收入，压榨得不堪言状。富绅、巨商虽然也受些剥削，可是他们是生产工具及田地的享有者，他们往往反而借此格外剥削农民。于是农民之中，自然而然发生极大的反抗：中部、

北部诸省都发生农民武装的自卫运动，红枪会等类的组织，这一运动现时已经有极伟大的力量，力能扫除士绅余孽，徘徊于军阀与人民之间的国民二军，虽然一时为吴佩孚所利用，可是接续着便对于吴佩孚的势力反抗。农民的这种暴动运动，实在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农民已经手里拿着武器要求农民问题的解决，中国革命如果不解决农民问题，是永世也不能胜利的。单是红枪会式的运动，自然不能得到最终的解放，因为他们的迷信和原始的斗争方法，是不容易取胜的。但是，如今各个村镇的红枪会，有者简直能够组织当地的“农民政权”，武力抗税，单这一点，便足以断绝士绅、军阀、帝国主义剥削的来源。而且，如南部中国革命政权稍稍确定，便能发展进步的农民运动——农民协会；农村中的阶级分化也日益急进，农民反抗地主、劣绅、土豪的斗争，便有有系统、有组织的方式及明确的政纲。何况，最近一两月来，红枪会运动已经渐渐和农民协会运动（河南的）相联合混一。如果红枪能稍稍脱离迷信，比较有系统地组织，和城市无产阶级运动联合起来，这是何等伟大的赤化力量！

现时中国的现状里，不但工人、农民必然赤化——要求革命，反对军阀、买办的压迫和剥削；就是普通一般平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也和乡村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地主）一样，处于极端受压迫的地位。国内战祸连年，不兑换的纸币充斥市面，种种税捐和勒索军饷的压榨。当初小商人还总相信商会等类半绅士式的机关和他们缓颊，如今已经屡次受他们的欺骗，如北京总商会的承用军用票，上海总商会的五卅案让步，对于闸北自治不能力争，对于反抗卷烟税不与援助……一般商人始终不得不自己走上革命的道路，而抛弃他们的所谓“领袖”。赤化的规模正在尽量扩大的过程里。

中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赤色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已经有极大的发展，革命的口号经过五卅之后，普遍到一般极广泛的民众里，弄得甚至于虞洽卿，甚至于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极右派，都不能不口口声声说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便是全革命化的明证。现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实在是一般平民、无产阶级领导的赤党、国民党、小资产阶级、农民与帝国主义指挥的白党、军阀、士绅、买办的阶级斗争。

帝国主义处于这危急存亡之秋，也想以黄色机会主义在中国来如法炮制。帝国主义在欧美利用社会改良主义做自己的续命汤，在中国便想利用“民族改良主义”。诚然不错！在现时一般小资产阶级大半还在士绅买办的政治指导之下。中国大资产阶级差不多都是士绅、买办出身，它的发展还很幼稚，至今没有脱离它的原形。但是，中国的工商业始终有些须发展；当革命高潮的时候，资产阶级也想仗着无产阶级的力量，向帝国主义者要些东西，如关税自主、华董位置等等。中国的士绅、买办既然资产阶级化了，当然便有和帝国主义利益冲突的地方。所以虞洽卿对外人演说，说“国家主权和民族平等”是两大原则。弄得帝国主义者连他也编派到赤化党里。本来这也并不冤枉。凡是反帝国

主义的，本来都是赤化党。不过，虞先生对外人说，民族平等便是“四海之内皆我弟兄”。所以当虞先生称中国无产阶级和平民是“弟弟”的时候，他是赤的。当他称外国资产阶级是“哥哥”的时候，他便变成了白的了。这种两面国的国籍，便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本性。他既不纯赤，也不纯白，于是便有“黄色大将”的资格了。读者如果想一想：五卅之后上海大资产阶级的种种行为、戴季陶主义的发现、国民党内新右派的形成，便可以知道此中的究竟。这种民族运动里的黄色机会主义，大致不外乎三种倾向：（1）梦想以妥协、投机，说什么“友谊亲善，互让精神”，希望帝国主义军阀对中国仁爱；并且只想消极地利用列强冲突，往往要勾结一帝国主义，如单独对英，中日亲善，东方民族共存共荣，希望日本“回东方来”等等的宣传，或者还有中美亲善的主张，这是被列强所利用，以为互相倾轧之用，同时，便巩固、发展一国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2）利用帝国主义军阀的势力压迫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如封闭上海总工会；并造作国内劳资妥协，发挥中国民族的仁爱性能等的论调，鼓吹“劝资本家、地主，替工人、农民革命”的学说。（3）企图以出卖平民利益、对帝国主义军阀让步、反对革命运动的种种手段，哀恳帝国主义军阀，想朋分一些政权，如包办地方自治、包收税捐，要求西董、华董“平等选举”，而抛弃平民群众的参政权，牺牲一般商民的利益。这些黄色的机会主义政策，正生于五卅运动革命潮流汹涌的一年里。它们的效果和功绩，便是分散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破坏革命的战争，消极地帮助帝国主义军队（吴、张等）的胜利。民族机会主义派虽然不是公开地加入反赤的，可是他们一切行动，无一不是巩固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的，无一不是赞助白色的屠杀政策的。

虽然如此，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尤其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却和它对于自己国内的劳工贵族不同。它对于劳工贵族，可以用国外掠夺所得的“战利品”犒赏他们。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却丝毫真正的让步都不能行：关税自主已经在关税会议上断送了，关税会议反而变成卖国大借款的机关了；租界华董的平等选举也绝对不能赏赐……法权，庚款等问题也是如此。因为英、日帝国主义完全靠中国广大的市场，如果中国关税自主或不平等条约修改，它们便受着极严重的打击；赏赐两三名华董、租界公园开放、越界筑路收回，已经算是莫大的恩典了！因此，不但一般平民不能暂时满意帝国主义的改良政策和黄色领袖的机会主义，便是资产阶级的群众也不能满意。何况，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关税协定未废除、不平等条约未取消以前，是决不能发展的。欧战时略略偷得些自由，可是现在便又受帝国主义的扼制了：请看近年来中国输入机器的锐减，便可以知道工业的停滞：

年份	机器输入总额	纺织机器
一九二二	三三·七七九·〇四四两	三〇·四八〇·三七六
一九二三	一四·三五七·二八六	一三·三一六·四八六
一九二四	九·六四五·一〇二	五·七〇九·五六
一九二五	三·一三七·五一九	——

(注) 表中一九二五年非指全年及全国, 仅为上海海关一月至九月输入者。

工业既不能发展, 中国资产阶级始终非常之幼稚、懦弱, 始终限制于士绅买办的阶级意识里, 并连黄色机会主义也不能彻底。他们这种“民族资产阶级”根本不能完全形成, 那民族改良主义或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始终不能巩固; 他们明显地倾向反赤的白化, 或是很露骨的黄色妥协主义不能长久欺罔中国民众, 所以缓和革命的作用很小。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的黄色机会主义, 比起欧美社会党的来, 要脆弱而没有力量得多。帝国主义有士绅、政客、军阀、买办的助力, 足以征服中国民众, 如北京屠杀后的英、日、吴、张联合战线, 能以支配中国政局之后, 一切表面的口惠而实不至的改良政策立刻完全消灭。虞洽卿屡次以五卅时的“调解”日厂罢工对日本人表功——今年五卅前后他代表赴日参观团的三四次演说。但是, 日本人回答他说: “自始即未承认《二十一条》之梦话, 决无成立之可能。”虞先生啊, 你不知道解决五卅罢工时, 日本人用得着你, 如今关税会议上日本要和中国订立“惠而不互”的《中日特别税约》, 日本人也需要你; 但是谈到《二十一条》时, 日本人便根本不要你这“赤党”了! 中国的“民族机会主义”只能使一般民众愈益愤激而革命化, 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始终弄得走投无路, 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赤化主义, 愈益能打倒妥协派、改良派、机会派的“民族运动”领袖。

帝国主义者要喂养劳动贵族的黄色机会主义, 便不能不露骨地侵略殖民地。如果要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黄色机会主义让步, 便不能喂养自国的劳动贵族。这是不能两全之道——非促进自国无产阶级革命, 即激起殖民地, 如中国等处的国民革命。

总之, 中国的赤化——国民革命运动, 也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样, 始终是正在激励地发展。它不因受国际的白党(张伯伦、若棕、吴佩孚、张作霖、章太炎等)的摧残而消沉, 也不因受世界的及中国的黄党(劳动党、社会民主党、无产政党右派、国民党新右派、上海总商会领袖等)的破坏而失败。虽然五卅后一年以来, 帝国主义能利用全副武装的白党军队来征服中国, 能利用具体而微的黄党领袖来散乱革命的战线, 和他们对付英、日国民革命运动一样。然而, 世界的及中国的民众, 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 因此更加趋向于赤化。现时, 中国吴、张内部冲突, 英、日等国的利益矛盾, 张、吴肘下的小军阀已在崩败。革命的农民运动随处爆发, 无产阶级的斗争继长增高, 一般人民受军用票等的压榨而普遍地倾向革命。国际的无产阶级及农民, 急剧地革命化。列强国内, 尤其是欧洲的经济恐慌, 已陷于不可救药的地位。同时, 帝国主义的续命汤已渐告

罄——社会的及民族的黄色机会主义急剧地破产、崩败。世界的和中国的赤化运动，即使受白党的压迫、黄党的破坏而暂时伏流昂进，表面上虽像阴霾蔽塞时的沉寂，其实是疾雷、暴风的预兆。中国国民革命的战斗和斗争不久便要爆发，扫除一切白色、黄色的妖孽，世界革命的赤色巨潮或将因此而大至，帝国主义的统治终是要颠覆的啊！

一九二六·六·七· 午夜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目前的问题

——在共产国际扩大执行委员会的提案

季诺维埃夫 著 郑超麟 译

(一) 资本主义“稳定”与世界革命策略

共产国际前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一九二五年三月）指出资本主义之部分的稳定，同时又说明这稳定是相对的、暂时的。从那时起到现在，这一年完全证实共产国际的分析不错。

共产国际指出的所谓“稳定”，并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度过崩坏和衰落时期的意思，并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医好了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给它的创痛的意思，并不是它已经调剂了那经过这次战争后特别显露的特别加紧的矛盾。资本主义崩坏时期仍继续着。但在此时期中，暂时的部分的改善是可能的。共产国际在一九二五年就已指出这种改善、这种资本主义“稳定”。这“稳定”是事实。绝不应把这“稳定”看做是资本主义经常的巩固——表示资本主义制度总的发达之新时代的过程，只应把它看做是比较战后前几年已达到了相当的固定。这“稳定”之相对性和脆弱性，现在尤其明显了。

到一九二六年之初，资本主义的欧洲重新陷入许多新的恐慌的难关：在英国——最厉害的工业恐慌现象，在法国——最厉害的纸币跌价恐慌，在德国——《道威斯计划》恐慌开始，在波兰——几乎是经济的大崩坏，在奥大利——也是恐慌……过去的一年，异常明显证实在许多重要的欧洲国家这资本主义“稳定”之脆弱性了。

为要了解世界资本主义已经稳固、其地位至若何程度，我们可以拿（1）一九一三年的状况（战前的水平线）去比较（2）一九一八——二一年的状况（战争刚了和资本主义经济最衰落之时）。但我们应该明白，单纯地比较一九一三年或任何其他的一年，实在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十几年间，世界经济本身“质量”方面发生了许多变动。

如果拿战前的水平线来看，那么欧洲强大国家中（美国是例外），大致说不仅没有一国超过了这水平线，而且没有一国完全达到了这水平线。如果拿战争刚了之初资本

主义经济最衰落的几年来看，那么在几个国家里，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目前已经相当改善了。

然而只有这种标准来判断，还是不够的。要估定目前资本主义稳固的程度，所用的标准不仅需要生产的绝对数目，而且要研究重要经济部分之比例问题和内部发展倾向问题。

达到欧洲资本主义部分稳定的道路，主要是：（1）骇人地榨取欧洲国家的民众（税捐压迫，减低工资，减低一般群众的生活程度）；（2）榨取殖民地；（3）美国方面的“帮忙”（美国借款）奴服欧洲，即是说结果强迫欧洲工人为美国资本家做工。

换一句话说，世界资产阶级打算取偿“稳定损耗”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身上。其形式，各国各不相同，但加紧剥削劳动者则是到处一样的。

（1）德国方法是加紧工业托拉斯化之过程，是民众和国家经济屈服于美国，是破产，是失业。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直言德国失业人数之增加，乃是“恢复”过程必然达到“更廉价的和更经济的生产”的结果。

（2）英国方法是纸币抬价，立意强迫工人阶级减低工资，即以此造成减低生产损耗之可能性，即增高利润。

（3）目前法国工业之比较的发达，大致是由于纸币跌价，因之减低了法国工人的真实工资而造成的。

同时，苏联之巩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帝国主义运动之增长，也是削弱资本主义“稳定”之有重大作用的动力。像俄国那样大的国家退出了“通常的”世界经济的（资本主义的）系统，这一事实是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的。

许多大国家中不断的政府恐慌、资产阶级政党内部的纷乱和分裂……也是资本主义“稳定”的相对性之病征。

美国 美国在世界经济上的霸权，是当代一件主要的事实。美国有世界百分之五的土地，百分之六点二的人口，却产出占世界生产百分之四十三的煤，百分之五十二的铜，百分之五十二的棉花，百分之六十的生铁，百分之五<十>七的纸，百分之七<十>一的煤油和百分之八<十>二的汽车。在世界航业中，美国所占由战前的百分之四提高至百分之二十。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势力在一九二五年仍继续增长。美国输出的资本在一九二五年已有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三分之一在坎拿大，三分之一在南美洲、澳洲、日本，三分之一在欧洲）：其中在德国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在意大利约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在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及其他若干国家的约共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可见，差不多全欧洲逐渐变成了美国的债

务国。从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的战事借款中，美国已经“整理了”七·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尚有四·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未经“整理”（其中法国欠美国三·三四〇·〇〇〇美金）。统计美国借出外国的款子和投放外国的资本共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

一九二五年在纽约交易所募集的股票总共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这些资本中三分之一投放于外国，三分之二则算为美国自己的股票。美国以其资本在全世界各部分为开路先锋，欧洲逐渐变成美国的属国。

美国的国际贸易增加起来（在一九二五年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五），这时德国的国际贸易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七，英国的减少了百分之五点五，比利时的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四，……坎拿大商业百分之八十是属于美国的。

美国榨取的额外利润一天一天加多。美国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优越地位是无可争议的。在最近几年一切国际上的主要会议——华盛顿、《道威斯计划》和洛迦诺的重要部分，都显露美国资本的世界霸权之不可磨灭的印象。

国家机关与托拉斯之“混合”已经用不着隐藏了。美国资本在这关系上已无需要戴假面具了。

美国资本榨取欧洲之汁，客观上即促成欧洲革命化。同时，不仅世界市场的优越权从英国跑过美国，而且反对的工人运动之“优越权”也从英国跑过美国了（美国劳动同盟）。

英国 工业恐慌和慢性病的失业，照旧在英国整个经济生活上显露不可磨灭的印象。英国贸易上的人超逐渐增加（一九二二年入超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镑，一九二四年一三四的四·〇〇〇·〇〇〇镑，一九二五年一三九的五·五〇〇·〇〇〇镑）。煤的生产在一九二四年占战前水平线之百分之九十二·二，在一九二五年则减少至百分之八十八·二。钢铁工业在一九二四年占战前水平线之百分之八十六·七，在一九二五年则减少至百分之七十六·二。一九二四年生活程度拿来和一九一四年比较，是百分之一百七十四·七，在一九二五年则提高至百分之一百七十五·六。工人工资不仅没有增加，而且在许多部分工业内实际上是减少了。煤业的恐慌不止一次使英国整个的工业生活都成了问题，而且将扩大至此前所未有过的范围。

英国需要：（1）与美、日争太平洋；（2）在欧洲与法国争（法国重工业在战中大有发展），与德国争（德国工业重新要来或迫得要来与英国工业战争），并与苏联争（东方问题）。英国的属国一天天摆脱了伦敦的势力。中国的事屡给英国在东方的势力以严重的打击。

不管最近几个月英国几部分工业中部分的、暂时的改善，但我们仍可以大胆说：英国经济发展根本上是有系统地低落下去了；英国帝国主义的政治势力一天天削弱了；英国霸权无归还地被美国帝国主义夺去了。英国帝国主义权力缓慢地，然而坚定地堕落了。

自由党因阶级斗争加紧而向消灭的途中走去。在保守党内部关于一些大问题，如：(1) 保护政策；(2) 摩塞尔问题；(3) 对工人阶级的策略问题，亦发生斗争。工党正经过长期的恐慌，左派逐渐强大起来。

英国经济发展步骤引起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大变化：工人贵族的势力衰弱了，工人群众向左并走上新的道路。英国工人运动的变化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

法国 过去一年法国加入了有慢性病恐慌的国家队伍之中，这是一件新的事实。在一九二五年这一年，法郎重新跌价百分之五十五。税项的负担一天天增加起来。战前税项只占国家收入百分之一十三·三，在一九二三—二四年则增加至百分二十一，在一九二五—二六年竟增加至百分之二十六。法国严重的财政恐慌（不管对外贸易是出超，不管最近十余年间法国重工业发展，不管没有失业）证明法国虽然是帝国主义战争中出来的胜利者，但其资本主义地位则是一天天困难的。保存私产制，不部分地没收大资本家的财产，在这状况底下，小资产阶级政府要找得一条出路是很困难的。摩洛哥和叙利亚的事变证明：法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也被其殖民地所摇动了。小资产阶级占据政权（左派联合），其中大人物当每次内阁变更时，事实上是个个站立在大资本的地位。但同时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是不可免地急进化了和革命化了，纵然至今还表现政治上的无多大助力。在统治阶级里逐渐不信任自己的力量，不相信自己能够从杂乱的和混沌的恐慌之中找得一条出路。

可见，法国跟着英国之后走上了拖延的恐慌和衰落的道路。不仅在第一次全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中战败的国家，而且战胜的大国（英法）都陷入于慢性恐慌的深坑，这种恐慌只有在社会革命的道路上才能够完全解决的。

法国大资产阶级的新政纲：(1) 限制议会制度；(2) 设立殖民地军队，即除了普通军队之外，还要有特别军队从事于殖民地的战争；(3) 稳定资产阶级的“内部预算案”，由国家增加税项（即斯丁纳式的办法）；(4) 奖励法西斯特，用为反对无产阶级和一部分革命化的中等分子之力量。

这种政纲使法国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先锋有可能成了多数劳动群众之前锋，在反对“民族联合”的斗争中组织群众，并攻击“左派联合”的犹豫。

德国 一年以前，一般人不敢说德国资本主义的稳定——《道威斯计划》的结果——是相对的。比较一九二三年纸币跌价时期看来，德国帝国主义的地位在一九二五年之初是稳固的。但在那时共产国际就预先看出这稳定事实上不是稳固的，也不是长久的，社会民主派便不是这样，他们跟着资本家庆祝胜利，并使工人相信德国已经永久制胜了重大的困难了。

过去的一年十分明显证明共产主义之分析应用于德国是正确的。《道威斯计划》之反面现在才开始发现。恐慌已经达到了群众的失业（二·〇〇〇·〇〇〇人以上的失业者），达到了资本主义企业之大批地破产，新的难解决的恐慌又造成出来，不管德国工业怎样能适应环境，不管德国资本家怎样巧妙。往后的结果，《道威斯计划》将更恶化德国的经济状况并加紧恐慌。

在一九二五年德国只出赔款二二四·〇〇〇·〇〇〇马克；在一九二六年它就应出（照《道威斯计划》）赔款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马克。“赔款问题就是减低工资问题。”（开恩斯）税项的负担在一九二四年是四·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马克（在一九一四年是一·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马克）；在一九二五年则增加至七·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马克；在一九二六年因《道威斯计划》的结果，税项的负担将更多了。

这便是《道威斯计划》对于德国的“代价”。可是这计划对于战胜国家自己也不是便宜的。《道威斯计划》助德国的输出，剥削德国工人阶级以减少德国商品生产的损耗，便是用人工发展战败国家的竞争力，去损口英、法及其他欧洲国家甚至美国自己。英国殖民地——南非洲、印度及其他纷纷向其宗主国报告德国工业之侵入于这些帝国的市场。《道威斯计划》之为英国煤业恐慌之重要动力，这是大家所知道的。

在一九二六年再来谈德国经济恐慌的部分救济，不是不可能的，但就全部看，在德国已经造成了一种状况，要找得这种状况的出路只有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不断的政府的和议会的恐慌，帝制派反动的增长，德国三大群众政党——中央党、国民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恐慌，议会制度的破产（现在的政府是少数派的政府，靠反对派的恩典而存在），工人群众的左倾，小资产阶级倾向于工人方面——所有这些使共产党人有获得群众之广大的可能。

波兰 底下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波兰厂主、银行家、商人、手工业主、地主等代表，联合上波兰共和国大总统一封呈文，最能够表现波兰大崩坏的经济状况：

波兰国家的经济生活一天天、一时时趋于消减。工业里的失业逐渐增加，已经达到二一三·〇〇〇工人，即占现时在生产中工作的工人百分之三十。这种百

分比在欧洲别的国家是没有的。有工作可做的工人也只每星期做工五日、四日，甚至三日。结果每六个做工的工人当中，有四个是不做工的……这种状况一天天恶化了。不久将做到少数人迫得去维持多数人生活的局面……工业停顿了，因为没有人要买。小地主是销行工业商品之非常重要的动力，现在没有方法能够购买。大地主在高利短期公债的重担底下破产了，更加不能在工业生产品购买中有何种作用。工人在目前临危的工业状况底下，已无力做消费者。雇员也不能购买了。手工业工场，与工业同走一样命运，也缩减了生产。商业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困难。总统先生——波兰全部的生产生活，都要沉没了。许多企业已经无可挽回地破产了。我们不能再容忍一分钟了。

财政总长向国会宣布“国库已空”并指出国内、国外“信用的恐慌”。国家机关无形中解体。贿赂的行为到处统治着。跟着来的，是白色恐怖的系统，对工人的暴虐，饥饿的失业者，中间之愤怒和失望……对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德国人、立陶宛人等之民族的压迫引起更大的反抗。民众的剥削一天天增加。同时税项的压迫和生活昂贵，也跟着增加。不仅工人，而且小雇员和很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都看见他们的经济地位怎样一天天恶化了。

东方 过去一年，且证实了共产国际上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对东方事变发展之列宁主义的评判，是绝对的正确。东方民族解放革命运动于过去一年中有很大的进步，各地发展的迅速也超过我们意料之外。在东方开始工业化的基础之上，这些事变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的运动无疑有全世界历史的意义，确实指明帝国主义统治已根本动摇了，指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在东方有不可测量的有力的后备军。新兴的中国工人运动在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一天天大起来。在中国事变发展中，俄罗斯革命和共产国际思想的大影响，是无可争议的。这些思想缓慢地然而坚定地输入印度，也是无可争议的。叙利亚和摩洛哥的事变证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将不可避免地增长，削弱帝国主义，并巩固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国际无产阶级前锋的势力。

拉丁的美洲 拉丁的美洲也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反帝国主义的（反美国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之靠点。在现在的状况之下，生活在拉丁的美洲之民族，大部分是被压迫的民族，迟早是要起来奋斗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

苏联 同时，在别一个地带，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里，在无产阶级从

资产阶级夺来的国家联合里，经济大大地发展，无产阶级经济的和政治的势力巩固起来。不管资产阶级国家怎样继续隔离和包围苏联的政策，不管国内战争的遗留怎样困难，苏联已经提高其经济至战前的水平线，已经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上得着很大的成绩，这事业现在将日加广大而增长。不管苏联内部怎样困难，须待解决，苏联无产阶级开始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建设，现在已经引起全世界广大而日益加增的工人群众之确定的注意和热烈的同情了。社会民主派首领们，许多年来极狂热地反对俄罗斯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现在在工人的迫逼底下，已迫得承认苏联是巩固起来，并且扫除了其发展道路上最重大的障碍物。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的成效，现在逐渐变成了国际一般的社会主义的成效了。苏联变成吸引各国无产者之中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中轴。

现在在全世界的状况上，是两种制度、两个世界之根本冲突统治着，二者之间到今还维持着多少不固定的均势局面：一方面是资本的世界，以美国为首；他方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以苏联为首。美国帝国主义继续占有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在美国的国际政策上，当其需要时，便拉拢英国为其同盟者（英、美联合）。然而这不是说，在这联合内部没有冲突。在一些重要问题如中国、摩塞尔、墨西哥，都可以看出英、美的冲突。这也不是说，在其余的资产阶级世界，为英、美联合行动对象的世界，就没有内部的冲突。

在一九二五年，英、美的经济冲突日益加增。英、美冲突发现在太平洋，在中国，在土耳其，在南美洲……这种冲突隐藏着新的世界战争之危险。英国本身是美国的债务国；而同时，美国以其最发展的生产力和最伟大的资本积累，又是差不多一切其余资产阶级世界的债权国。美国现在不仅有销售其商品的市场，而且有输出其资本的市场；而英国正处于慢性病的产业恐慌和失业。英国帝国主义利用美国的维持，有系统地想去隔离苏联，在国际贸易中在向外借款中防阻苏联，用包围政策反对苏联，准备于最近期间举行对苏维埃共和国之新的进攻。

资本主义世界的真实状况，这由世界大战产生出的巨大的、复杂的矛盾，在过去一年，竟挂上了一个假面具，用来欺骗劳动群众。这假面具的名字就是《洛迦诺条约》。

《洛迦诺》之客观的意义有底下几点：（1）美国资本主义经过这些协调去稳固其利益，以对付整个资本主义的欧洲（欧洲的“和平化”便是债务者将“认真办事”将认真偿还美国利息之保证；同时，看见“债务民族”小小尝试联合起来到相当程度以反

对美国，美国也觉得不满意)；(2) 英国帝国主义经过这些协调去保护其特殊利益，以对付法国(英国是“保安者”、仲裁者)；(3) 法国资产阶级稳固其特殊利益，以对付德国(拉拢英国为其同盟者)；(4) 英国帝国主义得着法国的帮助，经过《洛迦诺》协调去建立其战线，以对付孤立的苏联，并为这目的企图笼络德国使就其规范。

借助国际联盟以“巩固和平”的方法(特别是像《洛迦诺条约》一类的条约)，逐渐表现出其在事实上乃是趋向于准备新的战争。跟着国际联盟行动而来的，特别是跟着《洛迦诺》而来的和平主义的幻想，靠着社会民主党首领们的帮忙，无疑地略为普遍于工人群众中间。这些首领们是与闻国际联盟施行之欺骗的，他们把整个的第二国际变成了国际联盟的一部分。可是事变的进展，却使这些和平主义的幻想消灭，告诉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和与无产阶级群众接近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并对他们指出国际联盟的一切欺骗。在全世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中间，逐渐明白，要避免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必须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反对新战争之最有希望的壁垒乃是苏联，而唯一指导劳动群众反对劫掠战争，唯有共产国际。

底下便是以上的结论：

(1) 美国及其他几个海外国家，资本强大起来。

(2) 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在欧洲一切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经济恐慌日益加紧。

(3) 生产机关在托拉斯和嘉狄尔手里之集中，大大地增加；托拉斯和嘉狄尔上面就是银行资本。托拉斯化之扩大，我们在美国，在英国，在法国，在德国，都可看见。

(4) 美国和英国中间经济矛盾日益加厉。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以前，主要的矛盾是英、德的矛盾；现在则英、美矛盾逐渐发展了。(我们切勿因此便忽视了其他几种大矛盾的意义，如美、日矛盾，英、法矛盾等。)

(5) 《道威斯计划》开始破产。

(6) 五百万的失业者(若连家属算在内，则其数目更大)。

(7) 差不多在一切欧洲国家里，中等阶级日渐贫困。

而同时：

(1) 在占全地球六分之一的地域上，不顾一切困难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苏联)。

(2) 在差不多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地域上，正在扩大和增长民族解放运动，同时领导民族解放斗争的革命的工人运动也在扩大和增长(中国)。

(3) 在摩洛哥和叙里亚，民族解放运动竟发为直接的战争。在印度和埃及，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虽甚迟缓，但确已成熟。

(4) 在一切资本主义世界，共产党正在锻炼着，而且虽然因工业盛衰不同而起高潮、低潮的差异——工人运动正在发展。

共产国际驳斥那些早熟的结论，仿佛以为任何“稳定”都已过去了；但它又仍旧坚决驳斥社会民主党首领们的“结论”，仿佛以为资本主义重新巩固起来，成一整个的历史时代。

过去一年事变的进展，更加一次证明：共产国际根本的列宁主义政策——“到世界革命去！”是不可摇动的。在资本主义部分的和暂时的稳定时期，没有直接的革命状况，自能够而且应该推动共产国际相当改变若干工作的方法，可是共产国际的目的和行动仍然是照旧的。

(二) 国际工人运动的新现象与联合战线策略

近来，在各国广大的工人群众中间，特别有力地表现出统一的倾向。连带着，这些近年跟着改良主义跑的工人群众，对于改良主义发生怀疑，重新估量其价值，对于改良主义的方法表现某种的失望。在目前状况底下，统一的倾向，实就是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统一的倾向。

这些新的现象所以发生，是有许多原因的。

(1) 许多重要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发展，重新趋向于恶化（有时竟是绝对的恶化）广大的工人群众的状况。英国资产阶级日渐恶化的地位，逐渐剥夺了它榨取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额外利润之可能，因此也就剥夺了它创立某种特权给予工人贵族之可能——工人贵族乃是改良主义得以影响于广大的工人群众中之主要的传达者。

在英国，失业的范围一天天扩大。麦克唐纳尔第一个“工人”政府之经验，给改良主义幻想以严重的打击。资本的进攻引起了更大的冲突（矿工），使广大的工人群众愈加感觉得有工人阶级有组织的群众行动之必要。

在德国，失业也扩张得很大。广大的工人群众的经济地位一天天恶化了。同时，帝国的危险也迫切起来。统治阶级准备以二十万万马克巨款赔偿何亨作伦皇朝损失的田产。政府的恐慌变成经常的了。税项的负担加重，生活程度增高。

在法国，财政恐慌的效果似将完全移嫁在劳动群众身上。叙利亚和摩洛哥的事变，在工人群众的眼里，不会不看做是未来帝国主义“大”冲突之小的尝试。无出路的议会的和政府的恐慌，向广大的劳动群众明显证明：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整个系统，从根本上腐坏了。

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波兰、捷克、斯拉夫、意大利、巴尔干及其他许多国家。

(2) 在欧洲许多重要的国家，联立政策（这就是说，允许群众由和平的改良主义道路给予群众幸福的社会民主党人加入联立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显然是破产了。在法国、德国、波兰的社会民主党中，发生了公开的斗争，恰好就是为能否重新加入

联立政府的问题。社会民主党“左”派的代表者，出来反对与资产阶级合作，反对长远加入联立政府，自然是反映（仅仅是很弱的反映）一般社会民主党工人的不满——他们在许多联立政府的经验里看破了（或正在看破）改良主义的幻想而觉悟了。这绝不是说，这些社会民主党工人分子已经确定与改良主义幻想绝缘了。在某种范围，旧病复发是不可避免的。但改良主义幻想的引诱力——在我们方面施行正确的策略底下将一天弱似一天，以致于最后，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完全为我们所占领。

（3）苏联经济发达的事实，对于全世界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有巨大的影响。甚至在那些社会民主党工人分子中，向来特别广大地散布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革命的暴力、反对国内战争等的成见，现在他们看见活的例证不得不相信，苏联工人阶级的道路是正确的了。苏联——唯一的国家，在那里工人拿住自己的命运在自己的手里，在那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在那里工人阶级物质的和精神的地位逐渐提高了——不能够不成为全世界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的吸铁石。国际社会民主党首领们向来对于苏联的毁谤，现在也已消散了。社会民主党工人要摆脱改良主义的影响，来苏联考察的工人代表团便有而且将有伟大的作用。

（4）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工人，近来本能地感觉到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渐渐地重新起来。全世界军备的增加、赔偿战争损耗之移嫁于工人阶级肩上，帝国主义者之向东方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进攻，缔结新的秘密条约之继续不断地进攻——所有这些对于社会民主党工人，都将是新的世界战争的征兆；防止新的战争，只有全世界整个的无产阶级真实地坚固地联合起来。

所有这些综括起来，便在广大的社会民主党（或无党的）工人群众中造成了新的倾向，首先引起了他们的真实地群众地统一工人阶级队伍之原始的倾向。所有这些，达到了联合战线策略之初步的重大的成功，尤其在英国、比利时、瑞士及其他国家。

共产国际及其支部应当坚决地诚实地走去迎接社会民主党工人这种光明的统一倾向。

在这意义之下，仅仅现在才造成了真正应用联合战线策略之广大的基础。

这些新的现象之重要，达到了英俄职工委员会之组织，达到了英国共产党和“少数派运动”之成功，达到了德国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共同斗争（无代价地没收何享作伦财产的运动），达到了瑞士职工运动联合战线之初步的成功，达到了挪威的工人政党思想等……

在广大群众逼迫之下，社会民主党首领们开始——至少也是口头上的——变更他们的策略。在公开地应用白党策略来对付苏联的考茨基派之旁，在第二国际里复产生

了所谓“左派”（其最显明的代表者是奥托鲍尔——Otto Bauer），宣传对苏联之“友谊的”关系。奥国社会民主党——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社会民主党之一，有巧妙的改良主义外交家为其首领。所以奥托鲍尔及其伙伴（法国的康伯尔、莫勒儿——Compere、Morel）态度的改变可以做一种征兆，表示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心理的改变至何种程度。

同时，“左派的”社会民主党首领们仍继续诬蔑共产国际，用最无稽的和最恶毒的罪名攻讦共产国际。奥托鲍尔自己在不久之前在马赛开的第二国际大会席上对于苏联和东方民族取“友谊的”关系的一个议决案上竟这样肯定说：“共产国际散布了一些幻想，仿佛以为工人的解放是可以从红军的刺刀尖上得着的。共产国际以为必须引起新的世界战争，以冀达到世界革命之胜利。共产国际帮助亚洲和非洲的革命运动，希望依靠在这种运动之上，经过战争给资本主义以致命的打击。”社会民主党首领们分明知道，实际准备新战争的，并不是苏联，而是反对苏联的帝国主义政府。他们于是即利用社会民主党工人对于战争之仇愤，企图戴着“善意”的假面具，以上述的骗人的肯定语使社会民主党工人离开苏联，亦即以此使他们离开国际工人联合战线的思想。

社会民主党首领们反对联合战线思想的另一种得意的方法，便是企图将“自己的”共产党人（即本国的共产党人）装点得像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劣等的分子，与别国的共产党人不同，是不能与他们合作的。这样便传播了反对本国共产党人的谣言。

最后，为破坏联合战线策略，社会民主党其他的首领们还用底下的方法：他们把自己形容得是比共产党人多倍热心的“统一派”，并发出一种理论，以为要造成真正的统一，只有共产党人放弃其独立政党的思想，而加入于社会民主党……

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合并，不用说，无论如何都是谈不上的。这将是直接背叛了无产阶级事业。这将是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伟大的历史使命。独立的共产党之存在乃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ABC。最近时期工人阶级所得的主要成绩，便在，不管一切巨大困难，世界各国都成功创立了独立的共产党，公开地反对社会民主党首领们的背叛行为，公开地拥护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并准备这个革命。只有在共产党旗帜之下才能够联合——在此时自然说是联合——整个的无产阶级。

同时，共产国际扩大执行委员会宣言：共产国际将用比前更大的力量，实行联合战线策略，这就是说，将向社会民主党（和无党的）工人提议共同斗争，在一切最重要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问题上面，共同反对资产阶级，这样的共同行动是能够达到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共产党人中间之协调的。

共产国际扩大执行委员会明确地训令其所属各支部，须坚决地、勇敢地 and 诚实地走去，迎受社会民主党工人反资产阶级斗争之统一的倾向，与他们联合起来为这些或

那些的实际行动甚至为最小的口号而奋斗，并向他们表示注意的同志的和尊重的关系，只要给他们以可能，来同我们共同反对资产阶级。

共产国际用不着修改其对于社会民主党及其首领们（“左派”包含在内）的客观作用之评价。这种评价披露在共产国际从第一次大会到第五次大会的许多文件上面。共产国际扩大执行委员会坚决地驳斥那以为必须“修正”第五次大会议决案之一种取消派的观点（如法国右派反对派及其他一些抱取消派思想的“共产党人”的意见）。

共产国际绝不致疑于社会民主党首领们多数人将继续破坏工人的联合战线，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首领们在简单的共和党人都能够帮助工人的问题上之作为，便是一个例证。可是，环境改变了，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之心理也跟着改变了；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环境，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客观上有不同的作用——这是应用联合战线策略底下所首先不可忽略的。

共产国际仍旧保持这种意见，以为联合战线策略绝不是与社会民主党上层作议会的联合的策略，也不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上层合并，更不是共产党放弃了其在宣传和煽动上的独立性。共产国际仍旧以为，联合战线策略不是别的，只是在群众中革命煽动的方法，有组织地调动群众的方法，争取工人的大多数到共产国际方面来的方法。在某种历史的情况底下，联合战线策略是尽可能地联合国际无产阶级广大群众之唯一正确的方法，是以马克思主义精神有系统地训育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和无党工人群众，使之反对改良主义之唯一正确的方法。

社会民主党首领们，为反对联合战线，时常说，共产党人事实上不愿意联合战线。这样的解释，根本上就是虚伪的。“联合战线”口号对于我们，首先是以工人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之迫切的需要名义，真实地、全阶级地调动工人群众之口号。如果我们的煽动是向于反对社会民主党首领们，那完全是因为他们阻碍了工人为其切身需要斗争之联合。

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倾向于美国帝国主义者，向他们求救；同样，社会民主党首领们也求救于美国，要向那资产阶级在工人中模范侦探——美国工人运动的首领们，要求帮助。

美国资本的巨额，在高度的额外利润基础上，特别有系统地造成了工人贵族，收买并腐坏一切上层的美国工人运动。

美国劳动协会的指导权，完全操在最无耻的“工人”贵族之手。美国刚伯尔思派工会，创立多数“工会”银行，散发工厂、企业股票于工人，实际上是直接“结合”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会会员的数量减少了；工会变成了差不多只剩有工人贵族的闭

关组织。全美协会创立起来，首先是为阻止“别的”能够危害工人贵族特权的工人，到美国来。这些“工会”的首领们乃是苏联之最恶意的诬蔑者。

欧洲很多改良派首领们所欣赏的，便是这种“工作”。在德国，在奥国及在其他的国家，这些首领们宣传工人运动之“美国化”。他们开始仿效设立“工人”银行，与企业家联络。上层工人贵族购买股票，被他们看做是和平地“进化”到社会主义。亚姆斯德丹右派首领把美国劳动协会看做是波尔札维克危险的救星。他们拿“美国化”来抵制欧洲社会民主党工人接近苏联无产阶级之原始的倾向。工人运动刚伯尔思式“美国化”的“幸福”，连同《道威斯计划》的“幸福”，从美洲到欧洲来。

目前我们的重要责任之一，便是在全世界工人面前指出这种政策之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意义。

(三) 共产国际各支部危机和反对恶倾向的斗争

共产国际幼稚的支部之危机，在共产国际成立之最初几年，是不可避免的。引起这些危机的，有以下几种原因：整个时代之过渡性，新组成的共产党缺少革命经验，共产党中有多数分子是从社会民主党出来，没有一般承认的首领干部，社会民主党数量多过于我们……共产国际总的任务便在帮助各支部迅速地、没有弊病地渡过危机，并引导之达到危机现象减至极少的状况。欧洲客观状况利于工人阶级求解放的斗争。因此，主观因素，即共产党为执行应负的历史使命而准备的程度，乃愈加重要。

过去的一年，在捷克斯拉夫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中，完全渡过了危机。假如在上次共产国际扩大执行委员会时（一九二五年三月），捷克斯拉夫共产党内部状况是异常紧张的，那么经共产国际的帮助，到这一次共产国际扩大执行委员会时，捷克斯拉夫共产党已经巩固起来，改变其政策，因此便已经有重要的成功了。

意大利共产党内部长期的极左派的危机（波尔底嘉—Bordiga）幸得于不久之前开的大会解决了——这次大会找到了充分的内部力量，足以战胜那离开根本的共产主义政策的恶倾向。意大利共产党正确的政策，已经使它在群众中有重大的成功；在最近的将来，自然将有更大的成功。

捷克斯拉夫共产党内事变的发展，可以做如何制胜右派恶倾向的先例。而意大利共产党内事变的发展，也可以做如何制胜极左派恶倾向的先例。

德国共产党所处的危机尚未完全解决。共产国际，在一九二三年的失败和白朗德列尔（Brandler）派中央的破产之后，虽明知马斯洛夫（Maslov）、菲雪儿（Fischer）和索林（Soholem）能够做出极左倾的大错误，也不得不将指导权交给这些“左派”。共产国际曾经坚决地在佛郎克佛大会（“左派”的）上攻击过上述一派的错误（关于

工会问题、联合战线问题及其他)。共产国际给予指导权于这一派手里，一开始便警告党须留心他们的错误。当共产国际明白这一派不能免除恶倾向，而极左派本身又产出一派良好的工人能够负责做事之时，便帮助排除马斯洛夫、菲雪儿一派于党的指导权之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给德国共产党一封有名的公开的信（一九二五年八月）中所定下的政策，已经证明完全不错了。党得有接近更广大的工人群众之可能。党在实现联合战线的路上，终于达到了广大的结果。横隔在我们的党和社会民主党工人中间的墙壁开始倒塌了。为要确定取消一九二三年事变所引起的恐慌，德国共产党必须确定战胜极左派的恶倾向，这派的代表者（索林、菲雪儿、马斯洛夫）扯党往后退。这里，我们的任务便在纠正“首领们”的错误，须不致于失去那现在尚跟着“首领们”走的许多群众，须不致重演赫德尔堡（Heidelberg）事件（开除左派工人群众出党），须不致于在原则上对于德国共产党内至今尚未完全消灭之右派让步。

法国的状况对于共产国际是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的。照客观的状况，法国共产党在最近将来将有巨大的政治作用。客观的状况对于法国共产党的工作是十分便利的。这里，主要的危险便是右派恶倾向。在法国的右派反对派不是整齐划一的。在完全反对共产党的和反革命的分子（苏瓦林——Souvarine）旁边，在明显从共产主义退往工团主义的派别（罗斯麦尔——Bosmer、孟纳特——Monatte）旁边，在不能了解新的任务和固执社会民主党渣滓的落后分子（罗利欧——Loriot）旁边，在法国反对派里头，无疑有一些分子是被党的指导机关的一些错误所激成的，是由于或多或少合法地不满意于工人政党中之一些非常态的设施所激成的。法国共产党的任务便应该在于：（1）以广大的解释工作，以一切党的生活之德漠克拉西化，造成一种局面，使目前的右派反对派解体，而使其优良分子复归于党；（2）在这基础上恢复党的纪律，即使必须开除那些不愿意与苏瓦林及其伙伴绝交的党员出党亦在所不惜。

波兰共产党经过了严重危机的一个时代。党的指导机关之极左派的错误，几乎毁灭了党。不久之前闭幕的波兰共产党会议所通过之关于农民问题、民族问题……等议决案，是共产国际所同意的，而且完全适合于引导党入于轨道。最近半年以来，共产国际看见“极左派”恶倾向之旧病复发——在德国，在意大利，在波兰。在目前状况中，这种恶倾向可以引起特别重大的不幸。这种恶倾向的主要危险，就在不晓得为争取群众奋斗，不晓得应用联合战线策略，甚至于不能够明显提出争取大多数工人到我们这边来的问题。

在德国反对“极左派”的恶倾向，在法国反对右派反对派——以此决定共产国际对付目前的恶倾向的方针。同时在各个党内，共产国际仍旧奋斗反对极左派的恶倾向，同时也反对右派的恶倾向。共产国际行动的根本方向仍旧是——看空间和时间，依照

列宁主义以抵抗极左派的和右派的恶倾向。

自然，反对极左派的斗争，能够算做拥护列宁主义的斗争，只是在右派不能解释这斗争为他们的胜利之时。反之亦然。

共产国际在这关系上，亦如在其他的关系上一样，仍旧保持上一次共产国际扩大执行委员会所通过之波尔札维克化的纲要。

(四) 共产国际的任务

(1) 在欧洲，社会主义胜利的客观条件，逐渐成熟。主观因素亦跟着逐渐变成重要，如工人阶级团结至何程度问题、共产党巩固至何程度问题、共产党真正波尔札维克化至何程度问题、共产党在历史状况上表现至何程度问题。共产党预料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和困难点（因资本主义部分稳定关系），就应该自己努力时时刻刻准备着，去对付将来革命发展更迅速的步骤。注意锻炼共产党，留心于政治教育、训练、组织的团结力、思想的力量革命的毅力、到群众去的才能——这些便是共产国际在最近几年中重要的任务。

(2) 目前，许多重要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纵然有部分的资本主义“稳定”，却走到了经济的断头路；资本主义欧洲的生产力退化了或停滞了；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低落了；美国帝国主义逐渐变资本主义欧洲为其附庸了；广大工人群众，连社会民主党工人在内，根据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合作的“联立”政策，不能解决那日益纷乱的危机这一经验，逐渐坚定地去寻找那脱离目前状况的出路。在这些情况下，共产党的任务便是：比前更广大地、更果决地、更坚定地，在广大民众前面表露其解救欧洲的政纲——即由无产阶级革命，由无产阶级专政，由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这是共产国际于一九二三年即已赞同的口号），由实现“各国无产者和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口号等道路。

宣传建立欧洲合众国，以解放西欧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脱离本国资本和美国资本两重压迫的道路这种思想之时，应该注意底下几点。第一，欧洲合众国口号，应该看做是，欧洲国家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结果产生的欧洲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际关系之政治的表现。第二，西欧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连同欧洲合众国口号，应该了解做：不必定是无产阶级在全欧洲同时胜利，而是革命骚动的一个时代，在这骚动的进程中，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在某几国或某一国里取得胜利，然后蔓延于欧洲一切国家。第三，欧洲合众国口号表示欧洲解放了的民族按照联邦形式结合起来，只能在完全自由的和完全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第四，这口号，本是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亦即表示宣布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之解放，并在完全自由的基础之上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合作。

“欧洲合众国”或“欧洲工农共和合众国”口号之宣传，用在适当的时候（批评和鄙笑这“合众国”口号之平庸和平主义者的解释，指出在这方面资产阶级思想之无效），可收巨大的效果。

同时，在许多欧洲国家（法兰西、意大利、巴尔干、波兰、捷克斯拉夫、德意志），应该以特别的力量，发出“工农政府”口号。

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与苏联，与世界被压迫民族，与美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核心之联合，代表一种伟大的势力，使帝国主义的美国奈何不得。

(3) 特别对于国际联盟召集的国际会议（经济的和裁兵的），共产党必须根据共产国际总的政纲，为煽动目的，在广大劳动群众面前，发挥由反资本主义政策以解救欧洲的具体的政纲。

(4) 但在这广大的宣传工作之外，共产党还须能够定出许多具体的部分的要求、最近时期行动大纲、随时随地不同的最低限度要求，而带到群众里去——这种要求首先须是能够取得并一部分已经取得社会民主党和无党工人赞助的，须是能够改善劳动者生活水平线的，须是同够帮助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

(5) 统一的倾向——这便是差不多全世界工人现时心理之根本特点。日益坚定的向统一之意志；非统一则地位将愈恶化之认识；统一工人群众口号之通俗化，尤其统一职工运动口号之通俗化——这些便是现时工人运动的根本特点。

(6) 在这基础上，现在应该特别广大地发展联合战线策略。广大地应用联合战线策略，还仅仅在开始。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第一次发出这策略的几个要点，在第四次、第五次大会和扩大执行委员会，这策略才具体化了。联合战线策略本是无产阶级前锋在长时期里的策略，其作用将达到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到我们这边，但在环境改变时，应该随空间和时间不同，而稍变其形式并具体化。

在目前，尤其应该记住第三次大会所定的和第四次、第五次大会所发挥并补充的关于策略的议决案。这几次大会，关于策略方面所定的根本几点，一直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因此任何“修正”都谈不上。

(7) 现时应用联合战线策略中的重心，乃是职工运动。各国工人运动中现今形成的“左派”之特性，乃是工会性的。因此，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工作尤觉重要。帮助工会的左倾分子，赞助他们团结工人阶级势力的倾向，在每个国家为恢复工会统一而奋斗，为创立统一的、阶级的职工国际而奋斗——这些便是联合战线策略应用上的要点。共产国际主张为统一起见，一切共产党人都须同意取消独立的赤色职工国际，并合并于亚姆斯德丹国际，但有一原则，即召集两职工国际，开一联合的世界大会，两方面各保留有煽动的自由。大家自然明白，在未能合并以前，每个共产党人的责任乃

是以全力帮助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这宣言以为，赤色职工国际属下的苏联工会加入亚姆斯德丹国际，是做不到的，因为现在还充帝国主义的国际联盟工具之亚姆斯德丹国际，并不实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实系在统一工人运动上消极怠工……

共产国际坚持主张法国共产党（自然须得“统一派劳动总会”同意）和捷克斯拉夫共产党（自然须得赤色工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应该比此前多倍努力，在职工统一问题里应用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指出，在这问题里的保守主义，是足以误大事的。共产国际以为不制服法国和捷克斯拉夫的这种保守主义，那在应用联合战线上和有效地争取群众上，是不能切实进行的。在为国际无产阶级统一而奋斗的观点上，特别在为创立统一的、阶级的职工国际而奋斗的观点上，共产国际将以全力赞助英俄职工统一委员会及其他此类的倾向之工作。共产国际确信，英俄委员会万一不能逐渐扩大其工作，世界职工运动统一的思想也是要胜利的。在这观点之下，共产国际将以全力赞助那才开始的工人代表团游俄运动——这运动对于统一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上，其意义是日大一日的。

（8）在实际上应用联合战线策略之时，往往发生二种错误：

（甲）我们的党向社会民主党工人建议共同行动的条件时所提出的要求，是明知尚具改良主义心理的工人所不能接受的。譬如法国党向法国社会党人建议共同战线反对摩洛哥战争，其所提出条件是要他们承认法国撤兵和法兵与里孚人携手等口号。

（乙）我们的党部，与社会民主党协调之后，有时竟负责不以一字攻击社会民主党，这即是说，放弃了共产党煽动的自由（不久之前德国共产党某地党部才做过这样的事）。

这二种情形都是错误的。宣传法国撤退在摩洛哥驻兵的思想或法国兵士与里孚兵士携手的思想是绝对的正确。但在那种环境之下，提出改良主义工人须赞同这些口号为共同行动的条件——是绝对的错误。以全力向社会民主党工人求协调为共同行动——是绝对的正确。但放弃自己的独立地位——是绝对的错误。在应用联合战线策略底下，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保存独立地位，并在便易的形式宣传自己的全部思想，同时也在于由我们方面发动向社会民主党的和无党的工人求协调，纵然在改良主义的和半改良主义的工人分子能够接受的初步口号上也是可以的，只要这些口号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这些要求，大部分将是社会民主党工人能够接受的和愿意的，而为社会民主党首领们不大愿意接受的（或受群众逼迫勉强接受的）。没收德皇财产的运动，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不了解共产党在现存的或能够组成的工人政党（如工党之类）里的作用，遂使联

合战线策略上生出现存的缺点。

我们是不能够只限于写一封（或几封）“公开的信”给社会民主党的；我们是不能够只限于形式上点缀风景的“联合战线”。正确应用联合战线策略时，不仅要想到煽动上的成功，而且要想到组织上的巩固——不了解这些而做出的错误还在普遍于共产国际和许多支部。

共产党应该比前此任何时候都要了解，联合战线策略也是有危险的。社会民主党首领们勉强（受群众所逼迫）与我们协调，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努力把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的尾巴，这就是说使共产党人失去力量之后，到了紧急关头时，或去出卖整个的运动，或去改变运动的性质以报效于资产阶级。

在各种各色的共同行动之中，在各种各色的对社会民主党工人心理让步之中，共产党应该自己立定脚跟，应该宣传自己完好无缺的政纲，应该日益提高这个运动，不失去与群众的接触。

（9）同时自然谈不到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组织上的合并，或共产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合并（不久之前英国独立工党才这样提议）。社会民主党首领们有时这样提议，其计策是：提议那不可能的以破坏那可能的，这就是说，那不能实现的、似乎更进一步的提议（合并两党），企图来破坏那共产党工人和社会民主党工人在某种具体要求上、在某种反资产阶级的行动上求协调之能够实现的提议。

恢复工人阶级完全的国际统一，创立统一的包含工人阶级一切力量的国际——乃是共产国际所要完尽的全世界历史的任务。正因为要完尽这个任务，所以无产阶级先锋才在艰苦斗争中，不避巨大的困难造成了独立的无产阶级共产党，共产党自始至终都仇恨资产阶级世界和社会民主党首领们之迟疑不决的小资产阶级行动。唯有共产党，能够一贯到底拥护无产阶级全体的利益，创立独立的共产党乃是共产党人无论何时都不能放弃的胜利品。

（10）至于说到英国独立工党的提议，那共产国际扩大执行委员会便委托主席团以公开的信答复英国无产阶级：

（甲）向英国无产阶级解释共产国际和第二国际之合并何以是不可能的。

（乙）向英国独立工党和英国无产阶级其他团体提议：立即组成联合战线，赞助英国矿工在他们与矿主和政府将来的冲突中。并向整个第二国际提议：联合战线以赞助此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英国矿工的斗争。

（11）联合战线策略自然首先算是工人的共同行动。但联合战线的意义并非只限于此。当良好环境到来时，共产党人应该提出那些能够牵引半无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之部分的要求。譬如当纸币跌价之时，先蒙其害者便是小资产阶级群众，小资

产阶级的直接危机造成了。在这状况之下，譬如在德国，很多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能够而且应该被牵引入于反资产阶级的行动。没收德皇财产的运动也是这样。以前我们的煽动缺乏具体性，乃是我们党的工作中最大的缺点。纠正这个缺点——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中之一。

(12) 在许多国家里，农民中发生了严重的分化，这种分化反映到资产阶级的（和天主教的）农民组织里。在这些组织内部形成了左派……争夺农民的较有组织的斗争开始了（奥国社会民主党农民政纲草案，路易乔治的草案……）。若干共产党（意、法）之努力，注意于农民工作，都得重大效果。共产国际各支部应该加紧这方面的工作，使与共产国际工作平行并进。

(13) 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之觉醒和工人运动之逐渐强大，成了新的第一等重要的事实。使欧美工人注意于这事实，向他们解释这运动对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之重要，俾他们了解、帮助东方并与东方合作之必要——乃是目前主要任务之一。

同时，共产国际必须分出最大限度的力量，从各方面赞助并巩固东方诸国的工人组织，使东方工人日渐接近于无产阶级的国际斗争。

(14) 共产国际扩大执行委员会委托主席团特别注意于日本的工人运动，那里现在已有群众的无产阶级运动之序幕。尤其必要的，即改良派企图（将来得着美国社会叛徒的帮助更加要企图）占据日本工人运动的新生的机关，并由这机关将传达资产阶级的影响于有伟大前途的中国工人运动。

(15) 了解新的流血更多的帝国主义战争为不可避免的这一种思想（如果工人革命不早胜利时），逐渐呈现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面前。全世界工人逐渐明了认识，只有与苏联密切联合，才能作反对战争的斗争。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在创立统一的国际无产阶级战线上占重要位置。共产党人应该注意，务使反对战争的运动是由共产党人发动的。

(16) 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现在这革命斗争比较平静的时期中，更加要立定脚跟，在广大工人群众日常斗争和生活中，要争取工人的多数到我们这边来。无论如何，要变成如果不是这个国家唯一的，至少也当是重要的、最有影响的工人政党。在正确应用联合战线策略之下，这种任务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17) 在许多国家，共产党至今尚不是公开的，就必须做严重的、坚定的和重复的尝试，以脱离秘密工作的状况，并利用公开的可能。□应该要求社会民主党出来赞助一切工人组织须公开之要求，赞助反对白色恐怖的斗争，逼迫社会民主党首领们露出他们的真面目。

(18) 共产国际看出许多共产党内，至今还没有基本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党内德谟

克拉西。近来党内许多的危机，因没有党内德谟克拉西而益加剧。德谟克拉西集权制之正确的原则，时常被解释得太过于机械了。结果，下部的自动性被束缚了，致党的新的指导人才难于养成。中央委员会有时与党员群众相隔离。在这基础上，这派或那派的倾向很容易造成小派别，因此可以变成特别的危险。

共产党只可以建立在德谟克拉西集中制上面。但德谟克拉西集中制的功用，不仅是方针和指导由上部到下部来，而且一切党员群众真实地自由地发表意见与志愿也应该由下部到上部去。

德谟克拉西集中制不仅是纪律，乃是纪律加上指导机关之真正的选举，加上党内讨论问题的自由（除了问题已经解决，到了直接行动时候外），加上普通党员之真正的自动。

根据以上所说，共产国际扩大执行委员坚决地更加一次主张尚未“常态化”的共产国际支部之“常态化”。

(19) 必须严重注意于共产党在大工业中心和大工业企业里的工作。有许多地方共产党支部乃是小工厂和中等企业的支部，而在大企业里，共产党人的影响反弱。一切共产党应该念念不忘本国最大的、最重要的工业企业，并时时刻刻计划怎样在这些企业里，造成最强大的共产党支部。

(20) 在欧洲几个重要国家里，失业工人已经带了群众的性质，当地的共产党应该特别严重注意于失业工人的运动。共产党应该以组织失业工人并指导其运动为己任，应该用各种方法尽力使失业工人不与工会和在工作中的工人运动相隔离。然而，当工会是在反动派首领影响之下，不肯照理帮助失业工人之时，共产党必须组织失业工人团体，以各种方法帮助其斗争。

(21) 在几个国家里（保加利亚、波兰）过去一年发现了恐怖倾向的危险。在保加利亚工人中间，在刽子手藏可夫制度造成的环境里，有些被一些举动如苏菲亚教堂炸弹案等所引动，而趋于恐怖手段，纵然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坚决否定个人的恐怖。在波兰，有个时候也发生恐怖主义的倾向。

共产国际是坚决反对个人恐怖的。共产国际有革命的原则为其指导，而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方法。共产国际反对小资产阶级式的对于革命问题之见解。每个觉悟的无产者知道，不用革命的暴力，则不能推翻资产阶级，不能从资本压迫底下以解放世界。工人阶级只可以用武装的力量从资本主义凌辱底下解放人类出来。因此共产党人反对使用个人的恐怖，认为群众行动的斗争变成个人行动之后，只能够败坏我们的运动，只能够分散我们自己的势力。

(22) 在工厂支部基础上改造党的系统，现在已完全证实是不错的了。法国右派或

意国极左派对此组织原则之反对，只好证明他们的反对是由于错误的反波尔札维克的倾向所致。同时，建立党于工厂支部基础之时，不能过分直接地，必须按地方情形有具体的修改，需要时又必须按居住地方的组织（如街道支部）同时并进。

（23）必须加紧党的宣传工作，特别是提高党中坚分子思想水平线的工作，记住现在这一时期共产党人一分钟都不应空过，以准备未来的斗争。

（24）非党的团体也能够有大的意义。济难会、国际工人救济会、农民国际，协作社等便可证明。在这范围内应该比前此更加注意。

现在可以明白，欧洲工人广大的非党组织也能够负起责任，为反对战争而奋斗，有系统地帮助苏联及其建设事业等。

（2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应该加紧并整理起来。强大的支部应该比前更直接地来参加共产国际的指导工作（参见秘书处拟定的草案）。这不仅是组织问题，而且是大的政治问题。幼稚的共产党指导者尽可能精密地参加共产国际的一切工作，这乃是这些党更迅速地发展、更常态地成熟之条件，也是这些党能够有大的力量，能够站在本国重要革命事变前面之序幕。

广大的应用联合战线策略，仅仅还在开始。其应用将一年广似一年。

“统一工人阶级”这一口号是共产国际今后一切行动的主要口号。由工会中长期的有系统的工作道路，去日加一日地注意于争取工会！要求一个统一的、阶级的工会国际啊！

全世界工人日加一日地注意于苏联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国际无产阶级各方面帮助苏联的工业化啊！

更加注意东方！使工人知道东方民族解放（和工人）运动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有最接近的、最切实的关系。

更加注意新大陆——拉丁的美洲、非洲、澳洲的工人运动！

争取农民的斗争！争取中等分子的斗争！争取城市重要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斗争！为这目的，须提出市政的要求，以此不仅可以团结改良主义的工人，而且可以团结其他劳动分子（小农民、小雇员等）。

反对新战争危险的奋斗！

赞助工人代表团游俄运动！

有系统地、坚定地斗争，争取工人的多数！

有系统地、坚定地斗争，使共产国际各支部波尔札维克化！

世界职工运动之现状与共产党之职任

洛若夫斯基 著 瞿秋白 译

(一) 劳工运动的速度和规模

欧战后的劳工运动比起欧战前的来，它的变迁和突进的过程，实在和那资本主义的有机生长时期不同——迅速得多了。战前的变化，要几年甚至于几十年工夫的，如今简直只是几个月或者几星期的事。现在的速度和规模，完全换了个样子了。十多万工人的罢工，在战前是世界大事，整年整月地讨论它，研究它。如今呢，几十万工人的大冲突，全地球到处都有，简直不算什么一回事。我们自己都仿佛惯了。但是，如果把现在的劳工运动和十年前比较起来，真正可以说：我们进行的速度增多得百倍了。这种速度和规模使每年都有新的现象，我们必须研究它们，然后才能决定以后的方针。

从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一九二四年秋）之后，至今不过一年半光景，然而世界职工运动里的进展已有极大的进步。这一短期间之中，各国职工会里内部发生许多变化，工人阶级的力量重新经过一次调动，所以我们可以说，世界职工运动之中的确有新的现象。新的现象大致是：（1）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更受束缚；（2）工人群众的生活程度降低；（3）新式的阶级妥协；（4）美国劳动同盟对于欧洲改良派工会运动的影响，更加增大；（5）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职工运动急速发展；（6）大多数改良派工会里发生左派；（7）苏联工会对于世界职工运动的影响也日益增长；各国工人代表团纷纷来俄；（8）统一工会运动之英俄委员会成立；（9）黄色职工国际内部的斗争剧烈；（10）工人群众之中渴望工会运动的统一。

现时最可注意的是：一方面，极广泛的群众趋向于工会统一运动；别方面，世界职工运动里因此而发现新的分化。世界劳工运动的新分化，是两条路的选择：美国的和苏联的。群众倾向于苏联，而改良派首领趋向于美国。这是世界职工运动的南、北极，正和政治上的形势是一样的——苏维埃国家和财阀专政的国家。

美、俄两条路的倾向，其基础亦在于美国和苏联对于国际政治的作用增高。这是

两个绝对相反、互相仇视的制度，它们势力的分野，对于工人群众有极大的影响，对于工会领袖也是如此。美国和苏联的职工运动在策略上和思想上是绝对仇视、不能并立的；纯粹美国式的帝国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相对关系，亦是同样的。因此，工会领袖和群众便自然分化，各自趋向这南、北两极。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如果不了解这一过程——世界职工运动内部倾向美国和苏联的分化过程，当然便不能决定正确的方针。

（二）政治反动的增长

最近一年半以来，完全是资本家向工人阶级继续进攻的时期。差不多各国的工人阶级都在防御战的情状里，往往还是守不住原有的地位，而不得不退兵。资产阶级的进攻，在这一时期，大半是政治上的：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主义更明显地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自由。甚至于颂声满道的老立宪国家的英国，也熬不住了，竟公开地拥护资本家的特权，侵犯工人的自由，因为现时到了治者阶级的利益和那些形式上的自由都已经冲突的时候了。渐渐地各国都发现半法西斯蒂的反动政局。最近意大利的法西斯蒂主义，已经超过意大利的国家范围。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模范，各国资产阶级都想学了。治者阶级的畏惧布尔希维主义，使他们愿意接受法西斯蒂主义的教训。因此，法国资产阶级之中，反对国会制度的空气也增长起来；其他各国法西斯蒂的组织，也发现出来。

最近一年半，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更加受摧残，他的政治地位更加恶化，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征调全力以反对“破坏”劳工运动的布尔希维主义，即此暴露那些所谓“超阶级”的政府机关之阶级性，凡此一切都是毫无疑问的。这种现象不仅有消极的意义，却还有积极的意义呢。

（三）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

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压迫，同时和经济压迫并行。资产阶级的进攻，原本是以恶化劳动条件而减轻生产成本为目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经济愈益困难，美国对于世界经济的地位愈益增高，欧洲资产阶级也就愈益向工人阶级进攻，竭力剥削工人以减轻生产的成本。

这种进攻怎样进行的呢？有好几种方法。减少工人实际工资。英国现时社会斗争的激烈，很明显的是根据于减少实际工资的原因而来的——尤其是减少矿工的工资。这种进攻差不多各国都有。同时，便是增加工作时间。现在真正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国家和企业，已经非常之少非常之少的了。这一进攻，对于资产阶级有很好的结果，

尤其是在德国。它的“成绩”实在是大，所以英国资产阶级赶紧正式提出工作问题。暂时英国还没有十分充足的力量解决延长工时的问题，它便提议召集国际会议，说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便须大家一律。如果国际会议上大家都主张各仍原状，那么，英国资产阶级便有“理由”反对自己的工人了；如果真能一律，英国资产阶级也可沾不少光。这里我们看见很别致的英国资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事实上是因为英国工人努力奋斗，力持已得的减少工作时间。德国工资的低廉和工时的延长，几年以来对于欧洲工人运动是很大的压迫。而《道威斯计划》的进行，得到第二国际和黄色职工国际的赞助，更加使德国工时延长，自然要影响到各国。

再则，增时、减资之外，同时又向社会保险进攻……资本家所纳社会保险费减少，失业工人的补助费也减少……旧时的租税政策更加厉行——专口国家支出及战后善后经费，使最贫苦的人民担负。租税在最近几年来加重了不少，不但战败国是如此，就是战胜国也是如此：英国、法国等便是实证。

此外，资本家还用种种残酷手段，强迫工人增高生产力。

再加上，最近都市住宅租费激剧地昂贵，煤气、电灯、交通等费也再三再四地加价。我们自然得到一个总结论：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继续低落趋势异常明显。如果以工人经济地位的恶化程度做标准，来分判各国，那么，意大利居第一位，波兰居第二位，德国居第三位……德国工人的生活程度，对于英国资产阶级是一种理想制度，他们梦想着要使英国无产阶级生活“德国化”。各国工人经济地位的相互关系，再没有比现在明显的了。英国工人知道反对《道威斯计划》，就是因为他们眼看着这一计划应用在德国之后，立刻便反映到英国工人的经济地位上来。

（四）经济上剥削工人的新形式

现在资产阶级想种种方法组织一部分工人，仿佛是“劳资互助”的机关，使工人阶级一致的经济斗争没有可能。当然，这种事业表面上是慈善性质，仿佛是资本家对贫苦工人的仁爱；但是，这种机关在社会政治上的意义是异常之明显的。这种制度最发达的地方，便是美国。美国各业大生产的企业，或几种产业联合的公司里，资本家替工人组织“互助基金会”束缚工人的行动。欧洲方面，在法国亦有这种欺蒙工人的机关。一九二五年，法国共有一百七十六个“报赏储蓄会”——他们分设的小机关的总数有一万一千二百个，被组织的人数有一百二十一万。这些报赏储蓄会在去年上半年，总共发出一万六千万法郎的种种抚恤金。抚恤金之中包含儿童养育费、哺儿补助费、养病费等等。名义上有资格取得这些抚恤金的，总共不满法国工人职员中的百分之十；而实际上得到这些抚恤金的，尤其是这百分之十以内的极少数。可是这种机关

对于工人的统一斗争大有影响。这些机关使一部分工人和企业的关系亲密起来，因为这些抚恤金的支配完全在资本家手里。只有“安分的好工人”能够得到。这里面的意思，可以不必详说了。

这种现象，应当十分注意。因为它对于全体工人阶级奋斗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五）阶级妥协的新形式

资本家向工人进攻，造成剥削工人的新机关之外，更发明了一种破坏工会的方法——要使小部分工人利于企业的发达，他们便着手组织种种阶级妥协的新形式。美国方面这种工作做得最起劲。美国现在是阶级妥协的“模范国”。大家知道，美国的重工业（煤铁等）里，甚至于极妥协的刚伯思式工会都不能存在。资本家自己组织了工会（所谓“公司工会”——Company Union）。这些工会的性质各不相同。有些企业里工人选举委员会，资本家方面也派同样数量的代表加入。有些企业里，则实行“二院制”——工人选举工会的“下院”，资本家派定工会的“上院”。这些组织都有所谓互助机关，并且有自己的机关报，大半都是称颂资本家的“深恩厚德”，宣传资本家怎样仁爱、怎样体恤工人等等。

现在的美国，本已是种种新现象的舞台，欧洲人也从事模仿了。这些新现象是：工会和企业家订立协定，规定增高生产力的办法，工会要负这种责任。第一次实行这种协定的是“白蒂谟、沃海、朴朗铁路”（Laltimore Ohayo-plon），所以叫做“BOP办法”。工会既然负了这种责任，自然变成“包头”——工人懒惰便唯它是问；工会的名称等于厂主的鞭笞了。

资本家为求成效起见，常常召集劳、资混合的“生产会议”。工会代表自然要完全服从厂主意旨，用种种方法逼迫工人多做工作，以增高生产力，改革组织分配工作的方法，赞助严酷的管理工人法之实行。

再则，在美国还有所谓工人银行的狂热。但是这银行不过名称叫做“工人的”罢了，其中资本家总有大部分的股子，因此，他们在银行董事会里便有极大的权势。工人银行之下往往还有种种机关和企业，这些“工人企业”里只招收无组织的工人做工。这种办法不但是得了工会领袖的同意，并且是他们故意规定的。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知道，这种工人银行是些什么东西，它们会进行些什么“工人政策”！

这还不算。这些银行当然和美国大银行界要有密切的关系，完全执行资本家的政策，做资本主义的小尾巴。工会所有的基金，存放在这些银行里，变成了种种式式的股票，这样便算是美国经济的“社会化”。可是，工人要罢工反抗资本家时，这些“工

会基金”便提不动了。

工人银行的唯一“优点”，便是使工会领袖完全脱离群众的监督。工会会员只有小股东的资格——每月存进钱去罢了。工人银行等类的机关没有成立的时候，工会领袖至少还有些受群众的监督，因为工会事务的进行，要靠会员的会费。如今，工会既有独立的资本，工人银行也做财政界投机事业而有利又赚，工会领袖便可以任所欲为，要实行什么政策便实行什么政策了。工人银行及其他工会的财政机关使工会领袖——所谓“职工官僚”——完全脱离会员群众的监督，工人银行的意义便在于此。

美国还有一种现象，便是工人购买各种工业工厂的股票。美国的工人股票现在已经很多；工人股东愈多，他们和资本家的关系也愈紧切。这是资本家压迫工人的阶级斗争之最轻巧、聪明的方法，可以分裂工人阶级内部，使成为有特权的工人与没有特权的工人的两部分，挑拨他们的互斗，减少工人阶级的斗争力，使少数工人贵族利于公司的赚钱可以得到分红，而不肯积极一致地斗争；驱使这些劳工贵族不但自己心甘情愿地，维持资本主义，并且做资本家走狗，帮着压迫大多数工人，以实行所谓“增高劳动的生产力”之政策。

现在我们不能很详细地来讨论，这种制度当然是非常之可注意，而且值得郑重地研究的。注意这一问题的人，可以看福斯德（Foster）的《美国职工运动的新趋势》和陆宾斯坦（Rubinshten）的《改良主义之社会的根源》。现在所最重要的，便是这种倾向已经超出了美国的范围。德国方面开始在工会运动中发现美国式的阶级妥协。德国的改良派想在哲学上、理论上建立这种美国式运动的基础。德国最近有一种极通行、极时髦的新名词：“经济的民主主义”。经济的民主主义谈了已经好几年了；但越谈得多，便越没有劲。所谓经济的民主主义，当然便是资本与劳动的“平等”，而且政治经济的权力必须仍旧保存在资产阶级手里。

德国铁厂工会的机关报，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六登了一篇论文，题作《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兴高彩烈地庆祝工人银行的组织，说道：“这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下解放出来。”对于“BOP制度”（公司工会迫使工人多做工的制度），这一机关报也说：“从纯粹工会运动的观点看来，不能看轻了这一制度的优点。各地方的工会分会里，开会时工人聚得多了。工会生活有了内容，发达到了极点（！）。当然，这种丰富的思想，经常地研究改良生产之新方法，在企业家方面，实在是连城之璧。工人因此也得到利益，因为照这种公司工会的条约，资本家应当将赢利分给工人。”这些称颂美国资本家的社会民主党，以前曾经骂过苏联工会，说它们帮助苏维埃经济的发展，说它们关心于工人国家企业和劳动之生产力的增长，如今却声颂美国工会关心于生产力的发达和资本家的赚钱，并且提议要在德国实行！欧洲职工运动里这种“新思想”的

发现，实在是很有可注意的。我且引几个例子，使大家参考。茨文德（Karl Zwint）著了一部《职工运动的社会学》，其中有一个最有趣的意见，说“应当使主要的经济动力——资本和劳动，实行处于平等的地位，如今却是资本占优势。现代工会运动的理论和实际，都应当注全力于争求劳动的平等价值。”这位“社会学家”要证明：除此以外，没有工会运动发展的道路。他竟说出这样一个结论：“不应当忘记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这一制度崩坏，工人阶级也要崩坏。这两种经济动力之间，不应当有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想，我现在用不着来反驳这位“大社会学家”。我们不过要这几个实例，证明有人想在德国把刚伯思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这是非常之完整的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新方法——它的哲学和实践，都是想收买少部分工人，而使工人阶级放弃自己直接的、具体的重要责任。反对这种“新思想和新方法”，是各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重要工作。

（六）殖民地上职工运动之迅速发展

最近一年半来的特别现象之中，可注意的还有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上职工运动的迅速发展。最厉害的便是中国无产阶级。中国的革命开始于一九一一年（辛亥），可是，直到一九二五年才有伟大的规模和特殊的性质。这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及其职工运动上了历史的舞台。中国工会的发生，不过在几年以前，一直处于严重的压迫之下。对于劳工运动领袖的死刑，不久以前还算是中国社会里很平常的事。然而新起的中国劳工运动竟能在最短期间建设了自己的组织，巩固了自己的工会，奋起反抗英、日帝国主义，就此使中国社会里各种势力的相互关系大大地改变，而民族解放运动得以前进。中国民族运动里，因上海、香港、天津等处的罢工，而渗入了无产阶级的动力。这些罢工，明显地表示中国无产阶级是最彻底、最积极的反帝国主义力量。中国无产阶级的运动，不但对于工人阶级的仇敌出于意料之外，就是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及国民革命的朋友，也有些出乎意料之外。很少有人预料中国无产阶级已经有这么大的革命势力。

中国无产阶级的运动，使民族解放运动进了一个新阶段；中国已经有很有力的职工运动。当然，这一运动还是处于很艰苦困难的环境之中。中国人口很多，比较起来，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还不十分大。并且，大部分中国地方，还在反动的军阀手里。但是，在所有的工业区里，已经有较巩固的工会，它们一面努力奋斗，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一面力争待遇及生活的改善，并且改良自己的组织。

中国工会，在几年前不过有会员几万人，现在已经将近百万了。而且国民军或其他不压迫工人的政权之下，工会的发达异常之迅速。譬如，天津为国民军所有，不过

几个月，而天津工会的会员已经发达到三四万，天津工会已经有自己的机关报。别的地方亦是如此。中国工人反对帝国主义的方法，简直是劳工运动史上的新发明。香港工人罢工之后，十万工人都离开香港而归广州，使英帝国主义受极严重的打击。

中国的劳工运动，确是很幼稚，可是它既迅速发展，又已经感觉着自己的力量，对于世界职工运动实在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应当知道，中国工人五卅时期的斗争，是十月革命后世界史上第一等的重大事变。它对于帝国主义者有严重的打击。这使世界革命的军队，顿时感觉到生力军的发现，所以应当十分注意它。

别的殖民地里，也可以看见劳工运动的积极起来。最近印度的职工运动和大罢工的发现，也使这“英国王冕之珠”（印度）里起了很大的变化。北非洲突尼斯地方，工人力争革命工会组织之自由，法国政府把他们完全摧残了。在叙利亚虽然有暴动，虽然暴动渐次失败，但是居然也发现工会的形成。马来群岛方面，工人还是继续着奋斗，力争保存工会，扩大工会的组织。

如果没有苏联通信社和报纸，英国及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新闻政策，必完全隐蔽如中国五卅等的运动，而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压服中国民众。现在苏联的舆论和各国共产党报纸，才勉强打破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的舆论封锁。但是各国共产党的宣传还是不够，以后应当更加注意。尤其是资产阶级享有殖民地的国家里的共产党，应当分外地努力，赞助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及职工运动。

（七）国际的社会改良派与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各国的共产党和革命派的工会，努力地赞助中国五卅斗争；国际的社会改良派，却在这种时期完全暴露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尾巴。上海的罢工工人，曾经致函亚摩斯德丹黄色职工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请他们援助。赤色职工国际努力赞助（募款接济，派代表团到上海）^①，并且写信给黄色职工国际，邀他们共同进行援助事宜。但是黄色职工国际竟置之不理。几星期之后，黄色职工国际的会报上，发现了一段稀奇古怪的议决案：“共产国际及赤色职工国际所提议，邀请本会共同设法援助中国工人案，因种种原因碍难通过。”究竟是什么样的“种种原因”，这些改良派并没有解释。我就不懂得，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援助！大概只有一个理由，便是“不愿意”。黄色职工国际关于中国工会要求的议决案（去年六月底的）说：“须再函问他（谁呢？）所知道的中国工会，愿否接受帮助，能否接受帮助，如帮助则须多

^① 按：此有去年七月间《新》、《申》各报两次所载《俄国商业会捐助罢工工人五万元》的启事。商业会便是 Trade unions 的误译，其实是赤色工会的援助。

少。”这一答复实在是古文经典：中国工人已在要求帮助，急电通知世界工人，而这些改良派却还在疑虑——莫非用不着帮助罢！这就是他们老实不愿意的证据。

去年年底印度纱厂罢工，黄色职工国际通电所属工会，仿佛是叫他们援助，但是他说明所以可以表同情于殖民地工人的理由道：“现时已经可以希望印度工会运动的发展，快能达到加入国际职工运动的平等资格。”

黄色职工国际对待中国及印度职工运动的态度之所以不同，其原因非常简单。中国职工运动走上了革命斗争的道路，而印度则不然。印度工会首领都是所谓温和派。黄色职工国际希望拉拢印度的工贼派，仿佛可以重振已隳的声威。所以他对于中国竟敢如此蔑视。总之，什么地方有革命起来，什么地方便不见黄色职工国际的踪影。

然而，黄色职工国际所属的工会之中，也有几个工会对于中国事变发言的。最有趣味的是德国工会总同盟，它的传单里说：“我们希望中国的流血事件，能使在中国的欧洲文明代表天良发现，负起他们道义上的责任，而去和中国无产阶级商量，设法消灭太苦的劳动条件，因为那种情形实在是文化之耻。”这种态度，哀怨欧洲文明的代表天良发现，指出帝国主义者的道义上的责任，真正可以算得“悲天悯人，仁者之言”！

还可以举出许多实例来，社会民主党和改良派的工会领袖大致都是说，中国应当实行“经济上的现代化”（殖民地化么？）。甚至于他们不攻击帝国主义的压迫，却说是“共产党的阴谋，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赤化”（法国的茹沃）。中国工人要求援助，而改良派是这样答复！黄色职工国际是这样对付中国工会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至于叙利亚及摩洛哥的战争，黄色职工国际对于这些事更是置之不理。何以默然绝无声息呢？瑞士的社会民主党也曾这样发问过。*Berner Tagwacht* 报答复道：“因为黄色职工国际副委员长茹沃，不愿意人家多谈起摩洛哥及叙利亚的战争。”

但是，改良派亦不是永久这样消极的。他们决不限于通过几个“天良发现”的议决案。等到有反对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必要时，他们也会“积极”起来——去保护他们“文明的祖国”，“抵御落后的野蛮民族”。黄色职工国际副委员长茹沃，对于压迫突尼斯革命的职工运动，便有很大的功绩。突尼斯左派的职工会议，正在茹沃大人到过突尼斯之后，才被捣毁的。职工会议的领袖因这位大人的告发而被逮捕，被诬为阴谋暴动，还有许多驱逐出境。茹沃的功绩实在是明显的。帝国主义者压迫突尼斯的革命工会，不但得了法国改良派首领的“道义上的”赞助，并且有他们行动上的后援。

现在英国的劳动党也是异常积极地破坏印度工会的阶级斗争。英国劳动党提议在印度组织所谓费边社——社会和平主义的团体。许多劳动党领袖都到了印度，专门去宣传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以及一切左倾的工会运动。总之，每次革命工会运动勃兴

起来的时候，改良派便来帮助自己的资产阶级破坏阶级斗争，但是，需要帮助殖民地劳动者反抗剥削者的时候，他们便消极了。殖民地的工人运动，只有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能诚意竭力地援助。

（八）改良派工会中左派之形成

现时这一期的世界职工运动中最特殊的现象，便是改良派工会内部发现新的对抗派。以前的对抗派，都是同情于共产党而受它的政治指导的。现在一切改良派工会内部，都有共产派的影响。共产国际屡次决定要在改良派工会之中工作，所以各国工会里渐渐都发现少数工会会员倾向共产主义，有些已有组织，有些还没有。可是，现在除这种极左派之外，自然而然又发生了一派左派，站在极右与极左两派之间。这一新反抗派，到处都有，但是它在思想上并非一致的，并没有一致的政纲和策略；现在这一派势力蔓延各国，而在英国尤其有势力。

英国工人运动，现在正在革命化的过程中。这完全因为英国的经济恐慌，英国国外贸易的缩小和美国资本的竞争。客观的经济状况，使英国的经济势力范围日益缩减，因此，资本家对工人严重地进攻，群众之中自然发生不满意的反抗情绪，而在工人领袖里便有这种反映。

不满意于右派政策的左派，以前亦是有的。这种左派的发现，最初是在法兵占领鲁尔之后，那时黄色职工国际简直绝对地沉默，因此引起群众的不满意，甚至于黄色职工国际总会里都发生这种分子，英国工会代表便是左倾的。

英国工会代表的新政策使各国工会里都有许多分子起来响应，从此便发现新的左派。我们可以称这些反抗黄色首领的一切派别为对抗派。

现时改良派工会内部的对抗派的特性，约有下列几点：（1）明了亚摩斯德丹黄色职工国际的旧政策之无用；（2）愿意和苏联工会实行建立统一战线；（3）力求保存全国职工运动的统一；（4）号召国际职工运动统一的口号；（5）不满意于与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6）愿意建立左派的联盟；（7）反对阶级妥协。这是一个大概，各国左派都多少有这些主张，成分和分配却不尽相同。虽然左派分子还极散乱而无组织，但是在国际职工运动里却已有很严重的力量。一方面，有英国职工总会里的多数；别方面，各国工会里都有同情于这种政纲的“统一派”。这一派人现在在各国已都有自己的机关报；而且第二国际及黄色职工国际的分子有一部分移转到这一派里来，参加机关报的工作，这些机关报便成了在第二国际及黄色职工国际内部形成新派别的中心。譬如英国有《工会统一报》，比利时、荷兰、德国都有《统一报》。法国、奥国、瑞士、捷克斯拉夫的改良派工会里亦已发生左派，当然也在思想上渐渐形成新的对抗派。对抗派

最主要的特质和他们机关报的名称，都已明白表示：这一派的中心思想是国内及国际的职工运动统一。

我们对于这种对抗派运动的态度，应当怎样呢？当然，这对抗派还没有很清楚地形成。左派首领的言论态度里，还有许多旧时代的流毒，和我们的思想是不一致的。然而，不论他们思想上还不清楚，组织上也还没有形成，共产派始终没有敌视他们的根据。我们应当赞助他们的工作，尽力扩大他们的影响，吸收更多的群众，来赞助统一战线及工会统一的主张。改良派的政治组织及经济组织内部一切反对改良派政策的派别，我们都应当赞助的。我们以前亦许有些错误，对于这些派别要求他们做共产派的事。我们其实应该和他们联盟，共同进行各种时机里具体的、可能的行动计划。这种行动计划里，即使没有我们的口号（如无产阶级独裁制，苏维埃共和国，等等），我们也可以和他们在行动上联盟。这是我们的同盟军。如果我们不实行联盟，那么，一切统一战线的策略都是空话。

这些各国旧工会里的对抗派，他们自己的思想固然内部还有许多差别，我们对于他们的影响也是各不相同的。有些国里，我们一派自己有单独的组织，而在行动上和这些对抗派分子合作，他们并不和我们组织在一起。英国便是一个例子。英国共产派的工会另外有“少数工会运动”的组织，正式加入赤色职工国际；这“少数工会运动总会”和对抗派极有联络。至于瑞士便不同——那里共产派、社会民主党左派及无党的工人，大家共同组织了左派联盟。我们和这对抗派的相互关系，可以有种种形式，不过最重要的观点是：共产派应以全力建立和这些分子的最密切的斗争联盟，主张左倾的工人统一战线及国内国际职工运动的统一。

（九）苏联工会对各国工人影响之增长

这些对抗派大半都主张承认苏联工会，与苏联工人建立联合战线。这是因为大多数工会群众对于苏联国家的兴趣和同情日益增长：一方面，苏联经济的改造急速进行；别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生活状况日益恶化。因此，各国工人都纷纷派代表团到苏联参观。只有英国工会正式地遣派了代表团，其余各国却是工人群众非正式地遣派来的——因为工会首领、黄色职工国际派，正在努力反对西方工人和苏联接近呢。这是可以注意的一点。

其次，各国工人代表都追根到底地问：俄国无产阶级怎样度过前几年国内战争的难关。尤其注意苏联的经济和工会情形。他们在俄国略略居住这么半个月到两三个月，都有些明白：何以必须无产阶级独裁制，何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破产。我这里不必引各国工人代表团参观后的言论，他们对于俄国工人状况的报告，对于苏维埃制度的观

察，对于苏联经济、工会、文化事业等的批评。……我却不能不说一说社会民主党的阴谋破坏工人代表团参观，他们对于参观后的报告一概都加以谩骂。大家都知道，社会民主党对于代表团参观苏联一事，用种种卑劣手段怠工，后来竟提出条件来：“我们到俄国，一定要让我们带自己所愿意要的翻译！”这些翻译，他们故意要挑选白党或反动的孟希维克党。至于美国刚伯思继任的工贼首领格林，他看见英国工人自己组织委员会，筹备派代表到苏联去参观，他便印发了一张无耻的传单，说道：“派遣代表团到俄国去，对于英国工人及一般国民是无益而有害的。这件事不过对于共产党有益罢了——他们只想把持政权；代表团去了，无非是帮助共产党巩固政权，使他们有机会向国外宣传。无论怎样，大家都不要捐助赴俄代表团的川资啊！”

资产阶级及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看见工人代表团的报告，都愤恨得异常，抓住一两句说苏联不好的话，就大骂特骂。他们暗中派人以极大的款项购买赴俄的工人，使他们说苏联的坏话。可是就是被收买的人，如一个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虽然乱说“俄国工人没有行动自由”，但是也不得不说：“俄国共产党竭力地改善工人生活状况，想替工人阶级造福，不像德国的所谓共产党党员，完全是混蛋。”足见这些工人头脑里始终还有两种观念在那里交战：一是社会民主党的谣传所造成的错觉，一是真正佩服俄国革命的精神。

从此可见，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共产派建立统一的工人战线之道路，有经过莫斯科的必要。他们不相信本国的共产党，尤其是极左的（如德国的路脱菲塞尔女士）。各国工人经过莫斯科而与共产党接近，却是比较容易的事。这就是俄国革命对于他们影响增大的结果。

（十）统一职工运动之英俄委员会

资本主义各国工人里的这种心理，便在英、俄委员会之成立上表现出来。英、俄两国工会之联席委员会，以筹备国际工会的统一为宗旨，当然是国际职工运动发展中的一步骤。这一委员会的发生经过许多波折。英国职工运动中的反动分子，尤其是第二国际及黄色职工国际方面，屡次反对这一统一运动。

英国工会代表团到过苏联之后（一九二四年年底），各国社会民主党对于英国代表团和苏联工会大造其谣言。在莫斯科所签定的预约，遇见极大的反感，因为改良派知道这种统一运动的发展，足以对于他们给很大的打击，使他们不能继续分裂工会而自保权位。事实上呢，英俄联合委员会的理由是非常之充足的：苏联工会是赤色职工国际的基础和最主要的分子；英国工会又是黄色职工国际的最重要分子之一；这两方面的联席委员会，当然能开始实际地研究国际工会统一的问题。双方如能讨论出一反对

资本进攻的共同政纲，自然黄、赤两国际也应当从事于联合一致的战斗。正因为这样，各国社会民主党大起恐慌，用造谣诬蔑的手段来破坏英俄委员会。

英国工会代表团的报告书公布之后，德国黄色工会首领说这报告书是“无耻的书”；英俄委员会的宣言，也被改良派机关报（*Forverts*）称为“可耻的文件”。改良派这种态度，正足以证明他们的惊惶失措。他们一直希望英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即在斯加波洛开的）不批准英俄工会的协定（预约），说这种预约是非正式的，是不得多数工人同意的；可是，代表大会竟通过了。改良派便不能不改变方法，从事于离间英俄委员会中的英国和俄国的代表。

然而英俄委员会的成立，引起大多数工人群众的积极。许多工人团体（尤其是挪威、荷兰等），都愿意加入这一委员会，即使形式上不派代表，至少精神上表示赞助。各国工人之中都发生统一派，以赞助英俄委员会为中心主张。这可以证明英俄委员会的组织，适合于时代的要求。群众之中，深信现时应从统一战线的宣传进于实行了。固然，英俄委员会还只占国际有组织工人的少数。然而，英俄两国工会已经包含一千三百万工人，如果再加上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以及各国工会中赞成统一运动的分子，事实上已经有了世界职工运动的多数。

何以英国工会首先能和苏联联合呢？为什么不是德国呢？难道德国工人的状况，比英国好么？不然的。这是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黄色工会的首领竭力强迫工人的运动倾向美国主义；而英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上的势力没有这样根深蒂固，工会的机关也不能不注意工人群众的情绪，英国工会比德国地较与群众接近。因此，英国工会里发生左派领袖和苏联接近，而德国工会却开始美国化。

（十一）黄色职工国际内部各派的斗争

英俄统一委员会之成立，各国工人代表团之游俄，改良派工会内部对抗派情绪的激昂和增长，工人阶级状况之恶化和新出路的寻求，凡此种种，都使黄色职工国际及其所属工会里，发现各派的分化和激剧的斗争。黄色职工国际内部发现许多争辩、派别……虽然表面上这些辩论各方面还是很客气、很小心，但是内部确实已经发生危机。

这种分化里的争执问题，大概有下列几点：（1）对于苏联工会的态度；（2）对于国际联盟及其劳动局的态度；（3）与资产阶级联合战线，还是与共产派联合战线；（4）反对资本进攻的方法和改善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的方法；（5）对于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态度。这些问题都使黄色职工国际里的人要想一想自己的政策，要求一个正确的答案。工人群众不能满意黄色工会首领之沉默政策了。黄色职工国际的首领还尽在希望国际联盟，希望各国政府所召集的会议，仿佛这些东西里能变出什么把戏来似的。黄色国

际曾经赞助《道威斯计划》，现在又在称颂洛迦诺会议：“洛迦诺会议的成就，这是新世界改造的第一步。这是建立‘欧洲合众国’的开始。工人运动所争的目的，本在于新时代的改造，如今这一时代由洛迦诺开始了……”这种歌颂白里昂、张伯伦政策的态度，最足以表现黄色首领的心理了。黄色首领特别对于这种黑暗现象表示乐观，实在是故意蒙蔽事实，滑过工人阶级紧切重要的责任。

我这里也不来详细说黄色国际内诸首领的争执、讨论、倾轧……我只是要指出一件事实：黄色职工国际的秘书乌德格斯脱曾经恐吓会长柏尔塞，说如果会长还要继续左倾政策，他便要宣告和会长脱离一切关系。这已是何等异常的现象！

我们并不注意高级人员中的倾轧、联络、辩论等；我们所注意的是群众里的心理。如果我们从上面内部冲突再往下看，我们便看见各国大多数工人都赞成工会运动的统一，赞成和苏联工会接近。这种情绪不能完全地表现出来，只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和黄色工会的机关抑遏住了，他们竭力地破坏统一运动。

（十二）美国劳动总同盟影响于欧洲改良派工会

欧洲资本主义衰弱，因而工人群众左倾，接近苏联；同时，美国资本主义的势力侵入欧洲，因而美国劳动总同盟对于欧洲改良派的影响也日益增长。改良派的传统政策，本是反映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对势力。最近几年美国资本的势力横行于欧洲，欧洲改良派工会首领便十分注意于美国工会运动的主义（工贼主义）。欧洲工人群众激剧的左倾，共产党的势力日益增高，改良派便想在美国工会运动里去找新的方法和宣传，来巩固自己的权位。从前社会民主党领袖不大看得起美国劳动总同盟的。这一时期已经过去。社会民主党及一切改良派的性质，本在于趋向日远于社会主义原则的途程；如今他竟公开地接近反动的美国劳动总同盟，完全抛弃社会主义。改良派可谓第二次发现新大陆的美洲，他们对于美国主义的崇拜和英国工人左倾的趋势，适成正比例——尤其在最近两年以来。英国工人愈左倾，黄色国际力量愈弱，改良派首领便立刻开始接近美国，想搬运美国主义到欧洲来。美国劳动总同盟在巴黎和纽约的时候非常之出力的，刚伯思是国际联盟劳工委员会的委员长。他亦是黄色职工国际的一个发起人。后来他认为黄色国际还是太“革命和左倾”，因而退出，当时虽然黄色首领苦苦地劝谏刚伯思，自己辩护说不是革命党不是左派，说黄色国际议决案上的社会主义并非可怕的社会主义，而且并不强迫加入黄色国际的工会都去实行，然而刚伯思始终是退出了。刚伯思的退出欧洲，当然和美国政府的声言不管欧洲，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如今美国的职工官僚重新又注意起欧洲的事来，对于黄色领袖的不幸，表示深切的同情，亦是因为《道威斯计划》的关系。黄色职工国际现在拼命地拉拢美国劳动总同盟，

特别派了代表团到美国去，然而实际上至今还没有结果，不过美国工会首领已经肯表同情于改良派罢了。改良派的注意美国，同时也就是拒绝和苏联接近的借口。去年十二月，黄色国际总会开会时，霍詹斯说：美国对于全世界经济的势力之增长，使美国劳动总同盟之加入黄色职工国际有很重大的意义，这种意义比俄国人承认黄色国际的章程要大得多。其他的黄色右派首领，也屡次申说这一意思，答应美国工会加入黄色国际之后，可以享受特别优待的权利，许多政治上、原则上的国际决定，可以让美国人自由挑选。

改良派这种海外求救兵的政策，只想美国劳动总同盟来做仲裁人的政策，也可以证明黄色改良派在欧洲势力的衰落。

（十三）黄色职工国际与法西斯蒂派

最近一半年以来，黄色的改良派在对付法西斯蒂及政治反动的问题上，完全暴露自己的破产。改良派曾经大吹而特吹，说他们的民主主义方法，足以战胜法西斯蒂主义。可是，实际上他们的本领真正大，竟能想尽方法适应那法西斯蒂主义。意大利劳动总同盟领袖的政策非常之有趣！他们在一九二〇年工人运动高潮的时候，甚至于加入赤色职工国际，而现在法西斯蒂全盛时期，他们又归附于慕沙里尼的卵翼之下了。

意大利改良派的软弱真正到了极点，他们甚至于对于自己组织的崩坏，都一无法想。他们枉然力求适应，枉然为了讨好于慕沙里尼而反对共产党。他们帮同了法西斯蒂镇压革命的工人群众之后，法西斯蒂突然宣布只有法西斯蒂（工贼的）工会可以存在，一切改良派的工会都被破坏。那时，改良派里便发生三派：一派主张继续适应政策；别一派主张决一死战而退；三派主张将总会迁移到国外去。没有一派真正有主张、有策略，能确定有计划、有系统的坚决的斗争，以争工会的存在。

许多改良派，从达腊公起，大半都适应了法西斯蒂而改变自己的面目。印刷工会的秘书白鲁诺简直完全投降法西斯蒂党，做法党所派的工会管理员，他还申明说投降法西斯蒂党的理由：“印刷工人的互助事业，经过几十年才造成现在的制度，如果我不这样做，这些事业完全要被毁灭。所以为了保存这些事业起见，我不妨和可敬的慕沙里尼共事。”改良派不但适应法西斯蒂，他们自己也真有决心反对共产派和一切左倾分子。当封闭工会最厉害的时候，改良派自己取消各地的劳动会，取消这些当地工人群众的建议机关和积聚自己力量的组织，厉行开除工会里的共产派。足见对于黄色职工国际派，最重要的敌人不是法西斯蒂党，却是共产党——其实一切共产派的敌人，都已经承认共产党反抗法西斯蒂独裁制是最急激进、最彻底的。

不但意大利的改良派政策上、精神上完全破产。就是黄色职工国际也是如此。意

大利政府宣布法西斯蒂包办工会之后，共产国际及赤色职工国际因为意大利这些被封的工会大半属于黄色职工国际，所以写信给它，提议双方共同联合斗争，保护意大利的工会。但是，黄色国际置之不理。它自己把这问题提到国际联盟的劳动局去，要求在最近一次国际会议上讨论意大利职工组织存在问题。国际联盟给它一个答复，说是这一问题等国际劳动局一九二七年的例会上去讨论。就此算了！

再则，黄色国际还通过一个议决案，说慕沙里尼应当记得《巴黎和约》里有一个第十三章，保证职工组织的自由，这是“签约各国的列强所承认的。”这种议决案，只是证明《巴黎和约》除是强盗分脏的条约外，还是“保障劳工的国际宪章”，不过博得慕沙里尼的一粲罢了。

黄色职工国际和意大利黄色工会，这样便算是反对法西斯蒂压迫，为保护自己组织而斗争的了！还用得着再多说它们精神上、政策上的堕落吗？如此自愿地停止为自由而斗争，抛弃工人阶级的结社自由，还能有再无耻些的投降么？国际职工运动的历史里，真找不着再耻辱的污点了。

（十四）苏联总工会和黄色职工国际

苏联总工会和黄色职工国际之间的关系，说起来话长得很哩！最早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和黄色国际的领袖简直否认苏联工会的存在；改良派那时总是说苏联之中没有工会存在，而“只有一种政府机关名为工会”，所以黄色职工国际“不承认”苏联的工会。这一时期恰好和列强不承认俄国的时期相同，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事。等到列强渐渐地不能不承认苏俄，苏俄在国际政治上的势力也日益增长，黄色职工国际便不能不讨论对于苏联工会的态度和关系了。

这问题在一九二四年黄色国际的维也纳会议上，第一次由英国工人提出，此后每次国际会议或总会执行委员会议，都考察这一问题。苏联总工会和黄色职工国际的关系，并非纯粹的俄国问题，而是黄色国际与各国赤色工会间总关系的问题。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对于工会统一的问题，向来不沾滞于形式上的关系；赤色职工国际的一部分尽管可以与黄色国际磋商，只要对于统一运动的前途有益，赤色国际决不拘于形式上的统属和管理问题。

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及赤色职工国际第三次大会所决定的口号是合并赤色、黄色两职工国际，召集世界工会的统一大会，以所属人数的多寡派出代表……这一口号遇着了社会民主党强烈地反对。它们故意说这里没有黄色、赤色两派工会的国际关系问题，却只有苏联总工会和黄色职工国际之间的关系问题。黄色职工国际对于两国际合并的问题，提出一个对案，要求苏联总工会加入黄色职工国际。社会民主党和黄色工

会的机关报，两年以来天天地说这种武断的话，仿佛只要苏联工会加入黄色国际，工会统一运动便告成功。同时，它们对于美国工会事事都可以让步，主义上、政治上的问题都可以容许美国工会特别优待，而对于苏联工会却一味地压迫，要它们反对苏维埃制度，才有加入黄色国际的资格。

改良派时时总想推开工会统一的问题。所以它们故意提出这种对案。不但如此，它们的机关报上，还放出许多谣言，猜测苏联工会和赤色国际提议召集世界工会全体大会之用心。这些谣言之中，最普遍的是：（1）苏联工会想退出赤色国际；（2）苏联工会要避免各国革命工会对于它们的束缚；（3）苏联工会想脱离苏联共产党的影响；（4）苏联工会有新的倾向，仿佛是欧化了……改良派的谣言，已经造了一年半了，但是稍微明白一点的人决不相信这些梦话。苏联工会原本是赤色国际的发起人；苏联工会首先提议革命工会和一切工会的革命分子之团结。苏联工会的大会上，屡次承认苏联共产党之政治指导。最近，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大会更加使党与工会的关系密切。

改良派自己对于这些谣言，难道真的认真么？造这些谣言的有两种人：一种是糊涂的真心话，一种是故意自己说假话哄人。一方面是不明真相，别方面是要手段。为着不愿答复世界工会统一大会的提案起见，为着要避免统一的革命的国际总工会之组成起见，这些说假话人，故意暗示劝告苏联工会，等到苏联工会不听他们的鬼话的时候，他们仿佛又觉得“奇怪”得不得了。我们大家知道，俄国总工会是赤色职工国际不可分的一部分，他们要打破一切障碍，达到成立真正的完全包容的世界总工会之目的。如今苏联总工会愿意代替赤色国际和黄色国际开谈判，仅仅因为我们不愿意因形式上的问题而破裂，不愿意为着保存自己的面子起见，而停止各国工人相接近的工作——这仅仅因为黄色国际拒绝和赤色国际谈判。可是，实际上苏联总工会所进行的政策就是共产国际和赤色国际的政策。关于这一点，不论是共产国际之友或是共产国际之敌都应当知道的。至于黄色国际的右派竭力地拒绝谈判，那是因为它们宁可和资产阶级联合战线以反对革命，却不肯和革命派联合战线。

（十五）黄色职工国际与赤色职工国际

黄色职工国际处处都自己标榜是世界唯一的国际职工组织。但是，它自己的报告书否认了这些夸大的话。黄色职工国际中共有二十二国的工会，其中只有三国在欧洲以外（巴勒斯登、加拿大及南非洲），而且这三国的组织只有十五万会员。

黄色职工国际并且也没有资格自称为全欧洲职工总会，因为苏联工会全体、捷克斯拉夫工会的四分之一、法国工会的二分之一，已属于赤色职工国际。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布加利亚、希腊的工会，仅仅因为政治和警察的压迫，所以没有公开地加入

赤色职工国际。挪威和芬兰的工会站在两个国际之外，可是这两国的工会赞成英俄联合委员会，赞成赤色国际的工会统一政策。并且在黄色国际所属各国工会的内部，都有少数革命派分子，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即使不是形式上加入，至少有思想上、主义上的关系。大家都知道，黄色国际的反共产、反苏联政策，大半是德国黄色的总工会主持的。德国总工会常常以五百万工人的名义自豪。但是，这五百万工人都赞成黄色国际的主义么？事实上有四分之一的德国工人赞成共产党哩！

最近瑞典开过了工会大会，代表瑞典有组织工人之三分之一，他们都表示赞成英俄联合的委员会，主张阶级斗争……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和黄色总工会竭力地反对这一大会，但是不赞成黄色国际的工人对抗派还是在发展。如果我们观察黄色国际所属的各国工会，我们可以看见每一工会里都有革命派，赞成赤色国际的。我们能够不算这些革命派在政治上的分量么？如果这样，我们的争取工会政策，简直绝无意义。这种共产主义影响的扩大，就是我们政策的结果。所以我们计算赤色黄色的相对关系时，必须将这些革命分子算进去。譬如捷克斯拉夫的赤色工会共有二十万工人，然而最近一次选举，共产党得了将近百万的票。可见改良派工会中的工人，几十万地移转到共产派方面来，赞成共产党的口号哩！

我们现在不能一国一国详细说，各国共产党都能自己知道这种现象。总之，黄色国际不但不是全世界的工会联合，并且已经不能算全欧洲的工会联合。

欧洲以外，黄色国际的地位更加可怜。一九二五年五月的中国工会大会，一致地通过加入赤色职工国际。日本的左派工会亦是赞成赤色职工国际的，仅仅因为反动的压迫厉害，所以没有公开地加入。马来群岛、波斯以及其他殖民地的工会都已加入赤色职工国际。黄色职工国际的夸大，说自己是唯一的世界总工会，有什么意义呢？不过可笑而已。黄色国际对于殖民地工人是非常之看不起。例如马来的工人在荷兰的改良派看来，不过人海之中的一粟；然而在我们看来，这是平等的阶级兄弟，是我们的战友。对于他们，中国工人运动丝毫没有意义；对于我们，五卅运动中的工人们斗争却是国际职工运动史里新开辟了一个时代，是人类历史的新转机。假使赤色职工国际里仅仅只有苏联工会和中国工会，假使黄色职工国际里内部没有冲突，没有现时的两个对抗派——左派及极左派，黄色职工国际也应当承认我们已有极伟大的力量，应当知道赤色职工国际的发展是向上的。但是黄色职工国际都是半死的改良派，眼界十分狭小，它们看不起殖民地的工人运动，以为欧洲是宇宙的中心，资本主义是永久的神圣。所以它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了解历史的革命前途，不知道现时正是世界职工运动革命化的重要关键。再过两三年，连瞎子都可以看见：赤色职工国际的发展是向上的，而黄色国际是下落的。

（十六）职工国际的统一运动

如今各国共产党所最注意的，当然是成立统一的职工国际问题和统一的各国总工会问题。统一的职工国际，应当能包括各洲、各国、各人种、民族。每一个工人，尤其是共产党的工人，都应当知道：现在各大陆的工人都已奋起积极斗争，如果一个“国际”不能包含中国、日本、澳洲、南美的工人运动，这种“国际”便不能称为国际。如今有许多征兆，足以证明环球各地兴起的工人运动已在开始积极奋斗。去年有人提议召集大亚细亚的工会代表大会。提议的人是日本改良派铃木。他的谈话里，表示他要建立一种“民族国际”以与革命国际相抗，就是建立一个有色人种的工会国际以与赤色主义的工会国际相对待，他想发展国际联盟劳动局的“运动”于亚洲。几个月以前，铃木的代表到过上海，提倡召集大亚细亚的工会大会，说各国政府、工人、资本家三方面都要派代表加入。但是他在上海的工人方面，什么接洽也不能成功，因为上海工人看着他，明明是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的代表！改良派在印度和日本仿佛已经有些形成，这两国的工会首领便想出这个有色人种的职工国际的把戏，当然，这种组织在政治上一定是黄色国际的同类。改良派能不能实现这一建议案，现在还不能说定。但是，我们因此也可以看见，亚洲工人运动中的确有国际组织的新需要。

中国工人运动却从没有想着工人之中还要分什么种界。他们已经决然地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因为他们知道黄、白人种的工人互相携手，才能把全世界染成赤色。

澳洲的职工总会，现在提议召集太平洋工会会议。这一建议案足以表示澳洲工人的觉悟，是非常之可以注意的。太平洋的大战，将来或者始终不能免，而且是非常之巨大的战祸，欧战和它比较起来，恐怕还只是儿戏罢了。所以太平洋沿岸的工人结合，实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美洲呢，几年以前已经组织了“全美劳动联盟”，包容北美合众国、墨西哥及中央美洲几国的工会。这算是“美洲职工国际”的开始。全美劳动联盟的领袖是刚伯思派，他们把美国的孟禄主义“工人化”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如果这句口号译成通俗话，便是“南美、北美统归美国的富豪支配。”可是，这一全美劳动联盟也有四百万会员，今年三月间，听说还要在乌拉圭召集全美海员大会，想把他们联合北美、南美而成一统一的组织。

此外，就是印度、古巴等处，也有工人运动发达起来。所以现在的国际工会统一问题，决不限于苏联总工会和黄色职工国际的关系问题。这不是欧洲的问题，而实实在在是世界的问题。所以组织统一的职工国际是要结合各洲、各国、各人种、各民族的工人，成立真正的世界总工会。

怎么样着手去进行这一伟大的统一运动呢？我们所提议的是很简单的办法：赤色

职工国际和黄色职工国际共同发起世界工会代表大会，使赤色、黄色国际所属的各国工会以及在两个国际以外的一切工会，都派代表出席。代表人数，依各工会会员人数用比例选举的办法。我们早已声明，如果这一世界大会，能组织成新的国际——世界总工会，那么，赤色职工国际可以解散。我们并且已经声明，即使我们一派是少数，我们也将服从纪律，留在统一的国际组织里决不退出。同时，我们请社会民主党也负同等的责任和义务，双方只要保存在同一组织之内的宣传自由。我们问一问：这种提议难道自命为民主主义者的人不能接受吗？这不是解决难题的最民主的办法吗？还有什么再民主些的办法呢？可是，至今我们还没有接到黄色国际的明显的、确实的答复，因为社会民主党既不能反对这种民主办法，又不愿意工会统一。黄色职工国际只是含混推托，自己妄自尊大地说黄色国际是“唯一的”“世界的”工会组织，不肯进行组织真正统一的世界总工会。它们这种态度，无非是蒙蔽群众，蔑视群众的要求，对于国际工会的统一运动怠工。

然而我们不能放任黄色首领的奸谋。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应当努力为世界工会代表大会的提议奋斗，竭力主张各国、各洲、各民族、各人种大联合的职工国际。

（十七）赤色职工国际之巩固

统一的职工国际没有成立以前，各国工会没有完全统一之前，各国共产党应当怎样工作呢？应当努力扩大我们的影响，应当加紧我们在群众里的工作，在组织上巩固我们的政治势力，稳固我们单独的组织（如法国及捷克斯拉夫），在改良派工会之中扩大我们的群众宣传，赞助并巩固赤色职工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之中，不仅是共产主义者，还有工团主义者及无党的工人，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共产国际总共有二百万党员，赤色职工国际的会员却要六倍。单是这一点，各国共产党便应当格外注意赤色职工国际及其种种提议，这些提议大半都是和共产国际协商过的。

赤色职工国际初成立的两年，内部还有种种派别，有些反对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接近。可是，现在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已经没有了。每个革命工人，都知道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合作是必要的，而且对于工人阶级是有利的。时常可以听见社会民主党的武断的论调，仿佛它们也是无政府党似的，它们说赤色职工国际不能独立，而是服从共产国际的组织。社会主义要说亚摩斯德丹的黄色职工国际是独立的组织。其实，黄色职工国际的总会常常和第二国际的总委员会开联席会议，共同合开讨论会、大会等，常常有双方共同的议决案。甚至于黄色职工国际的领袖加入国际联盟的劳动局，担负实行国际联盟议决案之责任——遵守资产阶级政府和资本家团体代表

的意旨，赞助帝国主义的条约和协定（《道威斯计划》和《洛迦诺条约》），这算是“独立”！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共同进行革命的宣传和动员，这就算是“服从”！这些社会民主党的论调，自然完全是无耻的武断论。每一个工人、共产派、社会民主派以及没有党派的，都应当能从我们的机关报上，了解黄色国际和赤色国际的区别，了解为什么赤色国际和共产国际合作，了解我们所要求于职工国际的是什么。应当记住：只有我们不断地进行自己的政策，巩固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影响，才能达到统一工会运动的目的。共产党、共产国际及赤色职工国际的势力愈盛，我们达到统一也愈快。

（十八）统一战线策略之应用

世界职工运动的统一，必须我们善于应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有最后成功的希望。当然，各国同志应用统一战线的时候，做了不少错误。但是，我们已经在最近有了相当的胜利。这些胜利，大半因为共产国际能及时改正同志的错误，消灭各国共产党原有的弱点。

我们应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就在于会引导无党的工人，会应付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如今各国共产党渐渐地将要都有这种能力了。凡是能使共产派工人和其他派别的工人接近，能消灭各派工人一致行动的障碍，能打破共产派和社会民主派工人之间隔膜的种种方法，都使我们能够进行统一战线而增加我们对于群众的影响。

英国共产党应用这一策略，最有成绩。英国共产党党员不过六千五百人，但是他所指导的工人——政治、思想上所能影响的工人，足有几十万。可以说，英国每一共产党党员能影响的，至少有一百个工人。何以小小的党能有这样大的影响呢？因为它能确定党和直接同情于革命而非共产党员的工人群众以及一切左派分子之间的正确关系。这是英国共产党成功的原因。当然，在这一与一百之比例的相对力量里，伏着种种危险。共产党是太小，如果有严重的社会变动发生，它很不容易保持现在所能影响的广大群众。所以英国的党必须尽量地扩大。然而它现在的成绩，已经可以证明它所走的道路是正当的。这才是真正的布尔希维克化，而不是空言。

最近瑞典的左派工人会议里，共产党应用统一战线的策略，亦可以说有相当的成功。瑞典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完全赞成阶级斗争的原则；而且无党的工人、社会民主派和共产派，对于目前的行动已经有了一致的政纲。

意大利共产党亦能应用极能伸缩而活泼的策略——那地方周围的环境，却是最困难、最压迫的，因为法西斯蒂的残暴和改良派的无耻都结合在一起，来镇压革命的工人运动。意大利共产党居然能联合各派工人共同起来反对法西斯蒂的统治。这是活泼

的、永久积极的、极能伸缩的布尔希维主义。

我们可以综合起来，得一个总的公律：

我们愈能引进无党的工人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来和共产党的工人一致行动，反对资产阶级，我们便愈能应用统一战线的策略，亦就愈能使我们的党布尔希维克化。要会观察时势，审察各种力量的相对关系，摸着工人群众所感受的最深切的痛处，提出最紧迫、最切实的口号，联结这些口号和工人阶级的总斗争，推动最广泛的群众来争这些口号，以一切的能力，极端地坚决，诚恳地忠实，切切实实地，而不是形式上去领导群众——这总是真正的行动中的列宁主义。

我们稍稍地学习着了，但是还不是个个共产党都学会了争取群众的方法。

（十九）反对开除革命工人镇压革命的职工运动及分裂工会之斗争

各国共产党在统一工会运动及统一战线策略里，应当努力反抗黄色工会的开除共产党及左倾的工人，反对它们的分裂工会政策。我们现在有许多事实，足以证明改良派仍在继续这一政策。最明显的便是芬兰。芬兰的改良派自己没有力量取得工会，所以他们除乞援于黄色职工国际外，还利用芬兰的警察。

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社会民主党也是如此。巴尔干半岛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倾向赤色职工国际。仅仅靠了严重的压迫，群众的逮捕，由警察没收工会房屋交给社会民主派，社会民主派才能组织自己的工会，加入黄色国际。我们共产党的机关报对于巴尔干的压迫工人，宣传得还是太少。至今还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巴尔干社会民主党和警察的联盟有这样密切。现在希腊军阀政变之后，工会运动也成了这种现象。

芬兰社会民主党看了这些黄色工会的“胜利”，实在羡慕得不了，也想如法炮制，使芬兰的工会运动巴尔干化。我们当然知道，芬兰的无产阶级能够抗御黄色首领的分裂政策。各国共产党、各国职工运动、各国各派的工人群众的职任，便在于用实在的力量反抗黄色首领，反抗他们勾结警察军阀破坏真正的工会和他们的无耻的分裂政策，开除共产党员及左倾工人等。赞助这些小国工人的反抗运动，实在是赤色国际的天职。

（二十）工会运动——往群众去

共产国际成立了已经好多年，然而我们还要谈工会运动，仿佛有些不好意思。可是，事实上许多统计告诉我们，工会里的工作做得还不好。我们现在大家都说“百分之七十五的力量用到工会里去”，或是“百分之九十的注意工会”。然而事实上除英国外，很少有百分之二十的力量用到工会方面的。我们只要看一看各党所用于工会的财力，便可以知道实际上所做的，比口头上所说的少得多。而且在工会里工作的人，加

入工会的党员也不多。法国共产党有一个决议，说只有工会会员能入党，没工会会员证的人一概不容纳。这一决定是很好的。可是事实上考察起来，百分之九十的党员在工会里是不积极的。德国共产党曾经调查全党在工会里有多少人，积极工作的有多少。结果呢，在莱茵工业区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党员加入工会；有几个区域里只有百分之五十六是积极做工会工作的。美国共产党党员只有百分之三十二是工会会员。其余的百分之六十八呢？其中百分之二十六因为没有家庭雇佣的工会，所以不能加入工会；还有百分之四十二是有工会可入的，但是因为要管高等政治问题，不屑做工会会员和工会的工作。这种共产党员，应当在各国共产党里都严格地训练才好。共产国际不能容忍历次大会的决议完全不执行。

美国共产党里曾经经过一次讨论，一方面主张只要在工会里作宣传，别方面主张要注重争得工会职员的位置：这是非常之不好的现象。我们既作宣传，便要设法组织群众，使我们的政治势力有组织上的表现，否则我们的宣传是空的。取得工会的口号，便是说我们应当取得工人群众及工会的指导权。

总之，各国共产党还要百倍于现在的注意工会运动，应当使一切党员尽可能地加入工会，否则开除；不但加入，还要在工会里积极工作。

（二十一）工会运动的纲要

我们现在的工会运动纲要，应当做极广泛的群众一致行动的政纲。所以像反对《道威斯计划》，反对洛迦诺会议等口号可以不必加入，这是党的宣传工作。有这种政纲，我们便可以使极广泛的群众，包含社会民主派的工人一直到驻在殖民地的兵士，使他们一致起来奋斗。如果反对洛迦诺或道威斯的口号加入在里面，我们便不能征调别派的群众。譬如以前爱、洛二州之统一派工会及改良派工会之统一战线，始终破裂，便是因为召集双方联席大会时，我们提出要求爱、洛二州独立的口号。这种口号在共产党和革命工会的观点上，是很对的；在改良派遗毒很深的工会，便不是这么一回事。国际的运动纲要是：

- （1）反对直接的间接的延长工作时间，坚持八小时制为最高限度的工作时间；
- （2）反对降低工人的生活程度，要求提高真实的工资；
- （3）要求国立的失业保险，救济失业的工人；
- （4）要求工会组织的完全自由；
- （5）反对法西斯蒂的反动及法西斯蒂包办工会；
- （6）要求税捐的担负应归富人阶级；

- (7) 反对职工会中的官僚习气，要求工人的民主主义；
 - (8) 要求工会内部发表意见的自由；
 - (9) 反对一切阶级妥协的形式；
 - (10) 要求各国组织统一的职工会；
 - (11) 要求各国工人与苏联工人的接近；
 - (12) 要求西方工人与被压迫的东方工人接近；
 - (13) 反对国际联盟及其国际劳动局；
 - (14) 反对战争；
 - (15) 要求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无党的工人建立奋斗的、友谊的，同盟反对资本；
 - (16) 要求建立统一的包括各国、各人种、各大陆的职工会的阶级的国际。
- (此节引自《职工运动纲要的议决案》)。

各国不但应当有全国的工会运动纲要，并且还要有各区域特殊的要求。国际的、国内的、各地方的工会运动纲要，都应当每天、每小时地宣传，每一个共产党员，在工厂里工会里，以及其他地方，都应当是工会要求的宣传者；这种纲要一定要是能引导极广泛的群众的。我们所提出的要求纲要，并没有对于别派工人是不可能容纳的——足见只有共产党是真为群众利益奋斗，是诚意地、忠实地为民众谋解放，是有计划、有系统，切实而且彻底的斗争的党！我愿意各国共产党能够立刻实行今次会议的决定，我们真真实实地实行我们工会工作的布尔希维克化，切切实实按照列宁主义去取得工会，取得工人群众的信仰，准备工人群众实行社会革命！

这是洛若夫斯基同志在今年三月初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译者)

世界的农民政党及农民协会

瞿秋白

——赤色农民国际与国际农民运动的历史

一、帝国主义大战以前

朴列汉诺夫说：“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无产阶级必须实行社会革命，才能打倒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小生产者的农民却不然，他们有自己的生产资料，这是他们经济独立的保证。因此，农民的生活利益要求私有生产资料制度的保存。”“现社会的生产关系，使无产阶级成为革命主义者，却使农民成为保守主义者。”朴列汉诺夫对于农民的这种观察，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确是对的。资本主义的列强国内，只要资产阶级革命后，还能保证农民的小小田产，农民便成为私有制度的拥护者，在一切政治社会生活里，都偏向于保守主义。农民受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打击时，他们认为改善社会制度的方法，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却是扼制资本主义的发达，要求历史开倒车，回到小生产的简单的商品经济去。所以一切保守主义的政党都竭力想利用农民。“农民永久是国内最保守的份子，他们尊重一切古旧的而反对一切新奇的。”

当然，这种情形，只对于私有财产而有独立经济的农民是对的；对于其他的农民便不对了，至少也决不是全对的了。无田的及田少的农民，在大地主制度的国家内，受着种种封建制度余毒的压迫，客观上总是革命的，多少总参加农地革命运动（Agrarian Revolution），赞助革命的政党，甚至于组织自己阶级的革命团体。例如，俄国、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及其他各国的农地运动。还有些国家里，有类似于封建制度的农地关系存在并发展，所谓移殖的农民，如美国的“Farmers”等，客观上也是反对大资产及大地主阶级的。在农民经济恐慌的时机，往往发生左倾的对抗派的运动，赞助急进的政党，亦能组织自己阶级的政党及团体，有很急进的趋向（如美国、德国、意国）。至于民族复杂的国家里，那种民族压迫之经济上的表现，大半是掠夺弱小民族农民群众的田地，并且剥削他们的劳动，因此便发生“民族的和农地的运动”，形成农

民的国民革命的组织（如挪威、加黎刹——Galicia、哥罗地亚——Oroatia 等）。甚至于在没有大地主制度的国家里（保加利亚及塞尔维亚），那地方资本积累，完全靠农民之急剧的破产，所以农民也多少参加一切左倾对抗的运动，并且组织类似于职业团体的农民协会，有极急进的政纲。

农民的生产条件，使他们大致都是分散的，各自在田地、森林里经营生计，因此，减少他们的斗争力。农家繁重艰苦的劳动，占去他们极大部分的时候，又使农村中的政治教育难于发展。这两种情形，都妨碍独立的农民政治组织的发生。大致，农民总是因为其他份子的建议和联合，而参加政党的运动。农民只有在经济组织里，如协作社、农业公会等，偶然有自动的行动和指导，可是这些组织极容易落在富农手里。

帝国主义大战以前，农民组织的状况大概如下：

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如英、法、比、荷、德及瑞士等国里，农民只有经济的组织，有些表面上是无党的，其实受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有些公开地加入各种政党。例如比利时的农民协作社，是天主教党在乡村中的“支部”。德国的“农家协会（Bund der Laudwirte）”是保守党的分部；“德国农民协会（Der Deutsche Bauerbuud）”赞助自由党；而“农民联合会（Bauernvereine）”，依各地情形不同而分受天主教党、自由党、保守党及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这些组织没有独立的政治作用，只有德国的农家协会提议过要保守党力争农业的关税保护政策。西班牙有“农业家联盟”，其中是大地主及天主教神甫占势力。奥、匈各省的农业家联合会，实际上完全只会赞助各种民族的政党。美国的“农民会（Farmers Bureau）”，完全赞助资产阶级的政党，有时也会赞助“社会党”；一九一五年在达科大邦（St Dakota）却组织了农民的“无党联盟”，甚至于暂时取得这一邦的政权；其他各邦农民，也有这种独立的政治运动倾向。丹麦、哥罗地亚及布加利亚的农民群众，却在战前便组织了巩固的、独立的农民团体。丹麦“农民与农民之友联合会”是最古的农民群众组织，它能利用经济上组织巩固并且人数众多的农民，实行独立的政治运动；它参加国会选举，在国会议员之中有一农民系。“哥罗地亚农民党”成立于一九〇四年，它们的职任是拥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及哥罗地亚民族的民族利益（哥罗地亚现属南斯拉夫国，战前属匈牙利）。它（国民党）在欧战前居然能成为国内有力的政党。“布加利亚平民农业会”成立于一八九九年，是农村人民的政治、经济的总组织，在欧战时期以前，已经能够吸收大多数中农、小农的份子，而在国会之中颇占势力。

欧战发生之后，经济环境突变，使农民运动的趋向和速度都变更了。

二、欧战与农民运动

欧战对于农民群众大有革命的影响：一则战争本身对于一般农民的经济上、社会

上、精神上的旧生活有整个儿的打击；二则欧战之结果，发生政治经济上的大变动。

当然，欧战的破坏在农民经济上为最大：农民丧失大部分的农具、牲畜，而急剧地破产；农民当兵而死伤的最多；社会生活及精神生活上，农民因当兵而抛弃自己的乡土生活；农民与城市的革命无产阶级长久地接触，于是他们便渐渐唾弃自己向来的守旧主义，去掉那种乡下人对于人世间一切强权都屈服、崇拜的态度，而开始反抗一切过去时代的威权。

欧战的结果，第一便是极大的农业恐慌，这是全世界经济大崩坏的影响。恐慌的原因，当然在于所谓“剪刀统计”——工业品与农产品价格的悬殊。农民的经济状况，因此，不但在参战国并连中立国里，也大大地困难。“剪刀”经济的原因，是在工业品价格日高，而农产品价格日落；工业品在战后完全为托拉斯、嘉狄尔化的大资本家所独占，而农产品仍在分散的小生产者手里，不相联络，自相竞争；其结果自然工业家能一致抬高自己生产品的价格，而抑制农业原料的价格。只有国家的监督，能调剂工农业的关系。至于欧战政治上的影响，便是根据于这种经济现状而来的：一方面农民群众革命化，趋向于争取国家政权；别方面，资产阶级丧失其在小资产阶级中的政治上、思想上的威望，而使小资产阶级接近无产阶级。再则，革命化的政治情势使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异常加速：一方面农村资产阶级因为替大资产阶级当买办而大发其财；别方面，中农、小农急剧地破产失地，战后极重的租税，都加到一般劳动平民身上。阶级斗争自然在农村中也急剧起来，甚至于使笼统的农民组织因此分裂。再加之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有极大的影响：俄国农地问题和民族问题的解决、劳农政权的建设，使各国一般贫农都受极大的刺激。

于是欧战之后，农村便从守旧主义的巢穴，一变而成暴动反抗革命的动力。

农民力争田地的运动非常之剧烈，使统治者阶级不得不因避免革命而实行些农地改良政策（Agrarian Reform）。波兰、捷克斯拉夫、罗马尼亚、布加利亚、波罗的海诸国的政府，都急急应允实行农地制度的改良政策。然而，连这种极不彻底的农地改良政策，都不能完全实行。波兰至今丝毫没有实行；南斯拉夫政府后来竟公开地拒绝改良农地制度，只有波士尼亚地方（Bosnia）——旧属奥国，欧战后划归南斯拉夫——农民自动地“没收”地主的田地，至今占有这些田地，不过“法律上”还未受承认罢了；捷克斯拉夫勉强实行很“温和”的农地改良政策，没收了些德国人地主的田地；罗马尼亚将一部分贵族、武士的田地，收取极高的赎价，分配给农民；而在布加利亚，那所谓“劳动田地享有法”，在白党反革命胜利之后，已经完全取消。

三、战后的农民组织

欧战后的农民组织还是非常之散乱，有种种不同的形式，而且时常合并、分裂，很

不容易有系统地分析记载。所以这里只能说一大概（一九二五年年初的材料）：

（一）各国农民在政治上积极起来，都有组织政党，从事政治斗争的现象，富农、贫农都是一样的。法国向来是国会制度的政党统治，如今农民却不愿意赞助任何政党，而要求有自己的政治代表。美国组织过“劳农联盟党”，而且美国的“第三党运动”里，农民处于中心的地位。罗马尼亚发生了很大的农民党，所谓察朗尼党（Tsa. Ranists），它的中坚份子，是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的农民；这一党的内部，各种农村阶级的份子都有，所以不断地有左右派之争。挪威的“农村经济会”在一九二〇年特别组织了“农民党”，可是在守旧派富农的影响之下；中农和贫农的分子因此便分裂出来，自己另外组织了农民协会。荷兰也有农民的政治组织，最初是反对所谓工人的“特别优待工资”的，可是随后便反抗大地主及盘剥重利者了。德国南部，有许多农民组织发生，参加政治运动，一九二三年所谓“劳动联合会”（Arbeitsgemeinschaft），联合各区小农、中农、垦殖农民等的组织而成立，它后来加入了莫斯科的世界农民协会——农民国际。波兰最初有费托斯氏（Vitos）的农民党，大致是富农的组织；后来左派分裂出来，变成许多农民党和农民协会。捷克斯拉夫有所谓“农地党”，是大农阶级的政党，但是不久便分裂出中农、小农的许多“独立农民会”；后来又发生“德人农党”和“匈加利人农民党”，主张都很急进的。日本一九二一年发生农业会和佃农会；一九二二年组成“日本农民会”，并加入了农民国际；一九二三年又发现“日本农民总同盟”，主张更加急进：这两个会后来合并了。意大利北部成立了富农所指导的农民党，然而最近也分裂了；意大利南部，急进派的组织农民协会运动，正在日益发展。

可以说，农民的政治组织运动随波逐流地发展，无论什么力量不能遏制它。也许最近期间，各国都有农民政党成立。

（二）农民之政治的组织还没有成立的地方，农民政治斗争的需要，自然而然使他们利用农村经济的组织——农村合作社，去做政治运动。譬如在法国、希腊等，往往将不宜于政治运动的，甚至于绝对没有政治用处的组织，去实行政治斗争。

（三）旧时的农民协会和政党，欧战之后大大地变更了：第一，小农、中农大多数群众加入这些团体，他们的政治作用便比较地增高；第二，群众的左倾使这些政党内开始阶级分化，也有极少数的旧团体，重新定了急进的新政纲。例如哥罗地亚的农民党，实际上变成了哥罗地亚全民族的政党，改名为共和党；十万的哥罗地亚的留俄俘虏，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回去，使这一农民党大大地左倾，竟加入了农民国际，承受农民和无产阶级联盟的口号。这种同样的过程，在斯洛佛族（Slovsk）的农民党里也有，不过较缓进点罢了。

(四) 农民协会及政党里，尤其是它们执政的时候，常常发生阶级分化的过程，形成左派，以至于分裂。波兰农民党（费托斯的）便是一例；捷克农地党，布加利亚农业会等等都是如此。塞尔维亚帝国主义（南斯拉夫）侵略之下的“腊狄赤党”（Raditch），如果他们民族斗争稍稍胜利，内中也不免要起阶级分化。总之，富农和贫农的分化，非常之明显，而富农的党必定做大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庸。只有小农推翻富农领袖，而仍积极奋斗，才能保持群众（如布加利亚的农业会）。

(五) 独立发生的或分化出来的小农、中农的左倾组织，日益和无产阶级及共产党接近。然而这些左派的农民党，也还不曾固定，其中还可以有分化，他们的政治行动，大半是很不坚定的。他们大致是地方的，至多只是一区域的，都只各自代表当地的利益和情绪，相互之间关系很少。大半左派的农民组织都倾向农民国际，而农民国际正是要联合他们的机关。

四、农民政党及协会之政纲

农民政党及协会的社会基础，在乡村中的各种阶级里。大致有：（一）地主——出租自己的田地的；（二）剥削劳动的富农——亦有多量的田地，同时自己也耕种的；（三）佃农——租种富农地主或公司的田地的；（四）自耕的大农、中农、小农；（五）半无产阶级及农场工人。农民政党及协会之非依阶级而依阀阅组织者，即笼统包括一切与田地有些关系的人的团体里，可以遇见上述的各属阶级的份子。如西班牙的农业联盟中，中农、小农与大地主同时加入；德国的农家协会，也是包含一切有农家经济的农户，小农、中农、地主等。霍尔瓦德（Horwat）农民共和党及布加利亚平民农业会，都不禁阻地主加入。

这种阶级混合的原因，客观上是在于以前的农村中，阶级分化还薄弱；主观上是在于大地主、富农大半都是这种组织的发起人，如果不吸引欺骗小农、贫农，那么，他们人数很少，不能有大的政治作用。最近才不得不发生分裂：或者贫农退出，而成立左派组织（如捷克及波兰）；或者富农退出（如布加利亚）；或者小农、中农另外发起独立的组织（如德、意等）。左派农民组织的形成是农民群众革命化的证据。

农民组织的思想及政纲，自然跟着这种分裂变换而时常改易，各时期都显露自己的阶级色彩。

阀阅式的混合的农民组织之思想是怎样的呢？当然，就是其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西班牙农业联盟中，对于社会和国家完全是封建式的天主教的观点；德国的农家协会，纯粹受德帝威廉第二思想的影响；波兰费托斯党及捷克的农地党的政纲，当然反映着富农的阶级利益。大致这种“农阀”组织，都是宣传所谓“农业利益”，

实际上是欺骗贫农，掩饰那代表富农利益的政纲之真正色彩。最有意思的是党纲中关于农地问题的主张。农地改良（当然是不彻底的）已经实行的国内，这种农民组织的党纲，对于农地问题非常之谨慎，不敢多说，只有笼统的振兴农业等类的话；农地改良还没有实行的国内，简直一句话也不说。腊狄赤党的党纲对于农地问题便没有主张，只有隐藏在民族政治要求里的隐语。罗马尼亚的察朗尼党党纲，赞成资产阶级已经实行的农地改良，只希望“再求完善”些。没有一个这种农民组织，是真能代表无田的和田少的农民利益的，所以他们也不求农地问题的根本解决。

农民政党及协会，总想代表一切“农业者”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利益。第一种“高远的”共同理想便是协作社。第二种共同理想，便是正直的政府。所以一切农民组织都看着政府机关是万能的：要求他收买田地或改良农业，征收地价税，以达均产主义，教会农民选举，然后再行民权……第三种（这以下却非“共同的”理想了）——地主阶级占势力的农民组织（德国），完全是以赞助保守党为宗旨。第四种——富农占多数的农民政党或协会（波兰、捷克斯拉夫），便力求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以备朋分政权。第五种——工业不发达并且没有大农经济，而农业人民占大多数国内（布加利亚、哥罗地亚），富农便想独立地夺取政权而利用它。最后，第六种——左派农民组织，便十分倾向于和无产阶级合作，甚致于和无产阶级联盟以求实现工农政府。

五、布加利亚农民政府的经验

布加利亚农民政党的领袖，是史登蒲黎斯基（St. Mbuliysky），可以算是农民政权的理论家。他实际上也做了第一次“纯粹农民政府”的元首，但是他也亲身看见这一政府的失败。

史登蒲黎斯基的学说，认为个人及社会生活的主动动力是“自我保护、自我喂养、自我繁殖的本能”，通俗些说，便是生存欲、生长欲、生殖欲的“三生主义”。这一本能，使各个人及其社会努力奋斗（生存竞争）。因此，历史竟冤屈了仁爱的平民，使强暴者“取得政权，压迫劳动平民”，成立“世俗的和神道的统治者——皇帝和神甫的政治”。随后，这两种治者自相斗争，各种灭杀自己的力量。于是平民群众“不分财产、职业、社会地位”，联合而组织“全民革命的团体”，得以利用时机推翻皇帝的政权。然而等到建设新政治、新社会的问题发生之后——必须要造成“民权的”政治，于是那“全民组织”分裂而成各种“阶级组织”的政党。这些政党斗争的结果，便产生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政党在历史上的职务从此便算完了，政党变成了社会的赘疣而且是有害的东西，“阶级组织”的时期早已终了，现在到了“阀阅组织”的时期。阅

阅有下列几种：农阅、手工业阅、工人阅、工业阅、商业阅、官业阅，总之，便像是中国的士、农、工、商。每一阅阅（其实是职业）都有组织自己一阅的权利，以拥护自己一阅的利益。阶级关系比阅阅关系浅得多，阅阅利益比阶级利益强得多；大农家的利益和小农人的利益关系，比小农业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亲切得多。所以阶级组织应当让位于阅阅组织。同阅利益的冲突常常可以用妥协的方法解决的，各阅利益的矛盾，便非斗争不能解决了。各阅互斗的结果，始终要产生“社会的均势和公道与和平”。各国的阅阅组织，渐渐要联合成国际的阅阅组织——做调剂生产和分配的机关，保障国际的和平。因为农阅是主要的阅阅，数最多，所以它应当管理国家；在国家之内农阅利益应当占优胜的地位，这是很正直而公道的。

凡此一切“学说”，都可以算是很“新奇的”，而且是布加利亚的“国货”（不知布加利亚有无自己的孔子，否则也可以取得国粹、道统的尊称）。

史登蒲黎斯基对于社会主义是不表同情的，因为：一则他不承认现在还有阶级斗争；二则社会主义，依他说是与人类本能相冲突的，不合于他的三生主义。

史登蒲黎斯基的学说是如此，这种学说只能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农村资产阶级接受这一学说，因为阅阅组织的学说能够蒙蔽住农民群众，使他们不受城市资产阶级的影响；一般农民也接受这种学说，因为人数众多，希望有“自己的组织”而能夺取政权。

战争及其结果，使治者的城市资产阶级政治上、经济上大大破产，农村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机会便来，而“布加利亚农业会”的政府涌现了出来。城市资产阶级暂时也借此为反对共产主义的盾牌。史登蒲黎斯基执政之后，便实行自己的学说而开始“阅阅斗争”。他首先压迫的，便是“雇佣工人阅”。这一阶级斗争几与“农民党政府”相始终：从一九一九年屠杀罢工的铁路工人起，直到一九二三年选举时的反共产大压迫为止。随后，他又和“工业阅”宣战：一方面，他逮捕资产阶级政党首领，责以战争祸首的罪名；别方面，他实行谷类公卖，禁止谷类商营业，而以公卖权交给农业合作社，他贱价收买一部分地主房屋归官。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反对他。

至于农阅自己“家里的事”呢，贫农不久便看见政府所作所为只利于农村资产阶级，而无田的和田少的农民一无所得。农业会的执政，使农村中及农业会中开始急剧地阶级分化。“农民政府”的末期，农村资产阶级已和城市资产阶级勾结，同时，贫农阶级亦和无产阶级接近。阶级的利益事实上始终比阅阅的利益强。他的理论就此破产。

史登蒲黎斯基的政权，完全根据于：（一）盲目地信仰所谓民权机关的法律，如国会、内阁、地方自治等；（二）农村人民的数量众多。他只相信民权法律的力量，如撤回权、监察权、弹劾权等，不相信实际的民众力量；所以白党谋乱时，他不去认真宣

传军队，也不使民众武装。他只知道农民人数多，把持住乡村自治机关，便可以保证选举不致失败；他不知道现代国家的实力（就是在农民极多的国里）总在于城市：国家的强制机关，军队、警察、银行、工业、交通等，——农民无论怎么多，散处于森林、田野间，决不能独立维持政权的。这一政府始终因极反动的白党运动军队反革命而失败。

农民政权在布加利亚所得的教训是：

第一，现代国家里，巩固的、独立的农民政权是不可能的。

第二，农民政党的执政，使农村中及这些政党中，急剧地阶级分化，剧烈地阶级斗争。因此，这些政党分裂而成比较一律的阶级的组织。

第三，农村劳动平民只有和城市无产阶级联盟，方能巩固劳、农的政权，城市始终是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先锋队。

那农业会里的农村资产阶级及贫农，都得到了这些教训：富农脱离农业会而和城市资产阶级勾结，小农却和城市无产阶级携手了。

六、农民之国际联合

欧战之前，农民之中便有国际联合的倾向，因为国际穀类贸易的调剂，已经渐有这种需要。罗马的“国际农学馆”成立，更促进了这一运动。当然，也因为农民看工人的榜样。但是，战前实际上始终没有什么成就。战后农民政治斗争剧烈起来，虽然表面上是经济组织，而实际上急切地需要国际的政治的联合。第一次，一九一八年巴伐利亚（Bavaria）大农业家海谟教授，便向瑞士富农反动派首领劳尔博士提议，要组织国际农业联合会，“以肃清欧洲农村中的赤化”；法国大农业资产阶级也有这种尝试，后来都因为德、法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而失败了。第二次，是西班牙天主教派农民领袖提议，要联合农民的天主教徒，但是宗教是太狭隘了，结果也是一无所成。第三次，是斯拉夫族各国农民的联合，提议的人是史登蒲黎斯基，结果在捷克京城成立了“国际农民局”——联合了许多斯拉夫民族的农民组织：捷克、南斯拉夫、波兰、布加利亚及侨居国外的俄国人。第四次，一九二三年在莫斯科成立了世界农民协会——农民国际，加入的有许多国的农民组织，不但是欧洲的，还有其他各地的。最后，一九二四年十月，罗马国际农学馆在瑞士召集的农学家会议，委托劳尔组织“农业家国际”。这一会议上，差不多全是西班牙、法国、英国、匈牙利、捷克等国的反动派农学家，他们公开地说，要组织这所谓“国际”，是以反对农民运动之赤化为目的的。

这些尝试可以分成三种：（一）大地主、财政资产阶级的保守党组织，想以“国际合作”保障农村中之黑暗世界，继续维持旧时的状态；如果最后一次劳尔的组织能以

成功，这种“国际”，可算是黑色国际。（二）捷克京城（普莱格）的尝试，意义稍有不同。斯拉夫族的富农想一方面驱逐城市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于乡村之外；别方面，阻碍农民的赤化，而自己要做中农、小农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主人，这是所谓绿色国际。黑色国际看着他们的行动，还嫌太革命了（布加利亚的资产阶级称史登蒲黎斯基是过激派）；但是，革命的农民却认绿色国际还是反革命的。富农反对资产阶级时，客观上使农民左倾，可是它压迫贫农的时候，便不得不和资产阶级勾结。所以绿色国际根本上是自相矛盾的，它的能力非常之小。因为赤色国际的发展、农民群众的革命化，便使绿色国际实质上变成了黑色国际的附庸，它的颜色始终是要变黑的。本来它们之间的界线，非常之不清楚的。（三）最后，世界农民协会，表现国际贫农的阶级觉悟。它们不但要脱离大地主及资产阶级的压迫，并且要脱离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剥削。然而这一职任，依俄国及布加利亚等的经验看来，农民独自的力量不能够实行，必须联合自己的阶级同盟军——城市的工人。所以世界农民协会的主要口号是：劳动农民和工人的联盟，夺取政权，建立工农政府，彻底地解决农地问题，减轻贫农的租税负担，扑灭军国主义。

世界农民协会——便是赤色农民国际。

七、最近的发展形势及结论

农民运动最近的发展形势和结论可以归纳如下：

（一）欧战及其结果所引起的农村的政治觉悟，必然还要更加发展。农村中，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剧烈，使群众对于政治的兴趣日益增加，日益努力于政治斗争。如今治者阶级已经不能使农民做驯服的奴隶，完全不问政治了；治者阶级要再使农民变成守旧主义的台柱子，保障“秩序、私产和祖国”，是不可能的了。

（二）农村人民的政治上的积极奋起，表现于要求组织的倾向里。这种倾向在西方和东方各国，都是革命的动力（如中国广东、河南、湖南、湖北、直隶一九二四年以来的农民协会）。

（三）农业“阀阅”的组织，旧式的农党、农会等，必然要继续地分裂。这是阶级分化的结果，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革命的现象。贫农应当有自己的组织；至少，在阶级分化，经济上还不大明显的地方，也要有确定明显的贫农阶级的政纲。

（四）各地将由种种方式发生左倾的农民组织。因为各国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的客观条件，这些组织，一时不能有很整齐的系统 and 很集权的形式。革命的政党，应当注意它们政治上的国际、国内的联络，使它们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相提携。

（五）农民的左倾必然继续地昂进，不但不满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政治，并且也

不满意富农组织的绿色政策。这种革命化和左倾，正在继续发展，农民的倾向于无产阶级，因此一天一天厉害起来。赤色农民国际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应当特别注意这种现象。

（六）虽然如此，即使这些条件完全实现，农民协会的群众组织，在资本主义统治之下，不会变成纯粹共产主义的。它们能够实行反对地主、反对资本帝国主义及民族压迫的政策，这是它们的革命意义。至于造成共产主义的群众的农民组织，却是危险的幻想；这种名不副实的团体，其势只会反过来妨碍共产党在乡村中的发展。无产阶级是上升的阶级，它是日益扩大巩固的阶级，它的革命的最终胜利，能消灭一切阶级。小农民却是下落的阶级，历史的前途是很狭隘的；即使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它们的正当的发展道路，也只有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变成工人。所以工人有自己的政党，有明显的改造将来社会的党纲，而小农的组织却只能有关切目前实际需要的政纲。工、农联盟建筑在具体的、直接的不相矛盾的阶级利益上，只有共同合作，才能打倒双方共同的仇敌，达到双方切近的目的。等到工、农联盟胜利而夺得政权之后，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便进到一个新的时期——经济改造事业的协作使农业的工业化，有充分的调谐，而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也可以没有流弊，至少，可以使流弊减少至于极点。

（这篇文章大半根据于《农民国际》杂志的材料及郭腊罗夫同志的论文）

一九二六·六·九

世界革命与世界经济

刘仁静

(一) 世界革命运动的回顾

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是世界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这句话的意义是说，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受世界革命运动的影响和辅助，并且它也可以影响世界革命运动。我们现时已不是闭关孤立的奋斗，我们在国外有无数的友军，同情于我们，给我们以种种的物质上、精神上的帮助。因此，了解现在世界革命运动的状况、世界革命的力量与帝国主义的弱点及其崩溃的趋势，可以增加我们的打倒帝国主义的勇气，并且使我们很清楚地认清我们解放的道路；在革命争斗中，又可以尽量利用世界革命的经验，接受世界革命的指导。

欧战以后的一时代是世界革命时代的开始。自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国革命起，同年十一月，俄国第二革命；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革命；一九一九年奥国民革命，匈牙利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德国的巴维利亚社会革命；一九二〇年意大利工人罢工占领工厂；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各国罢工运动之蓬勃激昂（例如英国，在这四年罢工四千余次，参加者约五六百万人）；一九二三年保加利亚的农民暴动，德国的十月革命。我们观察这一时代，确是比欧战以前不同。在欧战前，世界资本主义正在平静地发展，欧洲各国很少罢工运动发生，比国曾发生过一次铁路罢工，当时的革命领袖（如卢森堡等）尚为之著专书研究。而在欧战以后，不仅罢工是极寻常的事，而且工、农群众且进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欧战以后，不仅列宁认识这是世界革命时代的开始，继俄国革命之后的将为德国革命，而且英国最聪明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路易乔治对于德国社会革命的将临，亦不胜其恐怖忧虑。欧洲资本主义的基础，在大战后的二三年内为波涛汹涌的社会革命潮流所震荡、摇撼。只是因为社会民主党投降于资产阶级，帮助资产阶级，组织政府；杀戮工人阶级的领袖（如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屠杀反抗的工人群众；以改良主义欺骗工人阶级，力助资本主义之恢复——才使资产阶级逃脱战后社会革命的危机。只因为社会民主党为社会革命的障碍，所以德国的有组

织的无产阶级终不能利用欧战后中欧的政治经济恐慌及统治阶级的危机，继俄国之后以取得政权。

紧接着欧战以后的社会革命运动，为欧洲的社会民主党联合着资产阶级，把它扑灭下去了。于是资产阶级乘机向无产阶级进攻。他们不惟将社会革命高涨时期所给予工人阶级的让步（如八小时工作制）从工人手中夺回，而且增加工时，降低工资，裁减工人，关闭工厂，他们要将恢复资本主义的代价和牺牲，一一转嫁在工人身上。一九二一年及一九二二年，乃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之最猛烈的时期。

欧战以后的经济现象是：帝国主义的大战毁坏了几千万万的财富，全欧洲的疮痍满目，死亡枕藉，生产减低，失业增加，纸币跌落，人民的贫乏日益加甚。加以《凡尔塞和约》把欧洲瓜分得四分五裂：从前是完整的经济区域，但是《凡尔塞和约》为了政治上的理由，硬要将它分开成两个或数个国家领土；这些国家仇视、冲突，建筑起关税的高墙，妨碍经济的合作，使生产无法进行。因为工业产品的缺乏、纸币跌落，有些资本主义的国家竟回复到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自给状态。当时的革命形势是极紧张的，只是无产阶级的主观条件尚未具备（大多数工人群众，仍在社会民主党影响之下，共产党尚在组织和形成的过程中），所以未能充分地利用这些危机夺取政权。但资本主义决不会自己塌台覆灭、寿终正寝的，它正利用无产阶级的弱点，逐步巩固其统治地位。

（二）现在世界经济状况

一九二四年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地位日渐进步的一年，大战以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的资本主义恐慌——由休战撤兵及《凡尔塞和约》所引起的恐慌，为资产阶级努力挣扎，将它克服了。一九二四年经济进步的征象是：美国开始进行它的大规模的增加生产计划；中欧诸国如德、奥的纸币因为美国的援助，实行《道威斯计划》的结果，也趋于稳定；国际间的商业与贷款也有部分的恢复。在一九二五年的上季，资本主义的稳定仍是继续进行。于是社会民主党欢呼资本主义的稳定、世界革命的消灭，嘲笑第三国际的策略，自诩有先见之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同时也产生了一部分不稳定的共产主义者，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以为世界革命运动因此要延迟数十年。到底世界革命运动因资本主义稳定消灭了没有？我们不可不有一番正确的观察。

第一，我们应该知道，资本主义的稳定是暂时的、局部的。世界资本主义的稳定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呢？现在的资本主义发展与战前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什么不同呢？这是决定世界革命运动消沉与否的前提。我们比较资本主义战前与战后发展的趋势，即可看出它有显著的差异。战前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向上的。虽然资本主义向前发展的

形式是循环的，恐慌与兴旺往复迭乘，但是后一次的恐慌与兴旺同前一次的比较，后一次的总比前一次的增加生产。那时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围是扩张的，它不断地在亚洲、非洲开辟新的市场，资本主义的特点都显露出来。这种现象在自由的资本主义时代，在自由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时代，都是如此。若我们考察大战以后的经济现象是怎样的情形呢？不错，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的经济状况，比大战以后几年要进步得多，有些国家的生产额几乎达到战前一九一三年的平面，货币也稳定些，不似从前那样的经济紊乱和恐慌了。倘如它继续往前发展，是否能达到完全稳定，医好资本主义的疮痍，恢复资本主义的健康呢？如照社会民主党的肯定的答案是对的，则世界革命运动自然不免于消沉，但是不幸有许多事实，决定欧洲的资本主义绝不能恢复战前原状，资本帝国主义正走入它的衰微、凋谢时代，因此世界革命的前途仍有无穷的希望。

若我们考查过去一年（一九二五年）的经济发展，我们看出它完全不是均一的、平衡的。在美国、美洲各国、英国各属地，资本主义的发展显然是向上的，除了这些（原文缺失□□□□□□□□□□）本，所以那成立于一九二〇年的摩洛哥铁路公司也属于巴黎荷兰银行，那具有一千万资本的电汽公司，也是属于巴黎荷兰银行，其余那六百万资本的酿酒公司、每日可出二十万斤面粉的制面公司、六百多万资本的屠宰场、一百万资本的摩洛哥垦殖公司、三百万资本的摩洛哥农业协社、二三百万资本的几个建筑公司以及一千四百万资本的建筑材料公司、五百万资本的摩洛哥海口建筑公司、二千万资本的摩洛哥公司、一千万资本的摩洛哥烟草公司，甚至于鸦片公司〔摩洛哥有一种植物名“基夫”（Kiff），似鸦片而毒性更猛烈，亦为法国银行家专卖品之一〕等等，莫不直接或间接的隶属于巴黎荷兰银行管理监督之下。总计，巴黎荷兰银行一个银行，在摩洛哥所管辖的各大企业之资本已达一九八·二五〇·〇〇〇法郎，其余加上别的银行、各种财政团体在摩洛哥的投资，到现在止，一共已达四万万八千三百万法郎，再加上各种大小商业工业的资本，则共为十万万二千三百九十八万法郎。

法国银行家在摩洛哥投出这些资本，据他们说：一方面是为“野蛮的”摩洛哥输入文化，一方面又是为法国全体人民的利益。但据我们所知道的，为的几个银行家输出十多万万资本，法国历年却也付了不少的代价：从一九〇七年起单只军费一项，就花了三十万万四千一百九十万，人死了一万二千，然里孚战争发生后的损失还不算。这三十多万万的花费是取于法国工、农群众，死的一万多人也是法国工、农群众。而法国银行家却因此达到输出十多万万过剩资本的目的，且每年可以得到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利息收入，这在他们几个人并不算损失！

至于这受了法帝国主义者之野蛮“开化运动”的摩洛哥究竟起了如何的反应，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所谓摩洛哥者，照地理学的记载，是面积占十七万六千方里，人口七百万，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交通便利，矿产丰富的一块地方。这正是帝国主义所需要“开化”的地方。法帝国主义者“开化”摩洛哥的成绩则如下面之记载：

摩洛哥自经法国十七年的占领以来，从来不曾安宁……

可以想见这稳定是如何地不自然和暂时的，是如何风雨飘摇了。

第二，我们应该知道资本主义构造上的变更。资本主义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所经历的剧烈恐慌，没有被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运用以倾覆它，结果它亦没有自动地倒塌。资本主义内部有许多潜伏的倾向和自觉的、政治的、经济的努力，足以造成新的经济平衡。例如某处资本缺乏，则以高利息以限制其输出，某处资本过剩，则用低利以促其输出，以致使资本的分配达到平均而后已。资本主义的稳定，便是这些倾向的成功，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失败。欧洲资本主义的恐慌已有六年之久，虽其剧烈程度在各时期有不同，虽然它现在已达到暂时的、局部的稳定，然而它内部的组织上、构造上，有许多变迁，使它恢复到经常的、向上的资本主义为不可能。欧洲资本主义内部构造上变更是根本的、永久的，试看它从一九一九年以来老是恐慌，没有兴旺，我们可以知道这不是一件偶然的平常的事，而是资本主义凋谢和衰微时期之开始。

世界资本主义的构造，有四种变化，为它凋谢的基础。我们试分开来说：

(1) 西欧从前是全世界的工业制造品供给者，现在它已失去此种优越地位。这有二种原因：

(甲) 自从大战以后，国际的分工消灭，从前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只是供给宗主国的原料的国家，但是现在也工业化了，它们自造的“国货”，足以抵制西欧各国工业国家商品的输入。

(乙) 在过去十年，美国一跃而为世界头等工业国，能生产廉价的工业品，与西欧各国竞争。

这两种原因破坏了西欧的全世界工业品供给者的资格。因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业是要继续发达的，因为美国工业品的输出是不能停止的，所以西欧是世界的工业制造厂的地位是永远失去了。

(2) 殖民地的额外利润减少了。亚洲、非洲殖民地人民革命运动的酝酿，摩洛哥、叙利亚、埃及等处所进行的猛烈的反帝国主义战争，土耳其已获得解放，中国及其他半殖民地正力谋独立——这一切都剥夺了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生存的基础。我们没有理由能断定这种殖民地解放运动在将来会停止。这也是欧洲资本主义所遭逢的永久的

损失。

(3) 欧洲从输出资本降而为输入资本，这是世界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变迁。我们看欧洲帝国主义的国家，从前是投资于殖民地以榨取额外利润的，现在投资很少，不惟不能接受从世界别的地方运来的剩余价值，而且要从美国借债、依赖美国，被迫割出它们所榨取的欧洲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之一部分，让给美国。特别，欧洲大陆诸国是如此，英国尚拥有许多资本在国外，而且在过去数月输出了很多的资本，但是英国因对外贸易减少，不得不用输出资本的利息填补，而有动用投资的危险。

欧洲资本主义以上三种永久的、根本的变迁，使欧洲资产阶级不能用他们从殖民地获得的额外利润，贿买一部分工人，造成工人贵族，以维持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此在英国特别显著，无论英国首相鲍尔温如何劝告英国的资本家与工人合作，但是事实上，英国帝国主义没有维持英国工人贵族生活的可能。欧洲各国的情形也是如此。资本家常想降低工人的生活，使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隔离愈远，使工人阶级革命化，使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工作格外困难。

(4) 资产阶级的孤立，在纸币跌落的国家，有一普通的现象就是小投资者的消灭。这一阶级不做一点工作，参加资本主义的剥削，在各处永远是资本家的最可靠的后备队，惟资产阶级之马首是瞻，拥护资产阶级的政纲。现在，这一阶级，在德国、法国、比利时、奥国、波兰实际上是完全消灭。滥发纸币，纸币跌价，实际上破坏了各种生利的债券，如公债、恩给金、工业农业的借据、薪俸等。这些储蓄的资本虽然现在还在进行，虽然有几分之几的资本已恢复过来，但这些寄生阶级的重要比起大战以前已减至零度。这一阶级的资本有一部分在大战时用干，有一部分因纸币跌价的结果，都滚到工业资产阶级的荷包里去了。

以上四种构造上的变迁，指示出欧洲资本主义的衰亡，除非经济力能将它翻转过来，一切资本主义重新复活的预言，只证明是废话，是反革命的遁辞。

第三，我们应该知道世界资本主义灭亡过程中的方式。欧洲资本主义灭亡过程的表现，是在生产能力与消费限度的矛盾、获得市场的永久的困难、与普遍持久而且无法解决的失业问题三点上。

现时欧洲经济界的形势，是工业生产机关比战前大大地扩张，但是工业品的销路比战前大大地减少。例如，现在德国的生产能力超过战前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法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超过战前百分之二十，而市场的消费能力减低至百分之七十。英国、意大利的生产事业亦各有扩张。工业生产机关的扩张本开始于大战时代，当时的交战国必须把重要的工业集中起来化为大规模的军事工业，以应军事的急需。此等工业在战事告终以后，即改为和平的工业。但是这种工业的扩张，在大战以后仍旧继续着。战

后纸币大跌特跌，工业资本家怕他们的流动资本受纸币跌落的影响，于是竞争置备机器工厂等产业，将他们的所得投入最安全稳当即所谓“实在价值”中去。我们知道这种生产机关的扩张与资本的集中，不是因为工业生产的剩余价值积累而成，乃是大资产阶级利用纸币跌价，营投机事业吮吸小资产阶级的财富与资本，牺牲政府、官吏和工人等的勤劳、血汗的结果。因此，大资产阶级愈富足，小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愈随之贫乏，生产没有真正地增加，只增加了一些不开工的工厂、不出烟的烟囱罢了。

各国的生产事业扩张，但是工业品的销路比大战前大大减少。在国外，一方面有殖民地原料国的工业化，一方面又有美国大规模的竞争，大大地限制欧洲资本主义的活动。在本国内，工业品的销路减少，除大资产阶级外，各阶级均陷于贫乏——如小投资者的消减、工人的工资减低和大批的失业等。

生产与售卖的限度不一致，是世界经济构造变迁的必然结果，因为找销场困难，结果是关闭工厂、裁减工人——大批的失业。此种情形在英国存在已有五年之多。英国每年平均须维持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的失业工人。此种恐慌已普及于欧洲，如煤业、造船业、铁路工业。去年年底，我们看见普遍的市场的缺乏，德、奥、匈、丹麦等国的大批失业。法国、意国因纸币跌价（纸币跌落则工资低，生产费廉，因此便于与别国竞争），尚得免此恐慌，但若它们的货币稳定，也很难为它们的货物找销场。即在德国，虽然有大批资本的输入，不过是造成生产过剩的恐慌，闪出生产扩张与销场缩小的矛盾。

德国的资产阶级为救济目前的恐慌，提议两种方法：第一，减少工资，减少为社会事业的耗费，延长工作时间；第二，工厂作坊的合理支配，裁汰一些无用的，不能廉价生产的工业。但这两种方法能救济恐慌么？第一，如此生产的结果，在国内绝找不到市场，因为工资减少、失业增加的结果，只足以使无产阶级的购买力更加减削，即是说，生产能力更显得增加与国内市场缩小的矛盾无法消灭。第二，节制生产固可以使德国在外国竞争，然而为德国所获得的市场，同时亦是别国在竞争中所失去，其结果只是将德国的恐慌移于别国而已。何况解决恐慌，恢复生产与市场间的平衡不能用增加生产推广市场（在国内外）的办法，而用关闭工厂、减少生产的办法，这不证明资本主义向下的发展么？这不证明资本主义的凋谢，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繁荣和恢复健康么？

第四，我们应该知道资本主义凋谢过程中的新现象。资本主义经过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革命运动的摧残，断难恢复旧观，它挣扎于穷途末路，只等着无产阶级革命来撞它的丧钟。在这资本主义凋谢的过程中，我们可看出几点重要的现象：第一，是英国资本主义之衰微；第二，苏联经济地位之巩固；第三，殖民地解放运动兴起。

第一，英国资本主义之衰微。英国的属地及殖民地几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占五分之一，握世界之霸权，成为全世界的工厂，已有数十年的历史。英国在大战后又是战胜国，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观察英国的革命运动，还只是说英国虽然稳固，但已发现社会革命的微生虫。曾几何时，此微生虫潜滋蔓长，竟爆发今年五月的英国四百万人的总罢工。英国帝国主义所恃以支持的，有六条台柱子：一、商业；二、投资；三、工业；四、商船；五、海军；六、殖民地。但此六条台柱子，已逐渐动摇。先言商业，英国的进口货物超过于出口的货物，一年一年地增加，在一九二三年只超过二万万零三百万镑，一九二四年，三万万四千一百万镑，但在一九二五年即超过三万万九千五百万镑。当美国的对外贸易等于战前的有百分之百十九，法国的等于百分之百零六时，而英国的对外贸易只有战前的百分之五十七。英国商业的衰微，可想而知。次言投资，英国在一九一三年对国外及殖民地投资共九万万四千八百万元，但是在一九二四年对国外的投资只有六万万四千八百万元。而美国在一九二四年一年的对外投资就有十二万万四千八百万元，即是说美国的资本输出二倍于英国的资本输出。英国的投资比较美国大大地落后。在一九二五年，英国限制资本的输出，以致其属地澳大利亚求在伦敦募集二千万镑的公债，只有五百万镑应命，其余一千五百万镑乃是从美国市场募集。此事引起伦敦银行的极大惊惧，因为英国对各属地的投资从来都是垄断的。又加上加拿大的百分之八十的商业是与美国有关。英国各属地逐渐被美国平和地侵占了，经济的重心，若倾向于美国，自然政治上也就不得不惟美国马首之是瞻。第三，工业，英国的工业如电气、煤矿、造船业的技术，都比美、德诸国落后，耗费成本甚大，而其生产反不及美、德之多。英国因为资本缺乏，竟不能进行技术改良，以与别国竞争。尤其是英国的矿工业，与英国人口之百分之八十五有关，每年出产二万万五千万磅，占英国全部输出的百分之十，为英国经济生命的基础。但是在近年产额减少，国内消费量减少，处处与德国和美国竞争不过。第四，英国的商船业，因为造船的成本增加，因为装运占大宗的煤的输出的减少，因此轮船的水脚费增加，使英国的原料与粮食的供给，格外困难。第五，海军，英国用于海军的军费，约一万万五千万镑，是财政上的一大负担。而它在现在的海军，只等于美国的海军。在大战以前，英国宣言它的海军要等于任何二国际联合的海军力，现在却不成功，又加以潜水艇的发达和飞机的日渐重要，英国逐渐失去它的孤岛地位的利益。第六，殖民地，有些属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有逐渐脱离母国的倾向。这些属地在经济上倚赖美国，宁愿求美国的帮助，以抵御日本，不愿意多陪着英国参加欧洲事务以增加财政上的负担。至于英国的殖民地如埃及、印度，是常遇着民族运动的危险，帝国主义在这些地方不过是采取拖延政策，而丝毫不能解决此问题。

英国帝国主义的处境艰难，无过于今日，右有美国帝国主义与英国竞争，施它以极大压迫，勾引各属地脱离母国；左有苏俄率领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向它进攻。它的处境既岌岌危殆，所以它不得不很凶猛地侵略殖民地、剥削本国的工人阶级和攻击苏联。它的横暴，乃是世界革命运动威胁它的生存，逼它不得不然。但是它凶猛地侵略殖民地，在去年即遇着五卅运动的打击，今年向本国工人阶级进攻，增加矿工工作时间，减少工资，又遇着四百万人的总罢工的抵抗。帝国主义衰微的过程，没有比英国帝国主义还明显的了。

(2) 苏联经济地位之稳固。苏联的存在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列强一大威胁。两种敌对的社会经济制度在今日对立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此一制度的强固即是彼一制度的衰弱。在今日，苏联地位的巩固与它已开始社会主义的建设，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工业生产，已达到战前百分之七十（前年度达到百分之四十），即倍于前年度的生产。农业也很快地恢复到大战以前的和平时代的状况。国有产业的生产增加与私人产业的生产减少，私人资本家只雇用百分之五的工银劳动者，这一切都证明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是十分显著的。为了节省篇幅，我不征引统计。苏联经济地位的巩固，对于世界革命有何意义呢？首先，它对于世界的工人阶级是一活的榜样，指示出社会主义是可以实现，可以战胜资本主义的，所以苏联的存在无异逐日使全世界工人革命化。其次，对于资产阶级的政权是不断地威胁，苏联在东方，在世界工人阶级及农民中的势力，对于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不啻逐日动摇其基础。苏联的力量增加对于世界革命有积极的帮助，不仅是精神的，而且是物质的。此所以帝国主义与苏联的仇恨愈结愈深，时时企图联合向它进攻，时时企图妨碍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发展。

(3) 东方民族革命运动之兴起。帝国主义恃以维持其生存的，莫过于获得殖民地的市场和吸收其原料。可是占地球六分之一面积的苏联已不是资本主义的范围，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兴起又使帝国主义难以畅行其侵略。帝国主义的侵略范围日益穷蹙，帝国主义国内的危机矛盾愈无法解决。东方的民族，土耳其已得到解放，波斯、阿富汗亦得一半的解放。中国、摩洛哥、叙利亚在去年的民族革命斗争最为剧烈。这些反帝国主义的战争、罢工与抵制，足以打击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威望，号召其他被压迫民族的兴起（例如今年高丽、台湾的革命运动）；加增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如美、日、英、美间的利益冲突，因五卅运动而扩大，英、法对于摩洛哥及叙利亚战争之利害不一致等）；给帝国主义以财政上、经济上的损失，如法国征摩军费之浩繁，中国五卅运动使英国帝国主义的对华贸易由二〇·三四三·〇〇〇·〇〇〇镑（一九二四年），减至一四·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镑（一九二五年），香港的商业几乎完全停顿了十个

月等，因此打击资本主义的稳定。

这三种资本主义崩坏、凋谢过程中所发生的新现象，不断地向前发展，直到挖好坟墓，埋葬资本帝国主义的时代为止。资本主义的稳定、受殖民地的反抗、本国工人阶级的反抗，苏联势力的增长等打击，这些打击在大战以后均是加速度地进行；资本主义的稳定受这些打击而能持久，这是决不会有的事。

(三)世界革命的前途

过去世界革命运动给我们的教训是：仅仅有革命的先锋队而大多数群众仍在改良主义影响之下，夺取政权是不可能，虽然客观的环境是革命的，虽然全国的总危机发生，虽然统治阶级不能照旧地统治。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共产党员都计算着欧洲重要的国家要爆发革命，他们的计算是受两件事实的影响——帝国主义强盗的大战和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一日演说有云：

同着我们一个队伍中前进的，有先进国的劳动群众，他们被强盗的战争所分裂，他们经过了长久的民主主义的训练。……我们的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工、农队伍是世界队伍中之一部分，他们为世界大战所分裂，热望统一，他们听见关于我们革命的每一报告、每一消息，都要欢呼，要寄以热烈的同情，——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共同事业正在俄国开始实行——即无产阶级崛起和国际社会主义的事业。活的榜样，在一国所实行的工作，比会议宣言要有效得多，——感动全世界的工人群众的，就在这一点……

一九〇五年的十月罢工是胜利的革命的初步，没有即刻引起西欧的注意，然而在一九〇五年它已唤起奥国的运动；若是当时我们已看出一国革命的模范的价值，我们现在更能看见世界的社会革命，不仅是逐日的成熟而且是一小时一小时的成熟。

然而共产党员的这种希望，终于没有实现，不是因为西方没有社会革命的条件，而是因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劳动贵族及其政党——社会民主党的背叛。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帮助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以保持政权。所以当时的直接的革命状况在欧洲各国算是虚耗，无产阶级没有成功地握得政权。

虽然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计划到世界革命的迅速爆发，他们很知道社会革命是需要一整个的历史时代的，列宁说：

每一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每一个懂得近代科学的常人，若遇着这个问题：各种资本主义的国家可以整齐地谐和地，按照比例地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么？一定要作一否定的回答。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没有也不能有整齐的、谐和的比例的事。每个国家的进化有时偏重于这一方面，有〈时〉偏重于那一方面，有时带这些，有时带那些资本主义和劳动运动的特色。发展的过程是参差不齐的。

又：

此种力量的存在将是一世界的历史的时代，一个整个的战争时代，有各种的战争，如帝国主义的战争、国内战争、两种战争的混合、民族的战争、为帝国主义者所分裂的民族之解放。……这个时代是极大的震动，一大堆战争，各种恐慌的猛烈解决的时代，——它已开始，我们看得很清楚，但这只是开始而已。

同时，共产主义者知道欧洲革命的开始，比俄国是要格外困难的，在一九一八年，列宁即已了解此点，他说：

革命未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来得快。我们必定接受这一事实。我们必须了解，先进国的革命不能如俄国一样容易地开始。……在俄国革命开始是容易的，极其容易，但是在资本主义已达到奢华的发展的国家，没有工作和准备而开始革命，这是无比的困难。

每个共产主义者应该懂得：世界革命要占世界历史的一长期的辛苦时代，而且世界革命在西欧的继续，要比在俄国的开始更加困难。所以我们了解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意思：第一，不在指出我们在世界革命的时代，因为我们不用理论，只用苏俄存在的事实，即可证明我们已处在这一时代的。第二，不在指出世界革命开始的地方和日期。在一九〇五年以前，列宁即说俄国要发生社会革命，革命时代在欧洲已开始。可是没有人可以正确地预言俄国革命何时发生，也不能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后预言第二次革命何时开始。第二时期的开始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及十月，但是世界革命的第二幕没有紧跟着第一幕，不能变更我们处在世界革命时代的这一事实。关于日期的错误是不要紧的。

我们所了解的世界革命前途的意义是：第一，指示出向世界革命进行的基本的动力，即发展的趋势没有变更。第二，分析我们现在在什么阶段。第三，衡量各种有利

和有害于革命向前发展的各势力的关系。关于第一点，我们已在上面指出资本主义现在的状态使它恢复常态为不可能，列宁的理论所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死亡的时代定律是没有变更的。关于第二点，现在我们所处的阶段，是革命运动向上发展的时代，如去年中国的五卅运动，摩洛哥、叙利亚战争，今年又接着英国的总罢工，美国的经济恐慌、银行倒闭、工人罢工，日本的农民暴动，高丽民族解放运动之崛起等。关于第三点，我们要注重在各国的社会力量关系的分析。

在这一时代，各国共产党的共同工作是：

- (1) 坚固党的组织——工厂支部。
- (2) 增加党员的教育，各种党校、研究会、训练班、实际问题的讨论等。
- (3) 联合战线，因为我们现在是在革命潮流高涨时期，各层民众的心理已趋于革命化，我们更须娴熟地运用此策略以获得群众。
- (4) 揭破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及改良派的欺骗策略（例如诬蔑苏俄为帝国主义等）。
- (5) 注意农民问题，经济的重担、资本主义的凋亡、殖民地战争、《道威斯计划》等之压在民众身上，打击农民不亚于工人。在世界革命下一次转变时，这个联盟者站在工人阶级的一边是极其重要的。
- (6) 在每次政府危机发生时，作工农政府的强烈鼓动。
- (7) 鼓动反对帝国主义及第二次战争。
- (8) 鼓动反对各国政府仇视苏俄的计划。
- (9) 组织赴俄工人代表团，因为实地的榜样是最好的鼓动的材料。

(四) 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之关系

中国的国民革命在大战以后得到迅速的猛烈的发展，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受了世界革命的影响。欧洲大战以后的民族自决声浪，使中国发生五四运动。当时苏俄革命的真相，因消息的封锁和帝国主义的诬蔑，对于中国的五四运动尚少影响。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救主是威尔逊，是美国帝国主义，故五四运动带着不少的亲美色彩。自从苏俄革命的真实消息逐渐透露于欧洲报纸，转辗传入中国以后，加以欧洲的革命风云罢工声浪（一九一八——一九二一）日紧一日，闪出工人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于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始注意到中国的劳动问题及社会主义运动。最初有《新青年》“星期评论”的社会主义的宣传。“星期评论”的宣传社会主义，正反映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潮流的汹涌，使一部分民族主义者为了接近民众，迎合民众的要求，不得不染一点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色彩。经过了一时期的社会主义的宣传，才开始有工人运动，一

般先进分子以平民学校为工具，接近和组织工人群众，引导他们作政治的及经济的斗争。一九二二年所开始的中国罢工运动，乃是一九一八——一九二一年欧洲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影响；至于当时的社会主义宣传（一九二〇——一九二一）诚难免空想之病，这正是反映社会革命的高涨，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感觉到中国可由无产阶级的努力，马上实现社会主义。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为欧洲资产阶级进攻、无产阶级退守的时期，资产阶级的进攻反映到中国来，于是唐山矿工罢工（一九二二年底）、京汉铁路罢工相继失败，中国的劳动运动经过了一极黑暗的停顿时期（一九二三年）。一九二一年的远东民族会议及一九二二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使中国共产党更了解它的职任，接受国际指导，引导中国的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中国的幼稚无产阶级在斗争的开始，即得到正确的政治指导与严密的组织，不能不说这是受世界革命之赐。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是苏俄经济恢复的一年，它逃脱了过去封锁、战乱、饥谨等种种的危机，开始社会主义的建设。它的经济地位的稳固，使它有力量帮助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于是一九二四年初国民党改组，中国的国民运动才开始在群众中得到广大的发展，所以国民党改组是受了世界革命的影响和俄国革命的援助。一九二四年初民主主义的和平时代开始，英、意各国均先后承认苏俄，中国亦于同年成立《中俄协定》，承认苏俄。《中俄协定》是反帝国主义的最猛烈的武器，于是反帝国主义运动、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呼声、反文化侵略运动都在《中俄协定》以后勃兴，使帝国主义的罪恶更易暴露于民众之前。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倒戈，又是受了中国国民党改组、中俄复交及一般革命运动高涨的影响。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中国革命运动的果实是：国民党改组，中俄复交和冯玉祥倒戈，这三件事都与世界革命运动有直接、间接的关系。

由冯玉祥倒戈的影响，在北方创造了一良好的政治环境，使中国的国民运动（国民会议及取消不平等条约运动）得到迅速广大的发展，劳动运动的复兴也取猛烈的形式（如各地不断的罢工运动）。同时英、日帝国主义的横暴因欺骗、恐吓的方法不能奏效，表现在上海及粤、汉各地的屠杀，更加激怒中国平民的愤恨。空前未有的反帝国主义的罢工和抵制乃在各地组织起来，对帝国主义给以最严厉的打击。帝国主义对着这横溢泛滥的革命潮流，不敢取武力干涉的形式来扑灭它；广东进行罢工与抵制已有年余的历史，但是英帝国主义终于奈何不了广东，只好与它和平谈判。帝国主义之如此忍辱卑屈，也是因为世界革命的影响：摩洛哥、叙利亚的战争，苏联国际地位的增高，本国工人对中国及摩洛哥解放运动的援助（巴黎工人为了援助摩洛哥总罢工一日），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态度之分歧与冲突，都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考虑武力干涉的是否合算，是否引起更大的革命爆发。帝国主义者在八十多年来第一次在中国受到严重

的损失，但是它不敢发起八国联军，它也不敢惹起中、英之战（如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这是受世界革命运动之赐。

若是中国弱小民族革命运动，在过去受了世界革命的影响，走上正确的道路，矫正了亲日、亲美，只问内政、不问外交等错误观念，得到国际的革命指导和世界革命无限的援助能加速地进行；那么，中国的革命运动也给全世界革命以冲动、刺激。列宁在一九一一年中国革命之后曾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去年的五卅运动，对于沉寂的西欧的革命运动不啻一服兴奋剂，使西欧的工人阶级注意弱小的东方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他们是曾经被民主主义麻醉若干年的；使他们逐渐脱离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因为社会民主党对于殖民地的解放斗争的态度是站在本国政府的一边的。国家主义者为了抹杀世界革命的重要，常常问英、日各国无产阶级如果帮助中国，何以它们不反对“二十一条”，不主张交还旅大、威海卫。诚然，过去英日各国的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及社会民主党的愚弄，不知同情于殖民地人民的争斗，但是欧洲无产阶级正在挣扎、脱离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它们援助中国解放运动的程度，正与它们脱离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的程度成正比例。我们不要近视和武断，这种近视和武断是与欧洲社会民主党无形的合作，隔离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潮流的汇合，阻碍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进行，维持帝国主义的寿命。

目前中国革命运动的大危机，便是中国的有些革命党人尚不了解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运动之关系，中国近来革命运动之突飞猛进，是受了世界革命的帮助和苏联是世界革命的枢纽。中国人若中了帝国主义的宣传，对苏联怀疑、仇视，其结果只有陷于失败、屈服。如此次英国总罢工，当其宣言不接受国外尤其苏联工会的援助时，它无异宣告总罢工的死刑，为向英国帝国主义屈服之准备。中国的一部分与民众接近的军队，例如国民军，在它们与帝国主义争斗时，常常声明它非赤化，以损失其在民众中的地位，为帝国主义者所乘。当革命战争正进行剧烈时，中立、犹豫的态度是没有用的，只有尽量地发展此运动，在国内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在国外得到世界革命运动的援助，才能取得胜利。

列宁告诉我们世界革命运动的进展是参差不齐的；因此，我们必须利用每个国际的革命运动的爆发作宣传，使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参差不齐的过程中互相接近和联合。我们必须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间的几种基本动力，足以促帝国主义的灭亡，我们便常分析我们所处的时代的阶段，认清敌人的力量和我们自己的力量，而自觉地促进我们的力量的发展，向敌人的最弱点进攻，摧毁敌人的势力（例如，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英国帝国主义——我们的主要的敌人势力衰微的时代，我们一切的策略和行动，都应集中在加速英国帝国主义的崩溃，而不要为其虚骄的威

吓所欺骗)。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凝固起来，植基于群众中间；教育党员使每个能成为群众的领袖；与民族革命运动的右派及资产阶级行最倔强的斗争；注意联合战线之应用；鼓动民众接近苏联；不断地揭破帝国主义的阴谋；注重农民问题；在每次政变时做国民政府及国民会议的鼓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现在的世界革命时期的任务。

苏联政治经济概况

斯大林 著 蒋光赤 译

——在第十四次全俄共产党大会（一九二五年末）之报告

（一）国内经济之总观

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中工作，自然我们的经济和建设，免不得要在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之矛盾中和冲突中发展起来。这一种矛盾和冲突，我们无论如何是免去不了的。我们不但要建设整个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对比，而且我们所用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元素，也是要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元素不同。

从此我们可以得一结论：我们建设我们自己的经济，不应当使我们的国家变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之装饰品，不应当使它也归并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体系，而应当使我们的国家形成一独立的经济的单位，此单位之发展最重要的是要靠我们国内商场的扩张，是要靠着我们国内的工业与农民的结合。

关于我们国内经济的建设，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以为我们的国家免不了要很久落为一农业的国家，它应当输出农业品，而输入工业制造的工具，我们应当照着此路行去。这一种意见，在实际上，实在要把我们的工业陷于裹足的状态，使它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发展，并将要使我们的国家变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附属物。这一种主张离我们的职任太远了，这是与我们不合的。

第二种主张以为我们应用全力使我们的国家变成为经济的独立的单位，变成为模范的国家，以引导其他资本主义要颓倒的国家走入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建设之一途。这一种主张要求我们尽量地发展工业，然而与我们现在所有的力量相符合，并不是要一步登天。这就是我们现在党的主张，我们应当照此主张进行。当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未消灭时，这种主张是必要的。倘若在法国或在德国，或在两国同时革命得了胜利，它们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之时，自然我们要改变方略，我们要使我们的国家归并于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内。但是现在当资本主义包围正盛之时，我们不得不保

存我们的独立的单位。

除此而外，我们还应当知道我们对于经济的指挥，与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经济的指挥，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私有资本统治一切，每一托拉斯、新提嘉，或一群资本家对于企业的错误，自然有商场来为他们矫正；就是有什么恐慌，也不过累着某一范围，或某一群资本家，其余这种恐慌大部分的害处，都是民众受的，资产阶级政府，可以不管。但是在我们的国家里就不然了，每一次在生产上或在商业上的恐慌，并不仅关系着某一个小的范围，而一定要牵连到全体的经济。每一次的，无论是在财政的、商业的或是工业的恐慌，在我们的国家内，可以转变为国家的全部的恐慌，因为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和农民。因此，在我们建设的事业下，我们必须有特别的观察，特别的谨慎。我们应当对于经济的建设实行有计划的指挥和管理，使错误或疏忽的地方减至最低的程度。

在我们近两年来的工作上，我们没有免去许多偶然的错误。在农村经济的范围内，我们应当注意开辟自然的物力；在工业的范围内，我们应当极力从事占据国内的市场；在国外贸易的范围内，我们应当极力减少我们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输入和输出的数量愈多，则我们受资本主义的西欧的束缚亦愈大，因之它们对于我们打击的机会亦愈多。为着要免去意外和错误意见，我们应当知道积蓄的必要。我们不能保证农村经济范围内不发生收成不好的现象，所以我们要积蓄；我们不能保证国内商场不发生意外的恐慌，所以我们要谨慎从事。我们生活在自己所积蓄的生活必需物上面，应当要特别俭省，决不可有丝毫的浪费，我们应当积蓄着为工业发展的后备。至于国外贸易呢，我们更保证不了不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我们应当谨防着变形的封锁和抵制。

我们本可以加紧步骤，把我们所有的完全都用在发展工业上面，但是若是如此，则我们对于农村经济的借贷将缺少能力了。我们可以极力加倍地输入机器，使我们的工业放起迅速发展的步骤，但是因此将要使输入超过输出，将要破坏我们经济基础的均衡——这是有危险性的。

我们或者可以尽量地增加输出额，而不注意到国内市场的现状。但是若如此，一定要引起城市中农产品价格的增高，要发生了许多的纠纷。至于工资问题，我们本可以将工资提高超过欧战前的状况，但是为着要发展我们的工业，我们不得不稍有所积聚，由工业所获得的利润，还是要有一部分充为发展工业的资本。我们一方面固然要极力增加工资，但工资的增加顶好是要不影响到工业的发展。

在我们现在的经济中，花色是很复杂的，有五种形态。第一种几乎是原始的农村经济，商品的生产性非常之小。第二种是商品生产的农村经济，在此经济中，商品的生产性有最大的作用。第三种是私有资本主义，当新经济政策尚存在之时，此种私有

的资本主义是不会消灭的。第四种是国家资本主义，此种资本主义为无产阶级国家暂时所实行，可以任意加以管理和限制。第五种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在这种工业的生产中，没有两个对敌的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而仅有一无产阶级为之主干。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及国家工业，即社会主义式的工业，我应当向你们说几句话，借以解释本党中对于本问题所发生的疑难。

我们可以不可以称国有工业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无产阶级独裁制之下，在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中，固然还是具有两个对敌的阶级——剥削的占有生产工具的阶级和被剥削的不占有生产工具的阶级——无论国家资本主义具有什么特别的形式，但是在实质上，还是资本主义式的。列宁当分析国家资本主义的时候，首先注意在租借（私人租借企业或外人租借企业）。我们且看一看租借企业是什么东西？在租借的生产中，有对立的两个阶级——资本阶级，即租借者，立于剥削的地位，租有生产工具，而无产阶级仍是受它们剥削。此地无所谓社会主义的元素，因为租借的企业对于社会主义的企业是反背的。

我们且看一看国有的企业。国有的企业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不是，绝对地不是！在国有的企业中，无两阶级的对立，而仅一劳动阶级统治一切。劳动阶级一方面领有生产的工具，一方面自己剥削自己，即不受他人剥削，因为从企业中所获得的利润，除发给工资而外，其余皆为发展工业之用，而发展工业之目的，在于改善全劳动阶级的生活。

或者又可以说，在国有的企业中，还保存有官僚主义的习气，到底不能称为社会主义的。但是所谓官僚主义的习气之未尽除，这并不能断定国有工业不是社会主义的。有两种生产的形式：第一种是资本主义的或国家资本主义的，在生产中有两阶级的对立，从生产所得来的利润，完全入于资本家的手里；第二种的生产形式，没有剥削的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为劳动阶级所占有，工作者的结果是为自己，并不是为着他人。列宁如此说过，我们的国有工业照形式上，就是社会主义的工业。

这也就同我们的国家相像。我们不称为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它具一新的形式，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因为什么称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因为我们国家的机关，不像其他资产阶级国家的一样，却是为着解放劳动阶级而工作的，而不是为着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工作的。不错，在我们的国家里尚有许多的官僚主义的余迹，但决不能因此就说我们的国家不是无产阶级的。也许资产阶级国家的机关比我们的会办事些，但是它们的目的是什么？任务是什么？是为着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为着压迫劳动阶级！而我们的机关，虽然一时不能尽免去官僚主义的习气，但是为着劳动阶级工作，为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

因此，我们也就不能说：因为国有企业之管理机关中，还未免去官僚主义的习气，就不能成其为社会主义的。也许在美国的某一个工厂中，管理方面比我们的要好些，但是他们的目的完全与我们两样。这一种原则上的差别，我们绝对不可忘却了！

我们现在且转到我们国民经济的统计。

农村经济生产物的数量，倘若以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算起，则已抵至大战前一九一三年的数量之百分七十一。据我们的统计的机关的预算，则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的农村经济生产物的数量，将增至战前的百分之八十一。从此我们可以得一结论：我们的农村经济是继续地发展着。

至于工业呢，倘若我们将国有的、租借的及私人承租的（私有的）工业都算在一起，则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的一年所给予我们生产的额数，也抵得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七十一。在将来的一年中，我们预算到要将工业的生产额增至战前之百分之九十一。大概地说，我们的工业也在发展着，今年的工业并且比农村经济发展得要快些。

关于电气化一问题，我们更要加以特别注意。国家电气计划工程处预定在十年至十五年以内，设立三十处大电站，其范围为一五〇〇千启罗瓦达，其价为八〇〇亿卢布。十年之内或十五年之内，我们想一定可以达到苏联电气化的目的。

倘若我们将国有的及合作社所有的工业的生产额与私有的相比较，则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的一年中，国有的及合作社所有的生产额占百分之七十六，而私有的占百分之三十六零。在今年这一年中，国有的及合作社所有的工业之生产额将增加至全部百分之七十九。在比较上，私有的工业的重量在这一个时期内是减低了。不错，私有的工业也是在发展着，但是国有的工业发展更快些，因此相形之下，私有的工业，重要就减低了。

这一桩事实使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的工业的权威超过了私有的工业。

倘若我们将国有的财产的数量，与个人私有的财产的数量相比较，则在此处我们也可以看出无产阶级的国家要占胜利些。

我们的社会制度不能纯粹地称为资本主义的或是社会主义的。在全局上看来，我们的制度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制度。在此种制度之下，所谓私有的农民的生产还占一部分的势力，但社会主义的工业却时时刻刻地生长。因为利用集中性和组织性，因为我们实行的是无产阶级独裁制，因为一切运输工具都在我们手里，因为银行受我们的支配，所以社会主义的工业有不断发展的可能，而渐渐将私有的工业屈服于自己势力之下。这一种社会主义的工业将渐渐消灭其他各种经济的形态，将要使乡村尾随着城市之后。

这是现在我们国民经济的特点及其概况。

至于我们国家的决算呢，它也是不停地在增加着，若同战前一九一三年比较起来，则当得百分之七十余。关于利润一问题，则在去年一年，我们国家企业及协作社所收入的，的确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的国家是很穷的，没有借得外债之可能。我们应当好好地注意我们自己的工业、商业、银行及协作社的进行状况，好借之以规定我们有些什么东西为发展经济的根基。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之一年，国有工业所给予我们的利润为一四二·〇〇〇·〇〇〇卢布，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之一年内，利润又几乎增加两倍。至于国有的商业呢，所得的利润也颇为可观，倘若继续地发展下去，我们国家的收入是不成问题的。

现在且说一说国外贸易。在一九二五年的一年中，国外贸易给予了我们四四兆卢布的利润。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之一年中，协作社所给与的利润为五一兆卢布。自然，比起战前来，我们国外贸易的流动额数是很少的。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输出额为五二二兆，输入额为四三九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输出额为五六四兆，而输入额七〇八兆，输入额比输出额多得一四四兆，这种现象是不大好的。第十三次大会决定，无论如何，我们的党一定要做到输出额超过输入额，但是我们却没有做到。在将来的一年中，我们决定在对外贸易上，至少要使输出额超过输入额达到一百兆。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国家很穷，外资又不到我们国里来，就是来也是很少的，我们应当使我们的金融不至于有所摇动。

我们照着我们能力所能做到的努力做去。

(二) 工业与农村经济

倘若我们看一看直接与工业和农村经济及其相互间有关系的问题，我们可以指出以下的要点：

第一，我们还是农业的国家，所谓农村经济的生产额数还在工业的之上。工业已达到了战争前的状态，然往后的发展，却是在于新的技术之应用，新的工厂之建造，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这需要很多的资本。因为我们的资本不充足，所以在将来工业的发展中，我们的步骤不得不走慢些。

但是在农村经济的范围内却不然了。我们不能说在农村经济的范围内，一切发展的可能性都枯竭了。在现在所有的技术的根基上，农村经济的确还有很快的发展的可能性。只要将农民的文化程度提高一下，或者就教会农民如何清理保护种子，这就可以使农村经济的生产额提高到百分之十二至十五。在最近的将来，农村经济的发展还不至于遇到什么技术上的大阻碍。

因此，在最近的将来的几年中，我们的工业与农业相互的不均衡的现象是免不

去的。

在这一种状况之下，我们的职任又当在什么地方呢？

一来，我们要竭力提高国有的工业；二来，我们要提高具有地方形式的苏维埃工业（省有及市有的）。我们不能仅将全力尽集中于国有的大工业，因为我们的托拉斯和新提嘉不能满足一万万四千万人口的需要。为着满足全国人口的需求，则必须在每一区、每一省、每一地方，提高工业的生活。倘若不利用地方的工业力量，倘若不发展每区或每省所有的、可用为经济建设的东西，则我们将达不到提高全国工业生活的目的，不能使全国工业化。

第二，从前关于燃料问题，都以为燃料的生产是过剩了，现在我们却走到燃料生产的恐慌之一问题上来，因为我们的工业的生长，比我们的燃料的生长要快得多，倘若我们再不极力发展燃料的经济，则我们将使燃料的供给不能符合工业发展的要求。

第三，关于五金的生产，我们现在也感觉得不足。工业的发展依赖五金的生产为最多，倘若我们的钢铁不能符合工业的要求，则工业将无发展的可能。

第四，我们熟练工人的数目不能符合工业的要求。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之一年中，全部需要添补四十三万余熟练工人，而现在所有的不过是四分之一。

（三）商业问题

现在且看一看我们商业的状况。

在商业的范围内，也就同在工业的范围内一样，国有的商业之发展程度，比较私有的商业之发展快得多。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之一年，国内商业流通的数目占战前百分之七十一。在这流通的总数中，国有商业占百分之五十，合作社占百分之十九，而私有的商业仅占百分之二点五不足。在历年的商业流通的统计中，我们只看出国有的及合作社的商业之渐渐地发展。

在原料的及面粉的制造方面，国有的及合作社的企业更占有不可比拟的势力。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屠宰业，国家占百分之六十五；麻，国家占百分之九十四；棉，国家几占百分之百；面粉，百分之七十。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之一年，关于面粉，国家曾占百分之七十五，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之一年，国家所占的所以有些微减低者，乃因国家机关没有把市场观察清楚，没有计算得当。在将来的一年中，我们要免去以前的错误。

（四）阶级及其相互间之关系

国民经济之发展，首先改善了劳动阶级之物质的生活。劳动阶级之恢复元气及其

生长的步骤，也非常之快。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以前，各种工人之全数为五·五〇〇·〇〇〇人，其中一百万为贫农，七十六万为失业者的加入。然至一九二五年之十月一日，工人数目增至七〇〇〇〇〇〇有余，其中一百二十万为贫农，七十一万五千为失业者。当然，我们的失业问题，有多余的工资可以长期发给津贴。如今连这津贴都省下一大部分了。每月工资平均起来，在一九二五年四月，等于三十五卢布；而在一九二五年之十月，却增至等于五十卢布。工资日见增加的现象，我们当然是看得很明显的。倘若我们看一看工资与生产率之相互的关系，则生产率的提高与工资的增加是并行的。在去年五六月间，工资的增加超过了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因为在假期中，而同时进厂的有一些新的工人——半农民。

农村经济之提高，自然要改良了农民的物质生活。农村居民的消费率，照着我们统计的机关算起来，比城市居民的消费率要增长得高些。农民将自己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大半留为自己用，衣食日渐地好起来了。

至于无产阶级国家所帮助于贫农及因灾荒而受惠的农民的，在什么地方呢？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之一年中，照着财政人民委员会的统计，国家帮助贫农所消费的数目，近于一百兆卢布。除开减轻税率而外，国家又专门组织了消灭灾旱基金委员会，其款额为七十兆。自然，无产阶级国家用以救济贫农的数目还是不大充足。但是无产阶级在此也就表现出自己的特性了。

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物质生活之改良，这是发展我们建设事业之根本的前提，无此，我们绝对不能推进我们建设的事业。这种根本的前提很明显地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物质生活之改良，同时提高了他们对于政治的积极的兴趣，他们很积极地批评我们现在所有的缺点及算计不周的地方。不但工人和农民复活起来，就是新的资产阶级也兴奋起来了。我们的政策至此不得不有点转变，就是我们要振兴协作社的事业，整顿职工会，对于农民略为让步，极力救济贫农，实行与中农连合的政策。我们党的政策应对于农村特别注意，我们要整理农村间的关系，我们要使无产阶级的权威在农村中提高，要保障无产阶级与贫农和中农之坚固的同盟。

或者有人要问，我们对于中农所施行的政策是对的吗？与列宁所指示我们的有没有冲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中，关于农民问题，曾有一议决案，就是在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时候，他的同盟者仅仅只能是贫农，而只可使中农占着中立的地位。倘若我们现在与中农联合，这岂不是与该议决案有点不合么？

其实这并没有不合的地方。当列宁写这一条议决案的时候，他的注重点在于正从事于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而我们现在已经得到政权了。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有三个阶段：第一，当我们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列宁曾提出口号，与一切农民联合，

在资产阶级中立的状态之下，反对皇帝，反对地主。当我们走到第二个阶段——十月革命的时候，列宁又提出“适合环境”的新口号，就是无产阶级与乡村的贫农联合起来，反对一切城市、乡村的资产阶级，而让中农立于中立的地位。所谓中农是很能看风转舵，他看着哪边胜就向哪边跑，当无产阶级初得到政权而尚未十分巩固的时候，还是不能把中农当为同盟者。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很巩固了，我们为着要从事于广阔的建设事业，不得不提出与中农联合的口号。所谓社会主义的建设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一定要将许多万乡村的民众包括到经济建设的范围内，不能仅注意城市就算了事的。

所谓无产阶级与中农的同盟，这并不是把贫农的地位和利益忘却了。我们的真实的同盟者除了贫农而外，还有谁个呢？当然是没有的。有些同志们或者以为我们施行与中农同盟的政策，恐怕要有忘却贫农利益的危险，其实这种想象是错误的。我们真实的同盟者当然只有贫农，而我们对于农民最关心的，当然也是要极力增加贫农的利润，岂有把他忘却的道理？不过在经济的建设中，为着要极力提高经济的发展，我们不得不对于中农让一让步。这种让步，在我们的目的上看来，并没有妨害。

我们帮助贫农不应仅仅在物质方面，我们应当好好地使贫农自己组织起来，使他们觉悟到自己的力量，使他们在选举上、合作社内、苏维埃内，能够独立地成为一种大力量与富农奋斗。惟其如此，我们才能使乡村的贫农成为无产阶级国家有力的柱石。

至于富农的问题呢？本党中有两种倾向：第一种以为富农并没有什么可怕地方，或者有人以为乡村中的阶级斗争已经是没有了，所谓富农退出了舞台；第二种以为富农重新发现于乡村中，是极危险的现象，“不得了了！救命呵！富农在横行呀！……”很多人这样地呼喊，似觉真是有天大的祸害样子。这两种倾向是哪一种对呢？都不对！新经济政策实行后，乡村中资本主义的分子——富农当然复活了许多，我们当然不能把他们看轻了。但是过于把他们看得重了也是不必要的。我们应当竭力组织贫农，联合中农以对抗富农。在无产阶级、贫农与中农联合的战线下，富农是没有什么大可怕的。

我现在且转到我们党对于国内现状所行的政策。

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范围内，我们应有以下之工作：

- （一）继续扩张国家的生产产品的额数；
- （二）将我们的国家由农业的变为工业的；
- （三）保障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使能超过资本主义的经济；
- （四）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应保障我们国民经济的独立性；

(五) 扩张国家由赋税所得的收入；
(六) 提高工业生产的技術，增高生产率，减低物价，扩大资本的流通；
(七) 使燃料、钢铁运输状况符合工业发展的需要；
(八) 发展地方的工业；
(九) 提高农地的收成，改良农村经济的技術，渐渐使农村经济成为工业化；
(十) 使散漫的农民经济包括于社会主义的建设，用提高农民文化程度、发达协作的方法。

在商业的范围内，我们应有以下之工作：

(一) 扩充和改良商品的流通处，如协作社、国家商店等；
(二) 竭力增加商品流通处的速度；
(三) 减低零售的价格，务使苏维埃协作社的商业超过私有的商业；
(四) 对外贸易一方面要使商品的流通加紧速度，而一方面又要使在流通中，我们的输出额超过输入额。

在阶级间之相互的关系上，我们应有以下之工作：

(一) 保障无产阶级、乡村贫农与中农的同盟；
(二) 保障无产阶级在此同盟中之指导者的地位；
(三) 努力使乡村的富农与城市的资本家受政治的和经济的限制。

在苏维埃建设的事业方面，我们应竭力设法免去官僚主义的恶习，而引导广泛的群众参加这一种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我现在且说一说新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代表。新资产阶级已经拥出自己的代表来，他们以为苏维埃政体一定要渐渐地走到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道路，一定要渐渐地改变自己的面目。这当然就是妄想呵！我们的党永远不会改变自己的面目！资产阶级也永远没有得势的希望！现在我们党内的党员，无论老少，在思想范围内，一天巩固似一天，他们都渐渐明了列宁主义，无论你说出来什么新奇花样，你总把他们弄不糊涂了。他们自己会分析，他们自己会研究！他们有列宁在头上，在手中！我们的党永远不会离开列宁主义！

现在且说一说我们的党。

我已经说过，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中，我们的无产阶级独裁制居然能支持下去，并且对内和对外所行的政策，都有很多的进步。但是，倘若没有我们的党作指导，即无产阶级独裁制是绝对不可能。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我们的党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有不断地一天比一天巩固起来。我们所遇着的困难是非常之多的，倘若我们的党不日渐巩固，我们能胜建设

社会主义的大任务？当然，我们要完成自己的职任，一定要得西方社会革命的帮助，不过绝不能因为现在得不到西方社会革命的帮助，我们就灰起心来：西方的社会民主党天天做反工人利益的工作，他们暗示工人没有建设的力量，使工人不自信自己有建设的力量，所以现在我们要在自己的努力中，表示我们的工作给西方劳动阶级看看，证明劳动阶级不但有破坏的力量，而且有建设的力量。

近来西欧工人的代表渐渐来察我们的工作了，渐渐相信自己的力量。有我们作为榜样，我相信西欧的无产阶级一定更要努力实现出自己的目的来！

英国帝国主义之崩坏与世界革命

尹宽 著 耳悚 译

(一) 资本主义稳定期中的英国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的世界，在最近过去数年间，的确经过了一个所谓“资本主义稳定期”。

这个“稳定期”的表现究竟是如何呢？这就是说：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帝国主义的大战后，数年间，资本主义的世界在生产上、贸易上及财政上都陷在极端的无政府状态中，有一个极恐怖的破产。差不多自一九二四年开始以后，一班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和贸易又开始恢复起来，而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也就渐渐地稳固了些。

直至现在，从经济上说，在欧洲所有先进的国家中，生产上与一九一九年（即大战后最恐慌的时期）比较起来，有一个向前进的倾向，并已达到战前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程度。若我们以整个的欧洲观察起来，工业和商业虽说远没有达战前的程度，但实是在进步中。在财政上，所有这些国家的预算也都费尽曲折，从对一般人民加以可怕的租税的负担上，保持在平衡的地位。虽然在有些国家中，还有兑换的动摇，但普遍地说起来，大战后数年间的混乱已经不存在了。

从政治上说，在大战后的危机中，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潮流本是风涌而起，只因过去的工人运动都在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政党领导之下，一时没有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以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因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除俄国的外）得以拼命挣扎，危而复安，并渐渐恢复其经济势力。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怒潮自然也就相当的平静，而暂时归到一个革命潮流退落时期。

就是这样表现所谓“资本主义稳定期”。在这个“稳定”期中，所有第二国际改良派的社会主义者，都得意洋洋地为资本主义歌功颂德。他们以为大战后的危机不过是资本主义一时的、偶然的病态，并不是它的根本危机。他们的意思仿佛是这样：“资本主义在大战后的确是经过一个危机，但是，现在它又恢复了，并且在大战以后，它只有日渐强固。纵不能说它一定还有一世纪的生命，但它至少还可以存在数十年。”

有一位捷克斯拉夫的社会民主党人竟直截了当地在他们的机关报上这样的说：“不

知为什么理由，在俄罗斯，至今还有人认为欧洲有一个牢不可破的错误见解。人还相信欧洲经济制度会走到一个厄运；人还相信欧洲尚在进行进攻俄罗斯的阴谋，并有实行联盟攻击俄罗斯的计划；人还相信欧洲许多国家都非常动摇，这些国家的崩坏都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假使人们已切实施行许多方法，如采用《道威斯计划》，以财政帮助德国、波兰、奥加利，不就是共产党人一个失败么？再加上《洛迦诺条约》——欧洲对美国债务的协调，所有这些不都是表明欧洲正在准备有一世纪的新的生命吗？”

这班社会民主党人至死不失为机会主义者。在大战以前，欧洲资本主义因发展其帝国主义，经过二十年的相当的和平发展，他们即大唱其改良机义；现在对着这个“资本主义的稳定”，又为资本主义庆祝万岁。其实，大战以前，资本主义二十年的相当的和平的发展，还可以说算是经过一个新的时代，现在这个“稳定”只能算是资本主义临死时一个回光反照！

我们共产主义者用不着自己欺骗自己，应该毫无惧怯地观察危险，用正确的眼光估量敌人及其势力。我们并不否认现在有一个“资本主义的稳定期”存在，但这个“稳定”是暂时的，同时又是相对的。在一个相当的短的时间内，资本主义的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是决定的！

何谓暂时的？我们所以说这个“稳定”是暂时的，就是因为这个“稳定”是“人为的”，用剜肉医疮的办法取得的；资本主义不但不能从此走入正轨，顺遂发展下去，并且将因此而有更严重的、更彻底的、更不可救药的危机到来。这个“稳定”的根本的来源不外三个：（一）乞援于美国的资本，使欧洲财政上附属于美国——直至现在欧洲欠美国的债项已达二百六十万万金罗布，此外尚有私人的借款（即美国存放于欧洲企业中的款），合计起来，也不下数十万万；（二）加重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如增长失业（全西欧共计五百万失业者）、缩减工资、延长工作时间……；（三）增加赋税的收入，以剥削一般劳动者及小资产阶级——例如，在去年英国的赋税收入与战前的比较为百分之二五八，法国为百分之二九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稳定”是有绝大的代价的：欧洲资产阶级为在美国财政资本统治之下，竭蹶图存，必须加重对于本国劳动者、小资产阶级及殖民地的剥削，这种压迫现在方才开始，将来更加厉害。这样的结果，自然一方面增长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另一方面增长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总而言之，就是增长世界革命。

何谓相对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第一，这个“稳定”是比较大战后的危机而言；若与战前一九一三年和一九一四年初比较起来，除开美国，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达到了战前的原状。第二，人不能以简单的数量上增加而证明资本主义危机之减退。例如德国工业上、商业上都比大战后恢复了，但它对于美国债项本利的担

负及对协约国的赔偿加重了；世界上煤的生产量在一九二四年比战前一九一三年或一九一四年多二千四百万吨，然而因为战后全地球生产力分配改变的关系，英国的煤业及相应而至的全英国的经济尚发生猛烈的危机。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是整个的，从全体上观察是比较稳定的，但某几个国家又已开始表现很严重的危机（如波兰、英国……）。甚至在一个国家中，从全盘经济上观察是比较稳定的，但某种工业或商业已开始表现很严重的危机（如英国煤业的危机及对外贸易日渐失势等等）。第四，在欧洲现在马上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固然是没有，但劳、资两阶级的冲突无论在哪一个国家中，仍日形紧张，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在统一上、在革命的左倾上，都有了极大的进步。

据上所述，我们已就可看出：所谓“资本主义稳定期”从实质上看起来，原来就是如此，若再把英国帝国主义加以解剖，我们更加明白这个“稳定”是非常不稳定的。

（二）英国的经济状况日就危殆

在这所谓“资本主义稳定期”中，各方面表现根本的危险的，要算英国是第一个。为说明英国的经济状况，我们可以分作三个领域来说：工业、商业和信托事业。

一、关于工业者

英国的工业状况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要险恶些。在许久以前，英国的工业都在国际市场上占一个优越的地位。在一九一三年，英国工业尚不亚于美国或德国的工业。现在他它一天一天走到更落后的地位了。

煤业 煤业是英国主要的工业，向来英国的煤炭不独供给本国工业的需要，并且在输出口中亦占重要的位置，不独影响于本国工业及商船之燃料的供给，并且直接影响于对外的贸易。因为英国以工业为立国之基础，每年赖大量的工业品输出，从国外换得原料及食物等回来。煤业发生危险，生产品输出减少，自然在英国入超的贸易上占一重大的原因。

自从欧战刚了，煤业即发生危险，直至现在，英国工业界表现最难解决的纠纷要算是煤业。当一九一九年时，英国首相即开始组织煤业调查委员会，调查煤业中困难情形，以解决这个纠纷。后由该委员会会长沙楷将其调查结果制定一报告书，即有名的《沙楷煤业报告书》。这个报告书的内容有两大要点：第一个，就是赞成煤矿业国营，以便整理统一；第二个，就是对工人工作时间由八小时改为七小时及增加工人之工资率均认为可行。不料矿主对此报告大加反对，结果两点中只略实行了后一点。一九二〇年，煤业与其他工业同受战后的影响，发生恐慌，英国政府又弥缝补苴，特从战时利益税中，提出七百万镑津贴矿主。到了一九二一年初，矿主仍以政府的津贴不

是根本长久的办法，迫令矿工减少工资。矿工方面遂于四月宣告罢工，罢工风潮延长至三个月之久，损失达三亿八千万镑。结果工人方面获得相当胜利，成立一种工资的新协定，并制定矿主矿工对于“利益之分配办法”。到一九二四年，矿工方面鉴于年来生活程度倍增，所得工资仍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要求矿主改订一九二一年的协定。当时英国矿主方面适因自一九二三年初以来，法国军队占据鲁尔，使德国之煤炭生产量大减，英煤业得乘机旺盛，故对矿工之要求略加采纳。不料入一九二五年，鲁尔之法军已撤，德国煤的生产又恢复起来，同时别国的煤年来亦已渐渐抵制了英国的销路，英国的煤业遂又陷于极端的恐慌状态中。因此矿主遂于六月三十日通告矿工，声明一九二四年之协定，至七月末满期，自八月一日起，工资率应递行减少，工作时间应实行八小时。矿工方面接此通告后，严词拒绝，并与铁路及电气工人结成三角同盟，预计如届期矿主方面悍然执行时，即以罢工手段对待之。政府大起恐慌，卒决定令矿主方面将一九二四年协定延长至一九二六年四月末，在此期间由政府从国库中津贴其损失，同时又设立煤业调查委员会，研究煤业问题之根本解决方法(?)。光阴迅速，转瞬之间一九二六年四月之期又到了。这个煤业调查委员会照例应于四月前(三月十日)发表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完全是混混沌沌的；在这个报告中，谁也找不出煤业之根本解决法，矿主、矿工两方对此报告都表示不满。于是两方都秣马厉兵，准备作战。四月一日，矿主方面以国库津贴之期将至，即将去年减少工资及延长工作时间之办法重行提出，矿工方面力争。酝酿至五月一日，谈判决裂，空前的同盟大罢工遂爆发。参加这个总同盟大罢工的，除矿工外，有运输、印刷、钢铁业、化学工业、建筑业、电气、煤气等工人。换言之，即包括所有的重要工业，人数达三四百万。这个总同盟罢工虽于五月十二日宣告停止，但矿工的争斗仍至今未懈。

由上一段煤业危机的小历史里，我们可以看出英国煤业在欧战后完全在拼命的挣扎中。这简直是英国整个的资本主义之写真。但是事变还在发展中，将来的危机，还不知伊于胡底呢？

五月二十二日伦敦电谓：“煤业争端前途仍无乐观，故需煤者现筹备运入外煤，波罗的航业交易所已租赁船三艘，在斐基尼亚州装煤一万九千吨来英。二十七日矿务大臣布告，自明日起各居户每星期仅许用煤五十六磅，须向地方官领取凭照，亲自取煤，店铺用煤以半数为限，不许用电灯招牌或广告，路灯亦减至不致危险之程度，违者重惩，其紧急之状可想而知。”

三十日伦敦消息：“《星期时报》政治访员称，矿工谈判如继续顿挫，则各工厂将有停工之虞，政府拟运外煤救济各工厂，预料与路工工团不致发生纠纷”云云。

三十一日洛特丹电：“英国罢工，荷兰煤业乃大发达，自五月一日起至二十九日

止，由此驶出之船，共三百二十九艘，装去煤一百五十余万吨，比平时每月平均装煤数多逾一倍，然国际矿工联合会四日在比京集会，决定设法减少运往英国之煤，加一班需煤之实业以压迫，俾资主方面得改其强硬之态度。”

六月六日伦敦消息：“谓煤业争执不已，各业均大受影响，上星期失业人数除矿工外，共有一百六十万，兰加夏与约克夏之纺织业颇为不振，纺美棉之纱厂已决定每两星期停工一星期，钢铁业现简直停顿，苏格兰现开工者仅有三厂，船厂亦滞顿。”

十四日伦敦电：“兰开夏纺美棉之纱厂工人十万现皆操短时间之工作，纱厂每星期停工一星期，即纺埃及棉之纱厂亦大受打击，则实业受损之巨，更可想见矣。”

又上海各报六月十六日所发表消息：“据英国政府所发表之五月份贸易统计，比去年五月减少四千八百万镑，自总罢工开始以来共损失一万万九千八百万镑。”

统观上列数个消息，英国煤业的危机及其影响已可见一斑了！

英国煤炭的输出在一九二三年尚占战前百分之七十五强，在一九二四年只有百分之六十一了；煤的生产量在一九二四年尚达到战前百分之九十二又二，到一九二五年减退至百分之八十八又二。在这里我们还须附带地加以注解的一点，就是煤的生产从数量上看既已如此，还须将政府屡次的津贴计算在里面。比如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煤的一个月的生产与头年同月比较算是增加四十万吨。这算是英国战后第一回的事。但是所以能达到这个地步，就是因为在去年十二月得到三百万镑的津贴。三百万元的津贴换得四十万吨煤，每吨平均计算摊一百五十个先令，差不多有每吨煤应有的价值之十倍！可惜今年的情形特别是大罢工以后的情形，我们还得不到！

钢铁业 钢铁业与煤业同为英国帝国主义的基础，并且在现在帝国主义的时代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英国钢铁生产情形也是日渐卑下。在这里，我们只须摘录英国一位新闻家维基尔（Vickers）报告就可看出。这个报告在去年四月为英国各家报纸都采登了：

……虽然失去劳伦（Lorraine）的矿山和经过鲁尔占据的破坏，德国的贸易已迅速地恢复了，钢的生产在一九二三年只有六百万吨，在一九二四年竟增至九百万吨。在法国也有同样的进步表现出来。在比国也是如此，只是程度上差异。在美国，钢的生产竟达一个令人想不到的数目：三千九百万吨……

英国钢的生产在一九二三年为八百五十万吨，到一九二四年，竟降至八百二十万吨。这里应该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后一个数目与五十年前的数目只些微高点。

我特别提出关于钢的生产的数目，因为这个数目是机器和船只制造的发展的

表征，并且它昭示我们是在这种工业中唯一的退步的工业国。许久以来，我们已失去了五十年来我们所占据的第一等位置。在从前，我们国中的煤炭是极贱的，我们努力从事于铁路的建筑，以及代替旧的木船之铁船的建筑。现在，我们没有机会再取得当初的地位……

维基尔君这一段报告有不胜今昔之感。据一九二五年的统计，英、美、德一年钢铁的生产量有如下的比例：

	铁	钢
英	一二	一二（以百万吨计）
美	五二点七	五九
德	一四	一四

英国钢铁的生产——特别是钢的生产，不特比美国差的远，并且不及德国。此种主要的工业既不能与人竞争，自然在国际市场上处处处于劣败的地位。

英国钢铁的生产是一年不如一年的。请看下表：

	铁	钢
一九一三年每月平均	八五五（以千吨计）	六三九
一九二三年每月平均	六二〇	七〇七
一九二四年每月平均	六一〇	六八五
一九二五年每月平均	五二〇	六一六

以一年合计起来，英国钢铁的生产在一九二四年尚有战前百分之八十六又七，在一九二五年降至百分之七十六又二。今年的情形当更恶劣。

船只的制造 船只的制造在英国经济中亦操一个重大的作用，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它也陷于崩坏的地位。战后三年与战前比较，英国船只的制造有如下的情形（以一千吨为单位）：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〇年
一·八九八	一·三四八	一·六二〇	二·〇五六

在制造中船只的数量，一九二四年九月末尚有一·二九七·〇〇〇吨，到去年六七月竟降低至一·一六五·〇〇〇吨，到去年年底算起来，在制造中的吨数比一九二四年要少四一二·〇〇〇吨，在制造中停止工作的吨数有九二·〇〇〇吨，即比一九二四年多三二·〇〇〇吨。

然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二五年之间，德国造船所在制造中的船只数量由三五五·〇〇〇吨增加至四〇五·〇〇〇吨。所以若人回想到国际的地位，英国造船业的悲运更加

表现的露骨。在一九一三年，英国造船厂一年制造的船只竟达一·八九八·〇〇〇吨，即占全世界制造的百分之五十九，不料现在这个比例竟降在百分之五十以下。

纺织业 英国的纺织业也还没有跳出它的危机。纺织厂全年都在减少时间中工作。中国对英的经济绝交，已在英国纺织业中起了极大的影响。在一九二五年初，输出尚在二千七百万元，到七八月竟降至八百万元。

英国各种工业的危机，特别是煤业、五金工业、纺织业的危机，自然要发生极大的失业，而且英国资产阶级为着对工人阶级进攻以救济它的工业的危机起见，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增长失业。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英国失业工人的数目是一百三十二万余人，今年春又增至一百五十余万人。现在经过罢工以后的数目还不知道，恐怕近两百万人了。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的统计，失业工人领津贴者已达一百二十二万人。

二、关于商业者

说到英国对外的贸易，英国商务大臣李斯德（Cunliffe Lister）一九二五年七月六日在国会演说叙述得最好：

若我们把我们的现今的对外贸易状况与战前比较，即得到下面的数目：

在一九一三年，我们的输入达八八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镑，输出达六九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镑，入超之数为—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镑。在一九二三年，输入为一·一五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镑，输出为九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镑，入超为二〇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镑。在一九二四年，输入为一·三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镑，输出为九九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镑，入超为三四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镑。到一九二五年五月截止，最后十二个月的贸易总额是一·三九〇·九九五·〇〇〇镑，入超之数竟增至三九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镑。

若人假定一九一三年的数目为一〇〇，我们一年平均实在的输入关于食物是一一六·七，关于原料是九七·七，关于制品是一一〇·四。制品实在的输出有一个些微改良的现象，但是煤炭的输出与一九一三年比较竟减为百分之七十六·五。

现在我们的输出，代表一个比战前生产更少的部份。若人计及明的和暗的输出和输入，我们在一九一三年有一八一·〇〇〇·〇〇〇镑的一笔总账。在一九二三年，竟减至一二·〇〇〇·〇〇〇镑；在一九二四年，竟减至三·〇〇〇·〇〇〇镑。

这是一个极危险的情形。（以上见一九二五年七月七日伦敦《泰晤士报》）

若人注意下列的数目，英国对外贸易的前程表现得更清楚：

美国生产占全世界百分之七十五的铁，百分之六十六的钢，百分之四十三的煤和百分之六十三的生油。美国工厂中每个工人每小时的生产，很明显地要高于英国几个工人的生产。美国这种对英国的竞争马上成为很严重的问题。

德国的输出过去是极受战争的损害，它的发展还没有达到战前的程度，但是现在人人知道《道威斯计划》将使德国的输出迅速地增长。德国人是一个有纪律的民族。他们努力以他们商业的和工业的发展弥补他们因战争所受的损失。德国的输出在数年之内，是有达到战前程度之希望的。

法国复兴的迅速是战后时期中一个最显露的事实。在一九二四年，法国的制造品输入很大地减少，而输出增加，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与一九一三年的数目比较起来，一九二四年的数目证明制造品的输出有一个百分之五十的增加。法国的工业界没有失业，并且招收外国工人以应生产上的需要。在大战以前，法国和英国的商业互相补充。今后应该在许多世界的商场上，遇着法国的竞争了。

在许多别的工业国家中，捷克斯拉夫、意大利、瑞士发展他们对外的贸易，意大利的工业准备要在印度市场上与英国竞争。在远东，日本代替英国很多关于制造品的供给。在一九〇〇年，英国握有中国输入的百分之二十，日本只有百分之十二。在一九二三年，英国方面降到百分之十三，而日本反增到百分之二十二又九。

以上是杜嘉尔 (E. L. M. Dougal) 在他的 *Sheltered markets* 著作中如此叙述英国的状况。

单就中国而论，根据一九二四年中国海关的报告，我们可从下列二表中看出英国在华商业之失坠的情形。

表一：英、美、日、法对华贸易输出比较表（表内各数以关平银一千两为单位）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英国	一四五·二九三	一二〇·三九七	一二六·〇一一
美国及檀香山	一六九·〇〇五	一五四·四四八	一九〇·九五七
日本及台湾	二三一·四二九	二一一·〇二四	二三四·七六二
法国	四·五五六	七·五一九	一〇·五六〇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美、日、法对华的输出都增加了，

独英国反减少。

表二：各国对华贸易输出数按照战前与战后比较表（以海关两计）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四年	
	输出货价	按中国总输入之百分比	输出货价	按中国总输入之百分比
英国	九六·九一〇·九四四	一六·五三%	一二六·〇〇一·〇二五	一二·一三%
美国	三五·四二七·一九八	六·〇四%	一九〇·九五六·九四二	一八·三八%
日本<及>台湾	一一九·三四六·六六二	二〇·三六%	二三四·七六一·八六三	二二·五九%

表三：战前战后各国往来中国船只吨数比较表：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四年	
	吨数	百分比	吨数	百分比
英	三八·一二〇·三〇〇	四〇·八四	五五·七一五·九二五	三九·三九
美	八九八·七五〇	〇·九六	六·三五九·五八九	四·五〇
日	二三·四二二·四八七	二五·一〇	三四·七五九·八八四	二四·五八
法	一·二三二·七六三	一·三二	二·一八五·八〇六	一·五五

与战前比较起来，美国的对外贸易超过百分之一一九，法国的对外贸易超过百分之一〇六，然而英国的对外贸易仅仅达到战前百分之五七。英国对外贸易每年之入超数，向来是用“看不见的”输出来弥补：海船收入，银行利息，存放外国的资本的利息。不幸这些“看不见的”输出又已一天一天地减少。

专为考察英国在世界商场上状况而设的委员会，证明英国商业权力丧失由于下列的原因：别的国家购买力的减少，英国殖民地和其他向来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工业的发展，美国和日本的生产品代替英国的生活品。若人问一问在最近的将来是否还有很多的理由可以使这三个障碍消灭，那么只有农业国购买力有一个新的增加是唯一的转机。但是英国国会专门委员会的报告却忘却了英国贸易增加的停止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原因：伦敦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统治地位丧失了。

三、关于信托事业者

英国的贸易向来依靠世界最好的信托制度。在以前，英国资本家不独借款给政府以发展国家的工业，不独输出资本在殖民地和外国建造各种新的工业，不独接济他们本国的商业，并且还是别的资本主义列强付他们的定货及将货物卖给别国市场上领取物价的总汇。自从英镑开始衰弱，不能在世界上成为中心的货币单位以来，伦敦即失了世界信托事业的中心。南美洲和远东的商人全不愿意以很轻的利率将他们的款存放在伦敦，因为数月之间这笔款可以大失其价值。这个结果就是有极大数量的短期付款，向为英国银行利用之以供给英国商业的短期借贷，现在没有了。

英国资本积累的迟缓不许它可以放置重要的资本于国外，似战前一样。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三年，英国存放资本的殖民地及外国平均每年有八万二千万美金；自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三年，只有四万四千四百万美金。在一九二三年，英国资本的输出尚为一万二千四百万镑，在一九二五年英国政府就已经限制英国资本经营于国外了。澳大利亚向伦敦要求借二万万金罗比，结果只借到五千万，另一万五千万还要跑到美国去借来。

若人注意到英国殖民地市场上，英国的贸易都已经表现没有很大的能力能维持它的地位。那么，这是很明显的，英国今后绝没有能力可以供给新的资本与它的殖民地——这种情形将在英国通盘筹算，总账上发生极可怕的影响。英国存放资本于国外，是英国帝国主义威望增加的基础之一，因此这种存放减少的结果，就是英国帝国主义的威望自动地失坠。

英国工业想以美国财政资本的援助，救济它的技术的落后。英国工业联合会会长韦莱（Willey）和英国一个大银行总经理马吉纳（Mac kenna——即过去的财政大臣）旅行纽约，想从该处获得长期借款，竟把英国危急的状况完全暴露出来了。

由以上工业、商业及信托事业各方面看来，可见英国的经济正处在日趋危险的状态。工业的不振足以影响于对外的贸易；对外贸易的失败足以影响于对外之信托事业；对外信托事业之减退又直接减少对外贸易之发展，间接因资本积累的微弱影响于工业的改进——这种“三态循环”的病证实是英国帝国主义不可救药的致命伤，因此英国资产阶级自己亦大声疾呼地叫恐慌：

为找着一个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相类似的低落，就只有回溯一八七三年的危机后数年低落的情形。（见英国工业协会出版的《英国经济现在停顿的若干原因》。）

人不能希望丝毫的改善。鲍尔温首相关于失业问题有一个最困难的第十五冬摆在他面前，难以度过。在这一冬威迫他更加厉害的就是矿业问题，津贴和调查委员会的组织只将这个问题缓和下来了，并未解决。莫要等着这个委员会会做出<什>么伟绩出来……。

我们的失业者（完全的或部分的）的数目差不多达到了男工全体百分之十二三，这个数目是一天增加一天。我们的人民中有极大的部分失却了劳动的习惯，并且这些工人差不多失了他们熟练工人的性质。数万青年人长成了，没有学习、工作的机会。对失业者的津贴竟使数十万人日趋堕落。输入和输出的总账，在现今的情形是非常的不利。

我们的铁路和一般工业的开支都靠基金，否则即不能存在。为维持我们工业的经营及支付工资的必须的资本消减了。这种情形若长此延长下去，只有倒账和破产来在我们面前。这种未来的事或者还很远，但我们是向那里走。没有改善的希望在我们眼中。〔见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九日《经济学家报》冯德爵士（Sir George Hunter）的论文〕

这里有一个问题：究竟是些什么原因使英国帝国主义发生这样的危机？解答了这个问题，连带地即解答了另一个问题：英国帝国主义这种危机究竟是它们根本的致命伤么？

具体地说起来，欧洲市场一部分丧失，在英国的殖民地和属国（Dominions）中有一个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世界经济的最高权移到美国，美国向加拿大所伸张的势力会使它完全脱离英国，殖民地的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的革命运动——这些都是大英帝国严重的、不可救药的危机之原因。不过归纳起来，英国帝国主义根本的致命伤只有三个：生产技术的落后，属国及殖民地之工业的发展和美国的竞争。

（三）英国生产技术之落后

说到英国生产技术的落后，我们只需拿一两种工业做例子。在世界电力会议的一个报告中，人曾把伦敦和芝加哥电气的供给做一个比较。电力和线路联合的集中之经济的利益，在这报告中看得非常明白。在两个城市中，电气厂所使用的煤的价值和价格差不多是平等的，但是每度（Kgwatt—Hour）电力费在伦敦是十一分钱，在芝加哥只四点四分；每度电灯费在伦敦是二十分，在芝加哥只十二分。此外伦敦电气公司在资本的比较上，也比芝加哥的公司有更少的利息，其比例是：五点三六九%对六点五五%。

在这两个城市电气供给的经济中，这种极大的不同可以由组织的不同来解释。在芝加哥，全城所使用电力四分之三是由一个大公司供给；这个大公司备有八个互相联络的大厂。在芝加哥二百七十万人口中，有六十五万是在上述的公司中订购的。这个公司在一九二二年曾供给二十二万三千万度的电力。在伦敦，电气的供给是非常分散的。伦敦城连四郊计算起来，约有八百万人民，由七十七个电气厂供给电气，共有五十个独立的路线。这些路线的联合若没有一个特别的组织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在速度上或张力上，相互间的流通都极不同。在伦敦所有路线中，有六种不同的速度和二十四个不同的张力。城市中心有四百五十万人民，由三十二种公司供给电气，其中有十六个是私人的，十六个是市政局的。在伦敦虽然人口比芝加哥更多，但购电人的数

目比芝加哥的少得多，共只有二十三万七千人。这当然是由于价格高的关系。每年电力的生产总共不过五万七千七百万。在伦敦许多工厂中，每个工厂都应该有它特别的储蓄所，这是很容易明白，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工厂的经营在伦敦比在芝加哥是非常之坏的。在伦敦，机器平均工作一千四百三十点钟，在芝加哥是三千三百点钟。在伦敦，为建筑这种不合理的电气供给的系统，人需使用一个非常大的资本。为一个启罗格兰姆瓦特，在伦敦人要使用七十五个英镑，在芝加哥，只要四十二个英镑。资本的负担，每年生产的一度电费在伦敦需五十分，在芝加哥只需六分。煤的消费在美国小的工厂中、平均每启罗格兰姆瓦特只需要一启罗格兰姆又六八。

从上面指出来的数目上，人就可懂得为什么伦敦对于人民电气的供给比芝加哥非常之贵，而营业家所得的利益亦比芝加哥少得多。

英国所经过的非常严重的煤业的危机，不完全由于欧洲大陆电气事业渐渐采用水力对英国的竞争，并且也是由于英国煤业的组织及其技术的落后情形。三千个井，附属于一千八百个公司，在技术的程度上，自然不是可以与坚强组织成托拉斯的德国煤业或美国煤业竞争的。虽然在英国，高等煤层的汲取需要一个比美国更高的技术（因美国煤业都还只在表层上工作），但这些不统一的井不能采用新式的机器。

因为电气和生油竞争的关系，生产的燃料应该由固体的改为液体的，但这种改变需要放置大宗的资本，这大宗资本是英国所没有的。

在船只的制造中也是如此。英国船业公司在德国造船厂中去订购新轮船，也无非因为德国船只的制造厂在技术上都比英国的高，船只的价格也比较贱。

现在我们不把英国各种工业一个一个地提出说了。但是为什么英国在技术上比别的国家落后呢？这又是因为英国资本积累的迟缓，不能使它追随现今世界上技术革命的进步。资本积累的迟缓和技术发展的迟缓构成英国资本主义一个非常严重的危险，并且要使它失却原有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

(四) 大英帝国的属国和殖民地之脱离

寻常有一句闲谈：“太阳绕地球一周都照着大英帝国的国旗。”这句话很能形容这个大英帝国的统治不独建立在英伦三岛，并且大部分是建立在非洲、亚洲、澳洲各属国、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上面。若这些属国和殖民地经济上、政治上渐渐地脱离，那么大英帝国也自然就跟着瓦解。下表便很明显地看见出大英帝国的基础所在地：

	土地面积（百万平方启罗米突单位）	人民（百万单位）
英国殖民地	三三·五	三九三·五
英国本国	〇·五	四六·五

上面尚有波斯、中国等半殖民地不在内，在这些国家中，英国也有极大的势力。

大英帝国向来靠这许多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做他的原料供给地及商品和财政资本的畅销场，以维持它的统治。不料经过欧战以后，发生两个大的变动：

第一个是：殖民地当地的工业的发展抵制英国的生产品，并渐渐要脱离英国的束缚。如在印度、埃及、澳大利亚、中国等地都表现这种情形；因工业化的结果，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也跟着发展，并渐渐带无产阶级性。

第二个是：美国的势力普遍地夺取英国的国际市场，特别是以财政资本的势力勾引英国的属国，使之与英国脱离。英国所输出的资本不能满足这些属国的需要，逼令它们不得不输入美国资本。

在英国的白种人的殖民地中，接近美国的倾向一天一天增长。这种事实表现特别显著的就是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新西兰（New Zeland）。这不特在经济上，即在政治上也一样有很大关系的。这些殖民地既渐渐附属于美国金融市场，同时这些国家都是太平洋主要的强有力者，新倾向于美国，是极关重要的事。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抵抗日本，宁可求助于美国而不求助于英国。因为英国对东方的政策有侵犯它们的贸易，不能得它们同意的。当去年上海五卅事件发生时，澳大利亚的报纸狂热地反对英国使用澳大利亚的巡洋舰，并宣告这些巡洋舰不是为这个目的而制造的。

在印度和埃及，英国行见有新的大危机到来。英国在印度、埃及所努力采用与殖民地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及欺骗的议会主义之失败，都是不祥之兆。英国已经不能驾驭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但英国的帝国主义又毫无力量能将它一部分利益及特权让与殖民地的资产阶级。

但事之不幸更有甚于此者。英国的资产阶级已正在孤立无援，与印度、埃及及其他殖民地资产阶级发生纠葛，处在最困难的情境，又有一个平民群众更沉重的新的困难涌现出来。过去孟买（Bombay）纺织工人的大罢工及去年五卅时上海和香港的大罢工，都表示印度、中国因工业化的增加，工人运动也跟着增加起来了。其他如埃及、澳洲甚至南非洲民族运动，都带了很浓厚的工人运动。这个工人运动一天一天地加强并渐渐取得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

（五）大英帝国之可怕的竞争者——美国

美国经济的最高权一天一天地增长。仅仅备有全地球百分之五的面积，百分之六的人口，它供给全世界生产之半数的最重要的生产品：煤、铜、棉、铁、钢、煤油、汽车。它的煤的生产虽尚只达到战前百分之九十，但石油生产之极大的增加是足以弥补这个差异的：美国石油的生产占全世界生产百分之七十，它的钢的生产已增到战前

百分之一百四十七，它的全国的收入已超过战前百分之三十。

全世界总储藏的金额不过九十万万镑，就有五十万万镑跑到美国去了。美金的价值是世界最稳固的。美国在世界经济中之继续增加的威力，全由于它存放在外国特别在外国生产企业中的资本增加。现时美国的对外投资总额已超过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美金，较之战前的数目（不过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美金）已增至五倍以上。每年收入的息金当在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美金。此外还有战争的借款已达二百一十万万美金，其中英国摊四十万万美金。英国自一九二三年以来每年要付三〇·〇〇〇·〇〇〇镑的利息交到美国金库。凭借这种资本的输出，美国在世界各部分都开辟了它的道路——即欧洲也不能跳出圈外，一天一天更厉害地落在美国资本的统治之下。

在欧战以前，英国是第一个输出资本的国家。一九一三年算是它输出资本数的最高度，在这年，它输出在各国及它的殖民地中的资本有一九五·〇〇〇·〇〇〇镑，约计美金九四八·〇〇〇·〇〇〇元。美国在一九二四年输出资本已达英国一九一三年的最高度。在一九二四年，英国存放到外国去的资本只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镑，约计六四八·〇〇〇·〇〇〇元美金，即比美国少两倍。人都已经知道，英国为维持金镑的稳定，现在已禁止资本的输出。不过按照英国对外商业的情形，即不禁止，资本的输出也一定是少于一九二四年。在一九二五年前八个月中，美国已输出六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美金，然而英国在这个期间只输出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美金，其中二一二·〇〇〇·〇〇〇元在它的殖民地中，五八·〇〇〇·〇〇〇元在别的国家中。

资本的输出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银行的动作，它亦是夺取原料的来源及国外市场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美国这些资本输送在什么地方呢？按照最近的统计，美国在一九二五年共输出十五万万元美金，其中三分之一（即五万万）是存放在加拿大，又一个三分之一存放于中美、南美、澳大利亚及日本。澳大利亚从美国获得一笔七千五百万美元美金的债以实现它的电气化，并从美国购买必需的工具以及汽车和小摩托车。在纽约地方发行澳大利亚的债款，在伦敦地方发生一个很大的轰动，因为直至现在，伦敦是垄断英国殖民地的借款。

这个轰动本是意中事，因为这种财政的动作表明美国要开始和平地夺取大英帝国的属国。经济的吸引会生出政治的吸引。

现今世界的经济状况之特别的表现就是流通资本的缺乏。美国对于流通资本的垄断，是它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上、政治上占特殊的强大地位的基础。一切国家、都会、银行和工业的企业，都应该奔走于美国资本家之前以求借款。财政总长、银行经

理、托拉斯的首领等等，都好比朝山一样拜访大拉（美金）国。

大英帝国的情形完全不同。这个世界历史中最强大的局面表现出很明显的倒塌的现象了。它的经济基础动摇了：英国已不能供给它的殖民地的资本了。它的属国要一天一天跑在美国的影响之下了。加拿大在经济上已完全与美国联结起来，与英国只剩下很疏的关系。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占全对外贸易额百分之九十。在一九一三年前十四年中，英国和美国在加拿大所投的资本是三与一之比（一·七五三·一五八·〇〇〇元美金——六二七·七九四·〇〇〇元美金），在现在，英国与美国是相等的。除开加拿大，美国的势力还继续不断地伸张到澳大利亚、南非洲以及波斯等。

再就普遍的方面指明一点，也就可见出英国在国际市场上对美国的失败。亚洲为世界最广大的市场，为几大帝国主义列强所相依为命的地方，美国对亚洲的输出自一九一三年以来，已增加百分之三百，然而英国在同样的期间只增加百分之四十。相差实在是太远！

美国这种资本的霸权，不独推翻英国国际市场上统治地位，普遍地夺取英国的市场以经济的势力，拉拢英国的属国及殖民地，并积极妨害英国的外交政策，遇英国与它的属国或殖民地当地的资产阶级发生冲突时，美国帝国主义者畅销它的资本，总是使当地的资产阶级与英国脱离而就它自己的圈套。英国恐惧它的属国或殖民地之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美国则以财政资本赞助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发展。

（六）苏联与大英帝国的崩坏

除开美国的竞争，英国还遇着一个新的劲敌：苏联。这个劲敌虽还没有与美国一样的强大，但它与大英帝国在根本上发生冲突，并且在前途上更是可怕的。

在经济的和国际政治的眼光上看，只有美国和苏维埃俄罗斯是在一个前进的途径上。因为它有一万三千五百万的人民，聚居在一个占地球六分之一的面积上，并有极大的天然财富，所以在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上，大可以把苏联与美国比较。至于在国际政治上，苏联在一切被压迫民族中的影响，是比任何帝国主义的列强都要大的，亚洲数万万人民（如在中国、印度、波斯等）都视苏联是他们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之唯一好友。

还不止此：苏联是无产阶级的大本营。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革命的工人——不仅是共产党员——都是在资产阶级的领土中，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做苏联的天然的好友。这些朋友是一天增长似一天的。

时至今日，苏联已经不是穷困的国家恳求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援助了！苏联的国民经济的进步足以步武美国。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已不能拿欺骗的话恐吓革

命的工人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饥荒、穷困和经济的破产。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已决不会为这些谎言所蒙蔽。他们看见许多满载着麦子、牛肉、奶油、鸡子等的船只从苏联驶往欧洲的市场。他们在资本家的报纸中见过苏联从外面买进很多的货。

世界无产阶级看出资产阶级的推翻确是经过许多牺牲与困苦，但是一旦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了，稳固了，前进是很快的。向来人说从资本主义产生的生产力只能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中由资本阶级支配与使用，这句是完全无稽了。苏联经济的发展证明了资本家是废物！

这正是因为以上的情形，所以苏联的存在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有莫大忧心。但立即感受岌岌乎不可终日的，就是英国。大英帝国 <已> 经是帝国主义世界比较微弱的部分。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已失却旧有稳静的态度。它完全在迟疑于探索中寻找它的最正确的道路，以维持它在世界上最高权，但终是找不着。在每个企图上，它总遇着它的主要的敌人：苏联。大英帝国是建立在亚洲民族的统治上。不幸苏联的政策专在便利一切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因此苏维埃俄罗斯和波尔札维克都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死敌。苏联的坚强就是英国的致命伤。

在这里，我们不须详加说明。我们只看英国资产阶级因波斯的民族运动，因土耳其的独立，因中国的五卅运动……对苏联非常愤激，要与之断绝邦交，就可知道苏联确是处处侵犯了大英帝国的统治。今年英国矿工罢工，因苏联工人援助罢工工人，英国资产阶级又要借口与苏联绝交，可见苏联还在布置敌人于英国家里呢！

(七) 大英帝国的革命化

英国的资本主义基础继续不断地被国际的新的动力破坏。英国资产阶级之百般的企图，以求适应新的条件并觅得一个新的基础，结果总是趋向一个更大的解体，并引起在本国及殖民地一个更紧张的争斗。因此英国的资本主义跑向一个四路无门的地方，而英国的政治家也觉得没有了出路。

战前英国资本主义是建设在世界财政最高权上的，这个最高权可以维持并扩张输出的大的工业：煤、铁、钢、机器、棉织物。唯有靠大量的资本输出到外国并预先增高工业的利润，才可以维持国际市场上的竞争。然而这种情形在大战以后竟完全不存在了，在大战以后，财政的最高权跑到美国去了。到了世界的市场比较更少和新的工业的列强迅速在全世界中发展时，英国的工业状况就不能维持了。英国的资产阶级应该寻找一个新的基础。

有两个东西是英国恢复它的资本主义强权所必须的：一、恢复它的财政资本的国际最高权；二、改组英国的工业并使之适应世界中竞争之新的条件。

但是英国的资产阶级没有力量能完成这两个工作；它必须从两个中选择一个结果。它选择第一个。战后“改造”的计划虽详细规定，但终于不能实行。因为这些计划需要很大的经费并引起货币的跌价。战后政策的骨干就在恢复金本位。这个金本位的恢复，完成于一九二五年，使英镑重新稳定。因此英国存放在国外的资本算是回复其价值，但又给国内的工业一个很大的打击。价格的抬高使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发生困难。在最近五年之间，英国工业都在不兴旺之中；失业的数目通常都在一百万至二百万之间。许多工厂因为生产工具没有革新，在技术的程度上不能与法国、德国、美国以及其他新的工业国的工厂竞争。另一方面，英国财政的强权只能用高的工业的利润来维持。但这高的工业的利润，只能由“减低生产费”才可获得。所谓“减低生产费”，就是减低工人的生活程度，换言之就是向工人阶级进攻，取偿于工人阶级。

当这“倒霉的”几年中，资产阶级利用特意的节制生产，特别是利用存放在国外的资本及布散在全世界的企业（换言之即利用殖民地工人的贱价劳力），仍旧有很大的收入。因此，恢复金本位是侵害英国工人，坚强英国资产阶级在世界上的位置。同时因为资产阶级倾向于殖民地中的活动，英国的工业遂在国外发展。印度的工业化及在近东组织一个新的王国（伊拉克），都是战后英国资本主义主要的动作。英国的工业团体都极力在属国及殖民地中创造自己企业的分所，渐渐视这些分所为它们利润的主要的来源。这种进行的过程正在发端，长此以往势必使英国变成一个游手的宗主国。

这就是英国的资本主义想适应新的条件和创造新的基础的方法。

但是这个新的基础生出来的冲突，结果只有增加破坏的势力，为英国资本主义所无法应付的。

第一，就是帝国的变动。属国和殖民地既已是原料和市场的源泉，自然就渐渐变成工业生产的中心，结果不独削弱宗主国的工业，并且必须达到殖民地独立的发展。因为殖民地新生的资产阶级渐渐一面要想自己剥削他家里的劳力，一面要趋向不是完全取得独立，就是托庇于一个新的更大的财政强权：美国。同时，当地无产阶级的形成及对农民之无限量的剥削，又产生出新的革命的势力。这就是大英帝国的新的发展的过程，所以增长了它的瓦解的速度。

第二，就是英国工人运动的革命化。在从前，英国的帝国主义者利用从殖民地所剥夺的额外的利息，可以贿赂上层的工人阶级。因此英国工人运动在改良派的领导之下，主张在共同的利益上阶级调和，以发展英国的工业。现在这新的基础竟将这阶级调和的迷梦打破了。在帝国工业中的新创造的状况已厉害地动摇产业工人的位置，特别是殖民地工人之额外的剥削，破坏英国工人原有的生活程度。英国的工业的发展，在世界竞争的新的条件中，需要一天一天猛烈地向工人生活程度进攻。在英国工业充

分崩坏中，国内资产阶级所得到的日益加多的利息的原因，就是国内工人失业、生活状况卑下、工资的减少和工作时间延长的原因：如此使英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完全决裂。为工资问题的经济斗争一天一天紧张，资本家的进攻一天一天逼近，工人的反抗一天一天扩张，就是这个明显的表征。但是这个斗争必定一天一天带更革命的性质：第一，因为经济斗争的两对手已经不是一个企业家和一个工团孤立的战争，乃是政府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斗争；第二，因为经济的条件已不容许旧的让步政策，而工人又逼着要要求根本的改革：产业国营、资本税等；第三，因为劳动者既已看清了这些新的条件，认定他们的利益与国际工人阶级及反抗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工人的利益都是一样的。所有这些原因都是扩大工人的战场，并迫他们懂得他们的争斗是一个阶级应该夺取政权的争斗。

这就是构成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化”的经济基础之过程，在英国资本主义现在的构成中，这个过程是不能有止境的，利益的分歧决不会减轻，只有增加。它不容许友谊的协商，乃一直引向革命的争斗。

这种“革命化”之具体的表现，就是年来英国工人运动处处有一个向左的倾向。举其大者而言：共产党势力的增长，工人群众中改良派的思想渐渐失势及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劳动党的内部分化并开始左派的组织；工会运动中有一个极强的左派的倾向，并有“少数运动”的组织（去年八月少数运动开了一个会议，到了七十五万人）；去年秋全国工团在斯加波罗（Scarborout）开一个大会，居然通过反帝国主义及《道威斯计划》并赞成工厂委员会的组织；去年四月英国工团总联合会与俄国工团总联合会共同组织“英俄委员会”，从事国际职工运动统一的运动；去年秋英国共产党十二个中央执行委员被捕，竟得三十万人签名要求释放；今年五月为矿工的问题而举行总同盟罢工等。

在这“革命化”的发展中，除开工人运动的左倾外，还有自由党的瓦解也值得我们注意的。英国自由党已充满了内部的冲突。众议院中四十个代表竟分成许许多多的派别，对任何问题都不能得一致的意见。向左倾的一小部分，以康伏尔西（Kenworthy）和卜林格尔（Pringle）为代表，已与劳动党的右派合作；另一部分右倾的，由阿尔佛列德猛得（Alfred Wend）主持，亲密地与保守党人合作，反对劳动党人。爱士葵虽还挂着自由党总理的名目，但已没有了积极的政治作用了。向来专事投机政策的鲁易乔治过去虽梦想与保守党做一个“国民的”联盟反对共同的敌人：劳动党，但是现在他又极力倾向劳动党，想利用劳动党再夺取政权。

这种自由党分裂的现象很明显地证明：英国阶级争斗已趋于两个极端，非左即右，没有“温和的”自由党存在的余地。英国资产阶级既不使用了自由党，现时就只有用

光棍的保守党来抵挡一切。自然到了保守党支持不了时，英国资产阶级迫不得已还是要将劳动党来试用一用。然劳动党再一试用失效，英国资产阶级总算是方法使尽，再没有了回旋的余地。同时，英国工人阶级必因之摆脱一切改良派的思想而趋向于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虽说事变的发展不似我们说话这样简单，然大体的趋势是这样，确是必然无疑的。

(八) 结论

英国的经济恐慌，特别是财政资本的失势，足以引起本国工人运动的革命化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发展，而本国工人的革命运动及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又加重经济的恐慌。如此交互影响以促进大英帝国主义之灭亡。大英帝国主义的崩坏与世界革命的发展是有极大关系的：

第一、英国的工人运动素以保守著称于世。改良主义的阶级合作思想在英国是非常占势力的。因此，由第二国际所领导的改良主义向以英国工人运动为其一个主要的坚强的柱石，于今英国工人运动的革命化足以使国际的改良主义失势，在国际的工人运动中是有极大的意义的。

第二、大英帝国在非、澳、亚三大洲拥有三千三百余万平方启罗米突的殖民地，奴隶二万九千三百余万的弱小民族的人民——此外，还须加上实际上受其侵掠的半殖民地（如中国）。于今大英帝国资产阶级既无力足以统治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资产阶级的独立运动及普通的民众革命运动，都是促进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及世界的革命。

第三、英国的资产阶级为挽救它的危亡，固然要向本国工人阶级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进攻，但同时它必须加紧与别国资产阶级争夺国际的地位。这样的结果就是国际资产阶级的冲突加剧及对国际的政治之不一致。

总之，英国帝国主义已算是世界帝国主义比较微弱的一部分，虽说第二次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不一定是暴发于英国，但帝国主义的世界是整个的，动一发而牵动全身，英国帝国主义的崩坏足以增长世界的革命的速度，破坏资本主义的稳定，是必然无疑的。

英国大罢工的原因及其经过

剑持平太

——译自一九二六年六月号《马克思主义》月刊

(一) 绪言

“大英帝国快到末日了”这句话现在已普遍于全世界各处：主要产业的慢性的衰落，对外贸易额入超的豪大，殖民地独立运动的热烈，经常失业工人的增加……总之，现在的英国资本主义是遇到了自一八七三年以来所从未经过的那种经济的危机，资本家像往前那样以一小部分的利润来给予自国的无产阶级以养成一种劳动贵族，而使自己得以高枕而眠的政策是不能继续了。他们只有牺牲劳动的利益，始得解决这个困难的局面，他们以为：“我们要挽回日就衰落的资本主义，使它重新安定；那我们只有对于我们的劳动者，再增加他们些劳动时间，减低他们些工银，方才有补救的可能！”

因此，资本家方面就开始他们的新攻势了。

企图剥削无产阶级的生存以谋跳出难关的全英资本阶级与为了拥护自身的生存权不肯屈辱的全英无产阶级，他们双方间的斗争必然是逐渐扩展，这种斗争很明显地是阶级的斗争了。

数年来盘旋于英国的经济的危机，到去年已达于最高顶，所以要想脱去这个难关的英国资本阶级，不能不出死力以谋进攻，而无产阶级对于这种严重的进攻，也不能不出死力以相抵抗。

在双方过了些“沉默的对峙”的时间而后，忽然于一九二五年的七月，以煤矿争议为引线而暴发了。一九二五年时，英国的资本阶级在无产阶级一致团结以相应战之前，深知无力抵拒，只好划出大洋一万万元（实际所用的有一万九千万元），拿来换得九个月的准备（见下）。他们于周密完备的准备而后，才有了这一次大的决战。

英国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在这次的决战中，方才开始了真实而显明的阶级战争。全英国国民也分明地站在两条敌对的战线上，所以鲍尔温首相甚而至于说：“这是侵犯宪法的自由与尊严。”但为了汤姆斯等右派首领的妥协，轰轰烈烈的全国大罢工，刚刚经过了八天，就被下令终止了，使得矿工联合会陷于孤立无援的困境中去单独苦斗。可

是这次的风潮，英国有三百余万的劳动者共同参加，以打破资本家的壁垒，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则不论在左派、右派，一致起而声援，在这一点上，已表示了很大的意义。而且它的结果怎样现在虽不可必，然而这是大英帝国“丧钟”的第一响，这话是可以断言的。现在先将根据目前所能得到的一些不很充足的材料，姑且做一个简单的考察。在下面第二节中是说明大罢工的经济的基础——即英国资本主义的衰落；第三节从经济上说明这次大罢工为什么以煤矿业为导火线；第四节说明站在三百万劳动者前面，勇敢善战的矿工联合会的发展以及煤矿业风潮的略史；第五、六两节，是说明这次大罢工以前劳、资双方的作战准备；第七节是说明这次大罢工的发展；第八节是结论，我想从上面所列次序，逐一地加以说明，以结束我这一篇文章。因为页数的限制，我只能在事实的范围内加以说明，至于理论一方面只好忽略了。

(二) 英国资本主义的衰落

英国主要工业的制铁、煤矿、造船、织物等工业，在一九二五年都一一表现出显著的衰落状态。

就中最显著的是要算煤矿业的不振了，一九二五年输出额所以大大减少的原因中，有四分之三的部分是在乎煤矿业的不振（关于煤矿业方面，下节有详细的说明）。

造船业——一九二五年的造船业虽是依然在世界造船吨数中占到了四成；但从它的结果（生产数量）看来，则去年为自一九〇九年以来成绩最不好的一年。

制铁业——一八五〇年英国的产铁额在全世界中占了五成以上，可是到了现在，单是美国一国以及到英国的八倍，法国也大有凌驾英国的趋势。这里先将最近十多年间英国的铁和钢铁的生产额以及贸易额，列表如下（表中数字是以一千吨为单位）：

	铁	钢	输入	输出	出超
一九一三年（每月平均）	八六九	六四九	一八六	四一四	二二八
一九二三年（每月平均）	六三〇	七一九	一一〇	三六〇	二五〇
一九二四年（每月平均）	六二〇	六九六	二〇二	三二〇	一一九
一九二五年一月	五八四	六一五	二三五	三二五	九〇
一九二五年二月	——	——	二三五	二九九	一四
一九二五年四月	——	——	二七四	二九八	二四
一九二五年八月	四五三	四八五	——	——	——

织物工业——这也是陷于日就困难的情况下，结果资本家遂计划缩小范围；中国自去年以来的抵制英货，当然是使棉织业衰败之一原因。一九二五年起初几个月，每月尚有平均二千七百万码的棉织物输出额，到了八九月间就激减到八百七十万码，这无非受了中国抵货运动的影响。

对外贸易——以上各种工业衰落的结果，表示得最为明显的乃是在对外贸易的上面，英国现在继续不断地被困于入超的苦境中：一九二三年的入超为一万三千四百万镑，一九二四增加到二万一千七百万镑，一九二五年度则直增至三万九千五百万镑的大入超。这个从一般的说来，则为：（一）世界购买力的减退；（二）英领殖民地工业的发达；（三）英国商品受他国商品所驱逐等等的结果。具体地说来，则为铁、钢铁、食粮等输入的增加和煤及棉织物等输出的激减所致的。

火药枪弹和金铁这些东西，都促成了殖民地急速的资本主义化，结果使得这些殖民地在世界市场中都成为英国目前有力的竞争者。对殖民地贸易的慢性的不振，是目前英国对外贸易上的一个大患，下列的一个表，很足以表示出这个不振的情形（表中数字是各殖民地输入总额中英国所占之百分比）：

	印度	加拿大	澳大利亚	纽西兰	南非洲
一八七五年	七七	四九	七三	六四	八三
一九〇〇年	六五	二四	六一	六一	六三
一九一五年	六五	二〇	五二	六〇	五六
一九一九—二〇年	四七	一二	三九	四八	五六

对外贸易的不振，在再输出一方面也可以明白看出来。英国再输出的所以不振，大概是由于：（一）因为三分之二的食粮须仰给于海外，以致生活费昂贵；（二）海外运费的巨大；（三）原料国特别是殖民地急速的资本主义化等等的结果。列表如下（以一九一三年为一百）：

	输入总额	再输出
一九一三年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	九三·三	八〇·七
一九二四年	一〇四·〇	八八·四
一九二五年	一〇八·二	八七·三

资本的输出一——资本输出，也表示一年比一年减少的倾向，现在列表如下（以百万镑为单位）：

	一九一二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投资总额	二一〇·九	一九六·五	五七三·七	二七一·四	二〇九·三	二三二·二
细别	国内	四五·三	三六·〇	四四三·五	一三三·九	八四·六
	属地	七二·六	七六·一	七四·九	九二·七	七二·三
	外国	九二·九	八四·四	五五·二	四四·八	五二·四
殖民地及外国合计	一六五·五	一六〇·五	一三〇·一	一三七·五	一二四·七	七七·二

这就是一九一三年投资总额中，约有百分之二十是投于国内的，约有百分之八十

是输出于殖民地及外国的；可是在一九二五年度，约有百分之六十七是投于国内，输出于殖民地和外国的，则不过是百分之三十三，而且如前表所示，输出于殖民地及外国的资本，在数量上也表示逐渐激减的倾向。

国库支出的激增——一九一三年的国库支出为一万八千八百万镑，到一九二四年度则激增为七万九千六百万镑，到一九二五年则更增至八万二千六百万镑，实际上有一千四百万镑的岁出超过。英国财政困难究竟到怎样的程度以及矿工补助金为什么不容易解决，这些问题，现在都可以了解了。

国债——英国的财政，受巨额的国债所压迫，以致困难得不堪设想，它每年必须付给美国一国的金额就有一万六千万美元，国债总额达到七十七万四千七百万镑的巨大，每一国民年须负担四十四元美元的利息（美国每人负担美金六元，法国每人则美金十二元）。

属地的离异——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发达，在世界市场中成为英国的竞争者，如印度的独立运动，加拿大有离异的倾向，都足以动摇大英帝国主义的基础，而且这些倾向，现正一年热烈一年哩！我们试看加拿大罢！英国对于加拿大资本的输出在战后比战前无大差异，而美国对于加拿大资本的输出，比战前竟增至三倍有半，英国在加拿大的势力已大受美国金融资本的侵迫，加拿大有个极有势力的团体，它于一九二五年六月竟向加拿大政府提出建议书说：“希望以与美国相合并为目的而与美国中央政府相交涉。”这个问题，现在加拿大许多有力的政治家，也正在那里纷纷讨论哩！

失业的增加——英国近数年来时常有大量失业的常备军的存在，而且这倾向有增无已，改善是很不容易的。现将这种慢性的失业的状态，列表以示之：

	有组织劳动者 失业的百分率	被保险者失 业的百分率	失业者总数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一〇·五	一一·五	一·二〇三·〇〇〇人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	八·六	一一·〇	一·一三三·〇〇〇人
一九二五年七月	一一·二	一一·五	一·三〇〇·三〇〇人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	一一·〇	一一·四	一·三九七·〇六三人

从一九二五年七月即去年发生煤矿风潮当时的统计看来，全英国的失业者有一百三十万又三百人，把它细别起来，成年男子为一百〇一万六千七百人，成年女子为二十二万五千人，青年男子三万五千六百人，青年女子为二万七千五百人，失业形势的严重，于此已可见一斑了。一九二五年失业者的所以增加，就因煤矿业失业增加的结果（关于煤矿业失业的情形，容后再说）。

由以上的考察，我们也可以大体知道英国资本主义的怎样衰落了。就是资本家采

用最后的攻势也是由此导源的，所以发生从古未有的全国大罢工的那种伟大的阶级战争的经济的基础，现在已很可明白了。

其次，我们要说明的是为这次全国大罢工的导火线的煤矿风潮以及它的经济的基础之大要。

(三) 煤矿风潮为什么成为导火线？

煤矿风潮为什么成为导火线呢？一言以蔽之，则是由于英国产业中心的煤矿业陷于最衰落所致的。再换句话说，则是由于这种产业的资本家对于工人所取的攻势过于猛烈所造成的。这是怎么说法呢？

第一，我们要弄明白煤矿业不振的一般的原因。其次，我们不能不考察的是为什么独是英国特别的不振。

从全世界说来，煤矿业也确是一年衰落似一年。《每日邮报》对于这点，曾经很正确地这样指摘说：“世界上所使用的煤的数量，今天已比昨天要少，明天比今天恐怕还要减少呢。”世界煤矿业的不振，莫非是这句话所表示的事实的结果。现在把世界产煤额减少的趋势，列表如下（以百万吨为单位）：

	欧洲	美洲	非洲	亚洲	澳洲	共计
一九二三年	六〇五	五三三	八	五五	一五	一二一六
一九二四年	五四九	五一二	一二	七一	一九	一一六三

(减少五三)

然而，这样不振的一概根本原因是在：（一）煤被煤油所驱逐，特别是军舰和其他船舶所使用煤的数量的激减；（二）煤被水力电气所驱逐^①；（三）因为煤的使用法上的改良，所以煤的使用量也减少了；（四）世界经济界的不振等等。

次后我们要注意的，是陷英国煤矿业于危机的具体的特殊事情是什么呢？

（一）意大利、法兰西、斯干迭纳维亚等国家，在从前都为采购英煤的好顾客，但因它们利用水力的结果，不感觉有采购外国煤的必要了；

（二）英国的工业以至船舶，本来都是用煤的，但近来很明显的有改用电力和煤油的倾向；

^① 煤被水力电气所驱逐，这在意、瑞、法、德、斯干迭纳维亚诸国最显著。试以瑞士来说，瑞士所利用的水力电气，一九一四年为五十万马力，到一九二五年，则发达到三百万马力，其结果，遂致由输入三百四十万吨左右的煤，一降而为仅仅输入二百六十万吨了。

(三) 因为《道威斯计划》的结果，致使德国以多量的煤赔偿于各协约国，这个就蚕食了英煤的销路；

(四) 美国的产煤额很急地增加，而且它的煤价尤廉，因此英煤大受压迫；

(五) 在美洲、亚洲、澳洲等地方的小国的产煤额的增加（参照前表）；

(六) 英煤受德国产褐煤的压迫。

但是，这对于英国，发生了怎样的具体的结果呢？现在将下表来表示之。

最近三年间（上半期）的产煤额及输出表（单位百万吨）

	一九二三年 上半期	一九二四年 上半期	一九二六年 上半期
总产额	一一六·六	一一九·六	一一〇·五
细别 {	输出额	三三·六	二九·〇
	国内消费额	八六·〇	八一·五

由上表看来，得知输出的激减，因而使煤矿业有显著的不振。

矿主为了救济这个衰落，只有牺牲劳动者的利益，即采用虐待工人、减低工资和延长工时等方法。劳动者方面对于资本主义这种无理的压迫，假使勉强让了一步，那就是否认了自己的生存权。

煤矿业失业者人数（一九二五年七月劳动部发表）（单位千人）

	煤矿业	其他	合计
一九二四年六月末	五九·七	九八二·〇	一〇四一·〇
一九二四年十月末	一三〇·〇	一一〇三·〇	一二三三·〇
一九二五年七月末	三一五·〇	一〇二四·〇	一三三九·〇

如上表所示，一般失业增加的大部分，差不多都起因于煤矿业内的失业增加。煤矿工人因被困于失业的危险，所以他们的工资也非常低减，连生活费也不足抵偿。不仅这样，他们在工作中，比之他项劳动者，而且更多死的危险。

一九二四年中矿工死亡数（由于工作而死亡的）

爆发	跌落	其他	共计	
一八人	五八九人	四一二人	一·一三二人	} 地下 地上

处在多量的失业者、最低下的劳动条件、死的压迫等等情形之下的英国矿工，他们自然会发生“假使再让一步即是否定自己的生存”的恐怖信念。所以他们只有以自己团结的力量来与资本家相对抗。

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而谋资本主义的稳定的矿主以及拿团结的力量为武器以相反抗的煤矿工人，他们间的问题只有从斗争来解决。数年来双方对峙于沉默中间的暗斗，不久就由发展到阶级和阶级的总斗争而爆发了。

但是为劳动者方面先锋军的英国矿工联合会的工会情形究竟是怎样的呢？

(四) 英国矿工联合会的发展

工会会员的众多，工会组织的严密，革命色彩的浓厚，这许多都是英国煤矿工联合会所独有的特点，也就是它将要成为英国劳动运动中的模范的地方。从前当一九二一年时因为汤姆斯等的妥协与右倾，致使它们苦斗于孤独无援的中间，含恨忍辱地屈处于资本家的攻势下面有五年之久，现在它们很勇敢地站在超过五百万的工会会员的四角同盟的前锋，将要竭尽它们所有的能力以动摇大英帝国的基础，这真是全世界劳动者所注目的焦点。

我在下面，先约略地把英国矿工联合会的发达和煤矿风潮的概要说明一下，附带地还说明矿工联合会之有今日绝不是偶然的理由。

英国的矿工联合会（Miners' Federation of Great Britain）是在一八八九年创立的。当时英国的资本阶级正因为力图挽回那日渐失落的独占的地位，拼死地榨取劳动阶级，因此引起了劳动界的不妥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勃兴，而势必导引劳动群众于团结和左倾。

当一八一四年大宪章运动终熄后的所谓保守主义的全盛时期，工会运动自然也不能超脱劳资协调的范围。到了一八八〇年代新的工会主义的运动起来了，而全英的劳动运动至此也就带上全国的和社会主义的性质了。^①

所以那孕育于这样的时代的英国矿工联合会在它创立的当初，已有确切的阶级意识和坚强的团结能力，那也是莫怪其然了。

英国矿工联合会的战斗的组织和主张渐次地获得了多数工人群众的信仰，好似燎原之火那样地发起来了。现在把它量的发展的状态列表如下：

一八八八年	一八九三年	一九〇〇年
三六·〇〇〇人	二〇〇·〇〇人	三六三·〇〇〇人
一九一四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五年
七三六·八五〇人	九五七·六一八人	八三〇·五三四人

^① 恩格斯解释这一点说：“英国当独占全世界工业界的时候，英国的劳动阶级在某一程度，也分了一小部分独占的利益……所以英国在涡文主义消沉后，一时尚没有社会主义的发生。但一到独占衰落时，英国的劳动阶级就失去了它那特殊的地位，与外国劳动者站到同样的地位，而没有些微的差别，这就是英国所以再有社会主义发生的原因。”（见恩格斯著《英国劳动阶级的状况》）

矿工联合会在数量上既有这些可惊的发展，就是在质量方面也渐渐有了发展。所以在政治上，一九一〇年矿工联合会所选出的议员竟和资本家政党断绝了关系，而亦不附属于劳动党的旗帜之下，它在产业的一方面差不多网罗了全体的煤矿工人，在政治的方面则与资产阶级断绝了因缘，而成为一个巨大的、有组织能力的战斗团体。

现在以每次风潮为中心，来依次说明它那发展的状态。

一八九三年的风潮——这是自工会成立后的第一次的罢工，从七月底开始继续到十一月中间，结局由政府的调停而解决，工人方面得到了胜利。

一九〇五年的工资风潮——起初是发端于司各脱地方矿主减低工人的工资而起的，渐渐地成了全英矿工的问题，结果工人得到胜利而解决了，工潮的带上全国色彩是由此开始的。

一九一〇——一一年的风潮——一九〇九年南威尔斯地方的一个矿区先发生了风潮，不久就延及所有该地方的各矿区，军队出而弹压，后由矿工联合会的出面，在一九一一年五月与矿主方面订成了协定。但工人方面不服从这种协定，他们很坚决地提出最低工资的要求，即熟练工人每日须八先令，不熟练工人每日须五先令，到后来终于失败而结束了。不过最低工资的要求，从此便成了煤矿工人以后一切运动中的普通标语，在这一点上说来，这次风潮也是有极深远的意义的。

一九一二年的大罢业——最低工资的要求逐渐成了普遍的口号，这使得矿工联合会和为矿主所组织的团体——英国矿业协会之间，成了相互斗争的局面。矿工联合会首先提出了最低工资的问题，后来发展而为一般煤矿工人的问题，并且反对地方的解决，努力于全国的统一的解决，但是矿主方面绝对不肯屈服。

矿工联合会拟以总同盟罢工的手段来对抗，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八日总投票的结果得了大多数的赞成，那就是假使到三月二日矿主方面还不让步时，就宣布总罢工。但矿主方面终于不稍屈服。于是八十万矿工的总罢工开始了。资本主义社会于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团体之前，战栗得不知所云。

自由党政府主张移转劳资双方的纷争于国会的议台上，以“立宪政治的公道”来解决，即想利用所谓“立宪的阴谋”来镇压这个运动。它也提出了一个御用的《最低工资法》，仅仅十日之间，两院都加通过了，于是矿工方面不得不忍辱上工了。

这样所得到的《最低工资法》，当然是极不充分的，然而这样的结果，间接地成为日后产生“三角同盟”的动机，使资产阶级战栗。这一点是极堪注意的。

三角同盟——因一九一二年的大罢工而得到伟大的教训与势力的矿工联合会中的急进分子，遂即正式地动议，开始与工会运动中二大势力的铁路工会和运输工会相提携而组织“三角同盟”的商议。这个商议为了世界大战的勃发，一时遂告中断，战后

因感到政府有镇压劳动运动的必然趋势，遂促成了三者间的协定，所谓“三角同盟”便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时成立了。

一九一六年八月时，三角同盟以同盟之名，提出：（一）实现和平和恢复战前的《工会法》；（二）对于解雇的劳动者，国家应为之保证标准工银或是充分的生活费等几条的要求^①，这是大足寒资本家的心胆的。

但是这个“三角同盟”，后来于一九一九——二一年以煤矿国有问题为焦点，也遂宣告解体了，所谓“黑色的星期五”那个悲伤的追忆，是英国劳动运动史上的一个可耻的纪念日（见下）。

煤矿国有问题——一九一九年二月的矿工联合会，对政府提出了：（一）六时间劳动；（二）工资增加三成；（三）煤矿国有的三个要求。三角同盟则实行援助。于是煤矿国有问题就成为大众的要求，政府虽百方防范，而五十万劳动者的大罢工却是终于开始了。革命的空气一时布满于全欧，政府不久就任命以桑侃为委员长的煤矿业调查委员会^②以从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说是必定要采用的。

这个委员会调查的结果，多数的意见以为：“煤矿业的总资本额是有一万三千五百万金镑，一九一四——一九年的煤矿业利润以至特许的总额竟达一万六千万金镑之多，煤矿主于这个时期内除完全收回了他们的总资本外，又取得了二千五百万金镑的利益。”他们由于这种明白的事实以及由其他种种方面的推论，发表了以国有为正当的主张。

事情是出于意外的，劳雷乔治竟违反了当初的公约，表示难以照行。矿工联合会是上了这位老奸巨滑的劳雷乔治的大当。在三月那时，如伦敦地方，连仅仅三天的煤都不足，而革命的空气，又是充满于全欧，这诚是矿工联合会取得胜利的好机会。可是后来呢，情形已是不同，这个机会当然是失去了。

但矿工联合会并不停止了战争。它和劳动党工会会议议会委员会消费合作社等相呼应，共同努力于煤矿国有的实现。只因时机的不利，所以一九二〇年三月工联总会议决定矿工方面所提出以总罢工来解决煤矿国有问题的建议，付之总投票。总投票的结果，遭大多数（一〇五万对三八七万）的否决，于是万事都没有希望了。

政府则乘机布散“工资一加，则家常用煤的价格，势必因以高涨等”的恶意宣传，一方面又于一九二〇年十月廿九日制定《矿业法》、《临时治安法》等等的恶法，以备

^① 伦敦《泰晤士报》对于这些要求的提出，发表它们的议论说：“这个三角同盟的实现，即所以谋正式的废止英国的立宪政府和恐吓受皇帝任命而担负国政进行的诸大臣。”（见细川氏著《英国国家内的一国家》五九页）

^② 该委员会是由议长桑侃及委员十二名组成的。委员的分配，为矿主方面三人，煤矿工人方面三名，中立方面的劳动者代表三人，资本家代表三人。

压迫矿工。在一九二一年，将本来要继续到八月三十一日的《煤矿业管理法》，于三月三十一日用不法的手段，声明取消了，这是证明政府已露骨地对劳动方面挑战。

矿主方面因为《煤矿业管理法》已于三月三十一日破弃了，就决定实行：（一）减低工资；（二）工资由各地分别协定，要是工人方面不听从时，就宣布停工。

一九二一年的决战——矿工联合会于是将此问题提交三角同盟来解决，结果三角同盟中铁路、运输两工会，也于四月八日一致地声明赞成于四月十二日实行总罢工。政府则依据《临时治安法》宣布特别戒严令，时局因此变得更加严重了。然而汤姆斯等右派领袖忽于四月十五日收回总罢工的宣言，遂使矿工联合会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不得已而忍辱地接受了资本家方面的工资条件。可是失败的不仅是矿工联合会，一切的工会运动，从此都处于资本家的攻势底下，过那艰辛的日子，工会会员的数量因此受了很大的影响。一九二〇年在工会旗帜下面有组织的劳动者为八百五十万人，一九二二年就减少到五百五十八万人。因此，那“黑色的星期五”的痛苦追忆，永远成了英国劳动运动史上一个可耻的日子（汤姆斯宣布停止罢工的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五日，是星期五，故有此名）。

一九二五年的大风潮——一九二四年劳资间成立了新协定^①工人方面稍稍得到胜利，但因煤矿业情形的继续不振，矿主此时又想牺牲工人利益以安定自己的地位。他们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廿三日，突然把限期到七月三十一日的在一九二四年所订的《工资率协定》宣告无效。到了七月一日，矿主协会发表下列的各项，作为新协定讨论时的基础：（一）工资由各地分别决定；（二）废止最低工资制；（三）八小时劳动。矿工方面则绝对加以拒绝。

决战的时期迫近了！雪耻的日子也到来了！矿工联合会奋起，工联总会总算也热烈地参加。煤矿工人联合会干事长柯克所发起的新产业同盟（四角同盟）的商议与进行，也有了急速的发展。七月十七日煤矿、铁道、运输、金属（铁厂）等四大产业工会的二百五十万人的新产业同盟，因此便成立了。工联总会到了三十日更发表给予矿工联合会以经济的援助，同时并赋予执行总同盟罢工的权力于特别委员会。危机是迫近了，工人方面的布置已一切妥当了。但是资本家方面的准备还没有完全，所以首相鲍尔温特用煤矿业补助金的名目，以大洋一万万圆（实际上支出了一万九千万圆）来换取九个月（一九二六年四月底为止）的战斗准备期。公开的决战因而又延长了九个月的时期，工人因团结的坚固，使资产阶级大为战栗。所谓可痛的“黑色的星期五”的追忆，一变

^① 一九二四年的《工资率协定》是：（一）由总收入中除出生产费（不包含工资）以外的余额百分之八十七作为工资，其余百分之十三则作为利润；（二）订定全国的统一的最低工资制，以一九一四年的工资率为基础，再增加百分之三十作为最低工资。

而为光辉的“赤色的星期五”^①的追忆了。

可是，在这九个月的中间，劳资双方都开始作种种战斗的准备。

(五) 资本家及政府方面的准备

政府与资本家既以大洋一万九千万元来买到了九个月的时间；他们当然竭力地作种种积极的准备，以备决战时的应付。

他们有一切的权利和三十六万的常备军，他们组织了产业大同盟把所有的资产阶级都打成了一片，他们在议会中又是绝对多数党，他们的势力本来已是很可惊了，但他们为了想操必胜之算，还竭力作各种战斗准备。资本家的政府在去年秋竟抬出一百五十年以前以对付资产阶级革命的潮流为目的而制定的《煽动军队取缔法》来对待工人方面，把共产党首领十二名投入狱中，因此大大减削了左派的指导力；他方面他们又大规模地组织了许多破坏罢工的团体，或明或暗地给予这些团体以各种的援助。现在将政府以至资本家方面的准备，具体的说明如下：

保给同盟（OMS）——以哈其哥公爵为盟主，去年九月由政府创设，乃是个大规模的破坏罢工的团体，它的任务是：（一）“保护公共事业”，必要时并充当特别警察；（二）铁路、地底铁路、电车的运转以及食粮的搬运；（三）于通信机关停止时，担任传令等。它完全地处于政府的维护下面保持了全国的联络，在这次罢工中间，它有很多的活动。

全国市民同盟（NCU）——以自由党领袖爱士葵为盟主，乃是资本家的一个破坏罢工团，在一九二一年的煤矿罢工中，它是很活动的。

英帝国同盟（BEU）——一九一五年时，由几个所谓有力的实行家发起创设的，自一九一九年起方始做破坏罢工的工作，一九二〇年该同盟内设立了“产业平和部”，即破坏罢工的专门部。在现在的风潮中，它从政府方面得到了很大的补助。

法西斯团——在必要时不惜诉之暴力以拥护皇室与帝国为宗旨的一个反动团体，当总同盟罢工时，往往充当军队以破坏罢工。

国民保卫团——类乎法西斯团的又一个反动团体，也是以破坏罢工为目的的，它的特色是在能够在这个团体中网罗到了各色各样的技术家。

补充军附属交通部——由陆军部的援助而成立的铁路服务人员的御用工会，也就是破坏罢工的工贼，这在铁路工会看来，最为辣手的地方。

^① 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即英国工人阶级不战而获胜利的光荣的日子，恰很巧的也是一个星期五，为了庆祝这个胜利，所以特呼它为“赤色的星期五”。

然而政府方面于这许多破坏罢工的团体之外，又颁布了《临时治安法》、《军队宣传取缔法》等等的恶法，将一切的国家权力、财力和三十多万的常备军等全部地动员了起来。

职工少数派运动的书记长乔治哈但最近（四月中旬）叙述政府方面种种武装准备说：

政府方面的准备很急速的发展着，保给同盟在政府的充分支持下面，现在一切都部署就绪了，所以在最近，又正着手组织‘紧急治安维持团’，法西斯团自动的加盟于‘紧急治安维持团’那是不必说了，划分全国为区，每区置大臣一名任管理，各大臣于总同盟罢工时有完全的独裁权。

（六）工人方面的准备

无产阶级对于有钱有势的政府以九个月的时间而筑成的资本主义的壁垒，将有怎样的准备呢？他们既没金钱，又没权势，他们所靠的只有团结和无产阶级意识。现在先把他们准备的大概，举要地说一说：

工联总会（TUC）——工人方面最大联合战线的机关是五百五十万，即包含有组织工人中间百分之八十的工联总会（加盟的工会约二〇五个）。它的中央机关关系由大会产出的三十个委员会所组织之评议部，它的任务与权限是由一九二四年哈鲁扩大会议议决的。当时所议的结果，有以下的几项：（一）各加盟工联有时常报告关于自身的产业及劳动状态于总会评议部的责任；（二）风潮假使决裂了，而且这风潮有关系到多数工会会员的可能性，或者这个风潮是由工资减低、延长工时和其他雇佣条件的逼迫而起的时候，评议部是有权加以顾问，同时且负有将自己所有一切物质的、精神的能力以援助那个工联的义务。

这次煤矿风潮所以能发展而演成这样空前的全国大罢工，实不得不归原于工联总会能够采用中央的集权制。

产业同盟或四角同盟（IA）——这是由工联总会内煤矿、铁路、运输、金属四大产业的工联，于去年七月所组织起来约有两百万人的攻守同盟，它是这次总同盟罢工中的主要势力。

全国失业工人委员会运动（NUWOM）——本年一月该会举行全国大会时，有五十四个委员会与八处的地方分会的代表，出席者共九十三人，议决的是：（一）于下次发生劳资斗争时须极力援助工会；（二）提高加入工联总会的空气。他们对于这次的风

潮，可算确有充分的准备。我们想到当罢工时他们对于失业者的种种帮助，便可深信这个运动的发展，是有很大意义的。

阶级斗争牺牲者国际救济会（ICWPA）——普通帮助资本家方面而战的人是受褒奖的，可是加入无产阶级方面而奋斗的人则往往受到入狱的危险。所以为了鼓舞战士的精神，使他没有后顾之忧，便有救济阶级斗争的牺牲者的要求。因为阶级斗争危机的日就迫切，所以这救济会的会员也大大增加起来。四月十一日，由该会的主持，在伦敦及孟基爱斯泰地方举行大示威运动，声势非常地浩大。

以上所述，不过从数量方面的观察；至说到质量的发展上，我们便首先见到了两个最重要的要素——少数派运动和共产党。

职工少数派运动（MM）——少数派运动的目的是在要求工人群众势力之国内的及国际的统一，无论如何它并不是一种分派的运动。这是因受了近年来资本家所取新攻势的逼迫，而以“广为纠合在劳动阶级现存组织内的前驱者，由此督促现存的工会都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斗机关”为它唯一的责任，它起初虽然仅为英国有组织工人间所发生的运动，但因英国的环境，逼得工人群众一天左倾一天，所以这个运动也大得了多数工人的信仰。它急速地发展于矿山、铁路、运输、金属、棉纱等各大工会间，到现在加入的工人已达一百万。自去年以来它和矿工联合会，同为有关于这次大风潮的主要势力（这派因英国大多数工会领袖都是妥协主义的工贼，所以初发起时只有工会会员中少数的人赞成。因此，沿用少数派的名称）。去年八月于伦敦所开少数派运动第二次全国大会（出席者六百八十三人，代表七十五万的人工会工人。大会的重要口号是“准备未来的斗争啊！”），以准备战斗为目的，议决了下列各项的进行策略：

- （一）密切地与失业者相提携；
- （二）组织作为斗争机关的工厂委员会；
- （三）在以后的斗争中须与共产党相提携；
- （四）组织对付法西斯政策的防卫团；
- （五）与消费合作社相提携。

少数派运动于本年三月二十一日通告全国，提议召集所有工会消费合作社及其他一切工人团体的全国大会，以准备未来的决战；一方又于四月上旬，在伦敦开了个少数派运动的行动大会（出席者八百八十三人，代表会员九十五万七千人），更议定了许多准备战斗的具体的决议案。

至于矿工联合会内部的少数派运动在这次风潮中具有伟大的作用，那是不用说的了。它们时常所提出战斗的口号是：（一）比桑侃委员会报告还要增加两先令，始得作为最低工资；（二）每日工作六小时；（三）无赔偿的煤矿国有，并交付管理权于工人。

最近举行的少数派运动内的左翼大会，关于工会运动方面，有：（一）授全权于工联总会的评议部；（二）每一工厂中，只能有一个工厂委员会的存在；（三）反对右翼首领排斥共产党分子等等的决议案。这与少数派运动的决议同样值得注意的。

共产党（BCP）——英国的共产党（一九二〇年创立）严格地说来，尚够不到称为群众的党，如党员的数量现在还不过数千人，但不论怎样，它实是少数派运动实质上的指导者。它对于有关工人群众利益的一切问题总是最勇敢地加以拥护。政府在准备战斗上第一招就是捕拿共产党首领十二名，这是很有意义的。

劳动党——无产阶级方面还有一个劳动党，那也是我们不能不把它算入的。劳动党是以工会、独立劳动党、费边社、妇人劳动同盟、消费合作社等为基础，无论如何，总算是一个群众的党。可惜因为它的主持权依然握在麦克唐纳尔、汤姆斯、乌爱波、斯诺但、蒲阿等等妥协的右派首领^①的手中，所以渐渐与工会群众相分离（这个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去年劳动党利物浦大会时的右倾和工联总会斯加波罗大会时的左倾）。劳动党右派首领于这样保守党反动的情形中，有想与自由党实行握手的阴谋，近来竟似乎有成功的趋势。

当然的，劳动党内部也自有其左派。伦斯白黎、楷柯阿杜等所率的左派是与麦克唐纳尔汤姆斯一派的右派相对抗的。不过就是这派，也并没有彻底的阶级意识。它也不想消灭资本主义的“民治”组织，比之右派的主张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别罢了。所以在这次阶级的斗争中，如果我们过于期待于劳动党，那必是归于失望的。果然，在目前的大罢工中，劳动党的议员团并没有什么积极的援助，始终抱了一个妥协的态度。

共产党力量的不足、劳动党首领的妥协等，都是无产阶级阶级阵线方面的大缺点。

国际的援助——但是无产阶级方面期待国外同志的竭力援助，是很有可能的（资产阶级为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有时竟超脱了国境而缔结神圣同盟，那也不必说了）。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亚摩斯德丹国际、各产业的国际、国际矿工总会、国际运输工人总会及其他等等国际的团结之热烈的援助，及由此号召起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之精神的、物质的援助，都大大的实现了。因此“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啊！”一句标语，便成为全英无产阶级的力量，而得到具体化了。

^① 劳动党右派首领中的代表麦克唐纳尔也是相信：“社会革命是必使欧洲陷入可悲的境遇中去的”“俄罗斯的革命不外于破灭与苦痛”。汤姆斯于这次大罢工中说：“这次的总同盟罢工纯然是个产业纷争，当它带有革命的性质那是绝对错误的。”他真是如托洛茨基所说：“不但不适于破坏资本主义的外壳，连任何作用处都没有的。”（见托洛茨基著的《英国往何处去》）

(七) 总同盟罢工的发展

以大洋一万九千万元的价值而买取九个月的准备时期的政府，拼死命从事战斗的准备，去年九月三日勒令任命桑米爱鲁为委员长的煤矿调查委员会（委员四名）又调查了一次。可是该会的委员都属于自由党和保守党，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拥护者，要使他们所做的报告能得到煤矿工人方面的满意，那是断然没有这回事的。

该委员会自去年十月起着手调查，因而矿主方面于本年一月十二日提出包含：（一）每日工作八小时（延长工时）；（二）减低工资额；（三）地方个别协定等等提案的觉书于委员会。矿工对此，亦于一月十四日以矿工联合会、工联总会及劳动党的名义，提出“关于采煤业及动力业的改造与发展的提案”，这个提案中所包含的意义是在主张：（一）采掘权及采煤权的国有；（二）煤的分配和输出的统一，电气、瓦斯及其他诸事业的国有或国营。

煤矿调查委员会于本年三月十一日发表了一篇堂堂二百九十四页的报告书。我们一读这个报告书，便知道他们确不愧为资产阶级的拥护者，这报告书的重要点是：（一）煤矿补助以四月末日预定的时期而截止，另外再筹煤业救济策；（二）工资的减低，在不得已时可以承认；（三）不赞成矿业国有^①等等。

政府对于这个报告书，当然是——加以承认了。但是矿工方面是无论如何不肯承认的。他们很决绝地加以痛斥（矿主方面对之也不服）。矿工方面对于减低工资一层是绝对反对的，所以虽经过了数次折衡、调和之后，交涉也终于在四月卅日午后十一时卅分决裂了。五月一日上午零时起九十万矿工的总罢工同时开始了。工联总会也于那天议决关于煤矿风潮的协议，如果到四日还得不到满意解决时，那凡是加入于总会的所有各重要产业的工人同时举行总同盟罢工。但是到了四日那天，连解决的一线曙光都看不到，于是全英三百万的工人群众不得不一致地开始总同盟罢工了，资产阶级大为失惊，只得狂呼“拥护宪法”的笑话了。后来为了汤姆斯等右派首领的妥协，到十二日那天，突然以工联总会的名义发出终止大罢工的命令，于是又使得矿工联合会苦斗于孤独无援的中间。矿工联合会直至今天还是勇敢地在那里继续奋斗哩！

(八) 结论

迫得资产阶级战栗于无产阶级一致团结之前的全英总同盟罢工，虽暂时地终熄于

^① 报告书上说：“为了助长这个特殊产业（煤矿业）的发展，与其由国家来管理，不若由富的个人来办理比较地自由而有希望，所以矿业国有是不可以的。”

世界资本主义乃至右派领袖之手，而不见有如何的发展；但是罢工至今还是在继续之中，矿工联合会始终不屈地继续着孤军奋斗。今后将有怎么样的发展，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关系今后将有怎样的变化，现在尚是不能预测。资本家的攻势是否因此更为猛烈而现成了一个反动期呢，还是工人方面因此得势而直迫资本家的壁垒呢？这些问题，虽一时都难以预测；但不论将来的形势发展到怎样的程度，英国的资本主义已急速地进入于陷落的过程中，那是可以断言的。

今后有没有反动期的降临，资本家是否能得到暂时的稳定，这虽然也是不可料的，但是英国资本主义急速陷落的趋势是必然地存在的。因此与牺牲工人利益而谋延长自己生命的资本家的策略同时而起的阶级斗争，必然地日趋紧张、愈为深刻。

距今一世纪前有位著作家这样的说道：

目下英国的前途有远大的希望，为从古所未有。英国制造工业的产额超过世界的四倍，而全欧的棉织业生产额，恐怕及不到英国十六分之一哩！

要是使这位著作家复活于今日，他将怎样的说法呢？英国的独占地位已差不多完全失落了，它已不是个世界的工场，主要的产业则一天衰落一天，属地则要求独立，失业者充溢于市上，巨大的人超围绕着。资本家则唯有牺牲工人利益以保护自己的利润，工人则以他们的阶级意识和团结力为武器而与资本家相对抗，以保持自己的生存权，阶级斗争的形势更加是迫切而严重了。这个时候如果再对于大英帝国下句断语时，恐怕是不出“激荡于革命的惊涛中的海船，现在更遇到了暗礁了”这一句话罢！

摩洛哥的革命战争

颜斐周

二十余年来，成为欧洲重大政治问题之一的摩洛哥问题，中间虽经过一次帝国主义者大大的武力决斗——欧洲大战，至今不但丝毫未得解决，照最近消息看，双方和议决裂，战争再开，其情势似更形严重了。这样重大的问题——一个关系世界革命的问题，中国人因为远隔重洋，或反视为非洲一个局部事件而常常忽略之，不明它的真相，而且不去求明它的真相，这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以至世界革命运动的意义上讲，真是一件大的损失。（五月廿八日电讯：摩洛哥已败降，然而里夫是不会屈服的，我们更加要研究这一问题，预备援助，并利用它的教训了。五月卅日注。）

（一）摩洛哥问题之世界性

我们知道：十九世纪最后一二十年以至二十世纪开始一二十年乃是世界帝国主义如日方中、光被全球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在经济上便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由工业资本进化而为财政资本，即过剩资本输出的要求更甚于过剩商品的输出。在政治上便是争夺殖民地、重新瓜分世界，即投资地之取得成为这时各资本国家的政治中心问题。

地球原来只有这样大，除各帝国主义国家固有之领土外，便是“野蛮”以及“半野蛮”的非、亚两洲，而这两洲经过欧洲帝国主义者一再分割，大部分早已安排妥当，剩下来最后被宰割的，便只有一个东方的中国，一个西方的摩洛哥。

中国、摩洛哥从半世纪以来即成为众矢之的，成为群狗相争的两块肉骨头。中国之为中国，中国现在的地位怎样，这是中国人比较容易明白的，现在我们看看与中国同地位的西方的摩洛哥怎样。

（二）帝国主义者勾心斗角下的摩洛哥

摩洛哥为英、法、西班牙等帝国主义者之竞猎场，自十九世纪以来就是如此。直到一九〇四年，英国以埃及人民发生反抗帝国主义的暴动，应付不来，于是向法国帝国主义者表

示对摩洛哥问题让步，而于这年四月八日与之秘密订定协约，其中有两条约说：

一、法国政府申明不变更摩洛哥之政体。

二、英国政府承认摩洛哥为法兰西之保护国；自后，法政府为维持其安宁起见，对于该国之一切政治、财政、军事之改善，得参与之。

这是当时英、法两帝国主义者的一笔秘密买卖（你给埃及与我，我即给摩洛哥与你），不但当事者摩洛哥人毫未与闻，即素来同争摩洛哥的西班牙帝国主义者也未曾知道。这自然免不了要引起第三者——西班牙出来说话。不久，到同年十月，法、西之纠纷果然开始了。结果，双方改订一公开的新约而令西班牙也加入四月八日之协约内。从此，法、西共分摩洛哥：法占南方大部分，西占北方沿海一带。

在这样一种局势下，摩洛哥虽完全变成法、西两帝国主义者的猎物，而帝国主义者在摩洛哥之冲突却并未因此稍减其程度。在一九〇四年十月的法西协约中，西班牙所得的究竟太少（法国所得领土为二十一万三千方里，西国则仅一万八千三百六十方里），但以国力低弱的原因，眼看着法国在摩洛哥飞扬跋扈又无奈他何，于是乃勾结一新兴的帝国主义者德意志，借以抑制法。德国在帝国主义中为后起之秀，以前一切瓜分世界、占据殖民地的事，大都未得参与，此时逢着这样一个机会，真是饥狼见了肥羊，安得不趋前猛啮的道理。到一九一〇年，摩洛哥人民已受不了压迫，群起叛乱，法国出兵进剿。当时德国则借口保护德侨而屯兵摩洛哥海口以牵制之，法国不得已乃于次年十一月与之签定《阿尔吉斯拉条约》（Algesiras），割刚果以和。自后，摩洛哥问题便成为德、法两帝国主义者纠缠的焦点，一直到大战为止。

（三）法国帝国主义者压榨下的摩洛哥

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帝国主义者一场大战，结果德帝国主义者被屏于殖民地竞争场之外，摩洛哥从此便成为法国帝国主义者独霸的局面。

自来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剥削政策，名义上都叫作“开化运动”，就是说：他们的一切苦心经营都为的是将欧洲的“文明”输入于这些“蛮邦”。总之，帝国主义者都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自然，法帝国主义者之于摩洛哥也是如此。

法帝国主义者给摩洛哥的“文明”，第一次便是一九〇四年以摩洛哥全国关税收入之百分四十作抵押的财政大借款。在这第一次借款交易上，法国所得的报酬便是银行界取得百分之一八至二五的利息。继后，第二次的“文明”输入，便是为“巩固绥尔丹（摩洛哥王之称呼）之政权”而派遣的军事委员。这样的“开化运动”当时颇使“野蛮”的绥尔丹着急，他说：“法国人这样与我合作的方法真是奇怪！他们不征求同意就分割我的土地，又管理我的关税，派遣军事委员，这种举动简直是要亡我摩洛哥，

这是正式监督一国的政治，哪里是尊重摩洛哥的政治独立呢！”不但如此，到一九一〇年法政府借口镇压内乱，更派重兵压境了，从此摩洛哥军权完全掌于法人之手。内乱平定之后，摩洛哥又不能不向法国银行作第二次大借款，这次借款是以关税收入之百分六十作抵押，于是摩洛哥的关税完全被法帝国主义者攫去。同时，西班牙也以里孚的矿产抵押为条件而与绥尔丹一笔大的借款。

榨取摩洛哥的并不是法国全体人民而只是五六个银行，这是很明显的。现在摩洛哥一切银行、铁道、电气、水利、垦殖公司、码头、房产公司等无不握在法国几个大银行手中，就中尤以巴黎荷兰银行（Banque de paris et des pays-bas）为摩洛哥“经济之王”。

摩洛哥国家银行，资本一千五百万，为全国财政总机关，而直隶于一国际委员会管理之下。八委员中四人为法人，其二人为巴黎荷兰银行之董事。

拥有一千二百万资本的摩洛哥商业银行，实际上不过国家银行之一支店，其管理人中之二法人亦为巴黎荷兰银行之董事。

专只限于银行界，并不足以消纳并发展法国银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外，苏联的经济发展，也是蒸蒸日上。在亚洲，因为有弥漫的革命潮，殖民地与帝国主义战争（摩洛哥、叙利亚）及内乱（中国）的障碍，经济的发展甚为迟缓。欧洲的经济比较难于评判一点，有几国的工商业是兴旺的。英国的经济恐慌继续直到秋间，以后渐有起色。德国呢，正与英国相反，经济的发展，直至秋间以后即有一极深广的经济恐慌，比一九二三年秋间（即一九二三年十月革命以前）的现象差不多。中欧与东欧各国经过经济恐慌和贸易停滞。而另一方面，法国、意大利纸币跌落，生产成本低廉，经济的发达颇为顺利。若我们比较英国与德国，欧洲的最大两工业国，我们常得到过去几年所常得到的印象，就是一国的经济进步，是以别国的经济衰微为牺牲。换言之，欧洲各国的资本主义不能同时地同上发展，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缺乏均一的现象。

固然，欧洲有些国家恢复了金本位（如英国、荷兰）。英国从前禁止现金出境，现在也弛禁了，使资本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自由流通，因此有大批资本流入欧洲各国。意大利和比国，与美国解决协约国间战债的结果，促进美国资本流入欧洲，帮助资本主义的恢复。这些是资本主义显著的进步。固然，欧洲资本主义不仅在金融方面有了进步，而且在生产界，去年欧洲的生产比前年（一九二四）亦有增加（例如钢铁的生产比前年增加百分二十，由此可以想见制造品的数量的增加）。但是我们若从劳动阶级的观点上考察，又是怎样的一幅情形呢？我们看出生产虽增加，但是劳动者的失业也是同时增加。据官式的统计，欧洲各国的失业人数，一九二五年的比一九二四年的多，失业人数去年年底当超过五百万。这是什么道理？自然，机器进步，工作时间延长，

使生产额同时增加，而雇用的工人数目同时减少。例如德国鲁尔区域的一矿山，裁减七万二千矿工（即全体工人百分之十八）而同时能维持旧日的生产：这种情形无异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稳定、资本主义的经济进步，是靠牺牲工人阶级，使他们更加贫乏和加劲剥削工人阶级的代价购得的。这种资本主义的稳定是要激起工人阶级更强烈的反抗。摩洛哥有差不多同法国十个省份大的区域至今是非常混乱的。法国大的、小的殖民者，已经占有四十万赫克脱（Hectare，约合中国一百方尺）的土地，实际等于法国一省的面积。摩洛哥土地本来是未完全开垦的，因此，这些欧洲人从土人抢夺来的土地便占了摩洛哥耕地之大部分。

“收买土人的耕地，这不过是一种侵略的开场，这些大的、小的殖民者的经营，现在已扩张到全摩洛哥了，凡阿拉伯人都被驱逐于沃土之外，挤在几个特别区域内，一切良田沃土都归了欧洲人。

“这种用武力占据土人田土的例子多得很，我们可以随便举一个例来说：一九一二年有一个驻扎瑟布（Seban）的法军司令于峨（Huot），他是当地的“土司”，他抛弃他应有的职务，而去指挥一个私人垦殖公司的事务。虽是一个陆军司令，但他对于摩洛哥的农业很有研究，虽是一个土司，但他在瑟布买了许多肥沃的土地。以军人与企业家这样狼狈为奸的事在法国是犯刑律的，但在摩洛哥境内的法国驻军做这样事的人非常之多。一九一四年，于司令因土地同土人涉讼，结果当地法庭的判决：土地还是归于司令的垦殖公司。这件事曾经引起土人许多不平之鸣，但在这武力的高压之下，终究只是不平而已！”〔见法人多利欧（Doriot）著的《帝国主义者与摩洛哥》〕

到一九一八年，情形变得更悲惨，垦殖公司决定驱逐土人了，这里有当时土人的一篇呼吁状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境：

上尉 Z……中尉 Y……，同着克斯里（Ksiri）调查局的卫队及格达里（Guedari）总督府的要人到我们卜里加特（Ridjates）来时，真如飓风一个样，烧、掠、掳抢，一城被洗得干干净净，风磨被烧毁，银钱、衣服被抢去，猪、羊、牛、驴被劫去一千二百头，小孩、女人被他们无情的鞭打，结果还被杀死好几个人。特里加特人因受不了这种惨酷的压迫，大部分都逃散别乡以逃生……

证明这种事实的并不止受害的摩洛哥人，即那素称“摩洛哥人之友”的殖民政府的官电也有这样的记载：“布利加特驱遣土人的事，已由保护政府武力执行。”另外，当时还有一百三十五个摩洛哥人签名画押的哀告书，我们看了，更可明了法国帝国主义者对摩洛哥人民的暴行（签名人中，有两个还是摩洛哥最有名的贵族）：

神明共鉴：吾等仅代表瑟布人民请愿于世人之前。维佗公司（Compagnie de Videan）与摩洛哥农业公司（Compagnie Agricole de Maroc）之经理富郎瑟氏（Franceschi）真是吾摩洛哥人之毒，自彼与其他许多有势力之人来我瑟布，以暴力强夺我等田园后，我们和平的村庄即被其焚毁，粮收被其抢夺，蹂躏我等良民，侮辱我等神数，甚至发掘祖坟，奸淫妻女，种种暴行，言之痛心！自彼来此，吾人民即日处于水火中，饥饿劳苦，死者载道，而彼等之无故迫害、拘杀，则仍无一日或止也……

土人有冤屈，是无处控诉的，要到法庭，必须有欧人作引进。一九二二年，法人基尔麻（Germa）以农业公司强夺土人土地，心怀不平，曾联合土人控告该公司于法庭。结果，法庭虽将土地判归原主，但至今两三年了并未实行。

那“维持秩序”“保护摩人”的驻摩洛哥军队，实际上不过是法国几个农业公司的保镖者，土人要稍有反抗，他们便轰之以炮火。下面两个电报便是证明这个的。

驻乌章（Ouezzan）团长给驻特鲁尔（Teroua）营营长电：

第一千五百四十三号 （一）九月二十二日之一千四百六十八电令第三款，关于用炮队轰击波士特叛变之农民事，是否已受命执行，请电复。（二）近据各地报告，各地长官都存以“节省子弹”的狭隘观念，常常违背我的命令，以致该叛民等得从容在驻军附近耕种土地，无所恐惧，此后希各该长官等特加注意。（三）数星期后，各地界址即可划定清楚，那时汝等对于处置各未征服之土地问题，实行我九月间一千四百六十八及一千四百八十一之两命令到何程度即可明晓。

乌章统领、上尉郭龙巴（Colombat）签名。

统领凡罗地（Farandy）给各属地驻军电：

第五百六十二号 嗣后报告关于叛民之处理结果时，只指出死者、伤者及牲畜损失之数目足矣，无庸区别其年龄及性别。

一九二一年九月，统领凡罗地签名。

帝国主义者对于殖民地的“开化运动”常是如此！驻殖民地的军队，都是几个银行老板的卫队，其视殖民地人民之生命真是等于草芥。法国帝国主义者压迫殖民地人

民素来特别残酷，观上面两道官电即可想见。

摩洛哥战争开始后，法、西共派去十几万雄兵、飞机、坦克车，到处烧、杀、抢、掠，无不本其这“不论老、幼、男、女，一概格杀勿论”的“开化政策”。所以自战争开始以来，里孚地方，无论战区与非战区，无不受法西飞机之照顾，飞机所过之处，村落为墟，人民牲畜死亡枕藉。法国军队杀土人，本来不问性别与年龄而只查数目的，至此，恐怕数目也不查了！可是“野蛮的”摩洛哥人却并非如此，摩洛哥人在战争中对敌人有这样的禁条：

- 一、凡对未携武器之敌国的老人、女子、孩童，不得射击；
- 二、凡敌兵当回身逃走时，不得射击；
- 三、在田中之耕种者，虽属敌人，亦不得射击；
- 四、对于寺中之道士及僻地之隐遁者，不得射击；
- 五、对于敌地之牲畜、房屋、禾苗等不得损害。

这些战时的律条，都是“文明的”欧洲人所不用的，这也就是“文明人”与“野蛮人”之区别处！

(四) 民族革命运动蓬勃中的摩洛哥

摩洛哥的民族独立运动是开始于西班牙属地之里孚。里孚为一产煤区域，人口只三百万，自一九〇九年以来即被统制于西班牙的里孚煤公司之下。因为资本家过度压迫的结果，里孚人自一九一〇年就开始反抗。最初便是因煤公司中几个工人在矿中被压死，公司不准给抚恤而起的全国工人大暴动，继后，虽经西班牙一次野蛮的屠杀，接连而起的农民暴动随地都是。然这些运动以各部落各自为战、不相统属的缘故，所以结果不久都随兴随灭了。直至一九二一年大战之后，民族运动的领袖阿白台尔克林（Abd-el-klim）崛起，摩洛哥的民族运动才有统率者，从此才进入一新时期。里孚的民族独立战争，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四五年，驱逐西班牙，打败法兰西，已为世界革命运动历史开新纪元。自后法、西两帝国主义者共开十多万军队，联合环攻，至一年之久，里孚的二三万革命军队至今不为稍屈。在帝国主义者的通讯社传出的消息，今日不说法西军攻至某地明日，便是说里孚人败退某地，其实这大半都是谣言。自摩洛哥战争开始到现在，不但法西军队不曾战胜英雄的里孚人一次，并且每次都是大大的败创，我们看下面一个西班牙军官所述摩洛哥的战况便可知道：

我军最近数星期内在西摩洛哥的失败比一九二一年在亚吕亚尔（Annual）的失败还厉害（那次西军共死一万二千人），总督所统带的军队，这次死伤及失踪者共达一万二三千人，被俘于阿白台尔克林的亦达一千多，而被摩洛哥人夺去的大炮、子弹等更是无数。……由阿白台尔克林所领带的摩军不过五千人，东西驰骋，卒败数万之西军，这比亚吕亚尔之役的十万军队更厉害多了……

同样，芝加哥之《公论报》也有这种记载：

……自吕达（Xaruta）之役，我曾亲历过，二十分钟之间，西军死者达二百三十四人，这不过是一次小小失败，总计死者已达三千九百人，而官场传出的消息，则说只死十五人！……

摩洛哥战争虽然帝国主义者怎样造谣诬蔑，实际上很明显的，只是摩洛哥人为独立为自由而起的一种革命战争，这在他们的领袖历次对外的宣言上可以看出的。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阿白台尔克林为声明里孚战争的目的，在芝加哥《公论报》上曾发表如左之宣言：

我们完全是为民族独立而战争。我们的敌人就是西班牙。和平是我们所爱戴的，只要西班牙人愿意，随时都可再做我们的朋友或同盟者……所有驻摩洛哥境内、大西洋沿岸的西班牙军队都当撤回西班牙，我们唯一的愿望便是西班牙放弃他对于摩洛哥的保护权。我们代表全摩洛哥人民要求放弃那给我们以痛苦和毁灭的西班牙保护权。

任你的要求如何光明，希望和平的心如何真切，然在贪狠的帝国主义者看来，终是“野蛮的反叛”行为。所以自去年秋季以来，摩洛哥人几次希望同法、西议和而终不可得，结果，仍只有战争。摩洛哥人现在仍然继续他们那“剑比文字更为真实”的战争了。我们看最近阿白台尔克林《致英报界书》，便可以明了摩洛哥民族革命运动以后之趋势以及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民族的横蛮与阴谋：

……我等的责任，便是向和平之道前进。我等之所谋，无非为主张正义、获得和平，我等敌人虽抱政治上之作用而造作种种谣言，实则于我等毫无所伤。当我等为拥护已失权利而开战时，彼等即已如此诬蔑，然我等无时不思和平，且无

时不在求和平之道。我等亦曾几经设法，欲与法、西两国之长官议和，愿彼等相见。时辄以傲慢之态度相临，以为吾等弱小民族殊无权力可以宣战，亦无能相抗到底，以是认吾等无能为，必遭失败。……故当我等徬徨未得进路时，亦常奉阿拉伯之古语所谓‘剑比文字更为真实’者以自勉。……我等现向世界重新申明：我等之行动，唯一目的，无非为达到和平而已；我等除要求应得之权利外，别无要求；我等除防护在责任上应行之防护外，别无防护；……我等现仍准备保护我民族权利至最后一步，且愿为主张而死……

(五) 摩洛哥战争与世界被压迫人民

摩洛哥战争表面只是两三百万人的一个民族的战争，实际则是几千万被压迫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一种战争。这是世界革命战争的一部分。

战争开始后，世界的无产阶级都群起实力援助，尤以有直接关系的法、西无产阶级为甚。一九二四年，巴黎曾有十余万人反对政府压迫摩洛哥的群众示威运动，当时示威者虽被捕好些，但自后实际反对战争的工作一天一天厉害：如煽动兵士不打摩洛哥人，运输工人罢工以阻止运兵赴摩洛哥等，都曾收过很大的效果（共产党议员都利欧曾因赴前敌宣传兵士而被捕）。西班牙无产阶级，也是一样，西班牙军队所以在摩洛哥处处失败，无产阶级在国内积极反对是一大原因。因此，西军每在前敌失败一次，国内必大捕共产党人一次以泄忿，然这终是帝国主义者一种滑稽的行为，于他垂死的命运上实毫无所补。除欧洲的无产阶级之外，便是殖民地被压迫的民族，尤以回教国家的民族为甚。《摩洛哥新闻》当时曾说过：“开罗电称：印度回教大同盟曾为祈祷阿白台尔克林之胜利及其军队的成功而开一广大的群众大会。在加尔各答、马德拉、孟买、德利各地之教堂中均有同样的集会。在加尔各答有十万人参加这种宗教的示威运动。自亚拉伯回教联合会发起向印度七千万回教徒捐募巨款以助里孚政府后，当地回民无不踊跃捐输，妇女多有卖簪饰以助里孚战费者。”

去年在印度巴尔郭开的回教大会，与会代表有两千多人，会中决议各地回民与里孚一致合作。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会晤阿白台尔克林后，说：“近来阿氏接见伦敦与印度回教徒之秘密组织的代表日必数起，这便是张伯伦先生祸期将临之预告！”

回教徒在世界上人数达两千万，然都是被压迫的。因经济、政治之压迫而促进他们的宗教结合，因摩洛哥战争而引起世界回教徒的大结合，将来必成为世界革命运动中一大势力，这在世界革命运动也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一件事。

一九二六年五月廿日

历史上的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盟

任卓宣

(一) 为什么要纪念巴黎公盟？

巴黎公盟 (La Commune de Paris) 是法国巴黎工人在一八七一年暴动后所组织出来的无产阶级独裁制的政府机关，以后法国工人每年在巴黎公盟成立和失败日子，俱热烈地纪念。这个事件，于我们说来，亦有纪念之必要么？有的。

原来资本主义发展到十九世纪初年，已经暴露出来了种种破绽，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因资本家之残酷的掠夺和经济危机所产生的生活痛苦、工人失业等事实，而扩大了、加重了的劳、资冲突。因为这样，无产阶级的生存争斗，日益猛烈。在他的对手方——资产阶级的组织未坚，德谟克拉西的制度未确定，而且正与封建的贵族阶级或外国的资产阶级相搏战的时候，无产阶级便要乘机暴动，以图夺取政权，这是阶级争斗历史中的一种法则。法国的情形恰恰如此，所以法国无产阶级就来为我们证明了这种阶级争斗的法则。

从一七八九年的国民会议 (Assemblée Nationale) 到第一帝国以前的总督政府 (Consulat) 这个期间中——或者更确切地说，从一七八九年的国民会议到一七九四年的国约会议 (Convention) 的大革命以后，时而帝制，时而复辟，时而共和，以致战争不绝，生活不安。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便利用这种冲突，屡次暴动，以谋自身的解放。其中最大的争斗，就是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但这两次，都遭了残酷的压迫，没有什么成功。然劳、资的冲突是免不了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亦绝不因过去之失败而停止不前，所以法国无产阶级在一八七一年又开始了一个更大的争斗，并且还获着暂时的成功，组织了他们自己的政府——巴黎公盟。

从此可知：巴黎公盟，绝不是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尝试，亦绝不是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尝试，而完完全全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尝试。它只有世界性，而无地方性，所以列宁在一九一一年的《劳动报》上说：“公盟的烈士，不仅为法国工人所尊敬，而且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所尊敬。因为公盟的争斗，不是为着狭义的一地的和一国的利益，

而是为着一切劳动人类、一切无财产者和一切被压迫者的解放。”他又说：“公盟所要成就的宗旨，是社会革命所要成就的宗旨，是劳动者完全的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所要成就的宗旨，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所要成就的宗旨，而这个宗旨是不朽的。”

(二)什么是巴黎公盟？

在一八七〇年以前，第二帝国为少数人的利益，已经把法国弄得很坏。到普法战争的时候，法国就成了被征服者，民族地位非常低下，同时这次战争——法国资产阶级与德国资产阶级的大冲突，法国资产阶级又用爱国口号加重人民负担，并强迫他们到战场上抵挡炮弹，以致形成了比平时更受压迫的生活痛苦。在这种情形之下，巴黎公盟便应运而生，来完尽当时无产阶级所负有的民族的——解脱德国压迫和阶级的完成劳动解放——两重使命。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国卫军在巴黎孟玛尔特（Montmartre）暴动，枪毙多麻斯（Thomas）、列公特（Leconte）等将军之后，便于三月廿二日进行选举，以组织新的政府——巴黎公盟。当选举时，一般资产者都闭门不出，结果只有劳动民众去投票，所以由这次选举——纯粹的无产阶级选举，所组织出来的公盟，可说是立足于无产阶级势力之上，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府。现在我来把它所做的重大事件说一说：

三月三十日，巴黎公盟宣布废除常备军，以人人都应参加的民兵来司保卫。它并停止一八七〇年十月至一八七一年四月的房租，已给付者退还。同日它又通过了当选的外国人加入公盟。

四月一日，它决定公盟内人员的最高薪金每年每人不能超过六千佛郎，换一句话说，不能比一般工人所得特别多些。

四月二日，下令把国家与教堂分开；废除由国家支付的祭费；没收一切僧侣的财产归国有。同日，决定消灭学校内的宗教标识和图像等；禁止在学校内做祈祷。

四月五日，为答复凡尔塞军对于公盟保卫者之残杀，下令逮捕为质于公盟的人。

四月六日，国卫军把断头台抬往十字街头，当众焚毁。

四月十二日，决定把拿破仑用夺自敌人的枪炮所鼓铸出来的纪念柱拆毁，以去掉挑拨民族仇恨的标识。

四月十六日，公盟登记一切停业的工厂，定出了由工人协作社来管理来使用这些工厂的计划。

四月二十日，废除在面包制造业中的夜工；废除自第二帝国以来即为警察所包办的职业介绍所，由县公署来司理为求工者介绍工作。

四月二十八日，废除掠夺劳动者的借贷所。

五月五日，决定拆毁忏悔宫。

以上便是巴黎公盟——东、北两方为德军所包围，西、南两方为凡尔塞军所包围的巴黎公盟——在一个短短的七十天的时间之内，所做出来的事件。

这些事件，是不是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呢？是不是表示巴黎公盟带无产阶级性而属于无产阶级的呢？是的。因此，虽然巴黎公盟中少有工人当选，第一国际的分子当选者亦不多，然而恩格斯却不注意这点而仍然断定它是无产阶级独裁。恩格斯曾经说过：“近来当人说及无产阶级独裁时，一般资产者又战栗起来了。先生们，你们愿意知道什么是独裁制吗？请看巴黎公盟。这便是无产阶级独裁。”所以巴黎公盟不是别的，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形式。

(三) 巴黎公盟的失败

巴黎公盟既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革命政府，所以法国银行家、资本家、房东、地主一切掠夺者都恨之入骨。只是在当时迫于社会革命的怒潮，法国资产阶级的代表笛尔（Thiers）将军乃仿效奥国格纳慈（W. Groez）王子在一八四八年之所为，率兵退出巴黎到凡尔塞去养精蓄锐，等待时机。阶级利益是超出了国家界限的，所以不仅法国资产阶级视巴黎公盟为眼中之钉，德国资产阶级亦深觉非用大力来“灭此朝食”不可。于是俾士麦归还十万俘虏兵于笛尔，并与他订约，使他容易有扑灭巴黎公盟之可能。资产阶级原是知有自己利益，而不知有民族利益的，原只是以民族利益或国家主义为假面具来保护自己利益的。所以法国的银行家、资本家、房东、地主都一致联合起来，与当前敌人妥协，并接受他的帮助去攻打其本国的无产阶级。在这种客观的情形之下，巴黎公盟焉得不失败？

革命是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决胜负、判生死的凶猛斗争，所以革命爆发过后，必然有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战。在这种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战中，不是革命独裁来压迫反革命，便是反革命独裁来压迫革命。自五月廿一日以后，凡尔塞军队冲入巴黎，于是“流血星期”便到来了。计巴黎公盟失败后，革命方面之被枪毙者三万人，被逮捕者四万五千人，被充军者又以万计。合之巴黎共失去了十万人。请看资产阶级是何等的残忍！在这种屠杀中，难道还抽不出来俄国十月革命后，在一九一八年那时代中必须实行红色恐怖主义的教训吗？

巴黎公盟的失败，不仅在其客观方面有法、德资产阶级的联合进攻，在其主观方面，亦有种种缺陷和错误。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统一的意志、统一行动之集中的和坚固的无产阶级政党。白朗起派（Blanquistes）、蒲鲁东派和国际派意见分歧，主张不

一，以致公盟的指导，时而是自由的独立的思想，时而又是耶各宾的（Jacobins）法国在一七九二——一七九三年代的激进党）思想，并且在政治上没有一个确定的纲领。最大的错误，就是未曾没收法国银行，使公盟的经济不充，而给予资产阶级以反革命的费用。至于在笛尔军队退出巴黎时，笛尔才二万五千兵，公盟拥有二十万大兵而不乘势进攻，听敌人休养、训练——这是杜洛茨基在军略上所以要大大批评公盟失策的地方。

（四）巴黎公盟的价值

巴黎公盟虽然犯了很多很严重的错误，然而却不因此而减少了它的价值。我们仔细分析，便可知它有后列三种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一，历史的重要。无产者自形成阶级以来，即开始争斗，一直到一八七一年才有了巴黎工人伟大的暴动，所以巴黎公盟是工人争斗到夺取政权时代的表示，是工人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的证明；不仅这样，它还指示出来了无产阶级有爆发革命和夺取政权的可能，它还给予后来工人运动以大刺激、大兴奋。所以列宁说：“公盟的牺牲很大，然而它获得了无产阶级争斗总和之价值的报酬。”又说，“虽然有种种错误，公盟仍是十九世纪无产阶级运动所给予我们的最大的模范，马克思曾经高高地估计了公盟之历史的重要。”而“公盟曾指示欧洲无产阶级在具体的实践问题上怎样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第二，理论的重要。公盟证明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和革命能力，使已建立于工人阶级势力上的共产主义不发生动摇；证明了无产阶级的解放，非从政治争斗上着手去夺取政权不可。公盟不仅告诉我们说，马克思在过去所发现出来的理论千真万实，而且还使马克思在此次运动中分析出来了新的理论，确定无产阶级独裁的形式，巩固了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共产主义社会必须经过种种过程的主张。马克思为公盟而做的《国际工人协会宣言》上说：“工人阶级不可以奇妙不可思议的事去要求公盟。公盟亦不会立刻实现了任何空想。工人阶级知道为达到其解放和社会生活的更高形式，必须经过一串完全改变生活总条件和人心的历史过程。”

第三，实验的重要。公盟所做，不论对与否，都给予后来无产阶级革命以宝贵的教训。做得不对的，成为了当时失败的原因，如不没收银行、不乘势攻打反革命军队等等。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就接受这种教训，没有覆辙再蹈，能使无产阶级独裁像铁一般的坚固。做得对的，如德漠克拉西政府之必变、常备军之废除、政府薪金之规定，允许外国人的被选举权而任用波兰人、匈牙利人以及工厂国有等，皆成为俄国革命的导师。

这样看来，巴黎公盟自有其伟大的价值，真所谓“虽败犹荣”。马克思在这一点上曾经说过：“工人的巴黎和它的公盟将常常为新世界之光荣的先驱；它的牺牲者，在工人心中建筑起了他们的纪念碑。它的刽子手，从现在起就被钉在历史的标柱上，刽子手的牧师无论怎样祷告，都不能从那个标柱之上把他们振拔出来。”是的，巴黎公盟已经为我们宣告了资产阶级的死灭和无产阶级的解放。四十六年过后，俄国资产阶级的倾覆，无产阶级就来执行巴黎公盟这个宣告，实现十月革命，进行世界革命。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无产阶级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

而所得的，是全世界！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盟纪念

世界革命运动年表

屈维它

——战壕断语(三)——

一、古代各国奴隶平民之暴动

——古埃及——古犹太——古希腊——古罗马

二、中世纪之农奴暴动及农民战争

——基督教共产社——寺院的异端的共产主义——西欧各国农民战争和宗派运动
——俄国之哥萨克运动

三、十七世纪之英国革命

——克伦威尔的革命——美国独立革命

四、十八世纪之法国大革命

五、世界各国革命及其无产阶级运动

——神圣同盟之下——英国察尔替运动——法国一八三〇、一八四八、一八七一年三次革命——德奥一八四八年革命及社会民主党——俄国近代革命史至多数派
——帝国主义之初

六、国际无产阶级之社会革命运动

——第一国际——英国新工会主义运动——法国社会主义及工团主义运动——德国马克思正统派与修正派——俄国一九〇五年——第二国际

七、二十世纪之世界社会革命

——共产国际之源始与欧战——俄国一九一七年之二月革命——世界革命之俄国胜利(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运动之第一高潮——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运动之第二高潮——第三国际

八、中国革命运动

上古——中世纪——洪杨——辛亥——五卅

一、古代各国奴隶平民之暴动

古埃及

西历纪元前一三二〇年——埃及之以色列筑城工人反抗压迫的暴政，摩西率领之罢工逃去。

纪元前一〇〇年(?)——某月十六日，埃及寺院之石工宣布罢工，要求预支薪水，三日后得胜利始上工。

古犹太

纪元前九五三年——犹太王雷波笃安时，人民反对苛税而暴动，犹太十二族中十族分裂出去，自建以色列国。

古希腊

纪元前四三一年——斯巴达攻雅典之卑罗尼苏战争时，雅典有二万矿工罢工，逃往敌国之铁沙里地方。

古罗马

纪元前四九四年——罗马平民群众反抗贵族，移迁至圣山，拒绝交纳田租及偿还债务；贵族允许取消债务并解放因负债而卖身为奴的人，始罢。

纪元前四八六年——平民要求颁发田地，嘉西(Cassius)始定《农地法》。

纪元前四四九年——平民因贵族的十大官(Decimiriie)奸淫民女，剥削平民，复据圣山“叛乱”，贵族让步，允许实行十二铜牌的《罗马法》。

纪元前四四三年——平民始得选统领三四人，与贵族所选者共同执政。

纪元前三六六年——平民统领李锡尼提出《新法》，限制财富、田产并废除财产承继制度，通过。

纪元前一三九年——罗马属地卑伦纳地方之努盟蒂人民首领农民维略都(Virithus)率众叛，不久即败。

纪元前一三三年——努盟蒂人继续反抗，是年始全平。(意大利当时全国地主不过二千人，罗马在纪元前一五九年至一三一年，自由农民自三十二万四千减至三万一千九百人，农奴日益增多了。)

纪元前一三三年——贫民党护民官格拉克(Tiberius Gracchus)倡言要求实行李锡尼《新法》，富豪党诬为阴谋称帝，杀之，株连三百余人。然因农民反抗，新法不得不实行，取得田地者有四万户。

纪元前一二三年——格拉克之弟(Gaius Gracohus)被选为护民官，又主张恢复李锡尼《新法》，并予意大利土人以选举权，富豪党反对。

纪元前一二二年——富豪党杀格拉克之弟及其党三千人。

纪元前一〇〇年——贫民党马留第六次当选为统领，其党人萨都尼翁（Satuniuns）历行格氏兄弟《新法》，又颁《谷物条例》救济贫民。富豪党与战，惨杀之。

纪元前七九年——斯马达季（Spartacus）率领罗马奴隶反抗贵族专政，战败而死。（现在德国共产党最早的组织即名斯巴达季社，便是据此古典。）

纪元前六二年——嘉里汀（Kalitiu）率奴隶暴动。

二、中世纪之农奴暴动及农民战争（初期基督教共产主义附）

? 年——耶稣基督少年时组织“反罗马救国会”，率领犹太人反抗罗马统治。

? 年——基督之师约翰及爱皮翁派始创贫民共产社。

二九年——基督率领教徒、犹太之贫民，反抗地主及奸商，驱逐在耶路撒冷圣殿之剥削民众的商人；因此被钉死于十字架。

二〇〇年(?)——基督教徒之共产社运动渐盛，贫民组织共食堂、埋葬公会等。

三〇〇年(?)——共产社运动尚有继续者，但基督教已渐为治者阶级利用，三二五年罗马开宗教会议，基督教已得为国教，于是反指共产运动为“异论”。

一〇〇〇年(?)——十一世纪时，各地基督教寺院，尚行共产制度，然因商业发展，寺院亦开始经商，基督教益堕。

一一〇〇年(?)——十二世纪教皇跋扈，淫佚奢侈不堪，于是发生寺院共产主义运动，拿亚赫摩（Noahim）创之，谓基督教徒应行共产，清苦自守。

一一四五年——意大利白菜桑斯基（Breshiansky）于罗马平民党暴动反抗教皇时，宣布贫民共产主义。

一一五四年——暴动平定，白菜桑斯基被捕，教皇指为异端共产主义焚死之。

一一八四年——法兰西南部农民暴动，华勒登沙夫（Valdensoff）率领之行共产主义，波希米亚农民亦起响应。法国北部地主派兵镇压，亦称“十字军”。

一二一五年——英国大宪章运动。

一二六八年至一二八〇年——法国南、北农民革命与反革命战争。

一三〇四年——意大利北部僧侣笃尔齐诺（Doltino）举兵联合国王因抗教王，率领农民暴动，主张共产。

一三〇七年——笃尔齐诺战败，其党人死者两千。

? 年——白嘉尔派（Begards）发生于符朗德里之纺织工人中，后蔓延德国各地，主张绝对共产，废除婚姻制度，组织“共同生活社”。

一三四八年——各国始创异端的死刑，即是所谓（Inquisition）。

一三五八年——法国若客黎（Jaquerie）派的农民暴动被武士屠杀七千人。

一三八〇年——以前各地虽严禁农民之异端共产主义运动，然尚因德帝与教王不和，白嘉尔等派稍有自由，至此德帝查地六世即位，是谓“教王皇帝”，德境波希米亚亦遭压迫。

一三八一年——英国农民大暴动，以泰禄尔（Tayles）为首领，占领伦敦，寻败。

一三八九年——英国威格黎主张分散教会财产、田地，于是发生洛腊尔派（Lollards）的农民暴动，是年全平。

一四一五年——德国古斯亦创共产说，是年被焚死，所谓“古斯战争”延长数年。

一四二〇年——德国塔白尔城聚农民四万二千，实行共产，毁教堂及神像，是谓塔白黎派（Taborito）。其中有一派名亚当美德派（Adamito），主张尤为激进。

一四三四年——贵族军队剿灭塔白黎派，一万八千人杀剩了五千人。

一四九一年——初，塔白黎派余党尚组织“波希米亚兄弟会”至此内中分裂，一派主张和政府妥协，并服从王权，于是渐败。

一五一七年——路德创新教，与孟臻尔（Munzer）共同主张宗教改革。

一五二二年——路德渐妥协，孟臻尔与之分离，宣传白嘉尔派主义，率领农民暴动。

? 年——孟臻尔被杀，农民死者十万人。

一五二六年——南德亦发生异端运动，即所谓亚纳罢孛派（Anabaptists），主张儿童不可行洗礼，贫民实行共产。

一五三三年——亚纳罢孛派取孟斯德城（Munster）守之十五月，败亡。

一五?? 年——俄国地主、富商剥削被征服之哥萨克农民，激起反抗，德美脱黎（Dmitrie）助之，因战胜而即莫斯科王位，解放欠债而为奴的哥萨克人，后为贵族所杀。

一五?? 年——白洛脱尼夸夫（Brnlotnikoff）率农民暴动，没败。

一五?? 年——莫斯科旁都深地方，哥萨克及俄国农民另戴一主，不服从莫斯科，是谓“都深之贼”。后俄国贵族赂买哥萨克中之领袖，复向波兰请兵助战，破都深。

一五?? 年——波兰兵队专恣，俄国贵族联合哥萨克及农民驱之，都深举其族长罗曼诺夫为莫斯科王。

一六七〇年——俄国农民腊晴（Razin）率众数万暴动。占领沃尔嘉河（Voiga）上流，直至察黎真城（Tsaritsyn）。

一六七一年——腊晴战败，死者十万人。

一七〇七年——俄国蒲腊雯（Bulavin）率哥萨克人暴动，占领南俄东纳河（Don）

流域，反抗彼得大帝的压迫哥萨克命令，败后自杀。

一七七三年——俄国达加赤夫的农民暴动起事，蒲加赤夫自称彼得三世，占嘉赞城（Kazan）。

一七七四年——蒲加赤夫之“乱”平。

一七七五年一月——蒲加赤夫被杀于莫斯科。

三、十七世纪之英国革命（北美独立附）

一五一八年——英国人莫尔著书，名《乌托邦》，主张共产主义。随即发生第葛派（Diggers）的农民运动。

一五三五年——莫尔因反对王权被杀。

一六二八年——英国人民抗税，国会发起“民权请愿”，国王佯允，税额通过后即解散国会。自是至一六四〇年英国无国会。

一六四二年——英国内乱，平等主义之莱佛罗派（Levellers）率领农民暴动，克伦威尔为之将。

一六四五年——英王查理第一败逃，遁入苏格兰。

一六四九年——克伦威尔之革命军擒英王，诛之。

一六五〇年——革命之英伦战胜反动之苏格兰。

一六五三年——克伦威尔解散国会，自为英国都护。

一六五八年——克伦威尔卒，反动派渐盛。

一六六〇年——英王查理第二即位，削民自由，反抗又起。

一六七九年——英王压迫人民，解散国会。

一六八八年——英国资产阶级迎荷兰总统威廉第三为王，公布权利宣言，确立资产阶级独裁制，所谓“光荣革命”。

一七六五年——英国征收北美殖民地之印花税，美人反抗。

一七六九年——美洲英殖民地中开始革命运动。

一七七五年——英殖民地美洲新英伦人民起兵逐英国总督。美洲英人召集代表大会（国会），委任华盛顿为殖民地革命军总司令。

一七七六年——北美合众国成立，宣布独立宣言。

一七八三年——英军伐美之第七年，华盛顿受法国金钱、军械之助，至此乃战胜。

一七八九年——华盛顿被选为美国大总统。

四、十八世纪之法国大革命

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召集国会。六月十七日国会内贵族、

僧侣与平民（第三阀）争执，平民代表分出，自称“国民会议”（Assemblée Nationale）。七月十四日，平民暴动击破“巴士底狱”，嗣后全国农民骚动。国民会议宣布同时称为“立国会议”，预备审议农民问题。八月四日宣布《人权宣言》，废除贵族地主之一切特权。十月十九日国会会议议决禁止“法外的”自由集会及言论等，开始反动。

一七九〇年——一月国民会议议定《宪法》，对于农工选举权多所限制（君主立宪）。七月法国国王遁英求救兵。八月国民会议议决，派兵剿击法兰西地方之农民革命运动。

一七九一年——九月国民会议改选，国法会议（Assemblée Legislative）依新《宪法》成立。十月一日右派齐龙党（Girondans）握权。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平民群众暴动，根本推翻王权。九月二十二日左派山岳党即耶各宾党（Jacobins）执政，召集“国约会议”（Convention Nationale），并宣布共和，定一七九三年《宪法》，以执政委员会为最高政府。

一七九三年——一月十七日诛法国国王。左派内部亦开始分裂。六月二日革命政府逮捕反动的齐龙党。七月十三日左派首领马腊德（Marate）被刺死。十一月实行革命独裁捕杀反动派。

一七九四年——一月左派内争日烈。七月二十八日左派首副罗伯士比埃尔（Robespierre）被杀死。八月反动派又渐得势。

一七九五年——十月五日拿破仑始击败皇党。

一七九七年——拿破仑始干政，逐执政委员二人。

一七九八年——贫民反对反动，罢孛夫（Babeuf）率群众一万七千人暴动，主张土地国有，败死。

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法国革命新历“雾月”（Brumer）十八日，拿破仑政变，自为第一总督，取消前执政委员会。（“雾月十八政变”）

一八〇二年——拿破仑自为终生总督。

一八〇四年——拿破仑称帝。

五、世界各国革命及其无产阶级运动

神圣同盟之下

一八一四年——奥相梅特涅于击败拿破仑之后，联合欧洲反动君主结神圣同盟，摧残各国革命运动。

一八一六年——西班牙殖民地南美洲之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皆宣布独立共和。

一八一八年——南美智利独立。

一八一九年——南美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相继独立。

一八二〇年——西班牙革命，宣布君主立宪。

一八二〇年(?)——意大利烧炭党革命，迫王立宪。神圣同盟派兵干涉，西、意皆恢复专制。

一八二二年——葡萄牙殖民地南美洲之巴西宣布独立。

一八二三年——墨西哥革命，宣布共和。

一八二八年——中美独立(一八二三年)后，裂为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萨耳瓦多、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五国。是时，神圣同盟以共和为过激赤化，欲联合欧洲各国出兵干涉。北美总统孟禄于一八二三年宣言，不许欧洲干涉美事，美洲亦不干涉欧事(是谓孟禄主义)，神圣同盟始未能出兵。

一八二九年——希腊革命(起于一八二一年)成功，离土耳其帝国独立。

一八三三年——埃及反抗土耳其帝国而独立。

英国

一八一二年——英国纱厂工人四十万罢工，击毁机器。

一八二五年——英国始颁《工会法》。

一八三四年——英国社会主义者欧文创立生产协社及工会，要求八小时工作。

一八三八年——英国开工人运动的全国大会。

一八三八年——五月八日英国全国“国民大会”(劳农)政纲公布——是为察尔替主义(Charterm)。)

一八三九年——一月十二日一百二十八人签名请愿，要求普通选举权，国会拒绝。九月四日威尔斯地方暴动。

一八四二年——五月十二日第二次大请愿运动。

一八四八年——四月十日察尔替派大示威运动，仍望坚决要求普选：比例选举，秘密选举，国会应每年召集一届，众议员不限财产资格，贫民议员应得年俸。同日，伦敦工人总同盟罢工。

一八四八年——工人暴动未成。渐发现工会主义(Tradeunionism)主张工会不问政治。

一八五一年——机器工会及其他大工会成立。

一八六一年——木匠大罢工，伦敦成立英国总工会。

一八七一年——工人要求罢工及工会自由，国会许之；但当时罢工工人詈骂破坏罢工者，仍遭监禁三年之刑罚。

一八七五年——英国各地工会已有二十万会员。

法国

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拿破仑后，路易十八执政，早已恢复专制，至此平民、工人等大起暴动，反抗压迫言论自由，资产阶级利用之，急急迎自由党之路易菲列，逐路易十八，宣布君主立宪（七月廿七至八月九日）。同年，法国七月革命影响欧陆各国：十月比利时离荷兰独立；波兰亦起革命未成；德国海森邦、白伦瑞克邦等相继迫王立宪；意大利烧炭党亦求法国援助，以抗奥帝之压迫，然大致都仍为奥军所平。

一八三二年——是时，法国贫民因革命失败，发生种种秘密组织：工人的互助会渐成罢工会、抵抗会；后有民友会，谋于是年暴动，未成；民友会主张均产。

一八三四年——法国人权会等，率巴黎、里昂工人相继起事，均未成。

一八三九年——白朗起（Blanqui）谋暴动，失败。

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二月至五月，国会中各阶级互争，直到革命。无产阶级之“兄弟会”努力参加。二月廿三日，巴黎暴动。六月十五日，白朗起派暴动。六月二十二日，巴黎又暴动。二十四日政府军队杀暴动者一万人。临时政府排斥左派路易白朗等（Louis Blanc），停止其国有工厂等办法。六月革命——一八四八年六月至一八四九年，国法会议取消无产阶级的一切胜利，日益反动。

一八四九年——六月法国农民六百万人，投票举拿破仑第三为总统。

一八五〇年——五月普通选举结果，革命派的工人又占优势；政府否认选举，取消普通选举权。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拿破仑第三称帝。

一八五二年——拿破仑第三钦赐结社、集会自由。

一八五三至一八六二年——法国有七百四十九工会受政府干涉或封禁，有三千九百〇九名政治犯及工人被逮捕。

一八六三年——法国工会分为三派：（一）工会派；（二）生产协社派；（三）政治斗争派。第三派中又有两派，一派主张在选举中赞助共和主义者，别派主张工人自己推选候补人。

一八六七年——劳动委员会向拿破仑第三请求工人之结社自由。拿破仑第三批准要求，但限定工会不准讨论宗教和政治。

一八六九年——巴黎成立劳动总会。

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九日，普法战争开始。八月九日，巴黎平民大请愿要求共和。九月二日，拿破仑第三被普军所擒。十月，国会议决废帝制共和，资产阶级政党及简尔将军等组织临时政府，号称“国防政府”。

一八七一年——一月“国防政府”以巴黎降于普军。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工人、共产党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党人暴动，逮捕反动的卖国军阀，继续防守巴黎。三月廿六日，宣布组织巴黎公盟（La Commune de Paris）政府。“国防政府”逃至凡尔塞。四月五日，巴黎公盟逮捕反动派。五月廿一日，反革命的法国国防政府与普鲁士军队勾结，四方围攻巴黎，破之。一万七千人被杀；五万人被逮，其中二百人处死刑；一千三百人被流刑——是谓流血星期。

一八七五年——法国资产阶级独裁制巩固，更定《宪法》。

一八七六年——法国工会协社开代表大会于巴黎。

一八七八年——工会代表第二次大会开会于里昂。

一八八〇年——社会主义者及工会代表，开大会于厄佛尔决定组织法国社会党。此社会党中分四派：（一）葛德派；（二）可能派（Posibilistes）；（三）亚尔曼派（Allemanistes）；（四）白朗起派。第一派是马克思派，第二派主张渐进，第三派偏重工会运动和地方自治运动，第四派偏重于暴动的军事运动。此外，若莱思（Jaures）一派主张改良主义，联合其他小派组织“独立派联盟”，反对以革命手段取得政权。

一八八六年——马克思派运动联合全国工会，成立工会联盟。若莱思派组织劳动介绍所联盟。

德国

一八??年——德国革命党出版《弃人》杂志，因此有“弃人社”的组织，宣传革命运动。

一八??年——德国国家主义派组织“少年德意志党”。

一八三六年——德国发生贫民的社会革命组织，如惠德灵（Weitling）组织的正义会，白朗起派组织的四季会。

一八三九年——白朗起派谋暴动未成。

一八四四年——西里西亚（Silesia）的纺织工人大暴动，击毁机器。

一八四七年——马克思加入正义会。

一八四八——马克思、恩格斯组织共产主义会，发布《共产党宣言》。

一八四八年——三月五日，德、奥自由主义者召集代表大会，不主张共和，只争召集国会预备会。三月十五日，维也纳民众大请愿，要求召集国会，解散贵族的联邦会议，反对梅特涅。学生、工人武装，组织“学院军”，梅特涅被驱逐。三月初，柏林市民大会，请愿运动。三月十八日，普国国王承认立宪。市民见国王时要求撤退柏林驻兵，军队开枪，死民众甚多。市民武装暴动将胜，王始命军队退出，亲对死者尸身行礼致歉。三月末，联邦会议议决召集国会。五月十八日，召集国民会议，议定新宪法，并解决农民问题。七月，维也纳开立法会议，议决解放农奴，匈、奥、德分离。

十月，帝国军队进攻维也纳，匈牙利革命军来救已不及，城破，立法会议解散。

一八四九年——巴枯宁在德莱思岑城暴动，支持五日始败（五月三日至九日）。

一八四九年——俄帝助奥平“民乱”，柏林戒严，反动顿起，国民抗税，于是更解散国会，改《选举法》（八月十八日）。农工民众暴动反抗，均被征服。

一八六〇年——意大利独立革命，后因受法助得胜奥。

一八六一年——德国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利用工人，组织国民会。

一八六三年——德国社会方义者拉萨尔（Lassalle）组织工会，以抗资产阶级之“国民会”。工会有会员四千六百十人，拉萨尔主张工人参加选举。

一八六七年——工人得选举权（一八六六年普胜奥，完全统一，成立现今之德国）。

一八六八年——马克思派柏柏尔（Bebel）组织工会。

一八六九年——柏柏尔派与拉萨尔派工会同开代表大会。

一八七二年——德国工会议决参加政治。

一八七四年——德国始创工人互助社，有社员六千人。

一八七五年——德国社会工党成立，拉萨尔派占优势，哥达大会时通过党纲，是为“哥达党纲”。

一八七八年——俾士麦颁布《反社会党律》，被封报馆四十七家，监禁九百人。

一八九〇年——《反社会党律》始取消——国会里已有三十五名工人代表。

俄国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俄历），俄国革命党人“十二月党”起事未成，被杀者十余人，流西伯利亚者一百六十人。（十二月党大半是青年军官，与资产阶级有关系。）

一八三〇至一八五〇年——彼得腊塞夫斯基（Petroshevsky）的社会主义研究会破获，二十一人处杀刑。

一八六一年——俄国解放农奴。

一八六？年——俄国革命理论家赤尔纳塞夫斯基（Tchernyshevsky）被诬为火灾中散传单之秘密团体主动人，被捕。当时俄国革命理论家还有赫尔岑（Herzen），在英国出版《钟》杂志，有很大的影响。

一八六三年——波兰革命未成。俄国各种秘密结社大联合，成立“土地与自由社”。

一八六六年——加腊夸若夫（Karakozov）谋刺俄皇未成。

一八七一年——聂察叶夫（Netchaev）（巴枯宁派）组织之斧头会，图谋暴动者，

发觉，被逮三百人；聂察叶夫逃瑞士。俄国以刑事犯为名，得引渡，置之死地。

一八七二年——此年之后，俄国革命党遂分两派，一是巴枯宁的鼓动派（Agitation）；一是腊符洛夫（Lavrov）的宣传派（Propagand）。当时革命党两派，都认为俄国可保持古代“密尔”（Mir）农村共产社会制度，不经资本主义而直到社会主义，是谓民粹主义（Narodnitsetvc）。

一八七三年——“往民间去”的运动开始。当时革命名人，有白菜史夸夫斯嘉女士（Breskovskaya——革命祖母）、彼洛夫斯嘉女士（Berovskaya）、慈略薄夫（Jeljabov）等。农民不了解革命党的反对帝制宣传，往往告发他们，所以失败。

一八七七年——史德方诺维赤（Stefanovich）自称“俄皇委员”，鼓动农民反抗官僚及贵族，谓可上达圣听。史氏党人被捕九百余人，他自己幸而逃脱。

一八七八——“土地与自由社”正式分裂成两个团体：一是民意社，注重政治斗争，专事暗杀运动；一是黑分社，注重经济斗争，主张农民自动平分贵族的田地〔朴列汉诺夫（Plebanoff）也在其中〕。

一八??年——萨苏黎赤女士（Vsra Sasulich）刺杀内务尚书德联朴夫。

一八八一年——慈略薄夫及波洛夫斯嘉（苏菲亚）等刺杀亚历山大第二，慈略薄夫等五人被戮。

一八八三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朴列汉诺夫、萨苏黎赤女士等始组织“劳动解放社”于瑞士（一八七五年南俄工会成立，一八七八年北俄工会成立）。

一八九五年——俄国各地均有大罢工运动，俄皇政府辄施屠杀，伊凡沃慈纳新斯克地方枪杀二千工人。

一八九五年——列宁开始在彼得堡工人中工作。

一八九六年——尼古拉第二登基，停工三天，厂主拟扣工资，全国工人又行大罢工。

一八九七年——俄皇公布十一小时半的《工作时间法律》。

一八九七年——俄国犹太工人组织犹太社会民主党。

一八九七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四团体，开联合大会，成立社会民主党。

一八九八年——俄国社会民主党正式成立大会，是为第一次代表大会。闭会后中央委员会被捕。

一九〇二年——俄国罢工运动又暴起。俄国警察使工贼朱罢托夫组织假工会，以扰乱工人的运动，是谓朱罢托夫主义（Zubatovshtchina），即工贼主义。

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在伦敦开第二次大会，分裂两派：一派是列宁的多数派（Bolcheviki——布尔希维克），主张严格的党的组织和无产阶级领导俄国革命；

一派是马尔托夫的少数派（Mensheviki——孟希维克），反对此说，主张党要松弛些，并主张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领导。

帝国主义之初

一八五〇年——中国农民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满清政府的压榨，日益破产，奋起反抗，实行太平天国的革命，失败。

一八七〇年——日本维新，抗列强之侵略。

一八八二年——埃及反抗英国而革命，失败。

一九〇八年——土耳其之革命党“少年土耳其”，举行革命。

一九一〇年——葡萄牙革命，实行共和。

一九一一年——中国辛亥革命。

六、国际无产阶级之社会革命运动

第一国际

一八八六年——第一国际第一次大会（日内瓦），决定党纲和章程。

一八八六年——第一国际第二次大会（日内瓦），决定八小时工作制及保护童工女工的要求；认定推翻资本主义，必须工人阶级取得政权。（蒲鲁东派专重协作社的提案未通过。）

一八六七年——第一国际第三次大会（洛桑），决定无产阶级革命之进行，需实行政治运动、组织工会、协作社、互助社等工作。

一八六八年——第一国际第四次大会（白鲁塞尔），确定罢工运动的策略，世界总同盟罢工反对战争；蒲鲁东派主张替工人设立互助银行，决定矿山、水利、森林、田地、铁路国有之要求。

一八六九年——第一国际第五次大会（罢塞尔），巴枯宁派反对国际总会（执行委员会）的集权，主张解散总会。

一八七一年——第一国际反对普法战争，第一国际党员十三人被举为巴黎公盟政府的委员。

一八七二年——第一国际第六次大会（海牙），开除巴枯宁。

一八七三年——第一国际第七次大会（日内瓦），讨论工会的国际联合问题。

一八七六年——第一国际因受外部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内部无政府派的内争，不得已已在纽约宣告解散。

英国

一八八三年——英国马克思派组织社会民主联盟党。

一八九七年——英国机器工人大罢工。

一八九八年——英国矿工大罢工。

一八九九年——英国工会总联盟成立。英国工人运动中虽然“劳工贵族”很占势力，但是十九世纪末发生新工会主义，“下等工人”也组织工会了；同时发生所谓费边社一派改良主义的工人运动。

一九〇二年——塔虎尔铁路工人罢工，贵族院议决令工会出赔偿损失金二十三万元（华币）——此后遂成惯例，直到一九〇五年，各工会所赔总计二百二十万元。全英工会代表大会反对罢工赔偿，议决组织劳动党。

一九〇六年——英国国会改选时，开始有工党议员二十九名。

一九一〇年——英工会代表大会反对“工贼”——资本家所贩卖之工会会员。

一九一一年——英国国会议员始给薪俸，此乃贫民议员的要求，从察尔替运动以来争了七十多年方才达到目的。

一九一二年——因工人反对贵族院改组，资产阶级从一九〇八年起，渐渐实行许多社会改良政策，希图缓和革命。

一九一三年——英国除工会外，工人消费合作社也大发达，是年统计有二千五百合作社，社员达二百七十五万。

一九一六年——英国工会会员总数达四百万人（一九〇一年，仅二百万左右）。

法国

一八九三年——法社会党中各派内争不已，是年始组织“社会共和革命联盟”，国会中始有社会党议员四十三人；然而社会党员美尔朗做资产阶级的总长后，又分为赞成入阁派与反对入阁派。

一八九四年——法国工团（工会）大会，决定赞成总同盟罢工的策略。渐发生工团主义（Syndicalism），主张工会的罢工、怠工运动便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用不着政治斗争，夺取政权。

一八九五年——成立全法国的“劳动总同盟”（C. G. T.）。

一九〇一年——反对美尔朗入阁的一派主张开除他，改良派反对。因此，葛德派及白朗起派组织革命的“法国社会党”，而改良派组织“法兰西社会党”，法社会党从此又裂为二。

一九〇四年——法国资产阶级从一八九二年起亦渐实行社会改良政策。是年，规定十小时工作制的法律。

一九〇五年——法国各派社会党又合并，称为“劳工国际（第二国际）法国部社会党”；但不久，若莱思自己虽未退出，而若莱思派，反对革命政策，又分裂出去组织

“独立社会党”。

一九〇六年——社会党议员增至七十四人（社会党五十四人，独立派二十人）。

一九一〇年——社会党议员增至一百三十二人（社会党一百〇二人，独立派三十人）。

德国

一八九一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爱尔夫德（Erfurt）开大会，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党纲——是谓《爱尔夫德党纲》。

一八九?年——德社会民主党中分为两派：一、马克思正统派；二、马克思修正派（revisionist），以伯恩思敦（Bernstein）为领袖。

一八九九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大会，通过正统派的议决案，但对于修正派很有让步，故修正派未退出。

一八九〇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始有三十五人。

一九〇三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决定在选举运动中不可宣传反军国主义。

一九〇五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决定赞成总同盟罢工，但因修正派（改良派）工会反对，故未实行。

一九一二年——德国资产阶级从一八九五年起便渐渐实行社会改良政策，是年社会民主党议员已有一百十人。

一九一二年——德国工会会员达二百五十万（一八九五年时只有二十五万九千人）。

一九一二年——是年统计自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二年，劳、资冲突共二万一千六百二十五次，参加之工人总计有二百五十三万七千零十六人。

俄国

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俄国大败，国内经济大恐慌，人民要求自由和立宪。

一九〇四年——俄国工会稍有组织，大致都是秘密的，只有警察所组织者能公开。圣彼得堡的工人，原本由警察派神甫加朋（Gapon）组织所谓“俄国工厂工人协会”，入会者是年已有八千人。

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彼得堡蒲第洛夫铁厂开除“工人协会”会员四人。

一九〇五年——一月十五日，蒲第洛夫铁厂工人宣布罢工（因为加朋要求和平解决，资本家不理）。二十日彼得堡其他两厂同情罢工，罢工人数达十五万人。

一九〇五年——一九〇五年革命。一月二十二日（俄历一月九日），加朋率领工人数万赴冬宫请愿，俄皇卫队开枪围击，死一千二百十六人，伤五千人。二月，社会革命党刺杀皇子谢尔格衣，此后直到十二月，各地罢工、示威陆续不绝。四月（?）到十月，

各地农民开始暴动，是年地主邸宅被焚毁者二千余，民主主义的知识阶级到处召集政治集会。资产阶级也要求立宪，屡次请愿。四月，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三次大会（多数派在伦敦开会，少数派另在日内瓦开负责党员会议。）五月，彼得堡成立俄国“各团体联合会”。六月十一日，波兰都城大暴动，与军队冲突。六月十六日，伊沃兹纳新斯克警察开枪打击女工、童工群众，死二十八人。六月二十六日，沃德萨工人暴动。八月，俄国农民会成立。九月，高加索工人暴动，死一百人。十月三日，莫斯科印刷工人罢工。十月十日，莫斯科总同盟罢工。十月二十一日，莫斯科铁路工人加入罢工。十月二十四日，彼得堡总同盟罢工，哈黎夸夫（乌克兰）示威大会。十月二十五日，萨脑托夫省农民运动爆发，波及九十九县。十月二十六日，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一次成立大会。十月二十七日，俄皇政府下令：“不要开空枪，不要可惜子弹”，务必击杀反抗的民众。十月二十九日，全俄国总同盟罢工——苏维埃的命令。十月三十日，俄皇政府始公布《十月十七日（俄历）立宪宣言》。十月三十一日，沃德萨、基辅等地方军警枪击民众，政府所收买的“民贼”攻打焚毁革命机关，死千余人。十一月八日，克龙史泰军队暴动。十一月十一日，彼得堡苏维埃下令，工人自由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十月十五日，第二次令俄总同盟罢工。十一月二十七日，泊登与及沃察夸夫两军舰暴动。十二月一日，基辅城军队暴动。十二月九日，彼得堡苏维埃议长诺萨尔被捕，杜洛茨基等继任。十二月十六日，彼得堡苏维埃全体被捕。十二月十九日，莫斯科政治罢工又起。十二月二十二日，莫斯科人民武装暴动。

一九〇六年——一月一日，莫斯科武装暴动失败。三月五日，俄皇政府召集国会。四月廿八日，俄国社会民主党第四次大会（两派联合）。五月六日，莫斯科省总督被刺受伤。五月六日，嘉德琳斯拉夫省总督被刺死。五月十日，俄国第一届国会开会。六月二十二日，符腊第高加索城军队兵变。七月廿二日，俄皇解散国会，莎尔漠口厂工人罢工。七月二十四日，都腊兵工厂罢工。八月一日，克龙史泰军舰兵变。八月四日，彼得堡总同盟罢工，反对解散国会。八月六日，莫斯科总同盟罢工。十月二日，审判彼得堡苏维埃。十一月二十二日，俄皇政府公布史托柳宾之《农地改良法》，欲缓和农民革命。十一月二十四日，谢沃斯托堡兵士水兵开大会。

一九〇七年——五月，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五次大会，于伦敦。犹太及其他小民族之社会党，皆赞助多数派，并并入社会民主党，因此，多数派在党中又占优势。然而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中立派动摇，中央遂成改良派的；多数派因此秘密组织多数派的中央，是为俄国共产党之始。六月十六日俄皇政府逮捕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俄国社会民主党少数派中更发生了“取消派”（Liquitateur），主张取消秘密组织，按照《宪法》组织公开政党。多数派中亦发生一派“召还派”（Otozyvist），主张召还社会民主

党的国会议员，纯粹做秘密工作。列宁派主张应联结公开与秘密两种工作，而以秘密、严紧的党的组织做中心，以指导革命运动。

一九〇八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巴黎会议上欲调和各派未成。

一九一〇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开两次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申明党的纪律，欲求联合各革命派，未成；杜洛茨基派反而主张列宁派应当让步，以保党之“统一”。

一九一二年——林纳金矿矿工大罢工，惨遭屠杀，俄国革命运动潮流又昂进。

一九一四年——多数派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第二国际

一八八九年——巴黎开各国社会党联席会，决定五月一日为国际无产阶级总同盟罢工的示威日期；并确定：（一）社会主义制度；（二）八小时工作制；（三）取消常备军——为宗旨，第二国际成立。

一九〇〇年——第二国际第五次大会（巴黎）始规定章程，组织“社会主义国际局”，确定马克思主义的政纲。第二国际可分为两期，自成立至一九〇四年为一期。此期中，第二国际反对社会党入阁，但声明如有十分必要时，可以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府。再则，主张以民众会议（国民外交）反对战争，主张设立国际仲裁机关消弭国际战争。

一九〇四年——第二国际第六次大会。

一九〇七年——第二国际在史都加开会，又决议反对战争。

一九一二年——第二国际在白鲁塞尔开会，反对战争的议决案更为明显，然而没有一定的反对战争方法，仅仅说：各国相度情势进行非战运动。所以从一九〇四年议决社会党可以入阁后，直到欧战，是第二国际的第二时期；此期中，反对战争渐渐变成口头禅。

一九一四年——各国社会党的改良派都赞助欧战，各自说自己政府的参战，是为正义、人道而战。

一九一五年——德、奥、匈等国社会党改良派单独开会。

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〇年——英、法、俄等协约国的社会党改良派也单独开会三次。（协约国及同盟国的资产阶级走狗、社会党改良派，各自赞助主人！）

七、二十世纪之世界社会革命

第二国际左派

一九一五年——第二国际左派、列宁派等，在臻美华德（Zimmerwald）开会，宣言反对帝国主义的欧洲大战。

一九一六年——第二国际左派又在经塔尔（Kiental）开会，然到会者仅为“臻美

华德会之左派”。列宁坚决提出反对第二国际，而另组“新的革命的国际”（第三国际），当时尚有“中立派”反对此议。

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

一九一七年——二月八日俄皇政府逮捕“战时工业委员会”中之工人代表（少数党）。

一九一七年——三月九日圣彼堡罢工工人达二十万，与警察冲突。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日圣彼得堡总同盟罢工，选举工人代表苏维埃。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一日俄皇下令解散国会，国会抗命。多数派宣言，主张设立临时政府，大示威。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三月十二日（俄历二月二十六），圣彼堡各营军队兵变，民众攻破彼得洛保罗夫监狱。圣彼得堡苏维埃成立，俄皇内阁阁员被捕，国会成立临时委员会。三月十四日，莫斯科苏维埃成立。三月十五日，俄皇尼古拉第二退位，以皇室美海尔摄政。俄国临时政府成立，以黎沃夫公爵为总理。三月十六日，俄皇摄政美海尔退位。三月廿一日，俄皇及皇后被捕。三月廿三日，彼得堡苏维埃下令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三月廿七日，彼得堡苏维埃宣言，要求无赔偿无、割地的欧战和议。四月五日，革命死者一千三百八十二人，举行国葬。四月十一日，全俄工兵苏维埃协议会开会。四月十六日，列宁归国。四月二十六日，彼得堡开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五月三日，多数党中央委员会宣言，反对续战；工人大示威，反对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美留夸夫（Milukoff 立宪民主党）的对外继续战争之通牒。五月十四日，临时政府改组为资产阶级政党及改良派政党之联立内阁（美留夸夫辞职）。五月廿六日，克龙史泰的苏维埃宣布自己是地方上的唯一政权。六月十三日，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中央会议决：无产阶级应即夺取政权。六月十六日，全俄第一次劳农苏维埃代表大会开会。六月廿日，全俄第三次工会联席会议开会，成立俄国（苏联）总工会。第一次联席会议一九〇五年十月，第二次在一九〇六年。六月廿九日，联立内阁政府的陆军总长克伦斯基，下令进攻德国，继续战争。多数派兵士组织开全俄会议。六月卅日，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设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七月一日，彼得堡大示威，反对改良派的政府。七月十日，乌克兰总同盟罢工。七月十六日，彼得堡工人、兵士武装暴动，反对临时政府，要求“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是为七月之役）。七月十七日，武装暴动被镇压。七月十八日，克伦斯基下令调反革命军队返京，以备镇压革命。七月十九日，“民贼”焚毁革命报馆，列宁不得不秘密起来。各处示威、暴动、罢工不绝。黑海舰队有异动消息。七月三十一日，临时政府解散波兰国会，不许波兰民族自决。八月三日，除多数党外，各政党开联席协议会，决请克伦斯基为总理，重组内阁。八

月五日，克伦斯基政府逮捕杜洛茨基及鲁纳察尔斯基。八月六日，克伦斯基内阁正式成立。八月八日，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开第六次大会于彼得堡。八月十三日，芬兰宣布总同盟罢工，反对克伦斯基政府之不承认芬兰自治。八月二十一日，芬兰自动召集国会。八月二十五日，莫斯科开“国是会议”，四十万工人大罢工表示反对。九月九日，郭尔尼洛夫（Korniloff）将军叛共和。九月十二日，克伦斯基自任海陆军大元帅，为战事总司令。九月十四日，克伦斯基之临时政府至此，始宣言确立共和制度。九月十七日，彼得堡苏维埃第一次议决：苏维埃应取得政权，社会革命党右派因此退出苏维埃主席团。九月二十七日，彼得堡开所谓民主派各党的协议会。塔什干苏维埃取得政权。九月二十九日，民主派协议会中之工人代表团，要求政权归苏维埃。十月八日，杜洛茨基被选为彼得堡苏维埃议长（杜氏系九月十七日释出）。十月二十九日，彼得堡苏维埃之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十一月六日，临时政府下令封禁革命报馆，如“工人之路”及“兵士”等。克伦斯基调动贵族军官队。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各军多数党代表准备起事。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十一月七日（俄历十月廿五日），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取得政权，逮捕临时政府，莫斯科苏维埃之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十一月八日，苏维埃大会通过《停战令》及《土地令》。平民委员行政会（So-v. Nar. Kom. ——苏维埃政府）成立。克伦斯基调集军队。十一月十一日，贵族军官队在彼得堡有暴动，为革命军所扑灭。平民委员行政会下《八小时工作制令》。莫斯科革命军暴动。十一月十四日，苏维埃军队占领嘉德赤纳（Gatchina），莫伦斯基逃去，克腊斯诺夫（Krasnoff）将军被捕。十一月十五日，莫斯科革命军和白党军队谈判结果，白党军队解除武装。十一月十七日，列宁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说明无产阶级的革命独裁之意义。十一月十九日，芬兰赤军与白军战。十一月二十一日，史维德洛夫（Sverdloff）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长。十一月二十二日，外交平民委员长杜洛茨基通知外国公使以苏维埃政府成立。克留伦郭（Klynelko）被任为最高审判委员会长。十一月二十三日，莫斯科举行国葬：十月革命死者典礼。十一月二十五日，国民会议选举之第一日。十一月二十七日，多数党占领西战线参谋部。十二月八日，革命军与反动军阀郭尔尼洛夫开始接战。十二月十一日，克服郭尔尼洛夫。十二月十三日，彼得堡发觉口宪民主党的复辟阴谋。十二月十七日，发觉列强公使参与郭尔尼洛夫反之革命阴谋。十二月二十七日，发布银行国有令。十二月三十一日，芬兰完全独立。发布《国民结婚条例令》，废除教堂结婚制度。

一九一八年一月三日——设立特别的革命法庭。一月五日，发布《新字母表令》。一月七日，苏维埃政府代表到白莱斯德（Brest Litovsk）开始与德议和。一月十四日，

列宁第一次遇刺。一月十八日，国民会议在彼得堡开会，国民会议拒绝讨论《和平》《土地》等令。苏维埃政府下令解散国民会议。一月二十九日，下令组织劳农赤军。一月三十日，乌克兰民众暴动，反对乌克兰资产阶级的国会。一月？日，俄国工会第一次全俄代表大会开会。二月五日，下令教堂与国家分离。二月八日，下令没收全国商船。二月十日，对德和平会议中乌克兰单独签字媾和。苏俄代表宣言对德战争停止，然对《白莱斯德条约》未签字。下令取消俄皇政府一切外债。二月十三日，下令撤兵停战，旧军队兵士解甲归田。二月十四日，下令组织赤色海军舰队。二月十九日，公布《土地国有令》。二月二十四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接受《白莱斯德和约》。三月三日，《白莱斯德和约》签字。三月八日，俄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第七次大会，改名俄国共产党。远东白党作乱。三月十日，苏俄迁都莫斯科。三月十六日，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白莱斯德和约》。四月十日，无政府党在莫斯科暴动，十二日解除其武装。四月十八日，反动军阀郭尔尼尔夫被杀于南俄。五月二十六日，西伯利亚的捷克人反革命军起事。六月十四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因左派社会革命党及少数党阴谋反革命，将他们开除出会。六月二十日，共产党领袖沃洛达尔斯基（Vorodarecky）被刺死。六月三十日，下令没收大工业。七月六日，左派社会革命党刺杀德国公使，欲仍使俄国卷入战争，他们并起暴乱。七月七日，逮捕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解除其武装。七月十六日，处前俄皇以死刑，于嘉德琳堡执行。七月十九日，全俄苏维埃，第五次大会公布其通过之《苏俄宪法》。八月二十七日，英国侵略俄国的军队，因兵士罢战，自亚尔罕赫勒斯克（Arhanhelsk）退去。八月卅日，反革命党（前社会革命党）嘉朴兰女士（Kaplan）刺列宁，列宁重伤（莫斯科）；乌黎茨基（Uritsky）被刺死（彼得堡）。九月一日，发觉“左派社会革命党”之反革命，系受英国帝国主义者勾结，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因公布命令，谓列强如阴谋推翻苏俄政府，运动反革命，即捕逮其公使为质。即日逮捕英国大使洛嘉德（Loccarf）。

九月十六日——反革命的军阀立宪党、少数党、社会革命党等在乌发（Ufa）开“国是会议”。十月十八日，赤军战胜克腊斯诺夫将军。十一月十三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因德国革命，宣言取消《白莱斯德和约》。十一月二十四日，英国军队会同白党占领巴库（Baku）。十二月一日，乌克兰军阀斯郭洛朴德斯基（Skoropad-cky）被推翻。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俄国共产党第八次大会。三月二十九日，嘉里宁（Kalinin）被举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四月六日，颁发组织《劳农民警法》。四月二十三日，提出对于列强封锁的抗议。五月廿二日，腊德维国内反革命开始，屠杀工人农民。七月十四日，赤军攻破哥尔察克（Koltcbak），克服嘉德琳堡。七月十九日，美国侵略苏俄的军队，因兵士罢战，从亚尔罕赫勒斯克撤退。八月三十一日，田

尼庚 (Den kin) 攻下基辅。九月二日, 蒲哈腊 (Buhara) 革命。十月十二日, 犹乾尼茨 (Udenitch) 匪队攻取杨堡尔城 (Yamburg)。十月十三日, 白党进占沃尔腊 (Orla)。十一月十五日, 犹乾尼茨攻彼得堡, 被击退。

一九二〇年——一月八日赤军攻取克腊史诺雅尔斯克 (Krasnoyarsk)。一月十五日, 西伯利亚实行苏维埃制度。一月卅日, 英国劳动党及工会发表宣言, 要求对苏俄讲和。二月七日, 哥尔察克在伊尔库茨克枪毙。二月十二日, 赫华 (Hiva) 为革命党占领。三月廿九日, 赤军占领符腊第高加索城。五月六日, 波兰兵侵苏联, 占基辅城。五月十五日, 远东共和国成立。五月二十九日, 鞑靼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七月十二日——苏俄与理德瓦国 (Litwa) 媾和。七月三十一日, 波兰成立革命委员会。八月十七日, 俄、波谈判开始。九月五日, 国际海员代表大会议决不运军火至波兰。十月十二日, 俄、波媾和, 预约签字。十月十四日, 意大利总同盟罢工, 主张承认苏俄。赤军与蓝格尔 (Wrangel) 战于南俄, 败之。十一月二十二日, 谢米诺夫 (Semenoff) 败退蒙古。

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苏俄与阿富汗订立《亲善条约》。三月二日, 克龙史泰反革命派暴乱。三月八日, 俄国共产党第十次大会, 决定新经济政策。三月十五日, 苏俄政府下令废止《食粮均配法》, 实行《食粮课税法》。三月十六日, 苏俄与革命的土耳其订立《亲善条约》。苏俄与英国订立《商约》。三月十七日, 克服克龙史泰的暴乱。四月十四日, 俄波和约批准。八月十一日, 平民委员行政会, 公布新经济政策。八月二十六日, 远东共和国与日本议和开大连会议。十一月五日, 苏俄与革命的蒙古政府订约。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苏俄代表参加列强之葛奴亚 (Genua) 会议。四月十六日, 苏俄与德国订立《腊柏洛 (Rapollo) 条约》。七月五日, 国际劳工赈济会议开会协议救俄国饿荒的问题。十月二十五日, 日本自海参崴退兵。十一月十九日, 远东共和国合并于苏俄。十二月三十日, 第一次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席大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 是为苏联。

注: 十月革命可分四期: 第一期, 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一八年二月。这是革命暴动胜利之后没收银行, 设立“最高国民经济行政会”, 工人监督工厂, 大企业没收, 商船没收, 设立纱业皮业等类总委员会。这期的政策完全是: 没收大企业及一切必须国有的机关, 实行无产阶级之经济监督制度; 食粮仍旧自由买卖。第二期, 自一九一八年二月至五月。无产阶级对资本的进攻已停止; 正在准备整理组织生产及消费机关, 要想实行“国有大生产之外无产阶级监督小资产阶

级经营”的经济制度；改组消费合作社及供给食粮机关，如运输等类；国内革命群众的行动渐渐纳入革命的法律和革命的规范。第三期，自一九一八年五月至九月。资产阶级抵御反抗，不服从革命政府的经济上的条例和《劳动法》《工厂法》等，小厂主或者抛弃工厂，停业抵制，大资本家更勾结列强实行反革命战争。因此，苏俄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没收一切企业；组织贫农与富农奋斗；派遣食粮军入乡，行使《食粮均配法》；暂时禁止自由贸易。第四期自一九一八秋至一九二一年春，厉行战时共产主义以求战胜反革命。果以此坚决政策，克服几十次、几十处的反革命，肃清反动派肇祸的国内战争。一九二一年国内战争停止，列宁一九一八四月所主张之改造俄国经济之政策——“无产阶级国有大生产之外，无产阶级监督小资产阶级经营之经济制度”，即现时通常所谓“新经济政策”始得实行（请再参看《战壕断语》二之八，见《新青年》第四号）。

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运动之第一高潮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八日柏林铁厂工人大罢工。

一九一八年——一月廿八日，德国总同盟罢工，反对战争。七月五日，匈牙利总同盟罢工。十月廿一日，奥国维也纳革命。十月三十一日，匈牙利革命。十一月三日，德国吉尔地方有暴动。十一月八日，德国柏林及各地大暴动。十一月九日，德国革命告一段落，威廉第二退位。十一月十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政府。十一月廿三日，匈牙利工人群众自动解散国民会议。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德国工人群众的苏维埃大会，要求政权，社会民主党政府施以残杀，逮捕李卜克内西德（K. Libknecht）罗若卢森堡（Rosa Luixembug）女士途中暗杀之。三月十九日，匈牙利宣布苏维埃政府立。四月二十六日，匈牙利反革命武装暴乱。八月四日，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失败，逮捕其平民委员政府。九月二十七日，美国五十万铁路工人宣布总同盟罢工，延长八星期，胜利。十一月二十一日，协约军队占领匈牙利苏维埃的区域——蒲达俾史德（Budape-st）。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三日，德国反革命派嘉泼（Kappa）阴谋复辟，鲁尔平民群众及其他地方暴动反抗，“共和”政府反镇服平民而加以屠杀。三月十六日，协约国军队突然占领君士但丁堡，强迫订立瓜分土耳其的条约。四月二十三日，土耳其革命京城昂戈尔（Angos）召集国民立法大会，从此以国民大会为最高政府机关。八月二十九日，意大利工人暴动，自动占领工厂。十月二十二日，罗马尼亚总同盟罢工。十二月？日，意大利和捷克斯拉夫工人占领工厂，失败。

一九二一年——？月，蒙古国民革命党成立国民革命政府驱逐中、俄白党而独立。

三月廿六日，德国加尔及孟斯菲德区总同盟罢工，德共产党起事未成，是为三月之役。四月二十五日，意大利反对法西斯蒂的总同盟罢工。八月一日，西班牙总同盟罢工，反对出兵摩洛哥。八月十一日，波兰铁厂工人大罢工。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日，美国煤矿大罢工，胜利。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德国鲁尔区工人，因法军占领，十万人罢工。八月十一日，柏林工人大罢工，要求建立工农政府。九月二十日，布加利亚的农民工人暴动，反对残苛夫（Tsankoff）的反动内阁，失败，惨遭屠杀（布加利亚于欧战败后，已于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宣布共和，国王自动退位，交政权于资产地主阶级）。十月十日，德国萨克宋尼亚（Saxonia）民众暴动，组织工人政府——“德国的十月革命”。十月二十九日，萨克宋尼亚工人政府受反革命军的摧残，因工人武装不足，失败。

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运动之第二高潮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中国上海之帝国主义政府屠杀民众。六月一日，上海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详见中国年表）。六月廿一日，广州、香港的中国工人大罢工。六月二十五日，广州中国国民政府成立。六月二十七日，摩洛哥的里夫民族开始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七月三日，非洲坦及尔地方因反对新颁《财政条例》，宣布罢市。八月六日，叙利亚大马斯克民众革命。八月十六日，印度孟买等处纱厂工人大罢工。九月十八日，帝国主义的中国代理统治者（奉系军阀）封闭上海工会。九月？日，美国无烟煤矿工人大罢工（一九二六年一月失败）。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政府段祺瑞执行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民众的哀的美敦书□屠杀请愿反抗大沽事件之民众。五月三日，英国工人援助矿工反对减资，宣布全国总同盟罢工。五月十二日，英国总罢工由改良派之英国工会总会宣布停止。五月二十六日，摩洛哥里夫革命军力竭，屈服于法帝国主义。

第三国际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八国共产党发表发起组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之宣言书。三月二日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正式成立（三月六日），发布宣言及政纲。九月二十日，少年共产国际开第一次大会于柏林，正式成立。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最终确定章程：排斥一切“中立”式机会主义派（加盟之二十一条）；决定工会运动、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等的方针。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第三国际第三次大会，出席者已有世界五十余国共产党代表；决定抵御资本进攻，应用统一战线的策略。

注：第二国际于欧战后一九一九年八月间“复活”大会，宣言赞成凡尔赛的帝国主义条约。第二国际的“左派”不容于第三国际，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在倍恩地方开一大会，另外成立“第二半国际”（正式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声言反对侵略苏俄，同时反对共产党之“铁的纪律”和“过激”的策略。所谓统一战线，便是要求这些“社会党”及其影响之下的工会，以最低限度的口号一致反对资本进攻。

一九二一年——七月九日，赤色职工国际第一次成立大会闭幕，宣布成立。

注：一九一三年，欧洲即有“国际工会联盟”之组织，战时随各国资产阶级的分裂而分裂。战后，一九一九年七月，改良派各国工会在亚摩斯德丹（荷京）开会，又成立国际工会联盟，是为黄色职工国际。它专希望国际联盟的劳动局对劳动者有“正义主张”，而不奋斗。故此，革命派的工人或整个儿的革命派工会，便团结起来，成立赤色职工国际，在一九二〇年七月间便筹备起的。赤色职工国际并不主张革命的工人退出改良派把持的工会；它的职任，是使一切工会革命化，然后组织统一全世界的革命的总工会。

一九二一年——七月？日，国际共产党妇女会议，成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妇女书记部（第一次国际共产党妇女会议在一九二〇年，这是第二次会议）。

一九二一年——七月？日，赤色体育国际成立，以要求无产阶级的体育及使体育团体运动会等革命化为宗旨。

一九二一年——九月二日，东方民族（远东）联席会议开会于巴库。

一九二二年——一月三十日，远东革命党派联席会议开会，决定国民革命政纲，废除不平等条约。二月二日，共产国际、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三方联席会议开会于柏林，讨论统一战线，约定四月二十二日或五月一日，共同进行世界示威，反对资本进攻。届时，第二国际及第二半国际之各国“社会党”故意怠工破坏。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列宁再报告俄国新经济政策之成绩及其国际意义；讨论意大利法西斯蒂政变及一般资本进攻中的策略，提出工人政府的口号；第一次提出共产国际《党纲》（草案），交付各国讨论。十一月？日，共产国际协作社部成立，确定协作社运动的方法。？月，革命牺牲国际救济会（Mopr——济难会）成立，专以办理精神上、物质上救济一切为革命牺牲者的本人及其家族等事务为职志。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日，第二国际及第二半国际在汉堡开会后，取消第二半国际。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扩大会议，讨论帝国主义战争的危机，法军占领鲁尔区域等问题。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世界农民协会成立，是为农民国际。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九日，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通过《共产国际党纲》（草案），仍交付国际委员会研究，讨论各国共产党布尔希维克化的问题；决定对于一九二三年十月的德国革命的批评（工人、政府、军界）；更加确定共产党对于民族主义的态度（赞助民族解放运动而反对民族仇视的资产阶级政策）。

一九二五年——一月，筹备统一国际职工运动的英、俄两国工会联合会委员会成立；黄色职工国际之内发生左派主张和俄国赤色工会携手。九月，英国工会代表大会在斯加波罗开会，大会群众左倾，采纳英、俄委员会之统一世界工会主张和共产主义的民族问题原则。

一九二六年——二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扩大会议。

八、中国革命运动

农民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至无产阶级的斗争

上古——??（待考）

中国的中世纪

纪元前二〇九年（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等举兵反秦。

纪元九年（王莽始建国元年）——禁买卖田宅、奴隶。

一七年（天凤四年）——绿林兵起荆州。

一八年（天凤五年）——赤眉起兵。

一六六年（东汉桓帝延嘉九年）——大捕党人李膺等下狱。

一六九年（灵帝建宁二年）杀李膺等百余人。

一八四年（灵帝中平元年）黄巾兵起，杀党人。

三一八年（晋睿帝建兴四年）——汉刘曜陷长安，帝出降（五胡乱华）。

五八八年（隋文帝开皇八年）——隋杨坚篡北周，后灭南陈。

六一一年（隋炀帝大业七年）——群“盗”蜂起。

八六〇年（唐懿宗成通元年）——浙东“贼”裘甫作乱。

八七五年（唐僖宗乾符二年）——王仙芝、黄巢起兵。

九四六年（五代后晋出帝开运三年）——辽大举兵执晋帝而去（五代异族乱华）。

一〇六九年（宋神宗熙宁元年）——王安石行方田、均税、青苗诸新法。

一一四〇年（宋高宗绍兴十年）——岳飞等败金师，明年，宋杀之，称臣纳贡于金。

一二七五年（宋恭帝德祐元年）——蒙古征服中国，文天祥勤王。

一二八七年（元世祖至元二四年）——江南民兵起，败。

一九二六年（元成宗元贞二年）——赣州民兵起，败。

一三四六年（元惠宗至正六年）——江州、靖州民兵起事。

一三四七年（至正七年）——沿江兵起。

一三四八年（至正八年）——方国珍起兵。

一三五〇年（至正十年）——四方“盗贼”起。

一三五一年（至正十一年）——刘福通、李二等起兵。

一三五二年（至正十二年）——郭子兴起兵濠州。

一三五三年（至正十三年）——张士诚起兵。

一三五五年（至正十五年）——朱元璋起兵，韩林儿称帝。

一三五七年（至正十七年）——明玉珍“反”于成都。

一五一一年（明武宗正德六年）——“流贼”大乱，平之。

一六二五年（明熹宗天启五年）——魏忠贤大兴东林党狱杀杨涟、左光斗等。

一六二八年（明思宗崇祯元年）——流贼大起。

一六三二年（崇祯五年）——张献忠大乱山西。

一六三三年（崇祯六年）——流贼犯畿南、河北、湖广。

一六三六年（崇祯九年）——李自成犯陕西。

一六四五年（清世祖顺治二年）——清兵下江南，屠扬州，明臣史可法自杀，清执福王。

一六四七年（顺治四年）——郑成功抗满清。

一六四八年（顺治五年）——瞿式耜等立明永明王于肇庆是为永历帝，是年各省官民起兵附之，有云南、贵州、江西、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七省。

一六四九年（顺治七年）——永历帝败奔梧州，瞿式耜固守桂林；广东各地高雷等处之陈邦彦、张家玉、陈子壮等义兵群起。

一六五九年（顺治十六年）——明永历帝自梧州奔缅甸，瞿式耜等被杀。（顺治十六年，吴三桂执永历杀之）。

一七一九年（清圣祖康熙五八年）——西藏抗清，明年始平。

一七二一年（康熙六十年）——台湾朱一贵抗清。

一七二三年（清世宗雍正元年）——青海反清，年羹尧平之。

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准噶尔（新疆回民）反清。

一七四七年（清高宗乾隆十二年）——四川大、小金川土番抗清（一七七六年始渐平）。

一七六四年（乾隆二九年）——回部乱起。

一七七四年（乾隆三九年）——山东“奸民”王伦作乱。

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八年）——回部又起兵反清。

一七九三年（乾隆五九年）——白莲教作乱。

一七九八年（清仁宗嘉庆三年）——襄阳“贼”起。

一八〇四年（嘉庆九年）——西南连年“匪”乱，是年平。

一八〇五年（清宣宗道光五年）——“回匪”张枚尔作乱（一八二七年始平）。

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永州“贼”起。

一八四五年（道光二五年）——回“匪”又起。

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

一八四七年（道光二七年）——广州平英团起事，逐英国人。

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洪秀全起兵，称太平天国。

一八五三年（清文宗咸丰元年）——太平天国军占领南京，放奴隶、禁娼妾。

一八六四年（清穆宗同治三年）——清将曾国荃取南京，秀全自杀。

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捻匪”作乱于北方（一八六八年始平）。

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回人陷伊犁（一八七八年左宗棠始定新疆）。

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天津人民焚法国教堂。

一八九四年（清德宗光绪二十年）——孙文创兴中会。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孙文、陆皓东、朱贵、全丘四等谋起兵广州，事泄，陆皓东被杀。

一八九七年（光绪廿三年）——山东人民杀德教士。

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梁启超等谋君主立宪，挟清帝行新政。事败，其党谭嗣同等六人为清太后所杀。

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北方义和团起事。兴中会会员郑士良起兵惠州革命，史坚如谋在广州响应，事败被杀。

一九〇五年（光绪卅一年）——孙文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于东京。是年黄兴、宋教仁等起兵柳州失败，来东京，与章炳麟等之光复会（只排满，不反对皇帝），皆先后加盟。

一九〇六年（光绪卅二年）——禹之谟、刘道一、宁调光、胡英等起兵于萍乡、醴陵失败。徐锡麟、秋瑾、熊成基刺安徽省大吏。革命党人起兵潮州黄冈，皆败。同盟会会员邓子瑜起兵惠州，败。

一九〇七年（光绪卅三年）——广东钦、廉两府人民抗捐，清新兵郭人漳、赵伯先往“讨”，同盟会游说之，使抗捐助民，郭等允之。各乡团勇及革命党无军械力弱，郭等犹豫观望，遂败。黄兴、胡汉民起兵于安南，攻镇南关，败。

一九〇八年（光绪卅四年）——清廷发布筹备立宪。

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黄兴以二百人自安南攻入钦、廉一带，弹尽而退。黄明堂以百数十人袭河口，杀清之边防督办，败退安南。一九〇九年（？）——汪精卫入京刺摄政王未中，入狱。

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朱执信、倪日映等谋以广州新军起事革命，因“新军中热度过甚之士于事前因小事起风潮”，倪日映不得不仓卒举兵，遂败。

辛亥革命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旧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七十二烈士举兵，事败被杀，丛葬于黄花岗。十月十日，武昌革命军起兵，推清新军统头领黎元洪为元帅。

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元年）——孙文就临时大总统之职于南京，未几让位于袁世凯。袁氏以反动势力压迫民党，国会遂选袁为大总统。同盟会分裂，光复会之章炳麟派分裂出去，而与立宪预备会之张謇派联合，组织统一党。宋教仁、黄兴等主持，复联合统一党等政团，合并而为国民党，抛弃平均地权之党纲。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袁世凯使人暗杀宋教仁。二次革命起，国民党员叛党多，遂失败。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孙文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欲刷清反革命派及妥协派。袁氏卖国，谋帝制自为，西南诸省起兵讨之。袁氏死，梁启超等之进步党及一切反动派执政。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张勋复辟，段祺瑞、梁启超等乘机起兵讨之而自执政权，旋即举兵攻南方护法诸省。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西南诸省组织军政府，南方军阀陆荣廷等渐专欲，孙文不能容，遂辞七总裁之一。

五四运动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学生群众殴章宗祥，焚曹汝霖宅，六月三日，上海总同盟罢市、罢工援助学生，钱能训之安祸系内阁遂不得不改组。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中国第一次庆祝五一劳动节，各地有罢工运动。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五月五日，陈炯明逐去陆荣廷，孙文返广州，非常国会选为大总统。中国共产党开第一次大会，正式成立。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广州陈炯明反革命，孙文又离粤。中华革命党改名中国国民党，申明三民主义。香港海员大罢工，胜利。六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一次对时局主张——民主主义联合战线，要求普选，废除“列强在华各种特权”（中国始有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湖南纱厂罢工，资本家令赵恒惕杀黄爱、庞人铨。中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开会于广州。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成立大会。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发布政纲——打倒帝国和军阀。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孙文再返广州，粤军推为大元帅。二月七日，京汉铁路大罢工，吴佩孚在汉口施行对于工人大屠杀（中国工人运动自一九二〇年起日益发展，至此为一段落）。六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通过《党纲》（草案），决定联合战线的策略，共产主义者可以加入国民革命的政党。七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二次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实行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一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始定“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联络苏俄，赞助农工”等之新政纲，决定新章程，容纳一切革命派别，而申明纪律制裁反革命派。二月七日，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七月，广州沙面华工罢工。九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时局宣言，反对军阀战争。九月十八日，广州革命政府北伐宣言。十月，广州商团反革命暴乱，革命政府扑灭之。十一月，冯玉祥倒戈，国民军成立，北京政变，军阀崩毁。十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时局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十一月，孙文发表北上宣言，亦提议反直军与人民各界团体开国民会议预备会。

五卅运动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更加确定民族解放运动及国民革命中之联合战线政策。二月，上海内外棉等日商纱厂四万余人大罢工，得相当的胜利。三月一日，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开会于北京，与段政府之善后会议对抗。三月，青岛日商纱厂大罢工。四月，北京印刷工人罢工，福州学生抵制日货。广州政府肃清东江之陈炯明军。五月一日，中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开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农、工、商、学、兵联合大示威于广州，广州农民协会第一次大会开会。五月，汉口英美烟公司罢工。五月十五日，上海日厂悔约，并打死罢工索薪工人顾正红等。五月廿九日，青岛日纱厂悔约，工人又罢工，张宗昌受日资本家令，杀工人两名。五月卅日上海帝国主义政府（工部局）屠杀援助日厂罢工之中国人民于南京路。六月一日，上海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上海总工会成立。六月十一日，汉口帝国主义者又屠

杀。六月十二日(?)，上海各马路商联合会，学生会及总工会之联合委员会成立。六月十三日，广州革命政府扑灭国民党叛党中央委员杨希闵、刘震寰勾结唐继尧、段祺瑞之反革命。上海总商会擅自修改工商学联合会之五卅对外条件。六月廿一日，香港沙面华工宣布总同盟罢工。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六月廿三日，沙面帝国主义者大施屠杀。六月廿五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上海总商会议决商人先行单独开市。七月初，天津纱厂工人罢工，李景林奉帝国主义者命令大施屠杀。七月十九日，上海十一国商会代表和上海总商会秘密磋商五卅事件，表面上无结果。七月廿二日，国民政府提议急速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讨论五卅交涉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国事。七月廿三日，上海工部局对华厂停电，中国资产阶级便压迫电厂工人上工。七月?日，上海帝国主义者命令戒严司令邢士廉封闭工、商、学联合会，旋准启封。八月初，南京英商和记工厂罢工。八月六日，北京英使馆工人罢工。八月十一日，天津第二次罢工。八月十一日(?)，唐山罢工。八月十二日，单独对英派上海总商会，交涉员等，强迫日厂工人签订条约，先行复工。八月廿日，广州反革命派刺杀廖仲恺。九月七日，上海民众反对《辛丑条约》的大示威，帝国主义者又开枪屠杀。九月十八日，上海帝国主义者命令邢士廉勾结总商会封闭上海总工会。九月廿三日，上海总商会始发起“爱国募金”，同时并不肯发给英厂罢工维持费。九月廿七日，上海英厂工人上工。十月十一日，反奉战争开始，吴佩孚国民军先后加入。十一月(?)，国民党反动派开西山会议，议决开除汪精卫，排斥共产派(赤化派)。十一月廿九日，北京市民大示威，欲驱逐段祺瑞。十二月十九日，日本出兵满洲，助奉张攻“赤化”的反戈的郭松龄。十二月廿四日，国民军占天津。

一九二六年——一月，冯玉祥忽宣言下野。国民党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月一日，吴佩孚世电发表，主张“护法”——曹宪。一月(?)，河南、山东农民组织之红枪会开始反抗军阀，至五月中，此运动已蔓延六省。二月，奉、直联合攻国民军。民众反奉、直联合战线，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三月十八日，直、奉、英、日联合的哀的美敦书，威吓国民军，并令段祺瑞屠杀请愿的民众。反赤的阴谋和鼓惑益甚。三月廿日，广州国民政府下有反动派阴谋反赤，未告全功，然汪精卫离粤。四月，王士珍、熊希龄等组织北京“临时反动政府”(治安会)。四月廿日，段下野，张、吴军队入京。二月至五月，河南、山东农民暴动，红枪会等农民组织武装自卫。宁阳、杞县等处张、吴军队在农村中大施屠杀焚毁，村镇毁灭者在一百以上，农民死者不下七八万人。五月一日，中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开会，广东农民协会全省第二次大会。五月十二日，广州农、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成立。五月(?)日，北京政府下令缉捕共产党，不分首从，一律处死。五月十五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全体会议，汪精卫已不能出

席，议决“整理党务”禁止党员加入共产党，然仍宣言“团结一切革命分子与反动派战斗”。五月廿六日，吴佩孚起程入京，与奉、张讨论贿选内阁摄政及关税大借款问题。五月卅日，五卅屠杀周年大纪念。

一九二六年，五月。

革命日志

(一九二六年四月)

四月一日

上海总工会通告全沪各工会，定于五月一日举行盛大的劳动纪念，向全世界资产阶级示威，各工会需一致加入筹备。

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开幕，到各工会代表一千余人，推海员工会等为主席团，开会六日，通过议案甚多。

全国学生总会为统一学生运动发表《告全国同学书》，大致谓：全国学生当在“反抗外国侵略以争民族独立”“反抗军阀压迫以争得民权”的两个共同要求上向前奋斗，造成学生群众之统一联合的战线。

南昌成立江西济难会总会，到一千三百余人。

南京乐天、启明两书局因销售《中国》《青年》《苏声》等刊物，被孙传芳查封并逮捕经理。

国民党中央党部，因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引起种种谣言，特发严重宣言，有“始终接受总理所定农工政策，及对加入本党之共产分子绝对不存歧视”等语。

四月二日

广东民众，在广东大学举行广东各界声讨段祺瑞惨杀北京民众大会，并示威大巡行。赴会群众达二十余万人。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青年军人联合会、广东省农民协会、广州总商会、广州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为主席团体。当场通过致全国各界同胞通电及要求国民政府出兵讨段请愿书。会毕巡行时，万人空巷以观，情形至为热烈。

广州轮渡船务工会工人向轮渡公会提出加薪及恤费等要求，几酿罢工风潮，然经农工厅出而调处，容纳工会要求，始平静。

四月三日

广东各界各团体，为岭南大学帝国主义当局，排除国民党籍学生和工人事，一致

起而援助。

四月四日

日前国民政府派代表白崇禧、陈铭枢二人到长沙后，唐生智表示完全服从国民政府，进行革命事业。湖南国民党员及各界民众则纷纷举行欢送大会，一时革命空气非常浓厚，三百工农群众开欢送会，并议决请现政府取消赵恒惕所颁《工会条例》及组织湖南省农民协会等十案。四日代表回粤，沿途各县，如醴陵、株州、衡山、衡阳等处民众，都举行欢送大会，两代表亦乘机作广大而切实的宣传。

四月五日

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因省局突变，特召集全省各县、市党部紧急代表联席会议，通过对省政的具体主张：（一）召集南昌各法团、各职业团体的联席会议，制定《全省团体代表会议组织法》；（二）制止吴佩孚势力之侵入；（三）在最短期内召集全省团体代表会议，自决省政等。

四月六日

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学校对“三一八惨案”向地检厅控告段祺瑞及全体国务员（?）。

惠州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与惠州各界人民代表会，为促成军、民合作完成国民革命起见，发起举行惠州军、民联欢大会，会毕大巡行。同时全城休业一天。

四月七日

广东孙文主义学会通电，认沪代表会为破坏革命；又谓该会无端引本会为反赤同调，显系有意侮蔑。

绍兴二百数十村机业工人，因生活艰苦，向各厂主提出增加工资等要求条件十六项，全体罢工以待解放，并请各地工会援助。

厦门一百四十余团体所组织的厦门外交后援会，受当地警厅干涉，被迫解散。

上海反动派组织“反赤、救国大联合”，今日开成立会，章炳麟、徐绍桢、邓家彦三人当选为理事。

红枪会为豫省农民在国奉战争中新起之武装自卫的组织，实力颇不弱，现被寇英杰密调军队在杞县屠杀，死老、幼、男、女七千余人，而武装的红枪会众多数逃脱，尚保全其实力。

四月八日

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王景云，被淞沪警察厅拘捕。因该厅迭接租界工部局及各机关函，称该会将于五月各纪念日举行大规模之运动，故暂时将其拘押看管。

四月九日

国民党南京党部通电，誓死反对叛党分子邹鲁、谢持等所召集之伪代表大会。

北京学生总会宣言否认媚外卖国的安福政府对“三一八”惨案中民众领袖的通缉令，并主张推翻安福政府，完成国民革命。

四月十日

北京鹿钟麟以签订金佛郎案、枪毙无辜学生、左右营私、挑拨战争等理由，驱逐段祺瑞，改编府卫队。

山东五十余民众团体，因北方政局愈形反动，特联名电促国民政府出师北伐。

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发表时局宣言，谓最近的将来有第三次奉、直战争暴发之危险，中国民族运动将因此而愈益进展。又通电声讨上海伪代表大会叛徒，并主张肃清反动分子。

国民党桂林县党部电告湖南民众，督促省政府进行革命工作。

中山大学南京分校附属中学，被孙传芳命令解散，学生全体转入上海大学附中。

同情于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英工党代表迈朗氏抵京，北京总工会学生总会等团体热烈欢迎。

四月十一日

上海学生联合会开代表大会，执行委员长报告一年来的工作，属于政治的有十一项：（一）反对关税会议运动，（二）反对沪案司法重查运动，（三）反奉运动，（四）反段运动，（五）反日出兵满州运动，（六）恢复国民会议促成会，（七）反基督教运动，（八）反张、吴联合运动，（九）反对英税务司封锁粤海关运动，（十）反日炮击大沽运动，（十一）援助京案；属于地方的有六项：（一）反对粮食加税，（二）反对越界筑路，（三）抵制英、日货，（四）督促各报勿续登英、日广告，（五）援助工界，（六）反对民生奖券。

国民政府下令：沪叛徒违令集会，造谣煽惑，如派人来粤煽乱，即予拿解法庭定罪，以肃纪律。

国民政府涉外交部长，以收回法权，不需外人调查；对各国来粤调查法权的委员，决定不予接待。

厦门妇女解放会开成立会，被武装警察阻止。

北京学生总会，对“三一八”惨案发表宣言，说：“这一次的惨变，只能更加激励我们的革命情绪，全国民众更需一致集中在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旗帜下。”

国民党中央党部因安南华侨为党事被法政府驱逐，特向法当局严重抗议。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部，为谋实际统一全省青年运动起见，特召集全省各市县党部青年部代表，各市、县学生联合会代表，中央青年部，广州市青年部及青年运动委员会，举行全省青年运动委员大会，讨论全省青年运动计划。

四月十二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乘北方军阀实力未充足前，促国民政府在最近出兵北伐。

广东省农民协会及商民协会都通告各县分会一致起来，联合各人民团体举行讨段大会。

留美学生九百名公推代表六人，谒见美总理顾理治与国务卿葛维格，抗议美国之对华政策，并要求将美国与参与国税会议其他列强所持之混合政策取消，顾理治表示喜悦。

四月十三日

上海各界京案后援会电请鹿钟麟扣留“三一八”惨案祸首段祺瑞、章士钊等，以待人民公判。

全国学生总会对英工部局增加华董问题发表宣言，大致表同情于总商会所提出的三项最低限度要求。

汕头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将领会衔通电，表示遵守总理遗嘱及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拥护国民政府，始终无二。

四月十四日

汕头装卸出入口货的驳僱工会，向各船公司提出加薪八成之要求，各厂主经久不答，最后仅允增加一成，驳僱工人不满，今日起一律罢工。于是船主便要求于商家，增加货件装价。后由汕头市长出任调停解决，其条件为工人工资照加八成，行商雇驳船僱货价加一计算，工人患病时不扣工资等。

上海纳税西人会开会通过工部局增加华董三人；而以纳税多少为标准的修正案，当场被否决。

上海学生联合会对华董问题宣言：反对增加三人之西人议决案，要求十三条件的总解决。

桂林各界民众举行市民反段大会，到万余人，通过声讨段祺瑞及请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等通电，会毕列队巡行。

惠州人民代表会议决：组织惠州人民讨段委员会，巡行示威，四处宣传。

琼崖各界追悼北京死难烈士大会到五千余，会毕巡行。

上海总商会对五卅惨案各大问题发表宣言，内容分三点：（一）在华外人应以种族平等之观念互相待遇；（二）反对在沪外人任意支配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议席，主张代议权之范围，以所纳税额实数之多寡为比例；（三）会审公廨厅立即无条件交还，其他未决各案，亦当根据公平、正义之原则迅速解决。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亦发表宣言，主张求去年所提十七条之总解决，反对任何支离破碎之解决。

无锡成衣工向铺主要求加薪不遂，全体罢工。

武汉市民大会因年来帝国主义者勾结军阀、制造内乱、操纵政权、压迫民众，特致书公使团提出严重警告。

四月十五日

香港总工会借中央党部大会堂开成立会，到各业工会代表七百余人。

国民党诏安县党部召集漳南各县代表会，议决：组织联乡自治军，谋抗张毅。

广东青年军人联合会，通电自行解散。

上海总工会宣言：继续奋斗以达到五卅案中之十七条件要求，反对工部局华董由西人纳税会限定人数，对会审公廨主无条件收回。

广东遂溪县农民协会成立，议决拥护省港罢工，加入国民党等各案。

四月十六日

国民军为保全实力计，全部退出北京。

上海日商东方纱厂童工，被职员殴打受伤，又罚工资，全间童工愤而罢工，并要求不准殴打工人、滥罚工资以及开除工人需得工会同意等条件。

广州被压迫民族联合会议决：援助被英、法殖民地政府蹂躏之华侨，宣布英、法帝国主义之野蛮，促弱小民族团结抵抗。

香港总工支召集代表大会，到代表四百余，开会九日，通过香港工会统一加入全国总工会等提案。

广东全省学生联合会召集代表大会，到四十余县代表八十余人，开会六日，通过统一广东学生运动，工、农、商、学、兵大联合，学生本身利益等提案。

四月十七日

上海各团体联合会对华董问题发第二次宣言，表示同情于总商会的主张，并贯彻去年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十七条件。

广东海康县农民协会成立，近遂加入国民党拥护省港罢工等议决案。

如虎似狼的奉、直军入京后，以命令强迫通用军用票，商界罢市抵抗。

四月十八日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借东南大学举行第二次全市代表大会，通过宣言，内有对国内政治之主张，对党务之意见，对“三一八”惨案之主张，对反动派之处置，对南京政治社会各问题之具体主张等，并议决请中央党部严惩参加伪大会之叛徒及中山舰事变之陷害者。

广东各界民众，在广东大学追悼北京死难烈士，到二十余万人，团体致祭者六百余。

中华留日学生总会等团体，在东京举行北京“三一八”殉难烈士大追悼会，到八九百人，通过：（一）请愿广东国民政府速行出兵北伐；（二）“三一八”定为哀悼纪念日；（三）不承认日本大沽事件之要求。并发表宣言。

黄埔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通电讨段，谓已枕戈待旦，请国民政府乘机北伐。

西山会议分子在湖南常德惨杀国民党员，死五人，伤十余人，被诬下狱的十余人。

云南昆明中等以上公、私各学校在省议会开北京“三一八”惨死学生追悼大会，到三千余人，议决通电声讨段祺瑞等卖国贼，会毕巡行。

四月十九日

广东台山县新宁铁路公司工人，因受台山县保卫团士兵恃势压迫，开枪截击，全体罢工。后由台山县长派员出任调停，并将该案滋事之团兵二十三名留押监狱，工人遂暂行恢复工作，其他条件，均由县长担保执行。

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发对华董问题宣言，表同情于总商会之主张。

四月二十日

国民政府发表时局宣言，大意谓段罪恶贯盈，已为革命军逼走。张、吴两军利害冲突，段倒之后，尤易分裂。北方事实上已陷于无政府地位，望全国人民乘时奋起，组织坚固团体，与军阀抗争，自动召集国民会议，本政府愿为民众前驱。

四月二十一日

广东省农会通告各地农会，一致行动，于五一劳动节实行农、工联合。

南京国民党部对华董问题宣言：需以纳税人数为标准。

广州孙文主义学会，为杜绝造谣者之利用，自行宣布解散。

四月二十二日

上海四明、中西、国民等三印刷局工人，均向局主要求加薪，结果工人胜利。

杭州学生联合会通电：对华董问题，同情于上海总商会所提三项为最低限度之要求。

四月二十三日

广东学生联合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内有“学生为自身利益奋斗，工、农、商、学、兵各联合起来，全国世界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赞助国民政府，打倒帝国主义军阀”等语。

鲁南汶上武装农民所集成的红枪会，因反抗官厅苛捐，将县知事逐走，并将兖州去剿办的军队一团缴械。逆料官厅不肯罢休，特派一部分到宁阳防兖州军队西进，先

后驻县城者，对民间绝无扰害。

四月二十四日

国民政府发对外宣言，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否认奉、直军阀占领北京政权。

奉系军阀入京后，指《京报》宣传赤化，袒护国民军，将该报封闭，社长邵飘萍被捕。

国民党海康县党部成立。

四月二十五日

广州全国劳动大会筹备会议决：为全国职工运动死难诸烈士建立纪念碑于全国总工会门前。

广东惠阳县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议决：请政府暂拨地方公款筹办农民自卫军，请政府早日肃清土匪出师北伐，警告造谣惑众之一切反革命派等议案。

四月二十六日

上海国立同济大学当局，为禁止学生参加民族运动起见，特借口学生为“三一八”案擅自罢课，迫令填具誓约书，否则开除学籍。学生会认□为剥夺自由之卖身契约，一致拒绝签约。今日当局调集武装军警七百余人到校禁止开会，强迫签约。学生三百余人被迫离校。

奉天城内各印刷所工人，在公园召集印刷业职工大会，审议如下之要求：（一）奉天票骤跌，需加工资；（二）定劳动时间每日十小时；（三）做夜工需酌给工资；（四）学徒期限应由四年缩为三年。被警察发觉，立令解散，捕去三十名。

广州邮差总工会，因受邮政当局不准该会参加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代表请假、不准参加群众运动等种种压迫，准备全体罢工。后经农工厅出为解决，邮差因目的已达，就中止罢工。

北京《京报》社长邵飘萍，被奉系军阀指为宣传赤化，执行枪毙。

全国学生总会及上海各团体联合会，都通电反对吴佩孚进兵湖南。

江西女青年社为死于“三一八”惨案刘和珍女士开会追悼。

四月二十七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通告所属工会，说明五一节召集全国劳动大会意义之重大，全国工会均有参加之必要。

国民政府决于一月内大举肃清各属土匪。

四月二十八日

江西革命同志会呈请国民政府军、政两委员会出师北伐，取道江西。

福州学界发起人权保障会，发表宣言，号召各界一致参加。

四月二十九日

广州民生火柴厂工人因厂方无理开除工友，全体罢工数十日。后由农工厅调解而复工。

上海中华袜厂女工，因反抗厂主压迫全体罢工。

四月三十日

国民政府通令所属各机关，各公、私工厂，于五一劳动节放假纪念。

省港青年工人借全国总工会礼堂举行代表大会，讨论设法增进自身利益问题，并请国民党中央青年部、工人部，省青年部、工人部，全国总工会等机关派员出席指导。当经通过拥护第二次劳动大会、组织省港劳动童子团等议案。

香港金属业总工会开第一次同人大会，到万余人，通过拥护第三次劳动大会宣言；职员行就职礼，宣读誓词。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上海总工会及工商联合会等团体，均为被奉系军阀惨杀的《京报》记者呼冤。

革命日志

(一九二六年五月)

五月一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所召集的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和广东省农会所召集的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联合开幕礼，共到工人代表四百余人，代表有组织的工人群众一百一十余万，农民代表二百五十余人，代表有组织的农民群众八十余万，并有英、俄、法、德、美、日诸工会代表及广东军、政、商、学各界代表参加。十时开会，当请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林祖涵宣读孙中山先生遗嘱；次全场静默三分钟，为中国革命领袖及一切革命死难烈士致哀；次由主席邓中夏宣布开会宗旨；次由秘书长刘少奇宣读各团体祝词；次请政治委员会代表林祖涵、国民党中央、代表詹大悲、中国共产党代表彭述之、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林根相继演说；次通过致全世界工友及全国各界通电，最后高呼“国民政府下之五一，是团结一切革命势力、反对帝国主义的纪念日”等口号而散会。

广州工、农、兵、商、学各团体在东校场开五一纪念会，到团体八百余，人数三十余万。由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省农会等代表为主席团，一致议决：通电全国，促民众一致兴起奋斗。会毕大巡行。

上海总工会因当局禁止五一集会，特秘密举行五一纪念代表大会，到七十余工会、代表二百余人，当议决：（一）致电庆祝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开幕；（二）电促国民政府出兵北伐；（三）对上海工贼所召集之纪念会加以痛斥。末后齐呼“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拥护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等口号而散。又，总工会所属各工会，亦均各自举行纪念会。

杭州印刷工人联合会等三十余团体、四千余人举行五一纪念会，大呼打倒资本帝国主义等口号。

惠州各界举行五一纪念与讨伐段祺瑞惨杀北京爱国民众大会，到万余人，通过拥护工、农两大会，惠州各界一致努力革命工作，援助北京民众，讨伐段祺瑞，打倒奉、

直军阀等议案。会毕巡行。

汕头全市工人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三百余人，开会两日，通过议决案甚多。

桂林市民举行两大会议：（一）追悼“三一八”烈士大会，上午举行，与祭者二万余人，议决驱逐帝国主义走狗段祺瑞，废除《辛丑条约》，促开国民会议，拥护国民政府等四案，通电全国同胞一致进行；（二）劳动节纪念大会，下午举行，各工会及学校均参加，一致通过拥护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援助北伐国民革命军，通电湘、赣、鄂劳工界一致拥护国民政府，实行三八制，援助省港罢工工友，联合世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一致奋斗等。

上海曹家渡工人为纪念五一节在该地平民学校开代表会，到六十四人，事为警署探悉，当派警察四五十人，将代表尽行拘捕，解送地方警察厅。

重庆工界举行“世界五一劳工圣节四十周年纪念重庆游行大会”，到工人团体五十余，达数千人，精神甚为奋发。大队游行至巴县公署前正大呼“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打倒资本主义”时，突来反动派暴徒多人，向工人横施毒殴，受伤者十余人。事后由被伤工人等向法院控告缉凶惩治。

天津总工会秘密筹备五一纪念，本甚热烈，后为当局探知，至时派大队军警分布各工厂附近，禁绝行人往来，并捕去工人二十余人。有数工会工人冒险冲去开会，均遭阻止，致起冲突。

广东全省第六次教育大会开幕，主席金曾澄致词，谓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当努力建设事业；教育厅长许崇清致勉词，谓教育界当认定方向，从事教育之革命，以协助政府之革命事业。

五月二日

广州工、农两代表大会第二日联合开会，谭延闿报告国民政府现状；蒋介石报告工、农、兵大联合；谭平山报告中国政治状况及社会状况。当经通过三种报告决议案。

广州华侨协会召集各华侨团体举行反抗帝国主义大会，到有各地方华侨、各界代表及印度、越南、朝鲜三国代表，当场议决：（一）请国民政府向各殖民地压迫华侨之帝国主义提出严重抗议，如无圆满答复，则通告海内外实行排斥彼等货物并实行经济绝交；（二）唤起侨众诚意与各殖民地弱小民族联合做反帝国主义运动；（三）请国民政府通缉为帝国主义者做走狗之汉奸等案。

上海中华织袜厂一部分女工，因要求加工资不遂，一致罢工。

上海通和纺织女工，因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经厂方允每人增加百分之五。

五月三日

工、农两大会第三次联合会议，由全国总工会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代表、上海

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报告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经过情形。并通过由两大会发表拥护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军案；由两大会致函国民党，感谢以前扶助农工之努力，并望清除党内破坏工农运动之分子，及接受孙中山先生遗嘱，切实扶助工农，完成国民革命案；请愿国民政府速即出师北伐案以及慰问罢工工友等案。

东兴华工邱华山，因无过界纸被法兵拘充苦役，其子两人前去省视，邱即停工和两子谈话，在场监押的两法兵当即开枪击毙邱华山。该地外交后援会为此严重质问法政府，并提出要求：（一）惩办凶手；（二）赔偿被害者之家属；（三）交回被害者之尸体；（四）以后不得惨杀及虐待华人；（五）取消过界纸。

五月四日

广东三万余民众开五四纪念大会，甘乃光、黎樾庭、褚民谊等均有演说，通过援助岭南大学被革同学等案。

上海学生联合会邀集各界代表在反动势力严禁集会中举行五四纪念会，请杨杏佛、杨信孚等演讲，并通过宣言。

广东第六次省教育大会通过教育宗旨决议案如下：注重平民化革命之教育，以完成国民革命。

工、农两大会第四次会议，由李立三报告世界工会运动状况，通过致电英工会，援助省港罢工及定期追悼全国革命运动死难烈士等案。

旅德华人在留德学生总会讨论段祺瑞残杀北京民众问题。议决通电声讨。

上海三新纱厂工人因厂方拟改用新法接头，并欲将旧有工人酌量撤换，纱间工人停工反抗。后厂方复开除小头目二人，激成全体六千余工人一致罢工。

宁波五四纪念大会，到二十余校、十余团体，计三四千人；全国学生总会亦派代表到场演说。

杭州学生联合会召开五四纪念大会，到五六百人。

五月五日

全国劳动大会第五日会议，由刘少奇报告职工运动之发展；苏兆征报告省港罢工状况；又推定委员组织职工运动之总策略、组织问题及其运用之方法、经济斗争及斗争之步骤、罢工战术、宣传教育问题、劳动法大纲、工会中之女工童工问题、失业问题、合作社问题、修改章程问题等议案审查委员会。开会时并举行马克思一〇八周年纪念。

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第五日会议，请胡汉民报告农民国际状况。

工、农两大会举行马克思一〇八周年联合纪念大会，到二千余人；全场高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高唱国际歌，并请陈启修、郭沫

若等演说。

五月六日

广东第六次全省教育大会，致电劳动大会及农民大会，誓与农工同志永远携手进行。

全国劳动大会第六日会议，请胡汉民报告游俄经过，刘少奇报告全国总工会一年来工作经过，李立三报告上海职工运动情形，并通过三报告的决议案。

五月七日

国民党中央青年部召集广东各界民众在广大操场举行五七国耻纪念大会，同时反动派亦在东校场举行，双方发生冲突。

广东第六次全省教育大会通过党化教育案。

全国劳动大会第七日会议，请鲍罗庭报告世界革命状况，邓中夏报告职工运动总策略；一致通过，又大会致电声援英国总同盟罢工工人。

长沙学生界举行国耻纪念会，叶开鑫竟令军队到场，向会众开枪轰击，立时毙命者三人，伤三百余人。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告全国民众，略谓：欲从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严重压迫之下求解放，唯有集中于本党旗帜之下，一致向帝国主义奋斗。本党将尽其能力，为民众先驱，以求国民革命之最后成功。

芜湖人力车夫千余人，因车行议定增加车租，一致罢工抵制。卒由行主承认不加。

英工党要人迈朗抵沪，调查英人活动及华人意见。上海各工会及国民党人，因迈氏向同情于被压迫民族，都表示极烈的欢迎。他离沪时发表《告别工人书》，谓回国后，当将中国工友所受痛苦，尽情宣达于英国工人前，极力促成中、英工人联合，打倒吾人共同之仇敌。

武昌学生三千余人为纪念国耻开会游行。

汕头各界一律休业一天，举行国耻纪念大会，到二万余人，会毕大巡行。

惠州五七国耻纪念，到万余人，会毕大巡行。

广州农、工、商、学各界团体代表千余人，请愿国民政府收回岭南大学，当被采纳。

五月八日

湖南战争，人民一致助唐、反吴、反叶，学生尤为出力，亲赴前线，慰劳演讲。嗣唐军退出长沙，叶军入城，因愤学界之助唐，一见男、女学生，即加毆杀，日必数十起。市民大愤，反抗益烈。

厦门学生在街上分贴国耻纪念短条，被工部局巡捕拘去十三人，旋释出。学界大

愤，向领团提出抗议，并联络各界恢复外交后援会。

上海日商内外棉第十五纱厂工人俱在工场外吸烟，当被开除；工人略加抗辩，又被用刀砍伤。在场工人不平，一致罢工，并提出抚恤受伤工人等要求四项。经厂方酌加允纳，始行复工。

五月九日

上海华租界当局严禁开会游行，各团体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各青年团体联合会、对日市民外交大会，均分别召集代表大会纪念国耻。

全国学生总会及上海国民党特别市党部、学生联合会等团体，纷纷通电援助英国大罢工。

全国劳动大会第九日会议，由赵时言报告宣传与教育问题；并通过致电鹿钟麟等，请释放京汉铁路委员苏文彬，致湖南省长唐生智促其反吴到底等电。

厦门鼓浪屿为国耻纪念休业，厦门有七千人的大游行。

福州学界千余人举行国耻纪念游行。

五月十日

广东农民代表大会第十日会议，由黄学增报告英国矿工大罢工事件，并决议致电援助；北京外交团农界代表郭竹朋报告北上经过；广西、湖南、湖北、山东四省之参加代表报告各该省农民运动状况。

惠州革履工会，向东家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结果完全胜利。

五月十一日

全省劳动代表大会、广东农民代表大会、教育大会、商界联合会及广州总商会、市商会、市商民协会等举行工、商、学联欢大会，各界团体均推代表演说；当场并通过组织工、农、商、学联合大会议决案。

全国劳动大会第十一日会议，香港及广东各地代表报告该地工人运动状况，通过罢工战术，经济斗争最近的目标及其进行步骤等决议案。

上海培林蛋厂工人，要求改良待遇，全体罢工，提出增加工资、添发抵御冷□号衣、不准无理压迫等条件八项。

五月十二日

全国劳动大会第十二日会议，通过《劳动法大纲》、合作社问题案、失业问题案，散发宣言对东方各国工友统一运动案，及代表团提出四十八件，并大会致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函文一通。选出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三十五人。晚间举行闭幕典礼。

广东全省教育大会通过广东教育厅注重农工教育案。

国民军领袖冯玉祥及国民党要人徐谦抵苏俄后，该处中山大学特开会欢迎，校长

拉狄克致欢迎词，谓国民军目前当务之急为：联合南方之国民党与全国民众作更密切之关连，以完成中国民族独立之使命。冯、徐亦均有答词。

上海喜和纱厂工人因要求辞退工头及增加工资，停工一日，得厂方之允纳而上工。

上海浦江铁业驳船工人向行主要求加薪不成罢工。

广西□兰县农民因组织农民协会，被该县知事勾结土豪、劣绅带引军队大肆惨杀，被焚四十余村，死二百余人，遭难农民派代表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请援。

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举行一周年纪念大会。

五月十三日

广州工、农两大会代表，致祭黄花岗烈士、沙基殉难烈士及省港罢工纠察队烈士。

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行委员开第一次会议，决定援助英工人罢工办法：（一）发表宣言；（二）通告全国各工会援助；（三）各地举行援助英国工人罢工周；（四）电请赤色职工国际援助；（五）作广大之宣传工作等。

汕头国民外交后援会通电国民政府省政府及全国同胞，以不平等的《中法越南通商条约》，到今年八月期满，应力争取取消，另订平等待遇的新约。

上海华洋印刷公司，无故开除工人三名。全体工人要求收回成命，并请酌加饭资，不成，一致罢工。经印刷总工会出任交涉，得满意解决。

五月十四日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广东办事处召集各路代表大会，通过拥护国民政府。

唐生智通电声讨吴佩孚。

留德学生总会对时局通电，主张召集国民会议。

湘战中吴佩孚的走狗叶开鑫，因形势危急，特派代表赴粤向国民政府表示好感，希图缓和北伐。湖南省党部电请严厉拒绝。

五月十五日

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第十三日会议，通过宣言及广大农科学生会提案，并选出广东省农民协会第二届执行委员十三人，下午举行闭幕典礼。

国民党举行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八日，通过蒋介石等提出的《整理党务》等案。选举张静江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召集各地分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开会四日，议决到各地组织各界妇女联合会，援助被婚姻压迫的女子等案多起。

北京学生总会派代表多人，分赴苏、浙、湘、鄂、粤、桂各地，宣传“三一八”惨案之真相，促国人一致声讨殃民军阀及一切反动势力。

河南杞县红枪会，被寇英杰军队进攻，会众坚强抵抗，卒以众寡不敌，被焚烧二

十余村庄，死会众五十余人，住户成年男、女七百余人，儿童三百余人，军队亦死百余人。

五月十六日

广东各县农民代表团请愿国民政府及省政府惩办逆党，当得满意之答复。

五月十七日

广东农工商学联合会成立，当议决推代表向国民党中央请愿采七项决议案；通过宣言；并通告各地民众举行示威大巡行，作广大的宣传。

广州糖面工会开成立会，到十余人。

汕头国民外交后援会，电请国民政府速出兵北伐。

衡阳人民反对叶开鑫残杀长沙学生游行、示威运动大会，电请国民政府出师讨叶。

上海商界教育界三十余团体，一致反对孙传芳征收淞沪宅地税。

五月十八日

浙江象山石浦镇农民百余人，为宁象南沙灶地悬放局长胡佩珍，横征暴敛，不堪苛扰，向当道请愿，孙传芳允为查究。

国民政府任唐生智为北伐前敌总指挥，刘文岛总指挥部政府部主任。

五月十九日

天津邮差工人三百余，为改良待遇，赴邮政总局请愿，要求成立邮务公会，增加工资等条件，当经局长签字担保实行。

五月二十日

无锡德兴、泰和顺、乾丰等十九家丝厂女工，以乾牲丝厂经理霸阻德兴丝厂发给女工定洋及增加工资，非常愤激，一致罢工对待。后经官厅及商会竭力调停，各厂复将所存定洋一律付发，方得解决。相持期间计达十日之久。

上海美人所办之达连铁厂工人，因厂主突增工时，不加工资，一致罢工反抗。

广东全省商民协会代表大会开幕，到各地代表一百三十余人，国民党中央商民部、广东省党部、全国总工会等均派代表到会演说；会场高呼“全国商人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买办阶级”等口号。

江西全省学生总会开成立会，议决学生本身利益问题案、反帝国主义运动案、反基督教运动案、帮助工农运动案、平民教育运动案等多起，并通过成立宣言。

五月廿一日

全国总工会汕头罢工委员会纠察队队员在英领事署附近贴黏样语，英人忽来撕去，并加毆骂，经劝阻后，该英人即入英领事署下半旗，传令海军武装上陆，幸队员潜避，未酿大故。事后令罢工委员会报告驻汕交涉员，请求严重抗议；汕头各界决联合作反

英之示威运动。

五月二十二日

国民党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行闭幕礼，谭延闿读闭会词，略谓：此次议决《整理党务案》，全依据总理联俄策略与容纳共产党而来，实是确定两党合作办法，团结革命势力，如再有挑拨离间，当以纪律制裁。蒋介石演说：以后大家团结，取消怀疑，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均需消灭；并望汪精卫、胡汉民均销假共视事和衷济。

五月二十三日

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召集开全市党员大会，到各界党员二千余人。孙科主席。蒋介石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之经过及《整理党务决议案》。吴稚晖演说北方压迫势力之凶猛，劝消除党内冲突，一致对外。

上海药业伙友因生活艰难，要求各店主加薪不允，一律罢工。后由县知事出事调停，确定加薪办法，双方签字解决。

五月二十四日

汉口英美烟厂装置新机，拟裁职工，工人大起恐慌，一律罢工以抗。旋老厂亦响应，声言要打倒洋资本家的专横。武昌、汉阳、汉口三镇学生及工人纷纷募捐援助。

五月二十五日

广东运输工会联合会成立，全国总工会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均派代表莅场演说。

五月二十六日

广东各界援助英国大罢工委员会，决议各种进行方法，并发表宣言，谓：英工人之胜利，即我们之胜利，全国同胞应一致援助。

上海复旦大学心理学院附设实验中学学生，因反动校长郭任远摧残爱国运动，一致罢课反抗；郭调军警压迫学生离校，并宣布暂停办。

五月二十七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全体会议发表宣言，要点谓此次决议案，明示本党不让帝国主义与军阀利用反共产口号，以摧残国民革命，乃一致接受《整理党务案》，期消灭对于合作原则真正目的之怀疑，更决非对于任何方面表示无意识之妥协，实为排除障碍，团结革命分子，以与帝国主义军阀反动派作更有力之战斗。

华侨协会召集驻粤华侨各团体开反抗帝国主义对华侨苛例讨论大会，议决：（一）促国民政府改善《中法越南通商条约》；（二）促各殖民地华侨团体一致反抗一切苛例；（三）通告海外华侨，实力赞助国民政府北伐；（四）援助为党奋斗被帝国主义驱逐出境的华侨。

苏州漆作业工人七百余，要求加工价，各店主不理，愤而罢工，结果胜利。

五月二十八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议决：任蒋中正组织部长，顾孟余任宣传部长，甘乃光农民部长，邵元冲青年部长。又发《告国民书》，要点谓：国民党团结一致，参加革命运动，如旁观怀疑，实为革命障碍。

五月二十九日

广东农工商学联合会主席团，请愿国民政府接纳该会七项议决案：（一）取消火油专卖；（二）省港罢工案，由省港商工代表、广州政府代表与香港政府代表共同组织一委员会，速谋解决；（三）对除盗安民，望政府拟定全盘具体计划，积极进行；（四）组织劳、资仲裁机关，解决劳、资间之一切冲突；（五）惩办贪官污吏，慎选民政人员；（六）严禁散布谣言；（七）建筑道路，黄埔开埠，改良港口，完成粤汉铁路，普及教育，整饬教育，增加教育经费当经完全接受，并由国民政府明令公布，表示与人民合作。

上海市民于下午一时为五卅烈士公墓行奠基礼，参加团体一千余，代表五千余人，极悲壮激昂之至。礼毕游行。又，上海学生联合会今日上午先行单独举行该会被难三烈士的周年追悼会。

五月卅日

今日为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日，上海全埠工人停工，学生停课，商界休业。上午十时起，各界市民在公共体育场举行五卅周年纪念大会，到工、商、学各界团体百余，人数达五万余，以工人为最多。张超主席，李宣誉总指挥。全场纠察队由总工会组织，计一千五百人，分作一百五十队，维持秩序。开会后，全场静默三分钟致哀；一致通过宣言、通电及《告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书》；最后三呼“为五卅烈士复仇”“继续五卅运动精神”“民族独立万岁”“民族统一万岁”等口号。会毕，出发游行。下午，学生联合会及总工会所组织的教育演讲队，在租界各处大举演说，尤以去年惨案发生的南京路为最多，一时万人拥挤，交通断绝，群众高呼口号，作极激昂的示威，帝国主义者的走狗虽用水龙驱逐群众，以机关枪相威吓，但群众的勇气并不稍减，帝国主义者始终不敢再施屠杀，仅拘捕数人而已。

广州各界停业。正午十二时在东校场举行纪念大会，工、农、商、学、兵各界团体二百余，达二十余万人，会场设立工农、学商、军政演讲台三座。推国民党中央党部全国总工会等七团体为主席团。宣布开会后，读革命领袖孙先生遗嘱；次默念五卅烈士三分钟；继报告演说，通过宣言、通电；最后齐呼口号，声冲云霄。会毕列队大巡行。又，西关民众，上午单独先开一纪念会，参加者五千余人，会毕巡行，齐赴东校场参加纪念。西关此种大运动，为五十年来所未有。

南京纪念会到数千人，一致主张继续五卅精神，达到十七条要求。又南京下关为五卅惨案发生地之一，今日亦有五千余人开纪念会，并分组演讲。

反动势力高压下的北京，五卅周年被禁止开会，各校被军警监视，并解散北京学生总会。

杭州纪念会，到百余团体万余人，褚辅成主席，一致主张继续五卅精神，打倒帝国主义及勾通英、日之卖国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力争十七条件。

厦门鼓浪屿各界休业，一致在教育会公祭五卅烈士，午后学生渡鼓演讲。

开封各校均停课致哀，参加纪念会及游行者有四十余团体，约五六千人。

九江纪念会，到三十余团体、万余人，会毕游行，中、小各校学生一律出发演讲。

反动军阀宰制下的天津，大规模的纪念五卅不可能，唯学校多数停课，各自开会纪念，再出发演讲。华界商店一律休业，并有五六百人在商会会所开会。各工厂工会，亦均分别开纪念会，由总工会派人参加演讲。

广州第十七师师长吴铁城谋乱有据，被军事委员会逮捕。

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王景云，前被淞沪警察厅拘捕羁押，兹以五月内各种重大纪念均已渡过，因于今日下午四时许得释放。王出狱后，各工会热烈欢迎。

金银业工人前因要求增加工钱而罢工，现经店主承认，圆满解决。

后 记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是20世纪初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文化月刊，它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该刊先后由上海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但印量都非常少，这些影印本（繁体竖排版）大多珍藏在大型图书馆的特藏室，作为学术研究之用，一般读者难以读到。

其实，《新青年》创办初始是想改为横排版的，这个建议最初也是由钱玄同提出来并得到陈独秀认可的。他说：“《新青年》杂志拿除旧布新作宗旨，则自己便须实行除旧布新，所有认作‘合理’的新法，说了就做得到的，总宜赶紧实行去做，以为社会先导才是。”但是横排版的想法却遭到群益书社的反对，理由是费工且费时。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其初衷也是想让更多的普通读者能阅读到这部重要的中国现代文献。此书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可谓圆了《新青年》创办者当年的心愿。

《新青年》简体横排版最初是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席云舒博士利用业余时间，历时6年，将《新青年》繁体竖排版整理为简体横排版电子文档，合计11卷（含季刊和不定期刊）63号，计700余万字。2008年底，宁夏人民出版社经与席云舒博士多次联系沟通，最终达成出版共识。目前，经过细致的加工整理，《〈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终于面世。

《新青年》创办时正处于白话文之滥觞、语言文字规范均尚未形成之际，前三卷只有断句没有标点，第四、五卷大多都是“一顿到底”的标点，这些文章点点滴滴地展示着当时白话文和新式标点从不规范向规范发展的过渡。我们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请教了很多相关领域的专家，特别是得到了国家语委厉兵教授的热心支持和帮助，厉兵教授百忙之中给我们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同时，鲁迅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教授为本套书

的出版撰写了推介信，原宁夏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龙城顺先生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此，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还聘请了蔡永贵、马丽珠、关爱群、宗志远、王琨、潘忠、吕国安、王丽云、武耀东、苏惠、喻通、白玮、刘涵等 13 位老师对本套书进行了校订工作，出版前我们又特邀了郎伟、李仁安、杨胜利、陈春霞、周惠玲、马丽珠、白玮、陈海洋、喻通、白丽等老师，进行最后的审读把关。付梓之前，对他们的真诚帮助表示深深的谢意。

编者

2011 年 6 月 25 日

新青年

简体典藏全本

研究新文化的历史与中国革命史，《新青年》都是必读的杂志。它不仅开始了新思想与新思维的历程，掀起了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是，体现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与精神风采。

此次以简体横排的方式面世，对普及历史知识及研究新文化的传播史，都有不小的意义，是《新青年》传播的重要渠道，将把它从历史的深处拉到今人的阅读视野里，会有亲切的感觉。

孙郁 鲁迅博物馆原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新青年》是我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份杂志，它的创刊揭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随后又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主要阵地，它的创办人陈独秀和主要撰稿人鲁迅、胡适是五四新文化的三位旗手，他们和《新青年》的其他同仁一道，为我国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至今仍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吴义勤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教授

ISBN 978-7-227-04748-3



9 787227 047483 >

总定价 880.00元